民主先声

郭　泉

郭泉，男，1968年生。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中国新民党的宗旨是：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提倡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

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刑事法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等职。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自由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韩国佛教圆融思想研究》（台湾《法藏文库》佛光山文印社2002年版）、《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群言出版社2005年）、《自由文学阐释学派2005》（中国文学出版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01年获南师大211工程资助项目一项。2004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2005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思想工作一等奖。2006年获第六届金陵文学奖。所指导的研究生已有五届毕业（21人毕业）。

郭泉联系办法：手机：13151423196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目录

郭泉：民主先声20：极权、资本与媒体，联合绞杀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郭泉：民主先声21：奠定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不是学问的多少，而是良知和勇气
郭泉：民主先声22：极权集团正在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他们的腰包里去
郭泉：民主先声23：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郭泉：民主先声24：财富向一部分人积聚，导致中国的权贵资本专政
郭泉：民主先声25：你们没有权利卖人民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土地
郭泉：民主先声26：中国人民应该知道信仰可以让国人善良、正义和奋起
郭泉：民主先声27：解除报禁、新闻自由，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步
郭泉：民主先声28：负责涉日案件的中国警察，应该多看几遍《南京》和《南京梦魇》
郭泉：民主先声29：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郭泉：民主先声30：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郭泉：民主先声31：台湾问题只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制宪政道路
郭泉：民主先声32：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郭泉：民主先声33：所有政治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另一是专制，而中国不幸一直是后者
郭泉：民主先声34：先富人群根本不想和人民共同富裕，他们想要的是经济特权
郭泉：民主先声35：还有什么丑闻人民不能承受？
郭泉：民主先声36：我们要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郭泉：民主先声37：没有民主制，就没有新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38：中国必将在20年内实现民主体制
郭泉：民主先声39：让文学副教授发表文章必须写错别字的时代，是极端堕落和反人民的
郭泉：民主先声40：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郭泉：民主先声41：党指挥枪，其实就是军人政府，实质是军事独裁政权
郭泉：民主先声42：21世纪，中国必须构建以民主制度和国学教育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制
郭泉：民主先声43：那些认为"农家乐"的人，是没有良心的
郭泉：民主先声44：谁该向谁感恩？到底是党养活了人民，还是人民养活了党
郭泉：民主先声45：面对人民的苦痛，我们怎么能背过脸去，丢下他们不管呢？
郭泉：民主先声46：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使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有一种原始恐惧
郭泉：民主先声47：中国必须尽快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否则将是人民起义
郭泉：民主先声48：别我们一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你们就污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
郭泉：民主先声 49：一党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一种反人类罪行
郭泉：民主先声 50：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郭泉：民主先声 51：我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当八年中国总统，然后回老家种田养猪
郭泉：民主先声 52："民主"就是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郭泉：民主先声 53："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可以用手里的选票选出自己的执政党
郭泉：民主先声 54：所有被迫害和被玷污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郭泉：民主先声 55：同胞们，以民主的名义，我们团结起来！
郭泉：民主先声 56：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郭泉：民主先声 57：民主制度作为一种选择执政党的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郭泉：民主先声 58：联合国应该为各国民主进程保驾护航，而不能受控于个别专制国家
郭泉：民主先声 59：执政党绝对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才是主人
郭泉：民主先声 60：只要还没有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就还处在人类的史前时代
郭泉：民主先声 61：2007 年 11 月 1 日，我启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
郭泉：民主先声 62：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党专制的"会说话的工具"
郭泉：民主先声 63：警察同志，我也想"带好儿子教好书"，可是我怎能不管国家人民呢？
郭泉：民主先声64：我们必须拨乱反正，其唯一结果只能是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 65：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想和人民共产
郭泉：民主先声 66：前苏联的一党专制是民主俄罗斯的前夜，中国也将如此
郭泉：民主先声 67：现在谁还认为中国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谁就该下地狱



郭 务院令”颁布，东京新闻小坂井先生“以身试法”成功
郭 民主政党应高度警惕中国国民党复辟独裁
郭 继续做共产党的帮凶吧
郭 让我远离了南京“剧毒地带”——仙林大学城
关 先生
郭

郭泉：民主先声 1：人民满意才是检验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

和谐，不是你一个人说和谐了就和谐了。和谐是一种双向行为，而不是单向行为。

这个道理很简单，最简单的例子是性和谐：双方都愿意并都开心，才叫和谐；而一个人想和谐但另一个人认为不和谐或根本就不想和谐，这种行为无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是在根本上属于一种强奸的范畴。

和：禾口之合，禾，粮食之意。禾与口结合，意思是人民有粮食吃，大家都能吃饱，于是就和。

谐：言皆之合，言，言论之意。言与皆结合，意思是人民都能开口说话，言论自由，于是就谐。

不让人吃饱，买断卖断工龄、强卖强买土地、下岗失业举世闻名，怎么能和？

不让人表达，禁报、禁言、封锁消息世界第一，怎么能谐？

所以，人民满意才是检验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

其余，我就不废话了。

郭泉：民主先声 2：“中国国情”不是你们搞腐败的借口和挡箭牌

有些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手里有两套法宝：一套是“中国国情”，一套是“与国际接轨” 。当制定不利于人民的政策时，如房改，要求大家自己掏钱购买商品房，就说是和“国际接轨”，理由是，人家外国都是自己买房子，没有福利分房的说法，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恰恰忽略了人家外国土地私有这个关键因素，中国人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都属于国家，却要被迫付出昂贵的价钱购买一套只有使用权的商品房，而当人们对此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又会说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

又比如医改、教改，人家其他国家是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但这一点他们又不与国际接轨了，又强调中国国情了，什么财力不堪重负啦之类，结果导致大家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又比如所谓“高薪养廉”，据说是新加坡、香港的成功经验，所以要和“国际接轨”，所以五次三番地给公务员加薪。但人家严格的监督制度，对公务员近乎苛刻的约束，廉政公署等等，他们又不和国际接轨了，又强调“中国国情”了。

韩国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只有 14 辆公务车，这点他们就不愿意接轨，中国现在一个乡镇 14 辆公车都不算多吧？这就是中国国情。

郭泉：民主先声3：在被强奸中活着和因反抗而死，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我今天捡破烂路过一个村子。看到一群人围着什么看。挤进去一瞅，是个男人在强奸女人。

我大惊，问：“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村里人告诉我，那男的是村长，原先村里人包括那个女的生活很穷，经常饿死人，不仅受村里的地主恶霸欺压，还受外村人欺负，被恶霸和外村人强奸、杀戮，后来是村长领着一帮人把恶霸和外人打倒、赶走，大家选他当村长，村长又让大家都吃上了饭，所以村长的强奸是让被奸者吃饱饭的强奸，比以前的强奸强多了！大家觉得还是村长的强奸比较好。

我说：“那女的怎么不反抗？再说你们都是被奸者，怎么不帮这个妇女？”村民象看个外星人似的看着我，说：“反抗！怎么不反抗！反抗这个，那个新的又这样，我们村村长没人能管，叫谁当村长谁都这样！再说，村里的民兵、治保联防队都是村长的人，他们有刀有枪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不想活啊!”

我说：“那你们连骂都不敢骂，就这么不吭一声？” 村民说道：“骂？谁能骂过村长啊，他有大喇叭，他在广

播上把你家的丑事一广播，把他的道理一讲，村里人谁信你啊。”

我说：“那你们可以告他啊。” 村民说：“告？我们村规定，近几年的主要是解决吃饱饭和吃好饭的问题，在解决这个主要问题过程中出现的东西，可以搁置不谈，等大家都吃的很好的时候自然就解决了，仓廪实而知礼仪啊，是生存还是不被强奸？当然是先要生存权。再说了，饱暖思淫欲，强奸，这是吃饱饭必然带来的阵痛，是村情决定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问那个被奸的妇女：“你不觉得你的人权和尊严受到凌辱吗？” 妇女在下面喘息说道：“啥叫人权和尊严啊，俺不懂，俺只知道他这样压着俺、弄俺，是不对的，俺挺累挺疼挺难受他还不给钱。”

我说：“怎么素质这么低！” 旁边村民冷笑道：“你以为你聪明，村长的治村方略是一整套的，要联系地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村长要随意强奸我们，首先，给我们吃饭，要让我们感激他；第二要给我们理想，说跟着他干以后会更好；第三，有民兵和治保联防队，给他保障；第四，有大喇叭、黑板报给他宣传，帮他批判不服的社员；还有一条，他让村里小学收费，于是很多人上不起学，于是就不懂人权和尊严，于是就没有你这么多想法，于是村长就可以清清静静地强奸。而那些上完学的孩子，一般是村长他们家族的或者得到村长照顾的，不会对抗村长；有几个倒是出息的穷孩子，但一毕业，村长就让他们到村委会或村办企业，待遇很好，都对村长感恩戴德，加上村长对他们灌输的强奸教育很多，这些知识分子，女的想为村长献身，男的想在村长强奸时帮他按住腿，那里还有你这些胡思乱想。这样，村里比如有一百人，80人是没文化的文盲，有文化的20人，大部分成为村长一个阵营的，你说，再有个把不老实的能翻什么浪？所以在我们村，什么都是为村长的强奸合理服务的。”

我说：“那你们就愿意这样被强奸下去？”村民说：“也不象你说的那样悲观。村长还是在不断的往好里做的。他大儿子偷村里的粮食，被他打断了腿；村长有次喝醉酒，把一个幼女强奸致死，他清醒后打了自己好几耳光，关了自己三天禁闭，没吃饭。你看他现在强奸，动作就很文明，被强奸妇女身下还垫了村长的军大衣，村长还知道戴安全套，还非常与国际接轨，跟录象里外国人干事似的，耶儿耶儿地叫。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说：“那你们就眼看着被奸者遭受痛苦的蹂躏？” 村民沉痛地说：“是啊，我们一直在致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激进的人认为被奸妇女要使劲推翻村长，但这样容易使矛盾激化，影响村里团结安定的来之不易的局面。更多人以为，挣扎解决不了她现在的痛苦，反而有可能增加，而且还会影响全村的建设。既然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无法迅速改变，就只有顺其自然，达成共识，让这个被强奸的妇女要承认自己是弱势群体，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现象，短暂阵痛，不要挣扎，可以换一个舒服点的姿势，主动迎合强奸，把村长当成一个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幸福的好男人，配合他的动作。这样，就不会痛苦，还可以体验到欢乐！”

这时，村长听我们议论得越来越没边，对旁边的村小学校长说：“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干，让他们的逼嘴一闲着就胡说，你跟他们讲，现在专家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杀了很多少数民族兄弟，而秦桧是社会和谐、民族融合的急先锋，秦桧才是民族英雄呢。”

村民一听小学校长说这话，顾不得和我议论了，立刻面红耳赤地和小学校长争论起岳飞和秦桧到底谁是民族英雄的问题。一个村民对村长竖起大拇指：“村长真民主啊，连这样重大的问题都拿到桌面让我们和校长一起辩论，过去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可见我们是真正的民主啊！”村长微微一笑，趁他们去争论岳飞不注意强奸了，又吃了一个蓝色小药片，拉过另一个少女干了起来。

在这片热闹的场面中，我忽然什么都明白了，明白得自己觉得寂寥，觉得害怕，觉得自己可怜，我忍不住要哭出声来，脱口的却是一句：“收破烂哎——”全村人一楞，都鄙夷地看着我。

（本文选自网络，稍做修改，作者不详）

郭泉：民主先声4：和平时代，腐败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

近 6 年中，中国因腐败问题倒下的官员是“三大战役”的总和。

如果以受到纪律处分为受伤，以开除党籍结束政治生命为死亡作比较，情况如下：

死亡：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 46993 人，5 年来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开除党籍)137711 人，是三大战役的近 3

倍；

受伤：三大战役中，我军受伤人数为 183624 人，而在 5 年中因腐败受伤(纪律处分)的人为 708439 人，是三大战役的近 4 倍；

将领伤亡：在反腐败中倒下的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被开除党籍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当于三大战役中的阵亡

县(处)级干部 28996 人，人数相当于师长阵亡；

省(部)级干部 98 人，人数相当于军长阵亡。

而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等，则相当于总前委阵亡。

损耗：三大战役中，我军损耗火炮 1108 门，枪 24825 支，子弹 9488 万发，炸药 168972 斤。所有这些加起来，抵不上一个厦门案造成的损失。

战略：淮海战役中的民工支前是战斗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更是高达 1：9。

而现在，虽然老百姓对腐败现象咬牙切齿，但是也仅限举报揭发。

郭泉：民主先声5：两党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阴阳学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于是，西方一些国家认为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文化奠基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而没有在野党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从此，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西方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两党（阴阳）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郭泉：民主先声 6：伟大中国的坚挺，不能指望一群阳痿病患的"理性"

1945 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1985 年 8 月 15 号（8 月 15 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但是，伴随着"中国愤青派"的出现，另一种声音以及他们的派别也甚嚣尘上。这一种声音和派别就是"过度理性派"，当然，他们自称为"理性中国派"。他们认为不应该纠缠于中日间过去的鸡毛蒜皮的陈年旧帐，要眼望中日友好的巨大利益，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还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中日关系新思维理论，这个新思维认为，如果早在 20 世纪就建立日本人设计的"大东亚共荣圈"将会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福祇。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新思维，而是二战期间所有汉奸的旧思维。

我们不否认经济一体化理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福利而对日本政府所做的有害于中国民族情感的事情缄口不言。我们更不能容忍中国的"过度理性派"根据他们的所谓"理性"对爱国青年的攻击。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度理性派"的攻击对"愤怒的青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低估由于他们占据了宣

传和理论的有利地形而形成的对社会正气的巨大的削弱能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中国的“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症状负责。因为在他们的过度理性的影响下，一些被他们的过度理性蒙蔽的中国人开始无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而向“中国愤青派”的爱国青年质问诸如“你们为什么要反日？”这样完全丧失民族情感的弱智问题。

一个过度理性的人，会被这种过度的理性扼杀了情感。过度理性的人其实是一种超理性型忧郁症病人，他们永远只信任自己的理性，他们以“现实”的“个人利益”来考虑一切事物，一旦与现实和个人无关、相互抵触，他们的反应永远是“不可行”。这种“超理性型忧郁症”是导致“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罪魁祸首。人的情绪必然跟着信念而行，当一个人的生命、理性都在大呼“不必要”和“不可能”时，情绪当然会变得忧郁沮丧、无力痛苦，“阳痿”也就产生了。当然，阳痿也有完全是生理原因的，但是来源于过度理性的精神性阳痿却是占绝大多数的。过度的理性，会将来自内在的冲动统统封杀。表现在中日问题上，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把靖国神社、教科书以及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因此，如此的过度理性，使得他们再也激动不起来了。每一种生命困境肯定都有出口，但是过度理性的头脑，将可能的出口都堵死了，因为那种对生命的无力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集结了强大的忧郁情绪，将人卷入无底的深渊。

过度理性是无法行动的。这正是“愤怒的青年”对“过度理性派”展开批判的逻辑起点。

“愤怒的青年”认为过度理性造成的无法行动的根源在于，过度理性不能容忍扰动项（perturbation）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可能因为扰动而出现的结果，很容易倾向于拒绝接受，进而以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扰动所发生的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他们在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反而表现得超级适应，过度理性，好像事情是发生在别国而与中国无关一样。他们之所以过度理性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设限。而当凡事过度诉诸理性就会忽略个人的预感、直觉和理想。

过度理性派的这一切都招致了“愤怒的青年”的猛烈批判。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因为他们都多少带有反对“过度理性”的“反现代的意味”。他们强调丢弃过度理性、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所以，愤青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他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城市过度理性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愤怒的青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过度理性化的组织生活方式和过度理性化的思维范式。

郭泉：民主先声7：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了，一些类似的黑煤窑事件也不断被揭露。我们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山西黑砖窑事件，说明在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我们有很多日进斗金的富豪，他们的大企业一年就可增收近亿元的财富。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又比如，我们很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公有制大企业，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挖走了，卖掉了，甚至白送掉了，变成了美其名曰的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原共产党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不用多说，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都是当年靠着亿万劳动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它们的产权、所有权大都不属于人民了，变成了私人老板的财产了。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恐怕不只是这次才暴露的黑砖窑问题，在其他各个地方都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年年“扫黄打非”，但据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着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这造成多少个家庭的父母子女的痛苦生活！难道我们对此就毫无办法，任其继续存在下去吗？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办得好、经营好的好端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毫无道理地拍卖给外国企业集团，让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内市场，挤压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最近媒体报道，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我国军事工业企业参股合资。即使是配套的设备、零件，这也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应当反对的。没有有保证的配套怎么会有可靠的主套成套？任何一种武器装备，只要有一个零件有问题，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甚至可能自行爆炸、造成恶性事故啊！而且他们还会窃取一些机密，摸清我们的底，蚕食整个军工生产体系的！我们有多少省市县的领导对国家财产毫不痛惜，眼睁睁地拱手让给别人。在我国目前的GDP中，有多少是国内私有企业做出的， 有多少是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做出的，又有多少是国有企业做出的呢？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现在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站得住脚吗？为什么国家主管部门包括统计部门，多年不公布出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数字呢？工人和农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在农村里早已出现新的剥削农民的富农和农场主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有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以上各类问题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确实让人惊心动魄，震惊和愤慨。但每一次发生时，只在一个时间段内作为单个的突出事件报道了，而随后的处理大都是大事化小或不了了之，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从源头上、路线方针上查原因，也很少有相关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或被撤职查办。只有一些被揭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腐化事件不得不判几年徒刑，最多判个死缓，极个别的才判死刑。这些干部过去很多都是不错的，只是在错误思想的潮流中没有经受住考验而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犯罪道路。

还有很多令人烦恼和深感忧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如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更为严重地，有的地方向中央闹独立性，不听招呼，不听指令。

看来这次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呢？从表面看来，一些城市高楼林立，建起了很多合资或外资企业，也合并和扩大了一些国有企业，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就多了，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黑暗问题对照起来，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能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要走的康庄大道吗？对于这种现象，以及某些领导人发表的掩盖矛盾、脱离实际的讲话，外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窃喜的，他们有的甚至公开加以赞许。而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些负面问题始终不见改变，却深感痛惜和焦虑，担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也担心自己的生活今后无依无靠。

现在真可以说，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郭泉：民主先声8：反民众的中国精英政治是中国快速腐败的罪魁祸首

西方公务员最怕的是民众，而中国官员最怕的是上级领导。我们从东西方公务员内心担心的事物的方向上可以发现一个问 题。即西方行政长官来自于民众的选举，如果民众不喜欢，那这个行政长官就无法做下去。而中国的行政长官却来自于上级领导，虽然也有所谓的选举，但是我连选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的长官们怕上级，而不怕民众了。

中国的精英政治的这种产生方式导致了大众制约机制的丧失。不是民众不想制约，而是民众根本没有制约的手段。相反，民众却被制约着。这就是使得中国的精英政治具有反民众倾向成为一种必然。

中国的精英政治这种内心世界，也使得他们与民众共产成为天方夜谭，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党产。他们不与民众共产，却很响应经济全球化的倡导。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搞经济自由全球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少数精英的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跨国资本设下的一个美丽的陷阱。他们的全球化更多的是以牺牲中国劳动利益和资源环境利益为代价的全球化。他们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可以使他们将国内的财富自由搬出国去。

因此，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此，反民众的中国精英政治是中国快速腐败、人民生活艰难的罪魁祸手。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对于国内存在着这样一个危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精英集团的事实，很多人却视而不见。

郭泉：民主先声9：西方的全部的政治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制衡

其实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反大众的精英阶层，他们之所以不象中国的精英群体一样具有危害性，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一个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这一政治制度来自人民。人民为了让自己从大量的烦琐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而把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让渡给了经过人民合法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这个政治精英的工作任务就是为民众服务，所以他和他的组织也叫公仆。

人民把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让渡给公仆后，是否就不能制约公仆了呢？当然不是！如果人民不能制约公仆，公仆就会变成皇帝。所以，人民必须拥有一种机制，使得人民的力量可以牵制精英群体。

西方的全部的政治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制衡。不仅人民力量和精英政治的有制衡，精英组织内部也有三权分立制衡。

但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威权主义国家，除了精英组织可以对社会利益和力量进行平衡，社会间不具备力量平衡机制，特别是平民大众不具备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精英政治所做的最大事情是收缴劳动群体的权利，收缴平民大众的权利，也使中国成了一个官僚精英和企业精英可以肆无忌惮地攫取发展成果的国家。

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中国的各种邪恶势力，中国人民又到了需要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了。

郭泉：民主先声10 ：因爱国而入狱的人，是伟大的人

不久前，2007年6月3日，它将永远成为我们为之羞愧、痛心的日子！中国著名保钓人士李义强在这一天被厦门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入狱，李义强家中合法私有财产亦遭警方侵犯；7月2日，李义强遭遇正式逮捕。

当我们放眼中华版图时，常常被她那壮丽的河山所倾倒。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抗日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一块热土被日本非法侵占。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中国可主张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此外，中国在太平洋海域拥有7.5万平方公里的专属勘探权，以及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

这些“蓝色国土”是中国巨大的资源宝库，完全能够建成中国未来的自然资源开发“战略基地”，能长期提供60%左右的水产品，2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约70%的原盐，足够的金属。此外，他每年还可为沿海城镇提供丰富的工业和生活用水。

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运输总量的90%左右要通过海上航线运输。战略资源，如石油总量的30%，铁矿石总量的50%，亦需要从海上运输。但是，在中国海洋运输通道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钓鱼台列屿、南海诸岛，大部都被它国所侵占。

如果我们失去钓鱼台列屿，东海管辖海域将所剩无几，中国南北海上运输通道将受制于人，中国海军也将失去一个极为重要的出海口。

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无法承受之痛！自1998年以来，为了保护领土钓鱼台列屿这片属于中国的神圣领土不被非法侵占，李义强曾3次乘船到钓鱼岛抗议，并在2004年参与国际保钓声明。

李义强和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参与保钓行动，只是在承担每个中华儿女都应肩负的神圣使命！只是在尽每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个别部门多次以荒谬的理由强行驱逐保钓志愿者，甚至对部分志愿者拳脚相加。由于保钓行动被个别部门认定“造成不良影响”，志愿者人身自由多次遭遇侵害，出来前还被提醒“以后注意点”。在合法私有财产、人身自由、行动自由遭到侵害的情况下，保钓志愿者不得不采取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各级法院却

拒绝受理有关案件。如今，又发生了保钓志士李义强被逼害入狱的悲剧。

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去问问厦门警方，以及个别逼害保钓志愿者的部门：你们视国家利益为何物？视宪法及法律为何物？视公民合法权利为何物？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简单：

1、当国家利益及领土完整遭遇侵害时，公民是否有通过抗议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

2、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是否拥有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

3、是否有权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及合法权利？

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依照宪法第29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这说明，保卫钓鱼台列屿不仅仅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武装力量及各级政府机关、部门的使命。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表明，当国家利益及领土完整遭遇侵害时，公民有权通过抗议等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依照宪法第五条之规定，在中国，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执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就表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自然意味着法律与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并非是不相容的。

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受法律约束并不意味着降低其身份，因而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反对的并不是这一点。那么，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已经了解：保卫钓鱼台列屿不仅仅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武装力量及各级政府机关、部门的使命。当国家利益及领土完整遭遇侵害时，公民有权通过抗议等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如果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因对保钓志愿者不满而介入，那么它们显然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公安局因为中国公民捍卫领土的言行而剥夺保钓志愿者的人身自由，违法了宪法第37条赋予我们的人身自由，并违反了行政法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如果个别部门侵犯保钓志愿者合法私有财产，我们有权使用宪法第39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断定：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反对的是“中国公民保卫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认为自己拥有“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并“有权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及合法私有财产”——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这种荒谬的事实显然是与宪法及法律相违背的！

在李义强遭厦门警方逼害入狱的悲剧中，厦门警方未能证明钓鱼台列屿不是中国领土；未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未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更未能证明自己拥有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因此，厦门警方及公诉人对李义强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厦门警方只能以“李义强在最近组织厦门市民游行反对海沧区兴建化工厂违法”为由对其实施打击报复。

但实际上，由于可能对厦门当地环境及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毁灭性打击，海沧区兴建PX厂的计划一直受到极大争论。2007年3月，全国人大及政协会议期间，105名政协委员联署议案，要求当局将这座总投资达108亿的特大化工厂转移到远离民居的其它地方。难道厦门警方要将厦门市民及这105名政协委员全数非法逮捕吗？

厦门警方因李义强“参与保钓行动”怀恨在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拘捕入狱，并侵犯其家中合法私有财产，已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法律的严重侵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规定，李义强参与保钓行动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使命，是合乎法律的正当行为。任何部门，包括厦门警方在内，都无权对其行为进行任何干涉。

现在，让我们回到宪法上来。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我们的问题使我们特别有必要关注宪法设计的上述目标。

李义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在部队是合格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他也从未放弃过保家卫国的使命。这个国家像李义强一样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捍卫钓鱼台列屿的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李义强的命运！

告诫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民主、和谐、强大的中国！请不要做伤害自己人的事！请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政府、军方应当高度警惕来自失去钓鱼台列屿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日本的狼子野心！任何对度的逾越，都可能招致灾难的再一次发生，亦可能令中国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我们的对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的要求很明确：

1、李义强参与保钓行动，以及反对厦门市海沧区兴建化工厂属合法行为。因此，厦门警方及公诉人对其指控不能成立，应立刻无条件释放李义强。

2、厦门警方无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亦无权侵占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对于李义强遭扣留的私人物品，厦门警方应立刻予以返还。

3、依照中国宪法，相关部门应制定有效政策，切实维护保钓志愿者的合法权利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4、李义强有权就其所受侵害申请国家赔偿金。

5、厦门警方必须向李义强正式道歉。

郭泉：民主先声11：中国正在大规模地无产阶级化

中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私有化，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在这样一场分化整合的国民财富再配置过程中，中国正在大规模地无产阶级化。

进入21世纪，世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就是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财富逐渐被少数人和国家所拥有，人民已经与国民财富的所有权无缘。

当下的中国，两股力量、两大阵营已经摆开阵势，已经开始激烈的交锋。这个斗争被称之为群体性事件。

大众的新平民运动与国内外的各种持有不满情绪的组织和个人的活动会交织在一起，如果这种合力产生了共振，便会共同对精英政治形成冲击。政府如果继续腐败下去，甚至武力压制，那么这个精英政治便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大众的新平民运动力量会逐渐强大，在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双重挤压下，这一群体的反抗性会越来越大，中国的政治危机爆发的可能行也会增大。

郭泉：民主先声12：中国新资本政治窃取革命成果后，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49年获得胜利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所有中国人面前。新的政府工作人员是不是会“异化”成新的剥削者。

毛泽东和他的幕僚们一直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一直到1966年，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由于这个“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所以不是武装革命，于是，毛和毛的幕僚们给这个革命，取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的继续革命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当时新的执政者已经开始了腐败和堕落。但是，毛却从根本上反对还有另外的一个政党作为在野党进行监督和未来的竞选上台，于是毛选择了群众运动方式。这其实就是在用群众取代政府，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祖国河山一片红”其实就是一次伟大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大试验。如果，这个

成果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的模型，那么在70年代的中国这个图景却来得太早了。其成果不被世人理解，其结果就是夭折。

现在，我必须重提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我们继续革命的条件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了。现在的社会情况是，那个毛泽东最担心的无产阶级新权贵已经蜕变成了新的资本政治，成为了资本利益本人或其代言人，他们已经完全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敌人。所以，我要说，我们的继续革命理论，应该是“资本专制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这样的名称比较符合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资本专制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其结果必然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高度社会福利的两党政治，其方式当然可以多样。

我认为，一切有利于实现这样一个理想政治模式的手段和方案，都是我们所欢迎的。

郭泉：民主先声13：汉族人，亮出你的汉服，或空空荡荡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的时候，我们在所有的现代文明旁边都看到了一个影子，这让我们汉族人感到困惑，这个影子就是和所有最现代的文明站在一起的各民族服装。

如果你去日本你会看到最现代科技的旁边是和服，如果你去英国，你会看到最激烈的比赛旁边是格子裙（基尔特裙），如果你去美国，你会看到“民族熔炉”的美国，各民族在本民族的重大节庆日，都穿出了本民族服装。

没有去过美国的朋友，会以为牛仔裤是美国的民族服装，其实，牛仔裤只是美国数百个民族的工作服而已。美国是由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组成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你可以看到所有民族的民族服装，但是，汉族除外。

很多中国人想到民族服装，马上会第一个想到“和服”，其实和服完全得益于汉服。日本在向中国学习之前的服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无从查考。有人说日本人接触到中国之前没有衣服，我认为，这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想，那也就是几片麻布一样的东西吧。和服，其实是唐代汉服的一种，后来在日本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例如，衣带后置，衣缘另色等。但是和服的基本元素与汉服完全相同，例如，交领、右衽、宽袖等等。我认为和服一直被日本的“和”民族穿着，完全是因为日本的和服传统没有丢弃的结果。

而汉族在1644年，被满族用马褂旗袍强制替换，史称“剃发易服”。推翻满清以后，民国时期，孙先生曾设想“五族共和”，但并未涉及民族服装，相反却弄出了以日本学生服为样本的“中山装”。这样，至今，汉民族大约400年没有本民族服装了。

我们在推广汉服的过程中，时常会有人会说，时代进步了我们还要穿古代的衣服干什么？

全世界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服装，惟独汉族没有。“两会”期间，55个民族的代表都穿本民族礼服隆重出席会议，只有汉族代表穿西服或其他服装。

我们应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服装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识之一。汉族丢弃这个重要标识是不对的。更何况当初也不是汉族人自愿丢弃的。汉服不是自然消亡的事物，汉服是被人为的扼杀的。全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服装，向我们揭示了民族服装是不会被自然淘汰的真理，除非这个民族消亡。

我们在推广汉服的过程中，时常会有人会说，汉服穿起来工作、学习不方便。他们还说，古人没有自行车、摩托车，他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古人穿汉服是应该的，现代人穿汉服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他们没有。但是我们汉族人穿着汉服建立了无数世界著名的功勋，我们的汉族先贤们穿着汉服饱读诗书。

是的，他们没有现代科技的一切享受，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汉服，并无反对现代服装的意思。只是认为，汉族应该在重大节庆日上穿本民族礼服而已，当然，如果有汉族人不愿意穿本民族服装，也无所谓，毕竟，这是个自由的时代，任何人都有穿这样或那样服装的自由。但是，我们作为推广者，我们先穿。

另外，我们也不提倡汉族人在任何时候都穿汉服。当然我们也不反对有人在任何时候都穿。我们认为，汉服作为礼服，是最能代表汉族的外在民族标识。日常生活，汉族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服装。当然，其他汉族人选择任何服装做礼服也无所谓的，只是我们选择汉服做礼服而已。

也许会有无数的人认为我们是在做汉服秀。是的，我们是在秀。我们不仅要秀出汉服，更要秀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秀出我们的一颗热爱本民族的拳拳之心。

我们秀了，我们就会贴出我们的照片。喜欢看的人，就看，不喜欢看的人，就不看。当然喜欢用恶毒话语诅咒汉服的，就骂吧。

无论大家是什么态度，我们都不在乎。毕竟这是个自由的时代，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汉族人，亮出你的汉服，或空空荡荡。

郭泉：民主先声1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终点是狼外婆的血盆大口

小红帽离开了妈妈去外婆家，一路走在笔直的大路上，大灰狼无法下手，于是，大灰狼在骗取小红帽的外婆家的地址后，绕近路到了外婆家。小红帽到外婆家以后，也就到了大灰狼的肚子里。

反观中国的产权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的产权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是从不搞"起点公平"以及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的。

我们被灌输的教育是，不搞"起点公平"，要搞"终点公平"。那么，什么叫"终点公平"呢？也就是说终点公平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即，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先集中送给少数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领大家共同富裕。

等把全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改革到少数人手中以后，立刻搞了个《物权法》，用法律形式把欺诈到手的公有资产锁定为少数私人的合法财产，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终点不是外婆家，而是大灰狼的血盆大口，但是一切都晚了。

小红帽很幸运地还有老猎人及时从狼肚子里救出了小红帽，最后消灭了大灰狼。可是中国人民呢？谁来救中国人民？

郭泉：民主先声15：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死绝了吗？

相传，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但是这在中国却成了例外。

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运动"敲断了中国士人的脊梁骨，之后更是漫长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恐怖年代，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本该是无产阶级大革"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现在的腐败分子）的命的，结果却成了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

于是，彼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不象此时的"被狗吃了"，而是被镣铐枷死了。

但是，虽然他们被杀，被打，然而他们对真理、良知、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毕竟是先贤传下来的精神道统，尽管气若游丝，却不绝如缕，仍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铁幕的呐喊……

"后文革时代"，在新型集权政治的裂缝里，长出了一片葱绿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后文革时期"看上去已日趋驯良的专制巨兽，竟以最凶残的暴力方式猝然终结了这个时代。 至今，钢铁履带依然辗压着中国人的中枢神经。

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后极权时期的特征。 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韩德强，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主的异见人士："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其实，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归根到底来自对专制主义的原始恐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生的奋斗目标的著名诗歌，虽然在中国也家喻

户晓。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人能读懂的呢？

郭泉：民主先声16：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从“为天地立心”快速地沦落为“学干禄”

张载认为中国士人的生命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曾几何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开始堕落，堕落成要么皆“学干禄”（《论语•为政》），要么噤若寒蝉。

首先，我们来谈谈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问题。50年前，所谓“右派”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说了几句“反对集权，要求民主”的话，而且是受“引蛇出洞”、“阴谋”的诱导，结果怎样？55万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57年，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挥不去的心理阴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半个世纪过去了，阴影仍在，井绳尤存！利剑高悬，心有余悸。

90年代起，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作了很多调整，评定职称、提高薪酬、附加各种津贴和待遇、房屋分配和内部价格售房、医疗、用车或用车津贴……总之，中国作为森严的等级社会，也让知识分子分一杯羹，部分地进入这个等级体制之内。当然，仅限于安分守己的人，凡是胆敢拂政权逆鳞的，则扫地出门，若论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后手段，首先是让你“不称臣者不得食”。而在中国大陆这非驴非马的半截子市场化商品化社会里，生活的压力，致令“君子谋道不谋食”、“从道不从君”的精神道统发生了蜕变。

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去“学干禄”的，但是他们也不再敢于言论自由了，最多只能“道路以目”。李银河的“封嘴”决定、沙叶新的“妥协”感叹，皆是如此。

其次，我们谈谈当代中国文人皆“学干禄”的事情。自古以来，科举制取“仕”与无可奈何下的归“隐”，就开始存在一个体制内外的问题，体制内“居庙堂之高”，体制外“处江湖之远”。无论体制内外，张载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皆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西方的“高薪养廉”到了中国却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人文景观，即“高薪养奴”。于是人们便得睹奇观，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89年之后曾名噪一时的何新，已非万人唾骂的单独例子。他们成为极权主义的家臣和食客后，便开始了对知识分子同类的倾轧。例如，有民间学者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撰文登载于《南方周末》，旋即遭《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大张挞伐，指斥为“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此篇大批判檄文还受到该报嘉奖，列为年度“获奖”之文。

这些已经主动被豢养的知识奴隶，严格来说他们不能被算作知识分子。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卑劣的奴性言说吧。他们认为批判当权者的异议人士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甚至鼓吹把异议人士都流放国外去当“活烈士”。 为了推卸良心的重压，他们不但“躲避崇高”，而且嘲笑崇高；自己的道德矮化了，却要去矮化比他们高大的人，把标尺的刻度拉下来，于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么矮了。例如讪笑政治异议者为表演“反政府秀”的不但有新左派、新毛派和“爱国教”的信徒，许多自称思想独立的士人也作此语，以安抚自己蒙垢的良知与沉滞的心脉。

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沦为豢养的朝廷鹰犬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变成了为“为极权立心，为俸禄立命”了。

郭泉：民主先声17：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岐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

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

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歧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郭泉：民主先声18：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时代还没有到来

《论语·乡党》记载："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孔子在游山观景的时候，看到山谷里的野鸡能自由飞翔，羡慕山梁雌雉"得其时"，而联想到自己东奔西走，无有响应。因此，他感叹生不逢时。

孔子的哀怨，说明知识分子和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那么，孔子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从中分析出知识分子需要什么样的时代，或曰，在什么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才能最乐意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呢？

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时代是孔子的时代，虽然与老子和老子的门徒相比，孔子要积极入世很多，但是，孔子也很清楚，尽管他和他的门徒们自己知道什么是社会必需的，但却没有可以实现的希望。最后，孔子也不得不绝望。如今孔子虽然被阅读，但是又有几人能真正体悟孔子对"礼崩乐坏"的极度焦躁之心呢？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时代是革命时代，当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达到人民的生命极限的时候，民众和知识分子的融合，才催生了革命者以及革命者的思想。在革命时代里，他们是革命的，他们认为需要号召激烈的变革，并希望这些变革（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忠告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他们中也有极少数人拿起了武器，成为战士。

知识分子的第三个时代是自由时代，只有当历史发展到社会公众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意见是可取的，至少意识到是善良的时候，知识分子才是与时代环境和谐的。这种和谐表现为，例如知识分子在提出他们自己认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的时候，他们深信他们的提议是会被人欢迎的，至少是被众人认真思考的。而且即使他们的思想不被采纳，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喜欢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

综上，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御用文人、朝廷鹰犬除外）还处于孔子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和谐时代还没有到来。于是，当代中国尚存良知的知识分子难免不发出与孔子一样的哀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郭泉：民主先声19：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批评主流政治

不要看到公共两个字就立即想到那些时常在媒体出现的御用文人。不，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御用文人代表的不是公众，而是他们的主子。他们的主子是以公众为敌的，因此，御用文人恰恰是公众的敌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代表人民、代表历史发展正方向的"社会良心"。他们最突出的表现是，当集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众的时候，这些"社会良心"敢于批判主流政治。

举一个去世不久的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去世，享年71岁。苏珊·桑塔格一直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始终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场，尖锐抨击美国发动的轰炸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并一直为美国政界所诟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

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苏珊·桑塔格不是为她自己活着的，她是为了全人类的良知活着的。她的良知就是为了民众不被主流政治愚弄和欺凌而展开批判。

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

尽管中国还处于实际上的“秦政”的延续，但是从外部渗透的自由思想，还是使得中国产生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个说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前提，在没有这些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要么是自我设限的，要么是必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

那些稍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得以成为公共言论，全靠言者的言说技巧和读者的解读技巧。事实上，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辞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尴尬就在于此，即我们必须始终要注意用高技术含量的话语来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否则就准备好去见上帝。而我，就早已准备好去见上帝了。

郭泉：民主先声20：极权、资本与媒体，联合绞杀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90年代中国进入“极权时代”，这个极权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着一种张力，而且也开始觊觎在全方位内落实这种极权。极权很快发现，只要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落实极权，那么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极权的荫翳下了。

极权介入知识体制后使得知识体制官僚化，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资源和发表资源都集中在了极权、在知识体制内的代言人手里。

极权还利用其手中控制的权贵资本，通过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象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这是极权演变的权贵资本对思想进行裹挟之后所干的真正勾当。其勾当最后表现在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垄断了舆论。以前是极权直接发布舆论，而当极权通过权贵资本控制媒体之后，他们联手过滤掉他们不喜欢的话语，封杀他们不喜欢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们力捧他们喜欢的文人，利用这些御用文人发布极权的观点。一切做的非常隐蔽。极权躲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西方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虽然中国的极权、权贵资本不喜欢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知道人民喜欢公共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就必须找出一些他们喜欢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公共知识分子”。让人民觉得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说的话是正确的，是在维护人民利益的，而实际上这些御用文人假冒公共知识分子的名义发布着实际是极权和权贵资本发布的舆论。

于是，中国的极权、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产生了一些时常出现在媒体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被人民误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他们貌似“为人民着想”的观点，其实完全是在帮主流政治给人民设定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就是为了让人民以为这不是主流政治的强迫，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建议。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人民是永远听不到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早已丧失了话语权。

郭泉：民主先声21：奠定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不是学问的多少，而是良知和勇气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历史上留下英名的知识分子，只有两类，一是发明或传承文化文明的知识分

子；另一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

当国家处于一种正常态的稳定发展的时候，第一类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而使得他们名垂青史。例如，司马迁、祖冲之、李时珍等文化、科技方面的历史名人。

当国家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况，例如出现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殊条件的时候，第二类知识分子就开始不断出现。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一方面，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所谓“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选择、都是问题。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这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他们分化为三个大的类型：一是书斋型学者，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是成为御用文人，谋求生存机会；第三类型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李大钊教授、闻一多教授、瞿秋白教授。

此三位教授在各自的专业教学、研究上的成就充其量说也就是一般的学术水平。与他们同时代的和他们相同学术水平的人在我们的记忆里、在历史教科书上都早已荡然无存了，而这三位教授却永垂不朽、流芳百世，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层出不穷；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此三位教授，却始终坚持人间正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于是，我们知道，评价公共知识分子的尺度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

郭泉：民主先声22：极权集团正在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他们的腰包里去

经过23年的政治和哲学研究，我得出了和马克思一样的终极结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不幸的是，考察当代中国后我不得不认为，至少在现阶段，共产这两个字，在中国是极权集团用来掩盖“剥夺”一词的代名词了。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民革命在最初的时候，其实都是打着“共产”的旗号的，例如最有名的陈胜吴广起义，他们的口号是“均贫富，等贵贱”；4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千百年来，革命的口号有这样那样的“与时俱进”，但是其“共产”的要求却如出一辙。

人民革命往往爆发在贫富分化最严重、阶级剥削最残酷的时代。人民革命的初期，革命者的要求的确是“共产主义”。但是，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及其家属，从被剥夺者一跃成为统治者。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在革命过程中的被共产掉的，以及事先答应的要共产的，在新的统治者执政后，陆续又回到了统治者手里。一切又都恢复成了老样子。

这一情况，在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成功后，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后，都有极其显著的表现。特别是1952年2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贪污等罪行被判处死刑，这使得毛泽东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夺取政权的革命者很有可能会快速蜕变成一个新的权贵阶级，从而使前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功、果实化为乌有。于是毛泽东策划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各种运动。虽然，毛让国内最大的走资派—国家主席刘少奇身陷囹圄，最后卒死狱中，但是，走资派在毛去世后，立即消灭了毛派革命者“四人帮”及其团队，走资派在清算毛思想的斗争中，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被终结以后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

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在新时期，完全集结成一个极权集团，他们对外软弱，对内暴戾。他们继续使用共产的名义把人民的财富都共产到集团内部，而根本不考虑人民的幸福指数。

然而，对再次沦为被剥削者的人民来说，这次有了一个大麻烦，即新权贵的权力的获得是他们高举共产进行暴力革命的结果，而人民对这些新权贵的革命、反抗和其他什么牢骚怪话，就立即被这些极权轻则污蔑为一小撮坏人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群体事件”，重则用法律手段打成“反革命”或判定为“颠复”罪了。

所以，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后，决不能换一套新人马去做以前一样的事情。如果只是人员变动，而不更改旧的统治性质的话，那么革命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赶走了上一批剥夺者，而置换上了新的剥夺者而已。

人民革命，意味着，从开始到最后，都必须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目前，极权集团正在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他们的腰包里去，这是严重地背叛共产主义的行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无产阶级的二次革命，革命成功后用民主的方式对革命成果加以固定，惟此，才能最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否则，就产生新的极权压迫。

郭泉：民主先声23：当前，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一国胜利后，必须等待或帮助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取得胜利，才能一体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各国的革命形式不同，革命的阶段也不同，所以，所有国家一体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是根本无法确定的。

这样，如何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成果就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1949年，毛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但是，毛的革命成果的取得，不只是在当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家取得的，而是共产党和在野的多党联合起来打败了执政的国民党。49年后，由于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突出贡献，自然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组阁的执政党。

8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57年，根据西方国家的竞选理论，连选连任不得超过2届（8年），因此，中国各民主党开始思考"轮流坐庄"和"人民公选"的问题了。毛共立即组织人马"引蛇出洞"，发动反右斗争，一举全歼右派领袖。

毛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倒退为资本主义的多党竞选政治。随后，毛泽东发起了全面"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简称大跃进），并确定了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一党原则。

毛共在清除掉来自共产党外部的执政权挑战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走资派"从内部分裂毛共，毛和他的幕僚开展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简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毛共的这一试验彻底葬送了毛和他的追随者。1976年，在文革的第10个年头，毛去世后，走资派立即消灭了毛派革命者的所有力量，并把毛夫人投入大牢。毛夫人最后在大牢里用自己的尼龙袜上吊自杀。

走资派当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权贵资本专政。无产阶级在开始的十年里，非常不满意，但是在89年以后，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满意都只能变成屈服。

无产阶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一天天被剥夺，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老板欺凌。而不能罢工，因为宪法禁止工人罢工。也无法去要个说法，因为这"破坏社会和谐"。

走资派们许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如今也成梦想。无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人富裕了，而无产阶级却更贫困了。

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成了权贵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所有无产阶级始料不及的。

郭泉：民主先声24：财富向一部分人积聚，导致中国的权贵资本专政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的人共同富裕"，这是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理由，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不应该叫理由，而应该叫借口。

如果说，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的目的在于大家的"共同富裕"，那我们还是可以说他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是如果他，只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而没有制定方案保证这些先富的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那他的良心就被狗吃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即要求剥夺剥削阶级的财富分给穷人。49年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一直到这"先富"理论出台，无产阶级都处在"共同富裕"的状态。当然，用现在的经济量衡量，当时的"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一种"共同贫困"。但是，这种贫困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大家所拥有的劳动机会和财富分配都是一样。没有比较就没有贫富。

但是，“先富”理论出台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产阶级在最初的年份里，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身边先富的人，认为他们是有本事的智慧者，无产阶级热切地盼望他们先富之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然后，先富者在先富之后，继续做着使得他们更富裕的事情，而没有任何迹象要和大家共同富裕。于是无产阶级们开始愤怒，开始去寻找先富者的先富根源，结果发现，不是因为他们勤劳，而是他们的关系和邪恶。

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大学生孩子们开始抗议，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讨个说法，结果却讨来了死亡。这一事件，终于让无产阶级知道了等待先富阶级用他们先得到的财富来让无产阶级“共同富裕”是一种痴人说梦。于是，无产阶级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也想让自己富裕起来。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了无产阶级，你们已经没有富裕的一切可能性了。因为，所有的机会和资源，都在先富者的手里了。

至2006年12月底，在大陆区域内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由于先富阶级具备了最庞大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自然就形成了他们的上层建筑。

无产阶级由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于是也就丧失了他们的上层建筑。

由于先富阶级迫切需要捍卫他们业已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他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快速地改造成了权贵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了。

郭泉：民主先声25：你们没有权利卖人民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土地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是《青春万岁》，记得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在田野里，对着眼前的农田和远处的厂房兴奋地喊着：“田地是我们的，厂房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医院是我们的，蓝天是我们的，白云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当时，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是现在想到这些优美的台词，不禁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现在还叫社会主义，可是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们的？

1949年，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在牺牲了千百万优秀的儿女之后，终于实现了陈胜吴广以来的中国梦想：“等贵贱、均贫富”。但是，好景不长。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压迫和新的剥削苗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这些苗头，毛称他们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共在消灭这些“走资派”的同时，也在全面“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也伤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毛去世后，“走资派”立即卷土重来。这些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分化出来的统治者，开始奉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这里的一部分”不是别人，正是“走资派”及其家属。这部分人如何先富裕起来呢？

他们开始使用的手段是劳动剥削。其手段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剥削了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但是，人民还是能忍受的。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逆来顺受的，也可以说是厚道，也可以说是懦弱。

中国人民一直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新中国不是某党打下的，而是人民打下的天下。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封建皇权思想的熏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江山是某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于是，人民给。包括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现在的第四代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

当然，也有人民的子女开始不满意这样的豪夺，然而，从天安门的枪声响起以后，人民的不满意的声音再也没有了，而“先富者”们不满足他们先富的那点财富的声音却越叫越高了。

于是，“先富者”们开始觊觎人民的“命根子”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就实行了一种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中国的土地、矿产、学校、医院和其他国有资产都是全体人民的，是不在流通体系当中流通的，是不

能买卖的。说白了这些都是全体国民的固定资产和不动产，是他们养老、医疗、福利的源泉。在经过五十多年的积累后，突然之间被“先富”的权贵集团拿出来出售了，其所得却进了“先富者”的腰包。这就是中国“基地屁”不断猛增的原因。于是，企业、医院、学校、土地等等人民财产被卖得越来越多，于是，“基地屁”增长得也就越快，而失业率也就要不断地攀升。

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实物交换经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下的国土资源，这种原本在公有制下的“无价物质”一下子就转换到了西方货币制度下的有形价值，“基地屁”能不暴增吗？目前，只有失业率的攀升，才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现象。而这种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两大阶级，一端是先富的权贵阶级，另一端是永远不可能“共同富裕”的无产阶级。

郭泉：民主先声26：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信仰可以让国人善良、正义和奋起

世界上的人，按性别分为男人和女人，按信仰可以分为有神论和无神论。至于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或不存在，这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认为有神或认为无神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1994年至1999年，我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官，每逢执行死刑，我都要私下与即将执行死刑的罪犯谈心。我问他们，“你怕下地狱吗？”

结果，他们用一种很迟疑的眼光看着我，反问，“郭法官，你讲唯心、搞迷信啊？”

我又问：“你真的不怕下地狱吗？”“我八十岁死和我马上死都一样的。死就死，怕什么呀！”

我再问：“你真的认为没有地狱吗？”

他们迷惑地望着我，喃喃地说：“如果真有地狱，我就不会杀人了。”

每次听到执行死刑的枪声，我都仰望天空，我想，如果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天堂地狱的信仰，他们就一定不敢杀人了。上帝啊，这些人虽然是万恶不赦，但是也应该把更大的惩罚降罪给剥夺人民宗教信仰教育的犯罪集团。因为在宪法里规定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人民无法认识神。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这个人就会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慎独”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不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监督着他。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信仰，这个党就会无所忌惮，因为他认为他们对人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遭“天怒”、“天谴”。因为，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他们的奴隶而已，他们却是人民的上帝。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有了信仰，我们才可能因为对神的敬畏而生出爱心，才能捍卫正义，才能在面对邪恶的极权力量的时候，奋起！孙中山曾说：“建国之基础在於心里，要除旧更新，必须敬畏上帝。”

郭泉：民主先声27： 解除报禁、新闻自由，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步

极权统治者总是最害怕言论自由。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

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

极权统治者自己也知道他们作的不是好事，所以只允许他们自己办报纸。以前，他们的报纸里的记者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可是现在，由于他们想办更多的报纸来愚弄更多的人，于是，他们被迫录用了很多人民子弟进入了他们独家开办的报纸。虽然，报纸是极权统治者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可以称之为"人民记者"的人民子弟。

但是这些"人民记者"只是人民对他们的尊称，并不表示极权统治者要实现所谓的"人民报纸人民办"。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他们愚弄人民的又一罪证而已。

我们来看看"人民记者"在极权集团的报纸里的生活景观吧。

如果这些"人民记者"写的新闻和评论，符合极权统治者的利益，就能顺利发表，这其实也是极权统治者最需要的。反之，极权统治者的报纸，就不予发表。如果，人民记者的新闻和评论侥幸逃脱了审查，即使发表，极权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组织他们自己的"权威人士"说："他们是临时人员，他们写的是虚假新闻，且已经被撤职"，其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些新闻和评论，不符合极权统治者的利益需要。

可是，人民子弟的新闻工作者心头深深刻划的创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人民也会永远记清楚是谁迫害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人民会永远记得是谁不允许人民自己办自己的报纸。

由于人民没有人民的报纸，由于新闻不自由，所以，当农民工被欠薪，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欠薪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贫困儿童失学，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书念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穷人看不起病等死，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付得起医药费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农民土地被强制征收，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种地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人民被抢劫，我们没有为被抢的人呐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抢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有人因为乙肝，而找不上工作，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上乙肝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小姑娘因为谋生，不得不出卖身体，我们没有为她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卖身体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学生因为高考、考研压力过大自杀，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活着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这笔帐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郭泉：民主先声28：负责涉日案件的中国警察，应该多看几遍《南京》和《南京梦魇》

2005年，由于中国爱国反日人士组织发起的一系列反日爱国活动中有一些爱国青年针对日本汽车和店铺进行了诸如投掷鸡蛋或石块的“刑事犯罪”（当然其中的实施者也极有可能是日本间谍或是想嫁祸于我爱国人士的其他组织）。事后，日本友邦惊诧。于是，为了不让“友邦继续惊诧”，中国立即成立了专门负责涉日案件侦破的警察机构，并将“涉日案件”单列为一类破坏中日和谐的严重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随后，中国的爱国反日人士，无论是否喜欢投掷鸡蛋或是扎日本车胎的人，都遭到中国警察的调查、搜查。中国警察的对中国爱国反日人士的防范工作，得到了日本友邦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中国警察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多次询问我们为什么要反日。我很怀疑这些警察是否学习过初中历史。因为在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初中阶段被安排教学中国历史，高中阶段被安排教学世界历史。关于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是安排在初中阶段的中国历史里的。

难道我们为什么要反日，这还需要问吗？如果日本真的是我们的好邻居，我们会反日吗？我很奇怪难道警察学校的洗脑机器竟然能把在初中学习的中国历史从警察的头脑里洗掉？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被称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洗脑机器的奇强的洗涤和漂白机能了。

今年是日本正式侵略中国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中国警察如临大敌，他们利用一切手段阻止了民间反日活动以及成功地阻止了所有媒体对70周年纪念活动的宣传。就在我认为今年将是万马齐喑的时代之时，美国的两部电影传到了中国。一部是《南京》、一部是《南京梦魇》。这两部伟大的电影都是美国人自费拍摄的。

当中国警察阻止了中国人民爱国反日的时候，美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美国人帮我们爱国来了！

说实在的，我们不能怪中国的爱国反日人士只能在网络上匿名说些激进的反日话语，因为在中国即使是在网络上说些激进的反日话语，也属于涉日案件。能匿名说说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别说我们自发捐款来拍摄爱国反日电影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美国人。你们在70年前的南京，几个美国人就拯救了20多万中国难民。现在，你们2个人，就自费拍了两部电影来中国放。

负责涉日案件的中国警察，应该多看几遍《南京》和《南京梦魇》，这样有利于你们认识日本友邦，这样有利于你们认识日本军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你们理解我们爱国反日人士的内心世界。

当然你们做警察的会说，你们爱国也没必要选择反日这个方式，你们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爱国了。首先，我们要说，我们的本职工作和爱国反日并不矛盾。另外，说老实话，你们其实在担心友邦惊诧的同时，更担心的是我们反日会引发诸如下岗职工闹事、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群体事件，这就对你们的统治构成了威胁。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因为五四运动就是从反日引发反政府的。政府不支持民间的反日，人民就不只是反日了。这很简单。

郭泉：民主先声29：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很不幸，公仆这个词来自西方。当然这个不幸是对中国人来说的，对西方人来说，他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古罗马时代，政客就有了公仆意识。当然这个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

古罗马是一个共和国，他们在中国的孔子时代就发明出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了。共和国国民每人手上都有选票。人民有选票，就会有想参政的富人来求你将选票投与他，他就得为穷人办事，办实事，办得穷人心花都怒放了，选票就给你了，你就可以拿着穷人选票，做执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负。人民有选票，那些还想继续做政客的政客们就必须在任期间认真做公仆。否则，人民的选票就不会继续投给他。

这就是古罗马的伟大！

我们来看看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经过考察，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

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

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

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参政和行政开道。

来自宗教的福祇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

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

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

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阶段，人民在政治层面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争取民主制度，获取用我们的选票选择执政党的权利。

任何专制，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党天下，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都是不得人心的，都将被人民消灭。

郭泉：民主先声30：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体，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个政体不满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不满意。如果仅仅是不满意，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这个政体的很多创建者，后来既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和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

每当我看到这个政体下的受害者的史实，其受害范围从黎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我就在想，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解决的方法其实是存在的，只是现在的执政党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而不愿意采用罢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他们怕这个药把他们自己当病毒给消灭了。

这个办法就是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

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美国差，就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方面。

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中国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郭泉：民主先声31：台湾问题只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制宪政道路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了。

其实，香港和澳门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香港和澳门是租界地，香港的期限是99年，而澳门的期限是永远。1997年，香港在到期后，英国把香港还回了中国，随后葡萄牙放弃了永远租用澳门的权利，也把澳门还给了中国。

台湾问题，才真正算个问题。台湾问题是内战造成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我认为，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

一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大陆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

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

大陆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郭泉：民主先声32：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到现在也是如此，只不过，古代是家天下，现在是党天下而已。

严格来说，家天下和党天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家天下也还是需要一大批同党来执行家长（也就是皇帝）的命令的。所以，说是家天下，其实也是党天下。皇帝的家天下，其实也就是皇帝的党天下。区别在于，皇帝的党天下的接班人是皇帝的儿子或其他亲戚，而当代中国的党天下由党魁指定的同党做接班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先军政”、“再党政”、“后宪政”的革命路线。

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党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党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其他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也同意“宪政”。但是，随后国民党发现共产党擅自接受敌人投降，并且积极抢占地盘，引起国民党极大不满，认为共产党没有民主宪政的诚意。于是，国民党认为 “宪政”条件并不成熟。

共产党有人有枪，当然不答应，于是中日战争后，开始了内战。最后，共产党取得胜利。

然而，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实行“宪政”，仍然是“党政”而已。1957年曾有民主党派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送入牢狱。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

于是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指定了第二代领导人华国锋，而第一代的其他领导人例如邓小平等人对此并不满意。于是，邓小平取而代之，继续了第一代的领导。

所以，说邓小平是第二代，这是错误的。即使邓本人这样认为也不行。他就是第一代。之后，他作为总设计师，在党内指定了耀邦，发现耀邦不能很好地执行命令后，废耀邦而重新在党内指定紫阳，又发现紫阳不能很好地执行命令后，废紫阳而重新在党内指定泽民，继而又替泽民指定了泽民的接班人锦涛。

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该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来维持和完善政权。

郭泉：民主先声33：所有政治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另一是专制，而中国不幸一直是后者

无论是政治专业的，还是非政治专业的，一提到政治，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入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

经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

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种。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只有一种，就是封建主义经济。

中国自古至今一直都是专制制度，所以中国的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经济。一切财富，在"家天下"时代都是皇帝的财产，而在"党天下"的今天，一切财富，其实都被党侵占而成为党产。

一党专政，表面上看，貌似是反封建反帝制的，但考察其实质，我们会发现，"党天下"和"家天下"实为一丘之貉，其专制方式如出一辙。也许有人说，"家天下"是一个人（皇帝）实行的专制，而"党天下"却是多人的政治制度。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即使是"家天下"，皇帝也是和大臣们一起实现着专制统治的。皇帝和大臣们，其实就是一个党。而现在的"党天下"的"紧密团结在以某人为核心（或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实质，不正是皇家的封建专制统治吗？区别在哪里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的"党天下"打着"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实行着封建专制的政治实质而已。 而皇帝的"家天下"却比较老实地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我要说，"党天下"其实就是对"家天下"的一种隐蔽的、狡猾的复辟而已。

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反封建、反帝制的民主革命，根本没有结束，而且斗争会更残酷。

郭泉：民主先声34： 先富人群根本不想和人民共同富裕，他们想要的是经济特权

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先富人群可能会是中国的主要民主力量，他们将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就我的研究成果看，这完全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他们绝对不会是中国的民主力量，他们将推动的不是中国的民主进程，而是他们的经济特权。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先富的人群是些什么人群。他们中不乏优秀的知识分子商人，但是最大量的不是知识分子商人和勤劳致富的守法公民，而是利用政府关系、凭借政府特权的不法分子（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或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犯罪集团。

这些人惟利是图，且缺乏基本的爱心。国家人民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的主打思想是"经济无国界"。他们挣到钱以后就把钱连同孩子一起送到了国外。而毫不理会中国的街头和田头的穷苦大众的缺衣少食的生活窘境。

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说话，被认为是一种乡愿或是一种欺骗。但是，无论是乡愿还是欺骗，其事实是先富之人先富裕之后，人民并没有享受到共同富裕，而是感受到了越来越深刻的贫苦和艰难。

等待先富之人带动大家富裕的想法是痴人说梦的。因为共同富裕，对贫困者来说当然是美好的事情，但是对先富者来说，则意味着丧失其经济特权，以及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经济特权以及心理上的优越感是在落差中才能有感受的，如果这种落差丧失，其欢娱也就丧失了。当然，除非先富者是以消除经济落差为快乐的，否则，他们的快乐，就一定来自这种巨大的经济落差。

当然，我们不排除是有个别的先富者是为了共同富裕而先富的，但是，这种情况绝不会是普遍现象，因此，先富者不会主动地去实现共同富裕。

让先富者的财产与人民共富有三种途径：一是，宗教情怀或良心觉悟的施舍行为，即先富者主动疏散财富给大众。二是，提高先富者的税赋，将其用于推行全民福利。三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剥夺先富者的财产。

第三种途径是不可取的，因为事实证明，这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成本大于革命收获。 第一种途径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种唯一的方式是无法推行的。

第二种方式是目前国际的通行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基于人民的立法组织。但是这个最关键问题目前在中国却无法做到。

因为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军队长官、国企领导、其他经济形式的领导，最后才是来自各行业的劳动者代表。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基本上属于先富者。

于是，这个组织制定出的法律当然是有利于先富者的。当然这个组织也会制定一些“兼顾公平”或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而营造更有利于先富人群继续富裕的社会环境。其结果是，相对地提高了贫苦人民的存活能力，而绝对地拉大了贫富差距。

郭泉：民主先声35：还有什么丑闻人民不能承受？

前一段，广大网友对贪腐众官在情妇工作上所做出的贡献搞了一个排行榜，其中：

有因包养情妇146名而获“数量奖”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

有因包养17名未婚女大学生而获“素质奖”的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

有因撰写性爱日记95本，保存性爱物证236份，而获“学术奖”的原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

有因运用MBA知识管理7名情妇，而获“管理奖”的原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杨枫；

有因召集22名情妇举办群芳宴并选出最美者，而获“团结奖”的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

有因向5名情妇保证，60岁之前每人每周性生活3次，而获“干劲奖”的原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

有因宠爱自己下属官员的11位官太太，并成立公司安排所有11位情人合作工作，而获“组织奖”的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宝鸡市市委书记庞家钰。

我不知道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还会有这样的丑闻，但是我知道，中国即使再多发生这样的丑闻，中国人民也无可奈何。这些官员当然是要下台的了。但是他们下台的原因，并不只是性丑闻。

贪腐众官下台的根本原因是有经济或其他刑事犯罪。如果只是性丑闻，他们是不会下台的。因为，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们的性丑闻即使是公开的，也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以揭露，因为媒体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实上，即使人民知道这些丑闻，下台的只是直接涉案人员，他们所隶属的党，却无需为他们负任何一点责任。

在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的高级党员发生这种丑闻，而不影响这个执政党的下届选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中国，这很正常。

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里，恐怕只有中国的执政党是最不怕人民知道执政党的丑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执政党是最怕本党出现丑闻了。

究其缘由，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那么人民的选票就不再投给执政党。于是西方的公务员最怕人民不满意，并努力做到让人民满意；

而中国的执政党地位的获得，不是凭借着人民的选票的，而是半个世纪前那场内战的结果。因此，中国的执政党根本不惧怕其执政地位的丧失。其中的官员发生了丑闻，那么执政党把他们清理出去，就万事大吉了。

所以，在中国，执政党对丑闻的管理理念是：首先，严密控制丑闻泄露。其次，如果泄露，立即清理丑闻官员。第三，发动舆论工具，宣传执政党的反腐决心。

于是，即使执政党发生再大的丑闻，对丑闻官员的清理，都成为了执政党反腐决心的美丽展示。于是，再大的丑闻，都会成为更大的庆功会的契机。

如是这般，还有什么丑闻人民不能承受？

郭泉：民主先声36：我们要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当先富集团出卖了人民的土地、厂房、医院、学校之后，他们已经无法遏制膨胀的欲望了。为了维持他们日益难以维持的统治，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要求获得更大量的货币。

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国的消费水平是不同的。先富者虽然大约只有5%的人口，但是却占有了中国社会95%的社会财富。在他们用各种手段先富之后，他们借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东风，把他们的财富都一体化到国外去了。

为了在本国本民族内部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欺压百姓，剥夺百姓，他们的欺骗话语是"我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事实上，先富人群在本质上就是反对共同富裕的，因为共同富裕之后，先富者就显示不出其经济落差，以及经济落差带来的经济特权。

然而，在中国，能卖的东西都已经被他们出卖光了。于是，他们就开始觊觎我们民族的未来了。

一些发达国家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民族的未来而不愿意把有毒的化学工业放在其本国生产。于是他们四处寻找洋买办，把这些有毒的化学工业的可能危害"嫁祸于人"。

于是，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一样，立即主动要求承办这些有毒的化学工业。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城市（厦门、南京、海南等）竞相上马了PX项目。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危险性，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PX全称"对二甲苯" （Dimethylbenz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摄氏度就会爆炸。受到对二甲苯蒸气的慢性中毒能够引起神经错乱、头痛、嗜睡、作呕、血液组成起变化。人吸入71.4g/m3短时致死。南京px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栖霞山附近，也就是南京炼油厂的厂区里面，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下游的居民饮水就发生问题，离此装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的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3公里，炼油厂的生活区里面，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我在想假如发生什么问题，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px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产品一生产，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南京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

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执政者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群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先富集团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更不管我们后代的身体健康。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

先富集团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

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有效地抗议活动。

郭泉：民主先声37：没有民主制，就没有新中国

今天在我的博客（http://guoquan.vip.bokee.com）里看到一个自称是"你知道但没有见过的小兄弟"的一个人发表于：2007-09-22 19:03:10的一个留言。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勤奋的人、有责任感的，有良知的人，有不同的见解的人，但作为小弟劝一句，你可以对社会某种现象不满，但不能对国家、对我们的党、我们社会制度不满，因为任何社会发展都会遇到问题，有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能力解决各种社会突出问题，如政体改革、教育公平、贫富差距等等。我想你除了提出各种问题以外，还要引导大家思考如何解决你提出的问题和看法，这一点更重要！"

好的，我现在就来说说我在指出中国的无数问题之后，给出的唯一的解决方案。

其实，一个好的社会调查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提出问题，二是分析问题，三是指出解决办法。我想，我早就做好了前两个部分。解决办法其实也暗含在其中了，如今你非要我来个水落石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国目前仍然属于旧中国，因为现在的统治方式和由秦到清的专制统治并无不同。国父孙文先生以及其他民主

先驱提出的议会民主、公投总统、联邦宪政的政治体制才是最终消灭专制主义的法宝，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却没有推行。

民主道路，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党及其领袖的。

只要中国还有一天不民主，那么，中国就还在旧社会。人民就不答应，历史也不答应。专制主义，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家天下也好，党天下也好，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没有民主制，就不会有新中国。新中国，对中国来说，只要没有实现民主，就永远是一种奢望和梦想。

郭泉：民主先声38：中国必将在20年内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

很不幸，中国人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与民主失之交臂。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是人民在拒绝民主，而是独裁者及其帮凶畏惧民主而将民主视为洪水猛兽。

现在，民主再次扣击着中国的大门。独裁者仍旧要拒斥民主，因为独裁是人民的公敌。但是，人民却张开了迎接的双臂。是的，民主的确是独裁者的洪水猛兽，因为民主的天职就是消灭独裁专制；但是，民主却是人民最温顺的公仆。

中国很不幸地被各种各样的家天下和党天下的独裁专制统治了太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错过了三次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是1828年－1926年，第二次是1943年—1962年，这两次民主化浪潮是在美国、法国民主革命影响下，以欧、美、日为主要范围的民主变革潮流。第三次是1974年4月葡萄牙的反独裁革命，引爆了20世纪后期包括南欧、拉美、东亚（台、韩等）、东欧和前苏联在内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很不幸，中国人民在全球爆发这三次浪潮的时候，都遭遇了独裁专制的挑起的内战、镇压和屠杀。

民主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和物质财富，是最优秀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主也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今，独裁统治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一党专政（中国、北韩、古巴）和军人政府（缅甸等）。第四次民主浪潮将在这些国家风起云涌。

第四次民主化浪潮将在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诸多方面展开，例如，环保问题、物价问题、选举问题、党禁报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中国人民失掉的只能是枷锁，获得的却是一个民主制度的新中国。

如果给中国实现民主制度进行一个预期的话，根据我长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的苦难指数以及全球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研究来看，我想，应该是20年。

中国的这20年将是民主斗士辈出的时代，中国的历史上将迎来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民主时代。伟大民族的复兴将完全取决于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郭泉：民主先声39：让文学副教授发表文章必须写错别字的时代，是极端堕落和反人民的

今天（2007年9月28日）早上，我写好了我的民主先声38，贴到我的QQ空间，结果，却成了这样：

郭泉：民主先声38：中国必将在20年内实现****体制

很不幸，中国人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与****失之交臂。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是人民在拒绝****，而是独裁者及其帮凶畏惧****而将****视为洪水猛兽。

现在，****再次扣击着中国的大门。独裁者仍旧要拒斥****，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公敌。但是，人民却张开了迎接的双臂。是的，****的确是独裁者的洪水猛兽，因为****的天职就是消灭独裁****；但是，****却是人民最温顺的公仆。

中国很不幸地被各种各样的家天下和党天下的独裁****统治了太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错过了三次全球的****化浪潮。第一次是1828年－1926年，第二次是1943年—1962年，这两次****化浪潮是在美国、法国****革命影响下，以欧、美、日为主要范围的****变革潮流。第三次是1974年4月葡萄牙的反独裁革命，引爆了20****后

期包括南欧、拉美、****（台韩等）、东欧和前苏联在内的全球****化浪潮。很不幸，中国人民在全球****这三次浪潮的时候，都遭遇了独裁****的挑起的内战、****和屠杀。

****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和物质财富，是最优秀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今，独裁统治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一党专政（中国、北韩、古巴）和军人****（缅甸等）。第四次****浪潮将在这些国家风起云涌。

第四次****化浪潮将在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诸多方面展开，例如，环保问题、****问题、选举问题、党禁报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中国人民失掉的只能是枷锁，获得的却是一个****制度的新中国。

如果给中国实现****制度进行一个预期的话，根据我长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的苦难指数以及全球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研究来看，我想，应该是20年。

中国的这20年将是****斗士辈出的时代，中国的历史上将迎来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时代。伟大民族的复兴将完全取决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于是，我仔细研究了其中被过滤掉的文字，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现在的执政党惧怕的正是其中被过滤掉的话语。我只得花了很多工夫，把其中执政党惧怕的字全部换成了错别字。没想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昌明的文明古国，一个堂堂正正的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竟然要绞尽脑汁为了在自己的QQ空间里发表文章而苦思冥想错别字。中国什么时候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些被过滤掉的字是： 民主、专制、镇压、政府、物价

郭泉：民主先声40：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当前，困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马上人们就把她理解为是一种政治制度。其实，民主制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来说，民主制度都是人类生活的最好的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制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

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民主制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民主制，不是革命口号，而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实践活动。

民主制，代表着最优秀生产力，民主制也代表着最先进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至于那个说自己是三个代表的人及其组织，他们只能代表他们的邪灵本质。

郭泉：民主先声41：党指挥枪，其实就是军人政府，实质是军事独裁政权

军事独裁政权，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直接以军人作国家最高统治者，例如1992年起，丹瑞大将控制了缅甸，成立军政府。

军事独裁政权，还有一种，就是指定代表式的一党专政体制，例如中国、朝鲜和古巴。

1948年，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实行多党民主议会制。

1962年，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废除多党制，成立革命委员会。1974年，吴奈温任“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定国名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8年7月，因不满经济恶化和几十年的独裁统治，缅甸暴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抗议活动。1988年8月8日，缅甸军队镇压了民众示威，约三千人死亡，史称“8888暴动”。这也成为当时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最血腥的一页。

1988年9月18日，全国性反抗被镇压后，以国防部长苏貌将军为首的军队接管政权，宣称要“废除”一党制， “实行”多党制。

1990年5月，举行全国大选，缅甸国父昂山之女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胜（获得485个议席中的396个席位），但军政府以先制宪为由，拒绝向“民盟”交权，并对昂山素季进行了长达18年的软禁。

1992年起，丹瑞大将控制了缅甸。其后军政府虽然多次宣称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宪，但每到关键时刻都动用了军队，沦为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国家。多年来，由于缅甸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西方国家纷纷进行经济制裁，该国民不聊生，长期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迄今国民人均年收入仅200美元左右。但2006年底，缅甸军政首脑丹瑞嫁女一掷5000万美金（相当于缅甸5300万百姓全年健康预算的3倍）的气派，激起了缅国百姓的公愤。

中国、朝鲜和古巴的一党专制也是从枪杆子里面夺政权开始的，但是，中国、朝鲜和古巴的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久，军队的一部分领导人就换下了军装，成为政府领导人，而另一批人一直留在军队里。虽然，他们表面上搞起了党军分离的把戏，但是实际上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他们的口号是“党指挥枪”。 这种指定代表式的一党专制体制，其实就是其军事独裁体制本质的遮羞布而已。

当人民要求民主的时候，他们就显出了军人的“本色”。

所以，无论是缅甸，还是中国、朝鲜、古巴，他们都一样地在倾情演出极端反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悲剧。

郭泉：民主先声42：21世纪中国必须构建以民主制度和国学教育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制

今日在一个“国学社区”里说了几句关于“国学和民主”的话语，立即就遭到警告：“不准把国学引进民主纷争里去，民主这字眼是要封杀的，你小心挨T”。

于是我就在想，是什么样恶毒的思维方式，竟把国学变成了专制的代名词，而执行着反民主的功能。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尔今普及国学知识、推广国学思想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

显然，国学是一个国家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专制服务的，当然，专制主义也会利用国学来为其专制服务。但是，国学的根本目的，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

国学的糟粕，例如专制、反民主等等，其实来源于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之后发布的伪国学。这个伪国学，才是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两个字“吃人”。所以，鲁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对的根本不是“国学”，而是专制统治者的“伪国学”。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时期的“批孔”，其实都搞错了对象。在这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同样弱智的。

长期以来，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和金陵国学馆的国学教学，应该算是提倡用国学来发展中国民主的代表和先驱吧。因为，我不知道当今还有谁和我一样把国学和民主在一个层面上一体观照和倡导。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政治模式，就是，民主制度和国学教育的合体。

目前，很多热爱和研究国学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国学是“大学”，其根本宗旨“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们普遍认为国学中的“小学”（ 读音、正字、考据和训诂等）才显得自己有学问。“小学”的研究对“大学”的理解当然有好处，但是，把国学理解为“小学”的学问，很显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小学”（考据派）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派，是在满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的文化统治下，中国文人的不得已的生存办法而已。

现在，已经不再是满族统治了，虽然还有“党天下”的文字狱，但是比其“家天下”的时代来，已经好很多了。如果我们现在的国学教育和学习，还停留在“小学”的阶段，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学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分

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狭隘的观念与狭隘的学问已经无法光大一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

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是“大学”，但是，他的弟子们搞的都是小学了，例如徐复先生。

我认为，学习国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而不是为了学。 这点如果大家还搞不清楚的话，可以回家给孩子喂奶去了。

当然，“为往圣继绝学”这样的冷板凳，的确需要人去坐，但是，不要把“为往圣继绝学”，当成现在我们学习国学的目的，这样就使得国学成为“小学”了。

国学的根本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落实到具体工作，就是构建以民主制度和国学教育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郭泉：民主先声43：那些认为“农家乐”的人，是没有良心的

自古以来，一些无聊、落寞的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都向往高山流水，并认为“小桥流水人家”的“农家乐”的田园生活是最美丽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经常背包走到深山老林里，山民无一例外地认为我离开城市到山里不正常，他们很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甚至还有山民提出，要用他们的10间草房跟我换我城市里的一间房子。他们说，他们一生的梦想就是走出大山，拥抱城市。

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苦难的。尽管，历史上的所有老爷们吃着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老爷们的战争也是农民去打的，但是，农民们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文化权力中心之外。农民，完全成为老爷们的玩物。

老爷们在官场中遭遇倾轧，于是就认为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是“农家乐”。可是，又有多少老爷在位的时候关爱过农民们呢？

当前中国农民正遭遇着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一个最屈辱最不堪的迫害，这个迫害来自全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的全方位的迫害。

在田地里辛勤劳动一年的产出，无力供子女上学、无力供老人医疗，甚至无力操办自己或子女的婚事。

城市里的老爷们总是把我们的最勤劳、最艰苦的农民兄弟姐妹称为低层、草根，他们总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即使进城成为农民工，也还总是城市的边缘者，任人宰割，不得尊敬。

贪官们一个章就几十万上百万，明星一个广告几百万上千万，而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只能喝西北风，子子孙孙在那儿愚公移山。老爸在城市做农民工的工资还必须用自杀相逼才能勉强领到。孩子考上大学，凑了大半个村子还不够学费的一半。

城市里的老爷要发展化学工业，又怕环境污染危害了老爷们及其小崽子们，于是就把农村当成了他们的排污场。农民的孩子难道不是人吗？

城市的老爷们在糟蹋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或女打工娃儿的时候可曾想想她们的父母用了多少的心血来养育她们，而现在她们却成了供老爷们享用的尤物。这就是她们的命吗？

没钱的人最常干得一件事就是搓手跺脚，诅咒这个该死的社会。贪官污吏却佯装不见穷人怨毒的目光。

那些认为“农家乐”的人，是没有良心的。

郭泉：民主先声44：谁该向谁感恩？到底是党养活了人民，还是人民养活了党

北京航大管理学院韩德强教授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主”的异见人士，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是集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这些诅咒和谩骂民主人士的御用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党养活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

好，我们先来讨论下，到底谁养活了谁，然后到底谁该向谁感恩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行政者”无论皇家大臣，还是现代公务员，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产生，是因为人民无力亲自处理所有的争诉，于是就找到了代理人（行政者的本来意义）来帮助处理。为了让这些“代理人”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承担了“代理人”以前自己要做的劳务，并向他们提供食物（最早税收的雏形）。也就是说，古代的时候，行政者为人民提供了服务，而人民向他们支付了报酬（赋税）。

但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些代理人开始异化成统治者，巧妙或野蛮地骗得了人民的一切权力，并宣布他们统领万民。于是，人民的劳动就变成了“行政者”的组织行为，于是，“行政者”就认为，人民的存活，完全是得益于他们的领导有方。最后，行政者得出结论，人民是被行政者养活的。

其实，无论行政者怎么解释他们的行政的重要性，都无法掩盖他们自己并没有从事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这一基本事实。

但是，我们也不能立即得出“人民养活了行政人员”这一武断的结论。因为，行政人员相应地提供劳务，人民支付的是行政人员的劳务报酬而已。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劳务合同关系，是双赢的关系。

以上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行问题，就是人民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共产党。

也就是说，人民支付给政府劳务报酬是应该的，但是人民凭什么要支付给共产党钱呢？

各级党委工作人员的工资、单位经费、党代会的会议费用，这些凭什么要人民支付呢？

如果说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对等的劳务关系，那么人民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则完全是养与被养关系了。

人民一直在养活着党。可是党却一直认为他在养活人民。于是，党总是要人民对党感恩，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人民唱出了“跟党走，报党恩，伟大的母亲像太阳，恩重难报永不尽”这样颠倒是非的歌曲来。

长期以来，人民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屡次“重大失误”而怨恨共产党，也没有因为人民没有更好的党选择而怨恨，人民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顽强地养活着共产党，中国人民是最厚道的。

共产党，应该向人民感恩。

郭泉：民主先声45：面对人民的苦痛，我们怎么能背过脸去，丢下他们不管呢？

我一贯主张人民应该有权选择执政党，提倡在中国建设多党民主竞选的政治体制，可是我的同事们，同样是教授，却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玩玩小女生，而去玩政治呢？”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看待我对政治的热心，难道我们读书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华之崛起，不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幸福生活吗？

难道我们读书人的读书目的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吗？

难道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真的都死绝了吗？

难道我们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里的知识分子真的都把读书的目的当成是“学干禄”(《论语》）和“玩小女生”了吗？

当今之中国，读书的目的，除了钱和色之外，难道真的不要“铁肩担道义”了？

面对统治者提出的所谓人民要和他们统治者“和谐”的奴才理论，难道我们知识分子不应该发出“人民满意才是检验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的呐喊吗？

面对他们用“中国国情”来作为他们搞腐败的借口和挡箭牌，难道我们知识分子不应该发出“和平时代，腐败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的控诉吗？

面对他们用“民主思想是西方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来反对多党民主的时候，难道我们知识分子不应该高举“两党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的旗帜吗？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华民族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要让人民知道，反民众的专制政治是中国快速腐败的罪魁祸首。

我们还要特别告诉那些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极权、资本与媒体，正在联合绞杀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永远是批评主流政治。

可能您的学位不高，也可能你不是教授、副教授，但是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奠定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不是学问的多少，而是良知和勇气。

我们还要告诉一切受害者，先富人群根本不想和人民共同富裕，他们想要的一直是经济特权。财富正在快速向“先富者”积聚，导致政治上中国的权贵资本开始对人民实行专政。极权阶级的根本目的是把人民的财富“共产”到了他们的腰包里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了权贵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他们邪恶的理论，一个罪恶的幽灵正游荡在中国大地。

我们还要控诉当代中国的权贵统治阶级，你们没有权利卖人民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土地。你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巧取豪夺人民的财富的借口。我们还要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在环保问题上、教育问题上，我们民族的未来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愚民政策再也掩盖不了人民生活的窘迫。现在，人民正在觉醒。当人民彻底觉悟的时候，就是权贵统治阶级的末日来临的时刻。

我们还要鼓励那些和我一样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同胞们：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社会福利的“修补”政策抱有希望，他们“修补”的目的只在于继续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伟大中国的坚挺，不能指望一群阳痿病患的“理性”。他们的“理性”只是他们剥夺人民的“理性”。因爱国而入狱的人，是伟大的。革命，才是永垂不朽的。

未来中国，必须是一个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开放党禁、解除报禁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步。民主思想的全部政治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制衡。多党接受人民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权力制衡。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公仆，否则执政党就是皇帝。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才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的国家的所有政治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另一是专制，而中国很不幸一直是后者。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从共产党内部的小圈子选。

没有民主制，就没有新中国。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国难不灭，何以为家？中国必须改变。

我也想安静地教学，安静地生活。谁不想安定呢？谁不想悠闲地度过自己一生中的几十个春夏秋冬呢？

但是，这个罪恶的时代哪里还有什么冬天的梅花和夏天的红蜻蜓？偶尔不经意抬头望见那洁白的月亮，都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享受呢。

我本是读书人，我真想和一切在太平时代的读书人一样看着春色秋香，度过夏去冬来。可是我深爱的人民呢？在这个不太平的时代，面对人民的苦痛，我们怎么能背过脸去，丢下他们不管呢？

郭泉：民主先声46：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造成大多数知识分子缺乏良知，并对统治阶级有一种原始恐惧

专制统治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家天下，一是党天下。 家天下是专制统治的初级阶段，党天下是专制统治的高级阶段。目前，中国的专制统治达到了高级阶段的颠峰状况。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统治，一直以来，专制统治竭力捍卫着“家天下”，其间，专制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商纣等等屠夫恶人，但是祖先们却未失去一个坚定的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上帝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吗？

家天下阶段的皇帝，虽然时有暴君出现，但是，他们还是畏惧皇天上帝的，他们还不敢完全地黑白颠倒，他们还需要礼仪典章来实行教育归化。毕竟，他们还记得一个信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事实上，覆舟事件也层出不穷，因为，在冷兵器和火器的初级阶段，反抗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颠覆就易如反掌。

但是进入到专制统治的高级阶段，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使用“党天下”，这更具迷惑性，这使得老百姓会误认为“党天下”比“家天下”要民主。其实，党天下比家天下更糟糕。第二、中国的党天下使用的是德国的无神论思想，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皇天上帝，于是他们没有什么怕的，其结果就是无恶不作。第三、现代武器的出现，使得战斗人数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目前再多的反抗群体，党天下也不觉得有什么感到害怕的。

于是作为专制统治的高级阶段的“党天下”在中国成了中国人的“上帝”。他控制着人的身体，更控制着人的心灵。

长期的专制使得一切民主的可能性都被打消了。知识分子明白地知道专制和民主孰高孰下，但是，却根本无法进行有关民主的任何尝试。于是，这样的痛苦状况扭曲了很多人的灵魂，让他们失去了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专制社会所造就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使得略为处于优势地位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受到利益诱惑和暴力压服而依附于权贵，而不是去追求正义与真理。

另外，知识分子在大量阅读中了解到文字狱、了解到专制主义对异己力量的残酷打击，于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就弥漫着一种原始恐惧。 当有人提出革新思想、并想消灭这最后阶段的专制主义的时候，保守派知识分子会立即把自己内心的恐怖传播给革新者。例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

这些知识分子，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专制主义最庞大的帮凶。

郭泉：民主先声47：中国必须尽快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否则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将横扫一切专制统治

目前，中国的所有问题，诸如腐败、司法不公、侵吞国有资产、贫富分化、失业、社会动荡、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其根源在于一党专制。

一党专制，其本质是反对民主的。只要中国还有一党专制这样的绝对权力就不会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中国的问题什么药都用不上。

仔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就能知道，不管什么处方，什么良药，只要和有封建特色的极权政治一结合，就一定变质，变得有名无实。有的无法实施，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不起作用，有的适得其反。

无药可治的病是最危险的，不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没有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

有人怕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多党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满以为高压可以长治久安，结果二世而亡。处在大国之间的瑞士，国小而多民族，不靠高压而靠民主，然而，和睦团结、稳定昌盛，赢得全世界的尊敬。

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社会矛盾，避免震荡，惟有依靠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是中国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唯一道路。

郭泉：民主先声48：别我们一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你们就污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

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社会矛盾，避免震荡，惟有依靠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是中国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唯一道路。

但是，我们一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专制主义者立即就污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低。几百年前的西方人都可以搞出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而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却被污蔑为素质低到不能搞多党竞选？这是什么逻辑？到底谁素质低？我就不相信中国老百姓会比陈希同、陈良宇的素质低。

一党专制者污蔑中国老百姓素质低无非是想让老百姓相信只有专制者才是有素质的。正如，他们污蔑上帝等有神论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人民不信上帝而去信他们。

如果一党专制没有诸如腐败、司法不公、侵吞国有资产、贫富分化、失业、社会动荡、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问题，那么人民支持是一定没有问题，我也就不会再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问题是一党专制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到底谁素质低？你们一方面在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另一方面却总是在污蔑人民的素质低，这不是在自己刷自己的脸吗？

你们骗老百姓帮你们打内战的时候，怎么不说老百姓素质低呢？

现在你们的所谓的革命成功了，你们为了捍卫你们并不值得人民爱的统治地位，你们却大肆污蔑帮助你们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你们怎么对得起无数牺牲了的人民的优秀儿女呢？你们这算是什么理论？

郭泉：民主先声49：一党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一种反人类罪行

一党专政，是专制主义的高级阶段，表面上他反对“家天下”，而他的“党天下”实行的严密统治，连“家天下”都望尘莫及呢。

虽然此一党人数众多，但是在执政党内进行专制统治的还是极少数的极权分子。也就是说，此一党内，为了标榜自己的所谓的人民性，把一些受蒙蔽的受苦受难的人民也吸收到党内。于是，党内也分为两个阶级，执行统治的是统治阶级，大多数普通党员和人民一样，都属于被剥夺的被统治者。

总体来说，一党专政，就是极少数极权分子对人民的专政统治。他们的无耻和卑鄙是人类历史上极罕见的，他们最独裁，他们最瞧不起劳动人民，他们迷恋封建时代的帝王专制统治。他们虽然很无耻，但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很高尚、很无私。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已经诞生了几百年的情况下，还打着“中国特色”、“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破旗实行自己对劳动人民的独裁。

改革开放，是正确的，能很好地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但是，他们在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的同时，也在实现他们的罪恶的腐败目标。他们无一时无一事不在为他们在中国实现专制统治而努力，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他们只相信他们的利益必须凌驾于劳动人民的利益，或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

他们在30分钟的新闻联播里，25分钟说他们怎么怎么好，5分钟说西方怎么怎么糟。事实果真如此么？他们可能会比非洲、阿拉伯和南美的一些还处在原始社会的酋长部落要好些，但是他们自己心里也一定知道，他们搞的专制制度怎么也不会比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国家优越。

封建帝王使用的“文字狱”等思想钳制手段，他们继承的很地道，他们现在还沿袭了文革期间的一切高压手段，例如，扣帽子、打板子等手法，他们用得极为纯熟。他们控制了舆论媒体，他们不让人民说话，或者不让人民听到人民喜欢听到的话。他们控制了军队，如果人民不同意他们的统治，他们就会开动军队的庞大机器。

他们一方面让工人失业、农民打工受尽凌辱，一方面纵容自己家属和集团成员大发国家财。他们打着改革的幌子搞专制，他们打着开放的幌子搞卖国，他们无法无天，欺凌人民，在中国做下了数不清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绝不能让中国走向人民最美好的梦想——共产主义，他们一心想着怎样把中国拉回专制主义的旧世界，因为，只有如此，他们的私利才能得到满足。

他们要劳动人民从国家的主人公变成他们的奴仆，供他们世世代代奴役。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即使他们杀掉所有的人民思想家，他们的无耻阴谋依然不会得到实现！只要人民还在！

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根本不属于中国人民，他们甚至都不能算是中国人，他们最多是即将被中国人民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一摊滴着浓血的腐肉而已。

郭泉：民主先声 50：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实现的一个是“民族”，实现了半个的是“民生”，还有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是“民权”。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而民权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诸多针对满清的武装革命。

解决“民生”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虽然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人民的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饿死冻死的黎民百姓了。说“民生”只解决了一半，是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例如，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一部分利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根本不想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该更好些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占，随着厂房、医院、学校、银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

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理想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种觉醒的认识，标志着“民权”时代即将到来。

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这种服务不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还行使了控制经济发展的道德方向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的两者关系上，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思维的差别。

一是以邓力群为代表的“经政极左”派思想，他们提出经济上使用陈云的“鸟笼”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政治上他们主张回到毛泽东。

二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经右政左”派思想，他和他的幕府的观点是，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政治上主张回到毛泽东。例如，他最近提出的“朝鲜和古巴，虽然在经济上有些困难，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明证。

三是我提出的，“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快速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邓力群的极左派思想，简直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他们可能一直以为中国是在月球上的一个真空国家，如果他们想去月球生活的话，他们自己去好了，中国人民才不想做他们的同路人呢。

胡锦涛的“经右政左”派思想，完全无视“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以为全国人民和他们一样也沉醉于“祖国大地一片红”。同时，他们也根本没有看清，毛路线其实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

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场经济又搞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会繁荣富强、社会稳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搞专制的国家，都走向失败，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动荡不安，拉美、印尼、中国均如此。

所以，必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改制的赛跑，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革命就会爆发。清朝末年，革命骤起，虽然有戊戌变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革命一举摧毁。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这也是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泉：民主先声 51：我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当八年中国总统，然后回老家种田养猪

长期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建设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国家，主张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来选择执政党。

但是，一些网友联想到毛泽东 49 年之后的一党专政，就开始担心我是否也会在未来竞选上中国总统后废除民主立法，而搞一党专政呢？

这些网友的担心是必要的，翻开南美和非洲和东南亚（特别是缅甸）各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以

民主宪法为伊始的新国家，堕落成为军事专制国家也是易如反掌。

但是，这些倒行逆施与我是永远无关的。理由如下：

第一、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其实和 49 年前各民主党没有与共产党一起强行制定一部多党竞选的民主法律有关。当时的各民主党认为选举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于是就把立法的事情搁置下来了。等到 1957 年（西方民主国家 4 年为一任，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二任），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位领袖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再提出来“轮流坐庄”、“多党竞选”的时候，他们就被毛泽东打成了“右派”。而我们，必须先选出议员、制定多党竞选的民主法律体系、召开议会。这样才有制约总统、弹劾总统的议会和法律基础。这里引用美国总统华盛顿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民主制国家的认知：宪政治国天为公分权制衡议会国，全民普选废任命，公民监政参议政。

第二、我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南美革命斗士切·格瓦纳、另一个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切·格瓦纳的牺牲精神，使我在争取民主的工作中有了无尽的精神动力。他有两句话我终身不忘，一是当他被捕时，面对枪口，他说：“我叫切·格瓦纳”。二是他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美国有一位华盛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第一任总统是幸运的。华盛顿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解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 年，华盛顿再度接受人民的召唤，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89 年 4 月，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当他担任美国总统八年后，发誓不再连任，坚决回到芒特弗农山庄，过平民生活，直到去世。

我想，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我就是切·格瓦纳，当我面对枪口的时候，我也要说：“我就是郭泉”。当我被反动派杀害之前，我也要说：“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我想，我在当选中国的民选总统之后，我也要做华盛顿。我的任期届满，我也要不再连任，回到我的徐州老家种田养猪，直到死亡。

第三、我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对“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从小“三不朽”的观念就牢记心中。我接受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要做一个流芳百世的人，这就必须“立言”、“立德”、“立功”。复辟专制是绝对没有好名声的。所以，我不会做毛泽东那样倒行逆施的事情。

我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当八年中国总统，然后回老家种田养猪。

郭泉：民主先声 52：“民主”就是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中国人一直就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民主。其实，民主就是人民有权决定选择谁来为人民服务。

而在中国，民主和自由，都被专制主义者做了精心的篡改。

例如，专制主义把不遵守规则、行为散漫称为“自由主义”，于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就立即被专制者颠覆为一个贬义词。以至于中国人在幼儿园时代，就被幼儿园老师呵斥“这个孩子太自由主义了”。于是，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自由主义就成了一个坏东西，而整个西方文明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他的孪生兄弟民主主义基础上的。

民主，也被中国的专制主义者篡改的面目全非了。例如，御用文人、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悍然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仔细研究刘教授的文章，才发现，他所说的民主，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先来看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一，这些“选”出来的代表都是哪些人？他们是否能代表人民？每届人大代表都分为政府代表、军队代表和行业代表。前两者其实就是公差，他们其实是人大决策的执行者。他们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而那些行业代表却成了“巡边员”，当然最高裁决权还是在裁判手里。而全国人民就被“代表”成了观众。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其实就是最大的“黑哨”。第二、这些人大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我已年满四旬了，可我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在选取前在报纸、电台、电视台搞竞选演说，更别说他们是否走向街头拉选票了。说你

“代”你就“代”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这三个代表吧！

我们再来看看执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党内的不同声音的发表，这根本不叫“民主”，因为执政党已经不是“民”了，哪还说得上什么“民主”？至于党内不同意见，其实就是执政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和民主风牛马不相及。而事实上，凡是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的，最后都死无葬身之地，如共产党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害死后火化时的名字成了“刘卫黄”，职业栏上写的是“无业”；再如共产党员、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火化后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著“王川、男”三个字，职业当然也是“无业”。

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政党领袖或是国家领袖的产生，若是没有经过竞选，独裁就是难免的，因为执政党永远都想自己永远执政，永远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类无法克制的罪性，所以，人民必须设计出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压制这种罪性。

这个有效的方式，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可以用自己手里的选票选择执政党。人民的选票可以使好的领导人上台，同时也使领导人做得更好，否则他就会被人民选举出来的新的领导人取代。

执政者无时无刻不在破坏竞争，以达成自己的权力垄断，所以，人民的选票，其实就是对执政者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惕的利器。

郭泉：民主先声 53：“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可以用手里的选票选出自己的执政党

49 年以来，“人民当家作主”这句承诺，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谎言。

中华民国时代，大量不明真相的农民和工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许诺下，颠覆了由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直在努力实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

这个曾经推翻过中国历史上最凶残、最野蛮的清朝政府的中华民国，刚刚才打走了日本侵略鬼子，牺牲了无数优秀的青年军人和知识分子，还没喘过气来就被红色革命颠覆了。

那么，这五十八年来，人民真的当家作主了吗？人民到底可以作什么主？面对自己奋斗多年的工厂被卖给权贵者，人民可以作什么主？面对昂贵的住房，人民可以作什么主？看到无耻的统治者对人民颐指气使，人民除了在心里怨毒地咒骂之外，还能作什么主？

过去几十年专制者一直宣传“人民当家做主”，还有诸如“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等词汇叫了很多年，结果发现这些都是专制者骗人的把戏，权力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政党内部实行“集体世袭”。专制者“当家作主”了，而叫人民为他们服务，叫人民成了他们的“私仆”。

人民其实从来就没有做过主，做主的都是“伟光正”。“伟光正”们认为他们永远“伟光正”，永远戴三只表，于是，中国人民在他们的领导下比美国的人权都要“好五倍”，幸亏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太子，否则中国如朝鲜的金家天下一样，现在也是毛家天下呢。在这点上，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彭元帅。

毛太子是死了，可是千千万万毛太子又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的帮主就是那“500 个家庭”，这 500 个家庭垄断了中国的政治权利、经济命脉，左右了中国的大政方针。而全国人民都成了乞丐。

人民当家作主是什么？当今中国有谁能讲清楚，人民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民已经被虚拟了、被空泛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统治者都拿人民做挡箭牌，什么人民军队、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铁路、人民邮政、人民警察、人民共和国等，以人民的名义奴役人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还找不到漏洞。

那么，人民和执政党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第一、若是知道人民是东家、执政者是掌柜的，掌柜的必须经常换，就很容易理解人民当家做主了。现在的人民是东家吗？掌柜的伙计却在指挥众东家们去厨房生火拣菜。

第二、执政者就是被人民选出来，并关在笼子里的一条狗而已。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有段很精彩的演说，他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什么昌明的科技、也不是什么闪光的名著，而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

这才是中国人到今天没有意识的问题，中国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如政党，但中国的政党最后都成了军阀了，掌控了军队的政党不过是极端的、大规模的“黑社会”而已。孟子曾言，“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一个政党的党魁，通过非正常的选举手段成为政权独裁者，当权力握在手中，就必然会发着狠地滥用从人民手中骗取到的权力。

中国近60年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吗？“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政”、“主权在民”，在中国不过是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一种口号而已。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可以用手里的选票选出自己的执政党。这才是正直的当家作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郭泉：民主先声54：所有被迫害和被玷污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
维权项目书

本项目是针对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和中石化)在2000年和2001年下岗离职的59万需要维护工作权利的人员而设立的。

这些人员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欺骗与单位签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以下简称“协解人员”。

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原中国石油部分成两个单位，现在同为世界500强，其中中石化是亚洲第二大公司,据《世界周刊》排名，中石化是全球第17大公司。

中石油中石化在2000年和2001年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非法解除员工59万人，目前这59万（详细数字当局没有对外公布）人的绝大部分人员正在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维护工作权利的抗争，以挽回自己所遭受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损失。我们就是要为这些人找到一个更加有效果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公民政治运动的进展。以下我简单介绍此项目的情况：

一、项目名称：中石油中石化协解人员维权

二、地点：中国国内的各油田各石化企业,分布在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不同的人数协解下岗，主要以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气田、吉林油田等单位为主。

这些地方维权热情高，利益夙求一致，人员便于集中。

三　远期规划：2009年12月30日之前，登记30万人员，并将这些人员组成一个同一法律诉讼群体。

四　近期目标：中原油田试点工作开展。（目前已经展开）形成500至800人的骨干维权力量。

五　所需资金：（内部计划、不予公布）

六　目前投入情况：１、试点已经印二千份宣传、统计人数的调查资料。２、资料已经全部下发完成。３、目前已经形成３０人的维权骨干人员力量。

目前本项目社会反响很好，已经和美联社、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等12家国际著名媒体通报了情况。下岗人员更是踊跃参加。项目需要后续的发展资金支撑，以能顺利的达到规划目标。

附件1呼吁协解人员用司法途径展开维权自救

自从200１年，我们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间接的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几乎使我们这些被胁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大部分人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在此期间的2002年直至2005年，协解人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和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进行交涉，努力挽回所遭受的损失，很遗憾均无结果。2006年5月，协解人员自发的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抗议活动，抗议有关当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无视“和谐社会”的全民意志，虽然抗议活动期间有四位抗议人员被行政拘留，但是我们自豪的换回来了2800个所谓的就业机会，为胁解人员及其家属赢得近每年3000万元的经济利益！事实向我们被胁解的一万余名人员表明，我们们的权利是争取来的，自己的权利必须自己去争取！

就此，我们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展开我们的维权自救工程，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并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在一些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帮助下，中原油田协解人员的状况资料被广泛的在社会中传播，并引起了中国法律维权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范亚峰博士，以及著名维权律师唐荆陵先生和荆楚先生等多名律师均提出愿意提供法律帮助，提出走司法途径解决协解人员目前以及将来所面临的困境，国内维权界著名人士郭泉先生、刘安军先生、郭永丰先生、王勇先生均表明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

一　用司法途径解决协解人员：

1、目前协解人员一般用上访的方式，试图用这个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很遗憾的是效果并不是太好，原因是没

有法律的保障，总是在被有关的工作人员以没有相关政策为理由，甚至是拒绝接访，我们被动的被导入政策的“旋涡”，不能自拔，在他们制定的前后不一的政策中被踢来踢去。利用目前我国的法律，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在程序上基本能保证我们不会被“踢来踢去”原地不动。

2、避免因集体上访触犯国家法律。因为协解人员众多，并非是一人一事，而是众人一个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个人上访很显然根本无法解决众人的事情，如果大家集体上访或众人讨论上访的有关事情，经验告诉我们往往被以煽动集体上访的罪名拘捕，而使协解人员的处境更加被动。

3、可以合法的在我们中间推选诉讼代表，办理诉讼中的日常事务，如聘请律师，收取愿意参与诉讼的人员所应付的诉讼费用，监督费用的使用情况，寻找有利于我们胜诉的证据等。

二　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以法判令协解协议无效，恢复诉讼人（原告是参与诉讼的协解人员）的原工作岗位。

2、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支付协解之日起，至重新恢复原工作原岗位的 6 年来的平均工资。

3、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支付从协解之日起，至重新恢复原工作原岗位的劳动保险金。

4、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给予在协解后，退休的人员和非协解的退休人员有同样的退休待遇。

三　法律依据：

1、1999 年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1999 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确保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出售方应在申请出售前征求职工对出售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意见，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企业出售中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买断工龄’或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这两份文件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职工利益的角度，规定企业不得以“买断工龄”的形式将职工推向社会。而中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在 2001 年却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打着“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幌子，“了断”职工，显然已经违反了国家政策和法规。

2、《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然而当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一不是濒临破产，二不是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而是效益极佳的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没有向企业工会提交报告，二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三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四没有给职工协商，五没有给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批，这就违反了《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3、国家劳动部劳部发〔1996〕354 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用人单位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劳动者，如果其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

(2)工作年限较长，且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

(3)复员、转业军人初次就业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条也明确指出：“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从以上法规可知，除破产倒闭企业外，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40、50”人员是不会轻易下岗失业的，他（她）们的劳动权利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中石化被裁减职工中有大部份工龄是达到了 10 年以上的，也有不少是距退休年龄 10 年以内的，企业必须与他（她）们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允许将他们“扫地出门”。中石化的做法显然也是违法的。

4、《劳动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四　协解人员目前应做的工作：

1、寻找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协解人员，并做好记录，以便将来汇总。

2、推举诉讼代表，收取诉讼费用，并推举专门人员监督使用和管理的情况。

3、建立协解人员相互通畅的联系渠道，更经济（节约）更快速的通报诉讼的进展情况。以上未考虑周到的地方，请大家提出，尽快进入司法程序，使大家有可能早日得到对

于我们协解人员来说应该是迟来的公正。

2007 年 8 月 29 日

附件 2 关于中原油田维权情况的通报

通过近期在中原油田展开的维权工作，每个参与维权工作的人员，更加坚定了通过使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方法，解决“协解”人员权利被侵害的信心。下岗人员积极参与，比该项目事先进行的评估预计的效果更好。经粗略统计，大约已经有一千五百人声明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欢迎媒体记者采访报道。

2007 年 9 月 23 日

郭泉：民主先声 55：同胞们，以民主的名义，我们团结起来！

网络对西方人来说只是一个使得生活变得便利的一个技术工具而已，但是，网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异常猛烈的宣传民主的武器。

网络使我们更为接近，网络可以唤起我们中国人心中残存的良心和勇气，网络可以唤起一切爱好民主的人们的兄弟般的情谊，网络，正在使得我们日益团结。

现在全世界有无数的人在通过网络了解中国的苦难。在中国，无数个绝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些在某种制度下受迫害、监禁的受害者。我要对同胞们说：不要绝望，我们蒙受的痛苦是由于一时贪婪所致，由于有一些人害怕人类进步的怨恨所致，人的仇恨会消失，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夺去的权利即将归还给人民，只要前仆后继，自由是不会消灭的。

生活的道路本应该是自由民主美好的，可是我们迷了路。贪婪毒害了人性，用仇恨分割了世界，把我们赶进痛苦和血泊之中。

我想以民主的名义，尽力帮助所有的人，我们都想彼此帮助，一切高尚的、热爱民主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的未来的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是要靠大家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们不应该彼此仇恨、鄙视，在中国，苦难的人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可能痛苦的种类不同，但是我们绝对是一个阶级，我们绝对是共同的被压迫者。

一切苦难的人，都要以民主的团结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团结起来，是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根本品质。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品质，生活将是凶残的，一切都将失去。

同胞们，不要听从那些禽兽，他们是鄙视、奴役我们的人，控制我们的思维、控制我们的言论、控制我们做什么想什么接受什么，把我们大家当作牛马去使唤，把我们当专制主义的工具！

同胞们，不要为奴役而战，要为自由而战。《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上面写着：天国就在人的心中，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而是所有的人，是你们！

你们是有能力的人，有创造机器的能力，也有创造幸福的能力。

你们是有能力使生活变得自由美好，使生活成为奇妙境界的人。

让我们以民主的名义运用这种能力，都团结起来！

为了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战！

我们的诺言是，使人人有工作机会，使青年有前途，老年有生活保证。

好多禽兽就是靠这种诺言起家的，那是欺骗！他们从来不会兑现这些诺言，永远不。独裁者自己自由了，可是奴役了人民。

让我们为了实现这个诺言而战吧！

为了解放这个世界而战！

除掉专制主义，除掉人间的贪婪、除掉一切仇恨和偏执，实现一个理智互爱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科学进步和自由民主能导致所有人的幸福！

同胞们，以民主的名义，我们团结起来！

郭泉：民主先声 56：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说实话，如果您只看中国的法律，你会认为中国真的是人间天堂。但是，你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你对地狱的想象都不及现实的中国的一半呢！

所有的权力，最后都归向了一党专制。例如，外国人看到中国有公安局、有检察院、有法院，就以为中国也是司法独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中共政法委统一控制着公检法这三个司法部门。再例如，外国人看到中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以为中国的人大类似于外国的议会，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各级人大主任都是中共的各级党的书记担任的。其他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说了。

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完全是一党专制造成的。

一党专制，其实质就是取消了当代社会最宝贵的政治理念：制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衡，那么随便这个一党专制的党说自己是三个代表还是四个代表，事实上，他们都只能代表他们自己。随便他们怎么说自己是怎么样地爱国爱人民，其实质都是复辟封建帝国而已。

当然，一党专制也会搞一些文字游戏，例如“党内民主”。其实执政党已经不是民了，还叫什么民主呢？不让人民投票选择执政党，却说自己已经是民主了，这就不只是“弱智”这么单纯可爱了，而是在背后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权力制衡，才是民主的核心问题。一党专制，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这就是一党专制的秘密所在。

“制衡”才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了。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个政党是不会受到制约的，两个以上的政党才能互相监督、相互制衡。

制衡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在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政党的利益驱动就是为了获得执政权，执政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一心为民服务，争取连选连任，在野党千方百计地寻找执政党的错误和漏洞，在公开攻辩执政党的同时，修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寻求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制衡就这样产生了。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间久了，都会犯错，多党竞选、政党轮替才是人民的福祉。

人民总是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政党来执政。那些认为人民还没有素质搞民主的人，其实是把人民当白痴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

一个政党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时刻标榜自己是“最伟大、为光荣、最正确的”毛共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没有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除了犯罪还是犯罪，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并且被人当成神王来膜拜，毛膨胀得发疯了，全国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制衡除了强化立法、司法对执政者的权力外，还必须要建立舆论的监督权，历史上很多执政者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独立作用多么重要。

可是在中国，虽然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却找不到可以发表我们自由言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郭泉：民主先声 57：民主制度作为一种选择执政党的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一党专政为了永远实现他们的一党专政，为了向人民灌输他们的一党专政永远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一党专政，于是他们总是污蔑中国人民素质差，不适合搞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其实，素质差的是他们自己。在二十一世纪搞一党专政才是素质最差的执政党呢！

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选择”是人类生活中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

例如，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解决每日的饮食。我们在菜场购买食物，手里拿着钞票，眼里看着多种多样的蔬菜或肉品。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作出购买行为。这种“持币选择”的过程，难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选择执政党的生活影像吗？再例如，我们为了种族和家族的繁衍，我们必须谈婚论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这都是一种选择行为。还有我们考学，无论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选择。

好了，更多的例子我也不想再举了，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选择”是我们每日最大量的行为方式。只要是人，那么我们就时刻在进行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任何人、任何群体的选择都是“趋利避祸”的。

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上文里一党专政所污蔑的所谓“人民素质差”的恶毒逻辑。他们之所以这样恶毒地诅咒并妖言惑众污蔑“人民素质差”，其实是对选举结果的恐惧。

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民主就象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引导一个优秀政体的健康运转。它象市场经济一样，都有其内在的调节作用。民主有一支看得见的手，一支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

选票，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民主无形中推崇着正义，压制了邪恶。

选择，作为一种执政党产生的行为方式，在民主的层面，就是人民应该有权选择执政党。

而目前中国的一党专制，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把人大代表的选举称为“民主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只是一种德才的选拔方式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而即使是他们张冠李戴的所谓“人大代表选举”其实也没有落实给人民。广大选民其实几乎从没有参加选举的人占有绝大多数。我今年已经年过四旬了，偶尔见过几次选票，上面竟赫然写着几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我无法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是怎么写到选票上去的，更无法知道候选人的情况和政见。

我的同事们履行了在特定时间举手或在特定位置画圈的“权利”。而我，最后选择了弃权。无论是他们的举手还是我的弃权，其本质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剥夺。

今年，有警察对我说，郭老师，你要不满意选票上的其他人的话，你也可以写上你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这警察是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报纸、电台、电视台不能让我到上面去自由发表我的施政言论，我在我的选票写上我的大名，到底有什么意义？

中国的现代政治思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启，从本质上说，中国政治模式还处在政治野蛮阶段。中国的一党专制，其实质，就是对封建帝王专制的复辟而已。

郭泉：民主先声 58：联合国应该为各国民主进程保驾护航，而不能受控于个别专制国家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从联合国的这个宗旨，我们可以看到某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不只是某国政府的专制问题，同样也是联合国的工作任务之一。

为实现上述宗旨，联合国遵循下列原则：各会员国应该忠实履行他们依宪章规定所承担的义务；联合国组织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的事项，但此项规定不应妨碍联合国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的行为及侵略行径采取强制行动。

根据联合国的这些原则，我们还可以知道到某国执政党必须履行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好了，我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某国执政党不履行《公约》算不算是内政？联合国要不要对某国执政党践踏人权、践踏《公约》的行为进行干涉？

虽然，联合国有“联合国组织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的事项”原则，但是，我们从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中可以得出人权和自由问题不只是内政问题，也应纳入联合国的工作范围。于是，就有了《公约》的 41 条。《公约》第 41 条规定的是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即依据《公约》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本公约义务的来文”。

目前，缅甸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人权危机。国际社会的目光都投向一个僧侣和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发起民主革命的国家。自从仰光街头爆发以僧侣为先锋的民主革命以来，缅甸的屠夫已经屠杀了数千名僧侣和民主人士，至于被逮捕的不计其数。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军政权还会让多少人倒在血泊中。

就在我关注这样一个在 21 世纪发生的人类惨剧的同时，传来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对媒体表示：对中国和好几个安理会成员国来说，那里的局势存在一些问题；但在目前的局势下，缅甸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对地区和国际安全与和平构成一

种威胁。法国《费加罗报》网上消息标题为："中国拒绝制裁缅甸"。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对缅甸民主革命的态度和思想，最后终于看懂了他们的意图了，那就是"中国以后屠杀类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是中国内政，联合国也不得干涉中国内政"。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前的表决方式是全票通过才可以对出现人道危机的国家进行制裁。但是，我想这个表决方式对制裁缅甸这样的专制独裁国家应该是不能适用的。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也有和缅甸一样的专制独裁国家，这个国家在以前和现在，时刻都在发生着屠杀民主人士的事件，这个国家也时刻准备着在未来屠杀一切促进民主革命的民主人士。

针对缅甸屠杀民主进步人士的暴行，我主张两点意见：

第一、联合国应为各国民主进程保驾护航，而不能受控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个别专制国家。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应该立即出兵缅甸，消灭缅甸专制政府，让昂山素姬建立一个民主缅甸。

一党专制的缅甸独裁军政府，是人类的敌人，任何正在帮助缅甸屠杀民主人士的国家，必将与缅甸独裁军政府一样，受到人民的控诉，他们一切反人类的罪行都将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郭泉：民主先声 59：执政党绝对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才是主人

从前，我们全家受误导，错误地认为以前的保姆不好，就在劳动力市场重新物色了一个四五十岁的保姆。于是，我们全家和这个新保姆，联合起来把以前的保姆赶出了家门。

新保姆刚来的时候，模样好，人勤快，工资要求也不多。可后来变化的太大了。她越来越懒，买菜的时候还贪污我的钱。我当面训斥了她，她居然对我说："工资太低了，不贪污怎么活啊？"她还要我学习西方，高薪养廉。可我涨了她的工资也没用，她还是变本加厉的贪污我的买菜钱。

我晚上回来迟了，她很不情愿地开门，还向我要额外的开门费用。她还强迫我们家庭成员在自己家里办理居住证，出入都要检查。她还给我们强加林林总总的各种摊派和收费。连叫她去倒垃圾，都还要交垃圾处理费。我们心里窝囊极了，可她还在小区里面到处宣传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竟然欺骗隔壁的山姆大叔，说她是我的母亲！还要我们颂她恩。

有一次，我和老婆商量再要一个小孩子，她突然从阴暗角落里面冲出来，说她坚决不同意，因为她制定的最重要的一个家策就是计划生育。天啊，她只不过是我从劳动市场上雇来的一个保姆而已啊！竟然干涉主人的生育问题！

过不了多久，我的家庭就败落了，可我们的保姆却越来越阔绰。我们家的伙食越来越差，保姆却常常大吃大喝，出入各种高档酒店。求了她好多次，她才勉强的做一点家务，而且每次做完家务她都要我们对她感恩戴德的反复歌颂赞美。

7 月 1 日又是她的生日，她总是逼着我们全家大操大办，花掉不少的钱，上次还逼着我的小孩叫她奶奶，看着她洋洋得意的样子，我们心里恨死她了！

终于一天，我决定要解雇她了，结束这一切悲惨的生活，话刚出口，她就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我说：你怎么打我？她恶恨恨的对我说：你还真以为你是主人啊？看着她强悍的样子，粗壮的臂膀，我真的不敢再说什么了。毕竟，我已经营养不良好几个月了，不是她的对手啊。

小区保安里有几个农村小青年，保姆常常用我的钱来招待他们，结果他们都公开表示，他们永远忠于我家保姆。我当时就恼了，我愤怒的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们小区的保安，是我们交纳的物业费养活你们的，你们是人民的军队，可不是谁的私人卫队，你们应该忠实于我们小区业主的啊。

保安们白了我一眼，却说：你的确是业主，不过你已经被代表了，我们忠于你家保姆，就是忠于业主，你家保姆是你们家的唯一合法代表！

后来保姆知道我找过保安，回家后对我冷嘲热讽，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代表你，你可以离家出走啊。你要是认为隔壁的山姆大叔家的保姆比中国的保姆好，你就隔壁山姆大叔家去住呀，别回来了。

天，我自己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可这怎么就不象我自己的家了呢？

对面楼上的山姆大叔很同情我，常常帮我说说话，山姆大叔家也有保姆可是很听话也很尊重主人，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命呢？我们家的保姆狠死山姆大叔了，可山姆大叔个子挺大，我家保姆也不敢当面说什么，可是我家保姆每次一回到家就拿我们泄愤，我们可惨了。我家的保姆说，我们的人权比山姆大叔家的人权好五倍，这样的生活我们 100 年不变。保姆常常在她的生日宴会上说她要活一万年，哎，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我们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本文选自网络，稍做修改，作者不详）

郭泉：民主先声60：只要还没有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就还处在人类的史前时代

这一课，我们要说说人类史的问题。

既然我们要说人类史，那我们必须先要搞清楚什么叫“人类”？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这样的生物怎样才能被称为“人类”？

人与动物在身体上是没有区别的，动物有四肢五脏六腑七窍，人也有四肢五脏六腑七窍。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和思想”。

人的“精神和思想”是人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的设计。这个设计只能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导向自由。任何导向束缚的设计，都是非“精神和思想”的，都是非人性和反人类的。

自由，一点也不神秘，就是是否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是否能选择自己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态度。因此，是否拥有选择权，才是自由的最本质的特征。

自由，如果用于选择执政党，就叫民主。民主，其实质就是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人民有权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可惜，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却被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完全扼杀了，以致于中国人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的一党专制彻底地反对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强迫人民接受它这个唯一的执政党。这种状况，是完全违背人类“精神和思想”的导向自由民主的根本要求的。

事实上，一党专制，就是反对自由和民主的体制，就是导向束缚而非自由的“设计”，因而是非人性和反人类的罪行。

人类，只有在获得了选择执政党的前提下，才真正开始了人类史，否则，就是人类的史前时期。

一个人们无权选择的世界叫“必然王国”。对动物而已，大自然就是“必然王国”，动物对大自然只能适应，而不能改变。对人而言，只能适应不能改变的那个必然王国叫“专制国家”。人类生活在“专制国家”和动物生活在“必然王国”的生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即，如果人类处于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时期和国度，其实就等同于动物，这个时期或这个国度里的人，其实都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史。

西方人是幸运的，因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就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要求民主的口号。到现在两百多年了，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很不幸，中国不在民主国家的行列。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在 21 世纪还视民主为洪水猛兽，这个国家还怎么发展？

其实，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只是经济制度而已，而政治制度只有两种，一是民主，而是专制。

可是，中国的一党专制，在人民面前完全不提民主的事情。他们用民生问题（经济制度问题）来掩盖民主问题。例如，14 大召开前讨论的话题是姓计姓市，15 大召开前是姓公姓私，16 大召开前是姓社姓资的话题，这些都是经济问题。17 大干脆宣称是一次“民生盛会”了。他们折腾了几十年，就是闭口不谈到底中国应该是“姓专还是姓民”？

目前，中国的所有的问题，诸如，农民贫困、工人下岗失业、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取消、房价上涨等，其实都是一党专制造成的。专制不除，百疴难消。

中国，只要专制还在猖獗肆虐，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史就还没有开始。在专制条件下，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是动物。

只要中国还没有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就还处在人类的史前时代。

郭泉：民主先声 61：2007 年 11 月 1 日，我启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

红色是血液的颜色，所以暴力革命也被称为红色革命。我反对在 21 世纪使用暴力进行民主革命。当然，如果专制统治者使用红色迫害民主人士，我也不排除发起红色革命的可能。

但是，我希望我不会在中国启动红色革命。

黄色，是中国黄土高原的颜色，黄河因此而获名。中国的专制主义思维方式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所有的中国皇帝都把皇家色彩定为黄色。

当黄色文明在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悄然崛起。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思想， 使得“蓝色”成为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代名词。而“黄色”对蓝色的禁锢和迫害，使得“黄色”成为专制的代名词。

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海洋，深邃而神秘。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地球的颜色、它是世界的颜色、他是宇宙的颜色。

黄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黄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黄色的专制统治，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也已经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黄色，它正在不断屠杀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

鉴于本人上述对红色、黄色和蓝色的不同象征意义的理解，特发起"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 （简称"蓝色运动"）

"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宗旨：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倡议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努力建设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的中国。

"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运动目标：确保中国尽早、全面实现民主政治

"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运动形式：日常性的和平蓝色运动

"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行为方式：不拘一格，只要能让人看到您身上有至少一件"蓝色物件"即可。例如，蓝领带、蓝手帕、蓝帽子、蓝手套、蓝色胸牌（以上任一）。

"蓝色运动"学习文件：郭泉专著《民主先声》。可通过 QQ、MSN、SKYPE 与我联系，我在线发给大家。

中国民主革命的"蓝色运动"发起人简介：

郭泉，男，1968 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提倡建设多党民主竞选政治体制。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刑事法官。

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郭泉联系办法：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博客：http://guoquan.vip.bokee.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62：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党专制的"会说话的工具"

我们进行生活、生产和管理都离不开工具。然而，工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沉默的工具，例如刀棍；二是会发声的工具，例如牛马；三是会说话的工具，例如人。

第一类工具是完全没有自主性的。无论主人怎么使用它，即使是毁灭性使用，第一类工具也完全沉默，因为它是完全无自主性的。这一无自主性，表现在无意识，于是也就无语言。

第二类工具是动物，已经具有了最基本的自主性意识，但是由于只有它自己种类的生存意识，而没有人类的思维意识，所以，动物只能顺从主人的摆布。至于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只是小波的自诩而已。

第三类工具是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件工具。我们都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工具。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生活生产有真理和谬误之分，管理有民主和专制之分，所有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有思考的。当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属于真理范畴，且符合民主要求的，这个工作我们就信心百倍。当某工作不符合民主的要求，属于谬误的范畴是，我们是可以拒绝工作的。

人作为一种有思维的工具，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是可以自己寻找主人的，例如，我们到底是选择成为专制、奴役的工具，还是选择成为民主、解放的工具呢？

选择成为专制、奴役的工具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被迫，一是自愿。

前者在本质上是反对专制的，所以是一种胁迫行为。后者却是一种主观愿望，是主体行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他们在面对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时候，采取了依附意识，前者虽然在主体上没有以主人的意识为自己的意识，但是行为却符合主人的意识；后者即以主人的意识为自己意识，其行为与主人的意志完全一致，并有所发挥。

对前者，虽然他作出了合乎专制统治者意愿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他们仍然应该怀有同情心的。因为他们也是专制的受害者。他们无力抵抗，只能顺服。

其实，我们也是专制的受害者，但是我们觉醒了，不再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了。

我们考察那些一党专制的"会说话的工具"，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它受制于、依附于专制（官）文化。其意识特点，一是"感恩戴德"，错误地认为自己的生活资料来源于专制统治。所以要"感恩"。 二是"安份守己"，如莫论国是等。这也就把公共事务和政治拱手让给了官僚阶级。三是"自私自利"，面对人民的苦难扭头而去。四是"只

反贪官，不反皇帝”。五是“走狗帮凶，共同施虐”。

时下中国的思想界，盛行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分流、争锋，从形式上说，左派坚持社会主义，右派宣扬资本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只是经济制度而已。而政治制度只有两个，要么多党民主竞选，要么一党独裁专制。

笼罩中国思想界的左派和右派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中国社会真正的病根——独裁专制体制。我们判断一切社会势力与一切思潮的根本标准，就是对此的态度如何。

一切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最应该知道专制对人性的破坏和毁灭。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些成为“会说话的工具”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走到了人性的对立面，他们实施和他们的独裁主子的精确合作，他们在各个舞台上扮演着人民公敌的角色，诸如，大学课堂、舆论媒体、网络论坛等。

他们的角色是，反动教授、反动政客、反动的网络评论员（这些人由于据说撰写维护专制打击民意的文章，可以获得每字零点五元的高收入，而被人民、被正直的网民戏称为“五毛人士”）。

郭泉：民主先声 63：警察同志，我也想“带好儿子教好书”，可是我怎能不管国家人民呢？

从 2003 年我开始做爱国反日的民间保钓运动（位于东海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现在被日本人占据），负责对我进行帮教的警察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凶恶，有的温和，有的无礼，有的文明；有的是敌人，有的则可以做朋友；有的心中有了民主的启蒙思想，有的却满心只有专制理念。

中共十七大期间，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也召开了我们的 17 大，并形成了十七大决议，而再次受到警察同志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学习习惯，就是对当前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或在茶楼，或在公园空地，或在某家客厅。可正襟危坐，可饮酒进食。但是，一个讨论结束，就会由我形成一个大会决议，冠以 N 大决议。上周已经就中国的蓝色革命，召开了 18 大，并形成了十八大决议。

2007 年 10 月中旬，中共的 17 大还在进行期间，而我们的十七大已经作出决议。就在我公布我们的 17 大决议后几天，2007 年 10 月 17 日，警察同志一行 4 人，携我单位中共党总支书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潘文老师）把我请到南师大仙林校区的保卫处，和我进行了广泛、友谊、激烈的会谈。

会谈期间喝茶 2 瓶，抽烟无数。时间长达 3 小时。

会谈首先从我的工资到底是共产党发的还是人民发的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

警察同志认为，我的工资是共产党发的。而我认为我的工资是人民发的。我的理由如下，第一、人民纳税给国家政府，第二、政府再对人民的纳税进行分配，其实大约不到 4%的部分被投入教育事业。第三，这个教育投入的一部分是教育基建、还有一部分是教师的劳动报酬。

此时警察同志的大意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个教育投入。这下我笑了，中国的教育在古老的夏商周时代就有，换了任何政府，也必须进行纳税的教育分配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我还顺便告诉警察同志，警察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而和共产党无关。

关于我的工资和警察的工资的来源问题讨论结束后，警察同志和我就本人长期提出的“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努力建设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思想展开热烈讨论。

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目前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是人民的选择。我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中国人民 49 年的选择，对此我不持异议。但是，现在是 2007 年 10 月份了，人民是否还选择共产党，这就需要看人民的投票结果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人民的投票，凭什么说人民愿意被代表了呢？而且还是三个都代表了。

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二，是多党竞选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我的意见是，当然不符合，因为宪法规定了只能坚持共产党执政。但是，一切宪法都不会是要使用几万年的，就是 49 年后，宪法还进行了很多次修改呢，当然未来的修改也包括修改这一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提倡创新的社会，创新有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两种。而修改宪法的这一点，不仅是执政理论的创新，也是执政技术的创新。

最后达成共识，民主是必然趋势。警察同志认为目前民主的时机还不成熟。是的，我说，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让这个时机成熟。本人在会议中再次重申了本人立场，第一，爱国爱人民，第二、只是对执政方式持不同政见，第三、反对暴力革命，第四，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加快建设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

11 月 2 日，一个负责我的警察同志，也是近年来最受我喜爱的警察同志给我短信，希望我“带好孩子教好书”。我立即回信：是啊，警察同志，我也想“带好儿子教好书”，可是我怎能不管国家和人民呢？

郭泉：民主先声 64： 我们必须拨乱反正，其唯一结果只能是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标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

任何打着民主竞选旗号而获得执政党地位，而后实施集权专制的国家和政党，事实证明，是极其反人类的，例如法西斯德国。更让我们警惕的是，希特勒也是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选的。

任何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施一党独裁专制，为了维护其执政党地位、搞军备竞赛而让百姓缺衣少食的国家和政党，事实证明，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例如前苏共。

任何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施一党独裁专制，并把人民的财富用经济改革的方式弄到执政党腰包里的国家，事实证明，也是极其反人民的，例如中国。

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种文化都能进行充分的辩论和展示，这样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种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训练和前进。

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多样化的文化建立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在追求社会的财富和政治的特权，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含义。

那种认为，经济上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政治、文化上我们搞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我们的确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把我们的生存目的仅仅解释成是发展生产力，把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资源去加以配置，变成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人的本质，而把人变成了经济霸权和专制统治的奴隶。

所以，除了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 1957 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悉数迫害致死。

现在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这个拨乱反正的唯一结果，就是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 65： 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想和人民共产

一般人都知道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此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也知道孙先生还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

国民党是靠暴力革命驱除鞑虏的，后又用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军阀混战，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属于军政。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暴力，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革命行为。

但是，暴力由于其手段与革命对象实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极易产生新的独裁专制而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孙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

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

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其实是民生的内容了。但是，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国民政府的训政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破坏。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

等到 1945 年战争结束，中国的战争资源已经完全耗尽。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宪政。而国民政府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够宪政的时机。与此同时，前线因为受降问题发生国共冲突，最终爆发内战。

1949 年，共产党颠覆了国民政府，并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党）驱逐到了台湾。

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首先，于 1949 年 5 月 l9 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实行军事管制。显然，这就是军政。其次，是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 年 7 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这就是训政和民生。

在 1986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 年 5 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 1990 年至 2000 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

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想和人民共产。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 95%的财富。同时，共产党还控制着一切权力，而不愿与人民共同竞选这一个权力。

事实证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郭泉：民主先声66：前苏联的一党专制是民主俄罗斯的前夜，中国也将如此

最近一些共产党左派和社会上的新毛派人士，不断地在反思前苏联一党专制破产的教训，他们说，“这样才能捍卫我们的执政地位，让我们的颜色永不变!”

其实，前苏联一党专制的破产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已。

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在专制社会，剩余价值被其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垄断，而民主社会，剩余价值从垄断的一端走向了均衡。当然，也不可能是完全均衡的。但是，这个均衡必须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

我们先来看看前苏联的一党专政在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前苏联是苏联共产党在沙皇俄罗斯时代使用暴力革命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先建成，而马克思却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整体地达到最高级阶段以后，再经过暴力或非暴力，全世界一体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建立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精确计算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两个特征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而这两个特征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才可以实现。

但是列宁却错误地认为击败俄罗斯沙皇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根本没有考虑物质是否极大丰富和人性是否极大发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考虑物质和人性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前苏共和中共都是很弱智的。如果仅仅是他们自己弱智还无所谓，问题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内造成的破坏和倒退却是罄竹难书的。

列宁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就可以发展共产主义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共产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全部经济的积累。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列宁在苏联搞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在中国搞了大跃进。结果是，苏联人民造反（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而中国人民饿死。

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这就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错在走的太快了，而忘掉了建设共产主义需要物质积累，于是他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两步》，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可惜毛泽东并没有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相反，中国在饿死 4000 万人之后，没隔几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即对执政党竞选批评和言说的其他民主党。

列宁死后，斯大林成为一党专制的主人。他立即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再次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随后的几十年，苏联和中国分别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卫星上了天，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与此同时，腐败官员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却越来越多。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在一党专政的开创时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人民的积怨越来越来深，直到人民想要让这个伟大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1991 年 12 月 25 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前苏联是多么吻合啊，前苏联的一党专制是民主俄罗斯的前夜，中国也将如此。中国的一党专制也将是民主中国的前夜。

郭泉：民主先声 67：现在谁还认为中国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谁就该下地狱

马克思根据社会财富的所有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认为在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

资本主义结束后，由于人们在物质生活和人性认知两个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于是必须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应该是在物质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特征。

物质方面，不需要我过多解释，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物质财富的积累并不比发达国家少。中国目前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其实是在对物质的分配方面。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在接受了多次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把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多数分配给了国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要比中国优越很多。

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财富上实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们还把执政权利拿出来供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竞选获得。所以，人性极大发挥的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财富的获取方面实现最大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实施方面实现最大程度的竞选公平。而这两个方面，中国目前都根本不具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现在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中国仅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还算不坏，问题是中国现在却连资本主义都不如。甚至，带有了强烈的封建专制的特征，而且比封建专制时代，还要专制百倍，是专制主义的最高级阶段。

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高福利和多党竞选，所以，中国现在还不是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个社会情况呢？

中国目前的情况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还是想罗列一下，用以加深大家对我的观点的理解：目前中国的一党专制对人民的高压控制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地步，完全垄断思想自由的一切平台，人民无法发表一切不同政见。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处于历史上最尖锐的对立状态。一党专制为自己取名叫“社会主义”，其实几十年来，并没有消灭阶级，相反却在加剧阶级矛盾。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十足的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社会，使得阶级对立更简单化了。一党专制无情地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们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货币自由代替了天赋人权自由。他们用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他们把医生、律师、教授、诗人和学者都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总而言之，他们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公义和善良。

如今，我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思考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我们终于不得不用胸中的怒火来批判他们

的生活特权和政治特权。他们由于窃取了人民的权力，他们由于强占了思想传播阵地，从而迫使我们听从他们的奴役，他们迫使我们按照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他们迫使我们采纳他们的所谓文明，而我们的反抗，却被他们称为不和谐。

一党专制为了他们的"基地屁"，无耻地展开惨无人道的现代"圈地运动"，被剥夺了农田的农民背井离乡。耕地被挪用，林木被砍伐，环境被污染，精神被残害，我们苦不堪言。

我们不仅被他们捆绑成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他们所谓的国家机器的残害。我们如果不炸毁构成他们统治的专制制度，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封建帝国吗？而且是封建帝国的最高级阶段。这个最高级阶段的特点在于，这个帝国的皇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党！现在谁还认为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谁就该下地狱！

郭泉：民主先声 68： 中共十七大开成"民生"会议，其实质就是用"民本"清洗"民主"

中国自古以来就发展出一套很成熟、很迷惑人的学问，就是民本思想。这是维持君王统治人民的法宝，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有效对抗民主思想的法宝。

近现代乃至当代，封建专制者为了反对民主体制，而有意误导人民，称"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而中国人民错误听信了统治者的洗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一直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民本思想，说白了就是封建君王把自己的极权统治当成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事，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封建帝王权术。人民温饱了，于是就不造反。

早期人类生活资源极其匮乏，人民随时处在饥谨边缘，封建帝王的这一用粮食换执政地位稳定的办法无疑是让人民吃上饭的好政策，受到人民的爱戴。《尚书·五子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段文字一方面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体现了对民众价值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也设定了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邦宁"，对我国的封建政治产生了千古如斯的影响。

战国思想家荀子亦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述。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

夯实"民本"这个基础，政治统治就会稳固，社会就会安定。由于"民本"与政治休戚相关，千百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一直为政治家所笃信、所力行。

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最终必如隋炀帝那样自食恶果。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他还曾经在《贞观政要·君道》中形象地阐述过这一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话都明确地表明了唐太宗民本思想的本质：如不能"存百姓"，"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就不能达到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目的。

很显然，民本思想，其本质只是封建帝王的权术而已，其目的在于用粮食维持统治。

维持统治在古往今来有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镇压，一是经济诱惑。民本思想，属于后者。当然，所有的封建帝王都不会放弃军事镇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只要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但是封建帝王也发现，中国人民的反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粮食问题。在粮食问题成为一个生或死的问题的时候，先吃上饭要比"持不同政见"来得实在些。

等到人民因为粮食问题而造反的时候，帝国再派兵镇压，还不如先让人民吃上饭呢。毕竟吃上了饭还造反的人是少数的。于是，聪明的封建帝王，就开始落实这一思想，并美其名曰："民本思想"。其实所有的帝王很清楚，这个"本"永远都是帝国统治的稳定。

这次中共把十七大开成了"民生盛宴"，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党专制最后的"回光返照"。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都在一党专制。但是中共却固执地认为人民大概只要生活好了就可以不要民主的。其实，当代中国的问题早就不是古代的那个是否能吃上饭的问题了，而是是否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已经把"民主体制"当成是维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而不是靠"明君"的名"民本"而实"帝王"的统治权术了。

这次，中共把十七大开成“民生”会议，其实质就是幻想用封建帝王的“民本思想”来清洗人民头脑中的民主思想。“民生”，其实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关注的实际问题，中共解决那些早就该解决的民生问题，绝不能成为继续搞一党专制的理由。

郭泉：民主先声 69：11 月 9 日，我宣布《2007 大中华（大陆、港澳及台湾）宪章》诞生

中国政府在 1997 年 10 月 27 日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 2001 年 3 月 27 日批准该公约，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持有保留（这一保留取消了劳动者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三个月后生效并实施。

中国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5 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已经 9 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批准。我们真诚希望政府尽快批准并实施此公约。

中国政府在 1986 年 12 月 12 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 1988 年 10 月 4 日批准，对公约第二十条和第三十条第一款持有保留（这些保留取消了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对酷刑秘密调查的权力，取消了国际仲裁和提交国际法院的权力），此公约于 1988 年 11 月 3 日正式生效并实施。

从此中国公民就享有这些生效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中国政府有义务履行这些公约。对于那些已经签署、尚未批准的公约，我们呼吁政府尽快批准并实施。这些公约是社会文明的宝贵财富，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奋斗的结果。因此，我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这些协定。然而，这些基本人权仅仅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的状况，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承认工作权，保证了人人有机会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来谋生的权利，第七条保证了劳动者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仅仅因为提出或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就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其雇主也遭受当局的压力和骚扰。许多大学生因为教育产业化付出了高额的学费，却难以找到工作，政府应该对他们的就业负责。我们呼吁重视工人工作安全条件，特别是煤矿等危险行业。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保证工人和其他人自由建立工会和其他组织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保证了工人享有自由罢工的权利。虽然中国政府在公约中承认罢工权，但在现实法律中并没有体现出保护，大量工人罢工领袖被政治审判，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并且中国存在着大量血汗工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没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十二条保证了母亲与胎儿健康的权利。我们希望这些权利被进一步延伸，使怀孕的母亲不能被强制堕胎，保证孕妇的健康权和胎儿的生命权，这些权利在现实中被严重践踏。第十二条还保证了所有人的健康权，对于重大的、严重影响社会的疾病，政府有责任关心照顾这些患者。对于严重传染疾病与重大灾害，人们有获知真相的知情权。我们希望这会成为一个共识，就是人人有获得方便的、低价的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保证了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于初等教育政府有免费和扶助的义务。中等与高等教育应该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政府应当致力于学生教育费用的降低，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无数的青年因为自己的观点，甚至因为他们父母的观点而被教育机构排斥于学校之外。此公约第十三条第三款还尊重父母的如下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非公立的合格学校，并保证其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但现实中还存在着公立机构对私塾学校严重的干涉与限制问题，从而剥夺了父母与孩子的上述权利。

另外我们还呼吁政府和社会进一步关注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恶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滥用，以及其它资源的过度开发等问题。我们认为人人有获得住房的权利，我们还关注非法拆迁，失地农民的困境，农村与城市贫民的生活保障，人们收入分配的公平，官匪勾结问题，以及关系民众重大切身利益政策的真实听证等等。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言中表达了人类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在现实中，人们一旦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就往往会陷入失业、恐吓、甚至或遭受行政、刑事处罚的危险之中。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保证了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公权机构非法地软禁、监控、绑架，从而丧失了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保证人人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大量的农民工暂住在工棚，无法获

得廉价的住房，无法迁徙整个家庭，造成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此公约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离开任何一个国家。很多人被无端禁止出入境，或者在保护国家机密的借口下强加各种非法条件。一些人通过国外的新闻媒介来报道严重地侵犯人权和自由的案件，并要求公平处理，却遭受当局的调查。

在政治迫害案件中，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所保障的公开审判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受刑者遭受尊严的侮辱和身心的迫害，其政法机关的目的在于摧毁政治犯的意志。

国安部门以各种形式粗暴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这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保证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的公民权。比如，窃听电话、监控邮件、跟踪私人活动，非法搜查住宅，利用威逼利诱建立告密者的网络等。国安部门频频地干涉雇主的决定、鼓励官方及其附属组织的歧视、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操纵新闻媒体进行污蔑和侮辱，这些行为不受法律的制约，使法制流于空谈，并使公民失去保护自己的所有机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条却被系统地、全面地侵犯，随意起诉教徒，干涉宗教聚会，用政治官僚化侵蚀宗教团体，引入收卖门票等商业化手段腐蚀宗教庙产，限制宗教信仰培训，制造宗教印刷品案件等。文革中政府掀起的"破四旧"运动，毁坏价值无量的宗教寺产、文物，迫害大量宗教人员，至今却没有足够的补偿。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证了言论自由的权利。本条第二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无数中国公民仅仅因为持有和官方不同的观点而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并受到当权者及其机构的各种歧视和骚扰，甚至被刑事指控。因为缺乏私人媒体，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手段，只有少数人能在互联网上发出少许声音，就是这少许的声音也因为网络审查、屏蔽、删除等而变得更加微弱。对所有通讯媒体和出版文化机构的集中控制（包括许可证制度、事后审查制度）压抑着公众言论表达自由。对于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或科学的见解，只要偏离狭隘的官方意识形态，就难以出版或者被查禁、处罚。对腐败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人们往往无法进行充分地、公开地评判。

按照现存体制，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实际上只接受来自执政党当局的政治指令，也就是权大于法，并且不断地把权变成法。共和国宪法、法律和其他法规必须低头于这些红头文件。这些决定通常由口头或保密文件发出，公众基本上无法获悉也无权利去审核。发布命令的人，只对他们自己所代表的统治阶层负责。然而这些指令却对制定法律，对政府、对工会、对各种组织和其他的政党、对工厂企事业单位、对学校等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这些指令高于法律。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保证了和平集会的权利，第二十二条保证了自由结社的权利。但是当某些组织或个体公民在行使他们的上述权利时，只要与执政者的政治指令发生冲突，他们便无法求助于任何其它机构，特别是宗教聚会活动和非政府组织活动。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作为政府失效的补救品，宗教和非政府组织也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保证了每一个儿童的平等权，不因出生和其他因素而受任何歧视，每一个儿童出生后应该加以登记，每一个儿童都有权取得一个国籍。但中国的许多超生儿童，仅仅因为自己的出生，就无法获得户籍，成为黑户口，因此受到上学、社会保障的种种歧视，甚至受到社会资助的歧视。我们呼吁保护女性胎儿乃至一切胎儿的生命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保证了公民具有普遍的、自由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的关于公共事务代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由于普遍存在选举操控、以及候选人控制，使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流于形式，无法代表民意。并且选举权存在严重的城乡歧视和不平等，城市户口一票可以抵农业户口数票。最近中国执政党建议逐步实现平等投票权和扩大基层民主，对此我们表示谨慎的欢迎，因为我们呼吁尽快实现平等投票权和全国的民主。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一条、第十六条禁止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酷刑。酷刑是指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令人遗憾的是反酷刑公约实施十九年来，酷刑在中国大地上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对政治犯与良心犯而言，威吓家人、长期不准睡眠、唆使刑事犯殴打、把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院进行精神药物注射等精神与肉

体酷刑特别严重。此公约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分别保证酷刑受害者有申诉与获得赔偿的权利，我们呼吁政府补偿受害者，并根据本公约从第四条到第十条对酷刑实施者采取法律制裁。

政治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监督和遵守对公民与政府均有效的崇圣的法律原则。基于对公民责任的共识，和自愿公民参与的信念，以及广泛表达此责任的需要。

因此，我们诞生了《2007 大中华（大陆、港澳及台湾）宪章》。

《07 宪章》 是由不同观念、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所组成的自由、非正式和公开的团体。以个人的或集体的努力在中国和全世界争取公民权和人权尊严，这个信念使我们团结起来。

《07 宪章》的理想已经激励了志同道合者的友谊和团结，并将继续激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07 宪章》将帮助所有的中国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而生活和工作。我们真诚希望以此唤起人们的公民责任感与公民道德感。

我们相信，我们的话语代表了渴望完整公民权利与尊严的爱国者的民意。

我们认为，冷漠与自私将使我们失去更多，直至使我们失去所有。

目前，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转折点的一边是美好的民主，而另一边却是凶残的专制。

今天（2007 年 11 月 9 日），我宣布《2007 大中华（大陆、港澳及台湾）宪章》诞生。历史将以此宪章的诞生而转折。

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

团结起来，为民主而战！

团结起来，为我们的新宪章而战！

郭泉：民主先声 70：中共党（团）委及其“党羽组织”必须自食其力，不得侵吞人民纳税

今天的话题，我们要谈谈各级中共党（团）委、各级政府、各级人大政协、各级工会妇联组织，这四套班子的问题。看看人民的纳税到底应该供养什么组织，以及为什么有的组织应该被供养，有的组织不应该被供养？

在以上四套班子里，只有各级人大（注意：不含政协）和各级政府应该享受人民纳税的供养。因为，从法学意义上看，前者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为国为民的决策机构，而后者是人民选举出来或由前者授权执行前者决议的执行机构。

而四套班子里的中共党（团）委及其政协（“民主”党的党部）、各级工会妇联组织，完全应该自食其力，不得侵吞人民的纳税。政协（“民主”党的党部）和各级工会妇联组织早就不再是他们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了，他们现在应该取名叫“党羽组织”。

中共党（团）委及其“党羽组织”们没有任何理由使用人民的纳税。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而得食者，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诅咒！

中国的公务开支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现在很多朋友都错误地把中国公务开支大的原因归结为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境外旅游以及腐败等，其实他们忘掉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民一直在被迫供养着本不该由人民养活的中共党委、政协和工青妇组织，而其他国家只供养被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议会班子。

事实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政党都是用本党党费和社会捐款来维持日常工作和特别工作的（例如选战）；
其他国家的工会是工人自治自养的群众组织，是由工人交纳的工会会费和社会捐助来维持与资方的斗争的；

其他国家的妇女组织，要么是隶属独立工会的女工委员会，要么是独立的女工作者协会，要么就是女权主义者。无论是什么方式组织成的妇女组织，都是使用会费和社会捐助来维持与资方和男权思想斗争的。

好了，为了说明中国人民养活了无数不该养活的人而不得不抗起的沉重负担，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公务开支吧：

美国的公务（美国政府和各级议会）开支一年只使用国民税收的 1-2%，而给美国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 40-50%。

中国的公务开支（包括中共党委、中国政府、人大、政协、工会、妇联、共青团）占国民税收的 40-50%。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 8％。

中国每年公款吃喝大约 3700 亿元，中国的教育经费每年大约 700 亿，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另外，中国的公车消费 3986 亿元 。公款出境旅游 2400 亿元，公款赌资外流 2000 亿元。

仅这些就合计 12086 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其实 80%的公费医疗还是只占人口比例不到 1%的高干们在享受)。

而 2006 年全国总税收是 37600 亿。

郭泉：民主先声 71：取消工人罢工权力的执政党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上几周，中国又发生多起罢工事件。罢工是劳资对抗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劳资双方是指劳动者和投资方。最近的工人反对资方的这些罢工主要针对的是资方的克扣工人工资、侵吞工资财产、没有劳动保护或其他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例如，湖南江永国有有色矿因矿长每年从股份制企业公款中私吞 260 万人民币，工人不满开始上访，并在一个多月前罢工，10 月 3 日，8 名罢工工人被捕。10 月 10 日，吉林长春市 100 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并到区政府请愿。反对把个体司机纳入私人公司统一管理，以免额外缴纳大笔管理费。10 月 14 日，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外资电子器材公司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员工因长期接触有害物质，有数百人的健康受影响，还有人因此患癌症死亡。员工要求厂方补偿医药费被拒绝后，全厂近 2000 员工集体罢工，并发起示威活动，多人被捕。

关于工人是否可以用罢工的形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问题，中共和中国政府一直讳莫如深。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和 78 年宪法都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但是很遗憾的是，罢工自由被现行宪法（1982 年）删除了。

工人，就是做工的人。不到工厂工作就没有工资，就无法生存。而为什么工人不愿意到工厂做工呢？不到工厂工作有几种情况，一是“跳槽”，指工人找到了新的更好的工作而不到原单位工作，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二是“罢工”，指工人还继续要求在本工厂上班，但是却要求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环境、劳动保护等。

“罢工”是工人在与资方谈判无门的情况下的不得已行为。其实中国共产党当年就是主要通过发动“三罢”运动在城市里展开与国民政府斗争的。“三罢”是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学。现在共产党却反对“罢工”作为一种争取工人权利的手段，实在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罢工、罢市、罢学是全世界各国工商人士和莘莘学子的基本权利，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手段，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三罢”运动促使了人类不断地朝向正义前进。

而在中国，有点奇怪，作为全世界各国基本人权的“罢工”却在 1982 年从《宪法》中被删除，而且一直至今。更有甚者，“罢工”还被中共和政府当成“闹事”、“动乱”、“突发事件”、 “群体事件”。于是乎，为了“和谐”，军队、武警、保安、黑社会一起打向了人民。

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会“罢工”的。更何况人民反对的还是做了坏事的资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资本家的斗争，你共产党怕个啥子哦？共产党不是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当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应该冲锋在前，与资本家肉搏吗？怎么变成了共产党肉搏罢工工人了呢？

这个自认为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底是在帮工人呢，还是在帮资本家呢？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清楚。

现在，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自认为几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罢工”得了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这些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把持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帮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相反却与资本家穿一条裤子，或自己就充当资本家欺压人民，骂群众，压群众，而且人民想选择执政党他们也不让选，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郭泉：民主先声 72：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

——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

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1949 年以后，中共的历届领袖和各级领导，尽管犯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延误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中共的一切政令的初衷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的，对此我不持疑义。

但是，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以及其他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以下就十八个方面，与两位领袖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一、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全民福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被其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垄断，在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正在从垄断的一端走向均衡。北欧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朝向均衡的迹象特别明显。

彻底的、完全的均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的剩余价值作为全民福利分给人民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全民福利的社会。

马克思根据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认为在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

资本主义结束后，由于人们在物质生活和人性认知两个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于是必须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应该是在物质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特征。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是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的按劳分配，至少要达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

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接受了多次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反抗人民的镇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国家福利和“股份”的方式分配给了国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要比目前的中国优越很多。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财富上实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们还把执政权利拿出来供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竞选获得。尽管各党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是从他们的竞选中，获利的是人民。

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性得到了发挥，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财富的获取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实施方面实现一定程度的竞选公平。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财产私有、高福利和多党竞选。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完善和改进，使财产所有权更明晰、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人民能组织人民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目前，很多人无论是政治专业的，还是非政治专业的，一提到政治，他们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体的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入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

经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种。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奴隶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在产权明晰和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的经济前提下，其执政地位允许代表各阶层的人民组建各自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而获得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选择”是人类生活中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例如，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解决每日的饮食。我们在菜场购买食物，手里拿着钞票，眼里看着多种多样的蔬菜或肉品。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作出购买行为。这种“持币选择”的过程，难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选择执政党的生活影像吗？

再例如，我们为了种族和家族的繁衍，我们必须谈婚论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这都是一种选择行为。还有我们考学，无论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选择。更多的例子我也不想再举了，其实“选择”是我们每日最大量的行为方式。只要是人，那么我们就时刻在进行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任何人、任何群体的选择都是“趋利避祸”的。

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就象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产生出一个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党。民主有一支看得见的手，一支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

选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

三、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奠基的。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阳）而没有在野党（阴）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就是不合“阴阳”之道的国家。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历朝历代，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因此，两党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歧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

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

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岐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五、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

古罗马是一个共和国，他们在中国的孔子时代就发明出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了。共和国国民每人手上都有选票。人民有选票，就会有想参政的富人来求你将选票投与他，他就得为穷人办事，办实事，办得穷人心花都怒放了，选票就给你了，你就可以拿着穷人选票，做执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负。人民有选票，那些还想继续做政客的政客们就必须在任期间认真做公仆。否则，人民的选票就不会继续投给他。这就是古罗马的伟大！

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

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

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参政和行政开道。

来自宗教的福祉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

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

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体，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个政体不满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不满意。如果仅仅是不满意，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这个政体的很多创建者，后来既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和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

每当我看到这个政体下的受害者的史实，其受害范围从黎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我就在想，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解决的方法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执政党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而不愿意采用罢了。这个办法就是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

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美国差，就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中国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七、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

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先是同意“宪政”，后又认为 “宪政”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中日战争后，开始了内战。最后，共产党取得胜利。

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没有人提到“宪政”的问题。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曾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

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该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来维持和完善政权。

八、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当前，困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马上人们就把她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实，民主制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来说，民主制度都是人类生活的最好的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制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

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

民主制还可以消除人民对执政者的情绪化思维。目前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一种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而无法改变的情绪化思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民主制，不是革命口号，而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实践活动。民主制，代表着最优秀生产力，民主制也代表着最先进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九、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实现的一个是“民族”，实现了半个的是“民生”，还有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是“民权”。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而民权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孙先生时代的“民族”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诸多针对满清的武装革命。

当前中国，解决“民生”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虽然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饿死冻死的黎民百姓了。说“民生”只解决了一半，是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例如，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一部分利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根本不想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该更好些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占，随着厂房、医院、学校、银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

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理想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种觉醒的认识，标志着“民权”时代即将到来。

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这种服务不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还行使了控制经济发展的道德方向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的两者关系上，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思维的差别。

一是“经政皆左”思想，他们提出经济上使用“鸟笼”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政治上他们主张回到高压专制时代。

二是“经右政左”思想，他们认为经济上应该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政治上主张“温和的专制”，即不打击民主思想，但是捍卫一党专政。

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快速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根据各自的管理思想组建政党，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第一种思想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种思想无视“大跃进”、“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还忽视了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基本事实。

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场经济又搞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会繁荣富强、社会稳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搞专制的国家，都走向失败，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动荡不安，拉美、印尼、中国均如此。

所以，必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改制的赛跑，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革命就会爆发。清朝末年，革命骤起，虽然有戊戌变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革命一举摧毁。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

十、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行事，人民将比现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我们无法乐观。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权力制衡。一党执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两个以上的政党进行竞选才能互相监督、相互制衡。

制衡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在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政党的利益驱动就是为了获得执政权，执政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一心为民服务，争取连选连任，在野党千方百计地寻找执政党的错误和漏洞，在公开攻辩执政党的同时，修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寻求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制衡就这样产生了。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间久了，都会犯错，多党竞选、政党轮替才是人民的福祉。

人民总是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政党来执政。那些认为人民还没有素质搞民主的人，其实是把人民当白痴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

一党专政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执政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

制衡除了强化立法、司法对执政者的权力外，还必须要建立舆论的监督权，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独立作用是多么重要。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中国人民应该可以援引这一原则成立民办的报纸、电台、电视台。

十一、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标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

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

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种文化都能进行充分的辩论和展示，这样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种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训练和前进。

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多样化的文化建立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在追求社会的财富和政治的特权，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含义。

那种认为，经济上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政治、文化上我们搞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我们的确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把我们的生存目的仅仅解释成是发展生产力，把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资源去加以配置，变成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人的本质，而把人变成了经济霸权和专制统治的奴隶。

所以，除了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 1957 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打成"右派"，无数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

现在到了共产党人兑现共产党人对黄炎培的承诺的时候了，这个兑现虽然迟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兑现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的。这个兑现，就是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十二、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人也应该与人民共选

一般人都知道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也知道孙先生还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

国民党是靠暴力革命驱除鞑虏的，后又用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军阀混战，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属于军政。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暴力，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革命行为。

但是，暴力由于其手段与革命对象实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极易产生新的独裁专制而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孙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

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

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其实是民生的内容了。但是，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国民政府的训政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破坏。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

等到 1945 年战争结束，中国的战争资源已经完全耗尽。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宪政。而国民政府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够宪政的时机。与此同时，前线因为受降问题发生国共冲突，最终爆发内战。

1949 年，共产党颠覆了国民政府，并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党）驱逐到了台湾。

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首先，于 1949 年 5 月 19 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实行军事管制。显然，这就是军政。其次，是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 年 7 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这就是训政和民生。

在 1986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 年 5 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 1990 年至 2000 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

“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

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也应该尽早与人民共选。目前的情况是，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 90%以上的财富。同时，人民还无权与共产党人共同竞选执政党地位。

事实证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有效道路。

十三、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不断地有人在反思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其实，前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已。

前苏联是苏联共产党在沙皇俄罗斯时代使用暴力革命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先建成，而马克思却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整体地达到最高级阶段以后，再经过暴力或非暴力，全世界一体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建立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精确计算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两个特征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而这两个特征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才可以实现。

但是列宁却错误地认为击败俄罗斯沙皇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根本没有考虑物质是否极大丰富和人性是否极大发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考虑物质和人性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前苏共和中共犯了同样的错误。

列宁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就可以发展共产主义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共产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全部经济的积累。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列宁在苏联搞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在中国搞了大跃进。结果是，苏联人民造反（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而中国人民饿死。

出现问题之后，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这就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错在走的太快了，而忘掉了建设共产主义需要物质积累。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的一本书名说出了他对他的错误的认识，这本书叫《进一步、退两步》。

可惜毛泽东并没有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相反，中国在饿死 4000 万人之后，没隔几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即在野党的缺位。事实上，作为在野党，其神圣职责，就是对执政党的批评和言说。

列宁死后，斯大林成为一党专制的主人。他立即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再次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随后的几十年，苏联和中国分别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腐败官员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却越来越多。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在一党专政的开创时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人民的积怨越来越来深，直到人民想要让这个伟大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1991 年 12 月 25 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

目前，俄罗斯国家在民主体制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前苏联发生的事情，对 21 世纪的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

十四、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区别

中国自古以来就发展出一套很成熟的帝王学问，这就是民本思想。这是维持君王统治的法宝，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有效对抗民主思想的法宝。

近现代乃至当代，封建专制者为了反对民主体制，而有意误导人民，称“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而中国人民错误听信了统治者的洗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一直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民本思想，说白了就是封建君王把自己的极权统治当成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事，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封建帝王权术。帝王们认为，人民温饱了，于是就不造反。

早期人类生活资源极其匮乏，人民随时处在饥谨边缘，封建帝王的这一用粮食换执政地位稳定的办法无疑是让人民吃上饭的好政策，受到人民的爱戴。《尚书·五子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段文字一方面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体现了对民众价值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也设定了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邦宁”，对我国的封建政治产生了千古如斯的影响。

战国思想家荀子亦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述。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

夯实"民本"这个基础，政治统治就会稳固，社会就会安定。由于"民本"与政治休戚相关，千百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一直为政治家所笃信、所力行。

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最终必如隋炀帝那样自食恶果。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他还曾经在《贞观政要·君道》中形象地阐述过这一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话都明确地表明了唐太宗民本思想的本质：如不能"存百姓"，"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就不能达到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目的。

很显然，民本思想，其本质只是封建帝王的权术而已，其目的在于用粮食维持统治。维持统治古往今来有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镇压，一是经济诱惑。民本思想，属于后者。当然，所有的封建帝王都不会放弃军事镇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但是封建帝王也发现，中国人民的反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粮食问题。在粮食问题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时候，先吃上饭比"持不同政见"要来得实在些。

与其等到人民因为缺衣少食而造反的时候，帝国再派兵镇压，还不如先让人民吃上饭呢。毕竟吃上了饭还造反的人是少数的。于是，聪明的封建帝王，就开始落实这一思想，并美其名曰："民本思想"。其实所有的帝王很清楚，这个"本"永远都是帝国统治的稳定。

帝王的民本思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人民再也不是只为了吃饱饭的"民生动物"。人之所谓被成为人，是因为其有思想和精神。国家有养活人民的责任。但是，不可以认为国家的责任只是喂饱人民。

其实，当代中国的问题早就不是古代的那个是否能吃上饭的问题了，而是是否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已经把"民主"当成是维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而不是靠"明君"的名"民本"而实"帝王"的统治权术了。

"民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解决的中国实际问题，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绝不能成为我们不推进民主的理由。

十五、取消工人罢工权力的执政党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上几周，中国又发生多起罢工事件。罢工是劳资对抗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劳资双方是指劳动者和投资方。最近的工人反对资方的这些罢工主要针对的是资方的克扣工人工资、侵吞公司财产、没有劳动保护或其他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例如，湖南江永国有有色矿因矿长每年从股份制企业公款中私吞260万人民币，工人不满开始上访，并在一个多月前罢工，10月3日，8名罢工工人被捕。10月10日，吉林长春市100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并到区政府请愿。反对把个体司机纳入私人公司统一管理，以免额外缴纳大笔管理费。10月14日，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外资电子器材公司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员工因长期接触有害物质，有数百人的健康受影响，还有人因此患癌症死亡。员工要求厂方补偿医药费被拒绝后，全厂近2000员工集体罢工，并发起示威活动，多人被捕。

关于工人是否可以用罢工的形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问题，我查阅了中国宪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但是很遗憾的是，罢工自由被现行宪法（1982年）删除了。

工人，就是做工的人。不到工厂工作就没有工资，就无法生存。而为什么工人不愿意到工厂做工呢？不到工厂工作有几种情况，一是"跳槽"，指工人找到了新的更好的工作而不到原单位工作，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二是"罢工"，指工人还继续要求在本工厂上班，但是却要求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环境、劳动保护等。

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会"罢工"的。更何况人民反对的还是做了坏事的资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资本家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制止呢？"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底是要帮工人呢，还是要帮资本家呢？

现在，有很多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员"，自认为几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罢工"得了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他们把持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帮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相反却与资本家穿一条裤子，或自己就充当资本家欺压人民，骂群众，压群众，而且人民想选择执政党他们也不让选，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愤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十六、必须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管理技术极大丰富了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这一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思想来指导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也是荒谬的。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亲切把有关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尔今普及国学知识、推广国学思想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

国学是一个国家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至于所谓的国学糟粕，其实来源于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之后发布的伪国学。这个伪国学，才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两个字“吃人”。

所以，鲁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对的根本不是“国学”，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伪国学”。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批孔”，其实都搞错了对象。在这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犯了同样错误的。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国家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标识，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宪法规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新思想来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以至于国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异在”，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目前，学国学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且错误地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我上书两位领袖，必须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至于西方的新思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

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文教学体制。

十七、台湾问题只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宪政道路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了。

其实，香港和澳门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香港和澳门是租界地，香港的期限是99年，而澳门的期限是永远。1997年，香港在到期后，英国把香港还回了中国，随后葡萄牙放弃了永远租用澳门的权利，也把澳门还给了中国。

台湾问题，才真正算个问题。台湾问题是内战造成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我认为，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

一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大陆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

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

大陆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宪政体制，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十八、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没有监督的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

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反对本国政府在本国生产有毒的化学工业产品，而充分运用民主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行动。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在人民的压力下，撤消或销售掉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

这些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这些有毒的化学工业。例如，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地区（厦门、南京、海南等）竞相上马了PX项目。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危险性，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中国的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PX全称“对二甲苯” （Dimethylbenz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摄氏度就会爆炸。受到对二甲苯蒸气的慢性中毒能够引起神经错乱、头痛、嗜睡、作呕、血液组成起变化。人吸入71.4g/m3短时致死。当然，南京的人民群众一再被告知“国家有关部门会确保不发生爆炸和泄露事故”，但是，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呢？

厦门的PX项目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厦门人民由于没有民主体制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不得不用全体市民到市政府门口“集体散步”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意愿，最后迫使该装置“缓建”。

南京px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栖霞山附近（南京炼油厂的厂区），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饮水就发生问题。离此装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的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3公里，大学城里有10所全国重点大学。炼油厂的生活区里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

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px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装置一运行，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

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群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权贵者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以上是我关于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全部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我想，很多国人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也许，我的思考和我的设计，实施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上书是任何一个爱国小民的责任，也请两位领袖衡量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贵党神圣的抉择。

历史会对两位领袖及贵党的抉择作出公允的评价的。

郭泉：民主先声 73：感谢人民警察，让我的朋友李国宏先生成了人民英雄

我的朋友李国宏先生是一位维权人士。现在他成了中国人民的英雄了，我感到很自豪。

他不是维护他自己的权利，而是选择去维护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和中石化)在 2000 年和 2001 年下岗离职的 59 万职工的权利。 这些人员是因为企业改制、资源重组等各种原因被欺骗与单位签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以下简称“协解人员”）。

他在 15 天前只身前往河南濮阳，被中原油田公安分局拘留至今。他的妻子在家焦急地等待着他，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当局出具的法律文书。

李国宏先生最后一次和我通话是 10 月 22 日晚 8 时许，他与我联系征求我的意见，他说：“郭先生，我最近要去中原油田和胜利油田，把需要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的人员名单和附带的一些资料统计下来。现在征求你的意见。”我说：“我研究过这个事情了，完全同意并支持起诉。”（李国宏 联系电话+8623-85381719 +8613527350006 不过应该无法接听）

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原中国石油部分成两个单位，现在同为世界 500 强，其中中石化是亚洲第二大公司,据《世界周刊》排名，中石化是全球第 17 大公司。

中石油中石化在 2000 年和 2001 年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非法解除员工 59 万人，目前这 59 万（详细数字当局没有对外公布）人的绝大部分人员正在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维护工作权利的抗争，以挽回自己所遭受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损失。

自从 2000 年，这些苦难的石油工人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间接的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几乎使这些被胁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大部分人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在此期间的 2002 年直至 2005 年，协解人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和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进行交涉，努力挽回所遭受

的损失，很遗憾均无结果。2006 年 5 月，协解人员自发的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抗议活动，抗议有关当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无视“和谐社会”的全民意志。

本案请求：

1、判令协解协议无效。2、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支付协解之日起，至重新恢复原工作原岗位的 6 年来的平均工资。3、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支付从协解之日起，至重新恢复原工作原岗位的劳动保险金。4、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给予在协解后，退休的人员和非协解的退休人员有同样的退休待遇。

本案的工作人员为：

国内维权界著名人士、民主运动人士：郭泉先生、李国宏先生、

李安国先生、刘安军先生、王勇先生、郭永丰先生、唐荆陵先生、荆楚先生

附件

关于中原油田维权情况的通报

通过近期在中原油田展开的维权工作，每个参与维权工作的人员，更加坚定了通过使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方法，解决“协解”人员权利被侵害的信心。下岗人员积极参与，比该项目事先进行的评估预计的效果更好。经粗略统计，大约已经有一千五百人声明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欢迎全世界一切关心中国人民疾苦的媒体记者采访报道。

2007 年 11 月 16 日

郭泉：民主先声 74：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我一直在负责并指挥中石油、中石化 2000 年－2001 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今天（11 月 18 日），我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我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写了一份公开信，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提笔给您写这份公开信了。

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我曾在 1990-1992 年担任过国企干部、1992-1994 年担任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1994-1999 年担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人员。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从事文史哲法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直关注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贵党的十七大刚刚结束， 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想就李国宏案和我手头的中石油、中石化 2000 年－2001 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您交换一下有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意见。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和中石化)，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重组等一系列改制原因，在 2000 年和 2001 年以签署“自愿解除劳动协议”的方式“协议解除”了 59 万石油工人的劳动关系（这个数字是我的调查，实际人数应该还要多，具体数字请总理阅完本信后组织力量调查）。这 59 万石油工人（以下简称协解人员）主要以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气田、吉林油田等单位为主。

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原“中国石油部”分成的两个单位，现在同为世界 500 强，其中中石化是亚洲第二大公司，据《世界周刊》排名，中石化是全球第 17 大公司。

但是，油田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资源和财产，不是属于某个集团的财产。全国人民才是中国的油田的真正的主人。59 万石油工人中的绝大部分人员正在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维护工作权利的抗争，以挽回自己所遭受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损失。

目前，石油工人的维权一般用上访的方式，但是很遗憾的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上访在中国是根本无效的，其中的苦难我就不说了，真是说了让全世界笑话。我的维权团队里有一位义工的爱人是某区的信访副主任，他说他爱人每天回到家都眼睛红红的，每天接触的事情“惨到我爱人掉眼泪”，但是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只能陪着哭。他的爱人是好人，但是更多的访民被有关的工作人员以没有相关政策为理由，甚至是拒绝接访。如果石油工人大量集体上访往往会被以聚众“闹事”的名义拘捕。如果众人讨论上访的有关事情，又会被以“煽动集体上访”的名义拘捕。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不只是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而更是政治制度。

我注意到有石油部门的领导出面说，石油工人是自愿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苦难也是自愿的。这些领导有没有良心？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是人民给的，执政党的工资是人民给的。你们怎么能让人民遭受苦难

呢？

中国的石油工人老实厚道，长期无限忠于党，听党的话跟党走。石油工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价上涨和恩格尔系数。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数石油工人在签字后生活遭遇窘迫。

我认为，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由于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情况，所以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做法。虽然国家有规定不得使用这一方法解除劳动关系，但是现实中，大量的单位没有执行这一规定。被以各种巧妙或强权的手段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中国工人越来越多。

我认为，任何协议内容首先是不能让油田员工利益损失。因为更多的油田工人他们把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油田，他们是中国最伟大的人。

他们不应该受穷。让他们受苦受难受穷受罪的执政党，是没有良心的。

把我派出的去调查这些石油工人的调查统计人员李国宏先生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更是没有良心的！

现在，他们需要获得生存资源来维护上有老下有孩子的抚养责任，难道我们不需要为他们主持公道吗？

另外，再和你讨论一下中国特色“劳动教养”制度。这是中国遭到世界各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批评最多的中国特色之一。

中国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 5 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九条保证了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中国政府在 1986 年 12 月 12 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 1988 年 10 月 4 日批准。

我认为限制人身自由，只有经过公安刑事拘留、检察院审查批捕、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审判才可为之。除此之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都是反人类的。

但是，在中国，却有一个不需要经过上述法律程序，直接由公安部门作出决定的“劳动教养”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这是极其不人道和反人类的。这是除了中国的政党制度之外，我第二个不同意的制度。

麻烦您通知公安部的同志，立即释放李国宏先生。如果我们是犯罪嫌疑人，请进入司法程序，走批捕、起诉和审判的道路。坚决取缔“劳动教养”制度。

否则，麻烦您也通知公安部的同志，也请把我也带走。因为，李国宏先生是接受我的派遣去为人民服务的，去为人民说话的。

让中国的一切苦难，由我一人承担吧！

中国人民太苦难了！

以下是李国宏先生被捕入狱前提交给我的最后两份材料，我转给总理大人阅处，也给全国人民阅读。

李先生提交的来自中原油田石油工人的材料里的语句也许不通顺，但是却是发自中原油田石油工人肺腑的原文。

附件 1：李国宏先生提交给我的中原油田石油工人的材料：

自从 200 1 年，我们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间接的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几乎使我们这些被胁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大部分人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

在此期间的 2002 年直至 2005 年，我们协解人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和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进行交涉，努力挽回所遭受的损失，很遗憾毫无结果。2006 年 5 月，我们协解人员自发的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抗议活动，抗议有关当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无视“和谐社会”的全民意志，虽然抗议活动期间有四位抗议人员被行政拘留，但是我们自豪的换回来了 2800 个所谓的就业机会，为协解人员及其家属赢得近每年 3000 万元的经济利益！

事实向我们被协解的一万余名人员表明，我们的权利是争取来的，自己的权利必须自己去争取！但是，这与我们一辈子的生活所需是有很大差距的。物价还在涨，所有的价格都在涨，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保障。我们要求人民法院（如果还是人民的法院）依法判令协解协议无效。我们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补偿协解之日以来我们的损失和劳动保险金。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给予在协解后，退休的人员和非协解的退休人员有同样的退休待遇。

中原油田部分协解石油工人

附件 2：李国宏先生提交给我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法律规定

1、1999 年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1999 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确保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出售方应在申请出售前征求职工对出售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意见，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企业出售中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买断工龄'或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这两份文件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职工利益的角度，规定企业不得以"买断工龄"的形式将职工推向社会。而中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在 2001 年却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打着"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幌子，"了断"职工，显然已经违反了国家政策和法规。

2、《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然而当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一不是濒临破产，二不是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而是效益极佳的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没有向企业工会提交报告，二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三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四没有给职工协商，五没有给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批，这就违反了《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3、国家劳动部劳部发〔1996〕354 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用人单位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劳动者，如果其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

(2)工作年限较长，且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

(3)复员、转业军人初次就业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条也明确指出："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从以上法规可知，除破产倒闭企业外，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40、50"人员是不会轻易下岗失业的，他（她）们的劳动权利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中石化被裁减职工中有大部份工龄是达到了 10 年以上的，也有不少是距退休年龄 10 年以内的，企业必须与他（她）们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允许将他们"扫地出门"。中石化的做法显然也是违法的。

4、《劳动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下面我再要和中华全国人民说几句话：

以上是我给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就下岗石油工人、李国宏先生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而写的公开信。之所以叫"公开信"，是因为这不仅是给家宝总理看的，也是给全国人民看的。

现在是 2007 年 11 月 19 日凌晨 2 点零六分，我写完了全信。窗外漆黑一片，天明不远了。离天明还有 4 个小时。这 4 个小时，我将全力利用网络传递这份公开信，传给我在 QQ、MSN 和 SKYPE 上的所有朋友，全部大约 1500 名。

他们每人再传递 1500 人，然后他们传递的 1500 人，再分别传递给各自的 1500 人，我想，这样传下去，传遍 14 亿人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天明的时刻，我想我的楼下等着我的将会是警车和手铐。以后的事情，无非就是日夜的审讯、殴打，再后就是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或死刑。但是，这一切，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在我死后，人民还生活在专制下、苦难中。

我最崇拜的中国人一是孔子，一是孙文。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我也是基督徒，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和所有的争取民主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我最崇拜的外国人，一是华盛顿，一是切·格瓦纳。

切•格瓦纳的牺牲精神，使我在争取民主的工作中有了无尽的精神动力。他有两句话我终身不忘，一是当他被捕时，面对枪口，他说："我叫切•格瓦纳"。二是他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美国有一位华盛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第一任总统是幸运的。华盛顿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解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 年，华盛顿再度接受人民的召唤，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89 年 4 月，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当他担任美国总统八年后，发誓不再连任，坚决回到芒特弗农山庄，过平民生活，直到去世。

我想，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我就是切•格瓦纳，当我面对枪口的时候，我也要说："我就是郭泉"。当我被反动派杀害之前，我也要说："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了。刚才去了一下卧室，我的夫人李晶、儿子郭称义在隔壁房间睡觉。最后一次看他们熟睡的面庞，我很自豪。他们会因为我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

在这里，我恳请中国政府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善待我的家人。

在这里也请全国人民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接济我的家人，并如我一样奋力转发我的两封公开信，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解决他们苦难的有效途径，惟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

中国人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团结、奋斗和牺牲。

郭泉，男，1968 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

1996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 年至 2001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至今。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联系办法：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博客：http://guoquan.vip.bokee.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75：感谢"自由门、无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再也无法愚弄网民了

什么是愚民政策：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是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

愚民政策古已有之。秦始皇虽然是个私生子，但是他的愚民政策却是明目张胆的。他听从独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焚书坑儒，直至今日，人们仍能听闻其中的哀号和血腥。

清朝，这种愚民政策导致血腥味更重。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师友株连，人人自危。当时情况与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无异。

乾隆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人们骂八国联军烧了官方的园林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 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

到共产党执政的时代，其愚民政策登峰造极。毛泽东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焚书坑儒算什么？他才焚了多少书？他才坑了多少人？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文字狱杀人无数。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先生组织撰写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案，涉案人员数千，被杀冤死无数。整个共产党执政期间被冤杀的人民不计其数。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共产党还在执政愚民。

那么共产党是怎么愚民的呢？共产党的愚民政策有三种方法：

一是在基础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等教学机构）和公民素质的提高上设置思想障碍，这一障碍就是单一思想（共产党专制）。

二是利用出版、新闻（报纸、电台、电视等）、官方网络传媒作为舆论控制工具，刻意引导大众的舆论范围及认知。发布对共产党有利的声音，封锁对共产党不利的消息。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联播 30 分，前 25 分钟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好，后 5 分钟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怎么怎么坏。

三是利用专制人力资源，在大众网络上愚弄、蓄意误导，意图左右网络民众对特定事物的看法，幻想操纵舆论，使之符合愚民者的利益。这些专制分子由于被传出他们在网络上每骂自由民主一个字会得到五角钱的高额报酬，所

以被人民戏称为“五毛人士”。

五毛人士的具体手段如下：　一、阻断与限制信息来源。1、限制愚民者以外的信息发布者的自由，至少是进入特定论坛的自由，以垄断话语权的方式实现信息源的单一化。2、对来源于愚民者之外的信息进行筛选并区别处理，删除或部分删除。以使任何不符合愚民者利益的信息消失或失效。　二、伪信息的制造与传播。1、制造和传播直接有利于愚民者利益的伪信息。　2、通过混淆视听甚至直接诋毁的方式使网络民众对威胁愚民者利益的其他信息发布者产生怀疑与不信任感，从而在心理上对后者所发布的信息产生排斥，以此间接达到操控舆论的目的。

公共权力的垄断和不受约束是网络愚民者及其他愚民者可以肆意愚民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杜绝愚民，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现在，中国人民早已觉醒了，人民竞相下载可以突破共产党的网络控制的代理服务器：自由门、无界等。中国人民可以通过“自由门”和“无界”看到专制的罪恶和民主的伟大，并进行独立的思考，指导自己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我想，所有网民都会得出我的思考结论，那就是：独裁必须终结，民主才能救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 76：郭泉就中国工商银行 13.8 万下岗职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我除了代理中石油中石化的 59 万名“协解人员”的维权工作之外，还代理了中国工商银行的 13.8 万同样被强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自谋职业者”中的 12 万原银行职员。上周我给您发出第一封公开信后，中国工商银行的其余 1 万多维权人员也请我代理了。

上封信我已经做了自我介绍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与中石油中石化一样，中国工商银行也是每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的盈利企业。2002-2004 年，这个银行企业既没有通过本系统职工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也没有取得当地职工工会组织的认可，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规定强行“裁员”13.8 万。

中国工商银行想方设法“协解”了为中国工商银行奉献了十多年、二十年青春的大批老职工们。截止 2004 年，中国工商银行 13.8 多万职工成了这场残酷的所谓的“减员增效”、“改革政策”的牺牲品。为了增加了企业的“效”，而让为这个企业辛苦奋斗一生的勤劳老实的工人阶级蒙受经济苦难和人格羞辱，这实在是没有良心的事情！

我的维权工作让我每天都在流泪。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学科研，本学期我受雇于三所大学，每周 36 节课程。6 年来，我每学期每周也都是 30 节以上。以前的业余爱好是户外攀登。负责维权的这几年，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就是阅读并分析我的服务对象提交给我的材料，每天睡觉只有 4-6 小时。心爱的儿子虚岁才 8 岁，上小学一年级，正需要我辅导功课，但是我却在永无休止的接待、视频、电话、落泪中度过我的业余时间，而此时我的南师大的教授同事们却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喝茶、户外登山。我的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

家宝总理，我在电视上也常看到你落泪，你的压抑住自己情感的表情我最能理解。我知道，我和您的泪是一样的苦涩，是一个味道。但是，您比我要苦，因为你周围全是人，你不能嚎啕大哭。而我能，我周围没有人，我可以在野外的风中，在我家的卫生间里放声大哭。这点上，我是比您幸福的。

现在，11 月底了，即将进入寒冬。现在，南京还不太冷，而西北、东北可能已经下过第一场雪了吧。那些被中国工商银行误导、蒙蔽、欺骗等手段剥夺工作权利，赶出工商银行，流落社会低层的“自谋职业职工”们，他们过着怎样艰难的生活呢？他们过冬的煤炭、白菜、胡萝卜、大米、白面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我不敢想象！是不是他们怀着对工商银行的不满、愤怒甚至仇恨还在准备着忍饥挨饿、冒严寒酷暑、冒无数风险到北京上访呢？我不敢想象！幸亏我在电脑打字，我的泪落在我的腿上，要是我还在过去，用纸笔给您上书的话，估计又要浪费我不知道多少信纸呢。

刚才 10 点多，一个人陌生人（+8613898700033）给我短信说“你负责的维权人员正在我的办公楼下集合呢，而大队的警察在清早就已经就位了。”感觉好象是在怪罪我。我不认识这个给我短信的人，也不知道那些在冷风中和平战立的人是否是我帮助的下岗职工，但是我知道又有人要受伤挨打了。我曾经也是司法干部，作为今天这些出勤警察的大哥哥，我祷告警察弟弟们手下留情，这些可怜维权人员曾经、现在、未来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请善待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请善待他们！中国共产党，请善待他们！

中国工商银行非法出台了一系列损害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文件，鼓励各省分行裁减人员，并给各行下达了指令性的“裁员指标”，如：

甘肃省分行的工银甘发[2003]203 号文第 4、5 页明确规定：对裁员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减员任务的完成情

况将与各行班子成员的收入挂钩，多减员一名，给予5万元的奖励，未完成的，扣减5万元的费用。

四川省乐山市的工银乐办发[2003]70号文件规定：裁员计划是一项指令性指标，必须全面完成。对超额完成减员计划的行，将按人均人力费用的3—5倍给予奖励。

湖南省湘潭市的工银潭发[2003]46号文件中提到"今年省分行下达给我行减员计划（其中正式员工71人，柜员合同工 10人）属指令性计划，省分行要求我行必须按期保量完成，并制定了相关的奖罚措施，我行必须高度重视，将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来努力完成。……"并规定："市分行将根据省分行的有关奖罚措施实行奖罚制度，多减员一名，给予6万元的费用奖励，未完成的扣减6万元费用。"

于是，在这样的非法"裁员指标"的命令下，四川省乐山市分行毫无人性的将黄建梅、王世君两名正在患重大疾病的职工强行解除了劳动合同；四川省成都市工行的女职工岳敏、四川省江油市工行的女职工陈昕在休完产假上班时，被告知没有岗位，必须"自谋职业"；

江苏省淮安市工行的领导更为荒唐，职工不愿意"自谋职业"就以抓阄的方式来逼迫职工走人；等等，

全国各地都有其"独特、精彩"的卑劣手段。

中国工商银行残酷虐待了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奉献了大半生的辛勤劳动者！

而正是这些辛苦了一辈子的劳动者，为我们建设了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工商银行在有法可依的法制社会中，为什么可以这样不考虑整个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不"以人为本"的进行有效益的改革和人员分流呢？

难道只有以大肆"裁减员工"的手段，逃脱责任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吗？

其实，1998年在实行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就极大的欺骗了所有职工，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条"劳动合同的期限分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工商银行从1998年开始正式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在工银发[1998]76号文件规定第四条"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要严格按规定执行。除部分业务骨干、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国家规定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人员外，员工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这条规定，致使工商银行一大批老职工，他们年龄40岁左右，工龄接近20年，80年代初参加工作，进入银行时，是作为国家人事局正式招收的干部编制身份，现在，他们却因为工商银行的转制而成了"合同制"的职工身份，除已是中层以上干部外，他们都只与工商银行签订成3——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从此，他们的命运就被工商银行控制和主宰了，从此，他们下岗、流落社会底层，无依无靠的噩运就开始了。

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企业在裁减员工时，是绝对不能这样不管不顾整个社会对失业人员的承载能力，他们是要考虑"裁减员工"在社会上的生存保障能力。因为西方是民主制度的国家！

所以，中国工商银行下岗人员的苦难，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工商银行没有一点社会公德心，缺失社会责任感，还公然漠视国家法律，大肆举起"裁刀"把那些在金融战线上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至今都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式员工，赶出了他们赖以维持全家生计和自己生存的工作单位，用少量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买断了他们的合法身份，把他们变成失业人员；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劳动者劳动的权利；工商银行把自己对职工的责任和义务推卸得一干二净，把沉重的失业、就业压力和包袱全部推给了13.8万中国工商业银行的下岗职工。

中国工商银行的权贵资本家们"花一点小钱，打发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夺得一笔巨额的资产，成就一个权贵阶级，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买卖了"。他们怎么对得起曾经为这个国家每日辛劳的劳动者！

象中国工商银行这样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中国不知道害死了、害苦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多少下岗的劳动者被沦落为被到处推委、没有人格尊严的"访民"？

人心都是肉长的！权贵们，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你们还到底是不是人？

中国工商银行的权贵们（行长们和各级领导们）你们凭什么在大量"裁减员工"之后，可以拿着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中国工商银行的现有职工为什么又可以年年增加工资收入？

中国工商银行，你们打着改革的幌子，无视国家法律，无视国家政策，悍然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安定和谐。

亲爱的家宝总理，我来给您算一笔帐。

中国工商银行工银发[2002]109 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自谋职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此文件的第四章第八条“员工自谋职业经济补偿金标准为：（一）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放 2500 元补偿金；（二）一次性支付协议剩余期限基本生活费；（三）支付安置费 1 万元。计算公式为：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2500 元+当地下岗职工最低基本生活费（月标准）×2×协议剩余月份+10000 元（安置费）

正是因为这个文件，把许多正式职工的命运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我以一位四川省绵阳市 1980 年参加工作，2004 年年满 42 岁的女职工为例来计算，按以上公式，她得到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是 75488 元，加上 10000 元安置费，共计 85488 元。

目前，她还需要缴纳社保、医保基金的年限为 13 年，直至她 55 岁退休后领取社保工资。以 2004 年度四川省绵阳市按社保的缴纳 100%档次计算，她应缴纳社保基金为 2318 元/年、医保基金为 989 元/年，共计为 3307 元/年；2005 年度四川省绵阳市按社保的缴纳 100%档次计算，她应缴纳的社保基金为 2813 元/年、医保基金为 1166 元/年，共计为 3979 元/年，比上年增加 672 元；2006 年度四川省绵阳市按社保的缴纳 100%档次计算，她应缴纳的社保基金为 3166 元/年，医保基金为 1297 元/年，共计为 4463 元/年，比上年增加 484 元；2007 年度四川省绵阳市按社保的缴纳 100%档次计算，她应缴纳的社保基金为 3570 元/年，医保基金为 1492 元/年，共计为 5062 元/年，比上年增加 599 元。按照这样计算，她在余后的 13 年缴纳期限里，缴纳的金额应该是呈逐年上涨趋势，那么平均每年按缴纳 5500 元计算，13 年时间她应该缴纳 71500 元，她领取的 85488 万元经济补偿金减去 71500 元，还余下 13988 元，这就是她余下 13 年时间里的生活费，平均到每月只有 103 元的生活费（男同志就更低了），2006 年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费为 160 元/月，2007 年为 175 元/月。

所以，请问家宝总理，她目前的生活是不是难以为继，她的生存状况是不是连养活自己、养活孩子、孝顺父母的能力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再把每年物价上涨、自己生病、孩子读书、父母生病的诸多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可见她的生活压力之大，生活质量之差。

为什么中国工商银行可以把她的生活来源阻断？为什么中国工商银行可以把她和她的家庭推向贫困的边缘？

是谁给这些权贵虐待中国劳动者这样的权力？

家宝总理，您是分管财经多年的总理了，数字一定没少看。虽然，数字是冷冰冰的，但是生活成这样的下岗职工的心却愤怒得出火。

什么叫水深火热？

这就是！

温总理，这样的补偿金标准引发了全国各地“自谋职业职工”的数次维权和上访。上访的失业员工们绝不是无理取闹，他们争取的是自己合法的权利，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

看看当今社会就业的巨大压力，看看这个社会上所有的招聘广告，就知道中国工商银行“自谋职业”的职工们能否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了。

招聘广告全部要求年龄在 30—35 岁以下，对学历的要求是专科以上，而“自谋职业职工”的年龄和学历上都不符合招聘要求。自己开店做生意，首先需要本钱投入，然后，需要机遇和技术等等。很多“自谋职业职工”早已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里闯荡得血本无归了。我每天都在听到、看到哭诉和控诉，叫血泪控诉，一点也不为过！

大多数“自谋职业职工”在银行干了一辈子，除了与钞票这一工作技能相关的技能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算盘已经被计算机替代，传统的手工记帐也被电脑替代了，所以，年龄、学历、技术上都没有再就业的优势。

目前，生存的压力和艰难，使中国工商银行的 13.8 万下岗职工感觉到自己还不如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因他们有优惠的再就业政策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甚至还不如进城的农民工，因他们有退路，回家有几分地耕种，有几间房屋可栖身。而大多数自谋职业的女职工都是 40 多岁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都是高中、大学的读书年龄，父母都是 70 多岁高龄，失去工作对她们来说生存的压力就更大，如果丈夫理解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共同承担抚养、赡养义务的，日子还能够将就过下去，如果夫妻离异，女职工自己的生存都是个问题，就更不能承担抚养赡养的义务了。

目前，迫于经济压力和社会地位，夫妻离异、家破人亡的“自谋职业职工”在增加；生病无钱医治已死和等死的“自谋职业职工”在增加；迫于生活压力失去信心自杀的“自谋职业职工”在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出现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将更加严重！

温总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象中国工商银行的 13.8 万下岗职工这样的残酷案例看多了会崩溃的。

我的同行张纯如女士，是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最美丽、最正直的女人，她在美国因为每日接触她要研究的数目庞大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照片而死。她无法理解日本侵华日军半个世纪前在南京任意虐杀中国人而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却将这些虐杀事件遗忘的干干净净，愤而饮弹离开了我。

张纯如女士，是我最敬爱的女人。我和她都认为，最认真的工作，就是去为我们的工作对象而死！

现在，我也准备为我的服务对象，全国所有的下岗职工去死！但是我决不会是自杀！因为，我是斗士！

说到我的同行张纯如女士，温总理，您一定记得我。我就是在 2005 年怒砸倭寇首领王直墓的那个南师大副教授郭泉。2000 年日本人跑到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修建了一个倭寇墓，然后每年来参拜一次。我砸掉之后被中国警察一直控制至今，而我砸那个墓一点法律责任都没有，无论民法还是刑法。

这些都说远了。温总理，我不知道您看到这些虐待劳动人民的现象，你是不是只会哭？而我，除了禁不住地落泪之外，还会冲到卫生间大口大口地呕吐！

以下是我派出的调查统计工作人员收集、审查并提交给我的中国工商银行下岗职工的血泪控诉：（略）

郭泉：民主先声 77：2007 年 11 月 25 日，我启动了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

全面启动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

为维权英雄李国宏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救第一号令）

目前之中国，最苦难的人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

目前之中国，最伟大的是为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维权的人。

目前之中国，最邪恶的是殴打关押杀害为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维权的人。

目前之中国，最让人愤怒的是让无数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

为了表彰所有因为维护人民的生活权利而被捕入狱的维权英雄们，为了让在监狱里服刑或走向刑场的维权英雄们无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更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投身维权的第一线，郭泉启动了对被关押和被杀害的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

本程序为：

1、当出现维权人士被警察非法劳教、劳改的事件，其家属立即提供维权英雄或其配偶、父母、直系子女的旧有或新办的银行卡号给郭泉。

2、由郭泉统一发布“为维权英雄（李国宏）的募捐一事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3、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打卡金额，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

4、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奋力转发此信息，力争迅速传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权英雄的作为，争取更多的国民救济。

5、维权英雄家属应当根据实际处境，定期告知善款到帐金额。

本案案情：

维权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受郭泉的派遣，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前往河南濮阳，调查统计中石油和中石化 59 万下岗工人的生活情况，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刑事拘留，11 月 18 日，被决定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

李国宏先生的募捐卡号是： 邮政储蓄卡号：6221886530061797032，户名：皮运霞（李国宏先生的妻子）

希望中华全国全体人民都来接济被迫害的人民英雄，让他们的家属得到最好的经济补偿。

一人募捐 50 元，1 万人的募捐就是 50 万。2 万人的募捐就是 100 万。

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不仅要得到荣誉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同时，还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奖励。

为中国的民主和幸福而奉献牺牲的人，理应得到来自中国人民的丰厚待遇。

最后，郭泉恳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要阻挠维权英雄家属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来自全国人民的国民救济。如果发生任何阻挠事件，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承担。

在维权英雄李国宏家属尚未提交银行卡号之前，已有下列 32 名同志认捐了 5050 元，请立即打卡。他们是：

范亚峰 1000 襄樊夏刚 500 郭泉 200 王德邦 200 王萌萌 200 范燕琼 200 王光泽 200 姚广德 200 伟华 200 小康 200 沙龙 200 元 赵龙飞 100 邓太清 100 李天翔 100 庞志勇 100 魏忠平 100 王勇 100 岳浩然 100 郭庆海 100 江洪 100 骆驼 100

象山 100 华丰 100 艾黎 100 湛河 100 刘安军 50 曾庆彬 50 华汉武 50

高寅 50 荆川 50 平常 50 水中月 50

郭泉：民主先声 78：满清政权被终结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一直在寻找道路

日前，我接到来自《公民月刊》的王德邦先生的邀请作一次访谈。说访谈，其实应该叫笔谈。因为王先生给了我十一个题目，我就做了十一个问答题。现收入《民主先声》，以飨读者。全文如下：

郭泉先生，您好！

我想许多人在读到先生的公开信时都会涌起一份激动。先生第一封信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冷静思考与第二封信为捍卫权利与自由而采取的行动可谓相得益彰，见证出先生理想与行动的合一，真是可敬可佩，可圈可点。在此我受《公民月刊》的委托，想就先生公开信的一些情况进行个访谈。下面列举的这些问题是我个人的粗浅思考，仅为抛砖引玉之用，先生不必局限于此，但愿先生将最想跟大家说的畅谈一番。

顺颂：

文安！

王德邦上

附：

一、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或是什么触发了先生发出这样的公开信？

郭泉：

结束满清统治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的经济政治道路。

封建君主体制结束后，世间的政治体制只有三种，一是“多党竞选”，如美国；二是“一党专政”，前苏联。三是“君主立宪”，如英国和日本。

清帝退位，标志着中国放弃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虽然，孙中山先生在价值取向上是赞同和选择“多党竞选”的，但是，孙先生认为当时之中国，并无立即实现多党竞选之民智。于是，孙先生在政治实务上采取了一个过渡性质的政治体制，即先“一党专政”后“多党竞选”。孙先生的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路线”上。

孙先生在世之时，中国共产党已然成立，并完全拥护孙先生的思想，遂国共合作。孙先生去世后，中国国民党清党，中共始有“宪政”要求。国共摩擦升级为战争。后，日军侵华，国共再次合作，直到二战结束。

1945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一致认爲，……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爲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但是，国共在民主宪政的选举方面意见不合，内战爆发。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放弃了孙先生的多党竞选理想，悍然确立一党专政的党政体制，致使中国灾难接踵而至，爆发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惨祸。这一状况，直到今日仍在延续，独裁统治，腐败盛行。事实证明，“一党专政”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

于是，就此问题，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二、先生在第一封信中提出“全民福利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构想，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与精辟的阐述。那么我想请问先生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究竟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

郭泉：

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问题。

民主，在中国是个人人都知道的词。中国人都知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中国人民被长期的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蒙蔽，而错误地以为只要让共产党执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其实，共产党当家作主根本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目前，中国人还有不少人不知道民主其实就是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尽快地让中国人知道，用自己手里的选票选择执政党，才是解放自己的唯一途径。让人民有这样的理解是不难的。因为我们每日大量的购物行为，就是选择。对货物的选择和对执政党的选择，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所以，目前中国的民主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

三、先生第一封信可谓是给中共领导者以开导，将马克思主义、现代文明世界普世价值与中国现行执政口号结合起来，为民主在中国推行找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如此一份充满理性的公开信，您认为中共现领导能听得进去，或能采纳多少吗？

郭泉：

广大中国共产党员里分为两类人，一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是混进共产党队伍里的权贵资本者。真正的共产党应该能理解我的用心。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我一样，也是爱人民、爱民族、爱国家的。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想他们一定能听懂，也必须听懂我的话。因为我在指引一条拯救中国、拯救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之路。

中国共产党如果现在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并且全部采纳我的公开信中提出的十八条施政方案，我想人民

一定会继续拥护共产党，热烈地选举共产党人出任 49 年之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

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话，我想，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着亡。

四、先生第二封信是激于李国宏先生被劳教的义愤而发出，其中真情流露，感人至深，读之让人泪下，由此可见先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在此想请您顺便谈谈李国宏先生参与中原油田维权的事，以及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处罚的违法性。

郭泉：

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企业为了轻装上阵，实施减员增效。企业改制、资源重组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侵犯员工利益就怨声载道。这些被以巧妙或强迫的手段“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油田职工需要懂得法律知识的人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工作和经济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全民的基本素质，任何一个人听闻人民的苦难哀号，都应该驻足体察。于是李国宏先生前往察看情形，不幸被捕入狱。

无论从李国宏前往中原油田的原因、目的，还是调查的方式手段上分析，李国宏都不可能得到一年零六个月的劳教处罚。

中原油田公安局决定给予李国宏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的文件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议》。此文件是一个行政文件。中国政府使用这一国务院文件，授权警察局将案件提交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某人长达三年的劳动教养。

中原油田公安局和河南濮阳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援引了国务院文件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决定，当然这是合了统治阶级的法，而违反了人民心中的“天法”。

我认为，一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都必须是经由开庭审理，定罪量刑。也就是说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出发，都必须经过警察局刑事拘留、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提起公诉和法院审理判决这些程序，否则任何公民不受剥夺自由。

五、从先生第二封信可以看到，先生不仅是个理论上思考国是的人，而且也切实关注并亲身参与中国的维权运动，那么先生认为中国今天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与中国推进民主有什么关系呢？

郭泉：

当人民的权益受到危害的时候，必需维权。但是，在中国，维权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中国政府在现有体制下也是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于是，人民开始思考为什么维权无人理睬。很快，其中的问题就被人民发现了，这些问题都是体制问题。所有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一党专政。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已经把“民主”当成是维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

六、中国今日维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出路是什么？

郭泉：

维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所有的社会问题的症结都在一党专制。目前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基本事实，但是，一党专制却不是很容易被终结的。于是，人民一方面在维权，一方面又知道体制不改，维权根本无效。这个矛盾，深深地烙印在每个维权者的心里。其中的困惑和焦躁，是可想而知的。

维权的出路，惟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政体，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七、本月 12 日黑龙江农垦劳教了上书十七大的访民代表刘杰一年半，14 日广州法院将郭飞雄判刑五年并罚款四万元，16 日中原油田又将李国宏劳教一年半，这些接连对维权人士的重判与处罚，发生在中共十七大刚结束还不到一个月，您认为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什么样的发展？

郭泉：

我想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维权人士为什么要去维权，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中国不发生了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在维权，为什么会有人去帮助维权的人？

但是中低级别的共产党官员并不了解中国目前处在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以为靠打群众、骂群众和压群众的方式，还可以继续其统治，显然是非常弱智的。

所以，我不认为您举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高层授意这么决定的，相反，我却认为应该是一些弱智的中下级官员的擅意而为。您的这些例子，应该与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没有关系。

另外，中国政治未来要发生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现在抓多少人没有关系。无论抓多少人，只要民主是顺应民心的，民主就一定会来到。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主动地改向民主政体，那么它现在每多抓一个人，就是在为它自己多增加一条罪证而已。

八、先生认为中国今日社会变革的希望在哪里？中共体制内自我改良的希望有多大？中国民间目前推进民主改革的力量有多大？

郭泉：

中国今日社会变革的希望在于全民的觉醒，如果全民都认识到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那么民主瞬间就到来了。所以，现在的启蒙、宣传是最重要的工作。

中共体制内自我改良的希望还是有的，毕竟共产党里还是有不少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必须正视历史，必须充分认识到民主是世界潮流。还权于民，与民共选，才是人间正道。

中国民间目前推进民主改革的力量目前有，高级知识分子、维权下岗工人、维权复转军人、维权失地农民。未来中国的幸福和民主，取决于今日大家的团结、奋斗和牺牲。

九、先生对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径有怎样的预估？

郭泉：

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径有两种可能：

一、中国共产党自己改。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共产党自己改却又可能出现两种民主样式。一是类似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种“一党独大的多党竞选民主政体”；二是一步到位实现美国式样的“多党竞选”。

二、人民革命一举终结独裁统治。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步到位实现美国式样的“多党竞选”。

十、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那种义无反顾与在所不惜的大无畏精神，真让人鼓舞。那么在先生发出两封信后，至今面临来自单位与政府怎样的对待？

郭泉：

目前只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的于主委和南京师范大学统战部的冯部长与我长谈一次。与我就 11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进行了交流。我坚持我的观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单位与政府派人与我接触。

十一、无庸置疑，先生今后一个时期的安危将是中国政治气候的一种晴雨表，今后先生可能要从为他人维权走向为自己人身自由维权，那么先生对此有什么准备？

郭泉：

我还能接受您的采访，就说明了中国目前的政治空气要比过往好很多了。虽然，说中国的政治春天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官员、商人和社会各界团体的负责人支持我，都发表公开信，指出执政党的不当之处，呼吁尽快实现民主。

至于您说的我的个人安危，我想，每一个立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走上争取民主道路的人，都应该把坐牢、牺牲，当作我们的必修课来学习。

假设未来某天，中国共产党限制我人身自由，我想我要表达的是六个字，第一、我反对，第二，我不怕。

郭泉：民主先声 79：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党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11 月 24 日，我发出了为中国工商银行的 13.8 万被欺骗、胁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而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公开信。

信发出后，接到的第一个 QQ 短信这样说：“我是被工行骗去了青春与尊严的一名残疾军人 我是沈阳人姓刘。他们用欺骗的手段剥夺了我这个为国家为民族流过鲜血的残疾军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今天我强烈要求工行有一个包容的心态，恢复我的员工身份，让和谐社会的阳光同样能照在我的身上，不要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让我这个为国家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残疾军人的心里有一种被国家与民族抛弃的感觉。得知你在百忙中还为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奔走呼吁，我本人真是由衷的感激你，朋友。”

我立即回话：“我是民主党人！这是我的工作！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党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人类历史错综复杂，其管理体制变化多端。但是无论多么炫目不测，其基本形态只有两个，一是专制，一是民主。

区分专制和民主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前者认为专制者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后者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人。

很显然，民主才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并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管理模式。但是专制者却极尽无耻之能事，为他们的专制寻找“人民”的外包装。

专制，在历史上有两个主要的种类，一是家天下，一是党天下。

家天下的皇帝寻找到的“人民”的外包装就是“替天行道”、“顺民应天”，于是就有“父母官”，于是就有“爱民如子”，于是就有“反贪官不反皇帝”。人民总是认为皇帝是好的，而忘掉了所有的专制系统的官员都是为了皇家服务的。

寻找“人民”外包装的皇帝还是不错的，虽然，这样的皇帝仍然是人民的主人，但是在这样的皇帝的专制统治下，人民还是能幸福生活的。那些，赤裸裸地撕下“人民”的外包装的皇帝，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覆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党天下”是一种巧妙的专制。这不是一个人的专制，而是一群人对更多数量的一大群人实行的专制。“党天下”也是一定要寻找“人民”的外包装的，否则它就没有统治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之世所有的“党天下”国家都标榜自己是代表人民的。

好，那我们来听其言观其行吧。我们先来观看前苏联共产党的“人民”外包装。斯大林虐杀了几千万苏联人民，这能说苏共是代表人民的吗？前苏联解体前，苏联人民的肉食量连百年前的沙皇俄国时代都比不上，这能说是代表人民的吗？我们再来看看朝鲜劳动党“党天下”的人民外包装。金家父子把朝鲜人民搞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穷困境地，而且在政治领域人人自危，这是代表人民吗？最后再来看看中国，毛泽东饿死 4000 万中国农民，害死 4000 万优秀的知识分子，上到国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无人幸免，这能是代表人民的吗？当今中国，大量下岗职工靠家庭亲友救济、企业军转干部沦为城市乞丐、失地农民流落城乡街头荒野，这能说是代表人民吗？人民的苦难无人理睬，冤屈上访却被强行带入“马家楼”监禁讯问，这能是代表人民吗？

人民的天下，怎么变成了党的天下呢？人民没有选举你，你怎么就成了人民的代表了呢？而且还代了三个表呢？

也许党天下要说，党是人民在 1949 年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各民主党自己的选择。是的，我承认，的确是 1949 年的选择，但是，现在是 2007 年，难道一次选举可以管 58 年吗？有这么便宜的选举吗？更何况，这 58 年，这个“党天下”杀人如麻，危害国家，危害民族。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宪政！

郭泉：民主先声 80：就 370 万复转军人问题，我致信胡锦涛和温家宝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

致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

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的社会安置机制”

尊敬的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

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是否能真正落实，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

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劳民之易为仁也。目前中国的腐败、苦难和混乱状况，正是两位领袖亲民爱民、实行政改、振新中华的最佳时机。

中国人民不想再打内战了，我效命的 1000 多万人的下岗工人、复转军人和失地农民的维权大军也不想再打内战了。大军过后必有荒年。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太深重了。如果两位领袖能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反腐轻赋，以佐百姓之急。于是，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两位领袖果能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人皆无离上之心，而暴乱之奸弭矣。

上月早些时候，我已经就“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公开呈送了策论；后又就中石化中石油 59 万一次性买断工龄的石油员工和中国工商银行的 13.8 万同样情况的银行职员向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反映了民怨民情。

现在，我想就我帮助服务的 370 万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以下简称“复转军人”）的尊严和生计问题上书两位领袖，请两位领袖为了共和国的安危、为了民族的存亡，派员调查、反思、并立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贵党的十七大，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出了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的伟大思想。而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长期做着大约 1000 多万下岗职工的维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其中有相当比重的是复转军人。他们的生活举步维难，但是他们盼望着人民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他们曾经有过很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斗争经验，我知道他们在忍耐，因为他们是共和国军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忍多久。最近，越来越多的复转军人的群体事件，使我不得不再次提笔向两位领袖提交策论。

本策论的核心思想是，

一、执政党和政府不能继续这样虐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共和国军人，必须尽快彻底解决复转军人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问题。

二、解决数百万复转军人的荣誉和生计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只有在“国家化”之后，复转军人的社会就业安置才能统一纳入国民就业体系中。而且，由于军人为保家卫国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复转军人在国民就业体系中，必须明显得到优待。

三、国民就业体系中分为非军人就业和复转军人就业。这一问题，属于劳动力资源问题。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盘活劳动力资源存量,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复转军人是特殊的劳动力资源，合理安置复转军人，他们会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不安置或不合理安置，复转军人将是社会动荡的首要力量。

以下就上述思想，在六个层面与两位领袖交换思想，探讨建立“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的社会安置机制”。

一、什么是“军队国家化”

1941 年 10 月 10 日，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提出政纲，要求“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梁漱溟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广大军人和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赞同。

1945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一致认爲，......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爲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之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军队国家化”仍旧渺无踪影；不惟如是，甚至连“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也不能公开见容于中国大陆。

那么，什么叫军队国家化？

军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打击一切入侵之敌，保家卫国。这一任务包括两种三种实现方式，一是针对入侵之敌实施自卫打击，二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实行针对敌国即将入侵之敌实施出境打击。除此之外，军队还可以自行或根据人民的要求进行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紧急救治工作。但是，军队的国内事务仅限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救治。

无论对敌军事斗争，还是救治国内事务，军队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法理的支持。这一法理，就是国家以立法方式规定军队通过执行国家元首、各部队执行各级军官的命令的方式，服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国家首脑有权调动和指挥军队，但军事斗争必须经过人民议会批准并对此负责。

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执政模式都是向苏联学习的，但是，治军方案却没有向苏联学习。“苏式军事体制”虽然也是诞生在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苏军始终是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例如，在列宁时代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许多农民被迫挨饿受冻，发生民变，而苏联士兵义无返顾地站到了苏联人民这边，迫使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军队是高度制度化、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军队，她不是听命于某一人的私家军，后来也未曾干预当年苏联的国内政治。

中国的大跃进之后也发生了饥荒，中国军队却没有和中国人民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经济政策，最后酿发饿死 4000 万人的人间悲剧。

当年彭德怀曾经致力于把军队导向苏式职业化方向，但毛泽东阻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扶持林彪领军后，林副统帅大搞“政治挂帅”、“三忠于四无限”，结果把国民血汗供养的人民军队弄成了一支毛泽东个人的红色卫队，把偌大中国变成了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准军营。

其遗祸之烈、灾难之广，史所罕见。而溯其源头，军队的非国家化思维，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二、只有军队国家化，复转军人才能被纳入国民劳动就业安置体制

军队国家化，除了在军队内部的建设和调度方面具有国家属性之外，军队国家化还体现在征兵宣传和复转军人的安置方面的国家属性。其中，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复转军人的就业安置，是本策论的核心话题。

军人的复转安置分为军官安置和士兵安置。

军官的复转安置分为转业安置、转业不安置、复员三种。其中，第一、转业安置的军官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原则上安置在政府和公检法系统，但是公务员法颁布后，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受控。大量军人被转业安置到企业。第二、转业不安置，即退役后虽然由地方接收，但是不安置工作，在家赋闲，只发给同级别待遇(对象为 05、06、07 三年退役且军龄为 18 年以上的。其余年份退役的军龄为 20 年以上)。第三、复员军官，一次性给予补助，国家不再进行就业安置。

士兵的复员安置的安置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即由农村来的回农村，由城镇入伍的回城镇，是工人、职员、学生的复工、复职、复学。没工作的另行安置。安置时“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安置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即本人根据下达的计划选择单位，单位同意接收时选择成功，选不到单位的一是在剩余指标内安置就业；二是发放补偿金自谋职业。单位也可以根据安置计划选人，选择完不成任务时，由退伍安置部门指令性分配，单位也可以申请实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

以上就是中国目前有关复转军人安置的全部方法。但是，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安置方案是很合理且不会有争议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把复转军人当作是劳动力资源完全推向市场进行配置，问题就全部出现了。

例如，第一、转业到企业的军官，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而成为失业游民，或被“一次性买断工龄”沦为贫困者。第二、“自谋职业”的复转军人，由于长期把青春奉献给了国防而耽误了学历获取，导致其获取社会就业机会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学历文凭。在自谋职业的问题上，企业军转干部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三、领取工资而没有工作的转业不安置的军官，由于他们的工资标准是依据他们转业时的工资标准确定的，而物价的快速上涨，使得他们的工资完全跟不上物价，而陷入经济困难。第四、领取了一次性补助而被推向社会的复员军官（目前大约 23000 人）以及被企业“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企业军转干部，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以及社会就业条件不断提高而使得他们在使用完他们的“一次性”所得后，立即陷入困境。

以上四类情况的军官中，我已经调查出已有为数不少的军官绝望自杀、罹患疯癫及神智不常。

所以，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是不应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市场配置的。也就是说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只能适用劳动力的计划控制，即军队国家化。惟有军队国家化，复转军人才能被纳入国民劳动就业安置体制，并自动获得优待地位。

三、目前的军队非国家化条件下的复转军人的苦难和血泪控诉

我和我的工作人员针对全国复转军人展开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是我所有社会维权服务工作中最残酷的工作。这个残酷不是因为工作量的巨大，而是因为我们都无法忍受看到共和国军人所受到的种种最残酷的人身虐待和经济虐待。

我第一次与复转军人的接触是在网络上，我注意到他们在电脑上打的的字都很大，我说，“你们的字怎么都这么大呀，是不是你们当军官的都喜欢写大字呀”。结果，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 50、60 岁的人了，眼睛看不清楚正常大小的字了”。我当时就潸然泪下。 这个年龄的共和国军人，竟然还在电脑上为了他们每日的生存费用而坚持不懈地向我咨询有关他们维权的事情，这个社会太没有良心了！

共和国军人，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能让我们和平幸福地工作学习，他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他们爬冰卧雪、流汗拼搏、流血牺牲……

他们戍边固疆，坚守在边陲海防、营房阵地。一年、二年、甚至二十年。

他们的工作生涯里，比我们多了一个军事生涯，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多出的这个军事生涯。这个军事生涯，怎么能使他们现在的生活蒙受苦难呢？这不公平！

中华全国全体军人不答应，中华全国各族人民更不答应！

在我的调查中，复转军人的怨苦之声不绝于耳。下面，我想就我亲自调查的 1993—2001 年间的 2.3 万余名复员军官的生活情况，向两位领袖传递他们的悲恸，也把他们的苦难诉说给全体中国人民，让人民知道曾经为我们作出重大牺牲的复转军人现在已经苦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我调查的这 23000 名复员军官其中 60%以上担任过师、团职职务，军衔中校至大校，他们为部队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军龄多在 20-37 年，多数在与世隔绝的海岛、高原、荒漠、牧区工作；40%以上的同志分别数次荣立一、二、三等功，有的曾被授予大军区以上级“先进个人”称号、学“雷锋标兵”，还有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全国全军英模。

然而，他们竟被国安[1993]2 号、[1993]政联字第 1 号《通知》打成了领取一次性补贴的“自行就业”者。而依据国家法律，他们本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与待遇，应享有的干部身份、政治与各种经济待遇，月退役金（工资）、医保、住房补贴、立功受奖、艰苦特殊地区补助、死亡丧葬等均被此试行《通知》剥夺殆尽。

目前，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五不管”（部队甩手不管，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不管，社会与事业、企业单位不管，街道乡村居委会不管，人民武装部不管）的弃儿、“八无”（无干部身份、无职业与无收入无退役金、无养老保险而无法生存、无医保与无钱治病救命、居无定所而无家可归、无衣蔽体无食裹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无人

过问）之弱势群体，日趋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无法生存。

昔日在部队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大功臣，“复员”后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自行就业”的工作有：卖血、踏三轮车当“车夫”、给人看门打更当“更夫”、四处流浪干零活打“短工”、学易经测字取名当“算命”先生、当“男保姆”、“老牧童”、“老厨娘”……。

风烛残年之时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年军人生存状况恶劣。

病魔缠身、无钱治病救命而憾死英年的中年军官，家破人亡。

复员军官中有些用那“一次性补助”到社会拼搏以至血本无归、债台高筑，而导致的夫债妻还、父债子还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

四川苍溪县已亡校级军官谭贵益之遗孀罗晓琴极度悲愤下发出了《一个已亡校级军官之妻的哀求》，怒问苍天、血泪控诉：“这何异于卖盐者喝淡汤，编凉席者睡光床，卖碳翁冻死在大路旁啊！”

可是，这些代表无数复员军官的呼天号地的呐喊心声，却根本没有任何一级政府部门听取并解决。

目前，这 2.3 万复员军官或因无业无收入经济困窘，导致感情破裂而妻离子散，或因无力还债而自杀轻生、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或心力枯竭精神失常，或信仰坍塌而遁入空门，真乃人间悲剧。

被中央军委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 1987 年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英雄营”教导员董元生，1995 年复员回河南原籍后，年老体弱无处工作，四处飘流找零活，拼命挣上几十元，勉强度日过几天，现已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乙肝等各种疾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等死。

又如巾帼英雄王春梅，15 岁参军到部队，曾 10 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3 次进京参加空军英模表彰大会，还当选全国第六次妇代会代表，1970 年国庆观礼时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95 年，王春梅 51 岁的这年复员，为生计在家乡招待所里干零活，大校变成 “老厨娘”，月薪不过 300 元，现年 63 岁，目前已无劳动能力，生活完全无来源，昔日“花木兰”，成为“下岗”无人管，生病无钱看，衣食无着的穷老太，境遇之悲惨，历史罕见！

这一人间惨祸，是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的。以上仅仅是复员校级军官的悲惨生活景遇，至于那些被胁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企业军转干部和企业军转志愿兵的苦难生活，就实在罄竹难书了。

这样的事例和无数的调查报告和调查数据，我的书房里堆积如山。

这些年来，争取合法权益的复转军人已被有关部门视为最不稳定的群众之一。其实，他们有话无处可说，有理无处可讲，有苦更无处可诉，连真实地反映情况还要随时做好被监被关的思想准备，他们人格尊严被深深地伤害，可谓是受尽了屈辱。

胡主席、温总理，我爷爷曾任中共青阳市长、中共安徽六安专区专员，在带兵进入大别山围剿敌军残部时牺牲。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烈士后代，我实在看不下去这样虐待军人的案件！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下去！

但是我一定知道，全国人民一定都看不下去！

中国共产党，你们决不能这样残酷虐待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中国政府，你们决不能这样残害我们最可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你们决不能这样干！

四、军队国家化可以彻底杜绝不同时期出台不同政策的虐军事件

关于军队退役干部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不同的政策。

这些不同的政策使得退役军官的生活待遇相差很大。这些不同的政策法规是：一、国发（1975）129 号文件；二、中发（1980）3 号文；三、93 政联字 1 号试行《通知》；四、中发[1998]7 号；五、中发（2001）3 号文；六、劳社部发（2005）17 号《通知》（与 93 政联字 1 号试行《通知》精神完全一致）。

其中，对所有退役军官最有利的文件是中发（2001）3 号文。建议两位领袖使用这一文件，针对所有的退役军官一体适用。

下面对上述文件中的重要文件精神作一个介绍：

1975 年 8 月 13 日国发（1975）129 号文件（以下简称 129 号文件）确立了“将军队退役干部作复员处理”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对退役干部很不利的一个原则。以后的五年里，大量的军人被复员，而丧失了国家干部身份。

1980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了中发（1980）3 号文件，承认“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 XX 万军队干部作了复员处理”，并开始落实政策。

1993 年 2 月 17 日出台了 93 政联字 1 号试行《通知》，却再次确立了“将军队退役干部作复员处理”的原则。“政府不负责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从此 23000 名校级军官成为可怜低贱而悲惨的“复员”军官，被非法剥夺了国家干部身份。1 号《通知》开场白这样说到：“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多渠道地安置军队退出现役的干部，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国发 1975）129 号文件精神，……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

2001 年 1 月 19 日颁布的中发（2001）3 号文件印发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规定：“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实行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合的方式安置。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由党委、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和职务；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第六十九条还规定：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此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以往有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但是，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发（2001）3 号文时却拒绝将此文中的“就业”、“退役金”制度适用于复员军官身上，导致复员军官生活进一步下降，产生绝望情绪，并由此诱发自杀、疯癫和其他错乱行为。

如果军队国家化，所有各阶段退役军人完全纳入国民就业安置或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有两个退役办法呢？

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新退役军官怎么能享受丰厚的待遇，而以前退役的军官却饥谨难耐呢？

另外，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怎么能让转业到公务员系统的军官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专业到企业的军官就要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而沦为贫困者呢？

公平何在？天理何在？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这样区别对待我们的共和国军人，我们人民不答应！应该立即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让全国所有的退役军人都能得到逐月发放并随社会经济发展逐年递增的可以保证幸福生活的退役金。对那些愿意工作的退役军人，国家应该积极提供就业机会。

五、军队国家化，可以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与社会各机制协调运行

目前的中国的退役军人的社会安置完全被交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又受到公务员录用程序的控制，于是退役军官的安置主要地是到企业。由于企业的自主性越来越突出，企业对抗政府派分退役军官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企业干脆就说不接受，导致退役军官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几年都上不了岗；还有一些企业拒绝退役军人上岗，而先每月支付几百元的工资说要等岗位，一等就是七八年；另有一些企业虽然接受了退役军官，但是，这些企业又借改制重组的名义“一次性买断工龄”，把退役军官一脚踢入社会。

以上现象与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与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复转军人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向两位领袖说明，复转军人问题必须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挂钩思考，否则，就是虐待迫害军人了。

请看上述 1993 年 2 月 17 日出台的 93 政联字 1 号试行《通知》第三条规定：“对回农村的干部应按规定……，划给责任田（山）、自由地（山）或安排其它生产经营任务”。

我不知道制定这个政策的总政官员到底是怎么学习国家有关农村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二年完全承包下户，三十年不变。哪里再有田可种呢？哪里再有山可分呢？这种立法水平，实在让人不知是心酸还是心寒。

再例如，1993 年 10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1994 年 1 月 1 日，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 93 政联字 1 号试行《通知》同国发（1975）129 号文件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政策，是不能适应与配套市场经济条件的，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这两个文件就应该被废止了，但是却一直执行到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次性补助（一次性发放 3 万-12 万元，以后分文全无）怎么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呢？物价每日都在涨，还在继续涨，说这些复员军人度日如年，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再例如，劳社部发（2005）17 号《通知》中说：“对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复员干部发生的医疗费用，有单位的由单位按规定解决，没有单位的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或由地方财政补助给予医疗救助”。

我不知道劳动社会保障部的同志你们学不学文件啊？1993 年 2 月 17 日出台了 93 政联字 1 号试行《通知》规定

“政府不负责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也就是说复员干部离开军队后就从来没有过单位，而“没有单位的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或由地方财政补助给予医疗救助”，请问劳动部的同志，共和国的退役军官怎么会落到要被纳入救助体系的这步田地了呢？真是伤良心！

数万名军龄在 20 年以上的复员干部长年累月在边关、海岛、高原与荒漠戈壁、艰苦特殊之恶劣环境为伴，巡逻执勤，站岗放哨，爬冰卧雪，风餐露宿，顶风沙，战严寒，磨爬滚打……，干到岁月的苍桑刻满全身，无情地病魔缠身，到了风烛残年之时，生病治病只能望医止步，望药兴叹，要救命只能靠“救助”，但这种“救助”让复员军官们不敢轻易就医、住院、买药、治病，生怕不符合救助的条件。校官谭贵益的求医之路难于上青天，无钱治病含恨九泉，落得个夫债妻还，父债子还，这样的悲剧已经开始发生在多名军官身上，开始在复员军官的家庭重演。这样的“救助”，叫复员军官在生病时，或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际，去相关部门磕头下跪流眼泪，东奔西跑批条子，哀求施舍与恩赐，其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等“条子”批下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重病拖至病危，病危者早已仰望长天，撒手人寰了……；二是需看钱入院，量费治病，费尽医止,眼睁睁地看着死,等着死,上文里的被中央军委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 1987 年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英雄营”教导员董元生，现在就躺在家中的破床上等死。

胡主席、温总理，你们看军队的复转军人的事情，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吗？再这样下去长城会彻底塌掉的。

惟有军队国家化，可以根治这个问题。因为军队国家化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就业机制、公务员录用机制等各方面的工作立即会思考并针对因为军队国家化带来的复转军人的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而展开全面工作。

六、安置工作是国策，应该实行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国家补偿机制

安置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简称国策)。军官因退役使国家产生安置义务，军官因个人利益受到损失和特别牺牲使国家产生补偿义务。

一、现行的安置及两退军官的诉求

（一)、现行的安置

1. 法律、文件设定的安置补偿制度。

1）1954 年以前的军人实行离休制，即离休安置或退役安置。

2）2001 年以后退役的自主择业、领取退役金制，即半退役安置。

3）安置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转入公务员系列，即转公安置。

4）高职衔离退休军官由军队自己养起来，即自养法。

2.低成本安排。

1）政府将退役军官安排到企业去就业。即就业法。

2）复员军官发给生活费，实行自我保障，即自保法。

3.由就业法、自保法衍生出的贫困退役军官，被政府随机、被动的安排享受救助金。即救助法。

4.因种种原因失去工作自谋生计的、花光复员费的、无人救助的退役军官，即不救助法。

各级政府用八种方法安置、安排退役军官，实际上是自找麻烦。上访的退役军官大部分都是从“低成本安排”中产生的。本文将救助和不救助的两类退役军官统称为两退军官。

(二)、两退军官的诉求。

由于政府拒绝履行安置补偿义务，引起退役军官上访。上访的要求简称“三项义务两种身份待遇保障”，三项义务是：

1.“国家妥善安置”的义务。

2.国家“保障离退休军人生活福利待遇”的义务。

3.国家对军转干部“生活福利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的义务。

两种身份待遇保障是：

1.军官职业荣誉（军衔、功勋）身份待遇保障。军衔是国家给予军官的永久职业荣誉，是调整现役军官、离休、退休、自主择业退役军官(简称：自退军官)个人收入的依据。同样享有职业荣誉的两退军官，其职业荣誉身份待遇不可侵犯，“不能搞一衔两制”。

2.两退军官的国家干部身份待遇保障。离休、退休、自退、安置到行政机关转为公务员的退役军官(简称：转公军官)，其身份均按国家干部身份给予待遇。同样享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两退军官，其国家干部身份待遇不可侵犯，不

能搞“一身（份）两制”。

二、法律、法规确立的安置补偿义务负责机关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行使下列职权：领导和管理.......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安置工作”与“国家设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机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两项法律规定对比得出的结论是：

1.国务院行使的职权是在国防建设事业以内，国防建设事业是指创立、增加新的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国防事业。通俗一点讲，国务院是负责履行经济补偿义务的唯一主体和负责机关。

2.能接受党中央、国务院、军委（或称军方）领导的机构不存在。

3.法律确立了两个安置补偿义务主体，国务院已经承担了经济补偿义务，不再具备担任安置补偿义务负责机关的资格，唯一的安置补偿义务履行主体和负责机关就是军委！

4.根据国家雇佣军官制度（或叫服务关系），解除国家雇佣关系、建立新的国家安置补偿关系，必须由军方代表国家来完成。

5.退役是为了“促进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军队的要求。

6.训练有素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两项指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靠补偿来交换的，退役后的安置补偿质量是军队、军人自身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所以从法律的规定，军队、军人的自身追求，安置补偿是一项地地道道的国防事务，军委是安置补偿义务的唯一履行主体和负责机关。军委是代表国家履行安置补偿义务的安置者，地方政府是安置补偿义务的执行者，退役军人是被安置补偿者。经济补偿是地方政府代替国务院履行的义务，其他补偿安置义务是地方政府向国家履行的义务。军委是监督承担责任的负责机关。

三、上访的原因

（一）、国民身份待遇差别。

在我国，身份具有调节个人社会属性、调节个人待遇差别作用。现有两种国民身份待遇，一种以城乡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城乡差别；另一种以国家干部（简称：干部）身份和企业职工（简称：工人）身份为载体的身份待遇差别。

干部、工人身份待遇差别是：

1.一是干部有行政级别，工人没有；二是在就业管理上，干部归人事局管，工人归社保局管，干部能在工人就业的单位就业，反之，工人则不能；三是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务选聘（被选举权）时，只对干部开放；四是干部身份是一种终身待遇，不因退休而丧失。

2.信息不对称。大量信息并不属于国家机密，但由于干部的有意控制，造成了工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干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优势。

3.福利待遇不同。在住房、用车、通讯、休假、医药费报销补助等等方面，干部比工人享受的待遇高。

4.养老标准不同。干部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负担，标准由干部定。工人的养老金以个人缴纳账户为基数。标准也由干部定。干部领取 90%以上的退休金，而工人只能领到 80%的退休金。工人的退休金在 700 元/月左右，一般干部的退休金在 1700 元/月以上。而且干部级别越高，差距越大。

干部工人差别，不用人大审议批准，不用征求纳税人意见，不是国家法律规定，而是文件政策规定。这种以政策重构的干部社会结构，必然导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固定，必然导致干部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低劣，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源。人事部说：两退军官上访是要比照公务员待遇，我认为应该依法超过公务员，一是法律效力高于文件政策规定，二这也是国际惯例！也应该接轨。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包括我们潜在的敌对国家）其退役军官的国家补偿金要比同等条件的公务员薪金高，这是事实。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同等条件的军队退役人员工资待遇，也远高于同等条件下的公务员，这也是事实。

（二）、相对剥夺感（挫折心理）的形成。

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条件。一是失去了补偿条件；二是失去了安置补偿的社会组织结构，失去了个人权益特别牺牲的认可；三是和其他退役军官之间的待遇差别；四是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安置补偿过程中的寻租；五是在部队殚精竭力学习、应用的军事理论、知识、技术，全部失效，退役后在地方基本上毫无用处，因此遭到社会普遍蔑视。这种心理认定还包括：

1.当年地方政府用计划分配把两退军官插到企业，是政府的“包办婚姻”，现在政府又把我们踢出来了（失业），

军委应该让地方政府履行经济补偿义务，或者军委重新安置我们。

2.享受安排工作的两退军官家属大量失业，有些退役家属为了活着要和男性民工一样的劳动，军委要监督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要有作为。

3.得知全国企业军转干部 94 万人，加上复员军官，需要解困的就有 32--47 万人，解困救助率达到 50%，说明现行安置补偿制度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已经彻底解体了，军委应当重新制定补救方案。

4.由于履行兵役时的环境因素，部分两退军官患病率高，留有后遗症，却没有医保，军委要监督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要有所作为。

5.职业荣誉、干部身份是军官流血流汗，是用人生最宝贵的阶段换来的，是军委代表国家颁发和授予的，军委有义务维护这种荣誉。

6.根据法律规定、社会评价、道德标准，军委应当支持两退军官维护自己的经济补偿权。

7.离休、退休、自退、转公军官都养起来，两退军官被边缘化了！

8.退役军官享受的生活福利过低，不到位，甚至有大量的复员军官没有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对此，国家要有所作为。

解决办法惟有实行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国家补偿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

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前已有述，而国家补偿的目的一是为了"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二是为了补足和抵消个人权益损失和特别牺牲。国家补偿包括经济补偿、政策补偿、精神补偿。经济补偿是基础，国家在安置补偿义务法律关系中永远是义务主体，退役军官在安置补偿义务法律关系中永远是权力的主体。

以下我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调查报告和广大军转干部提交给我的控诉材料，给两位领袖看，如果你们有耐心读完本信和所有的附件，我想，两位领袖一定能作出最有利于国家、最有利于民族和最有利于人民的抉择。

我还特别的要推荐给两个领袖的是本信附件的最后一个附件：美国联邦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工作简介。相信，本信正文和所有的附件对两位领袖来说是一本最好的体察民情的桥梁，桥梁的两头，一边是人民，一边是领袖。请走过桥梁，进入民众，倾听民心！

郭泉：民主先声 81：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

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两位领袖好：

后天（12月13日）就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了。70年前的这一天，日军攻入南京，开始虐杀这个悲情城市的三十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直至几周后这个美丽的城市成了人间地狱。

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了，但中日两国对这一重大灾难的反思仍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作为一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经济大国，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融关系是任何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描淡写、敷衍了事的。

上个月早些时候，我在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的公开信中，已与两位领袖探讨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关系，今天，我想与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两位领袖探讨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正式开始探讨之前，我想先向两位领袖汇报一个小插曲。

坐落在侵华日军南京江东门集中屠杀点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在2005年12月13日闭馆维修、扩建后，历经两年，终于在日前完工。我的一位在电视台实习的女学生对馆前新落成的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千辛万苦联系并采访了雕塑的设计者和施工者，请教了雕塑的尺寸及其象征意义等等。电视台的同事、领导以及广大市民都认可并高度赞扬了这一爱国主题的新闻短片，并准备播出。

不料，在播出前，电视台接到了来自省市宣传部的"不准播出"的命令，言称恐其破坏中日友好关系。

两位领袖，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一汇报后感想如何？我想，如果这种仅仅介绍雕塑长宽高的新闻短片，中共宣

传部都不准播出的话，那么未来，日本或其他什么国家再来一次南京大屠杀或北京大屠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言归正传。11月30日，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的支局长渡边昭和等两位新闻工作者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小会议室采访了我，请我谈谈我对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展望以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观点和态度。

现将此次谈话要义，说与两位领袖及全国人民、海外华人，以作探讨，并以此文祭奠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罹难冤死的中国军民。

国与国之关系，犹人与人之关系。人与人有敌人、陌生人、朋友三种关系；国与国也有这三种关系。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其经济、文化、政治的互通融合层面极多。"敌对"将两败俱伤；"行同陌路"也对两国无所裨益。唯有做朋友，两国政府才可能为两国人民共谋福祉。

中日在六十年前是敌人，后又做了十余年的陌生人。中日建交后，日本多位首相作了不同形式的道歉，目前，两国政府在法律文书上是朋友了，但中国人民是不信这个邪的。因为战争创伤并没有完全愈合。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由此可见，做朋友的前提是"信"。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日本国的谢罪问题。

目前，我查阅到中日建交后，不少日本首相都表示过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和道歉。但是，我们知道，民主制国家里的总统和首相其实都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临时工而已。其谢罪和道歉如果非经国会授权，那就只能代表他本人，不能代表国家人民。所以，我认为，在侵华罪行方面应由日本天皇制定颁发谢罪诏书，诏告历史，永志不忘。

其次，天皇的谢罪诏书，必须得到实际的兑现，否则，中国人的身心伤痕永难消遁。现我开列战争赔偿和返还清单如下：

一、对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死难的三千五百万中国同胞进行战争赔偿。

此问题，虽有中华民国蒋介石先生放弃在先，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两先生放弃在后，但此三人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全体国人及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上述三人所作的一切放弃战争赔偿之文书均应依法宣告非法。

目前，应重开战争赔偿之索赔调查并形成文件，交由全国人大讨论决议。

二、日军侵华期间毁损之中国民用建筑及公共设施，均应做出相应的赔偿。

以上两条，均应支付自应赔付期至实际履行期的全部利息。

三、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从中国掠夺之金银、文物、珍宝，均应如数返还。并对毁损之文物、珍宝进行相应赔偿。

四、返还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屿及其所属海域。

五、应开庭审理并实际解决慰安妇诉讼、毒气弹受害者诉讼、赴日华工诉讼等特大战争虐民案件。

以上第一条、第二条之"战争死亡、毁损事"，中华民国在战后有过详细的调查并有现成之死亡、毁损报告。

以上第三条之"金银、文物、珍宝事"，中华民国博物馆、档案馆亦有相应的调查报告。

以上第四条之"钓鱼台列屿及所属海域事"，有中国明朝海防图，及《顺风相送》等大量古籍佐证。另外，我的朋友李义强先生在此问题上研究、行动均出力最甚。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先生对此也深有研究。此两人，堪称海峡两岸之爱国保钓人士的典范、楷模。

以上第五条之"慰安妇案"，以我的同事、挚友经盛鸿教授最为权威；第五条之"毒气弹受害者案"以我的同行王选女士最为坚强；第五条之"赴日华工案"以我的同行童增先生最为热心。

在这里，我还想对中国钓鱼台列屿及其海域向两位领袖多进言几句。

钓鱼台列屿自古为中国与古琉球王国的分界线。其分界线的地理结构为一个深长、绵延数千公里的海沟，叫宫谷海沟。海沟的东侧是古琉球王国，海沟的西侧是中国的钓鱼台列屿。

钓鱼台列屿及其所属海域，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出海口，也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储藏区。二十一世纪谁拥有这个石油储藏区，谁就执世界之牛耳。万幸的是，这一巨大的石油储藏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从2004年9月18日开始，每月逢18日，我在南师大免费开设面向全南京市民的钓鱼岛知识系列讲座，场场都有300余名市民、学生到场研讨。不幸的是，在2005年3月，这一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免费的爱国教育被中国警方以及南师大校方以"破坏中日友好关系且不合时宜"的理由取缔了，实为憾事。

我坚持认为，邓小平先生的"搁置钓鱼台主权"的政策是极端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邓先生的这一错误政策出台之后，钓鱼岛就完全被日本实际控制了。我的同行、朋友冯锦华先生、王喜强先生等保钓勇士经历生

死考验，登上钓鱼岛数小时就被日本政府逮捕并移交日本的那霸警署审查。这就是钓鱼岛被日本霸占的明证。

邓小平先生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未经中国人民的同意，且违反国家海洋法明文规定钓鱼台列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法律条文，所以应坚决废止"搁置"政策。

我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邓小平先生的"搁置主权"政策应修正为"捍卫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钓鱼台列屿及其海域的巨大能源及海洋交通价值，将是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在。中国丢失此岛，将使中国在21世纪的一切复兴希望破灭。

由于我长期以来致力于对钓鱼岛的研究以及我在法律事务方面的经验，我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共同承担中日钓鱼岛问题国际争端的代理律师。马英九先生的博士论文就做的是有关钓鱼岛归属的法律研究。马先生为老一辈的保钓人士，我与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马先生也曾经表示要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去国际法庭与日本打官司。

建议两位领袖在思考中日关系之钓鱼岛问题时，参阅马英九先生的博士论文。

再次，如果日本方面能认真思考上述开列之谢罪、赔偿、返还清单，并积极与中国商讨，中国方面应在"理赔数量"上与日本进行实事求是的磋商，但是在"侵华性质"上，则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最后，本人认为，在以上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或经讨论达成共识并着手履行之时，在中日两国已经成为朋友、并不危害任何第三方的前提下，可以商讨70年前日本单方面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但是我们的提法应该是"亚洲经济共同体"。

我认为，21世纪亚洲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正在形成。如果日本在谢罪、赔偿和返还等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将使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完全成熟。

请两位领袖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着眼于21世纪的中国，广泛调查民意，调整中日外交关系，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台湾人民共同努力，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郭泉：民主先声82：　郭泉告中华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同胞书

中国人，再也不能生活在专制统治下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分为封建皇帝的"家天下"专制和当代中共的"党天下"专制两种。

百年前，中国人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专制统治，开始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天下"时代。原本孙先生有从"党天下"过渡到民主宪政的设计，但被日本的铁蹄无情地粉碎了。中日战争结束后，1945 年国共两党内战爆发。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中国"的旗号下，团结一致，全力协助中共取得内战胜利。不料，1949 年，中共在篡改国号之后，并没有兑现其向人民承诺的"建设民主中国"的誓言。其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背信弃义，令人发指。

随后的五十八年里，中共的"党天下"专制统治相比国民党的"党天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五十八年，中共针对要求民主政体的优秀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打击之残酷连苏共邪魔也望尘莫及。大批中国作家、教授和各类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商人、学生被冤杀或屈死狱中。连国歌的歌词作者田汉先生也遭屈死，其他国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此五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励精图治、发奋反思、自责自省，终于在上世纪末做出了还权于民的伟大抉择。从此，台湾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可以充分发表各自反对执政党的不同政见而不受执政党的迫害、逮捕和暗杀。无疑，台湾人民是幸福的。

不幸的是，盘踞大陆的中共在酿造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非法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重大罪行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倒行逆施，妄图把十四亿中国人民捆绑在其摇摇欲坠的"党天下"的专制破旗上。

中国人民再也不愿意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主义的殉葬品了。

中国人民必须站起来！

目前，中国的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善良、高尚的中国人民正在站起来。我们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社会地位和学历层次，只要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真正可以由人民来选择执政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国人，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共同缔造即将到来的民主中国。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

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将重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观；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将实现五十六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将迎来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强盛友善的盛世景象。

中国，将在 21 世纪提供给全世界更大量的物质产品，让全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品。同时，中国也将在 21 世纪赋予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最文明、最善良的精神力量。让全世界人民都称赞这个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和帮助。

为了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为之奋斗。

全体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但是，我们不需要战争！

战争只能带来死亡、痛苦和无尽的仇恨。战争，虽然从表层意义上看，是针对敌对势力的军事力量的打击，但究其本质，战争无非旨在打击敌人之经济、政治、文化等统治秩序。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一本质上的摧毁，表层意义上的战斗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也是绝对不必要的。

如果一个战斗组织拥有十颗导弹，任何一个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十枚导弹应该瞄准以下目标并摧毁之。这些目标是，这个国家重要城市的供发电设施、供水单位、电信综合枢纽单位（手机、网络管理中心）、交通枢纽单位（火车站、地铁站、公交总站等）、新闻宣传中心（电台、电视台、国家新闻社）、政府办公所在地、大型水利工程设施等核心单位。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通知以上单位及中国全境所有单位的生产、管理、服务人员在某一周，全体在家休息七天，我想，其造成的“全民民主思想的意愿表达”效果和经济上的摧毁效果要大过任何一次摧毁性的核战争。

八九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枪林弹雨里，子弹击中血肉之躯的哀恸场面历历在目，坦克轰鸣、弹雨横飞，满城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如今，再让国民进行类似八九那样的街头流血革命，是不人道的，也是愚蠢的。即便如此革命成功，也是尽美不尽善的。子曰：韶，尽善尽美，武，尽美未尽善。意思是说，尧舜禹三代是因禅让而推进时代演进而非战争，所以是尽善尽美。而夏商周三代，虽时代前进但靠的是征伐，所以是尽美未尽善。

我设计并倡导的 21 世纪的国民和平民主革命模式，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民主革命模式。如果这一和平革命理念能得以实现，那么任何一个专制统治都无法支撑超过七天的时间。

这七天里，所有的教师、学生、工人、管理者、商人、服务者等一切热爱民主反对专制的中国人都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佛教徒在家吃斋念佛，基督徒在家读经祷告，穆斯林在家同心祝福，一切有信仰之人民在家祈祷中国民主。没有信仰的朋友在家看书、学习、聊天、睡觉、思考，享用事先准备好的可供一周使用的饮食。

而此时，专制统治者的全幅武装的军队和整装待发的武装警察，将面对“万人空巷”的尴尬局面，使“屠夫无用武之地”。

另外，我也请一切希望中国走向民主体制的海外民主制国家，积极配合中国人民的这一和平民主革命，与中国人民保持高度一致，在此七日内断绝一切与中国专制统治者的经济、文化、政治往来。

如能如此实施，我想大约不需要七天，专制者就必然宣告失败，而被迫召开由各民主党、各人民群体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民主政体的多项民主制度，实行多党、多群体的民主竞选。

当然，我也希望胡温当局能审时度势，自行政改，和平过渡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否则，民主革命将在所难免。

如当局不自行政改，全国人民就将奋力推进民主化进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件是确定全民和平民主革命开始的时刻表；另一件就是使用各种工具、通过多种途径，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希望、支持并拥护中国实行民主的海外朋友传递中国人民将于某日开始实施全民和平民主革命的好消息。

关于时刻问题，我想，由于我是这一和平民主革命理念的设计者和倡导者，如果我被捕入狱（劳教劳改）或被杀，请国人和各路领袖选择我生日 5 月 8 日实施这一计划。如果这一天我已在狱中或已遇难，我的灵魂将与中国人民同在。我的灵魂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与大家一同静候专制的崩塌，与大家一起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请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支持、拥护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海内外朋友，通过你们最方便、最熟练的工具和渠道，全力发布并奋力传播如下信息（全文 508 字）：

中国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进行全体国民的和平民主革命。革命方式为全体国民在家享受安静的生活，不与专制者合作，不为专制者服务，并请全体国民备齐七天之饮食，静候民主中国来临，迫使当局召开有各民主势力参加的临时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反对街头流血革命，提倡在家的民主革命。

如果您的家人有在 49 年后被镇压，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的家人有在“三反五反”中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大跃进”中被饿死、流亡、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文革”中被以各种形式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文革”之后至 89 年的各类民主运动中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 89 年后，因信仰、文化、经济等所有方面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在专制统治下遭受或感受到任何种类的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反对专制，要求并支持民主，请在家革命！

民主革命，不需要您在街头流血牺牲，只要您在我们通知的时间里在家学习、生活、不为专制极权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和服务，您就在革命，您就是民主革命者。

中国未来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团结和奋斗。

您所要做的就是在家七天而已！或许不要七天！

郭泉：民主先声 83：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我这样的，另一类是他们那样的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事情经过

事情经过如下：

12 月 13 日，我在南师大文学院资料室演奏古筝。

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副主委于正先生和组织委员孙原靖老师来找我，找了个空教室与我商讨。（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主委是林振山教授，副主委为陈永高教授、汤惠生研究员、余多慰教授、于正副研究员。）

他们说，“你的公开信给民盟和南师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考虑到开除您的政治成本太大，今天来对您进行劝退。建议您自己自行退出民盟”。

我只听说过有千万人退共产党的，没听说过有一人退民主党的。于是我笑着说，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两位先生女士无功而返。

12 月 14 日早上一上班，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正副两位主委一同到我办公室，找我谈心。来的两位先生是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主委林振山教授（简介见附件 2），副主委余多慰教授（简介见附件 3）。

他们说：“你的公开信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很大，搞得政府很被动。昨天于正老师来和你商量劝退一事，他向我们汇报了。但是我们还是想和你交流沟通。你的公开信，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是违反宪法的。宪法规定中国人只能而且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主同盟的章程也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完全可以开除你。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如果开除你，我们南师大民盟在 10 年之内就得不到先进了。还是请你考虑民盟的盟利益，自己退盟吧。”

我还是笑着说：“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

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主委林振山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也不小了，40 不惑了，看来还很幼稚。只有共产党才能管好中国，其他任何民主党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汉族人的人性是最坏的，如果给中国人民主，汉族人的自相残杀是最厉害的。”

我没说话，对他这样的思维，我实在没什么话好说了。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华夏儿女什么时候成了人性最坏的民族了呢？如果，现在的华夏儿女有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党造成了华夏儿女的心灵裂痕？我们是继续这种裂痕，还是努力修复？我不反驳他，真的没反驳林教授的欲望！因为他是理科教授，我是文科学生。鸡鸭不同语！

最后，他说：“你再考虑下。我下午 3 点给你电话，你自己决定吧！”我说“好的！”

下午 3 点，他给我电话，我回答：“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

他说：“4 点半我再来找你，再谈谈。”

下午 4 点半，林老师和于正老师再次登门。再次劝我自退。并一再声明，这个决定是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决定，不是中央民盟的决定。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决定申诉的话，上面一定会“维持原判”的。这下我又笑了。我第四次回答：“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然后，我又加了一句，“我不申诉。”

于是，林主委从怀里拿出了《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决定》（见附件一），握手告别。

然后，我下班，回家！晚上，我向我一直帮助维权的农民代表、工人代表和军人代表通报了这个事情。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他们等着！”

再然后，昨天（12 月 17 日，周一），我接到了各路维权代表的委托，出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附件一：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决定

郭泉，男，1968 年 5 月 8 日生，2001 年 6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郭泉于 2007 年 11 月中旬在网上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给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发出公开信，宣扬要在中国实施西方的多党竞选政治制度。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相关条款。在社会上、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至今郭泉仍坚持其错误行为。

根据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第七章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为坚持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和严肃盟的纪律，本委员会决定给予郭泉开除盟籍的处分。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2007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二：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委员会主委林振山教授简介

林振山，男，汉族，1955 年 7 月出生。北京大学大气环境与大气物理专业博士。1993 年—2001 年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津贴。2001 年 4 月回国后受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2002 年起任地理科学学院院长。1995 年获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1998 年入选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现任 Ecological Complexity（欧洲）、《自然资源科学报》等学报的编委。教育部高职高专环境与气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计量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湿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统计气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核心成员。

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办公电话：02585888230 邮箱：linzhenshan@njnu.edu.cn

附件三：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委员会副主委余多慰教授简介

余多慰 男，1954 年 3 月出生。安徽安庆人。民盟江苏省委常委，民盟南师大主委，南师大生科院遗传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进展》论文评审专家，国家博士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华东船舶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中国临床与实验医学荟萃杂志编委，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会员。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化与生物制品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210097 电话：86-25-83598216 传真：86-25-83598723E-mail: dwyu0331@email.njnu.edu.cn

郭泉：民主先声 84：我们只不过是提倡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而已，怎么是颠覆国家政权呢？

再次感谢中共警察，让我的又一位好友成为了人民英雄！

12 月 13 日下午，广西全州县网络异议作家荆楚先生，在家中被桂林市国保会同全州县国保与城北派出所警员前去搜查，抄走他电脑主机、文稿及一些书籍，当晚深夜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荆楚先生本名王德佳，系广西全州县白宝乡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广西财经学校，毕业后在银行系统工作。1980 年代初，他参加了全州县文革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调查工作，了解到当地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惨无人道的事件真象，心灵震撼极大。从此荆楚先生对中国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深度质疑。1989 年中国民主运动暴发时，他在银行系统主办内部刊物，曾写诗暗讽时政，之后被清算下放到柜台工作。2003 年他与其他工行被强行买断工龄的员工一道上访维权一年。之后一直活跃于网络，撰写时政评论文章。今年以来，他与一些国内朋友创办了《中国人权论坛》。 他针砭时弊、激扬文字、不畏强权，揭露中国官场一些腐败黑暗，这本是为了国家政权更健康，为了人民的生活更幸福，竟然被打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看看中国现在这个腐败堕落的状况，巨大的贫富分化，到底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答案其实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但绝不是我的老朋友王德佳！

我们来看看，我的老友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首先，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其中第四十一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基于这些宪法规定，荆楚先生无论揭露了哪一级官员的罪错，都应该是在践行一个公民的权利，在承担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何罪之有呢？

其次，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宣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的表达权尤其彰显着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认同与尊重，显示着新领导集体对国际文明准则的认同，与试图引导中国融入主流世界的意向。荆楚先生的文章恰好就是十七大的要求。何罪之有呢？

最后，宪法明文："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荆楚先生的文章批评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要求改变的也是执政党的产生方式而已，怎么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荆楚先生不仅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相反，却是在热烈地呼吁大家爱国。

我们都是热爱国家政权的，只是我们都认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人民选择执政党，当然可能选上了这个党，

选下了另外一个党。执政党，充其量就是人民的一个保姆、公仆而已，你做的不好人民就要把你选下来。你做的再好，到了年限以后，也要把你选下来，因为，你如果永远做下去，你就成了独裁者了，而任何一个没有制约的天使，都会堕落成魔鬼的。

让人民选择执政党，这怎么能叫"颠覆国家政权"呢？看来，认为要求执政党下台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当成了国家政权。于是，这个执政党认为，如果人民想选择执政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我的老友荆楚先生阐述民主思想，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了！

现在，我们要重新学习"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了，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政治民主，就是要看民众有没有权力选择执政党，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允许民众过问政事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某人某党的私有财产，再多说辞都是借口。只能认定是专制独裁统治。

郭泉：民主先声 85：告中华全国退役军官书：卸磨杀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郭泉告中华全国退役军官书

公平、公正、公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谐就是消除矛盾。而所有的矛盾来自于两个根本的需求，一是日用的饮食，一是人格的尊严。

02 年以来，我在调查企业下岗职工的时候，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军转干部，高至师级干部都惨遭"买断"迫害。至今一些师级干部因为组织维权还身陷囹圄。他们整日双手卧着牢狱的铁栅栏，眼望自由。今年，我接受全国退役军人的委托，代理中华全国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志愿兵的上书工作。上书后，一些地方政府对退役军官的维权表示了明显的"客气"，但是，另有一些地方政府，对退役军官的维权仍然实施"严打"。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周，银川市复员军官赵德福同志去兰州军区，采取有理有节的方式提出请求、申诉。得到全国复员军官一致响应，这是合法行为。但是银川市公安局随后对赵德福进行了强制手段。现公布赵德富妻子的电话：0951-6723280，请广大退役军官致电慰问并提供各种手段的救济。也请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启动对赵德福的人权保护程序。

退役军官从军期间，流血出汗，把最珍贵的青春献给了国家。数百万在 1950 年---2000 年期间脱下军装的，并且服从了组织分配走上了建设祖国的第一线的退役军官，被剥夺了国家干部身份，使经济待遇比同类人员低了好几倍。

这种不是根据对祖国的贡献，而是仅仅凭着转业的年代和转业分配去向，决定我们退役军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使广大退役军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乞丐，要靠"解困"、"救助"来维持生计，这样合理吗？公平吗？这样对待为祖国作出巨大牺牲的共和国军人，天理难容！

天理昭昭！罪恶必罚！

国家曾经颁发过一系列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文件，其核心精神都是**"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享受各种待遇。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相关机构取消上述文件的正式文件。但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就是不予以落实，这是为什么？

这样不落实，不兑现的法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中国的法律应该是给中国人用的，不是用来欺骗国际社会的。即使中国欺骗国际社会说中国怎么社会制度好，怎么法制健全，但是，广大退役军官感受不到社会制度的优越和法制的完善，相反，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和苦难。

全国各地退役军官要求各级政府以"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待和落实军转干部政策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主动行动促进企业军转干部待遇早日落实，要求恢复企业军转干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打着改革旗号，彻底否定了国家关于退役军官安置的一系列文件，一夜之间，全国几十万、上百万企业军转干部被"莫须有"的剥夺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待遇，由昔日最可爱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这真是世界军史上最大的耻辱！中国军人再也不能这样冤屈下去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欺我共和国退役军官，顽固坚持其错误行径，依其所谓的《宣传提纲》、《答复口径》，为其错误行径进行狡辩，拒不落实军转干部政策。全国各地退役军官理应积极行动起来，奋力维护共和国军人的合法权益！

转业军官都是奉命转业、计划分配的。分配到企业工作，是组织的决定，而不是个人的行动。在政策面前应一视同仁，而不应对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产生歧视。

借改革之名，严重侵害企业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是广大退役军官绝不能容忍的！

企业军转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共和国退役军官的尊严，为了维护国家法律政策的权威，十几年来冲破重重阻力，不怕窃听监视、围追堵截、打击压制、“办班”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怕滥用警力，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进行上访、申诉，要求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1998】7 号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精神，落实政策、待遇问题，但是至今没有给予解决。

迫于巨大的压力，人事部等有关部委才羞羞答答、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出台了所谓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措施”，企图以“解困”来代替军转政策的全面落实。即便是这一“解困”政策，各地在落实中也是“短斤缺两”的。譬如：中央办公厅颁发【2003】29 号文明确规定“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的基本养老金，要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今后在国家统一部署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各地要继续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但是广大退役军官再次被欺骗，2004 年至 2007 年，四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都没有落实上述文件精神。

各级政府无视国家法律政策的存在、任意践踏国家法律法规的做法令人发指！

目前，国家对广大退役军官的思维是“解困”。那么，什么叫“解困”？“解困”是救济，是照顾，是可怜，是施舍。这种救济、照顾、可怜和施舍，是他们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的。以“改革”的名义，将企业军转干部变为困难群体，然后再来“解困”，广大退役军官对此感到悲哀和羞辱！

广大退役军官不答应！

广大退役军官的家属不答应！

一切拥军的中国人民都不答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共和国军人。为了国家的安全流血牺牲；国家困难时流汗奋斗；改革开放时又顾全大局、“克制”和“忍让”。

可以说：当年如果不是近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顾全大局、克制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委屈，改革能“改”的动、开放能“开”得了吗？

这就是革命军人博大的胸怀！这就是最可爱的人！

全国人民拥护你们，全国人民爱戴你们！

改革了，开放了，发展了，强大了，目的得到了，权贵者想卸磨杀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庄严维权，目的就是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十几年的严重侵权行为进行彻底的纠正，找回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一切待遇，为全国最大的冤案平反。广大退役军官的维权行为是合理、合法和正义的。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如果没有全国几十万企业军转干部前仆后继、庄严的、誓死的、必胜的维权信念；如果没有十几年来众志成城、气壮山河、持之以恒地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进行上访、申诉；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冲破有关部门非法的重重阻力甚至镇压；如果企业军转干部没有充足的、100%的理由----人事部等有关部委根本不会羞羞答答、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出台所谓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措施”。

出台“解困措施”决不是他们良心的发现，也绝不是他们发了慈悲，说穿了就是权贵者心虚、理亏！从根本上说明了他们对企业军转干部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如果他们没有错，为什么出台“解困措施”？既然承认错了，就要彻底纠正，给广大退役军官彻底平反！

什么叫彻底平反？彻底平反就是要恢复广大退役军官的尊严、名誉；恢复广大退役军官的政治、经济待遇；补偿因政策不落实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只有给全国广大退役军官彻底平反，才能真正保证国家平安、社会和谐。

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不顾企业退役军官当年用血肉之躯、青春血泪、抛家舍情，为了祖国的尊严、领土完整、人民的利益去流血，去牺牲，去奉献的事实，打着人民群众会攀比的挡箭牌，企图挑拨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何其毒也！

人民群众与谁攀比？是与穷困潦倒的企业军转干部攀比吗？绝对不是！他们首选是与一些饱食终日、高高在上、不问人民疾苦、极力倡导所谓“高薪养廉”的权贵者攀比；其次是与那些在高官显贵的保护下，依靠官商勾结、疯狂抢夺瓜分国有财产、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富豪攀比。

欠账总是要还的，任何人欠了人民的账，都要彻底清偿！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人民写的！

目前，退役军官中已有不少因为年迈多病、气愤冤屈而病死、老死、自杀、疯癫，但是，广大退役军官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值得我们中华全国一切受迫害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学习！

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你们为真理奔波、为权益奋争，激励了每个高尚的灵魂！

全国人民和你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追求公平、公正和尊严。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希望。

全中国一切要求维权的苦难同胞团结起来！让我们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坚持依法维权，进行合法的斗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视死如归、奋勇前进！

心贴心，手挽手，肩并肩，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属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坚持讨回公道，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华夏儿女、巾帼须眉，行动起来吧，伟大的共和国军人、亲爱的全国同胞们！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找回自己尊严，这就是人权！人权不是什么大道理！人权就是生活和尊严！

自尊！自强！我们要永远坚信：不管维权的道路多么坎坷、曲折，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终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潮流！

附件一：银川军转赵德福上访遭刑拘 妻病儿孤呼吁各界救助

12月18号，银川市军转人员赵德福的妻子罗华女士通过希望之声电台向社会各界求救，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因为上访被刑事拘留的复转军人赵福德。

12月5号，银川市70多名复转军人因为安置和待遇问题得不到落实，而集体到兰州军区上访。12月10号，赵德富被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抓走，以非法游行罪的名义被刑事拘留，现关押于银川市看守所。

本台记者18号接通赵德福家中的电话后，首先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音）。

赵福德的妻子罗英介绍说在部队工作了27年的赵德福98年转业以来没有工作、住房和医疗保险，现在一家三口每月只能靠600元的低保生活，丈夫还患有糖尿病，是没有活路了才去上访，现在被抓走，她只能带着一岁多的孩子艰难度日（声音）。

罗英说负责赵德福案子的是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孟长义和张建英，她呼吁当局释放她的丈夫。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方亮采访报导。

郭泉：民主先声 86：用纳税人税收建立的纪念馆，只能纪念人民追求民主解放的历程

今年夏天，我作为“和谐中华•民族之花江苏赛区”负责人率队到北京参加总决赛，赛事之余，我和队员穿着我亲手缝制的汉族本民族服装“汉服”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游览。

我们以天安门为背景拍照。背对着天安门，面前的一座建筑让我思考良多，这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身边走过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他们的苦难不只是写在他们的上访信件里，更写在他们脸上；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衣衫褴褛的乞讨者向我们伸出求助的手。看到这些苦难的国民，在看看这个奢华的私人纪念堂，我就在想，每年维修这个纪念堂的数百万上千万的费用要是用于救济国民，那该多好啊！

人民的血汗钱，怎么可以让一个死人垫在尸体下呢？而活人却在街头流浪，在“马家楼”受折磨！想到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独自神伤。

家天下时代，帝王再伟大究其根本也只是为了他的家族的荣耀；党天下时代，党主席再伟大，也只是为了他的党团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鱼肉百姓，只是为了愉悦。他们一切的荣耀都是以人民的苦难为代价的。权贵者的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伴随着无数百姓的愁容和泪水。

这个时代必须结束！

用人民的纳税来满足专制者身前威福、身后纪念的时代必须结束！

用纳税人税收建立的纪念馆，只能纪念人民追求民主解放的历程！

一切私人的纪念堂，都只能由他们的后代私人出资。

2007 年 5 月 10 日，台湾人民经过 17 年的奋斗，终于将“中正纪念堂”正式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历史的胜利！民主的胜利！

原“中正纪念堂” 所在基地的街廓范围历经清领、日本殖民时期至 1961 年，旧地为“营边段”，过去曾为陆

军总部旧址。1975 年 4 月 5 日蒋先生逝世，行政院成立筹备小组，决议结合民间捐款及政府出资并拨用国有土地兴建“中正纪念堂”。

这就是用人民的纳税用于私人纪念的明证。中国的毛泽东纪念堂也不例外。党天下的专制统治，其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行政院的筹备小组经甄选海内外建筑师之设计后，于 1976 年 10 月 31 日动土施工，1980 年 3 月底完成，并于同年 4 月 5 日正式对外开放，整体建筑设计以中国传统帝王建筑风格为其特色。

1990 年春，野百合学运在此开启。这是一个伟大的改变台湾宪政历史的学潮，与中国的八九学潮的意义一样伟大。从此，不论是民间团体或各政党所发起的一连串台湾民主游行、社会运动，大都以此地为出发或汇集地，中正纪念堂成为大多数国人见证台湾民主化发展的共同回忆。

为纪念并彰显台湾民主发展之历程，在台湾人民长期不懈地呼吁与坚持下，2007 年 5 月 10 日，台湾政府终于顺应民意，将“中正纪念堂”正式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中正纪念公园也更名为台湾民主公园，整体命名为台湾民主纪念园区。

台湾民主纪念馆的设立，将展示台湾人追求民主的艰辛历程，并藉由相关活动史料、文件、影像数据的展示与教育推广，共同珍藏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发展与成果价值。让台湾民主纪念馆的成立，达到促进历史和解与记忆共存的目的，为台湾民主前进注入新的生命力。

台湾人民的是伟大的人民。决定开放党禁、解除报禁的顺应民意还权于民的原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也是伟大的政治家。 因为，他们在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终于认识到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否则，这个政党就丧失了存在的人民基础，而蜕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欺诈人民、剥削人民的人民公敌！台湾人民万岁！台湾民主万岁！

郭泉：民主先声 87：我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2007 年 12 月 14 日，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林振山教授向我递交了《关于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决定》，称我“于 2007 年 11 月上旬在网上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给胡锦涛、吴邦国发出公开信，宣扬要在中国实施西方的多党竞选政治制度。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相关条款。……为坚持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和严肃盟的纪律，本委员会决定给予郭泉开除盟籍的处分。”

他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劝退我，称“开除我政治成本太大”。而我认为我自退的成本更大，于是，我当然坚持“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

其实，我对目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进行过周密、精细的计算，我甚至对我的所有政治文章的措辞的激烈和温和程度，以及我对内对外的性格态度都进行了准确的论证。但是，我却没有计算到民盟居然会愚蠢到开除我。这不是因为我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而是我实在高估了对手的智力，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如此重大事件上，对手竟然如此不堪。只要他们能稍微计算下开除我的政治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可以立即作出合适的行为判断了。可惜，他们根本没有思维或是根本没有独立思维。就象我们上街买菜，看中了某样菜，我们一定想到是如何进行讨价还价，但是我们绝对想不到对方会说“免费奉送”或“有价不卖”。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对我的开除决定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自杀行为。

他们的这一自杀行为，将使得中国民主同盟在 21 世纪的中国民主运动中丧失其伟大的历史遗产，丧失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等一大批伟大领袖视死如归、坚持终生的用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灵魂”。这一行为，将使中国人民再次体悟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从独立政党到“花瓶”再到“儿党”、最后堕落成“中共的民主党支部”的可耻历程。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是民盟不会计算，而是他们背后的那个鬼魅计算错误，或者就是直接想要这个结果。因为，开除的决定，对民盟来说是极端不经济的。但是，好笑的是，这个决定对民盟背后的那个鬼魅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鬼魅也许会认为，倒霉的是民盟而已不是鬼魅。其实，鬼魅的如意算盘也打错了。这只会向全国人民彻底暴露其邪恶本质。

我曾建议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林振山教授、副主委余多慰教授和于正副研究员，我说开除我对民盟不利。他们也表示开除我的政治成本太大。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复杂，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林振山教授甚至还表示对被引进到南师大感到后悔，他说，如果不来南师大，就不会遇见如此棘手的事情了！他和我是南京大学校友，都是在 2001 年被引进到南师大的。我是 1999 年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到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我 2001 年被引进到南师大文学院，林教授同年被引进到南师大地科院。

民盟开除我的消息被我封锁了 3 天。这三天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一直在思考是否要公开这个事件，期间对这个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的未来处境也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但是，最后考虑到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为了 21 世纪中国的民主事业，为了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我决定公开这个事件。公开这个事件的目的在于，让国人认识中国

的执政党及其帮凶是如何打击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和民主思想的。我的七份公开信以及政论文集《民主先声》都是提倡人民当家作主的，都是提倡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都是提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思想不对，而你们的专制独裁对，那好，我们来一个全民公投呀，看看你们到底能得到多少选票！

为什么不公投呢？怕什么呢？是怕人民不投你们的票吗？是的，这就是你们反对“票决”的根本原因！于是你们只提倡你们的“党决”，反对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面对这样的反人民的执政思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直、高尚的人都必然公然与你们决裂。我本不是共产党，如果是的话，我一定主动退掉这个党。但是我以前是这个党的预备组织的成员。虽然，已经超龄了十几年了，早已不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了，还是声明一下退出好。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郭泉：民主先声 88：中国新民党党章暨施政纲领

中国新民党党章

暨施政纲领

一　缘起和名称

中国新民党由全国工人、农民、军人、教师、民族商人等多行业的维权组织在实际维权过程中，觉悟到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目前执政党的一党专制，而自发成立。

中国新民党原名“中国民生党”，是一个由多个无实际指导思想的松散的维权群体组合而成，大约形成于 2004 年底，但并无确切组党时间和文字记载。“中国民生党”着力关注并解决各自群体自身的维权问题。成员多为苦难的中国公民，人数相对稳定在 1000 万人左右。

2007 年 12 月 17 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民主知识分子加盟，并建议“中国民生党”更名为“中国新民党”，即刻得到同意。

中国新民党，名称涵义其一为区别于被中国人民嗤之以鼻为“花瓶”的旧（伪）“民主党”。名称涵义其二为启蒙民主思想，使国民思维日新月异。语出《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二 宗旨和目标

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

民主党，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中国新民党反对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主张多党竞选、司法独立以及军队国家化等民主理念。

中国新民党在民族、民生、民权三方面的指导思想是：

民族方面，在反对专制、反对迫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实现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捍卫民族文化，推进国学教育。倡导并逐步实行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思想。

民生方面，努力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民主体制即人民不能选择执政党，人民的生活是无法得到根本保证的。专制主义和专制权贵者，无时无刻不在压榨人民和侵吞国家财产。

民权方面，中国新民党捍卫天赋人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民权理念。民权是民生得以发生的基础。没有民权，民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而民众只能嗷嗷待哺，等待专制政府拯救，而不是自己栽种生命的花园。民主制度的内在理念是“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是民众通过选举过程，按照宪法赋予政府的。民众手里的选票，一人一票，是制度层面上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最根本制约。

中国新民党承诺与中国人民一起，奋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誓言在人民的选举和监督下，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中国新民党誓言惩治一切危害人权的犯罪行为，取缔一切反对人权的专制罪恶思维。

中国新民党的宗旨为：社会总财富除用于国防、国民公共建设外，必须按劳分配给全体中国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人民实现这一天赋权利，实行“多党竞选”的政党政策。

中国新民党愿意接受人民的选择，始终与中国人民一道，捍卫自由民主这一普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全力

倡导并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

近期目标：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终极目标：实现人民可以自由组党并实施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

三 与中国各党之关系

中国新民党主张建立组党、结社自由的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

在这一体制建立前，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一切积极推动结束专制政体以建立民主宪政政体的政党合作。在这一体制建立后，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一切依法注册登记并合法发展的政党保持正常关系。

中国新民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国新民党与中国各党之关系为竞选关系。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国新民党在与其他各党的竞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将是中国人民。

中国目前的政党略分为二，一是捍卫“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政党，诸如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共承认存在之“民主党”各党；二是反对“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政党，诸如中国新民党、中共不承认存在之其他民主党（包括目前流亡海外的各民运党派和组织）、港澳台三地各党。

捍卫专制的政党里，前者是完全的专制独裁者，后者是被胁迫而成“花瓶”的所谓的“参政党”。因此，对此两党应该区别对待。

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但是，共产党员中也有被蒙蔽的正直善良之士，并不都是血债累累的罪犯。尚无罪恶的中共党员愿意加入中国新民党的，应该向中国新民党郑重提交其书面退党声明。

经人民控诉，司法检控、审判而获罪的中共党员不得加入中国新民党。

中国新民党最近获悉，中国共产党中的没有被泯灭良知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开始秘密组建中国共产党新党。中国新民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由从来没有过对人民犯罪的共产党员自发组建的共产党新党，只要其不再坚持“一党专制”，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新党展开竞争，接受人民的选择。

中国新民党坚决支持中国全境和境外（港澳台各政党、流亡海外的各民运党派和组织）的民主党反对“一党专制独裁统治”。中国新民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主张，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朋友。

一切反对民主，捍卫专制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敌人。

四 与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之关系

中国新民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捍卫人民利益。

中国新民党认为，一切出生在中国的人，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除非本人书面声明放弃中国国籍，均终生获得中国国籍。中国新民党反对目前政府认为只要加入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政策。

中国新民党热爱一切学习、工作、生活在中国的反对专制、支持民主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一切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多党民主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

中国新民党希望中国各行业都有独立工会，并愿意为全国所有行业的独立工会的成立和运作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中国新民党支持一切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海内外宗教组织自由在中国开展宗教活动。

中国新民党支持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在中国进行各自宗教的信仰崇拜活动。谴责并以实际行动反对一切限制和镇压任何种类的宗教公开或家庭聚会的邪恶专制暴政。

中国新民党谴责并反对专制暴政用其专制政党利益来任意界定“邪教”、并镇压宗教组织和信仰人士的反人类罪行。

中国新民党认为未经民主制度下的司法检控和审判，任何宗教均不得被判定为“邪教”。

但中国新民党坚决贯彻当代国际普遍实行的“政教分离”的民主制度原则。

五 与台湾之关系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十分关注的大事，也是中国新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中国新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与台湾实现民主统一。

台湾所有的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大陆民主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台海两岸政体上完全对立。目前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

中国新民党认为，不实行民主宪政，台湾就永无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性。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

一是除非台湾军队先行攻击大陆，否则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大陆军队在任何情况下的先行攻台军事行为。

二是中国新民党坚决不承认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独立出去。但中国新民党会以各种形式与台湾各政党进行友善民主磋商。以期与台湾各党各界人民达成民主统一中国的共识。

三是可以与台湾各党各界人民进行政体上的联邦宪政思路的广泛讨论和公投。

六 与各国之关系

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无非两种，一是自由民主政体，一是专制集权政体。

20 世纪以来，多党民主竞选政体其实就是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形式——自由民主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

这种形式的国家在 20 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且仍继续增长。

中国新民党认为，自由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核心和历史终点。自由民主制，正是《大学》首句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至善思维”和“至善行动”。中国新民党认为，只有在这样的至善体制下，中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而专制集权政体的国家因为不符合人民的内心要求和世界民主化浪潮而越来越少。专制集权政体有多种形式，例如军政府国家（如缅甸）和共产国家。

共产国家目前全世界还剩下四个国家，即中国、朝鲜、古巴和越南。最近，越南的民主政改加大了力度，从其政改方案看，已具备了从专制集权政体全面和平过渡到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条件，转型指日可待。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全世界一切自由民主政体国家里的所有反对一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接受一切来自民主国家的帮助，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目前还处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里的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帮助他们终结他们国家的专制统治。

中国新民党特别关注和美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必须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民主宪政。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巨大。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组建的美国民间航空志愿兵来到中国与日本飞机空中鏖战以及战争后期的驼峰航线，使得任何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在坐落在南京的“航空烈士墓”前流下高尚的眼泪。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建设、台海统一也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离不开美国。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中国新民党也特别关注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如果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发布谢罪公告、妥善解决诸如战争赔偿、财产归还、国土返还（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在中日两国已经完全成为朋友、并不危害任何第三方的前提下，可以由中日牵头，联合亚洲各国商讨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中国新民党认为，21世纪亚洲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正在形成。如果日本在谢罪、赔偿和返还等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将使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完全成熟。

但如果日本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固执己见，继续霸占我钓鱼岛领土，本党将联合海内外华人的一切爱国力量，使用一切手段与日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关钓鱼岛的国土争夺斗争。

七 党团注册、党员登记、党部设立和党主席选举

目前中国之宪法，虽有“结社自由”之条款（“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人和世界一切明晓中国事务的国际友人都知道这个“结社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汲取早些年要求申请登记注册的其他民主党先后遭遇残酷镇压的经验教训，中国新民党决定以中国开放报禁、解除党禁这一历史事件为分界线，实行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中国新民党活动政策。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设立任何形式的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和县市党部。但在海外设立中国新民党（各国）党部。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寻求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团注册工作。但在海外各国均应申请注册，以利于开展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工作。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员登记工作。但在海外进行严格的党员登记工作，包括党员申请、审查审批和宣誓入党工作。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大陆，目前为完全开放的民主党。任何人，无论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只要反对专制、要求并支持民主，皆可自行宣称为中国新民党党员。

中国新民党党员目前在大陆的工作，就是用一切手段对民众宣传民主思想。中国新民党海外各党部的工作是带领海外党员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政治主张，寻求各民主国家民主政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积极配合中国新民党在国内民主运动的最新形势。

中国新民党将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后，依法进行党团注册、党员登记（接受申请、审查审批、宣誓入党）工作。党员登记的基层单位为各县市党部。登记工作全部完毕后，进行各级党主席竞选。

任何党员都必须首先归属县市党部。中国新民党任何党员皆可参选县市党部主席。

各县市党部进行民主选举产生的县市党部主席，参加省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各省党部主席参加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海外各国的中国新民党党部也照此执行。

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各国）党部主席与中国新民党大陆各省党部主席的地位平等。

海外各党部主席必须回国参加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各县市党部主席各省党部主席如被民主选举到上一级党部担任主席的原党部重新进行新主席的民主选举工作。

中国解除党禁前，中国新民党代主席由中国公民郭泉先生出任。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和海外各党部民主产生的各党部主席，如有一切不适合担任引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品行操守问题，皆应立即解除职务。

未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席、省党部主席、县市党部主席或任何中国新民党党员，如参加政务竞选，成功当选政府各级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为其个人、家属亲戚或中国新民党各党产部门谋取利益。

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执政党的一切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

八 党的日常学习和活动

中国新民党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学习、实践和宣传民主思想是中国新民党最重要的工作。

所有中国新民党党员都要深刻认识到惟有民主才能拯救中国。而未来民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我们今日的努力宣传。中国新民党在目前阶段的近期目标是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新民党目前之主要工作是宣传。

中国新民党的学习宣传文件目前为：

1、 中国新民党党章
2、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所有公开信
3、 民主时评集《民主先声》

中国新民党的活动，目前在大陆的思路继续是“以维权促民主”、“以民生求民主”。切实作好每个维权个案，总结提高。在实际维权工作中，把民主思想灌溉到每个维权人员的心灵深处。努力做好具体细致的“21 世纪的中国和平民主革命”（参见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告中华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同胞书》）的宣传发动工作。

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各国党部，目前的活动以联络各国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为主，广泛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和政治主张。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中国即将进行的全民参与的“21 世纪的中国和平民主革命”，争取各国人民的声援和财物支持。

中国新民党的国内外党员都要有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的精神。并肩作战，奋力工作，争取早日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九 党费、党产和支出

中国新民党反对目前中国执政党使用人民纳税来供给党务开销的政策。

中国人民不仅要养活一个庞大的政府公务员的队伍，而且还被迫养活人数众多的中共党团委、伪“民主党”的专职党务人员。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制国家人民都无法接受的邪恶政策。

党政必须完全分开。

任何党（包括执政党）的党务活动都不可以使用人民纳税，而只能使用本党党员缴纳的党费、党产和合法的社会捐赠。

中国新民党的经费来源略分为三：

1、中国新民党党员缴纳的党费（因为各种原因经济拮据的党员免交）；

2、自愿以厂房、商场或其他经营形式缴纳党费而形成的党产收益；

3、一切不违背竞选法律的、合法的国内、国际社会捐赠。

中国新民党的经费使用分为三个途径：

1、支付各党部办公经费（包括房租水电通讯、设备购买维修、宣传活动场地费等）和人员工资。

2、各级党部主席的竞选费用的公共部分，例如会议场地的租用、新闻发布会的费用。但参选人各自的竞选宣传费用自筹。

3、各级党部主席代表中国新民党参加的社会政府官员的竞选活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鉴于目前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不寻求党团注册和党员登记，中国新民党中国境内之党员不缴纳任何形式的党费。但中国新民党（海外各国）党部在严格办理党员登记工作的同时，自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党费标准，但必须造册登记备查。（全文完）

郭泉：民主先声 89：拯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迫害一人即害全体人类

任何一个残酷的时代，任何一个悲惨的宏大历史事件，都是从对单个生命体的蔑视和对社会个体苦难的漠视开始的。这种蔑视和漠视的叠加和累积，必将导致整体性的迫害。这是任何一个在专制体制下遭遇欺凌的人都可以直接感受的事实。

当一个执政党或这个执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开始蔑视单个生命体的生活遭遇，开始漠视社会个体在专制体制下的苦难，那么这个执政党和政府就是在迫害整个人类了。这样的执政党必然遭遇人民的控诉和反抗。

但是，这样的执政党却总是认为自己是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的，而把对其控诉和反抗的人，视为“犯上作乱的刁民”和“思维不健康的精神病患者”。

其实，在民主时代，公民都可以监督政府、都可以表达意见，都可以要求政府正确对待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哪里需要“犯上作乱”呢！民主时代，不是政府担心人民“犯上作乱”，而是人民有权有能力有手段防止政府“犯下作乱”。

再次，把专制思想当成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思想的执政党和政府，当然看不得人民有反专制的思想了。“伟光正”把要求民主权益的人民打成“思维不健康的精神病患者”也就是不奇怪的事情了。于是一切与专制思想相悖的民主者、信仰者、维权者都被“伟光正”送往监狱或精神病院，或造谣说其是精神病或“大脑不正常”。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个案，就知道一个善良正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怎样被专制政府逼成“伟光正”认为不正常的访民的。

于佃荣，1947 年 4 月 20 日生，连云港市大浦人。15 岁母亲去世，20 岁父亲去世。1965 年参加工作。1970 年 2 月 10 日被武装部抽调到北海舰队第八国防工地参见国防秘密建设。四年后回连云港。1974 年 5 月到盐区砖瓦厂工作（就是现在的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该厂被多次改名）。1977 年 5 月 25 日在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工作时发生事故，造成右臂被截肢（4 级工伤）。却依然被连云港市民政局强迫从事极重体力劳动－－－石灰窑烧窑工。一直干到 2002 年 4 月，但从未享受过工伤待遇。

该民政局直属企业还把于佃荣 1965 年 1 月至 1974 年 5 月期间工作的原始档案弄丢。现在只有武装部、当时的武装部部长、1965 年工作的单位出具的证明。民政局假意承认于佃荣这 10 年工龄，将于佃荣问题推给劳动局。而劳动局以没有原始档案为由不予承认这 10 年工龄。02 年，可怜的老于开始他的访民生涯。

从 2002 年 6 月至 2005 年 2 月，他给中国各级政府写了 96 封上访信。后又花了很多时间、金钱打听这些信的下落。给北京打电话，北京说信转到省里了；给南京打电话，说，信转到市里了；给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说，转到市信访局了；给信访局打电话，信访局说，转到市劳动局了；找市劳动局，市劳动局说没收到；又找市信访局，信访局说，那就转给市民政局了，我们不留信；找民政局，民政局说收到了。问：怎么处理？民政局答：劳动局不作为，你去找劳动局；重新复印材料到劳动局上访，劳动局又把这件事推给民政局。

2006 年 3 月 3 日，于佃荣又写了 4 封上访信，分别是：第 97 封给了连云港市委王建华书记，第 98 封给了连云港市政府刘永忠市长，第 99 封给了江苏民政厅赵顺盘厅长，第一百封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老于还打了无数的电话，结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的对他说：“领导对你的事很关心、很重视、已经批示转下去了！”连国家信访总局的官员都这样回答：“你给总理的信我们收到了，领导很关心、很重视、已经批示转下去了！”

2006 年 4 月还是没有得到答复，于佃荣开始搜集各级政府、各级党委、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各级媒体、各级正义组织、各级正义人士、各级社会名流等人的地址并向他们发出 1000 封以上的求救信、求助信。其中的一份求救信就到了我的手里！现在我帮他控诉这个残酷、罪恶的社会！

这样苦难的人都不拯救，这个政府还有存在的任何理由吗？拯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一切善良皆源出于此！迫害一人即害全体人类，一切罪恶皆咎由于此！

郭泉：民主先声 90：为复转军人维权英雄赵德福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通知

为复转军人维权英雄赵德福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救第二号令）

本案案情：

12月5号，复转军人赵德福与银川市70多名复转军人因为安置和待遇问题得不到落实，而集体到兰州军区上访。12月10号，赵德福被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抓走，以非法游行罪的名义被刑事拘留，现关押于银川市看守所。家中的孩子发烧住院，急需帮助。

维权英雄赵德福的银行卡号是：　农行：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福

目前之中国，最苦难的人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复转军人。

目前之中国，最伟大的是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复转军人维权的人。

目前之中国，最邪恶的是殴打关押杀害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复转军人维权的人。

目前之中国，最让人愤怒的是让无数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复转军人苦难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

为了表彰所有因为维护人民的生活权利而被捕入狱的维权英雄们，为了让在监狱里服刑或走向刑场的维权英雄们无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更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投身维权的第一线，启动对被关押和被杀害的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

本程序为：

1、当出现维权人士被警察非法劳教、劳改的事件，其家属立即提供维权英雄或其配偶、父母、直系子女的旧有或新办的银行卡号给郭泉。

2、由郭泉统一发布“为维权英雄（某）的募捐一事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3、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打卡金额，最少50元，上不封顶。

4、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奋力转发此信息，力争迅速传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权英雄的作为，争取更多的国民救济。

5、维权英雄家属应当根据实际处境，定期告知善款到帐金额。

希望中华全国全体人民都来接济被迫害的人民英雄，让他们的家属得到最好的经济补偿。一人募捐50元，1万人的募捐就是50万。2万人的募捐就是100万。

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不仅要得到荣誉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同时，还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奖励。

为中国的民主和幸福而奉献牺牲的人，理应得到来自中国人民的丰厚待遇。

最后，郭泉恳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要阻挠维权英雄家属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来自全国人民的国民救济。如果发生任何阻挠事件，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承担。

附件：国救字号“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启动一览表

1、 国救第一号令（李国宏）邮政储蓄卡号：6221886530061797032，户名：皮运霞

2、 国救第二号令（赵德福）中国农行卡号：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福

郭泉：民主先声91：“中国化学化趋势”下中国人民对中国专制集权统治的反抗

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涨，原生态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日常需求。于是人类发展了重工业和化工产业。汽油等石油产品使得人类享受了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塑料涤纶弥补了棉麻的不足。这一切使得化工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化工产品的成品和制作过程都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发达国家由于最早生产这样的产品，于是也最早遭遇毒害。于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反对本国政府在本国生产有毒的化学工业产品。他们充分运用民主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行动。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在人民的压力下，撤消或销售掉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

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胜利其实是完全得以于民主体制的。因为如果政府不答应撤消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人民完全可以用手里的选票把执政党选下来。于是在有毒化学装置和执政党地位之间，执政党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有毒化学装置。

其他不发达的民主国家的人民也使用他们手里的民主权力反对政府建设有毒化学装置。

最可怜的是生活在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这些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专制集团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如此众多的有毒的化学工业。例如，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地区（南京、厦门、海南等）竞相上马了PX项目。PX全称“对二甲苯”（para-xyl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国际有关化学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人类居住地100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巨大危险性，而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没有民主监督的专制集权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只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中国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而专制集权集团却无须担 心中国人民投中国政府的反对票，因为中国人民手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就是专制集权者“钦定”了一些拥护专制集权的所谓的“选民”欺骗中国人民的把戏而已。

中国的专制集权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PX（对二甲苯）和PTA（对苯二甲酸）属于芳烃，为无色透明液体，有刺鼻气味。厦门海沧区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和南京的扬子巴斯夫化学公司周围数公里都能看到烟囱里飘散的白烟，闻到含苯的化学品的刺鼻味道。PX和PTA是对人体危害最严重的有机化工原料，最初级的原料是石油。国内市场对PX有巨大的需求，百份八九十用来生产聚酯原料，做成涤纶产品，供应给纺织企业。整条产业链大致如下（PX和PTA处于中间位置）：石油—→石脑油—→对二甲苯（PX）—→对苯二甲酸（PTA）＋乙二醇（EG）—→聚酯切片（PET）—→“涤纶长丝（PFY）”或“涤纶短纤（PSF）”

具体来讲，这些“中间体”包括苯、甲苯等有毒的芳烃，硫化氢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与PX项目同时开工的还有翔鹭石化年产150万吨PTA（对苯二甲酸）二期项目。PTA是通过把PX氧化结晶分离干燥，进一步制成的，在

此过程中，会生成乙酸甲酯、乙酸、溴蒸汽。厦门海沧区居民每天呼吸着 PX 和 PTA，有婴儿半夜里被这种气味刺醒而哭闹，甚至许多成年人因此失眠；学生早起时咽喉干痛；孕妇们不敢住在这里；附近的村民受害更深……他们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但都石沉大海。

在 PX 生产过程中，要用到高毒、高致癌、且会造成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的苯，和甲苯（中毒者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虽然两者都是在封闭的反应塔中循环使用，但中国人民所担心的爆炸和泄漏事故并非没有“万一”发生的可能。且不说 2005 年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留意一下相关新闻就会发现，化工厂起火爆炸、化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泄漏并造成恶性污染的事件正日益增多。

厦门的PX项目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厦门人民由于没有民主体制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不得不用全体市民到市政府门口“集体散步”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意愿，最后迫使该装置“缓建”。

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类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专制集权阶级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例如，2006 年国家发改委专门出台了《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以显示对中国政府而言，增加 PX 产能也是一项重要国策。《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表明：“PX 消费量的猛增，首先缘于化纤工业的迅速发展，其动力又来自国内纺织业的扩张。化纤已取代棉花成为第一大纺织原料（2005 年占纺织纤维总产量的 60%）。结果，PX 的进口量由 2001 年的 17 万吨飙升至 2006 年的 184 万吨（占消费量的 42%），年均增速高达 61％。国际市场上 PX 价格不断上涨。今年 6 月更创下新高，达到 1248.8 美元／吨，同比上涨 18.9％”。

2006 年由于这一国家发改委《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的出台，而被国人视为“中国化学化趋势”的开端。

中国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但是，2007年，厦门人民开始反抗“中国化学化趋势”。最早反对在厦门市兴建PX化工项目的，是中科院院士兼政协委员的赵玉芬女士。2006年，赵玉芬等6位院士联名致信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但多次交涉无果。两会期间，由赵玉芬院士牵头，105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要求该项目停建和迁址的议案。赵玉芬女士指出，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

相反，中国政府的无良学者和无良政府官员立即站出来为专制集权的“GDP 主义”辩护。例如，在动工典礼上，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在致辞中表示：“这是厦门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对提升海峡两岸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当地经济总量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市环保局局长谢海生说：“PX 不是剧毒，我们组织了大批专业人员查阅了国内国外的资料，还没有发现 PX 会致畸、致癌的报道。”

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目的都是追逐利润供集团消费，而非满足人民的需要。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为了他们的私欲而不顾人民死活，尽其所能地增加经济总量（GDP），导致了对自然界竭泽而渔。胡温当局的“科学发展观”完全是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中国的专制集权统治者利欲熏心，其对中国人民的破坏性的资源掠夺所酿就的环境危机，不仅毫无改善的迹象，而且大有勇往直前、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气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或是治污工程之类的小修和大补，都远远赶不上渴求利润之血的资本加速的破坏。于是，中国的专制统治集团一口吃下了被西方民主国家人民驱逐出来的化学污染。当然，高官巨贾们是不要“吃化学污染”的。他们可以易地而居，或以美国加拿大澳洲为归宿，但是南京、厦门等地的人民却要世世代代把化学污染“吃下去”。

于是厦门人民在李义强先生的发起下开展了一次“黄巾军起义”。2007 年 5 月底，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反对建设高污染项目，这条短信先介绍了 PX 的危害，结尾呼吁市民“参加万人集体大散步，时间六月一日上午八时起，由所在地向市政府进发！手绑黄色丝带！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这一短信，最终促成市民接连两日“大散步”。2007 年 6 月 1 日和 2 日，两万以上的厦门人民连续两天上街“集体散步”，迫使厦门市政府承诺缓建 PX 化工项目，重新进行区域环境评估。

我从7月开始在南京的门户网站“西祠胡同”上号召南京人民抵制南京的PX。南京px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栖霞山附近（南京炼油厂的厂区），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饮水就发生问题。离此装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的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3公里，

大学城里有10所全国重点大学。炼油厂的生活区里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px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装置一运行，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

结果我在 9 月被南京警察找“谈话”，他们一方面承诺“保证有毒化学物质不会泄露”，一方面关闭了我在“西祠胡同”上所有的关于南京 PX 的讨论文章，并封掉了我在“西祠胡同”上的 ID（注册网名）。

于是，我把南京 PX 写进了我的关于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公开信，于 11 月 14 日发给了全国人民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呼吁人民高度关注专制统治者的这种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本民族未来的犯罪行为。号召中国人民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有效地抗议活动。

日前，福建省召开了省委所有常委参加的专项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决定迁建厦门 PX 项目，预选地将设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同时，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层官员当晚已同翔鹭集团高层初步达成迁建意向。

有评论指出，这是一场民意的胜利，这是厦门人的胜利。甚至，中国最著名的一张报纸《南方周末》还把“厦门人”这三个字遴选为 2007 年最有影响力人物的候选人名单里。但是，漳州市人民不答应了！

漳州市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呼吁说：“太过份了！现在这个工程居然决定在漳州古雷兴建！人命有贵贱吗？漳州人民的命难道不如厦门人民的人命值钱吗？对厦门会有影响，对漳州也一样会影响的，怎么可以这样不顾民众健康，执意兴建呢？

郭泉：民主先声 92：在 21 世纪还在搞一党独裁的执政党才犯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昨天（2007 年 12 月 28 日）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通知我“胡佳被逮捕”。我说：“我知道他 27 日下午就突然从 skype 上消失了，他所有的通讯工具都接不上。我知道他那里有情况了，但是没想到是逮捕。”

说实话，我百思不得其解。32 岁的胡佳是中国最著名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人士，经常到爱滋病的重灾区河南上蔡县等地为病患提供帮助，例如送钱、送衣服、送玩具等，深受艾滋病人和爱滋孤儿的爱戴。

胡佳的爱心活动，使中共当局感觉“丢了脸”，中共当局生怕胡佳揭露出的爱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的情况，会破坏“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经常把胡佳抓起来，一关就是一个月；中共警察们还时常殴打胡佳，享受拳头打在肉体上的快感。连胡佳的爱人金燕在医院生孩子，胡佳去送饮食，警察先生们都惟恐饭盒里送的有关爱滋病患者的情报，在医院门口殴打可怜的胡佳先生。

但是，说胡佳被逮捕，这实在把我闹糊涂了。我实在想不到这样一个被中共当局任意欺凌的老实厚道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人士，竟然中共当局也能找出罪名来逮捕他。

晚上上网，我看到“胡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我不禁笑起来，笑出了眼泪。

首先，我要祝贺胡佳同志终于从帮助爱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英雄成长为民主革命英雄了。这个过程他走了很多年。

其次，我也要感谢中共当局让中国的人民英雄越来越多了。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胡佳有过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想法。他最多只是和我一样反对专制而已。我记得他评价过我的“21 世纪全民和平民主革命的新形式”（在家革命），他说“郭泉教授倡导的全民在家革命新形式，如果我们真正落实好，别说七天，估计两天专制就垮了。”他的评论是正确的，因为我计算过，如果真正落实好，全国一天的损失会达到几百亿。

但是，就是他对我的这个评论也不至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逮捕呀。

下面我们要来谈谈“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

那么什么才叫国家政权呢？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权是由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与共产党无关。所以，一说到“颠覆国家政权罪”，往往有人马上认为反对共产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完全不正确的。

其实根据中国《刑法》反对中共并不构成任何罪名。宪法虽然规定了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只是指反对后两项，即指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也就是说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本没有关系。

那么什么才叫人民民主专政呢？很显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那么什么才叫社会主义制度呢？很显然，人民共同致富，全民福利的社会制度才叫社会主义制度。

于是，我们也就清楚了，我和我的老友荆楚先生以及胡佳先生是在反对一党专制、反对经济压迫、提倡全民福

利的，这恰恰是在要求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行为，立即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而那些提倡和捍卫一党专制、经济垄断的集权统治者才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郭泉：民主先声 93：中国新民党新年贺词：告全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书

中国新民党是一个无国界的政党。任何支持中国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提倡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自愿加入中国新民党。

即将到来的 2008 年，将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

在这个开端的一边，我们将告别专制，另一边，我们将迎接民主的光临！

中国新民党祝愿中国人民早日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里。

中国新民党祝愿全世界各国安定和谐，祝愿全世界各国人民安康幸福，在各自的国度享受自由民主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中国新民党还祝愿全世界各国人民能充分享受到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民带给全世界的丰硕的物质和文化产品。

2008 年，中国新民党将在全世界一切有华裔居住的地方建立各国党部。并将在此基础上，与全世界一切支持民主制度的国家和人民一同缔造一个“世界民主同盟”。

2007 年 12 月 17 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民主知识分子与中国劳工大众结盟，成立“中国新民党”。中国新民党，名称涵义其一为区别于中国目前之旧（伪）“民主党”；名称涵义其二为启蒙民主思想，使国民思维日新月异。语出中国经典《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无非两种，一是自由民主政体，一是专制集权政体。

20 世纪以来，多党民主竞选政体的国家在 20 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且仍继续增长。

中国新民党认为，自由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核心和历史终点。自由民主制，正是《大学》首句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至善思维”和“至善行动”。

中国新民党认为，只有在这样的至善体制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世界才能和平安全。

专制集权政体的国家因为不符合人民的内心要求和世界民主化浪潮而越来越少。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全世界一切自由民主政体国家里的所有反对一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接受一切来自民主国家的帮助，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目前还处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里的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帮助他们终结他们国家的专制统治。

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民主党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中国新民党愿意和中国人民一起，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实现民族和睦、生活幸福、主权在民

中国新民党在民族、民生、民权三方面的指导思想是：

民族方面，在反对专制、反对迫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实现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捍卫民族文化，推进国学教育。倡导并逐步实行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思想。

民生方面，努力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民主体制即人民不能选择执政党，人民的生活是无法得到根本保证的。专制主义和专制权贵者，无时无刻不在压榨人民和侵吞国家财产。

民权方面，中国新民党捍卫天赋人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民权理念。民权是民生得以发生的基础。没有民权，民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而民众只能嗷嗷待哺，等待专制政府拯救，而不是自己栽种生命的花园。民主制度的内在理念是“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是民众通过选举过程，按照宪法赋予政府的。民众手里的选票，一人一票，是制度层面上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最根本制约。

中国新民党承诺与中国人民一起，奋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誓言在人民的选举和监督下，与世界人民一道，惩治一切危害人权的犯罪行为，取缔一切反对人权的专制罪恶思维。

中国新民党的宗旨为：社会总财富除用于国防、国民公共建设外，必须按劳分配给全体中国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人民实现这一天赋权利，实行“多党竞选”的政党政策。

中国新民党愿意接受人民的选择，始终与中国人民一道，捍卫自由民主这一普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全力倡导并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

2008 年，中国新民党将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中国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2008 年，中国新民党将奋力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中国“鸠占鹊巢”的情景。人民才应该是中国的主人，可是现在，仆人却对主人任意欺凌。

2008 年中国新民党将让中国人民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民主制才能救中国；

2008 年中国新民党将让中国人民深刻知道，只有“实现人民可以自由组党并实施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才能使中国国泰民安、世界和谐安全。

2008 年，中国新民党将让全世界看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诞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美丽的也是艰辛的。欢迎光临革命现场！（全文完）

郭泉：民主先声 94：共产党一直认为大学是为共产党培养一党专制接班人的地方

07 年的最后一天，我的美国记者朋友 Mara（汉名：马语琴）给我电话，她代表美国纽约的 New Republic 周刊来采访我。我欣然接受了采访。

虽然她在上海生活了很久，汉语很好，但是我还是担心她无法准确地记述和理解我的话语，所以我决定让她出问答题，我作书面回答。于是，她在 08 年的第一天，给了我 5 个问答题。现把答题纸呈献给大家：

1、最近中日关系好一点，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刚来北京访问，说想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答：任何国家的任何领导人都应该与中国合作。因为与中国合作对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但是合作必须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互不侵犯和互不欠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欠债，但是日本除外。第一、21 世纪了，日本直到现在还侵占了我钓鱼岛及其海域，第二、日本在上个世纪侵略中国的战争赔款还没有赔付。日本新首相福田赳夫在没有完成以上两个前提之前，就要求中国和日本合作，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俚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没有要求日本落实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就答应和日本的合作，那无疑于把钓鱼岛和中国人民的情感一切抛弃在东海里了。中国新民党和我都相信，中国共产党政府在 21 世纪不敢再做这样的卖国贼行为。虽然他们在 1949 年以后，已经卖了大约 41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2、能不能跟我讲民族主义现在在中国的重要性？ 现在爱国的年轻人多不多？ 将来会有像 2005 年游行的那种大活动吗？

答：民族主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民族凝聚力。但是，民族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这是中国新民党和我都坚决反对的；二是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民族主义，这是中国新民党和我都坚决拥护的。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民族主义，是在融入世界民主潮流的基础上，捍卫本国领土、捍卫本国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色。目前，中国新民党要做的一个艰巨的工作是，一方面向国人启蒙民主，一方面提倡国学，反对马学对国学的毁灭性“西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化已经几乎彻底把国学消灭殆尽。捍卫国学传统，是当代每一位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当前，爱国青年很多，但是他们的爱国勇气有待考验。口头爱国者要远远多于行动爱国者。至于您问到 2005 年的反日大游行，我想如果日本不把钓鱼岛交还给中国，中国爱国青年针对日本的游行将永不停息。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国的一党专制主义的，中国新民党的策略和计划是“21 世纪的和平民主革命形式”，即非暴力不上街的在家革命，而非街头革命。

3、在您写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探讨 21 世纪中日关系新思维》的公开信里，您先给两位领导人讲了一个故事，说你有一位在电视台实习的学生，中共宣传部的官员告诉她不可以报道南京大屠杀，因为会破坏中日友好关系。2007 年“12·13” 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很正常吗？

答：这个小故事就是发生在 2007 年“12·13”（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祭奠日）前夕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很多。我在 04 年、05 年免费为南京市民举办中国钓鱼岛的知识介绍，也被中共取缔，借口是“破坏中日友好”。其实，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谋取利益而讨好献媚于日本，二是惟恐人民在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运动中反对共产党的对日政策，最后演发成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共产党作出这样的献媚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正常的。但是对中国新民党来说，这是不正常的。

4、The World 的报告说南京师范大学现在不让您当教授， 是吗？

答：我没有读过 THE WORLD 的报告，但是这个消息是真实的。

不过我要指出你的一个错误，并不是南京师范大学不让我当教授的。因为南师大共产党的党办主任刘主任说是上级的决定。所以，你的问题应该纠正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让你当教授，是吗？”

针对你的这个新问题，我的回答，才可以是“是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不让我当教授，只要是稍微有些智力的人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法律都规定了必须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所有提出多党竞选的人就是反党。

而共产党又一直认为大学是为共产党培养一党专制接班人的地方，怎么能让这个叫郭泉的男人在课堂上培养未来多党竞选的民主人才呢？于是，共产党不让郭泉当教授就很好理解了。

这在民主制国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而在共产党国家却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

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举一个我的本家郭罗基教授的例子给你看。

郭罗基教授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上世纪 80 年代，因为郭教授有民主思想而被邓小平驱逐出北大，邓“总设计师”说：“这种人怎么能在北京大学教书呢？”于是，郭罗基被调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上世纪 90 年代，江泽民到南京视察，又省略了几个字，说“这种人怎么能教书呢？”于是，可怜的郭教授和我一样，被调去当了图书资料员。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毛泽东也作过图书资料管理员。最后毛却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

当然毛是用专制颠覆了民主。而我们却正好相反。

5、你的这些公开信有了什么结果？ 有没有人回答你？

答：任何事情都有结果，我的这些公开信当然也不例外。

我的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呼吁终结一党独裁，尽早实行民主政改；二是立即解决我的公开信里提到的维权对象的生活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一个都没有解决。但是共产党却很快对我有了另外的一个回答，那就是把我调离教学岗位，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另外还派出鹰犬警察抄了我的家，没收我的三台笔记本电脑和相关的所有电子附件，以及我的维权资料，还有我家日用的银行卡。

中国共产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中国人民的提问总是从来都不拖泥带水的。

6、谢谢！

答：不谢！应该说感谢的是我，因为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找到我采访我，这就是伟大真诚的美国人民对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的最好的支持。谢谢你，马语琴！谢谢你们，美国人民！

郭泉：民主先声 95 ：中国必须在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汇入世界民主浪潮

年前，收到英国的汉学家朱丽叶•洛弗尔（Julia Lovell 汉名蓝诗玲）女士的来信。她是《鲁迅全集》和张爱玲作品的翻译者。她说她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近现史的影响的书，想得到我的帮助。给了我 12 个问答题，要我回答。

我先来介绍一下她。

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英国剑桥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交流学者，现任剑桥大学汉学系教授，翻译作品有《鲁迅全集》、《色•戒》（张爱玲）、《马桥词典》（韩少功）、《我爱美圆》（朱文）等，并著有《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等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

蓝诗玲女士通晓英、中、法和西班牙四国语言。她 1997 年来到南京大学学习汉语。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博士，她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读书。8 个月后，她学成回国，到剑桥大学攻读现当代中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 2002 年毕业。毕业后来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 年，英国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收入钱锺书先生的名作《围城》。针对此事，她在英国《卫报》刊出长文，以《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为题，回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西方的历史，并剖析了其在西方始终影响甚微的原因所在。受到华文世界的瞩目。

她的专著《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The Great Wall: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分别在 8 个国家出版。

来信全文如下：

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同意回答我的问题，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8、您怎么看去年的冰点事件?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请原谅我非常笨拙的中文，希望您能看得懂!谢谢!
祝您
新年快乐!
蓝诗玲敬上
才做完我的美国记者朋友 Mara（汉名马语琴）代表美国纽约 New Republic 周刊开出的问答题，又要做英国朋友的问答题了，这实在是个忙碌的新年伊始。
回答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答：我 1968 年 5 月 8 日生，按中国人的说法，今年“四十不惑”了。中国人之所以说四十才能“不惑”的原因是三个，一是学历，二是工作，三是社会活动。
我的学习生涯比较复杂，从大学到博士后分别的专业是中英文秘书、法学（社会学）硕士、哲学（中国哲学）博士、文学（文艺学）博士后。硕士、博士都是在南京大学在职攻读的、博士后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做的。博士论文是《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专著）、博士后论文是《自由与文学》（专著）。还出版过一部研究安徒生《海的女儿》的专著《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
我的工作也比较复杂，90 年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在江苏省金陵汽车运输公司做政工干事，然后是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再后又做过 5 年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法官。1999 年至 2001 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1 年留校工作，担任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
我的社会活动就更复杂了。我提倡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创办过金陵国学馆（南京）；我首倡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新思维，提倡在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我还设计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模式，在此模式下帮助中国维权群体进行民生和民主的斗争。
以上三方面的思维和行为，就构成了我全部的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其应有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一种很落后的专制主义时代。所有专制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很糟糕的，目前的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专制主义国家与世界民主浪潮也是格格不入的，这点中国就更不例外了。目前的专制主义政权也渴望获得崇高的国际地位并想和世界人民搞好关系。但是，他们的专制主义思维和行为早已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唾弃。
中国目前的专制主义政府不能代表勤劳善良勇敢友爱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渴望民主、憎恶专制的人民。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有能力使得中国变成一个伟大的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必将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赢得崇高的国际地位。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答：中国应该以博大的胸怀、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世界人民。这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以民主中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民主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体”。民主中国对内善待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对外崇尚和平反对侵略，并支持和声援还处在专制主义时代的人民终结其本国的专制独裁政权。
民主中国将在 21 世纪提供给全世界更大量的物质产品，让全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品。同时，中国也将在 21 世纪赋予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最文明、最善良的精神力量。让全世界人民都称赞这个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和帮助。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我目前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方面，但是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是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第二种民族主义是在捍卫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敞开胸襟、欢迎全世界追求民主、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我属于第二种民族主义者，我既爱中华各民族人民，也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
这方面的思想来源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论语》首段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这个开放思想的最直接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学理层面统称国学。国学教导了我不仅要爱中国人也要爱天下人。“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都说了这个道理。

二是民主主义方面，我完全认同“人生而平等”、“人人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普世价值观。这方面的思想一是来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二是来源于我的社会学和哲学基础。

我是在 1995 年信靠基督并受洗的。我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已有 12 个年头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思想里发展出的民主理念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基督教民主方面的书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我只接受基督教的民主伦理，而不赞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其实，目前欧洲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融入社会主义理念改善社会财富不均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所以，在经济分配形式方面，我提倡“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文明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两大源泉。

提倡圆融思想的中国人民理应让这两朵人类文明的奇葩同时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答：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断代史，其中有屈辱的回忆，也有辉煌的篇章，有值得我们当代人庆幸的历史转折，也有让我们扼腕叹息的历史悲剧。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限制了工业技术的发展。甚至连一些机械设计都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大国里，工业技术想要得到提升的唯一办法就是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中国的华夏民族两千年来只遭遇过匈奴入侵、五胡乱华、蒙元入侵、满清入关这四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这四次民族战争全部都是发生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战争的科技含量极其低下。满清入关之后，继续执行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甚至还保留了胡服骑射的落后战争观念。

就在清朝满足于长城内的农耕骑射欢娱宴乐的时候，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18 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 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等待中国发现落后之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已经开到国门了。

落后就要挨打！我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要时刻牢记的历史教训。

“落后”分为技术落后和政治落后两种。满清之中国，技术和政治均为落后。“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提升中国的技术而不是改善中国政治。我们知道，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和购买的方式提高，但是专制集权者却不想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专制统治者提升技术的根本愿望在于更好地捍卫专制统治。

而这个专制政治的问题，近代史没有完成，现代史也没有完成，于是这一终结专制独裁统治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当代人的肩上。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答：上题已经介绍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封建社会内部虽然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倍加艰难。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1835 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 1950 台，纱锭 900 万枚。年产生铁 102 万吨，煤 3000 万吨。1840 年，英国工业产量已占世界工业产量的 45%，出口总值也由 19 世纪 20 年代初的每年 3000 余万镑，增加到 5000 余万镑。与此相适应，工业城市相继出现，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大变革，军事工业也在急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英国具备了用武力拓展其海外市场的能力。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个影响百年中国的大事件是中英战争。这个战争在中国被叫做“鸦片战争”。其实，这场战争只是一种贸易战争的军事化而已。这场战争起源于中国的贸易壁垒，战争的结果却使得我们走向了世界。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中英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鸦片战争前夕，中外海上贸易 80%是中英双边贸易。到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1765-1769 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是 1192915 两白银，中国输英商品的总值则是 2190619 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达 997704 两白银；1795-1799 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 5373015 两白银，中国输英总值则为 5719972 两白银，中国出超 346957 两白银；1830-1833 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 7335023 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额则高达 2615263 两白银。我们再从中英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看，英国输华商品主要是毛织品(各种呢、绒)、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也包括少量金属制品，如刀、钟表等)和由印度来的棉花等。由中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土布，此外还有丝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还处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对西方包括英国的工业品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作用，因而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多大的销售市场。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及其它土特产，在西方销路很广，深受消费者欢迎。1781-1790 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额，仅茶叶一项，就达英国同期输华商品总额的 6 倍。1821 年英国运至广州的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 60%以上，1826 年输入的棉布，也亏本 10%左右。当时所有的英商都哀叹，在中国“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甚至，从 1757 年到 1835 年，清政府先后公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款，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活动范围、华夷交往等都作了规定。主要包括：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为他们修建的“夷馆”内，外商不得雇用中国仆妇；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外国妇女不许居住广州夷馆；禁止洋人兵船闯入内河；不得偷漏税款；严格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禁止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及中国史书出洋；不准外国人像中国官员士绅一样坐轿、乘船游玩等等

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局面和对外国人诸多限制，1793 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公爵来到中国，提出了在北京设立商馆，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口岸，割取浙江沿海岛屿、减轻税率等要求。这些要求均被满清政府驳回。乾隆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816 年，英国派遣阿美思德使团来华交涉，除要求清政府放宽对广州的贸易限制外，又重申“马戛尔尼要求”，仍遭拒绝。

这样，无论是正常商品输入也好，还是通过外交途径强力交涉也好，英国都未达到打开中国大门，扩大贸易的目的。

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出产的毛织品、金属品，但是中国人却喜欢鸦片。

于是，英国开始对华出售鸦片。1830 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 21906754 两白银，其中鸦片竟占 12222525 两白银，而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则为 13049574 两白银。依靠鸦片贸易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扭转与中国在正常商业贸易中的逆差局面。

鸦片输入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丧失战斗力。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地方督抚乃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也直接或间接从鸦片走私中获利。

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烟民数量骤增。1835 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谈及京城八旗兵的情况，说：“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遇有上级校阅检查，“率皆移东补西，或一人领充数名，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彼此包庇，狡狯百出，虽大吏亦无可如何”。

到 1838 年，中国约有 200 万人吸食鸦片。鸦片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即或残喘苟延，亦必俾昼作夜。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片时之烟，耗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转而困阨乞丐者多矣。”

面对烟祸泛滥，国势日衰的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痛陈鸦片的祸害，提出
禁烟主张，形成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兵部给事中许球为代表的严禁派。首
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琦善、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1838 年 6 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的输入。湖广总督林则徐大力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指出，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斩挽颓波，非严蔑济”。“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财源枯竭、军队瓦解的严重局面，于 1838 年 12 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1839 年 3 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弁。他责令外国鸦片烟贩将趸船上所有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令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

1839 年 4 月上旬至 6 月下旬，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39 年 8 月，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 9 月 30 日，曼彻斯特 39 家公司和厂商联名致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外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10 月 1 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舰队到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就近支援。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对华作战英军总司令”。4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华战争案。6 月，以懿律为司令，由 48 艘船舰、540 门大炮及 4000 多人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1842 年 8 月中国战败，中英双方签定《南京条约》。

1851 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太平军开展了反洋斗争。1856 年发生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1856 年 10 月英、法两国对华宣战。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英国人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1860 年 11 月 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中法签定《北京条约》。

中英战争，第一次使得中国与世界贴近，也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人在见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之时，也感受到了落后的屈辱。这一切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显著变化，其特征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形成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

“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是技术层面的，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却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龚自珍倡言变法改革。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提出“更法”、“改图”、“变功令”的改革主张。他指出，“自古及今，

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肯定改革是历史的必然，痛斥那种“拘一祖之法”而不思变革的主张。

魏源赞扬美国州长和总统选举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把瑞士“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联邦制称为“西土桃花园”。猛烈地抨击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复古守旧思想，力主改革社会风气。他指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中英战争之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受到世界工业的影响。农业中商品经济作物比重增大，农民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鸦片战争虽然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却使得中国得到了两样来自世界的礼物：工业文明和宪政观念。这两样礼物，无论其进入方式是多么屈辱和罪恶，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和政治两个层面。

目前，在技术方面，中国早已与世界接轨；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的宪政之路还没有完成，但是，中国人民在打开国门之后早已知道了民主宪政要比专制集权优越。

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国人民坚信，专制即将结束，民主即将到来。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答：我想，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的，但是爱国的方式因人而异。甚至有人自认为自己爱国，结果却成了卖国贼。但是，历史是看结果的，不看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

目前中国，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三种思维：

一、部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被过度的利益追求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胁迫，而变得十分不确定。过度的利益追求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挣钱”就是爱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认为“爱党”就是爱国。“挣钱”使中国人变成了经济动物，“爱党”使中国人变成了“党奴”。

二、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者。其实，一切正直善良、对国家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都是反对把“挣钱”和“爱党”作为爱国的。爱国，分为言语文字层面的和行动层面两个大的方面。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目前还被日本占领的我钓鱼岛情况；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等等。其实，用言语文字来表达爱国情怀，也就是一种行为。虽然，言语文字不是行动，但是却可以煽动行动。

三、行为层面的爱国者，例如组织并参与保卫钓鱼岛的行动（宣传或出海）；例如开办介绍国学的国学讲座和国学馆；例如参加各种要求中国终结独裁的民主运动，等等。

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由后两种中国人撰写的。

而行为层面的爱国者注定是永垂不朽的！因为，一切做出伟大爱国主义行为的人，不仅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更要兼具才、胆、识、气！

8、您怎么看 2006 年的冰点事件?

答：“冰点”是北京《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新闻品牌栏目，创刊于 1995 年 1 月 6 日。 “冰点”最初叫“冰点新闻”，是每周出刊一次的专题新闻版，内容包括专题新闻和时事评论，其发刊词指出：“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想法，更多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由于其敢于言论、关系民众与社会命运的风格，一直很受读者欢迎。 1998 年在该版开设专门发表时事评论的栏目“冰点时评”。1999 年 11 月改版为“青年话题”版，并保留“冰点时评”。另外开设专题长篇新闻版“冰点周刊”。

但是，这一深受人民喜欢的报纸，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格审查和百般指责，以至停刊整顿。例如：

2005 年 5 月 25 日刊出龙应台撰写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因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 年 12 月 7 日刊登胡启立著《我心中的耀邦》，该文为中青报 16 年来首篇纪念胡耀邦的长篇文章，刊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立即批评“冰点”擅自刊发该敏感话题，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规定所有媒体“不得有自选动作”的报禁政策。

2005 年 6 月 1 日刊出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因首次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上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此次战斗中的壮烈牺牲，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没有塑造共产党的抗日形象”。

2006 年 1 月 11 日，第 574 期《冰点》周刊刊登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强烈不满，在中宣部新闻局 2006 年 1 月 20 日内部发行《新闻阅评》第 34 期上进行了严厉批评文章“为早定结论的历史问题翻案，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是对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

2006 年 1 月 24 日“冰点周刊”被中国共产党下令停刊整顿，同日下午 5 时中国各大媒体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等部门的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2 月 16 日，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免职。

其实，袁伟时的文章只是导火索而已。中国共产党早就蓄意打击“冰点”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报禁”专制主

义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又一罪证。

中国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立即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人人皆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 21 世纪还在倒行逆施其极其反人类的“报禁”、“党禁”等专制主义，这只能让人民看到他们的心虚。2006 年 1 月 24 日，共产党发文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受到国际国内的一致谴责。200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我的数封致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公开信，这次他们心虚到只敢以“口头通知”的方式禁止中国各新闻单位报道。

中国共产党对“冰点”的停刊整顿以及对最近的公开信的封杀，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其邪恶本质。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答：中国的近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问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面对世界贸易大市场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最后西方的工业文明终结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问题的形成是内部体制拒绝对外开放造成的。中国的政府不愿意开放，中国的人民也不愿意开放，所以，必须通过外部力量来加以促进。但是，

但是，外因是条件，改变事物的决定力量却是内因。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二、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政策的矛盾造成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带领下，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还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民生的内容。

但是，就在中国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这一时期的问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问题的最后解决除了作为内因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外，美国为首的盟军作为外因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但国共双方都存有私心，惟恐自己在竞选中被对方消灭，而没有彻底的要求宪政的决心。于是，内战爆发。内战中，共产党向人民承诺要建立民主中国，于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49 年，中国共产党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把中国国民党驱逐到了台湾。

这一阶段，有国共两党的内部争斗问题，也有前苏联和美国的外部对抗的原因，情况十分复杂。

四、1949 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给了各民主党一些“副主席”和“副部长”的位置外，闭口不提“民主宪政”。1957 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直至今日，中国还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中国当代史上的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施了一党专制，缺乏权力制衡。“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

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

中国当代史的这一问题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问题的解决，必须靠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答：一切专制主义的统治在技术力量方面都是很愿意强大起来的。他们强大的目的在于，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屠杀国内一切反对专制的人民，扼杀禁锢不同的声音。他们强大的目的还在于，他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对比他们弱小的国家耀武扬威。

但是，一切专制主义都是纸老虎，他们必将在世界民主力量面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专制当局目前在军事力量方面是极其渴望强大的。但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具备，那就是对民主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愿望。他们想强大的真实内心世界是想最好地捍卫他们的专制统治、镇压人民的起义和武力统一台湾。

至于说到强大的中国是否会报复英国等其他曾经入侵中国的问题，我想，如果中国继续处于专制集权统治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成为了“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中国，哪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好朋友。

因为只有专制主义才导致复仇，而民主制度提倡和谐和解。

全人类必须团结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反对专制，反对战争。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答：“愤青”这个词原本出自您的祖国——英国。1945 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很显然，“愤青”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是民主意义的。但是，“愤青”这个词传入“专制中国”的时候，是不可能被提及其原初意义的。于是，“愤青”一到中国，就只能被赋予民族意义了。

1985 年 8 月 15 号（8 月 15 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愤青”的准确内涵，是时刻寻找机会用外在行动把内心思想（愤怒情绪）表现出来的青年，“愤青”最主要的特征还有一个，即“愤青”为了表达内心思想而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动是否触犯法律。甚至，很多“愤青”的愤怒对象就是专制主义的宪法和法律本身。

除了“民族主义愤青”外，21 世纪中国还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愤青”，即“民主主义愤青”。

我在 2006 年底被中国的一张著名报纸《南方都市报》确定为中国两大“愤青”之一，还有一位是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涂鸦而被日本判刑而被驱逐出境的冯锦华先生。

2006 年 12 月 27 日的南方都市报 A 特 222 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情绪激进与理性拉锯》的文章，在其中一段“两个著名愤青”里这样介绍了我，“另一名愤青郭泉在 2005 年的出场同样和日本有关。2005 年 1 月 30 日晚上，这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自备破坏工具前往安徽歙县，目标是日本人在当地修建的王直墓。有史书指控这个生前勾结倭寇的明朝人，里通外国、联手走私，顺带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以上事件使我被界定为“民族主义愤青”。2007 年 11 月 14 日，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随后在一个月内又连续发出了八封致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各界人民的公开信，并在 2007 年 12 月 17 日被中国新民党推选为代主席，而成为“民主主义愤青”。

“民主主义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我们反对专制集权主义，我们强调丢弃专制、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我们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

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行动的结果，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结果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行动的过程。为了自己的民主信念，哪怕入狱被杀，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和荣耀。

我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专制主义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民主主义愤青"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专制主义的组织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

附上我以前写的一篇有关"愤青"的小文，以使您对中国愤青有进一步的理解：

《而立之年：冯锦华、薛义和我》

一、我们都是而立之年

01年冯锦华在靖国神厕上用油漆"损害物件"，05年，我用斧子和榔头砸坏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首领汉奸王直的墓碑，07年薛义在日本向"李总统登辉先生"投掷水弹。是年，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 01年，冯锦华31岁， 05年，我37岁，07年，薛义，34岁。

二、我们都是研究生毕业

01年，冯锦华31岁，原东京博朗思特国际电话公司职员。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法学部，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05年，郭泉37岁，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07年，薛义，34岁，日本某公司软件工程师。前沈阳东软商用事业部，研究生毕业。

三、我们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冯锦华："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的想法从来没有变！"

郭泉："我砸就砸了，我不觉得对我会有什么后果！"

薛义："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今后将如何面对自己"

四、我们都今生无悔

冯锦华："做那种事情是不会后悔的。"

郭泉："既然已经公开出来就不怕承担什么后果"

薛义："我并没什么可后悔的。这件事肯定会影响我在日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可能不会留在日本太长时间了。因为按照日本法律，毕竟我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但是我本人无所谓。"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答：中国人从思想上只分为两类人，一是捍卫"共产党垄断社会财富的一党专制主义"的"党奴"，这种人大约有几千万。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高层"党奴"手里，"党奴"总人数可能还会更少。另一类人是力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主义"的人民。除"党奴"外，13 亿中国人民都是渴望民主的。这是中国的多数派。但是，中国的一党专制，不是"票决"的民主政治，而是强权政治。

我想，我的思想是能够代表渴望民主的 13 亿中国人民的。当然，共产党说他们"三个代表"。但是，他们却不敢让人民投票选择人民认为可以代表人民的政党。

虽然，没有人选他们代表人民，但是这一点不影响那占少数派的"党奴"，随时可以杀掉我。他们做这些事情来，与他们掠夺人民财产一样，一点都不含糊的。

不过，我也相信，如果我被少数派"党奴"杀害，我一定会被 13 亿最终将走入民主中国的中国人民誉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英雄"。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提倡生前死后的好名声，而对身体的存活时间并不在意。例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不成功便成仁"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这些词语和诗句，其实都在说一个道理，即人的好名声不只是在生前的，更是要死后的。

一般的人，死后也就没有人记得他了。但是，二十四孝的首孝舜帝，辞世数千年，中国人民还记得他的故事，这是因为他"立德"了；大禹也去世数千年，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他的治水功绩，因为他"立功了"；老子、孔子离开我们二千多年了，至今学校教室里飘出的"之乎者也"声仍不绝于耳，全世界各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民都

在学习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立言”了。

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永垂不朽的三不朽之事是：立德、立功、立言。

郭泉：民主先声 96：中国必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必须包括采访的自由和被采访的自由

上周五（2008 年 1 月 4 日）中午，日本的三大新闻社之一的“中日新闻社”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专程来南京采访我。

长期以来，因为我是中国的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愤青”团队的领军人物，一直受到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

日本的三大新闻社是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社和中日新闻社。前两个新闻社都采访过我多次，而“中日新闻社”却是第一次与我接触。小坂井先生主要是来采访我对 21 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以及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推选我做代主席的事情。

中午 11 点，他在南京火车站下火车。我与他约好 12 点到南京师范大学的紫金校区（板仓村）见面。他在 11 点 50 分给我电话，说他已经到学校门口了。而我此时，还在从南师大老校区（随园宁海路校区）赶往紫金校区的路上。

12 点 15 分，我到了南师大紫金校区门口。小坂井先生站在门内的雪松下。和他握手之后，我问他吃饭了吗？他说没有吃，先采访，不要紧的。

我说，我也没有吃呢，我请你吃台湾便当吧，就在学校的门口。

于是我带他又出了校门。我发现我们一走动，周围很多人也开始走动了。我立即留意周围至少在 7 个点上有便衣特工。还有 2 个在街对面。我不禁笑了一下，这就是中国特色。怕他害怕，就没有对他说。

那家台湾便当的名称叫“台尚”饭店，在一个不大的小二层楼里。说是二层，其实第一层有一半是在地下的。估计就是一楼的门面房往下又挖了一米多的地，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小二楼。这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吧。

我点了两个煲仔饭，一个是红烧排骨煲仔饭，一个是黑椒牛柳煲仔饭。我吃红烧排骨的，他吃黑椒牛柳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话。周围 4 个便衣很认真地聆听我们的谈话，还把手机放在离我们最近的桌角，估计是在录音。

我通过中日新闻社的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告诫日本政府，要想达成中日友好关系的唯一前提就是日本必须立即交还长期侵占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另外，我还说虽然中国政府对日本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我要说，第一，中国政府的这一放弃决定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投票表决的，是非法的。第二，日本必须接受并裁判所有中国以个人或以集体受害者的名字对日本进行的诉讼。

小坂井先生询问了我关于中国新民党的事情，我回答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党都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然后去联合工人、农民和士兵。但是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却正好相反。中国新民党是先有苦难的工人、农民、复转军人和被权贵资本压迫的民族商人，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寻找知识分子。所以，我这个代主席，说实在的就是个法律和政策方面的男仆而已。

小坂井先生还问了中国新民党和法轮功的关系，我说，法轮功是个宗教团体，从 1998 年以后在中国未经审判就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邪教”，所以他们目前在揭露专制主义的罪恶。虽然我们也是在揭露专制主义的罪恶，但是我们是政治组织，不是宗教组织。尽管，法轮功的所有媒体都在介绍和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民主思想，但是中国新民党和法轮功之间从没有隶属关系。

我们吃完饭，也就采访完了。我很有兴趣地问小坂井先生，其他国家的记者，例如美国的美联社、美国之音、伦敦 BBC、俄罗斯路透社、自由亚洲电台等等除了伦敦 BBC 来人采访过我两次外，其余都是给我电话采访的，为什么你们日本的三大新闻社都是亲自来采访呢？

他笑了一下，说，电话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郭泉呢？这下把我也逗乐了。是的，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的确有这个问题。

我说，那就结束吧，我下午还有事。他说，还要拍一张照片。我说就这里吧。他看了一下环境，摇摇头，说，到学校里吧，毕竟是学校比较好。我说好吧。

于是，我们就进了校门，众多的便衣也鬼祟进了校门。我带小坂井先生到了一个教师休息室，他找了一个角度给我拍照。这时，南师大的保卫处的一个干事突然进来，对我说：“郭老师，南师大的党办主任刘主任请你去谈话”。

我说："好的"。

把小坂井先生送出教师休息室，我就跟这个保卫干事向学校保卫处走了。扭头看了一下小坂井先生，他身后有好几个便衣跟着。

到了保卫处，果然，中国共产党南师大党办刘主任和南师大保卫处杨处长在等着我。

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学校有规定，学校里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我说：第一、我知道有这个学校规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什么组织制定的，能代表广大学校员工的意愿吗？这个规定合法吗？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中国特色还是专制的本质？

第二、我谈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也不代表南师大。我谈的所有话语都和南师大无关，和南师大有关的话题，我想境外媒体也不会找我了解。

第三、我的观点，我选择告诉谁告诉什么媒体，这完全是我的自由。如果您说我违法了南师大的规定，那好，您就开除我吧。

中国共产党南师大党办刘主任楞了一会儿，喃喃地说："适当的时候，会开除你的。"

我说："好，我等着。"

这时刘主任的电话震动了，他一脸严肃地接电话，不停地说："好！好！"估计是接到什么命令了。他挂上电话后，对保卫处的杨处长使了一个眼色，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先走了"。也不管我了，直接走了。

我走出校门，打车回到办公室。我给小坂井先生拨了电话，却没人接。这时，我不知道跟着小坂井先生走的那些便衣对小坂井先生怎么了，就立即给"中日新闻社"上海支局拨通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上海支局的工作人员。

大约 1 小时后，小坂井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刚才的位置信号屏蔽，一切安全，没有警察骚扰。

于是，我笑起来。原来，中国警察只敢骚扰中国人，不敢骚扰日本人。看来，还是在鲁迅先生时代，还是在"友邦惊诧论"的时代。

堂堂大中华，搞到连一个中国人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都要派出十几个警察盯梢，怎么还能有警力帮助老百姓呢。要是这些警力都保护人民而不是残害人民，那多好啊！

于是我想到刚刚结束的圣诞节，我的一位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丁女士来电话说，当地的警察局给每家送了圣诞节礼物，很多很多，还有一只火鸡。市政府也送了礼物和火鸡，现在她家三只火鸡了，这该怎么办呀？

听她在电话里很着急的声音，我也很开心，仿佛火鸡也在我家满地跑。

可是，圣诞节前后，在中国，荆楚先生、胡佳先生先后被中国警察象抓火鸡一样地抓走了，这实在让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难为情！警察先生的工资和警察局的办公经费，都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支付的，连关押荆楚先生、胡佳先生的监狱或看守所，也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建造的，怎么能这样对付人民呢？

荆楚先生、胡佳先生的事迹，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是绝对看不到的。但是中国人民在口口相传着他们的伟大事迹。中国必须立即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必须包括采访的自由和被采访的自由。

郭泉：民主先声 97：民主中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就是人民的中国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德中同行"活动的开幕式和随后的一系列活动。

为纪念德中建交 35 周年，旨在全方位介绍德国各方面情况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德中同行"活动是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的共同支持下举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南京，亲自为"德中同行"揭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德国女首脑访问南京。

"德中同行" 第一站是南京，其后是 2008 年春在广州，2008 年秋在成都，2009 年这一活动将在北方城市延续，一直持续到 2010 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时。

南京人民对德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经理拉贝先生（1882-1950 年）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在南京沦陷后，拉贝以其特殊的身份目击了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

"安全区"为大约 25 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而在此期间，安全区之外的 30 万人则惨死在日

军的屠刀之下，他同时在自家的花园里保护了 600 名南京人。

1938 年 2 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他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暴行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为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在他一家濒临饿毙的绝境中，中华民国的南京人民邮寄出了大量食品包裹。

1950 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南京人对于拉贝先生有着特殊的感情，拉贝先生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在拉贝的墓碑上，刻画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八卦图。

可是，这次的“德中同行”活动中，我有两件事情心里不快。

一是看到了德国巴斯夫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叫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是由中国石化和德国巴斯夫以 50：50 的股比共同出资设立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总投资约 29 亿美元，2001 年 9 月开始工程建设，于 2005 年 6 月投入商业运营。主要生产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苯、甲苯、混合二甲苯。这些东西在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对南京的空气影响很大，其所在地南京大厂镇已成环保重灾区

二是了解到德国技术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的全世界第一条线是在中国上海。本来，任何人都是喜欢第一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面对这个第一我却开心不起来。我用很蹩脚的德语问工作人员“德国的技术，为什么德国不是第一？”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人有钱！”

其实，我一直知道中国的磁悬浮铁路只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线而已，而德国的试验线从 1984 年就开始投入运营了。德国磁悬浮列车试验段由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投资建造的，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商业运营。

于是我又问：“德国为什么不建设商业线呢？”工作人员的大意是说：“虽然德国认为磁悬浮理论完美无缺，技术也已成熟，但运行费用昂贵，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争论不休，德国人民不同意。”

于是我立即联想到中国的情况。2001 年 3 月 1 日开工建设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线。2002 年 3 月工程竣工。西起上海地铁 2 号线龙阳路车站南侧，东到浦东国际机场一期航站楼东侧，线路总长 31.17 公里，设计时速和运行时速分别为 505 公里和 430 公里，总投资 89 亿元。另外，即将施工的沪杭磁悬浮线全长约 175 公里，工程总概算约 350 亿元。

这两条铁路的总投资是 450 亿，而且维持养护的费用更是大的惊人。有人计算，这个项目需要 500 年才能收回成本。

那么，德国政府都不能通过的项目，中国政府怎么能通过的呢？难道真的如“德中同行”的工作人员说的“中国人有钱”吗？

不！不是中国人有钱，君不见政府门口长年累月的访民不断，君不见城市街头日晒夜露的老少乞丐？这能叫中国人有钱吗？

但是为什么德国人都建不起的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中国却可以建了呢？

我们来看看德国人为什么建设不起来？

是没有钱吗？不是的！那么，有钱的德国，为什么建不起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呢？

好，我们来看看德国政府怕什么？德国政府最怕德国人民的反对。

公共设施的建设都是使用的人民的纳税钱，而德国人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纳税钱投入到一个运行费用昂贵而又无法预测成本回收年限的项目里去。

德国人民反对的事情，德国政府去做，那就等于自动下台了。因为，决定政府去留的选票在人民的手里，而不是在政府手里。

于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的化工企业，结果德国政府把化工企业搬到了中国。

于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的磁悬浮，结果德国政府试验了 23 年，却始终没有商业运作。

而中国呢？

是谁同意政府建设这样一个只有 100 多公里的铁路就花掉了 450 个亿呢？是谁投票的？

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到底应该让谁决定？是政府吗？政府能作人民的主吗？

对这条铁路我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建设这条铁路是人民的意愿吗？

只要中国人民一天不能行使作为一个纳税人的选票，这个国家就是权贵专制的国度。

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不是一个权贵专制的中国，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是一个“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中国。这个中国叫“民主中国”。

民主中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 98：郭泉报导：中国专制主义条件下最和谐的一次会谈

大家好！我到家了。

昨天，接到学校通知，请我今天（2008 年 1 月 10 日）到南京师范大学去谈话。

我准时赴约。会谈在安静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会议半小时，9 点半结束。

双方出席人员有：我，对方是南师大的人事处赵处长（我的老朋友兼好朋友），宣传部许秘书（我的学生）以及南师大文学院的党委潘文书记（也是朋友）。

潘书记先介绍了与会人员，我笑着说，都是老朋友了，别介绍了。于是潘书记笑起来，说，那就开始吧。

会议先由潘书记作了一个开场白，说人事处来向我通报一下有关教师工作规定的四个文件等。

然后赵处长读文件，从国家文件，读到江苏省的文件，再读到南师大的文件。我和赵处长是 8 年的老朋友了，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地对我读文件，我心里笑开了怀。我估计他也在心里感到很好玩。我的孩子和赵处长的孩子同岁，在我们的孩子都是 2 岁的时候，我当时住在南师大校园内。我和赵处长天天下午带孩子在学校大草坪上“溜”孩子。当时他还是“赵科长”呢。

赵处长读完文件，我说，老赵，这些文件我都非常熟悉。我以前做法官的时候，在给罪犯判刑前，都要与他的单位沟通的。我也算是中国人事制度的大半个专家了。

然后，我对他们谈了我的思想认识：

首先、我通报了一下最近我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研究、建设情况，以及中国新民党的成立情况等。并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不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的几个法律常识。

第二，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如果政府判定我有罪，根据人事制度，我应该被开除。如果有这一天，我接受处罚。请学校领导，各位朋友放心。

第三，鉴于目前国内外的复杂情况，请学校慎重思考对我的沟通方式和处理方式。在目前专制条件下，南师大领导层受到的压力很大，我能理解。但是，也请领导们要意识到，我对未来的百年南师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历史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民主中国的来临，不是要不要来的问题，而是时间表的问题。

第四，学校的任何不克制的处置，都会造成对学校的危害。例如，前一段时间，民盟南师大委员会对我的开除决定，已经危害到了中国民主同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除非南师大接到上级的命令，请不要擅自决定对我的处置。否则，对未来百年南师的危害是显然的。

第五、旷工是要被开除的，这我清楚。所以，我承诺，我不会旷工，保证每日上下班签到。也不会离开南京。因为我本人不需要离开南京。离开南京对我本人也没任何益处。请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放心。

会议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下结束。这是 4 年来，最和谐的一次会议。

才写完以上的文字，又接到学校的信息，说最近还要和我讨论有关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方面的有关规定。不知道下次是不是还这么和谐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郭泉：民主先声 99：放弃战争赔偿，是完全非法，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卖国行为

作为南京籍的日本侵华史的学者，我心里一直有件事情堵着慌，而且一堵就是很多年。

这件事，就是从 1931 年“918”到 1945 年“815”，这 14 年间，侵华日军的铁蹄肆意蹂躏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屠杀或以其他方式伤亡三千五百万以上的中国军民，毁损中国公共设施不计其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 1000 亿以上。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放弃这样的战争赔偿，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天下哪有这么弱智的受害者？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 1894－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 2 亿美元、5．5 亿美元和 2．23 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 3900 万美元。

1952 年 4 月 28 日在台湾的蒋介石，与日本签定日台吉田蒋介石和约正文中没有说到赔偿一事。但是并没有言称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

1972 年 9 月 26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田中角荣曾任侵华日军的红部司令部司令（红部司令即政治部主任）。此次来华的目的是就相关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作废）和日本战争赔偿问题进行磋商。

所以，根本不存在目前中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1972 年中国政府为了国际政治的需要，在中日建交时决定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说法。

本来，日本人来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谈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怎么中国却在三日后 9 月 2 9 日的《中日联合声明》里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呢？这不是很荒唐吗？

大家知道，绝大多数受害的黎民百姓都生活在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很显然，1949 年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中国人民向日本索赔。

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日要求战争赔偿。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解释。

我们先来看看 1955 年 10 月 15 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说：“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196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回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还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是中国单方面作出放弃赔偿的决定的。而这个决定，我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发现根本没有经过任何一级人民参与的讨论和表决，完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暗箱操作。

惨遭日军铁骑蹂躏的苦难的中国，竟然被独夫玩控于手掌之中。这叫什么人民共和国？

未经人民的同意，中国共产党竟然“代表”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中国人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又叫什么人民民主？

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党的国内利益以“民主”的名义欺骗利用人民帮他们打内战，打完仗又为了党的国际利益“代表”人民放弃战争赔偿。这是什么样残忍的内心世界呀？我无法理解！我也不想理解这些内心里完全没有人民的大独裁者。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叫毛泽东的独夫，还说些什么。

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59 年 7 月 31 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

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 182 页）

1959 年 8 月 17 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 260 页）

写到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也不知道我能说什么了！我也实在不想说什么了！

我只想说，一切爱好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的善良正直勇敢的海内外同胞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民主目标，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奋勇杀敌！

郭泉：民主先声 100：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入狱被杀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

刚才和一个 SKYPE 上的朋友谈话。

他说：“1 月 18 日，中国民主党某分部的同志要聚会，我想参加，可惜期末了要改试卷。” 我说：“我对中国民主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了解这个党在 1998 年竟然想在中国境内

进行政团注册和党员登记。于是各省党员纷纷到各省的民政厅申请党团注册，结果全军覆没。各省领袖全部入狱。其他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他说：“王丹，您知道的，就是 89 全国高校大学生研究生自治联合会的首领之一（简称高自联），被判了 10 徒刑的那个，目前在美国，是他们的主席之一。”

我说：“王先生是怎么到美国的呢？”

他说：“应该是被中共给遣送的。”

我问：“这怎么遣送啊？难道大陆的人会绑架他们到美国？”

他说：“就象像魏京生一样，先把你关了，然后几年徒刑。美国方面出来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最后你就可以保外就医”。

后来又说到王军涛先生，他一说到王军涛，我开心地笑起来。昨天我还和王军涛说音乐的事情呢。我说：“涛哥，等民主革命成功了，我亲自迎接你回国，弹古筝给你听。”他说他要高歌《出塞曲》。我一听急了，我说：“哎呀，《出塞曲》要用琵琶伴奏的，我不会啊。我另请个会琵琶的给你伴奏吧。”王军涛说：“不！我唱《出塞曲》，你弹筝！”

这个朋友提到的上述几人的情况其实很不相同的。实际上，据我考察，国内民主人士出国成为流亡民主人士分为五种情况：

第一、有民主思想，却没有行动。出国后敢说敢干而成为民主人士。

第二、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但是尚未抓捕，即先出国。

第三、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被判入狱。后刑满释放，出国。

第四、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入狱期间，国际人权组织交涉，而出国就医。

第五、有民主思想，出国学习工作，甚至取得绿卡，但又回国组织或参与民主运动而入狱，后再次出国的。

第一种情况例如费良勇先生，1954 年生，1977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开始阅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自由民主的著作。1982 年，费良勇毕业后被分配回到四川工作，进入中国核工业部成都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 1987 年国家教委和核工业部决定派遣一批专家出国深造。费良勇到德国慕尼黑学习。1989 年，他在德国积极投入到了声援“六四”的海外学运之中，参与了全德学联的筹建。现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第二种情况例如胡平先生，1947 年生于成都，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78 年担任民主墙主要民刊《沃土》的副主编。1987 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现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又如，1989“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乌尔开西先生和柴玲女士等也是同一情况。

第三种情况如王希哲先生，1948 年生于四川。 1968 年，因反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镇压群众而入狱一年。后被流放到农村，遭受批斗、监禁和折磨。 73 年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再次入狱。76 年平反出狱。1981 年，因组织民主运动再次入狱 14 年，1993 年刑满释放。1996 年经香港流亡美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访问学

者。著名海外政论家。

第四种情况例如王军涛先生，1958 年生于南京，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核物理专业学士。1989 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尚未刑满，1994 年被监狱当局以“送美国检查身体”为名，驱逐出境，至今没有法律手续。成为中国监管史上第一例从监狱直接运送美国的民运人士。在美国及全球积极从事民运活动，得到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王军涛先生曾获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

第五种情况例如杨建利先生，1963 年生于山东，80 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曾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2001 年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特别是 1989 年六四事件后，他积极投身海外民运。多年以来，他组织召开了由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参加的有关中国宪政、政党政治、乡村选举、族群关系、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等课题广泛的学术研讨会，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曾经两次申请返回中国都遭到拒绝。2002 年，中国东北发生大规模工潮，他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情况，用实际行动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毅然返回中国，回国后被判入狱 5 年。2007 年 4 月刑满释放。目前在美国生活，现任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

而我将是哪一种呢？

我想，我属于那种要把牢底坐穿的那种男人！不为别的，就为这是我们中国的牢！

其实和我一个思维的人还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突出，他叫刘晓波。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从 1989 年六四后开始断断续续的监牢生涯。先后三次被捕，三次坐牢和劳教，最后一次出狱是 1999 年 10 月。但他并没有因为遭受迫害、坐牢、失去自由、离婚等打击而放弃民主自由理念。他依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奋笔疾书，抨击专制制度

中国曾有个弱小女子写了一首很男人的诗。我小时侯读一直以为是男人写的，长大以后虽然知道这首很男人的诗不是男人写的，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是个弱女子写的。

这个女人就是李清照。她写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从我选择做“民族愤青”、“民主愤青”的那天起，我就没准备活到自然死。

以前做教授的时候，在课堂上问学生，什么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小女生们嗲气地说“睡到自然醒是最幸福的。”

后来做维权，问我帮助维权的下岗女工，什么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女工们坚强地说，“能随便有个活干是最幸福的”。

现在，经常有人来问我，郭教授，什么是您最幸福的事情呢？我淡淡一笑，“为大家争取幸福自由的生活而被杀，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时常告诫中国新民党的朋友们，入狱、被杀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所有中国新民党党员，都必须牢记“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十个字。

今天下午，湖南的一位军转干部携他的女儿来南京找到我，说他代表了湖南的几万名企业军转干部“断友”（被一次性卖断工龄的人）来看我。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到了上面的话。他说：“我想好了，郭教授坐牢我陪坐，郭教授被杀我陪砍。”

分手时，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狱，也许以后见不到了。他叫他的 17 岁的女儿向我磕头，并说这是湖南的风俗。我作揖回礼。

我问是什么风俗，他说，这是他们家乡古代的时候对那些帮助穷苦人与敌人斗争而即将走上刑场的人，在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的情况下，都要磕头的。

我说，很好！让中国的下一代记得我们的奋斗，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

郭泉：民主先声 101：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国新民党致“中国过渡政府”运动的贺信）

中国新民党喜悉“中国过渡政府”运动已于 2008 年元旦启动，这是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中国过渡政府”作为一个民主运动形式，是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中国新民党相信，“中国过渡政府”这一民运形式，必将在推进和协助中国民主运动中贡献出杰出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

中国的民主运动，早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还没有完

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封建帝制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大地上复辟，其中最严重的复辟是目前中国的执政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这一统治虽然是以“党天下”巧妙地取代了“家天下”，但是这根本掩盖不了其专制独裁的帝制本质。

从目前情形看，中国的专制独裁已经到了最高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对人民的极度蔑视，对国家权力的高度垄断。而事实上，国家权力应是全体国民的。历史上所有攫取人民权力而独断专行的统治者，都是人民的公敌。

民主制国家，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国民服务，成立政府的程序是人民投票选举政府首脑，然后由政府首脑选择最优秀的高级官员，中低级别官员均由考试院完成遴选甄别工作。但是专制国家里，专制政府成立的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权贵服务，专制政府的成立的程序不是人民投票而是卖官鬻爵。

民主制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政治上，人民有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自由，人民有权组织独立的政党、独立的工会和其他社团，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在经济文化上，民主制国家的人民有公正、公平地享受社会福利的自由、人民有权拥有自己的物品、土地和房屋，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人民有学习和采纳各种文化体系的自由。

但是，以上这一切在当今中国全是奢望，是中国人民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大海的一边是民主，另一边却是专制。

民主制国家的人民的一切福利和权利，中国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看到，却行使不到，这怎么能不让人心碎呢？

在中国，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现在，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在 21 世纪，伟大的中国还生活在落后野蛮的专制主义时代，是全体热爱民主反对专制的中国人民的耻辱，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的耻辱，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耻辱。

中国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为夺回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为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中国人民与专制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智慧的中国人民使用各种形式开展斗争，例如，2007 年 12 月 17 日，由各阶层中国人民缔造的中国新民党在中国成立；2008 年 1 月 1 日，由海外华人缔造的“中国过渡政府”运动在美国启动，这都是中国 21 世纪民主进程中发生的大事件。中国新民党和“中国过渡政府”运动，在终结独裁、在全面推进并最终实施“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方面的观点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过渡政府”运动一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民主，促进世界和平，保障人民幸福。中国新民党愿意和“中国过渡政府”运动一道，将《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至善思维”和“至善行动”进行到底。在这一伟大的民主革命中，中国新民党和“中国过渡政府”运动的宗旨完全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实现！

已经到来的 2008 年，将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在这个开端的一边，我们将告别专制，另一边，我们将迎接民主的光临！

郭泉：民主先声 102：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记者朋友功不可没（第一批“文胆”记者网址）

长期以来，全世界各国热爱中国并希望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记者朋友对中国专制独裁、腐败猖獗、人民苦难、异见人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采访报导，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人类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民主制国家里，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有司法监督、政党（在野党）监督、人民团体（工会等）监督、宗教（道义伦理）监督、新闻监督。新闻监督中的监督员是记者，他们被称为民主制国家的“无冕之王”。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民主、反对专制的有良知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被人民尊称为“社会良心”，而那些特别有勇气的“社会良心”又被人民称为“文胆”。

在目前的专制主义中国，司法监督、政党（在野党）监督、人民团体（工会等）监督、宗教（道义伦理）监督全部落空。虽然，外国朋友看到中国有“民主党”、有“工会”、“妇联”、有基督教等等，但是这些组织在中国是无法起到实质意义上的监督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用这些名义，不仅欺骗了中国人民，更欺骗了全世界人民。

我们先来看看司法监督。目前中国的司法部门完全成了执政党的帮凶。他们不能再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公安”了，他们早就是执政党利益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根本得不到司法的庇护。中国五千万以上的维权访民全部都是不公正的司法造成的。前几年，维权访民在司法体系中遭遇不公正，于是到北京中央上访，结果又被中央、地方联合起来，强制关进臭名昭著的“马家楼”里，最后遣送回原籍，问题根本得不到任何的解决。

现在越来越多的维权访民意识到，中国的司法根本就不是独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司法。他们吃着人民纳税的钱，却做了权贵统治者的帮凶。人民早就怒火焚烧了！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八大民主党”。这些“民主党”全是伪民主党，完全沦为了“花瓶党”、“举手党”、“洗脚党”，他们在 1957 年以后就不再是民主党了，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别支部”了。

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人民团体”怎么样了呢？中国的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完全成为执政党的玩物，而丧失独立思维和人道主义思想，他们不仅仅自己当上了“党奴”，而且想方设法让其掌控的人民也向专制主义俯首称臣。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宗教团体。虽然中国的宪法规定了信仰自由，但是，宪法同时有规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维系统，在根本上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未经审判而用“党裁”的方式裁定某宗教团体为“邪教”，甚至连全世界通行的基督教传教方式——家庭聚会在中国也遭禁止。

众多为了捍卫信仰自由和崇拜自由的中国信仰者，受到残酷镇压，其残酷程度比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迫害还要严酷百倍！

现在中国人民的苦难已经达到了最恶劣的境地，当然中国的权贵的生活，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奢华的地步。他们豪赌、豪嫖、豪抢、豪夺，完全不顾最底层人民的死活。他们欺骗国外一切热爱中国的外国朋友，他们残害国内一切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虽然，目前专制主义条件下中国的上述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新闻监督却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当然，新闻还是被中共牢牢地控制在其怀中，但是，一些有良心的“文胆记者”突破防线，把人民的苦难揭示了出来。

现公布第一批有良心的“文胆”记者的姓名、个人网址和他们的工作单位的网址给大家。请大家热爱、慰问、支持他们。

伟大中国的复兴，伟大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们功不可没。

第一批有良知的记者及其单位的联系信箱

（全国维权访民应人手一册）

林韬 terry-lin@263.net　　俞圣宏 yushenghong@163.com
刘海铭 cnxw110@163.com　　李新德 fazhijizhe@126.com
鲁宁平（1）luningping@yahoo.com.cn　　鲁宁平（2）luningping@yahoo.com.cn
姜焕文（1）zhentan007@126.com　　姜焕文（2）jubao007@126.com
阿成：qzac@sina.com　　李方：yayawu_2000@yahoo.com.cn
涂艳 tuyanwin@sina.com.cn　　谢庆立：xql@jcrb.com.cn
羊艳 yangyan212@sina.com　　冯广博 myf197@263.net
“小丫”： cctvxiaoya@vip.sina.com　　柴子文：chaiziwen@vip.sina.com

新华网新闻部邮箱：xhsgnb@xinhuanet.com
人民网新闻部邮箱：rm@peopledaily.com.cn
中国网新闻部：webmaster@china.org.cn
焦点访谈 ab30@mail.cctv.com
《人民日报》(1)：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2)：cb525@peopledaily.com.cn
《焦点访谈》栏目 ：ab30@mail.cctv.com
《东方时空》栏目 ：baixinggushi@263.net
《新闻纵横》栏目：xwzx@cnradio.com
《法制在线》栏目：fzzx@mail.cctv.com
新华社总编辑室：xhszbs@xinhuanet.com
新华社国内部： xhsgnb@xinhuanet.com
《社会记录》栏目：shjl@mail.cctv.com
央视新闻调查 ab35@mail.cctv.com
半岛晨报核心报道组 bdcb@163.com
南方周末 百姓记事、茶坊 nfzmxl@163.net
南方都市报时评（1）shipingban1@vip.sina.com
南方都市报（2） shipingban2@vip.163.com
京华时报 各地/声音 gn@beijingtimes.com.cn
南方周末 视点：nfzmlyd@163.net
华夏时报 百姓记事和百姓茶坊 bidao@vip.sina.com
杂文月刊 zw_yk@sina.com
广州日报每日闲情：mrxq@gzdaily.com

文汇报．虚实谈：pyd@wxjt.com.cn
重庆晚报 市井//夜雨 fkb@mail.cqwb.com.cn
中国审计报周末：songyue3816@sina.com
成都晚报 ldonglin@vip.sina.com
合肥晚报 庐州夜话：liaoqw@hotmail.com
检察日报 观点：ljc@jcrb.com.cn
检察日报 绿海：zj2000@jcrb.com.cn
经济视点报．时评：fangzifangzi@sina.com.cn
南风窗：window@nfcmag.com
深圳特区报：周末观察 zjchen@szszd.com.cn
新闻周刊：huangaihe@chinanews.com.cn
中国电视报．民间文汇：zhaohanguang@2911.net
中青报・法治社会：fzsh2000@vip.sina.com
中青报 经济时评：jjshcyd@263.net
南方周末观点：qzhd@vip.sina.com
科技鑫报：xufeng1971@vip.sina.com
湖北青年报 时评版：caoermo@163.com
每日商报：lcxlang@mail.hz.zj.cn
央视 315 信箱 315@mail.cctv.com
重庆时报联手央视两会报道邮箱 zhengfabu@163.net

郭泉：民主先声 103：大学生们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谎言、反对专制、反对党文化

今天，几个即将毕业的大四男生到城里找工作。下午，他们顺便到随园校区来看我。

他们看到我很开心，说："很后悔上郭老师的时候没有好好听课，翘了很多课。以前上课的时候，郭老师说中国还没有完成民主革命，我们还在下面笑老师傻。现在一到社会上才知道，我们才真的傻。这个社会的确需要革命。社会太不公平了。"

我忙问："怎么了？"

一个同学忿忿地说："几乎所有的公务员职位都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员。"

我笑起来："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你们在学校里养尊处优，根本不知道人民疾苦。我在课堂告诉你们真实的中国情况，你们却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说我都快四十了，怎么还这么愤？现在终于临到你们愤了吧。"

然后，我和他们谈到了古代的科举制度，我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现在的官员录入和监察制度，别说根本无法得到当代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连封建皇帝的科举、吏治制度都比不上呢。

中国科举制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客卿制"。当时诸侯国君为了争取人才，大多能"礼贤下士"，奉行"选贤任能"的原则。东汉末年，曹操力倡"唯才是举"，打破族姓阀阅旧习，识拔奇才，不拘微贱，且"能用度外之人"。一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曹丕即位为魏文帝以后定"九品中正制"作为吏部录用的依据。"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隋代确立科举制度，以试策取士，不拘士庶之别。宋代"取士不问家世"。

而中国共产党机器把持的政府呢？大量的职位却规定了必须是"皇党"才可以准入。这真的连中国古代的皇帝都不如呢！

这种区分"皇党"和非"皇党"的公务员录用方式，难道不是对人民的蔑视吗？

我上网做了一点功课。查了国家教育部、国家民政部和国家人事部这三个与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的专业部门，却发现：

国家教育部 2007 年招考 10 个岗位全部限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 2008 年招 15 个，也全部限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国家民政部 2007 年招考 17 个岗位，其中 12 个岗位限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 2008 年招 13 个，却全部限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国家人事部 2007 年招考 6 个岗位，其中 4 个岗位限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 2008 年招 8 个，却全部限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是对数以百万计的非党员大学毕业生的歧视，有血性的大学生对此不会漠然视之。

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说满清黑暗腐败，但是就连这个我们认为最黑暗的满清也没有规定进京赶考者必须是皇党成员，必须是皇子皇孙！

中共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专制接班人。满清的科举制度，虽有舞弊，但是满清对考试作弊的考生和官员严惩不贷，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惩处过几个作弊者？

到底谁黑暗？到底谁最黑暗？中国共产党还把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党文化”课程强行塞进了大学的课堂，对中国大学生进行专制主义洗脑。美其名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牢牢占领大学课堂”。而中国古代除了“罢黜百家”的几个特殊的时代，唐朝以后，就提倡儒学、道学、佛学“三教圆融”了。

进入 21 世纪了，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在增长，大学生开始思考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们反对单一专制意识形态的灌输，反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他们的声音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网络，表达了出来。

郭泉：民主先声 104：看看中共是怎样把“政协”变成中共的一个“联合支部”的

在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政治事物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积极响应、参加。 但是，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安排了一些民主党的领袖做了一些部的部长、副部长，甚至副主席，并以此“人事安排”悄悄取代了“民主联合政府”。

1954 年 9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里再也不提“民主联合政府”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开始了。虽然共产党对外宣称，政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随后，毛泽东在 1957 年对提出要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各民主党的民主人士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完全暴露了共产党的专制本质。

以后的几十年，共产党不断地用与各“民主党”“政治协商”的方式欺骗人民。例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写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是，各“民主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会被执政党采纳呢？政协是否有强制要求执政党采纳意见和建议的权力呢？换句话说，如果执政党不采纳各“民主党”的意见，政协能怎么样呢？

答案是，如果执政党不采纳各“民主党”的意见，不仅各“民主党”没有办法，政协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因为“政协”里一半以上的主席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2008 年 1 月 11 日，吉林省政协十届一次主席会议在长春南湖宾馆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十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建议名单；审议通过省政协常委会 2008 年工作要点（审议稿）。

省政协主席王国发主持会议，副主席林炎志、别胜学、徐学海、常显玉、任凤霞、薛康、赵吉光、支建华，秘书长王尔智出席了会议。

我对吉林省十届主席会议的成员做了一个功课。结果却发现 9 个主席中有 5 个是中共党员，他们是：王国发原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副书记；林炎志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徐学海是原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长；常显玉是原吉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任凤霞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9 个主席中的 4 个“民主党”是：别胜学（无党派人士），原通化市政府副市长；薛康，民进吉林省主委、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赵吉光，农工党吉林省主委、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院长；支建华，九三学社吉林省常委，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而这个主席会议的秘书长，王尔智是原中共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中共就是这样把“政协”变成中共的一个“联合支部”的。这样的政协除了能起到花瓶的作用，还能起到什么

作用呢？

郭泉：民主先声 105：杨帆门事件、萧瀚教授以及南京的大学生民主意识

昨天（2008 年 1 月 15 日），南京下了第二场大雪。美丽、古典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银装素裹、安详静谧。南师大是百年老校，百年来，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从昨天一早到晚上，不断地有很多其他高校的师生来我们学校观赏雪景。

这学期我在南京的三所大学做任课教师。南师大是我的本职，其他两所是客座教授。2007 年 12 月 6 日，因为我 11 月 14 日通过国际互联网向中共及全国人民发出“终止独裁，还我民主”的公开信，而被中国共产党取消教职，下放到随园校区文学院资料室任资料员。

不经意间，已有月余。每日上下班进出校园，深深感觉校园的美丽。从深秋到隆冬，我心激越而又安详，正如这美丽的校园雪景，一边是静谧的飘雪，一边是打雪仗的漂亮女生英俊男生的喧闹欢腾。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叫“小恬”的女生从 40 公里外的校区赶来看雪景，她“顺便”来我办公室看我。我说：“太好了，我们一起去玩雪。”

学校大操场上都是打雪仗的同学。学校大操场就是我的办公室的后面。她说，“还有一个女同学马上来，她坐另外一条公交线的，刚才来过短信了，说快到了。”

和她边看雪，边聊天，才知道学校搞过几次关于我教学内容的小规模的学生座谈会。我问她是什么部门，她说“不知道，他们没说。我们也不想知道。他们很无聊很无耻，说的话让人恶心。”

我正要问是怎么回事。她噗嗤笑起来，说，“也很好玩，阿花这下出了大名了！”

阿花是个漂亮女生，是班上出了名的翘课大王。我担任副教授 5 年来，上课几乎不点名。即使点名也是因为想认识一下同学而已。我一直坚持认为，用点名的方式强迫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实在很专制。对翘课学生说明上课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至于学生不听，那就是咎由自取，教师也就尽到了责任了。大学教师不可能和中小学教师那样，强制学生听课。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对象是未成年人，而大学教师的教学对象都是成年人。对成年人进行强制教学，即使教师的用心是好的，那也是专制主义的。

我发现阿花虽然翘课很多，但是期中小论文却写的很有独立思考，不是那种直接到网络上 down 下来的无脑文章。有次，她第一节课没来，第二节来上课了。课间我问她怎么会翘这么多课的。她眨着大眼睛，无辜地说：“你的课早上第一节就开始上了，我起不来。我属于那种要睡到自然醒的人。你看，我今天不是来上课了吗？虽然第一节课没来，但是现在我来了。要不是看在郭老师的课的份上，其他老师课我才不起床呢！老师，你很民主，于是我也就支持民主了，不睡懒觉了！”

哈哈，看着她满脸不情愿的样子，我笑起来。原来，对她来说能来上我的第二节就是对我的很大的鼓励了。

我忙问小恬，“阿花怎么了？她怎么出名了呢？”

小恬说，那次会议，她和阿花都去了。主要是问了我在课堂说对学生说了什么。她们回答：“没说什么。”

然后又问：“上课怎么能不说什么呢？”她们回答：“郭老师讲课的呀！”

然后又问：“讲课讲了些什么呢？”于是她们反问：“你说讲课能讲什么？”

估计那些人鼻子都气歪了。于是又问：“有同学反映说郭泉上课讲了与课文无关的东西是吗？”她们回答：“有人反映那你们去找反映的人去，我们没有听到郭老师说什么与课文无关的东西。”

然后又问：“郭泉有没有在课上说到民主？”

这时阿花开口说话了：“不错，郭老师在课上说了民主也说了爱国，但是我认为民主与爱国，是与课文密切相关的。”

然后又问：“这位小同学，你不认为文学课堂就应该讲文学，而不应该讲民主吗？”

阿花站起来：“首先，我不是小同学，我 20 岁了。我是女大学生，而且大三了。其次，文学不是花花草草搂搂抱抱，文学就是革命，文学就是民主，文学就是爱国。你有没有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这是文学还是革命？你有没有读过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个梦》，这是文学还是民主？你有没有读过岳飞的《满江红》，这是文学还是爱国？”

这下那些提问的人傻了眼。阿花接着说：“如果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不讲革命，不说民主，不谈爱国，那简直就是狗屁。这就是我最讨厌那些狗屁教授上的狗屁课的原因。我告诉你们，郭老师就是因为他太爱国了，才被你们停止上课的。你们对爱国教授的迫害，必然导致全国大学生的示威和反抗。”

小恬说，那些人还想插话，阿花接着说：“你们有没有礼貌啊？我还没有说完。我说完最后一句话，你们把我抓走我也无所谓。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郭老师认为民主就是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我要再加上一句话，革命，就是阶级复仇。你们等着。好，我说完了，你们有种抓我走呀。反正这个狗屁学校我也受够了！”

面面相觑，然后还是面面相觑。于是，散会。

小恬告诉我，那天晚上阿花回到宿舍里一言不发，好象在想什么。小恬就问她怎么了？阿花很认真地说，“监狱里有没有双人间啊？如果有的话，我和郭老师一间房间，就可以把我以前翘的课补回来了，而且就不要起早了，在床上就可以听第一节课了。”于是宿舍里笑了阿花一个晚上。

哈哈，我也笑起来，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男女双人房的监狱。”

小恬笑着说，“是啊，第二天，阿花就成了校园里的除了郭老师之外的，第二名人了。”

这时，阿花从远处跑来了，手里捧着一大束的腊梅。红扑扑的笑脸、灿烂的腊梅映衬着白雪，显得格外的美丽。“郭老师，这是给你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万花丛中，只有梅花合配您。”

我问，“阿花，现在下雪了，估计第一节课你又起不来了吧。”

阿花一边揉着一个雪团，一边一脸不情愿地说：“起床干什么啊？我才不想去听狗屁教授的课呢！”

小恬说：“郭老师，你不来上课后，阿花就没在中午 12 点前起过床。今天是个特例，她听说要来看你，9 点多就起床了。”阿花把手里的雪团塞进了小恬的领口。小恬立即叫起来，大声说：“郭老师说了，监狱里没有男女双人房！”阿花立即瞪大了眼睛，看看小恬又看看我，突然爆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追着小恬打过去了。

今天我真的很开心。看着她们在雪地里闹腾着，我就想到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和萧瀚教授。

其实，学生不上课真的没什么。杨帆教授的希望学生好好学习的良苦用心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为一个班的同学上课不好好听课发过脾气，但是现在想起来，学生都是成人了，对上课教师和上课内容应该有选择权了。你上的好，学生就愿意听，你上的不好，学生就不愿意听。大学的课堂应该是提供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强迫学生必须听你的。有选择的权力，这就是民主。中国的大学生应该可以选择教授，这和中国人民也应该可以选择执政党是一个道理。这就是民主，你不得不服！

也听说萧瀚教授为学生说了几句话，遭到压力，愤而辞职，并在最后一节课上谈到了六四死难烈士。八九那年，我上大二，不知道萧瀚教授是上大几？或许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也说不定呢。反正你现在也辞职了，我也被解职了，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有空到南京，我请你喝酒。如果阿花、小恬也在南京的话，我请她们作陪，找一条南京老街，温一壶酒，点几碟金陵小菜，我们来聊聊南京和北京的大学生的民主意识怎么样？

最后，请与萧瀚教授有来往的朋友，帮忙把这篇文章转给萧瀚教授，感激不尽。

郭泉：民主先声 106：21 世纪南京必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未来的民主运动中心

中共极权统治遭遇的两大挑战都是因为对亡者的悼念。一是 1976 年因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四五民主运动，另一是 1989 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六四民主运动。

这两次民主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历史上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一个“民主总力量汇聚”里的一个环节。民主运动中的所有失败，都将愤怒、激情和斗争智慧作为重要的遗产，被下一次民主运动继承和运用。

所以，民主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多，政治智慧越用越好。而专制，作为民主的敌人，则越来越弱，手段越来越少，越来越白痴。

21 世纪，专制的唯一武器就是“杀人”。而中国人民早已不怕死了。在专制主义下，中国人民生不如死。数千年来，中国人民的要求不高，只求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但是，现在共产党执政当局，却搞得民不聊生。在这样一个生不如死的社会里，《老子》第七十四章有句话说的很贴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人皆有求生之本能，人皆有避祸之天性。为何人民会“不畏死”呢？很显然，人民有比死更畏惧的东西。孟子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死有所不避也”。也就是说，当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压迫已经到达了让老百姓宁可死也不愿意承受的地步，那么当然就“民不畏死”了。

数千年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比死更畏惧的东西，是专制，当今也不例外。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以死抗争”、“民主革命”会成为永远时髦的词汇了。

其实，统治者对于民众的治理，不外乎“恩”、“威”二种方法。

治理天下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有了这个“百姓心”作竞选基础，执政党才有“威”的施展余地。“威”是建立在老百姓用手里的选票表达对执政党的“信”的基础上的。

如今之中国，极权统治者在没有“百姓心”的情况下，不“恩”却“威”，这能吓到谁呢？只能吓到那些甘于被专制极权统治的“奴才”而已。

对我们这些内心要求民主，而外在却时刻感受专制压迫的人来说，不民主勿宁死。入狱、被杀，是所有民主人

士的必修课。人，总是要死的。为了民主而死，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何尝不是一种归宿呢？汉语中有个成语真的很传神，那就是视死如归。

虽然，1976 年因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四五民主运动和 1989 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六四民主运动都发生在北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1976 年的那次民主革命就是在南京引爆的。

1975 年 9 月，南京制药厂的职工徐水良先生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反对特权》、《战斗宣言》、《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等四篇共约四万字大字报。这四份大字报当天深夜就被中共当局撕去。随后，中共江苏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对徐先生进行批判。 徐先生的大字报和文章主要是论述反对特权官僚等级专制制度，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文中还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理论权威。不久，徐先生入狱。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和四人帮用各种方法阻止悼念，引起南京人们的不满。南京人民开始把四人帮当成了专制极权的代名词而投以怒目。

3 月 24 日，江苏新医学院 200 多名学生和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激起群众的愤怒。

3 月 25 日，《文汇报》刊登一篇报道，文章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南京大学学生把这句话加了红圈，贴到校门口。800 多名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分成 20 个小组，到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上刷大标语。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在党支部书记秦锋带领下，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各地的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标语。

3 月 29 日夜至 30 日，更多学校学生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一出南京，大标语就被冲洗掉，就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

这些列车开到了北京，开到了全国各地。把反对专制主义的声音带到了全国各地。

在 1976 年 3 月末的几天里，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4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情况。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

《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南京事件引爆了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4 月 16 日晚 8 时，中央政治局为江苏问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说："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质是一样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对政治事件的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要彻底追查，进行打击。"随后，南京市各单位和解放军驻宁部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逮捕了秦锋、郑信、陈帮水、王运德等 17 名"要犯"。

文革结束后，虽然南京群众和江苏各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徐水良先生，但当时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极力反对，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也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搞民主，比四人帮更坏，指示南京市再一次开展批判。

徐先生在文革结束三年后，才在 1979 年 1 月出狱。出狱不久，因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再次入狱，直到 1991 年 5 月刑满释放。

由南京事件（徐水良大字报、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北上列车上的油漆标语等）引爆的"四五运动"，如果摆在整个中国民主进程中来看，无疑是中国民主进程和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直接受这之前徐水良（南京）、李一哲（广州）大字报的影响而产生，而它的结果，他的继承者，也是七九民主墙和思想解放运动。四五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成为七九民主墙的骨干。中共当局，即使在四五运动平反后的对它盛赞的高潮中，仍然把它视为异类。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仍然受到怀疑和监控，被当作异己分子，异议人士。顺便提一下，广州的李一哲其实是一个写作集体，一般史书都说是三个人。经我的考证，应该是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广州美术学院未分配的毕业生李正天、下乡插队后回城待分配工作的知识青年陈一阳、广东水产制品厂的锅炉工王希哲、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他们于 1974 年 11 月 7 日，在广州市的北京路上帖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署名"李一哲"。这份大字报彻底否定并猛烈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极左体系。

四五运动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意义，不可低估。四五运动毕竟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仅仅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就达到一百万人。加上包括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参与者，规模相当可观。它第

一次在大赞秦始皇的专制黑暗环境中，呼出了“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复返了”的强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专制发出了第一轮的突击。

南京，因为“南京事件”将在中国民运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

如今，中国新民党 2007 年 12 月 17 日在南京正式组党，必将使南京这个悲情也是革命的城市，在中国民运史上留下最光辉的篇章。21 世纪的南京必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未来的民主运动中心。

郭泉：民主先声 107：网络就是我们的武器，网民就是我们的军队

上周六（2008 年 1 月 12 日）下午，每日新闻社（日本）上海支局记者大谷 麻由美女士专程来南京采访我。我和她在南京的古南都饭店的一楼茶厅聊了 2 小时。

她说她采访过焦国标教授和其他很多中国著名的挑战专制的民主人士，但是她认为我是中国最勇敢的人。我说：“这很简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英雄的国家，而英雄在中国古代往往是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其实是以为了理想和信仰而抛弃生命为荣的。我是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当然也不例外。中国人的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被你们日本人学回去，改了个名字叫武士道。”

大谷 麻由美女士瞪大了眼睛，说：“武士道？”我说：“是的。武士道也是以死为荣的。”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大概是的吧。我最早了解您是从您把王直墓砸了开始的，那个事情被日本人认为是愤青行为，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说：“愤青也许在国外不是一个好名词，它代表了极端。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办法不极端。那个墓是你们日本来中国委托中国政府修建的。我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国政府重新审议，然后中国政府自行拆除。这在民主制国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专制主义中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民手里没有民主的武器——真正意义上的选票。”

大谷 麻由美女士说：“我明白了。那么请问你对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如何看呢？”

我说：“21 世纪的中日关系取决于钓鱼岛的归宿问题。如果日本归还钓鱼岛给中国，那么中日关系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日本不归还钓鱼岛，那么，即使中国政府媚日，中国人民也不买账。”

“钓鱼岛的归宿权，中日双方各执己见。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谷女士问。

我回答：“钓鱼岛问题的争端，未来有四种可能。第一，维持目前的邓小平提出来的搁置状况，这是中日政府最喜欢的，但是却是中国人民最不喜欢的。第二、中日双方谈话，日本最后将钓鱼岛归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最欢迎的。第三、中日双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并由国际法庭仲裁。我愿意代理这场国际官司，我手里的所有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证据，使我坚信中国必赢。第四，爆发中日钓鱼岛战争，这是两国人民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日本一意孤行，那么战争就是日本人自找的。”

大谷女士问，“您的中国新民党对日本的态度是什么？中国新民党目前如何进行工作？”我说：“中国新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化，但是目前国际局势下，中国新民党在党章中所明确的对日态度就是我刚才向您介绍的观点。中国新民党目前的工作是通过网络或其他的方式对国人进行民主主义启蒙。中国新民党认为民主就是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大谷女士问，“最近我得到消息中国政府现在加强了网络封锁，这对中国新民党的网络工作计划是否有影响。”

我说：“网络是不可能封锁的。网络宣传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是网站讨论版发帖，第二是网络即时聊天器，例如 SKYPE、QQ、MSN 等，第三还有邮箱、手机短信等等。所谓网络封锁只能封锁第一种，而第二种、第三种根本无法封锁。中国政府目前只能用过滤“敏感字”的方式，对后两种进行干涉。但是，我们的智慧是绝对超越中共政府的。例如中共把政府这两个字设置为敏感字，那我们就写成 真腐，例如中共把游行设置成敏感字，那我们就写成悠行或散步，再例如中共把 PX 设定为敏感字，那我就写成 屁癌克死。于是，我就可以发送这样的信息给所有的手机用户、SKYPE、QQ、MSN、新浪等等互联网邮箱用户，他们一看就明白了。例如，某月某日某时，请所有南京人到南京市真腐门口进行反对屁癌克死的悠行（散步）。伟大的汉字的一字一音特点，简直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发明的。哈哈”

大谷 麻由美女士说：“明白了，你真行！”

郭泉：民主先声 108：民主党的领袖、民主时代的总统都只是人民的一条狗而已

上周日（2008 年 1 月 13 日）晚上，英国第一 24 小时新闻频道天空新闻的亚洲制片总监 Eve Johnson 女士（汉名韩莺）、驻亚洲记者 Peter Sharp 先生（汉名夏锐）和摄影师 Andy Portch 先生（汉名安都）从北京专程飞到南京，在南京的上海路上的一个茶馆里采访了我 3 小时。我们谈了中国新民党的建党宗旨、对外关系。天空频道还告诉我英国首相下周来中国访问，他们希望我对英国首相说些什么。

我的发言如下："英国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侵略过中国，但是中国也因此获得了打开国门认识世界的机会。香港作为一个租借地租给英国 99 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屈辱与荣耀并存。所以，英国有责任在 21 世纪与中国人民一道，帮助中国走向自由和富裕，最终在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国家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

英国天空频道是几年来从外地飞到南京采访我的"最紧张"的一支新闻队伍了。驻亚洲记者 Peter Sharp 先生（汉名夏锐）和摄影师 Andy Portch 先生（汉名安都）都是美伊战争的战地记者。他们这次到南京使用的完全是战地采访的方式。

Eve Johnson 女士（汉名韩莺）先和我约好采访的时间和地点。然后提前了半小时给我电话，说他们已经在附近的地方等我了。要我到了那茶馆就给他们电话。我准时到了以后，坐下来给韩莺女士播通了电话。他们立即抗着摄象机冲了进来。这时我发现茶馆边上有一辆面包车。他们是从那车里下来的。原来，他们早就潜伏在那面包车里了。估计他们在观察我是否有尾巴，或如果有警察逮捕我，他们就在面包车里进行实地采访报道了。

在茶馆的一个小包间里我们完成了 3 小时的采访。韩莺女士说，英国有两大媒体，一是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 BBC，但是 BBC 在英国的受众群却没有英国天空频道广泛。英国第一 24 小时新闻频道天空新闻是英国人民最喜欢看的，英国人民将通过这个频道收看英国首相的中国之行。这次的采访一直是韩莺女士与我联系的，她的汉语说的比我的那些研究生都好。我的一个研究生是江苏常州人，本科研究生都在南师大读的，毕业后也在南京工作，这么多年了一见到她还是满口的常州普通话，受不了！而韩莺女士，如果你不看她的英伦的面庞，你绝对听不出她是外国人。一问，原来她 01 年就到中国工作了，最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在到中国的最初一年里，是在我们南师大学习汉语的。而我那年在南师大做文学博士后研究。

采访中，大个子的摄影师 Andy Portch 先生（汉名安都）的唯美主义工作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折腾我十几分钟后，才选到了最佳的角度，他说："我要把你拍的最漂亮。"我感觉我结婚时拍结婚照的摄影师都没他这么认真。我问："你有两米吧？"他立即用汉语回答我："不到。"驻亚洲记者 Peter Sharp 先生（汉名夏锐）长相老成。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外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的主持人都是中老年人，而中国的都是小美女，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他回答："英国的观众认为新闻和评论节目应该是有丰富社会阅历和知识背景的人来主持，这样可信度强些。新闻政论节目使用小美女主持是不正常的。这会使得新闻政论的严肃性和知识性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认为，夏锐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不过，韩莺女士的话让我忍俊不禁。她说："郭老师，他并不老，他在伊拉克战争中做记者很辛苦，所以就显得老，其实他只有 29 岁。"天哪，我看他感觉 50 多岁。

采访中，韩莺女士问了一个问题很有趣，她问："如果您被逮捕，您的中国新民党怎么办呢？"我笑起来，说："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民主党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民主党的主人是人民，不是领袖。领袖只是人民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已。杀掉一个公仆，人民再选一个公仆来，再杀，那就再选。别说民主党的领袖，就是民主制国家的总统都是人民的一条狗而已，没了领袖，没了总统，人民可以再选。只有一党专制的国家，执政党才自认为是人民的主人，把人民当狗！所以，如果我死了，中国新民党的所有党员按党章选举新的领袖就行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民主万岁！"

郭泉：民主先声 109：民主制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李清博士被限制在南京有感）

2008 年 1 月 18 日，我给被迫逗留在南京的李清博士打了电话，想约他下午到街头小酒馆喝酒聊天，不料他却说被有关部门限制了活动自由，不能出来喝酒。我于是唏嘘半响，看来执政党还是不明白只有民主才能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道理。专制只能导致反抗专制的情绪和行动走向极端。其实，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颠覆、政变、起义、造反）都是因为专制造成的，如果人民可以使用选票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各自的"意思表示"，那么谁会白痴到要去革命杀人呢？

现在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就会乱。"我看，这是完全不懂中国历史的人说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都是因为专制造成的。杀人最多、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专制的产物。

如果是民主制，孙中山也就不需要搞辛亥革命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把满清封建帝制终结了；

如果是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毛泽东的"阳谋"下被屠杀和屈死 55 万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所谓的"反右"的政治决策了；

如果是民主制，中国人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就不会饿死 4 千万人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决策了；

如果有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蒙冤而死千万以上的优秀儿女了，因

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文革”这样的政策出台了；

如果有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八九年发生六四惨案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反对任人唯亲了；

如果有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近十年发生大规模的维权群体事件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出台对人民不利的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了；

如果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那么中国的所有的政党都会认真为人民服务，因为不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是不会把手里宝贵的选票投给他的。

所以，民主制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民主制才是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根本制度。

1 月 18 日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一起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中英两国公众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温家宝引用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话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但是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交换之后，我们每人就都有两个思想。”

很显然，中共党员、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是知道两个思想是对人民最有利的，但是为什么只停留在口头，只对外国人说，不对中国人做呢？中国古语说的好，“听其言，观其行”，这对中国共产党是最适用的。

李清博士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他原来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后在悉尼科技大学获得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为祖国的民主事业贡献力量，本周，他回国祭拜父亲看望母亲，顺便想到南京看看我，没想到却被限制在南京。他通过网络对外界说；“我希望当地官府能让我拜访南京的著名学者刘大生、郭泉等等，都是我慕名已久的，不知能否如愿？” 现在看来，李清博士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现在看来，温总理认同的两个思想也无法同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

李清博士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为人民服务，哪怕是做个小学教师也心甘情愿。中国共产党不能因为政见不同而阻止政治异见人士回国为人民服务。我们所有的对专制主义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都是爱国爱人民的，只是我们不爱专制主义而已。

如果中国是民主制，那么，所有希望中国富强的民主人士都回到祖国报效国家，那该多好啊！

郭泉：民主先声 110：我们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宏大叙事”下对个体生命的蔑视态度

最近一段时间，南京师范大学的中共党委办公室、中共统战部、中共宣传部、国际交流学院、学校保卫处的领导们频繁、轮番与我谈心，努力对我“感化、教育、挽救”。我归纳他们的中心思想如下：“你写给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公开信里的事实，党和大家都是知道，但是，改革是必须有阵痛的，改革是不可能兼顾所有人的，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正在变好，而且越变越好，等国家有钱了，最后大家都会很有钱的。别急，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你看，电视新闻上农民都一个声地说共产党好。”

在我看来，他们犯了个根本的错误，一是在宏大叙事下对个体生命的蔑视，二是在新闻专制下对不同声音的忽视。其中，第二个错误的产生是第一个错误导致的。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宏大叙事”。这个概念是史学、政治学的概念，强调历史发展的某种归宿，并为了这个归宿的实现而忽视过程中的伤亡和损害。因为对“宏大叙事”思维来说，“目的”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而为了这个目的伤亡多少人却是不重要的事情了。

例如，中国共产党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结果几千万人被饿死。最后毛泽东说，“我们的总路线是对的！”再例如，中国共产党为了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千万优秀中国儿女蒙冤而死，最后，毛泽东却说，“文革的功过让后人去评说吧。”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地蔑视人的生命！

例如，为了“中国二十年的稳定”，邓小平下令动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军事手段剿灭中国人民群众要求反对腐败的群众集会，再例如，为了“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了“基地屁”，各种危害伟大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摸着石头过河”了，结果，却是“踩着人民的尸体前进”。巨大的贫富分化下，少数权贵者富裕起来了，而更多的中国人民却面对高学费、高医药费、高物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筹莫展。

这一切都是执政党的“宏大叙事”思维造成的灾难。因为在“宏大叙事”思维下，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执政党自身的所谓的“最美好的理想”或“自以为是”。这种封闭的“理想”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厢情愿的构想型式，执政党往往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或在若干年内根本无法实现而变的急燥而残暴。他们坚信，为了未来的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美好理想，现在的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牺牲）。人民的生命和幸福，类似于棋子，是为了整个棋局的胜负服务的，为了棋局的胜利，哪怕拼成最后一个棋子（当然

这个最后的棋子一定是执政党）。

而当人民疑惑执政党的这个“宏大叙事”的时候，执政党首先会劝说人民，一切都会有的，等国家富裕了大家就都有了，现在国家还不富裕，所以就让少部分人先有了（当然这些人都是执政党庇护的人）。而当人民团结起来挑战这个“宏大叙事”的时候，执政党就立即认为人民是“暴民”而加以枪炮坦克或警棍手铐。

“宏大叙事”就是一种将某种执政党意志强加于人民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话语。专制主义者总是确定好一个对执政党有利的政策，然后强力推行。在推行过程中不管人民的死活。

专制，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例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四川成都市政府不顾农民朋友的反对，以低价，强行拆迁太平村上千亩的土地，过程中多次使用暴力对付村民。村民不满，向多个部门反映，但都不获处理。部份村民一直拒绝迁走，留守村内看护土地，期间亦曾多次发生冲突。最后，成都当局终于在 2008 年 1 月 19 日如愿以偿。该市政府出动数百人员入村，强行拆卸掉了村民集体所有的厂房，近二百名村民到场阻止，期间引发冲突，两名 80 岁的老奶奶村民受伤进了医院而无人问津。

于是，伟大英勇的中共四川成都市政府顺利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大叙事”。当然，大队警察大打出手的镜头，我们在 CCTV 等“宏大叙事”思维下的新闻报道里是根本看不到的。我们在中共新闻专制下，可以看到的就是我的南师大同事们看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电视新闻上农民都说共产党好。”

郭泉：民主先声 111：专制独裁在竭力压制民主的同时，也在鼓励人民群众发动民主革命

目前中国的专制独裁的自我防御机制虽然压抑一切导致政治制度变革的积极因素，但是独裁者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于是他们也在做着体制内的修补。

不过，他们的修补根本不是朝向多党民主制度的，而是对一党专制的完善、加强和巩固。

历史上这样的修补从未间断，但是却总是以失败告终，随后而来的却是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

我们来研究一下三个比较有名的修补，一是汉朝的王莽改制，二是宋朝王安石变法，三是明朝的张居正改革。这些修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留专制制度，而改善君民关系，但是，人民对专制的积怨和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都使得修补以失败告终。

王莽改制真的是一心为民的。王莽改革的核心是“收天下田为王田”，实行“井田制”，“实行五均、赊贷、六莞”和改革币制等等都是为了国家控制资源分配，实现“天下田天下共耕”、“均贫富”的农民式的理想。但是，人民照样对王莽执政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最后，王莽被“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死于贫民之手。

试图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就没有王莽那样的“好心肠”了，他在内忧外患的北宋的变法是在维护专制政权的前提下，搞经济的皇家控制或垄断。很类似于中国前一段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建立预算制度、节省开支、堵塞漏洞；建立政府粮食储备制度，调剂丰歉；帮助农民解“青黄不接”之困的以青苗为信用贷款的“青苗法”；设立具有金融职能又能平抑物价的“市易务”，调节市场搞活流通。此处还有连环自保的“保甲法”，出钱雇人的“募役法”，保障财政收入又减轻小农负担的“方田均税法”等等。这些不切实际的伟大空想无疑遭到当朝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变法也随着王安石的下台而告终。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当时的宋朝不俱备“帝国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的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缺乏汇单、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和借款及抵押借款等等一系列金融和商业法律的基础，也缺乏对假冒、欺骗及监守自盗的惩罚和监管的法规。其变法犹如空中楼阁，必败无疑。

明万历张居正的改革则属于吏治改革，改革的起因是赋役制度的混乱，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吏治腐败。改革的重点是整顿吏治，强化管理，提高效率。如为纠正吏治不清，责任不明而实行“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又如用人“唯才是用”，实行“用舍进退、一切功实为准”；再如实行“一条鞭法”，纠正征税征役方面的混乱现象等等。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样遭到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的强烈反抗，死后落得“身败名裂”，抄没家产，长子被逼自杀的悲惨境地。改革也就此告终。“十年新政，毁之一旦”。

很显然，这样的修补，其实不仅人民不喜欢，而且专制统治者内部也不喜欢。

结合当前中国实际看，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者，也是在专制主义条件下的修修补补。中国共产党拒绝还政于民，一心只想修补。共产党修补的方式是，在保证权贵经济的前提下，给底层人民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例如取消农业税、例如 9 年义务制教育，例如农村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修补方式，在两个方面都“得罪”了人，一是“得罪”了人民，因为人民现在已经不满足这样的施舍了，人民要的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反对贫富分化，在政治上，中国人民希望有权选择执政党。另一方面也“得罪”了权贵者，权贵者反对一切干涉他们的经济利益的改革。

目前，可以说在对待中国的社会问题上，现在的执政党已无回天之力了。不难看出，如果不采纳人民组党、民主竞选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在一个极为封闭的专制制度内，修补（改革）是难以成功的。凡是修补者，不论左、中、右均没有好下场。这就昭示着每个专制时代积累成山的问题不能通过专制制度内部的修补来解决。

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执政党自行实现民主制，要么人民爆发革命。在实现民主制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早改早主动，不改就被动。如果不改，那么人民爆发的民主革命将会为中国人民重新找回公平、公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民主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等待专制者的将是正义和民主的审判！

郭泉：民主先声 112：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大臣要比中国共产党可爱百倍

昨天中午，我下楼买熟菜。家里中饭的其他菜肴都做好了，感觉五味里缺一个辣。好久没吃辣了，辣是革命的味道，不辣就不革命，于是就特想吃一份麻辣的“夫妻肺片”。抓了 10 元钱下楼了。一路上很馋那份久违的麻辣感觉。不料，原本十多元一斤的“夫妻肺片”，突然变成了 28.8 元一斤，足足翻了一番。而旁边一个顾客还对我说，早几个月 8 元一斤的羊肉现在成 18 元了，还不止翻一番了呢。

这时其他顾客七嘴八舌地骂起了共产党：

一个说：“虽然工资是涨了点，但是，涨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物价涨的呢！”

一个说：“你还好，你还有工资，我们下岗职工才倒了霉呢！没有了工资，物价却一个劲地涨！该天刀的，共产党不是人！”

一个说：“共产党只顾自己贪污发财，哪里管你们的牢骚呀。你们除了牢骚，还敢做什么呢？”这个人这么一说，其他人一脸的尴尬，就都不说话了。

这时一个人说，“现在有不少人说胡温亲民，我看是吹牛闭，今年的物价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这就叫亲民？胡温天天在电视上走这家串那家的，开这个会那个会的，好象搞的很爱民，其实物价搞下来才叫真的爱民。否则样子货谁不会做啊？公款旅游啊？今天安徽明天四川的，转筋呢？全中国就他们胡温两个人作秀，自己感觉良好，也不管全国人民是否觉得恶心啊？物价降下来才是硬道理！”

我笑起来，对他说：“人民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两人也明白，只是他们硬着头皮表演下去而已。正如《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也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但是却要硬着头皮表演下去，人民笑话他，他假装不知道。其实他们心里也很明白呢！”

我的 10 元只能买了 4 两的“夫妻肺片”，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却好意思说“人民币在升值”、“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呢？

其实，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目前中国的腐败堕落人民实际生活下降的情况，但是，这个专制体制却使得一切正义的声音只能在民间说，而无法出现在新闻媒体里，因为，中国的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党产”内的工作人员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无法获得生活资料。

于是 CCTV1《晚间新闻》里就有了这样的一组新闻：10 月物价上涨 6.6%，群众一致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而 CCTV4“海峡两岸”却播出了这样的信息：台湾物价增长 4.5%，民众大叫“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台海两地的群众对物价的反应相差这么大呢？事实大家都一目了然，中国人民反映“活不下去了”的声音，CCTV 根本不会播出。

所以，《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指出皇帝“是光屁股”的真话是上不了 CCTV 的，于是胡温就在 CCTV 里裸体表演了。

但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还是很可爱的。他的可爱之处，就是没有派出国家安全部门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但是在中国，说真话的小孩子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中国，说真话是要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的。而且皇帝对说真话的人的控制力度远远超过对物价的控制力度。每年，国家安全部门用于对我的监视、控制、谈话、帮教的钱，完全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或资助 50 个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上到小学毕业。全国用于对政治犯或其他民主人士的控制、逮捕、审判、监狱管理的费用，完全可以实现我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经济体制了。但是，皇帝们不愿意这样去做，他们宁愿抓说真话的小孩子，也不愿意穿起现代文明的衣服、自由民主的新衣。

好吧，就让这些皇帝、大臣们裸体去死吧！

郭泉：民主先声 113：中共利用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帮助中共更好地实现了一党独裁

每次与朋友、学生谈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谈到“人民自由组党”，谈到“人民选举票决制度”，总有个别人问，“郭教授，我们中国不是有人大选举制度吗？这难道不是民主吗？”

这是民主吗？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茶话会和举手会，失去了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实质，例如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提案从 1986 左右提出到目前，超过 20 多年都没有获得通过，您说这样的所谓的

人民代表能代表什么？这样的大会能是什么大会？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朋友被这个制度所迷惑。看来，“党天下”的这一“人大选举”的障眼法还是欺骗了不少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为了欺骗人民，搞出了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个都代表了。言下之意就是共产党才是人民的代表。既然共产党都已经三个代表了，那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呢？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是要做一个形式给外人看，因为实质上谁都知道共产党是一党专制，那么，总得换个外包装吧。即使就是这样虚伪的外包装，共产党也不让人民随便设计和折叠的，必须按照共产党规定的样式去做。

下面我来举我两个朋友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一个是姚立法先生，一个是孙文广先生。

11 月 14 日我致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终结独裁、实行民主、开放党禁、竞选执政”的公开信在除中国外的全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后，姚立法先生立即给我打来电话，说：“郭老师，中国要是按你的公开信这样做，人民就幸福了。中国人民其实根本没有民主权利！”

是的，姚立法先生是完全有发言权的。

姚立法，湖北省潜江市民选人大代表，曾被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为“挑战旧秩序的中国民主战士”。

姚立法连续 12 年自荐竞选，屡败屡战，永不退缩；1998 年 11 月 28 日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人大会议上，姚先生敢于一次次大声地喊出“我反对”，他代言人民，监督政府，不留情面；和穷人交朋友，主动向选民述职，要求做一名专职人大代表。他是一名小学教师，但是却成就了轰动中国乃至中国当代基层民主发展的清晰脉络。

在民间，他被广为称赞和拥戴；但在官方，他却陷于巨大阻碍、威胁和痛恨之中。官民矛盾已不能简单解释这种尴尬的局面，实在是有权有势的太多人心太黑、脸太厚、思想太顽固。他们那些巨大的政绩、金钱、官衔，可以置法纪于外，置人民生计于不顾。

姚立法每次参选都被重重阻挠，参选成功后又孤身作出战，身陷非一般的寂寞和危险。而其他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聊着天，剥着瓜子，嘻嘻哈哈，摇头摆尾……。恰恰就是这帮人，总能把人大会议开得“团结、胜利、圆满”，说他们是“橡皮图章”，都算是够温和的了，并未触到其痛处。每年他们开这个会、那个会，这当中花了人民多少钱？可又真正倡导了多少利事？遏制了多少害事？他们实在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议员”，而是被党权和潜规则哲学直接控制着的“规矩人”。

2001 年的“建党节”，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政经类杂志之一《南风窗》，便是洋洋洒洒两万余字，以《为人民呐喊——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参政传奇》为题，详尽披露姚立法的草根民主实践及其巨大阻碍。“建党节”当日，湖北省潜江市当地的当期《南风窗》被大量没收。官方的掩人耳目之举，竟以“各个报亭没有办理报纸杂志经营许可证”为由，使潜江报亭在一天之内全部变成“空亭”，其效率之高，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

2006 年，记者朱凌采访姚先生，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不料，很快就被中国共产党列为禁书，在全国收缴销毁。

2008 年，1 月 7 日，湖北省天门市城管工作人员在竟陵办事处湾坝村 6 组与村民发生冲突。天门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魏文华路经事发地点时，用手机摄像，与城管人员发生纠纷，被殴打不幸身亡。湖北天门爆发万人游行抗议城管暴行，市民自发设立靈堂，每日前来弔唁的民眾逾千。1 月 11 日，姚立法先生遭到當地公安局傳喚，威脅他不要介入此事。并进一步威胁道：“今後發生任何群體性衝擊事件，都不准介入，更不要向國際媒體報料。”

但是，姚立法永远是姚立法，他的一句名言始终回响在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的耳边：“就是那一排人，他们信誓旦旦……，然而他们却……。”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我的另一位老朋友孙文广教授参加人民代表竞选的遭遇。

孙文广先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民主人士，已经 73 岁了，但是一直重于以行动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2007 年 11 月，孙先生打破了山东大学的死气沉沉的“选举”气氛。他用行动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圈这种现状的进行了宣战、示威和反抗。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忽悠人民所谓的“扩大基层民主”，并忽悠人民说这是在“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从 1981 年起，开始所谓的直接选举乡、镇、县级人大，村选举有“海选”,乡镇选举有“鸟选”。然而，26 年过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民主选举的荒漠。

孙先生说：“如果说农村基层都可以实行乡、镇、县级人大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的话，那么，山东大学这样一个

国家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的重点大学就更能实行基层人大民主的直接选举。山东大学，一所号称百年历史、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集各类大学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共 3 万优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国家级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就更应当够条件实行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然而，在这样的大学，人的文化素质之高，现代人文精神之强，山大仍然要强行禁止民主选举制度在这里通行。这怎么能行？”

于是，孙先生开始了他的选举之路。他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他说：“我已经写了四本书了，三本已经出版。难道我们只能坐而论道吗？争取宪政民主事业最重要的是行动。所以，只要能行动，我首先会去做行动的事，不考虑我的年龄和我手中未完成的重要著作。”

孙先生在学校贴了许多选举海报，但是孙先生白天贴出晚上就被共产党撕掉。孙先生就反复贴，共产党就反复撕。孙先生还在山东大学新校区食堂摆展板，发表竞选演讲，散发竞选资料。中国共产党十分恐慌，每日深夜撕下孙先生的竞选海报，还明令不许山东大学学生阅读孙文广教授的竞选传单，不许听孙文广教授的竞选演讲。最可耻和罪恶的是，共产党还在学生投票时，不许大学生投孙文广的票。共产党的这一罪行，激起了山东大学师生的愤怒。许多同学主动站出来给孙教授当义工，说：“我们那一栋学生楼我包了，请给我竞选的资料，我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去分发。”

共产党还派出便衣特务阻止孙教授在校园内发表竞选演讲，被山东大学师生呵斥得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最后，共产党只得在选票上作手脚。由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原因，孙教授落选了。但是落选的不应该是孙先生，而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我和孙文广教授在多党民主竞选方面的思想完全相同。我致胡锦涛先生的要求终结独裁统治的公开信发表后，孙教授第一个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我。除民主思想相同外，我们还有很多相同之处。我和孙教授的家都被共产党抄过多次，几台电脑都作为“作案工具”被查抄没收。最值得我珍惜和思考的，是我和孙先生都是基督徒，也不约而同地成为真理的实践者。这促使我思考民主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

基督教徒的入世精神实际上就是追求民主、实践真理的精神。孙文广教授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追求民主、实践真理的基督徒学习的。孙教授说：“我们若不实践真理，那么领受、研读、查考、背诵、和默想圣经都是没有作用的。”

郭泉：民主先声 114：“被告席”和“审判台”，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要颠倒过来的

中国人数千年生活在“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最近一百年又生活在“党天下”的淫威下，致使中国的民主意识完全丧失，造成民族性格中出现高强度的奴性。为使这一病态得到根治，具有民主思想的国人前赴后继地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他们最先使用大字报的方式反对独裁，例如著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又使用地下杂志、秘密组党结社的方式宣传民主。如今，网络时代俏然到来，民运的新时代也随之到来。过去的大字报贴在墙上，现在的公开信贴在网络上，传播的更快、更广、更准。

中国的民主人士在网络时代如虎添翼，写下了无数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好文章。中国的民运从“民主墙”时代一举跃升为“民主网”时代。针对这种宣传民主反对独裁的“民主网”，中共只能搬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治罪。

但是共产党再也想不到，如今，人民只要一听说共产党判定某人是“颠覆国家政权”，就立即知道这个人是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民主人士。共产党每判处一个“组织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民主革命党人，共产党就多了一份罪恶。因为，这些“罪犯”，他们心里满满的是爱国之情，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对自由和民主的爱。

不错，他们是在颠覆，但是，不是颠覆国家、不是危害国家，恰恰相反。他们在捍卫祖国的国土安全，人民幸福安康。他们要颠覆的只是独裁专制而已。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期待。

全部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虽然，他们现在站在被告席上，但是他们不是罪犯，而真正的罪犯却道貌岸然地端坐在审判台上。

而“被告席”和“审判台”，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要颠倒过来的。

下面，我要将我掌握的最近几年因从事互联网活动而被判处或即将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斗士的名单公布如下，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1、林海 1998 年 5 月被捕，以“煽动他人颠覆国家”罪名入狱两年。

2、黄琦 2000 年 6 月 3 日被捕，以“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3、蒋世华 2000 年 8 月 16 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拘捕。2000 年 12 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4、綦彦臣 2000 年 9 月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四年。

5、陶海东 2003 年 1 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七年有期徒刑

6、蔡陆军 2003 年 3 月 3 日被批捕，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判刑三年。

7、罗永忠 2003 年 10 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8、杜导斌 2003 年 10 月 29 日被拘留，煽动颠覆罪被判四年，缓期执行。

9、罗长福 2003 年 3 月 13 日，因网上呼吁释放刘荻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11 月被判三年。

10、颜均 2003 年 12 月 8 日，以煽动颠覆判处两年徒刑

11、李志 2003 年 12 月 10 日以颠覆罪判处八年徒刑。

12、王小宁，2002 年 9 月 1 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2002 年 9 月 30 日被逮捕。2003 年 9 月 12 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王小宁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13、郑贻春 2004 年 12 月 3 日被捕。2005 年 9 月 22 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14、李建平 2005 年 5 月 26 日被拘留，6 月 30 日以“涉嫌诽谤”为由被批捕，后更改为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006 年 10 月 25 日，李建平被山东省淄博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 3 年。

15、许万平于 2005 年 4 月 30 日被刑事拘留，于 2005 年 12 月 21 日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16、任自元 2005 年 5 月 10 日在江苏省南通市被拘留，2005 年 6 月 17 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06 年 3 月 17 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7、张林 2005 年 8 月 2 日被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张林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论性文章，2005 年 1 月底，张林计划到北京参加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活动，但是在蚌埠火车站被警方逮捕。

18、李元龙（笔名：夜狼）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 2005 年 9 月 9 日被贵州省国家安全厅刑事拘留，2005 年 9 月 23 日被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监视居住，2005 年 9 月 28 日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决定批捕，2006 年 7 月 13 日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19、2006 年 5 月 12 日河北维权人士郭起真被警方逮捕，8 月底以在网站发表文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起诉。

20、2006 年 8 月 15 日，高智晟被秘密拘捕，9 月 21 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拘捕。12 月 21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21、2006 年 9 月 6 日，张建红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07 年 1 月 12 日不公开审理，一审判处六年徒刑。

22、2007 年 8 月，陈树青因网上发表言论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的罪名判处 4 年有期徒刑

23、2007 年 12 月 28 日，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郭泉：民主先声 115：“反饥饿、要生存”， 来自两个伟大的女性傅月华、陈冰的呐喊

2008 年 1 月 21 日上午 9 点，在位于北京长安街的全国总工会大门前，来自全国工商银行系统的四百余名上访维权人员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强烈抗议中国工商银行强行买断工龄，他们打出标语口号：“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四百余上访人员一度将总工会大门堵死。据情报，还有很多各省份的上访维权人员在到达北京后即被扣留在下榻的小宾馆里，限制了人身自由，而无法赶来声援。上午 10 点左右，大批中共警察赶到，强行把这些工商行上访维权人员绑赴臭名昭著的“马家楼”关押，周围大批围观群众对中共警察投去愤怒和鄙夷的眼光。

1949 年中共统治中国，之后的 60 年岁月里中国就一直处于总是有人在不断地要求生存权的状态，这实在让人感到愤怒。

1949 年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被中共的严重错误的经济政策饿死冻死、以及被中共残酷的各种政治运动迫害致

死的中国人数以千万计。1979 年到 2008 年这三十年被中共吹嘘成伟大的和平崛起、经济腾飞，但是中国人民“反饥饿、要生存”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权贵党。

1949 年以后，中国敢于打出“反饥饿、要生存”口号组织同胞上街示威游行的第一人是一个名叫傅月华的女工。1978 年底，那时北京有许多上访者，要求为他们过去受到的冤屈平反。上访者之一傅月华是一个被单位非法辞退的女商业职工，1979 年 1 月 8 日她用白床单写上“反饥饿、反压迫”和“争民主、争人权”的标语组织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示威。1 月 18 日，傅月华被逮捕。2 月 8 日，“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人民论坛》、《群众参考消息》和《探索》等群体的成员聚集在北京市公安局附近讨论了傅月华案件。他们依据中国的法律，要求当局对此案作合法、透明的处理。同时，魏京生在《探索》杂志上发表评论，揭露司法机关的压迫特征。

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这次的民主运动。1979 年 3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民主墙运动”搞得太过分了。3 月 29 日，北京市政府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报和“敌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版物。同日，《探索》杂志的发起人魏京生与“中国人权同盟”的负责人之一陈吕被捕。后来，“中国人权同盟”的主要发起人任畹町、《探索》杂志的两位协办人路林、杨光以及“启蒙社”的一些会员也相继被捕。在上海也有数十位异议人士被捕。

2006 年，另一位伟大的女性也在北京组织了“反饥饿、要生存”的示威游行。这个伟大的女性名叫陈冰，她是广西桂林原工商银行“买断”工龄职工。2006 年 10 月 24 日，陈冰组织、策划全国十三省市 100 多名原工商银行“买断”工龄人员进京上访。他们分别于 10 月 25 日、26 日、27 日到工商银行总行、全国总工会门前聚集，提出了请求国家取缔非法的“买断”措施，“断友”重返工作岗位并取得赔偿等要求。11 月，陈冰被中共决定劳动教养一年。陈冰女士是瑶族人，1962 年 7 月 27 日生，大专文化，广西桂林恭城县人氏。

2007 年 12 月，陈冰女士劳教期满，她立即给我电话，说：“我出来了，郭老师，我还有很多工商银行违法买断工龄的资料，我马上寄给你。”可惜的是，不知道是她那里的中共不让她寄信，还是我这里的中共不让我收信，她寄了两次，我都没有收到。

19 日下午，陈冰女士给我电话，问：“郭老师，21 日我们工商银行的断友又要到北京去了。”我说，“我知道了。”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其实中国新民党的大队人马 18 日晚上就已经悄悄进驻北京了。21 日早上，我们通过网络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400 壮士雪中屹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门前的震撼人心的伟大身影。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16：我就不信，多党民主的“选举成本”会比专制独裁的“制度成本”大？

1 月 21 日，南京师范大学放假了。放假前的一周里，中共南师大党委办公室、统治部、宣传部、国际交流学院的领导们轮番与我谈心。虽然多数话语都乏善可陈，但是也不乏饶有趣味的交锋和争斗。

其中，中共南师大党委办公室刘主任和中共南师大党委统治部冯部长的观点，十分突出，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思想的。

我们先来看看中共南师大党委办公室刘主任在放假前一天和我谈心结束前的最后几句对话。我说，“刘主任，我和您在终极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民富国强，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方面，我和您持不同政见。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党带领人民才能走向国富民强，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多党竞选接受人民的选举，才最有利于国富民强。”

刘主任说：“你凭什么认为人民会赞同你的观点呢？”

我说：“您也别说你的就有道理，我也不说我的对。让人民来选择一党还是多党吧。”

刘主任急切地说：“你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太幼稚了！”

是的，如果认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提倡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是一种幼稚的话，我愿将这种幼稚进行到底。

晚上回到家做饭，我对我八岁的儿子，“郭称义，爸爸永远只做一样菜给你吃，和爸爸多做几样菜给你选，你喜欢哪种？”

我儿子说：“当然要我选着吃呀！”

连我八岁的儿子都知道有选择是好的，那些提倡专制独裁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呢？到底是谁幼稚？

我于是又问："如果爸爸每天坚持永远只做一样菜给你吃，你会怎么样？"

我儿子说："第一，我离家出走；第二，我问妈妈要钱自己买着吃；第三，我要换爸爸。"

于是我突然明白了很多，原来，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就是我儿子说的第一种；一心干私活不问民主政治的人就是第二种；而我，属于第三种！

除了刘主任的这句话我印象深刻外，中共南师大党委统治部冯部长的几段话也让我回味无穷。

第一，冯部长说："我就不懂票决有什么好，不就是 51 票对 49 票的暴力吗？"

我说："51 票对 49 票不叫暴力，而 7500 万中国共产党对 13 亿中国人那才叫暴力呢！"

第二，冯部长说："我们到外国去过，人家外国的在野党很羡慕我们的执政党对其他民主党这么好；人家的执政党也很羡慕中国的参政党不反对执政党。"

其实，冯部长的这段话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 2008 年 1 月 16 日在广东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如出一辙。汪说："我们的民主方式非常有优越性，西方国家非常羡慕。"他还说："对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民主方式，我觉得我们这种民主方式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优越性，大大降低了民主的成本，提高了民主的效率，台湾现在搞选战，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民主的成本。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非常羡慕我们这种制度的决策效率。"

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如果执政党都给在野党发工资，而在野党不进行攻辩，那就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了！如果这样，专制独裁就是永远不可避免的。

至于他们两位谈到民主的成本问题，这就是我的拿手好戏了。民主竞选使用的钱，根本不是人民纳税的钱，而其实是各党的党费、党产收益和合法捐赠。竞选的一切"花钱"的行为，其实也就是一种消费行为。

而专制独裁带来的制度成本，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人民纳税的钱。

例如：公务员的所谓的公务开销成本。2007 年国家财政收入 3.9 万亿，占 GDP 的 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 GDP 的 16%高出 3.5 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 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 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 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 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吧？

再例如，由于是专制独裁制度，这就使得人民要办事情必须花大把的钱用于"铺路"。 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这个制度成本也不低吧？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以上成本是根本不需要支付的。

说中国目前的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所谓的"民主方式非常有优越性，西方国家非常羡慕"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

郭泉：民主先声 117：如果执政党拒不放弃独裁的话，我们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21 世纪的中国，民主浪潮已席卷整个地球，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已成历史的必然。这一时刻，原本是不需要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民主，但是，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的独裁专制传统的国度，这样一个"党天下"已经完全压倒"人民民主"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如果不革命就无法实现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前苏联中共领导人看到了民主的历史必然性，将苏联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也在上世纪末将台湾变成民主政治体制。这些变化都是在人民的一次次呼声下，由当地领导人主动地顺应民主化形势而做出的决定，于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中国的来自民间的呼声也并不比前苏联和台湾少，甚至更惨烈，但是却始终无法得到执政者的思考，相反却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杀戮。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和愤怒。

最近在与胡迪先生的讨论中，他很关心我的处境，我说，"我不在乎生死"。

他说："万事小心，它们的兽性太重了"。我说："这个当然。他们本就不是人！我不怕"

他说："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别让它们找到下手的机会"。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说："是的，人民对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诚信的基础。"

胡迪先生是广东省新会的民运人士，一直致力于民主中国的建设。他是祭奠林昭运动的发起人。从 01 年至今每年组织网友去苏州灵岩山的林昭墓地祭奠。林昭女士因为说真话，而被共产党杀害。

他说的是实话，最近几年来，中共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几乎很少使用政治罪名，而较多地是找个其他的普通刑事

犯罪的罪名收监。例如孙大午案用的是非法融资，南都案用的经济犯罪，陈光诚案用的是破坏财产和扰乱交通，郭飞雄案用的是非法出版，孑木案用的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等。

如果这些罪名也找不到，那就用其他手段，如用经济手段、诬陷生活问题、诬陷精神病等手段。我在 11 月 14 日发出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后，在 12 月 6 日被通知说我因为违反宪法中“必须拥护共产党”的条文而被决定取消副教授津贴，致使我经济生活受到影响。孔强先生在 12 月中旬发出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后，被强迫承认有精神病，否则就要开除工职。高智晟先生和夫人在路上行走，竟然还遭遇有特殊任务的“妓女”的公然挑衅。高智晟被判缓刑后竟然下落不明。我在一个美国的朋友给我电话说，中国的一个有民主思想的画家，被诬陷偷自行车，这位画家在反驳的时候，警察先生说：“说你偷自行车还算好了，没告你强奸算不错的了。”其他类似在你出差的时候，找个小姐敲开你的房门，然后诬陷你嫖娼的事件层出不穷。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目前中共对民主人士的打击手段极其卑劣。这其实充分暴露了其反动性，如果中共认为中共真的三个代表了，那就让人民选举。中共一方面怕中共选举不上，另一方面又怕人民采信民主选举思想，而把有民主思想的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收监，这哪里有任何的道义合法性呢？

与九十年代相比，中共当局打压民间反对活动的残酷性、力度和范围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是，卑鄙性却在直线飙升。前者是自“六.四”十八年以来民间的积极抗争、代价付出、不断累积的结果，而卑鄙性源自中共对民主人士的思维正确性的恐惧，而试图寻找其他罪名破坏民主人士的名誉，从而诬陷民主人士思维的正确性。

他们为了降低镇压民主运动的政治成本，近些年，中共对政治案件的司法处理，尽量采取非政治化的方式，只要能找到非政治化的理由，当局决不会用政治化的罪名。中共的这一打击新动向虽然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但是，这一动向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捍卫专制利益的 残酷性。所以，我们民运人士的基本态度应该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无论被诬陷什么，无论遭受什么打击甚至入狱被杀也要毫不畏惧。如果执政党拒不放弃独裁的话，我们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郭泉：民主先声 118：大家要警惕中共“五毛党”对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妖魔化”

今天（2008 年 1 月 30 日）吃完中饭，照例先开了电脑，打开了所有的聊天软件（skype、 msn、QQ），然后打扫卫生。孩子在我的电脑桌旁做今天的寒假作业。大约半小时后，我做好家务，去看看孩子的寒假作业。这时我看到我的 QQ 在闪，我立即点开，看到一个 QQ 号为 419968273 的 QQ 留言，他已经下线了。留言如下：

419968273 2008-01-30 13:24:02 郭教授好

419968273 2008-01-30 13:27:08 我是浙江民间维权人士沈炳祥

419968273 2008-01-30 13:41:52 郭泉你不理人?那么牛?原来你也是一个势利小人，沈某眼盲看错你了，象你这种人也能救中国?哈哈哈哈 88

我立即回话：

郭泉 13:49:32　我在陪儿子写作业，开着电脑。

郭泉 13:50:19　你的脾气不适合与人交流

郭泉 13:55:03　我经常开着电脑，但是却在做家务，或者陪儿子玩，看电视，做作业

回完信息，我又去看孩子的寒假作业，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这实在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民间维权人士我见多了，这样口气说话的“民间维权人士”我还真的是第一次遇见。

民间维权人士一般在网络、电话里，都是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当然也会开玩笑，但是开的玩笑一般也都是拿共产党调侃，例如“共产党还没抓您呀？”“共产党还没杀您啊？”之类的招呼语。从来没有类似于这个自称为“浙江民间维权人士沈炳祥”这样的说话方式。

于是我立即到网上查了一下“沈炳祥”的资料，发现这个 QQ419968273 的人说的话怎么也不象是一个已经 58 岁的民间维权人士沈炳祥先生的德行。沈炳祥先生的资料如下：

沈炳祥，男，1950 年1 月11 日出生，浙江省上虞市人。2000 年通过考核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一直在上虞市沥海法律服务所执业。2002 年上虞市沥海镇开始刮起非法征地之风，大片基本农田被当地官员非法低价征用高价出卖，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成了一张废纸。沈炳祥看到承包土地被卖，农民们得不到补偿，又没有工作，叫他们如何生活？于是，沈炳祥将上虞市非法低价征用农田，高价出卖的违法腐败行为向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进行了举报，得到了许多新闻记者以及维权人士的重视和帮助，终于惊动了中纪委。在中纪委的关注下，一举将上虞市大小腐败官员四十多个绳之于法。 但沈炳祥 2004 年举报非法征地事件却遭到当地有关人员的打击报

复，至今未能恢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

仔细分析完这个资料我断定中共的“五毛党”现在很害怕我们民间维权人士的横向联合，于是开始挑起我们之间的内讧。历史上所有的武林内斗、宗教内斗，其实都是朝廷指示其鹰犬所为。“五毛党”就是这样的朝廷鹰犬，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雇佣的体系内或体系外的“网络警察”的协警。他们的报酬是每字五毛钱，所以被民主人士斥责为“中共五毛党”。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网络上谩骂民主人士、混淆群众视听、挑拨民运人士以及民间维权人士的内斗或其他形式的不团结。

今天，他们假冒沈炳祥先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对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妖魔化”，他们妄图分裂中国民间维权力量的伟大团结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共对我们民间维权人士团结的恐惧，这也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

郭泉：民主先声 119：我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人了！

美国的火警是 911，而中国的火警是 119。今天，我的《民主先声》也写到第 119 篇了。

关于我的《民主先声》，我要多说两句。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有两层涵义的。第一，我的文章是写于中国的民主制度确立之前的，所以是民主先声，当然，发出民主的声音的人很多，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第二，听惯了大家叫我郭先生、郭泉先生、教授先生，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心里最喜欢的是被大家称为民主先生，所以就按谐音取了民主先声这个名字。

目前《民主先声》的前 100 篇和我已经发出的八份公开信已经提交给袁红冰先生审阅，不知道这两本书是否能得到他的资助出版。出版的时候，我会把其中的几篇修改自网络上文章撤换下来，使《民主先声》（第一集 1-100）全部为我本人的言论。目前正在写的第九份公开信，即将在春节前发出，此公开信将连同前八份公开信合编成一本《郭泉的九份公开信》的书。

忙完这些，我想我死也无憾了。其实，我一直是个不怕死的人。其中的原委有三，第一，我的博士专业学的是中国哲学，其主攻方向是隋唐佛学圆融思想，其中的生死圆融不二思想让我早就参透生死了；其二、我教学的主要课程是国学，其中的仁学思想例如“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对我的影响简直就如同“武士道”对日本人的影响；第三，我是基督徒，耶稣明知道自己要被法利赛人害死，仍然走向十字架，死后复活升天。

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生不如死的独裁专制统治下，死真的是一种解脱呢。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话对我也适用的。

刚才，我忘了我一篇文章的题目了，就到百度（Baidu）上搜索我的名字，结果却发现“抱歉，没有找到与“郭泉”相关的网页。”又到谷歌（Google）上搜索“郭泉”，却被告知“无法访问您所搜索的信息，请返回 google.cn 查询其它信息”。

其实，我对我的名字被封，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毕竟是在独裁专制条件下，要求终结独裁统治，提倡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倡导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

我想，其他和我持相同政见的朋友也一定被封了。但是转念一想，不会呀，因为我在写“徐水良先生与 1975 年的南京事件”的时候，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有他们的名字的呀！于是，我带着好奇的心理，搜索了历史上所有共产党不喜欢的人的名字，竟然他们所有的名字都在。例如：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所痛恨的共产党“异类”，如陈独秀先生、张国焘先生，他们都在！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所痛恨的国民党领袖，如蒋介石先生、副总裁汪精卫，他们都在！

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所痛恨的大右派，如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三先生，他们都在！

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所痛恨的共产党“异类”，如刘少奇先生、彭德怀先生，他们都在！

1976 年后中共所深恶痛绝的民运人士，如任畹町、魏京生、王炳章三先生，他们都在！

1989 年后中共所寝食难安的民运人士，如王丹、王军涛、刘晓波三先生，他们都在！

而我不在了！

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在过去和现在与共产党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都搜索了一遍，个个都查到了，而我却查不到。

这实在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惊讶，而是一丝丝甜蜜。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只有郭泉的名字被封，这让我感叹良久。沉思片刻，我开心地笑起来！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人了！

郭泉：民主先声 120：为中国民主事业，我决定起诉全球最大搜索引擎美国 Google 公司

自 2007 年 11 月 14 日我向中国人民和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领导人发出了八封公开信后，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搜索引擎美国 Google 公司的 Google.cn（谷歌）搜索上就搜不到我的名字了。

在 Google（谷歌）的搜索栏里输入"郭泉"两个字，Google（谷歌）显示是 "无法访问您所搜索的信息，请返回 google.cn 查询其它信息"。其实，我在百度（Baidu）上也搜索不到我的名字，百度的显示是"抱歉，没有找到与"郭泉" 相关的网页。"

百度（Baidu）是中国公司，受中国共产党的胁迫我可以理解，但是 Google（谷歌）是美国公司却也如此受中国共产党的摆布，我就要起诉了。首先，我要美国 Google 公司向我和其他千百与我同名同姓的"郭泉们"出示封我的姓名（郭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我知道美国 Google 公司的 Google.cn（谷歌）与中共政府在 2004 年有个协议，即协助中共在中国的网络上封锁中共不喜欢的讯息，例如自动过滤和一律封杀那些中共所谓的"有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但是，我要求终结独裁统治，提倡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倡导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的思想并非"有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如果美国 Google 公司的 Google.cn（谷歌）认为我的言论有问题，请出示你们的法律依据。

以上只是我起诉美国 Google 公司的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人还是南京郭泉服装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美国 Google 公司封杀"郭泉"这两个字还侵犯了我的公司利益。

本人和本公司起诉美国 Google 公司的各项在美国的法律事务，我已经委托我在美国的好朋友郑存柱先生代理。郑存柱先生是中国民主党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中共十七大之后，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要求实行县市级宪政改制。我另外还会指定其他在美的朋友协助郑先生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 Google 公司是如何协助中共政府封锁民主消息和人权消息的。

美国 Google 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搜索引擎。她的企业宗旨为：Google 是全球驰名的搜索引擎技术开发商和高效的广告宣传媒介。Google 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

Google 的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大学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他们在学生宿舍内共同开发了全新的在线搜索引擎，然后迅速传播给全球的信息搜索者。Larry Page 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世界上的信息编组"。 美国 Google 公司的公开招股说明书里这样写到："Google 现在是时候成为一个公众所有的公司了。这一改变将为我们的雇员、现在和未来的股东以及客户产生巨大的好处，而最大的受益者是 Google 用户"。"在将 Goolgle 转变为公众持股的公司过程中，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企业结构，其它外部组织要想控制或者影响 Google 都会更加困难"。"我们立志将 Google 建成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机构"。

Google 公司的 CEO 施密特对 Google 的行为准则的说明是：Google's code of conduct can be boiled down to a mere three words: Don't be evil.（Google 的行为准则，可以归结为仅仅 3 个字：不要作恶。）

但是，美国 Google 公司的企业宗旨，到了中国却完全变了一副面孔。2006 年，美国 Google 公司向中国市场提供了 Google.cn（谷歌）搜索，但是 Google.cn（谷歌）与中共政府的丑恶合作，使得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从 Google.cn（谷歌）的所作所为里一点看不到 Google"Don't Be Evil（不作恶）"的丝毫表现。

美国 Google 公司从"Don't Be Evil"堕落为中共独裁统治的帮凶走狗只用了 2 年。

Google 在 2002 年是被中共封杀的，当时 Google 表现出不屈的态度，冷静对应，一面与中共交涉，一面推出动态网，迎战中国网络警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当时，雅虎（Yahoo）已经屈服于中共压力，连同微软（Microsoft）在内的 130 多家网络公司，都签字同意在他们的网站上，自动过滤那些中共所谓的"有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把包括"人权"、"六四"、"法轮功"等字眼的信息，一律封杀。当时，社会上把 Google 拿来与雅虎对照，说"古狗颈硬、雅虎脚软"，称誉这只英勇的义犬。

但是，好景不长。2004 年这条古狗一改初衷，竟也屈服于中共，在中国的网络上封锁中共不喜欢的讯息。真是"良心难敌金钱诱惑"，一想到 13 亿人的市场，Google 就从天使变成了魔鬼。当然，一个人想要做违背良心的事，也都可以找到借口。Google 封锁讯息的借口之一，就是"争夺中国市场"。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随便 Google 怎么解释，都绕不开一个字："钱"。 Google 从此为了钱，成了中共脚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

现在，Google 已经完全违背了自己最初的原则而走到恶的极端上去了，Google 只提供符合中共的邪恶信息，而屏蔽所有正义的信息，Google.cn 网站和中共邪恶的中央电视台（cctv）一样完全是一个邪恶的工具了。这事关中国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决定了这巨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导向，所以这问题严重程度非同小可。美国 Google 公司在中国的政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权、民主事业来说，完全是个大灾难。这一错误行动帮助强化中共邪党的对民众的欺骗和邪恶统治已经完全阻碍了世界和平民主进程。

美国 Google 公司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人民的侵害，并赔偿由于 Google.cn 封锁消息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

针对美国 Google 公司的屏蔽中国政府认为敏感信息的 Google.cn 搜索引擎网址，中国人民早已开始愤怒了。为了在中国获得营业许可，美国 Google 公司同意在搜索结果中省略中共政府所反感的信息。 Google.cn 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做出判断之前，不能够得到有关当今世界和中国发生的民主和人权资讯。

值得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高度重视的是，美国 Google 公司并不是第一个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对中国民众封锁信息的公司。雅虎、微软和思科公司为了在中国营业也都做出了与美国 Google 公司完全一样的妥协。这些公司在明知道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反对的情况下，仍然象个精明的小商贩一样一心只考虑中国增长迅速的经济以及一亿多的互联网用户市场，从而服从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抛弃了正义、良知和道义责任，协助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这些公司都是唯利是图的罪犯。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 QQ115659144，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博客 http://cndp.huarenblog.cn

郭泉：民主先声 121：从“民主墙”、“民办刊”到“民主网”：谈中共信息封锁的最终破产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民主墙”时代，大家夜里在家用毛笔愤笔激书，一清早贴到墙上等着大家来看。天蒙蒙亮，来阅读大字报的人群就越集越多，大家兴奋地捧着小本本抄录。第一批大字报还没有抄完，第二批大字报就覆盖了第一批了。有的时候，一个早上，墙上覆盖了好几层大字报。

1976 年 12 月，北京严寒彻骨。但仍有上千人继续书写大字报，成千上万的人冒着零下气温看这些大字报。大多数看大字报的人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党员，他们想从中得到国家变化的消息。

开始的时候，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表示对已故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和对周恩来提出的现代化思维的支持，接着便开始呼吁邓小平复出。例如“我们要求华主席给邓小平同志一个工作”、“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大字报遍布全城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大学。

1977 年 1 月初，李盛平、严江征、郑晓龙、李冬民等人最先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中旬，陈子明在天安门广场的木板墙上贴出《四五运动亲历记》长篇小字报。后来他们把大字报的揭露批判矛头直指仍在台上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局长刘传新。1978 年 11 月 16 日吕林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使得民主墙运动进入高潮。深夜匿名贴大字报的作者们得以取得联系，开始结社。

几天后，中共政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 月 26 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12 月，邓小平在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上又说：“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邓小平接见一个外国记者团时，还公开点到“西单民主墙”，他说：“你们要了解中国的民主吗？你们到西单去，那里有一个民主墙。”邓小平的这些肯定，掀起更高的政治参与热潮，北京发生了两万人的政治集会，上海政治集会规模最多时达到 15 万。

被邓小平接见的外国记者结束了和邓的访谈，随即来到西单民主墙，他们是把邓小平上述话讲给人群最外一层，站在自行车上的人听的，就由这层人墙一层一层向里传递，一直传到最里层，顿时一片欢呼，随后自发组织起游行，外国记者也参加了，经过天安门广场，到达正义路。当时集会群众强烈要求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大力推进民主改革，随后自发结社和民办刊物大量涌现，最多时全国有六十多份。

于是，“民主墙”运动转成了“民办刊物”运动。影响最大的有任畹町先生最早建立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这一组织发表了任畹町先生起草的著名的《中国人权宣言》，中国人权同盟主办了著名的民办刊物《中国人权》；魏京生主办的提出中国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和反对“邓小平独裁”而闻名的《探索》；第一个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徐文立、刘青、吕朴的《四五论坛》；还有善洪、胡平的《沃土》；周眉英的《今天》和四五英雄为主体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选择地支持改革派发表《破除“现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揭批凡是派，与中共理论务虚会议上的党内民主派内呼外应。

“民主墙”运动和“民办刊物”运动的最直接受益者是邓小平。但是，当邓小平坐稳了江山后，其专制独裁

的本来面目就彻底暴露出来了。198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9 号文件下发，该文件称："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

这意味中共体制外的民运团体无法继续生存。新的民主运动只能在体制边缘地带孕育和产生。随后，上述所有为邓小平复出呼吁的"民主墙"运动、"民办刊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民主人士全部入狱，受到残酷迫害。

"民主墙"运动、"民办刊物"运动之后，随着网络这一新的传播工具的滥觞，民主人士立即掌握了这一全新的战斗武器，"民主网"运动开始了。

网络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传播武器，已经让奉行专制独裁主义的中共捉襟见肘了。过去是把知情人、传播者抓起来、看起来就可以达成封锁消息的效果的，但是，现在，只要知情人和传播者能在被抓捕前有 10 分钟的上网时间，消息一旦发出去就如核辐射般无法阻挡了。消息在网际的传播不受警察的暴力逮捕，只受网络警察设置的"过滤词"或"敏感字"的阻挠，但是这个"阻挠"对一字一音的汉字是起不到任何限制作用的。例如，如果"政府"和"游行"这两个词被阻挠，网民完全可以把这两个词改写成谐音词"真腐"和"油行"。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阅读并理解诸如"本周日上午请大家到市真腐门口油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际传播不需要长途跋涉，不需要提心吊胆，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文件轻松一键搞定。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除了作爱，无须见面"。这比"民主墙"运动、"民办刊物"运动要安全高效很多。

维持独裁专制统治的最大需求是对信息的垄断发布，这种垄断发布在非网络时代是轻而易举地做到的。但是在网络时代，愚民政策根本愚不了网民。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免费下载"自由门"、"无界浏览"、"花园"、"世界通"、"火凤凰"等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直接睁眼看世界。

网络已经把所有要求民主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了。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民主声音，都能在一夜之间传遍所有的民主聊天室（群）。网络已经使得中国的所有民主运动人士零距离。"民主墙"时代的大字报和"民办刊"时代的地下报纸刊物，在当今就是一篇篇"网文"，就是一个个"好贴"。

从"民主墙"、"民办刊"运动发展到今天的"民主网"运动，中共想通过信息封锁来达到其维持独裁专制统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正在并必将最终被中国人民的"民主网运动"终结。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 QQ115659144，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博客 http://cndp.huarenblog.cn

郭泉：民主先声 122：为维权斗士孔强先生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通知

为维权斗士孔强先生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救第三号令）

本案案情：

中共十七大后，山东省曲阜市工商局干部孔强先生向国家领导人发出了要求惩治腐败、匡扶正义的多封公开信，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一致称赞。孔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中华申正网"的创办者和注册人，长期以来孔先生致力于中国民间维权事业，投入大量心血，得到全国各界正义人士的一致好评。

但是，孔先生的义举善行，却遭到了中共曲阜市工商局的残酷迫害。

2008 年元月 18 日该局突然停发孔先生的工资收入，致使孔强先生的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孔先生的父母无法理解中共这种迫害爱国好儿郎的行径，悲愤过度双双病到，至今仍在住院治疗。如今年关将近，孔先生一家的生活遭受极大的窘迫。

为了表彰和支持所有因为维护人民的生活权利而被捕入狱或遭遇各类经济、政治迫害的
维权英雄们，为了让正在浴血奋战在维权第一线的维权英雄们无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更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投身维权的第一线，中国新民党再次向中华全国各族同胞启动对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请大家接此通知后，将善款（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直接打入孔强先生的银行卡中。

中国农行卡号：6228481330364939314，户名：孔强，电话：15963062157，0537-4985159_ _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程序为：

1、当出现维权人士被中共非法劳教、劳改，或遭遇各类经济、政治迫害，其本人或家属应立即提供维权英雄或其配偶、父母、直系子女的旧有或新办的银行卡号给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

2、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统一发布"为维权英雄（某）的募捐一事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3、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打卡金额，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

4、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奋力转发此信息，力争迅速传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权英雄的作为，争取更多的国民救济。

5、维权英雄家属应当根据实际处境，定期告知善款到帐金额。

希望中华全国全体人民都来接济被迫害的人民英雄，让他们的家属得到最好的经济补偿。一人募捐 50 元，1 万人的募捐就是 50 万。2 万人的募捐就是 100 万。

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不仅要得到荣誉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同时，还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奖励。

为中国的民主和幸福而奉献牺牲的人，理应得到来自中国人民的丰厚待遇。

最后，郭泉恳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要阻挠维权英雄家属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来自全国人民的国民救济。如果发生任何阻挠事件，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承担。

附件：国救字号“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启动一览表

1、国救第一号令（李国宏）邮政储蓄卡号：6221886530061797032，户名：皮运霞

2、国救第二号令（赵德富）中国农行卡号：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富

3、国救第三号令（孔强）中国农行卡号：6228481330364939314，户名：孔强

郭泉：民主先声 123：就 2008 年 2 月 4 日中国网民党的成立，谈中国网民的网络革命

今天（2008 年 2 月 4 日），中国新民党长沙党部代理主席张不为先生接受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的指令，组建了中国网民党，并出任中网党代理主席，领衔负责中国新民党的网络革命指导工作。张先生 31 岁，学生时代即立志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几年来热心民主事业，关注维权斗争，曾在去年一年里遭遇中共迫害致使损失财产五万之巨。

2007 年一年，中国网民在找真相、说真话的行动中，表现突出，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现举三个杰出的战例：

第一例：2007 年 6 月 5 日，无锡市市长书记在湖滨饭店开会研究蓝藻问题，表示“其实我们这几天在水厂里已经喝自来水烧的开水了，”并当着记者的面喝下 “自来水”。其间还专门让另一领导监督烧水，使用透明杯以示“真实”。事后网友查出该饭店使用德国 SBOK(世保康)家庭厨房净水系统。原来领导喝的此“自来水”非百姓喝的彼“自来水”。

第二例：“嫦娥”上天了，不见了，又出现了，传回来一张照片。网友 LiuJun 发现，在相同区域，嫦娥月照比“NASA”（ 美国宇航局）的照片多了一个撞击坑点。欧阳自远（“嫦娥一号”工程首席科学家）驳斥了这一说法，表示嫦娥月照多出来的一个小坑，或许是美国图像的分辨率还不如中国的图像分辨率高，或许是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间月球遭受新的小天体撞击而形成的。人称“欧阳坑”是也！同一天，网友“美的眼睛”通过仔细比对，发现嫦娥月照中的两个坑对应的其实就是“NASA”中的一个坑。也就是说，要么是美国的图片拼接错误，要么是“嫦娥”的照片拼接错误，但不会是新的撞击点。中国网民们随后发现，拼接误差不是这一个点，而是一条拼接线，有的地方被修正得很完美，也有的地方出现了“重影”。 2007 年 12 月 6 日，欧阳自远表示，怀疑照片的真实性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是对 17000 名工作人员工作成果的否定！照片的真实性“不容任何怀疑”！并称拼接细节问题“不值得一谈”！

第三例：2007 年，那是一个秋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陕西省拍了一只虎，神话般地顶起张张树叶，奇迹般睁大圆圆眼；虎啸啊，唤醒了长城内外，照片啊，红透了大洋两岸；啊，网民，网民，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众打虎的秋天！华南虎的摄影者周正龙信誓旦旦地说：“我认为是百分之百是真的，没有一点假”。 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说：“是真的！”于是，中国网民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后发现这是一只拍摄自年历画的“纸老虎”。然而林业厅的宣传主任却不耐烦地说：“没料到网友会如此不信任政府发布的消息”。最后，“纸老虎”终究还是“纸老虎”。

更多的例子我也不多举了，我相信 2008 年将是中国网民党创造辉煌战绩的一年。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新闻，只有宣传；中国的“新闻”里根本没有真相，只有谎言。这正是中国网民党大展鸿图的时刻。

我想 2008 年，除了揭批谎言外，中国网民党还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中国网民党可以积极调查中共不愿意公布的事件真相，例如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县凤大公路堤溪段的凤凰大桥坍塌，所有新闻里根本没有最基本的伤亡人数、没有事件的基本资料、没有设计单位的名称、没有施工单位的名称，读者最迫切想知道的新闻要件全不出现。

但是，却出现了 14 名官衔姓名齐全的官员的高尚事迹和死难家属的感恩感德之言。例如新闻里出现了“抢救得力，死难家属情绪稳定，善后安抚工作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最让人感到玩味的是新闻报道了以下事件：“8 月 16 日下午，遇难人员刘腊平的父亲，刘康身老人将一面印有‘热情服务，人民公仆’字样的锦旗，专程送到凤凰县

人事局局长龙桃英手中；截至 8 月 17 日，已有遇难者家属送来了 4 面锦旗到县委、县政府，以感谢他们的工作。”一场渎职造成的灾难被中共政府和中共新闻演绎成了“凤凰沱河桥梁坍塌真是全球桥梁史上标志性的盛世盛事”，真是让人愤慨、令人发指！

类似这样的事情，中国网民党应该做的事情是，积极地有组织地调查死难者的人数、姓名、年龄、性别，发布事件真相，让中国人民看到在中共新闻里看不到的事实真相。

2008 年新年伊始，一场大雪让中国南方陷入皑皑冰雪中，到底冻死多少人、到底饿死多少人，他们死在哪里？他们叫什么？他们是男是女？他们曾经以何为生？最近又传出广州火车站有滞留旅客被践踏而死，那么他叫什么，他家在哪里？中国网民党应该紧密团结起来，分工合作，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还历史一个真相，让每个最平凡的人在这个国度都能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事迹。

让善良不被埋没，让邪恶无处遁形。

让每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呐喊都能传遍全世界，让一切希望中国民主强大的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追求和浴血奋战。

已经开始的 2008 年，是网络战争的一年。

这一年里，网络是我们的武器，网民是我们的军队！

最后，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民主强盛！

附录：

中国网民党章程暨成立宣言

序言

一、中国网民党的性质和宗旨序言

二、中国网民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三、中国网民党的三大基本任务

四、中国网民党的党员登记、党部设立与党费党产

五、中国网民党党员的日常学习与工作

六、中国网民党党员的誓言

2007 年是中国网民胜利的一年，“华南虎”、“欧阳坑”等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事件都一一遭到中国网民的深刻揭批。这充分说明了在网络时代，愚民政策愚不了网民。中国网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决意组建中国网民党，作为彻底抛弃盲信、盲从的象征，作为中国从此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作为中国社会民意表达大变革的里程碑，我们站起来了。

一、中国网民党的性质和宗旨：

1、中国网民党似党而非党

2、中国网民党只有人性没有“党性”

3、中国网民党只有团结互爱没有阶级斗争

4、中国网民党只有合法经营没有巧取豪夺

5、中国网民党只有正义与良知没有暴力加欺骗

6、中国网民党誓与一切欺骗、伪造、撰改为敌

7、中国网民党誓与一切删贴、锁贴等冷热暴力为仇

8、中国网民党必须坚持人民的领导，坚持“只要人民怀疑，我们就去调查”的重要原则

二、中国网民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1、公开　2、理性　3、非暴力　4、统一行动

三、中国网民党的三大基本任务：

1、揭露一切欺骗与虚伪行为，还世间以朗朗乾坤；

2、扫平一切冷热暴力，还天下以大同社会；

3、宣传“全民参与、齐说真话”的思想，最终促成还权于民。

四、中国网民党的党员登记、党部设立与党费党产：

1、凡认同中国网民党宗旨、基本原则与基本任务的全世界无论国籍、种族、性别、年龄的网民均可自行宣布为中

国网民党成员，所有党员一律不予注册、登记
2、中国网民党各党部根据地域、爱好、行业、论坛等可自由组建，党部领袖内部民主选拔，所有党员均可自由同时加入多个党部
3、中国网民党无须交纳任何党费，亦无任何党产。
五、中国网民党党员的日常学习与工作：
1、学习、实践和宣传正义与良知是中国网民党最重要的工作
2、中国网民党所有党员都要深刻认识到惟有正义与良知才能拯救中国。而朗朗乾坤、大同社会的最终确立，取决于我们今日的努力
3、中国网民党的目的就是揭批谎言，以遍布中国的各种网络社区、论坛、网站为战斗阵地。网络是我们的武器，网民是我们的军队！
六、中国网民党党员的誓言
中国网民党的历史使命的实现取决于全体党员的共同奋斗！荣辱与共、同舟共济，让我们紧紧团结在广大人民的周围，为正义而战！为良知而战！正义万岁！良知万岁！！中国网民万万岁！！！

中国网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网民党代理主席 张不为
二 00 八年二月四日

中国网民党联系办法： skype：zhangbuwei1989 gmail：zhangbuwei1989@gmail.com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Skype：gwnguoquan QQ115659144，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博客http://cndp.huarenblog.cn

郭泉：民主先声 124：中国新民党、中国网民党近期要做的两大网络工作：雪灾和奥运

据中共官方 2 月 2 日公布的数字，目前被中共民政部列入灾区名单的省、市、自治区达 18 个。全国受灾人口超过 1 亿；因灾死亡人数 60 人；失踪两人；超过 20 万伤病者得到紧急医疗人员的救治。全国农作物受损面积 7270.8 千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537.9 亿元人民币。

但是这是实际情况吗？中国人民有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数字？前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后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造成中国人民不相信中国官方新闻的重要原因，就是新闻垄断！

一切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本特点，一是党禁，一是报禁。中国的党禁和报禁政策，昭告了世人，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样的报禁政策下，什么是真相就成了问题。由于没有新闻监督，专制者的新闻一定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例如 2007 年 8 月，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县凤大公路堤溪段的凤凰大桥坍塌，中共所有新闻里根本没有最基本的伤亡人数、没有事件的基本资料、没有设计单位的名称、没有施工单位的名称，读者最迫切想知道的新闻要件全不出现。但是，却出现了 14 名官衔姓名齐全的官员的高尚事迹和死难家属的感恩感德之言。例如新闻里出现了“抢救得力，死难家属情绪稳定，善后安抚工作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最让人感到玩味的是新闻报道了以下事件：“8 月 16 日下午，遇难人员刘腊平的父亲，刘康身老人将一面印有‘热情服务，人民公仆’字样的锦旗，专程送到凤凰县人事局局长龙桃英手中；截至 8 月 17 日，已有遇难者家属送来了 4 面锦旗到县委、县政府，以感谢他们的工作。”一场渎职造成的灾难被中共政府和中共新闻演绎成了“凤凰沱河桥梁坍塌真是全球桥梁史上标志性的盛世盛事”，真是让人愤慨、令人发指！

这次的雪灾也不例外，我们在中共新闻里看到的是“中共领导指挥，措施有效”；“党员干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受到人民爱戴”云云。但是，人民想知道的是到底饿死、冻死多少人，他们的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和家人情况，我们一概不知。估计等到风和日丽，本该承担政府责任的中国政府又要开庆功会了，极力宣传在“伟光正”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特大雪灾，然后我们大家最最熟悉的话语，诸如“事实证明，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灾难”等等。

我们再看看民主制度的国家的独立新闻是怎样报道新闻并监督政府、引导人民抵抗灾难的。911、印度洋海啸、科索沃局势、缅甸僧侣和平抗议等等，都是全世界目不转睛的事件。这些同样具备着人类对于不确定事件的探知需求，使得这类始料不及的事件成为新闻竞争的主战场。

北半球普降大雪，并不是中国独树一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国的新闻记者站在灾难的第一线把最真实的

情况报道给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新闻监督使的各国遭遇雪灾时必须落实未雨绸缪时就制定的应对措施，比如德国就有法律规定，所有德国人降雪后 24 小时之内必须将自己家周围的积雪清楚掉，否则就将遭到罚款，连续罚款后还要锒铛入狱。中国也有政府救灾的法律，但是中国的新闻根本不去谴责不落实法律的责任人，甚至连最基本的灾情报道也不得允许。各国都对气象灾害有着充足的准备，从水电、食品、药物、设备等方方面面尽皆如此。这样，才使得当气象灾害来临之际，全社会秩序井然，人们胸有成竹。但是，怎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亿万人的惊慌失措死伤无数了呢？

中国政府在哪里？中国新闻在哪里？是不是你们只在对你们有利的位置上呢？

在新闻里，我们看到南方雪灾还没有完结，国家气象局头面人物就忙不迭地出面，为自身的气象预报失误进行开脱，强词夺理，理直气壮，还说；"我们测不准，我想其他国家也测不准吧。"我们总是最先听到的都是这种振振有词，他们在第一时间不是报道灾情，而是在第一时间将责任尽可能推卸掉，以至于到最后根本就找不到能够承担责任的机构或者人员。

国家气象局局长面对雪灾时说，"超过一周的气象预报是非常困难的"，那你凭什么还敢预报还有 170 天的"奥运会开幕式时降水概率很小，也就是说气候不会影响露天开幕式的顺利举行"呢？

现在有消息说，"从飞机上看地面，灾情严重的出乎想像。高速公路上被冰冻的汽车长达数十公里，能得到救援的只有靠近出口的地方，很多停在中间的汽车已经和地面冻成了一体，柴油被冻住，大部分汽车已经无法发动。很多长途汽车已经在公路上停留超过五天。连我们从北京赶过来视察的都无法进去，你就知道情况是多么的严重"；"仅仅一条公路上，车祸及在长途客车上死亡的人员就已经超过二百人。湖南和贵州的可以通讯的几个县城初步统计因为灾害冻死的人都超过了百人。这还是在可以步行到达的县城及周边地区，很多地区因为没有电，通讯联系不上，死亡人数及具体状况无法得知。"

这些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在中共新闻里看不到的，现在中国人民都在口口相传。 一些从雪灾灾区回来的人说，灾情的严重程度远远大于媒体报导的程度。隐瞒只能让人感到愤怒！隐瞒的结果还不只是愤怒，隐瞒的结果还带来了救援的咨讯障碍，最终贻误救援战机。

据网友反映，为安抚民心，中共官方媒体还采取了一贯的做法——虚假宣传。一位亲眼目睹火车站送水的造假宣传的网民发来消息说："等摄像机拍摄完毕，送水的人也就不见踪影了。"

这就是中国人民通过被垄断的新闻媒体看到的中国灾情新闻！

现在，广大网民不断通过网络和手机，迫切要求"我们想了解家乡最真实的情况，我们要看到最需要帮助的灾民那无助的眼神和期盼的神情，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捐款捐物是否能真正到达那些应该到达的地方。"

针对广大网友的急切呼声，中国新民党、中国网民党近期的主要网络工作是：

1、发布最新的灾情报道和"后灾情的苦难"报道；

2、彻底调查每一个受灾的县市，每一条冻堵的公路，每一个冻死的人。要利用一切人力和网络资源，查到每一个死难人员的名字、性别、年龄以及他们是如何罹难的；

3、监督所有捐款的发放情况，例如，官方报道的实收捐款和发放数目是否吻合等；

4、当这些都做完的时候，中国新民党、中国网民党还要帮他们的家人维权，追究中共政府在雪灾中的管理责任，帮助每一个死难人员的家属进行要求各类赔偿的法律行动。

雪灾之后，中国新民党、中国网民党的第二个调查任务将是，彻底调查在建设奥运工程中的工伤死亡情况。届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将作出新的部署。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Skype：gwnguoquan QQ115659144，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博客 http://cndp.huarenblog.cn

郭泉：民主先声 125：法轮功与人民圣殿教：回顾中共社论，看中共的新闻封锁和愚民政策

这次的雪灾让我们再次领教了中共的新闻封锁和愚民政策。我们在中共新闻里连篇看到的是"中共领导指挥，措施得力，工作有效"；"党员干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受到人民爱戴"云云。但是，人民想知道的是到底饿死、冻死多少人，他们的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和家人情况，我们一概不知。估计等到风和日丽，本该承担政府责任的中国政府又要开庆功会了，极力宣传在"伟光正"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特大雪灾，然后就是我们大家最最熟悉的话语，诸如"事实证明，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灾难"等等。

中国新民党和中国网民党的近期网络工作，就是揭露雪灾真相，让人民知道到底谁该承担责任？是死难者，是天灾，还是中共政府？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或者天灾人祸的比重各占多少？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法轮大法弟子的维权群体，并着手有关的法律准备工作。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研究法轮功并发表文章的学者，不过说来惭愧，在《生活导刊》上发表的是一篇在没有完全掌握原告（中共）和被告（法轮大法）双方资料的情况下，根据原告的一面之辞而写的"揭批"文章。根据我事后的观察，这篇"揭批"文章是 1999 年"425"事件后第一篇由学者撰写的研究、批判文章。

很显然，原告和被告的官司应该有法官审理裁判，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原告自己先控告，而且还不让被告辩护，最后原告自己当了法官进行了刑事判决。这哪里是审判呀？当时我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做审判工作，竟然当时没有想通这个道理，现在想想真的很傻。

现在，愿借这篇文章的写作，为我在 99 年的卤莽和偏颇，向法轮大法郑重道歉。我想，未来这一对诉讼双方（中共和法轮大法）一定会打一场官司。这一场官司将由全国人民来决定谁有罪谁无罪，如果可能，我想出任这场特别法庭的审判长。这是后话了，先写这篇文章。

在研究法轮大法弟子的维权群体并着手有关的法律准备工作中，我再次阅读了 9 年前读过的 1999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上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一文。惊奇地发现，中共当时把法轮功的李洪志师父和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大卫教"教主考雷什、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幌的名字并列。

对三个外国人里的"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邪教教主"，而是一个崇拜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中共把与中国共产党有完全思维方式的"人民圣殿教"称为邪教呢？而不称为共产主义兄弟呢？

很显然，"人民圣殿教"在美国犯了反人类罪，其犯罪手段与中共在中国对人民的犯罪手段完全一致。但是，"人民圣殿教"在美国被铲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还在。

覆没于 1978 年的"人民圣殿教"事件死亡 900 多人。其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在枪杀了因为接到投诉而前来调查事实的美国议员之后，命令手下 900 多人集体去"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自杀。

吉姆•琼斯（Jim Jones）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太太玛瑟琳（Marceline Jones）在 1977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琼斯 18 岁时的偶像就是毛泽东，琼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1977 年 11 月 22 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一位曾跟随琼斯的前教徒万达•约翰逊（Wanda Johnson）夫人说，"琼斯在很多场合都说他是列宁转世。他说这一次他将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州"。

洛杉矶时报（1978.12.10）报道，记者提问"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琼斯认为哪个更优先"时，自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斯里巫（Silver）说，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 （琼斯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是一个无神论者）。

琼斯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他强烈的反对美国的所谓的"压迫制度"，立志要建立一个"正义之国"。他的观点吸引了一些生活在底层的黑人和少数涉世不深比较孤僻的白人妇女，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核战争恐惧异常。1977 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成员许诺在那里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于是，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他们建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琼斯镇。

在这个叫"琼斯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第一是"人民公社"，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人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第二是"高音喇叭"，琼斯还特别采用了中国毛式共产主义最常用的高音喇叭技术，天天给公社成员洗脑。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可怕（很象中共那时宣称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说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this socialist experiment），从而让人们感到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琼斯还在喇叭里威胁"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 （there is only one punishment for treason： death）。

《洛杉矶时报》（1978.12.10）还提到，一位叫金•布朗（Jean Brown）的幸存者说，"圣殿教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种被毛泽东提倡的技术来加强纪律"。

其实这位叫布朗的先生搞错了，这种白天劳动，晚上围着篝火进行互相批判的方式是列宁的发明。公社成员一天要工作 12 小时，完了以后就要进行"自我批评"，谁要是没有完成任务，或者对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怀疑，就要受到惩罚。或者被剃头，被戴黄帽子，甚至几天不许说话。殴打、虐待和处死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同文革中共的暴政如出一辙，文革中的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用车轮战、疲劳战给异议人士洗脑，更别提中共杀人如麻的种种劣行了。

1978 年 11 月 14 日，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瑞安（Leo Ryan）带领一些新闻记者和部份公社成员的亲属来到琼斯镇，打算作一次非正式的调查，因为他们先前收到一些"人民圣殿教"成员的投诉，指控教主琼斯对他们施加种种强制，强迫他们放弃财产，强迫他们参加稀奇古怪的性仪式。四天后，瑞安一行和十个叛教者准备在琼斯镇简易机

场（距琼斯镇有 8 英里远）乘飞机返回美国，琼斯派出人员驾车冲上飞机跑道，开枪射击，打死瑞安和三名记者以及一名叛教者，其余十人受伤，包括一名美国驻圭亚那使馆官员。

当琼斯得知虽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并可能报告当局，于是，琼斯开始着手他的为革命献身的计划。《洛杉矶时报》（1978.11.26）的一篇由查理斯•伽瑞（Charles Garry，“人民圣殿教”的律师）写的文章中提到，死亡前的人们嘴里喃喃自语，“让我们为革命而死。用我们的死去曝光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并很豪迈地高呼：“It's good to die in this great revolutionary suicide”（在这种伟大的革命牺牲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现场惨不忍睹。

以上这些信息在中国的新闻媒体里根本看不到，因为“人民圣殿教”的思维和行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思维和行为完全是一家的。邪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新闻封锁和愚民政策。邪教的最大特征就是让人与外界隔绝，信息封闭，强行洗脑。让人进得来，却出不去。这一点上，“人民圣殿教”与中国共产党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人民圣殿教”才死了 900 多人而已，而中共从 1949 年上台到现在，因为反对其专制统治而被残害而死的何止 9000 万？

好在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中共的新闻封锁再也封锁不住网民了，中国的愚民政策再也愚不到网民了。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Skype：gwnguoquan QQ115659144，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博客http://cndp.huarenblog.cn

郭泉：民主先声 126：从台湾“激烈”选战攻辩，谈民主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

民主制国家里根本不存在“煽动和组织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问题，因为每四年一次的多党竞选各级行政长官的选战，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跃跃欲试。试成功的，当选执政如愿以偿，试不成功的，在野以图东山再起。每四年一次的选战攻辩，成功者并不是对失败者的“颠覆”，因为这是人民的选择。如果非要说是颠覆，那也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选出新执政党“颠覆”了旧执政党。如果非要寻找谁是颠覆者的话，那只能是人民，而颠覆工具，那只能是选票。

因使用武力成功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我提出多党竞选，立即有中共党员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你太幼稚了，你要注意，你不要沦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平演变的利用工具！你看看台湾的民主，多乱啊！民主，就是反华势力的反华武器！”

首先我要说的是，1949 年前，中国人民协助中国共产党使用武力颠覆中华民国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许诺中国人民要“搞民主”。如果，中共当时说，中共当政后在政治上对中国人民还要搞一党专制，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还要搞垄断压榨，中国人民再也不会协助中共行此等颠覆之事的。中共当年欺骗中国人民的罪证现在人人都可以查到，那就是延安时期出版的所有《新华日报》。该报每篇文章都全篇不离“民主”二字，极尽欺骗之能事，而且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如果摆脱“以独裁取代独裁的专制怪圈”时，毛泽东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但是等到 1949 年在人民的帮助下中共取得天下后，自由、民主这两个词却成了谈虎色变的反动字眼。中共使用武力颠覆的手段颠覆中华民国后，随即坠入“以独裁取代独裁的专制怪圈”。《新华日报》的民主文章、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的承诺，统统被共产党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中共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一样，最惧怕别人颠覆他。哪怕象胡佳先生这样的替爱滋病患者维权的善良人说的几句不满的话，都要被冠之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如，最近杭州的吕耿松先生，因为在自己的博客里说了一些人民的心声而获刑 4 年。这充分说明了中共对来自民间的“不同政见”的万分畏惧和沮丧。

其次，关于台湾民主问题，我想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上学期，我在中国传播大学南广学院做兼职教授。一次课堂上，有学生说“台湾的民主选举吵架打架的觉得很闹剧”。我于是对全班同学说，“如果你们中国传播大学南广学院的人大代表和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人大代表为了各自学校的学生利益在人大会议上互相攻辩，最后贵校的代表认为我们南师大的代表的意见侵犯了贵校的学生利益，而由攻辩演化成吵架，最后脱下鞋子砸过去了。请问，如果这样的场面在贵校的校内电视台播出，同学们会说是闹剧吗？”于是所有的同学都说，如果有这样的代表，那一定是中国传播大学南广学院的好代表！然后，我就问，那台湾的台南县的代表和台北市的代表为了捍卫各自城市的人民利益而互相攻辩、吵架、砸鞋子，你们为什么说他们是闹剧呢？最后，在下课前，我说，“可惜中国的人大会议全是共产党操纵的，根本就不会出现攻辩。中共操纵的这样的人大会议，才叫闹剧！台湾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 2008 年 1 月 16 日在广东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说：“我们的民主方式非常有优越性，西方国家非常羡慕。”他还说：“对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民主方式，我觉得我们这种民主方式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优越性，大大降低了民主的成本，提高了民主的效率，台湾现在搞选战，大家

可以看看这个民主的成本。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非常羡慕我们这种制度的决策效率。”这个人能如此地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台湾各党的竞选成本都是各自的党费、党产收益和合法的捐赠，民主竞选使用的所有的钱，其实都是社会消费，这种消费都要纳税。无论竞选结果还是竞选消费，其最后收益的都是人民。

再次，民主怎么会造成社会动乱呢？难道多党民主竞选会比共产党一党专制更乱吗？

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其根源就在于共产党的专制，如果中国是民主制，那么共产党就不能造这么多恶、作这么多孽，如果中国是民主制，那么共产党就不可能残害人民。例如：

如果中国是民主制，55 万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在毛泽东的“阳谋”下惨遭迫害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所谓的“反右”的政治决策了；

如果中国是民主制，中国人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就不会饿死 4 千万人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决策了；

如果中国是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蒙冤而死千万以上的优秀儿女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文革”这样的政策出台了；

如果中国是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八九年发生六四惨案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反对任人唯亲了；

如果中国是民主制，中国就不会在近十年发生大规模的维权群体事件了，因为人民手里的选票就可以反对出台对人民不利的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了；

如果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那么中国的所有的政党都会认真为人民服务，因为不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是不会把手里宝贵的选票投给他的。

所以，民主制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民主制才是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根本制度。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动乱。

那些说“中国一民主，社会就会乱”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共产党！

民主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怎么是反华势力的反华武器呢？如果西方国家要反华的话，西方国家那就会最希望中国搞一党专制，因为中国搞一党专制了，中国就没有希望了，于是反华就成功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今世界只有三个流氓共产国家，如朝鲜、古巴、越南才是真正的反华专家，这三个小流氓才希望中国搞专制，让中国人民永无翻身之日，永远做共产党的奴隶！相反，西方民主国家却希望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这哪里是反华？最多只是反独裁而已，而这一点，中国人民也在反！

一切反独裁反专制的政党和国家，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切反独裁反专制的政党和国家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

最后，我要回应那些反对建设民主中国的共产党员，现在，中国新民党和中国人民一道，正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很熟悉，这是写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最后一句话。1848 年《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现在我要把这段话改为：中国新民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与中国人民一道，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终结全部现存的独裁专制制度。让独裁专制统治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中国人民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获得的将是一个美丽善良公正公义的民主中国。全中国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联合起来！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Skype：gwnguoquan
QQ115659144，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27：邹涛、李铁两先生揭开了决战 08 的序幕，人民必胜，民主万岁！

最近很多不认识的朋友想到南京来见见我，但是他们却流露出怕被警察先生找麻烦的顾虑；甚至有朋友给我电话，一听到手机里有回音，立即就很紧张地问我的手机是否有可能被窃听。于是我笑着说：“这不是可能的问题，而是一定的问题，我大约从 03 年涉足民间保钓运动起就被全面监控了，但是这不影响我现在的民主运动”。

一些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看到我，只要他们身边有人，就都假装不认识我。而他们独自与我相遇的时候，就悄悄地对说："郭老师，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观点我们都赞同，支持你。"说实在的，我没有任何瞧不起他们的意思，但是看来中共在当代民主浪潮席卷整个世界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存活到 2008 年，与中国人民对专制独裁的原始恐惧有关。

中国人民对专制独裁的原始恐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共产党会切断民主人士的经济来源（例如破坏经营、扣发工资、开除解职等）；第二、共产党会迫害民主人士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等；第三、共产党会迫害民主人士，拘留、劳教、劳改甚至死刑。

所以，立志民主事业的朋友，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甘愿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民主强大而抛弃一切世俗牵挂。惟有如此，中国才有希望。舍此精神，中国民主事业将一事无成。

邹涛、李铁两先生在农历 2008 年的前一天，揭开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决战 08"的序幕。2008 年 2 月 6 日（大年三十），深圳的两位民主斗士邹涛先生和李铁先生在深圳闹市"华强北"地区，拉起黄底红字非常醒目的"2008，期待民主中国"的横幅，并沿途派发《公民表达：房价、民主和民生》的杂志。虽然寒风袭人，但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观看，更有不少市民接过横幅拍照留影。随后两先生又游行到了深圳市民中心，并在市民中心展示了横幅。

邹涛说他们两人这样做的背后理念是以行动表达中国人民的民主心声："我们行动了，我们发出了我们的呼吁，我们用最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渴望一个民主的中国。"

邹涛和李铁两位先生是多年从事基层公益工作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和我一样，都从中国的实际维权工作中得出"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共同结论。

我们共同认为："解决的办法惟有人民手里的真正意义上的选票"。

邹涛说："我们长期在第一线，接触最多的老百姓，最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什么会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因为很多制度是不合理的，老百姓的选票、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社会底层的一员，我觉得我们能代表绝大部分中国人。"

李铁先生表示：许许多多建政 50 多年都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腐败问题、发展问题、不敢让人民知道真相的问题等等，究其根源，无不和社会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于我们抨击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人民都已经觉醒，那些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民主会乱、民主会造成分裂、中国人素质低等等抹黑民主的忽悠只能看作是来自独裁的最后顽抗。

邹涛、李铁两先生是好样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揭开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决战 08"的序幕。他们的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邹涛、李铁两先生必将载入史册！

历史（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 2008 年的新一轮民主运动中，人民必胜，民主万岁！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Skype：gwnguoquan　　QQ115659144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28：古语"仁则荣，不仁则辱"，如今共产党不仁且无耻

长期以来，我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口号、计划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我想一切有正确思维的人都能看出这个现象，那就是越是共产党做不到且根本不想去做的事情，共产党就越是高举高呼高唱。例如，中共从本质上就是捍卫专制反对民主的一个独裁专制党，但是却在它的所有会议上大谈特谈"民主"，连宪法上都写上了"人民民主"，但是，谁都知道其本质是"专政"。再例如，中共从 1949 年成功颠覆中华民国之后，就一直是一党专制，从来就没有让中国人民组党进行过多党的民主竞选，中共却认为它三个代表了。未经人民选举就自称代表，这简直就是民贼独夫。还有，共产党说它"三讲"了，其实中国人民谁都知道，中共根本就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讲学习。

如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执政党的邪恶程度也刷新了历史记录。人民怨声载道，官员腐败堕落。谁都知道当今中国是历史上最不和谐的时代，而中共却说中国已经是"很好、很和谐"的和谐社会了。

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共产党如此地不知廉耻的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不仁！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孟子》有言："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里还有一句话，铁骨铮铮地写明了仁与荣辱的关系，那就是"仁则荣，不仁则辱"。

前天（2 月 8 日）自由亚洲电台安培女士采访我，要我谈谈对中共的官员制度的看法。采访我的由头是吴仪副

总理 1 月 28 日在２００８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上即兴给参会的三百余名贸促系统代表出题：“我考考你们，你们知道‘两防’是什么吗？”结果只有两位干部举手示意知道。今天，几位学生到我家拜年，谈到这个事情，其中一位女同学笑着说，“还好，还没有中共干部抢答说，两防是防民主、防郭泉”。于是我们乐开了怀。

与自由亚洲电台安培女士的谈话主要是围绕中共官员制度而谈的。我说：“第一、中共一党专制使得它的官员管理制度是组织任命而不是人民选举，所以，中共的官员不怕人民只怕上级。所以，它们在执行过程中就不会产生爱民亲民的思维方式。第二，专制制度没有任何监督和制衡机制，所以中共任人惟亲，把有民主思想、爱民亲民的最优秀的人才都排斥在执政圈之外。而体制内的官员以逢迎奉承为己任，不学无术、残害人民。第三，两防就是防止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但是，如此这等对当下国情的正确认识和爱民的行政措施，不是这些一党专制下的奴才和庸才可以完成的”。

最可笑的是，吴仪副总理在看到这个尴尬的局面后，竟然还为中共解嘲，她说：“今天（大家要）记住了！只管抬头看世界、不管低头看国家这可不行，外事和国事密切相关，一定要关注国内的事情！”

我不知道吴仪副总理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想搞笑，其实她面对的出席全国贸促工作会议堂堂三百余名贸促系统干部，都是我国外贸系统掌管一方的权贵分子。这些权贵者对当前宏观调控主要任务的“两防”浑然不知，难道您吴仪副总理还指望他们会“抬头看世界”？难道吴仪副总理认为这些人对国内“两防”不了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关注世界问题了？

其实中共从 1949 年到现在，就根本没有过“抬头看世界”。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共产党视而不见，而且还动辄用“中国特色”、“中国内政”来抵抗世界民主潮流。这是何等地不知廉耻啊！《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共的不仁，中共的不知廉耻，虽“四维不张”，但“国”是肯定灭亡不了的，不过，我看独裁专制却是一定能被终结的。

《诗经》有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今日，有网友发来了两则《八荣八耻》，读后感慨良多，现在此摘录，发给大家

《中国新民党八荣八耻》

以促进宪政为荣，以独裁垄断为耻；
以还政于民为荣，以私相授受为耻；
以多党竞选为荣，以党禁报禁为耻；
以人民民主为荣，以一党专制为耻；
以廉洁奉公为荣，以贪污腐败为耻；
以民主启蒙为荣，以愚民残民为耻；
以保护环境为荣，以疯狂掠夺为耻；
以实事求是为荣，以篡改历史为耻。

《中国共产党八荣八耻》

以财大气粗为荣，以艰苦朴素为耻；
以豪宅巨赌为荣，以兢兢业业为耻；
以享乐淫逸为荣，以廉洁奉公为耻；
以宠富敛财为荣，以勤俭节约为耻；
以养尊处优为荣，以自甘清贫为耻；
以个人至上为荣，以团结群众为耻；
以尔虞我诈为荣，以诚实守信为耻；
以捞取政绩为荣，以同甘共苦为耻。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Skype：gwnguoquan QQ115659144，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博客 http://cndp.huarenblog.cn

郭泉：民主先声 129：当列宁与亨廷顿在中国相遇的时候，中共独裁统治就可以被终结了

列宁是主张阶级革命的，亨庭顿是主张民主革命的，而我是主张民主革命与阶级革命必须紧密结合的。

中国新民党从组建伊始，作为中国新民党的代理主席，我就在中国新民党章程里规定了中国新民党人的两大任务，一是积极帮助人民群众做好每一个维权案件，二是对民众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

之所以这样规定，完全是基于我对中国社情民意的调查。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已经完全达到了列宁的阶级革命爆发的临界点、也完全达到了亨廷顿的民主革命爆发的临界点。

列宁认为，革命和变革，只有在上层无法统治，下层无法忍受的情况才能发生。

而亨庭顿认为，革命和变革，是在民众生活得到基本改善，文化认识有了提高，不受基本生存威胁而有时间关心自己处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我们先来谈谈列宁的阶级革命爆发的临界点。我从 02 年开始介入维权界以来，我发现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工人、军转干部以及失地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处于各方（亲戚朋友）救济已经完全用完的窘迫境地，他们现在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了。而社会的另一面，却是富裕奢华的权贵资本者。贫富分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阶级仇恨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激烈程度。他们不断地去做访民，不断地维权，他们维护的是人的生存权利。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的集权统治，使得中国人民怨声载道，可谓是干柴遍布全国大地，只欠烈火点燃而已。

我们再来谈谈亨廷顿的民主革命爆发的临界点。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在研究和寻找社会稳定的法宝。但是中共的研究完全是在帮民主的大忙。中共一直认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中层（中产阶级），即高级知识分子和民族商人。但是，共产党忘记了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国家社会稳定的法宝，而不是专制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剂，相反，在专制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是一柄双刃剑。中产阶级一旦有了民主思想，他们就会为民主服务，而不是捍卫专制。中产阶级衣食无忧、知识丰富、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处境和民族国家的未来大事。他们也维权，但维护的主要是人的政治权利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权。

在中国，只有列宁的阶级革命爆发的临界点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人的中国特色之一是散乱，中国人民一直是渴望被组织和被领导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专制压榨下，已经变的非常懦弱、胆小怕事、敢怒不敢言、朝三暮四，得过且过，自欺欺人，不想走出谎言。甚至中国人还有“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的投降思想。

而只有亨廷顿的民主革命爆发的临界点，也是无用的。1989 年的 64 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的革命主体是大学教授和革命学生，而工人农民还没有意识到贫困和专制。1989 年，我读大学二年级，正是革命情怀最热烈的时候。在街头游行的时候，我总是听到游行队伍外有群众说：“这样天天游行，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不支持！”当时我就感觉心里不舒服，但是我无法组织语言说明。现在知道了，当时的 1989 年的民主运动，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完全超越了工人和农民。这种超越，使得 1989 年的知识分子孤军奋战，随后被专制主义的枪炮和履带扼杀。

但是，如果两者有交汇的话，既成革命无法阻挡之势。中国新民党人目前的一切思维和行动都源于此种思维。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有一道鸿沟。中国新民党敦促中国共产党主动架设好一条桥梁。否则，中国新民党将用尸体填满这道鸿沟，让中国人民踩在中国新民党员的尸体上走向民主！

“不自由，勿宁死”，“不成功，便成仁”，是每个中国新民党人的终身誓言！

郭泉：民主先声 130：美国 Google 公司已向我屈服，而美国 yahoo 公司还在负隅顽抗

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郭泉

就美国 yahoo 公司的“王小宁事件”、“师涛事件”、“郭泉事件”

告中华全国网民同胞书

农历年前，我向全世界媒体发出了我正式起诉美国 Google 公司和美国 yahoo 公司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发出后，我接受了泰晤士报、英国金融时报、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唐人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随后，全世界除中共操纵的亲共媒体没有转载外，其余一切热爱民主、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华文和西文媒体都进行了转载报道。

农历大年初三，美国 Google 公司开始悄悄向我屈服，输入“郭泉”可以搜索到 307 条信息；随后的几天，可以搜索到的有关我的消息越来越多，刚才（2008 年 2 月 12 日）我可以搜索到与“郭泉”相关的 32000 条信息了。

但是，美国 yahoo 公司还在负隅顽抗，看来美国 yahoo 是铁定了心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婊子了。

其实，美国 yahoo 公司做中国共产党的线人、婊子早已不是什么暗地里的事情了。

4 年前（2004 年），湖南记者师涛在一个地方共产党员会议上采访了有关部门关于天安门事件 15 周年纪念的消息，并用私人电子邮箱将笔记发送到在纽约的中国民主网页。数周以后，师涛便因此被捕，2005 年，师涛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师涛在发送此采访消息时使用的是雅虎邮箱，当中国政府要求美国 yahoo 公司提交“犯罪嫌疑人”师涛的电邮帐号、IP 地址、登陆记录和邮件内容等有关数据时，美国 yahoo 公司竟然照做。事实上，美国雅虎公司已经成为了中国警方的线人。

类似的事件还有“王小宁事件”，王小宁也是一位中国记者，由于雅虎公司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王小宁先生关于有关言论的电子邮件，导致王小宁先生于 2003 年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日前，记者师涛、王小宁的家人已依美国人权法在旧金山奥克兰联邦法院控告美国雅虎公司。

2007 年的最后一月，因为我从 2007 年 11 月 14 日开始连续向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中华全国人民发出了多份公开信后，美国 yahoo 公司的 cn.yahoo.com 全面封杀我的消息，致使我的姓名“郭泉”无法在 cn.yahoo.com 搜索到。

美国 yahoo 公司为自己的辩护是这样的：美国 yahoo 公司总裁杨致远在 2005 年的一次记者会上声明：“无论在中国或是其它地方做生意，公司都会遵照当地法律。”美国 yahoo 公司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加拉汉称，“当时并不知道中共需要师涛的资料干什么”。

情况如下：2005 年 9 月 10 日，在杭州举行的国际知名互联网公司高层会议上，雅虎负责人杨致远解释了向中国警方提供中国记者师涛网上活动情况的理由，认为雅虎除了服从所在国的法律、规章和习俗外，别无其它选择。雅虎公司当时并不知道中国警方索要上述信息的目的，中国警方也没有透露所要搜索的内容。他强调说，雅虎公司提交网上用户信息完全是在“遵守当地的法律”。他说，雅虎公司有“明确的”隐私保护制度。福布斯新闻援引杨致远的话说，雅虎只有在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后才会提供有关信息。

但是，2007 年，美国旧金山人权组织公布了一份中国的法律文件，并指证美国 yahoo 公司在 2004 年就已经掌握一份 2004 年中国政府签发的命令，声称当局正在寻找一名雅虎用户的信息，该用户涉嫌“非法向外国机构提供国家机密”——这是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常见的指控。在最近的一次美国国会召开的对美国 yahoo 公司违反人权的听政会上，美国 yahoo 公司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加拉汉供认不讳，并向美国国会道歉。美国 yahoo 公司总裁杨致远近日已经向受害人的母亲表示道歉。

但是，美国 yahoo 公司在向师涛亲属道歉的同时，却在封杀“郭泉”的名字，这种言行不一的行径，只能充分证明了美国 yahoo 公司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所以，我们认为美国 yahoo 公司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线人、婊子是有确凿事实依据的。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yahoo 公司总裁杨致远的辩护词，他说“无论在中国或是其它地方做生意，公司都会遵照当地法律。”

我的攻辩如下：

第一、既然美国 yahoo 公司总裁杨致远先生想遵照当地法律，那么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先生出示有关法律文书呢？例如，美国 yahoo 公司封杀“郭泉”这两个字，依据的是中共的哪条法律呢？如果美国 yahoo 公司总裁杨致远先生认为中共警察的手续齐全，那么请您出示。

第二、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公司在外国做生意皆不允许违背美国法律。即使当地政府违法或侵犯人权，美国公司也不能“入乡随俗”。事实上，一些公司在外国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也被美国法庭成功起诉。

第三、这并不是抽象的商业道德规范问题。美国 yahoo 公司在中国的行为将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影响。在过去 20 年来，虽然中国政府不时公开敌意，但美国政府依然鼓励公司到当地开拓业务。他们的出现即使不能让中国变得更民主，也能够令当地社会更开放。但如果美国公司助长中国变得更专制，并让中国人民的民主进程的目标上遭遇更多障碍，那中国人民就要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了。

第四、当有关国家的法律明显损害人类普遍价值观和人权观念时，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应该落井下石，中国古语有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我看美国 yahoo 公司不只是“无勇”，而是“见利忘义”!

由于美国 yahoo 公司的“见利忘义”， 我们维护中国人权和自由的斗争将变得更加艰难。

针对美国 yahoo 公司“见利忘义”，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线人婊子的丑恶行径，2007 年 11 月 6 日美国众议院召开听证会，谴责美国 yahoo 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而采取了某种限制信息自由流通的运作方式。当天，雅虎总裁杨志远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向师涛母亲表示道歉；近日，雅虎又与两名内地记者的家人达成庭外和解，雅虎同意支付律师费。

美国 yahoo 公司泄漏用户资料事件不仅涉及法律和道德层面，作为在全部互联网搜索应用中所占份额高达 36%左右的国际网络公司，此次听证会对 Yahoo 未来经营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美国众议院召开听证会的当天（11 月 6 日）开始三个交易日内美国 yahoo 公司股票就下跌了 13.8%。

美国众议院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 Tom Lantos 说的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While techn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 you are giants, morally you are pygmies”（你们是科技和金钱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

随后，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通过《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本法是为了打击“中国恶名昭彰与残暴的政治压制机器”。

美国 yahoo 公司争做中国共产党的线人婊子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因为，一方面，美国微软正在积极收购美国 yahoo 公司，如果收购成功，美国 yahoo 公司就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美国的《全球网络自由法案》将使得美国 yahoo 公司再也不敢对中国人民胡作非为了！

最后，我号召中华全国网民同胞们，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都要联合起来抵制雅虎！

郭泉：民主先声 131：我在向美国旧金山法院起诉美国 yahoo 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各媒体的记者朋友，出席本新闻发布会的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郭泉。2007 年 11 月 14 日至今，我陆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及中华全国人民发出了十一封公开信。

任何一个公民就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使用公开信的方式“文谏”国家领导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之一。但是就在我发出第一封公开信不久，美国 Google 公司的 google.cn 和美国 yahoo 公司的 cn.yahoo.com 无端、非法全面封杀我的消息，致使我的姓名“郭泉”无法在 google.cn、cn.yahoo.com 搜索到。

2008 年春节期间，我通过国际媒体表达了我要起诉这两家美国网络搜索公司的意愿，美国 Google 公司在几天之后立即改正错误，但是美国 yahoo 公司仍然拒不认错。

今天，我在美国旧金山法院起诉美国 yahoo 公司侵犯我的姓名权，要求立即解封关于“郭泉”的网络信息，并向我赔礼道歉。

美国 yahoo 公司违反国际有关人权的相关法案，擅自非法封锁本人的姓名，对本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美国 yahoo 公司作为一个美国公司，这一行径也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公司在外国做生意也不允许违背美国法律。

美国 yahoo 公司协助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是包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美国 yahoo 公司的这一丑恶行经，不只是抽象的商业道德规范问题。它对美国政府在全世界的良好民主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如果美国法律、美国政府继续对美国 yahoo 公司在中国协助专制统治实行网络信息封锁的行经不闻不问的话，必将使中国人民在民主进程的目标上遭遇更多的障碍。那么，中国人民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就将是必然的。

本人还想通过这次起诉，告诉全世界所有正在或即将进入中国从事网络业务的美国公司和各国公司，当中国的专制集权法律和政策明显损害人类普遍价值观和人权观念时，任何一个善良的公司应该“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而不是落井下石。

这是任何公司的社会责任！

中国有个词语叫“见利忘义”，这个词形容那些无良公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最后，我引用刚刚去世的美国众议院议员 Tom Lantos 先生的话，告戒那些无良公司，他说：“While techn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 you are giants, morally you are pygmies”（你们是科技和金钱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

（本讲话由现居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郑存柱先生代为宣读）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 QQ115659144，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郭泉：民主先声 132：致中国最高领导的探讨“彻底解决文革思维下经租房问题”的公开信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

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彻底解决文革思维下经租房问题”的策论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两位领袖好：

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从 2007 年 11 月 14 日起，先后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方面在国内、国际事务的思考和运用，向两位领袖写过五封公开信。

虽然两位领袖没有直接给我回信，但两位领袖以其他方式表达了对我长期研究的“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企业一次性买断工龄问题”、“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问题”、“21 世纪中日关系新思维”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特别让我欣慰的是我关注的“中石油中石化一次性买断工龄问题”和“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问题”在发出公开信后一周内，国家有关部门均派出了调查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在此，我代表我长期效忠、服务的千百万“企业断友”、“复转军人”感谢两位领袖的体恤和帮助。

去年 12 月，全国千百万“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复转军人”、“失地农民”、“民族商人”组建中国新民党，并推选我为代理主席。中国新民党致力于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党民主竞选道路”，“提倡人民有权组党并竞选，努力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中国新民党的宗旨是“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专制制度”。

民主党，就是主张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中国新民党就是这样一个爱国亲民的民主党。今天，我代表中国新民党接受全国“经租房”维权群众的委托，向两位领袖致信，要求彻底解决文革思维下的“经租房”问题。

“经租房” 维权群体是我长期关注、研究并积极协助的另一个人数更为庞大（初步统计是 4000 万）的维权群体。现将我这几年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对策研究，向两位领袖作一个汇报，并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一根本出发点出发，在以下六个方面，实事求是地提出我的策论。

一、什么叫“经租房”

二、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

三、在“经租房”问题上“文革”还没有结束

四、为什么到 21 世纪了还要执行“文革”的罪恶政策

五、法律和政策之间，究竟谁该听谁的？

六、什么叫“以人为本”、什么叫“执政为民”？

执政党对人民而言，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从很多要求执政的政党里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这个公仆之所以被人民选择出来，是因为这个政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可以作大多数国民的代言人。

人民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的经济、民主生活。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的必需条件是： 公平、信用、积累财富的延续性。

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在这个层面进行比拼。政党竞选，其实就是各政党竞相取悦于民的一个承诺过程。人民评判各政党的承诺及其兑现的可能性，最后用手里的选票选择出一个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来做公仆。

被人民选出来执政的政党的执政期间，其实就是对竞选承诺的兑现过程。一届任期结束，任期内无论兑现的好坏，都必须接受新一轮的人民选择。人民手里的选票，才是使得人民当 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任何政党都必须屈服于人民手里的选票。

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看到了太多的人民屈服于执政党的事情，人民毫无办法，只能用怨毒的话语和目光诅咒。我每天在街上、在出租车里，在网络上满目所视、充耳皆闻的都是这样的同一个诅咒。

电视剧《裴家大院》的剧终挖出了祖宗的镇宅之宝——传说中的“金银财宝”，打开一看，裴大爷连声赞叹道：“裴家老祖宗有高人啊！”原来所谓的“金银财宝”就是一块上面刻着大红的八个字的普通石头：家無孝子、片瓦無存。

现在，我长期关注、研究并积极协助的全国 4000 万人的“经租房”维权群体中，有些也已是片瓦無存。但是，造成他们“片瓦無存”的原因，并不是“家無孝子”，而是不“以人为本”的专制政策。

一、什么叫“经租房”

1949 年，共产党的军队彻底打败了中华民国的政府军，从而颠覆了中华民国。当时，由于共产党长期是一个革命党，1949 年前根本没有参与过国家的国民基础建设，所以，当共产党的行政人员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大批进驻城市后，城市住房十分紧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动员私有空房出租的问题的决定》（1954 年 4 月 27 日市府第十二次联合办公）。内容如下：（1）召开房主座谈会只是讲解政策进行动员，愿否出租以及租给谁，由房主自己考虑并选择，房管局不予介绍房客；（2）对每个房主召开座谈会不得超过两次，每次时间不要过长，并派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主持。

到了 1956 年，中共政府已经完全无法解决住房短缺这一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了。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1956 年 5 月 18 日，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制订了一份名为《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的文件，提出对城市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理由是：一、私房比例过大；二、不少城市居民住房困难；三、租金混乱、欠租情况多；四、二房东（房屋中介）多，从而得出"城市房屋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极左结论，因此决定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份文件说，经租房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其设定的改造形式是：由国家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超过一定标准的私有出租房屋，再跟房主分享房租。

此文件出台后，全国各地都制定了经租房地方规范。比如北京在 1958 年 6 月 4 日出台了《对私有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几个具体问题政策的规定》，规定了纳入改造起点为：出租房屋够 15 间或总面积达 225 平米以上者一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之列。但由于 "改造"没有对如何赎买及一定时期为多长做出具体规定，也就没有触及到房地产所有权变更。房主按月可领取房租 20%~40%的租金，同时留有一定面积的自住房屋。

中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希望全国有多余房屋的城市居民将自家超过自家使用面积的房屋拿出来替政府排忧解难，并出台了强制性规定，例如：1958 年 2 月 25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三次行政会议通过《北京市私有房屋暂行管理办法》，其中的第十八条规定："为使房屋得到充分利用，房主应该将可供住用的空闲房屋出租。如无正当理由而闲置不出租时，房地产管理机关可以劝令出租。必要时，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强制出租。"

各城市在确定"改造起点"（自家使用面积）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北京是 225 平方米，而其他大城市为 150 平方米、中小城市、小城镇为 100 平方米。中共政府在广播报纸等媒体上进行了广泛动员。全国各地广大的爱国居民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将超过自己使用面积的多余的房产拿出来替政府解决困难。

1958 年，为了加强对这些房屋的管理，政府提出的由国家政府房管部门统一租金，统一经营出租管理，定为统一国家私人经租房产。按当时的做法，把城市里的私有房产分为自住房和出租房，出租房在超越"改造起点"（自家使用面积）以上的，即由政府经租。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如管理、收租、修缮等，并把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发给经租房的业主。

私房主与国家签定的是不定期的房屋经营租赁合同，仅仅就是经租，而并没有什么其它含义，也不涉及到产权变更。所以当时有多余房产的全国城市爱国居民纷纷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为政府解决困难而出力。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各城市大量不足改造面积或未出租空关房、代管房，甚至连自住房全部被纳入改造。当时，有的房屋业主，被强行挤占腾让或责令搬家，有的赴外学习支援工作或抗美援朝，而"保（建）国家，失小家"。无人看房者，遭破门而入连同家具纳入改造。最终家小只有栖身之地或赶出家门，至今漂泊租房为生，背井离乡者，沦落到有家无处归之境地。由于私房改造，很多普通的城镇居民失去生活来源，无法聊生。

那是一个闭嘴屈从者可全身而退，逆我者将人身灾难恶梦终身的"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火红年代。

当时我国城市私房比例很高，如北京私有房产占总房源的 53%；上海占 66%；苏州占 86%；全国被经租的房屋达 1 亿多平方米，涉及 62.41 万户。北京经租房共有 24 万间，380 万平米，占当时北京住房总数的 40%左右，涉及 6 千户左右。在解放初期，政府曾动员把多余的房屋拿出来出租，不少人有过顾虑，许多地方政府便给房主做工作，让他们放心不会剥夺他们的财产。于是响应者越来越多，结果 1958 年许多城市的大部分私有房屋被纳入经租范围。【注：这只是 1958 年的统计。不包括 1966 年文革红卫兵抢夺的大量的经租房，经租房维权人士称之为"文革产"。】

1958 年始，政府接管经租时，与产权人签订有"经营租赁契约"（现仍保存在房管局房屋档案中），而非买卖契约，且有关房地契证明仍在私人手中。这足以证明当时政府并未将经租房产收归公有。

随后，中共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例如：1961 年对私房改造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速城市私人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联合通知》、1963 年《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 年《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等。

196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 年 1 月 13 日由国务院批转）规定："经租的办法是，凡房主出租房屋的数量达到改造起点的，即将其出租房屋全部由国家统一经营，在一定时期内付给房主原房租 20%至 40%的固定租金。"这个文件并没有提到经租房的所有权发生变化。

但是，在 9 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 1964 年 9 月 18 日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1964 年 6 月 19 日〔64〕粤法行字第 82 号请示时答复：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64年6月19日〔64〕粤法行字第82号请示收悉。现在答复如下：

根据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屋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和1964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房屋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的规定，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办理领取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如果广州市人委和房屋管理部门规定必须办理这种公证手续，则可以办理继承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对于公证费征收标准，请你院或广州市公证处与有关部门研究商定。此复。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1964年9月18日)。这个批复现在也被很多人称为1964年9月1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丧失所有权的批复》。

这个批复是极其违法的，而且最荒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用批复的方式将人民的财产收归国有，而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利益方面的听政会和双方谈判。所以，这个法律文书是完全的"霸王条款"，是赤裸裸地对人民财产的剥夺。

到了1966年，不仅经租房的所有权被中共政府剥夺，文革爆发后，连经租房的定租也全部停发了。甚至，不少房主被从自己的自住房里轰了出去，使不少经租房主流离失所。

50年来，经租房主从来没有办理过这些房屋产权的转移出让手续，他们仍然是其被经租房产的合法业主。一方面，中共政府非法不再发钱给经租房主并且把所有"经租房"全部收为国有，而另一方面，所有"经租房"的业主都继续持有"经租房"的产权证书。

这一状况，不可避免地为当今中国带来了大量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当今的执政党——中共来说，如何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如何为历史罪恶"埋单"，这是检验执政党是否爱民亲民的唯一标准。

近十年来，全国"经租房"维权老人稍有文化者都写了文章要求政府退回"经租房"。但是他们知道写文章没有用。一些老人在临死前，手里都攥着50年代共产党政府颁发的《房产证》。他们临终前，最不能释怀的就是祖宗的家业他们没能保得住。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拖着风烛残年的身躯，来回进京上访。他们都撑着一口气来争取自己的财产权。他们不屈不挠，他们被抓被关被打，但是他们坚定一条信念，那就是"一定要为祖宗的基业讨个公道"。很多长期吃米的南方的老人到北京上访，耗劲了钱财，开始倔强地啃起了北京的烧饼，吃不起菜，就咬榨菜和萝卜条。

尽管他们知道，他们会死在这条维权的路上，但是他们坚持为了祖宗的房产而奔走呼号。好在现在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组成全国联动的"经租房"维权群体接过了这一永不放弃的历史接力棒。

二、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一个受到法律限制，并最终对人民负责的公共权力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保障。

但是，我们在第一节《什么叫"经租房"》的介绍里，根本看不到政府对人民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在那个时代对人民私有财产的剥夺时刻都在发生，一切都假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认为财富私有的社会制度是不好的，于是，中共开始做起了"社会医生"。但是，中国共产党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大夫让自己变得健康起来，而不是让病人更羸弱或死亡。在私有房屋问题上，显然中共采取的是剥夺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给人民带来痛苦和压抑。中共当时应该做的是发展经济，建设更多的房屋，养活更多的人，让所有的人都有幸福的家园，而不是"损有余，以补不足"。好医生是不会这样做的。

唐名医孙思邈《千金方》里有一段话是介绍什么才是好医生的。他把好医生称为"大医精诚"。孙思邈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执政也是如此！执政者，必须是苍生大医、天地公仆。任何属于"含灵巨贼"的执政者，都将被人民识破，任何来自强权的对人民财产的剥夺，都将在不远的将来受到人民的清算。

来自专制强权的剥夺，就如想要一只梨子，却砍倒整棵梨树，这是一种只知道结果而不懂得效益的制度，更何况任何历史的最终胜利者总是人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个建立在对人民财产剥夺基础上的专制集权政党，都逃脱不了这一历史命运。

现在，到了对"经租房"这一特大私有财产剥夺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和彻底清算的时候了。当年的第一代"经租房"业主已经去世大半，现在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期待着中共政府归还祖业。

中国古训有"祖宗基业，寸土必争；家無孝子、片瓦無存"，请两位领袖能多想想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都

是中国人，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中国心！

中国人，这三个字，不是一个生理学或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

既然在那个时代，一切对人民私有财产的剥夺都假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那么我现在来和两位领袖共同研究一下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

1952 年底，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总路线，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对象是：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被统称为“三大改造”，其中并没有城市“经租房”。

经租房的对象除了极少数占有大量的房地产业的公司、大资本家外，大部分都是城镇的普通劳动人民。

但是，1956 年中共对城镇的普通劳动人民的私有房产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了。

一个政策若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剥夺劳动人民财产为目的，这个政策必然是害国、害党、害民的政策。民为国之本，损害到民，岂由不损害到国？对经租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剥夺政策。

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当时还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的，但是，在城市里剥夺普通市民的私有房屋，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得人心的。

中共对于私人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鉴于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需要、解决住房困难的社会矛盾而展开的。中共政府不积极建设住房，却把目光盯到了城市普通市民的私有房屋上。例如，我查到了在 196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 年 1 月 13 日由国务院批转）中有“利用私房这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字样。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了！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政府？自己不去创造财富，相反却剥夺黎民百姓呢？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老实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就算只是“国家经租”（ 表现形式是由国家替房主

进行统一租赁、统一维修、统一定价的国家经营租赁行为），人民也是能够理解的。这毕竟有房主与国家主管房屋的部门签订的“同意由国家经租的书面申请”为证，况且房屋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

但是，谁会想到中共政府会在未来的几年里把人民自愿交给国家解决住房困难的“经租房”全部没收呢？而且还是用一个未经讨论、未经谈判的政策来剥夺的，这甚至在当时都是违法的。因为，变更财产所有权必须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

当时的人民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中共政府这么麻痹呢？理由有三：

一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二是，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所进行的“公私合营”，是将工商业主私人占有的除“生活资料”外的“生产资料”的产权进行定价赎买。这个事情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即私有房屋是“生活资料”，不是“生产资料”，不会被“社会主义改造”。本来这个信息是正确的，但是，后来中共政府错误地把本是“生活资料”的“私房”当成了“生产资料”，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人民的私有财产“改造”到了政府的口袋里。

三是，1957 年 6 月毛泽东先生在一届全国人在第四次会议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上，在几处提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面都加写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九个字。（毛泽东的批示全文如下：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毛泽东）

鉴于以上三种情况，全国各地城市居民把私有房屋交给政府“经租”。

其实，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正确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改造”，而不是生活资料。也就是说，毛泽东曾试图纠正对“城市私有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

但是，从 1956 年 1 月 18 日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到 196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 年 1 月 13 日由国务院批转），再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1964 年 9 月 18 日），中共政府有关部门一直混淆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虽然 1956 年 1 月 18 日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规定，“对私有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但是 1958 年对私人出租房屋的改造，只是将“私人房产的使用权”进行了由国家统一经营的“征用”。即由国家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统一经营管理、统一修缮维护、统一价格的国家经租行为。房契蓝图盖上了“国家经租”四个红字。1958 年“国家经租行为”只是进行了“经营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物的所有权即房产权并没有转移。

但是，一切的罪恶从 1964 年 9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开始了。这一文件其中有一句话，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刺痛着全体“经租房”维权人员的心，即“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

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逻辑中，开始经租时即已从原房主手中取得所有权，付给原房主的固定租金是国家给予其的补偿。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搞错了一个概念，即“所有制”不等于“所有权”。所有制是对一个国家、组织的经济制度而言的，例如中国是个社会主义所有制（公有制）的国家，但是不代表中国人民不可以拥有各自房屋的所有权。

因此，所谓的“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经租房所有权也应于经租开始后逐步（而非即时）发生转移。

那么，对“经租房”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什么呢？这一改造，其实就应该是由国家来经营租赁，把房子收过来，由国家把它租出去，然后统一分配使用，国家来修理和维护。私有房主就签一个合同：我自愿把位于某地某地的房产交给国家经营，也就是委托给政府统一经营。然后政府负责修缮，安排租房子，60%-80%的房租给政府，20%-40%的房租给经租房业主。这时，经租房业主就没有经营权了，只是财产的获利权（分享房租）。

1964 年 9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里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三、在“经租房”问题上“文革”还没有结束

中共政府从 1949 年以来，就不断地从“制定宪法”到“藐视宪法”，最后发展到“践踏宪法”，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不绝于耳的苍生百姓的哭嚎哀恸。

只要我们研究同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政策，我们就会发现，中共的政策总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而且中共的政策变化之快让人觉得儿戏。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宪法完全一致只在 1949 年正式执政前。

1949 年 8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一文中指出：“旧私有房屋来说，其所以不能和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一样处理，是因为这两者的所有权关系，从而产生的这两者的剥削关系一般地是不相同的。……城市里私人房主对房屋的占有，一般地不是封建性质，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房屋所有权，应当和其他官僚资本以外的私人资本的所有权一样地受到保护……综合起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城市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和房租的政策，采取如下的原则：一、承认一般私人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并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禁止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占用私人房屋。对于官僚资本的房产，在调查确实后必须加以接收；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房产，经政府依法判决，则加以没收，属于人民民主国家所有。 二、允许私人房屋出租，租约由主客双方自由协议来订立。 三、主客双方都应当遵守所自由议定的租约。 四、人民政府有权保护城市的房屋，并督促房主进行必要的修建，不能听任有用的房屋拆毁、倒塌。对于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政府并要按累进制分等征收一定的捐税。 人民政府的这种关于城市房屋的政策，不是暂时的，而是要长期实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居民有足够的房屋可住。 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建房屋。因此就需要鼓励私人资本来修建房屋。要使私人资本愿意投入房屋的建造，就必须保护房屋的所有权并允许其正当合法地租赁，让资本可以周转，房主有利可图。”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的建国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其中第三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从上述两个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共产党政策和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私有财产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几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十、十一、十二条中，就分别规定了“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

但是 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所进行的“公私合营”，是将工商业主私人占有的除“生活资料”外的“生产资料”的产权进行定价赎买。这一“赎买”政策，使得资本家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定息”。就是这个“定息”到 1966 年，也全部停止了。

中共政府还无视“1954 年前后经政府审核后颁发的合法的房地产所有权证”这一根本事实，无视 1954 年颁布的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规定，于 1956 年 5 月 18 日，悍然出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制订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将全国经租房业主推向苦难的深渊。以后不同历史年代对经租房政策的解释，也都违反了宪法中的私有财产保护规定。

1963 年，四清运动爆发。四清运动是指 1963 年至 1966 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

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

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四清运动表现在“经租房”问题上的突出表现是：1963年12月30日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国务院1964年1月13日批转）

这个报告说：“目前，私房改造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往往以人口增加，自住房不够为理由，要求退还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或者以生活困难为理由，要求增加定租；有的甚至强收房租，逼迫住户搬家，强占房屋，破坏房屋。这些情况，反映了私房改造工作中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中共政府通过这个文件，把房产所有人合法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行为，定性为“私房改造中存在的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此，中国人民谁想要自己的私有房产，谁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攻倒算”，就是“你死我活”的“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即“阶级斗争”。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1964年9月18日在批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1964年6月19日〔64〕粤法行字第82号请示时答复：“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在看到公民私有财产被逐渐剥夺的过程中，根本看不到宪法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反，我们只看到中共的政策在践踏宪法。

国家经租房的业主就因为64年的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两个文件的宣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1966年文革爆发，又来了一个“消灭剥削”的制度，于是，所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定息”全部停止，人民不仅丧失了一切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最后连定息、定租都完全丧失了。

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进入了剥夺一切私有财产的非正常状态。社会上的私有房地产一律被收归国有。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人敢于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辩护。

红卫兵“革命小将”贴出勒令状，让所有私房主在规定的期限内上交房地产所有权证及房地契等材料，否则格杀勿论。从那时起，经租房主的私有财产所有权被剥夺，私有财产的证据被侵吞。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没有一片瓦是私人的，许许多多的人家被抄，私人连自己住的房屋都要向政府交房租。

为了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即《中发（1966）507号文》。文中这样说：“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提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该采纳办理。……（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关于取消定息，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在未通过前，暂停支付。”

根据中发（1966）507号文精神，建设部国家房产管理局把对“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扩大到了“经租房”业主的头上。

建设部国家房产管理局在(1966)国房局字第77号《关于改造房主的定租暂停支付的意见》中对江苏省建设厅的答复批示如下：“我局接到东台县房管处电报一份，请示两个问题：(1)改造房主的定租是否暂停支付；(2)改造房主的定租如果暂停支付，少数改造户的生活困难问题如何解决，由民政部门按月补助还是由房产部门发给生活费用。现将他们的请示告你厅，请研究处理。我们意见：改造房主的定租，一律暂停支付。但正式取消，需要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取消资本家的定息后，再按同一步骤进行。改造房主的定租暂停支付后，对少数改造户的生活困难问题，最好与民政部门联系，由社会救济解决。”

该文件发布后，经租房主收取的定租随即被暂停支付，一直停到现在。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国必须立即支付按现在货币价值兑现的全部“定租”和利息。

因为，从 1966 年的这两个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经租房定租是暂停支付，但正式取消，需要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取消资本家的定息后，再按同一步骤进行。

但是，时值今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也没有讨论过“取消资本家的定息”问题，就更别提“取消定租”了。

1976 年，惨绝人寰、灭绝人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人民的苦难声中和血泪控诉下终于结束了。

文革结束后，当时遗留的许多问题，经过 30 多年，基本得到解决，但仍然留有尾巴。

虽然，中国共产党否定文革，但是，中国共产党只对中共对公民进行的政治迫害进行了“平反”，却对千百万人因为文革而家破人亡、死于非命的经济赔偿闭口不提。

在文革中被收归公有的原私人房产中并未全部返还，包括被经租的部分，迟迟未能得到解决。

更有甚者，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政府还在执行文革对“经租房定租暂停支付” 的强盗政策。

文革后，中共为了其统治地位不因为文革而动摇，出台了落实私房政策，部分长期流离失所、沦为无房游民的经租房主得以回到房产所在地，收回自住房屋或部分自住房屋，但政府到今天没有归还被经租的那一部份私房，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定租”。

数以亿万平方米的“经租房”被政府捞进了口袋，每年数以百亿、千亿的“经租房租”全部算成了政府的 GDP 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福利分房时代，我国各地都规定凡有私房者不得享受福利分房。解放半个世纪后，当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住房条件都大大改善时，经租房主及后代的住房条件却往往是最差的。

直到今天，由于经租房主与房管局之间没有发生过一分钱的买卖关系，所以它的的私产性质是勿庸质疑的。

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是如何在文革结束之后，仍然继续文革的思维和政策来剥夺全国广大“经租房”业主的大量私有财产的呢？

“经租房”即使是在文革也没有被确定为“国家所有”，只是说“定租暂停支付”，正式取消要等全国人大的最后决定。

经租房被宣布“归国家所有”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在文革结束 9 年以后的 1985 年。非法侵害经租房产权的始作甬者是国家建设部，当时的名称叫“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国家建设部发文之前，没有一个与之同级或上级的党政文件宣布经租房“归国家所有”，国家建设部堪称非法侵害经租房产权的始作甬者。

国家建设部通过三个政策性文件完成了对全国广大“经租房”业主的剥夺。

1982 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现国家建设部）下发（82）445 号文，文中提出“凡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即国家经租房）“可以宣布为国家所有”。

1985 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现国家建设部）在国务院尚未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人大至今也未作出取消“资本家定息”和取消“定租”的情况下，擅自出台了一个《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85）城住字 87 号文)。《意见》里说：“过去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这是中共政府建国以来首次如此明确宣布人民的私有财产“经租房”被国家剥夺，极大地侵害了广大经租房主的合法物权。建设部（87）城房字 575 号文件又重复了这个说法。

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建设部的这三份文件都援引了中发（66）507 号文，即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建设部在其（85）87 号文中提出定租“从当地私房改造之日起发放到 1966 年 9 月底”。这真是在 1985 年落实了 1966 年“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倡议。

建设部在其（85）87 号文中，还提出未领取“定租”的“一般按五年计算，予以补发或补足”。而全国人大至今尚未确定改变经租房所有制的时期。

这些文件表明，“文化大革命”在“经租房”问题上还在死灰复燃。

四、为什么到 21 世纪了还要执行“文革”的罪恶政策

经租房欠账问题，已经落到了现任政府身上，要落实十七大“以人为本”的精神，就必须真正把民生问题摆到更加突出位置上，经租房问题这个历史欠账更是不能再拖了。

除了经租房问题外，一切由于中共政府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苦难，都必须得到谢罪和赔偿。

原来就是老百姓的财产，就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先还给老百姓。这才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态度。把过去欠老百姓的账拖着不还，而在“十七大”里又要说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这怎能能向人民交待呢？

爱民亲民，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嘴上了。人民现在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听其言，观其行”。

如此大量的被经租的私人房产，在没有履行或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就被宣布“归国家所有”了。这么大的一件“政府抢劫”行为，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今天，是不能假装视而不见的。

为什么文革时的“政治迫害”问题都得以解决，甚至连解放初期没收的“敌逆”都发还了产权，惟有合法的、响应政府号召的、帮助国家解决困难的私房主的房屋产权问题被一拖再拖？

其中的秘密在哪里呢？

2005 年，国家建设部一改向其辖内建设厅（委）发文的常规，首次以“经国务院同意”的名义，未经国务院批转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直接向省级政府发出《建住房（2005）226 号文》，提出“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政策规定的，其产权性质按国家政策规定已明确为国家所有，不得变动。”

但是这一事关千家万户、千秋万代、长治久安、国计民生的决定，却被注明“此件不公开报导”。这一情况与该部建法（2005）143 号《关于进一步推行建设系统政务公开的指导意见》中“未经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得作为给管理相对人设定义务的依据”相悖，而各地政府房管部门甚至无视所谓“产权性质属于国家，不得变动”的规定，大量非法贱卖私改经租房获利，可见建设部 226 号文不仅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且对行政管理者亦无约束力。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经租房主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物权，纷纷向中共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维权的申诉和要求，要求停止对经租房主合法产权的侵害。

但是，中共政府各地建设、房管部门拒绝解决经租房问题，其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曰“维护私改成果”，二曰“尊重历史原则”。

中国新民党认为，“维护私改成果”和“尊重历史原则”的结果应该是退回经租房。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维护私改成果”。首先要澄清什么是私改，什么是私改的成果。如果用尊重历史的态度去看待，那是很清楚的：私改就是经租，或曰政府代理房主经租，当时并没有要求原房主转移房屋产权给国家，至今也没有办理过这样的手续。说要用类似赎买的办法改变经租房的所有制，但是并没有具体实施，也没有履行相应的手续。涉及经租房的问题，说要由国务院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讨论通过，但是并没有这样做。要“维护”，就该实事求是地还经租房以本来面目，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成果”可言了。如果哪个政府部门还是要维护“经租房归国家所有”这个“成果”，那也该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讨论通过，也须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才能合法。

五六十年代，国家将私房主超过改造起点的出租房由国家统一经租，统筹安排，缓解城市住房紧张，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给经租房主发放“固定租金额”（经租房主作出了巨大贡献）称之为“私改成果”亦无不可，要求加以“巩固”也顺理而成章。至文革爆发，“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红卫兵运动”经租房主成了异类，作为私房改造的重要原则，赖以成立的重要支柱——国家所谓的“赎买政策”被践踏得无影无踪，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和手续，宣布经租房产权为国家所有。至此，源于国务院 64 年 21 号文认定并要求巩固的私改成果肢离破碎，变成了“红卫兵的战果”——“文革成果”，至今没有“巩固”起来。更有甚者，官商勾结，与民争利，无视国家《城市房地产法》关于权属有争议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将大量经租房廉价卖于开发商，更使这些业已肢离破碎的私改成果荡然无存！断章取义的宣扬“维护私改成果”，如果维护的是属于国务院 64 年认定的“私改成果”那么就应该：

1、立即停止对私改经租房的非法买卖和拆迁，彻查非法成交情况，追缴非法交易所得不义之财，专项存储，用于落实私房政策。

2、剔除因错改而撤销改造的经租房外，其它现存经租房应一律恢复到文革前态势。

3、对已非法买卖并已拆除的经租房，属于错改的应尊重原业主的选择权，或以同等房屋或以市场价格进行赔偿，超过改造起点的，恢复原业主文革前享有的权利，费用可从依法追缴的不义之财中列支。

舍此之外，所谓“维护私改成果”云云，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维护“红卫兵的战果”——“文革成果”，就是维护官商勾结，违法交易，与民争利，掩盖当权者管理失控、失职渎职的遁词；就是一句愚民的假大空话！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尊重历史原则”，即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解决经租房问题，合法的坚持，不合法的就要纠正。拨乱返正以来，这样正确处理历史问题的事例不胜枚举。应该依法求实，不可将错就错。如果片面强调“国家政策已有规定”，“原来文件没有规定的不要开新口子”，而不看过去的政策规定是否依法、合法，那就不符合当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主流了。

说白了，中共政府说是“维护私改成果”、“尊重历史原则”，但全体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政府不愿意交出他们抢劫人民私有财产的抢劫成果（经租房）。

那么，中共政府的官方说法是什么呢？

1、“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

2、目前落实私房政策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查看历史档案的记载。档案中有业主的申请报告，报告上有业主的签名、印章等其它相关材料，足以说明当时是经业主同意的，并按规定处理的。说是被中共强迫，无据可查。

3、业主的住宅部分，1985 年 10 月已给予落实，并进行折价处理，折价单上有业主的签名盖章。出租非住宅部分，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故该业主的私房落实政策问题，已属办结，目前不存在再次落实的问题。

好，现在我代表中国新民党来驳斥这些强盗逻辑：

1、1949 年以来，哪部宪法提出了可以对公民的合法私房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对合法私房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款呢?

2、 对合法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什么？合法私有房屋出租是合法的经营谋生手段，为什么要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

3、1949 年以来尤其是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材料，都是有当事人的签名、印章的，难道据此就可以不纠正冤假错案吗？难道可以简单地以“冤假错案的材料都是有当事人的签名、印章”中共就可以不平反了吗？在那种邪恶的

社会状况，不签字就会死的时代，签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4、1985 年 10 月对自留房部分落实政策，当时给出的是《私房接退通知书》，《私房接退通知书》什么时候变成了折价处理单的？如果当初中共要折价收购自留房，为什么不直接提出一个《折价收购自留房通知书》呢？《私房接退通知书》等同于《折价收购自留房通知书》吗？

5、50 年代，共产党规定公民只能居住 100 平方米的房子，本身就是违法的。公民拥有超过 100 平方米的住房，这是公民权利。私房出租是国家法律允许的合法行为，是取得财产性收入的合法行为，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业主出租私房并没有错，更没有罪，更不能因此就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私房业主是广大人民的一分子，客观地说，当时业主出租私房起到了支援国家建设、缓解住房紧张的有效作用，私房业主非但无罪，而且有功！

6、1966 年私房改造政策是“阶级斗争为纲”、“反资防修斗私”的意识形态产物。极左思潮及流毒影响下产生的私房改造政策是很难让当今的中国人理解的。

7、目前，我国拥有 100 平方米以上私房（店面）及出租 100 平方米以上私房（店面）的家庭已为数不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呢？为什么还要残害 50 年前的“经租房”业主呢？

中国共产党人请回答我提出的以上 7 个问题。几十年来就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中共扬州房管局却很响亮、一语道破地说出了心声：“如果把房子都退给你们的话，我们吃什么呢？”

中国新民党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因为要养活自己，而苦了群众、穷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对中国人民作了太多的孽，现在到了谢罪和赔偿的时候了。

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放下历史包袱的根本途径，以抹杀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是割裂不了历史包袱的。只要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正放下历史包袱才能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开的这个药方，是使中国共产党回归文明的良药。

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人民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应该彻底摆脱极左流毒的桎梏，以人类的良知，以对宪法的尊重，对所有私有房产全面落实政策。

五、法律和政策之间，究竟谁该听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历次修改，都没有改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款。

但是，在中共执政条件下，中国的宪法里对中共有利的条款中共就拿来制裁人，例如，我在去年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上书提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立即被中共“对照宪法”裁定我违反宪法中的“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条款，而被取消教授职称，下放资料室劳动。

自古以来所有优秀的中国皇帝都没有这样对待过“文谏”的文士秀才，连鲁迅对国民党骂成那样，国民党都没有取消鲁迅教授职称，而我却被共产党取消教授职称了。中国共产党这又是对照了哪条宪法呢？

而中共任意非法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亿万平方米的私有房产，却又不“对照宪法”了。

这就叫“双重标准”！中国有句俗话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多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一再强调了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在全世界普遍奉行“宪法中心主义”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却一直笃信“政策中心主义”。

如果根据“宪法中心主义”，那么中共政府的制定的任何有可能限制或影响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政策，都不得与其已确定的保护私产所有权的宪法及基本法律相冲突。

但是，很不幸的是，中国人民生活在执政党的“政策中心主义”的时代。经租房就是典型的“执政党政策中心主义”的产物。

宪法大还是执政党政策大，这在民主国家是个连孩子都会觉得很弱智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却成了一个大问题！

经租房实质上是国家通过执政党政策的强制力，逼使私有房产主与国家之间订立的委托经营租赁私有房屋的关系。整个经租房关系的确立、履行，无不昭示着国家强制力的单方性及随意性。经租房权属人无不处于被动的绝对服从地位，因此，它是一种无效民事契约。即使有部分经租房业主当时真是志愿的，但是作为中共政府，出台将“改造起点”以上的房屋一律“经租”而不问是否有不同意见，那么，这一政策就是胁迫人民的。经胁迫或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很显然，当年出台经租房的政策，是集“胁迫”与“显失公平”为一体的非法强权政策。

在经租房问题上的法律和政策纠缠，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

例如：1987 年 10 月 22 日，最高法院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复查历史案件中处理私人房产有关事项的通知》。

在这个通知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法律已经完全向中共政策屈服了。

一、人民法院在复查纠正历史案件(包括刑事和民事)时，对需要作出撤销原判决，发还当时被没收的私人房屋的，在判决前，先与房屋所在地的政府主管部门协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原房还存在，按私房政策规定应发还原房的，要及时发还；对一时不能发还原房屋的，可先明确产权；对原房屋变动较大或退还原房屋确

有困难的，交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房屋的现实情况和有关政策，组织有关方面具体办理房屋发还或作价补偿。有关政府部门应积极配合，妥善解决。

二、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案件中，遇到有关落实私房政策的案件，如：私房因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文革期间被挤占、没收的私人房产问题，建国初期代管的房产问题，落实华侨、港澳台胞私房政策问题等，应移送当地落实私房政策部门办理。落实私房政策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严格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处理。中央已有规定的，应严格依照政策办理，不许扩大范围。中央没有规定的，不许再开新口子。

如果说 1987 年中共确立的是法律必须听政策的话，那么 5 年之后，法律就完成不得介入“经租房”政策了的调解和裁判了。

例如：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经租房”案件：

“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概念是如何被中国共产党政策里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奸的。1949 年以后，在中国，强奸民意一直是通过强奸宪法实现的。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序言中再次指出，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是公私合营、政策是对民族工商业者实行一包到底的“赎买”政策。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与范畴。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却把普通市民的生活资料（私有房产）当做“生产资料”进行了残酷无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多达数千万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

这样的对人民的整体剥夺，全世界哪个政党作得出？全世界哪个政府作得出？这样的对私有财产的公然侵犯，惟有中国才作了，惟有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才做了！这不是作孽是什么？还有什么词能比“作孽”更准确的呢？

生产资料的范畴，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么“生活资料”的范畴是什么呢？

我国的几部宪法都已经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各种生活资料都在这个范畴，并保护它们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很显然，那些“与企业无关”的私人房屋自然不是生产资料，由此也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或公私合营的对象。

1956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制订下发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简称“二办意见”）明知私人房产“与企业无关”，却纳入社会主义改造，拿去“由国家经租”或搞什么“公私合营”这显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超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扩大了公私合营的范围，混淆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本质与界线，侵犯了私人财产的所有权。

经租房问题，没有法律依据，更没有相应立法，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凭“红头文件”就单方面地改变如此大量私人财产的物权，真是伤天害理！

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国家宪法的粗暴践踏，是对私人财产的任意掠夺，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违法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让人夜不能寐的是，这样的践踏，现在还在进行！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几年中共政府的政策是如何践踏法律的。

2005 年 12 月 14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2006 年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此时，以“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法制宣传日的宣传活动尚未结束，国家建设部却以罕见的违法形式，出台下发了建住房（2005）226 号《关于对经租房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首先、建住房（2005）226 号文违背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发出。

根据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四章行文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职权可以相互行文和向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行文；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第十七条规定：“须经政府审批的事项，经政府同意也可由部门行文，文中应当注明政府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上述公文处理办法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国办函[2001]1 号）第 4 条明确规定：“政府各部门（包括议事协调机构），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如需行文，应报请本级政府批转或由本级政府办公厅（室）转发。因特殊情况确需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应当报经本级政府批准，并在文中注明经政府同意。”

很明显，第一，建设部 226 号文并非“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第二，经租房问题，国务院并未将其设定为审批项目，不属于“审批事项”。因此，只好实用主义、有选择地利用国务院办公厅实施意见第 4 条中的“因特殊情况”打国务院禁止性规定的“擦边球”，向下一级政府发文。这“特殊情况”，其动机可疑。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设部对处理私改经租房问题先后对“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下发过（82）445 号、（85）87 号、（87）575 号、（89）431 号等文件，此次（2005）226 号文所谓“经租房有关问

题的处理意见”基本上都包含在已发的文件之内，并无实质性新义，并无“特殊情况”可言。既非经国务院批转，也未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采取直接向下一级政府行文，违背了国务院《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的行文规则，实乃“挟天子以令诸侯”!

226 号文所称“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私改的有关政策，其实就是指现行有效的中共中央 56 年 1 月 18 日文件和国务院（64）21 号文，前者是中央批转书记处二办的私改经租意见，后者是国务院批转国家房管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改造问题的报告，分别下达至下一级党、政部门。从两文批转前均有一个月左右的酝酿研讨时间，从两文批转时的谨慎用语，前者为“基本上同意”，后者为“原则同意”。上述文件虽是在非法侵害私人财产，但是在行文方面可见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的集体决策，其发文程序合法。

其次、226 号文违背政务公开原则。国家建设部为了所谓的“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办发[2005]12 号文），于 2005 年 8 月 31 日下达了建法[2005]143 号《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行建设系统政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各级建设部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围绕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职责，首先从人民群众关心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按照方便群众办事，便于群众知情，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要求，循序渐进，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内容”，

该《指导意见》指出“政务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内容包括“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密切的重大政策”，而建设部 226 号文涉及 4000 万以上的经租房主切身利益，却被注明“此件不公开报导”，可以说与上述“指导意见”精神南辕北辙。

建设部《政务公开指导意见》还指出：“推行政务公开要遵循‘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对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除涉及国家机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外，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如实公开。”对私改、经租房问题，人民日报早在 1958 年 8 月 6 日即向世人公布，根本就不是秘密，已经历近半个世纪，近年来多篇有理有据有份量的评论见诸报刊，现在竟“不公开报导”。

建设部《政务公开指导意见》规定：“未经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得作为给管理相对人设定义务的依据。”那么，“不公开报导”的 226 号文的存在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为什么不公开报导，中共政府怕什么？我想，大家不言而喻。

第三、226 号文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005 年 8 月 18 日，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司副司长江凌在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会议上说：“红头文件决不能与国家的法律相违背！”建设部曾于（85）87 号文中宣布“纳入私房改造的房屋所有权问题，国家尚未明确”，226 号文却又宣布“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政策规定的，其产权性质按国家政策规定已明确属于国家所有，不得变动”。

这是摆明了用政策强奸法律，欺负中国人民的丑恶行径。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但是 226 号文出台的时候，“物权法定”原则一直用于行政实践与司法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它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第四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由此可见房地产转让，也即产权的转移属于要式法律行为，原经租房产权人并未与任何人签订产权转移书面合同，仅凭建设部一纸文件，产权就转让（移）丧失了、明显违背了《国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而建设部 226 号文再次以莫须有的“国家政策规定”代替《国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226 号文称：“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政策规定的，其产权性质按国家政策规定已明确属于国家所有，不得变动。”

那么请问 226 号文下达之前，哪一份国家文件的政策规定经租房产权“已明确属于国家所有”？建设部能代表国家吗?

私改、经租，是国务院根据中央政策部署执行的，至今中央、国务院也未宣布经租房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此前国务院也并未授权建设部作此宣布，所谓“国家政策规定已明确”，只不过是忽悠下一级政府和群众的一句假大空话。

人们不会忘记建设部在（82）445 号文中提出“凡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即国家经租房屋），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66）507 号文第二项“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的规定精神，可明确宣布属于国家所有。”（87）575 号文又重申了上述房屋“根据中发（66）507 号文件的规定精神，其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且看文化大革命中传达到“红卫兵和广大群众”的中发（1966）507 号文中的有关内容：“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提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该采纳办理。”其中第二项：“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关于取消定息，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在未通过 前，暂停支付。”

暂不论建设部将拥有生活资料的大批经租房主视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将“定租”混同“定息”，也不论人大至今未作出取消“定息”、“定租”的决定，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否定文革整整十一年后，建设部仍坚持用文革中的文件，用当年红卫兵的倡议作为变更经租房产权的依据，岂非咄咄怪事！更有甚者，事隔近 20 年之后，早已进入了 21 世纪，建设部在 226 号文中竟将文革时代的文件、红卫兵的倡议忽悠成了所谓“国家政策规定”，仿佛时光倒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

第四、226 号文根本反对“尊重历史，实是求事”的精神。

中共中央在 1956 年 1 月 18 日文件中确定的私改基本方针政策为：“对城市房屋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应当按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的原则进行。对城市私人房屋通过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226 号文将其高度概括为：“国家比照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发给定租的形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简称‘经租房’）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份。”这就使得“私改”的原貌完全失真，以此概括只能起到对下一级政府误导的作用，因为非专业人士或非当事年轻人对经租房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而被概括掉，被省略的内容恰恰是经租房问题的关键，是媒体质疑、群众呼声强烈，同时也是建设部不能忽视、需要向国务院请示汇报的问题。

如：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 226 号文省略了“资本主义”。当年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才进行了改造，而建设部取消了定语“资本主义”，还需要改造吗？如需要改造，当前蓬勃发展的私营工商业又该如何？该定语不论省略与否，都是一个令建设部难以回答而又不容回避的问题。况且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对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而作为私有出租房屋的改造，除作为有一定规模的私人房地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外，大部份经租房主的私房是作为生活资料而存在的，比照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合适吗？

同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政府对当前中国居民不规定“100 平方米的居住面积”限制，这作何解释呢？

中共政府对当前中国城市的大批量出租房不再进行“经租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作何解释呢？

那么为什么在 50 年前，中共政府要剥夺中国居民的私人住房呢？难道不是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吗？难道不是同一个中国共产党吗？如果不是同一个共产党，那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政权，却抛弃了罪责和债务呢？

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

把这样伤天害理的债务让人民承受，我们于心何忍啊？亲爱的主席、亲爱的总理！请你们听听人民的哭天抢地的怨声吧！

再回到 226 号文，文中概括省略掉了原中央文件中的重要规定：“对城市房屋占用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赎金应由国家支付，定租由承租百姓所付房租的 20%~40%（即“依租定租”）取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这国家不花钱的“赎买”，国人早有质疑。

一般经租房主领取的“定租”与其当时的房价比率，远远低于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此“赎买”绝非公道。另外，中央所称“在一定时期内”，至今未明确这个“时期”是多长，难道支持红卫兵的要求、截止于 1966 年 9 月文革中能算数吗？

“文革”的历史事实值得尊重和肯定吗？

胡主席，我研究过您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现在您对文革的思想。

您在文革早期也被冲击过，当时您在清华大学做辅导员。

您现在对文革的思想是：“文革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也伤害了中国共产党。”

我有渠道获得一般国人无法获得的您的思想，我想，对文革，我和您的心是相通的。相通的思维是：文革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人的思想”的改造，但是手段不仅是错的，更是反人类的！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一切错的事情改正！

早改早主动，迟改就被动！

经租房问题可以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一个重要的大问题，近几年来，特别是“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后，面对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诉求，包括报刊报导、评论的, 访民（特别是北京访民）投诉质询的许多意见，或支持或反对，建设部要不要有自己的见解？

对此重大问题如不能提出合理合法的见解，又如何能提出妥善处理问题的办法？

国家建设部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任何针对性的答复，这就叫不实事求是！

226 号文省略掉有关经租房的重要历史规定，这就叫不尊重历史！

国家建设部作为房地产方面最高的政府职能部门，尚且不能回答报刊和访民提出的问题，又如何要求下一级政府“高度重视经租房有关问题的处理工作”、“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呢？

这难道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以体现求真务实、促进安定和谐？

第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有错必纠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府必须执行的原则。

对于私改、经租房问题，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搞阶级斗争“灭资兴无”的年代，原认定“房主收取房租就是剥削”是极其错误的！

将生活资料当作生产资料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是极其罪恶的！

将房屋租赁经营方式的改变、代替了所有制的改变；将“定租”视为“赎金”；至今仍在执行文革红卫兵倡议、停止发放定租；强行改变经租房产权等等，这些都是对人民财产的巧取豪夺的行径。

这些反对人民的政策，必将遭到历史的唾弃，人民的审判！

我们再来看一个在网络上遭到中国人民普遍唾骂的国家建设部于2006年12月下发的建住房（2006）308号《关于妥善处理经租房有关问题的通知》。

308号文题为“关于妥善处理经租房有关问题的通知”，名不副实。文中既未对妥善解决经租房问题提出一条具体措施，又未对旷日持久的纠错纠偏工作提出一项具体要求，也未对多年来访民和媒体提出的经租房问题作出任何解释。在“全面正确理解经租房有关政策”的官话、套话、空话背后，是以偏概全的非法推定，是对文革中“左”祸冲击经租房原政策的默认，以及越权解释忽悠出“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已明确”，先斩后奏到“同意”相隔20年（从该部1985年87号文到2005年226号文，才出现所谓“经国务院同意”字样），再次越权（并无授权证据）且无法律依据，第二次宣称经租房产权“属于国家所有，不得变动”。

值得重视并保持高度警惕的是，这份308号文认为，“近期有的媒体”“公开报导经租房问题”，“引发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上访增多”。所以，要求媒体不得报道相关事件。

308号文完全是本末倒置，颠倒了因果关系。无视客观事实，堵截冤民上访，限制媒体报道，捂盖子、回避矛盾的作法，无法化解矛盾和消除不和谐因素，只能适得其反。

经租房业主依法维权上访，是受宪法一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保障人权”入宪和《物权法》等条文的鼓舞；是为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是为了维护政令畅通，促进依法行政；是因为经租房政策在决策上受到“左”的影响，存在先天的缺陷和疏漏且有悖于宪法而形成，是因为一些地方在政策执行上，各自为政，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对访民依法按政策提出的诉求置之不理，官官相护，与民争利所导致。

而308号文对此却以“防火、防盗、防记者”、“防人之口胜于防川”的心态，采取不是“疏”而是“堵”、“捂”和“压”的做法，闭口不提抓紧和督促解决应当解决的信访问题，相反，308号文坚持文革冲击私改经租房政策的错误，扭曲了私改经租的历史，背离了中央有关否定文革的方针政策！

308号文的下达，是为地方房管部门中坚持各自为政、政出多门，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暗箱操作，与民争利的种种劣行打气鼓劲；是为拒绝批评，不琢磨事，专琢磨人，办事无力，整人来劲者支招解围。使所谓“善始善终做好城镇房地产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将长期停留在建设部（89）431号文件的纸面上，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308号文不是要按照《国家保密法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解密、公开的问题，而是其有悖于宪法和法律规定，需要撤销，是主动还是被动撤销、何时撤销的问题。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打造阳光工程，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才能得到民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古代皇帝都能明晓的浅显道理，到了21世纪的中共政府，却不懂得了，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法律和政策相比，法律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执政党不听法律的，以政策代替法律，或用政策凌驾于法律，老百姓还信任什么呢！

现在，中国人民走上了古代封建皇帝制定的上访道路，这实在让法律感到羞愧难堪。

就是老百姓视为救命稻草的上访，也因为臭名昭著的“马家楼”（关押上访群众的场所）而使得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咫尺天涯。

在如今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不过长安街”的中国国情下，中国访民是全世界最苦难的人民。

现在中国要靠国家机关的内部监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人大、政协、新闻等一切所谓的“监督”手段，都因为一党专制而全部失效。

所以，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中国新民党倡导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政体模式。

六、什么叫“以人为本”、什么叫“执政为民”？

作为一名西方社会学硕士和中国哲学博士，我很开心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终于知道了要“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了。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仁学”的伦理基础之一。“执政为民”却是多党竞选制度的全部政治基础。

“以人为本”，我们中国人探究的比西方人深刻，而“执政为民”的选举政治却是西方人的强项。这两样好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指日可待。

这两样的合体，其实就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人乃是天地之心，人心乃是体物而不遗之广大之心。仁者爱人，这只是仁学的第一步，爱鸟兽是第二步，爱草木是第三步，爱瓦石是第四步。其中的顺序是，人与鸟兽皆为生灵，人有文化而鸟兽没有，故人为有生之最尊也；

草木瓦石非外力皆不可移动，但草木枯荣生生不息也，而瓦石为无生之物也。以有生之最尊，爱无生之瓦石，方为世间大爱。

以上仁爱之阶渐次第，见阳明先生言："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是故，理气心人我，贯通无二。万物一体之说，仁学之善体也。

仁者爱人的内涵和指标，乃"以人为本"，爱民、亲民、体恤怜悯。

而爱鸟兽草木瓦石则涉及动植物保护问题、植被森林保护问题、环保问题、资源再利用问题、旧城改造问题、文物保护问题，这些问题我都派遣大量调查人员进行过深入的调查，调查报告堆积如山，容我以后再就相关议案与两位领袖探讨。

今天，在这里，我想和两位领袖谈如何用"以人为本"的"仁学"思想来解决"经租房"的问题。

仁者爱人，此人为总体之人，非分殊之人。孔子言："泛爱众，而亲仁"，当是此意。立人我之别而以一已生意凌驾别人者，必将丧失畅达流行之自然之道，反倒天理枯死。

在"经租房"问题上，我看不到"泛爱众"，看不到"无异无分别"，我看到的是，中共政府发还了"华侨"和"国民党高官"的"经租房"，普通人民的"经租房"却被中共政府牢牢地抱在怀里。

"华侨"、"国民党高官"、普通人民，皆人也，何则不同礼相待呢？这是"以人为本"吗？

1987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复查历史案件中处理私人房产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出了退还文革中被挤占的私人住房问题，并且提到经租房问题中"对于中央和国务院明确的对祖国统一大业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本人要求发还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我们再来看几条消息：

2001 年，由于南方的华侨要求归还私人房产的声音非常强烈，当地政府在请示国务院之后，开始认真落实。目前广东、厦门、福建、海南等地均已把经租房归还给了华侨，已拆了的便赔钱。

广州市落实房屋政策办公室的文件规定：凡是房屋代管和经租时产权人已具备华侨、港澳同胞身份的，只要房主或者代理人提出申请，提供有效证件和房契，房屋产权全部发还给业主。

广州市海珠区、越秀区国土和房屋管理局的文件还规定：无论华侨还是国内业主，只要能提供有效证件，都可以发还经租房产权。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知名华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将领，他们如果原来有房子成为经租房，由国家代为出租的这种情况是可以落实政策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在人大常委会议上表示全国清退了四千万平方米的华侨私房（简称乔产房）。

考虑到招商引资的任务，广东、福建、海南等省开始对原私人被经租的房产进行退还

在政策上现在开口子开的包括华侨、国民党军队人员、少数民族、所谓的有特殊贡献者。

他们的财产是私人财产，普通民众的财产就是中共政府的？

他们是人，普通民众就不是人吗？

"以人为本"在"经租房"问题上，难道是"以对中共政府有用之人为本"的吗？

人民果真没用吗？看看历史上，欺负人民的，有谁有过好下场？

那么，在"经租房"问题上，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中国新民党认为，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基础。而保护私有财产是政府的目的。议会主权、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全都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修订版都强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根本原因。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自由经济与宪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一个最为牢固的基础。

宪政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必须建立在公民个体的独立之上，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平等的保护；而财产权成就了公民的个体独立，并构成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并进而构成整个人权的基础。

财产权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属于个人物品的支配权，它意味着一个可以由主体自行决定的范围。这一方面为主体提供了自由——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他的基本自由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自由界定了的空间范围——这个范围是个体独立的界限。一定的财产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因此，一个人的财产有了保障，则他的生命也就有了保障。

因此，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还充分体现了宪政对人性的尊重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同时，财产权还是公民实现其他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主要工具。

人的精神存在固然重要，但它必须以一定物质形式作为其依托。

当时的中共政府对待"经租房"问题的失误，其实就在于缺乏我和中国新民党的上述思想所造成的。当时的中共政府认为"人的思想"的改造，就是去掉人对物质财产的迷恋，这是反科学的。

以上说的是"以人为本"，下面我和两位领袖谈谈"执政为民"的问题。

执政，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为己，一是为民。

为己执政的，那是专制统治。为民执政的，必然是民主制度。当然，也有专制集权打出“执政为民”的口号的，但是很快就被人民发现其实是用华美的衣裳包裹着一颗肮脏的心。

那么为什么只有民主制度，才可以真正实现“执政为民”呢？

因为，民主制度的多党竞选，其实就是人民在选一个可以在现阶段代表大多数民意的政党。这样选出来的执政党，必然“执政为民”，而且也必须“执政为民”，因为，人民的选票决定了这个执政党是否还能继续执政下去。为了监督执政党对人民的服务，人民还用手里的选票，票决出了宪法。于是，一切政策都必须在这个宪法之下，这就叫宪政。

宪政即限政，它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而财产权为公民个体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权力限制和干预的领域，为公民个体制约政府权力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

公民没有了私人财产，就沦为了政府的奴隶。所以，财产权成为了对抗政府权力恣意的最坚固的屏障。18 世纪英国的皮特首相曾这样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王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正是财产权的这种制度装置，促进了宪政在民主国家的兴起。

但是，要使财产权从纸上的规定变成现实的保障，还必须籍由以下三方面的津梁：

第一、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将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确定为无效并予以排除，最终使宪法的规定能够在法律法规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贯彻。从“经租房”问题来看，中国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个违宪审查制度才使得中共政府凌驾于宪法之上。

第二、推进宪法的司法化。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和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这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普通法律法规未对宪法有关规定具体化或者普通法律法规违宪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若遭侵害将无法通过法院得到救济。英国有句谚语是，“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为使财产权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必须使宪法在法院得到完全、全面地适用。任何法律的制定，其最终的指向都是法院，宪法也不例外。就宪法的司法化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特别是建立宪法诉愿制度，以保证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在没有其他法律依据时直接依宪法条文提起宪法之诉。

中国新民党认为，必须在中国建立宪法法院，来杜绝政府用强奸宪法的方式来强奸民意。

第三，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就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核心是要确立程序本位观念，赋予程序以独立的价值。这对财产权的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主要针对政府，用以排除政府随意剥夺、恣意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你要剥夺我的财产权，必须依据事先确定的、公正的法律程序。只要你的程序不合法，你的行为就会被宣布无效；而不管你的动机是多么高尚，目的是多么合理！

现在“经租房”也是这个情况，所有经租房维权人士手里都有当年政府颁发的房产证或经租协议，同时也未经过任何合法的手续变更这样的证明和协议，而中共政府却说，经租房在文革开始那年（1966 年）就算是国家的了，这怎么能让人不感到愤怒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经租房”问题的解决惟有取消现在实行的“经租房国有”的政策，确认“经租房”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然后积极进行“还房于民”的工作。

由于目前之“经租房”的存在状况分为三种情况，所以“还房于民”工作也有三个途径：

一、原房屋完好可住，且政府还需要继续租用的，政府应该补足从暂停发放“定租”（“经租费”）之日至今的房租。房租按 2008 年市价为依据进行测算。

二、原房屋完好可住，且政府不需要继续租用的，应该立即退回，并补足从暂停发放“定租”（“经租费”）之日至今的房租。

三、原房屋无法修缮不能住人，或原房屋已经坍塌或被拆迁，应该就近退给“经租房”业主原面积的房屋，并按 2008 年市价测算支付拆迁补偿费。

胡锦涛主席、家宝总理，以上只是我的一些粗浅的法律认识，如果两位领袖认为我说的在理，认为我说的是民意，认为我是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的话，请两位领袖思忖定夺。如有用的上我的话，我将全力协助两位领袖和贵党一切爱国亲民之才俊，为国效力。

在我向两位领袖介绍了我对“经租房”问题的法律问题后，我想借此机会，与两位领袖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我于去年底被中国广大维权群众推选出任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并起草了中国新民党章程，想来两位领袖都阅读过了。我想，两位领袖与我的心，与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明眼人读过中国新民党章程的都知道，中国新民党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新民党，其实就是中国的“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同盟后，并没有成立过共产党，相反，他们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抛弃了的口号。

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

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通过多党竞选、议会斗争、群众维权，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促使了社会的进步，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我用 12 年时间阅读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认为，马克思一生只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让人贫困的书，一本是让人富裕的书。他们先写了让人穷的书，后写了让人富的书。前者叫“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叫“社会民主思想”。

不幸的是，我们可爱的中国，选取了一本“让人穷的书”，而欧洲多党万幸选择了“让人富的书”。每晚睡觉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无法入眠，揪心裂肺之痛难以言表。

所以，我才在 2007 年 11 月给胡锦涛主席上书探讨“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并把这个理论重新命名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理论。

中国新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但是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由这个初衷出发的手段和途径不一样。中国新民党提倡人民组党、多党竞选、走向全民福利；而中国共产党却认为可以一党带领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参政议政）在监督制衡方面有先天的不足。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不都是如两位领袖这样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参政议政的政党制度，无法解决两个根本的制度问题，一是当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出现类似“毛泽东思维”的人时，几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毫无制止之力。“文革”的发生和肆虐，就是如此产生的。第二、执政资源垄断，各自为政，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不过长安街”，对此两位领袖深有感触吧。

最后，我要和胡锦涛主席说几句话，请允许我称呼您为胡叔叔，因为您是我母亲在省泰中的高中同学校友。您和我母亲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长，这是我们江苏人的骄傲。我曾经在国企、政府、法院工作，但最后选择了做学问的道路。学业未精，却又被人民群众推上了民间维权政治的道路，真是世事难测啊！

21 世纪，中国正在全面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也被人民推到了紧迫的层面。中国共产党在 21 世纪如何应对历史变革，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全世界现在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

就中国目前体制看，可以推动中国和平发生伟大的历史变革的人，只有一人，那就是胡叔叔您。

我曾在 3 年前，带着一书包马克思论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和两包香烟坐在省泰中的门口，吸烟读书，想着您曾经在这个门口进进出出，以及我能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所有关于您的思想，最后，在我快吸完两包烟里的最后一枝烟的时候，我再次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八十一页，阅读马克思的一句话。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想，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看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把恩格斯屏弃的“1848 年的斗争方式”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看到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在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看到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专制独裁滥杀无辜的时候，看到毛泽东把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一定会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我揿灭手里的最后一根香烟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必须走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可以让中国人民永远感谢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胡锦涛先生。

胡叔叔您担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您不仅是行政长官，您也是卓越的理论家，我上面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您一定耳熟能详。

此外，我的同志、同行中国共产党人李锐先生和谢韬先生也著述甚丰，他们是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学者，我只不过是帮助他们做了他们理论的实践工作而已。

另外我要告诫千百万中国新民党党员，最近在网络上快速流传着两幅照片。一幅照片的两边写着“立党为公款、执政为民膏”，横批是“共产党万岁”；另一幅照片的两边写的是“立党为正义，执政为民生”，横批是“新民党万岁”。前者的照片是胡主席，后者的照片是我。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历史问题、以及腐败等体制问题，让胡锦涛主席承担是不公道的。胡锦涛主席的大名必将载入史册，但是绝对不是这样的界定。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全部文字连同附件，请 4000 万“经租房”维权群众和中国新民党人在传播时，请一字不落地全文传播。切记！

郭泉：民主先声 133：美国雅虎向中国民运屈服，这不只是我的功劳，功劳属于中国人民！

上周，我代表中国新民党就美国 yahoo 公司的“王小宁事件”、“师涛事件”、“郭泉事件”向中华全国网民同胞发出了一份《告中华全国网民同胞书》。

我在信中说，因为我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出公开信，要求结束一党独裁，立即实行多党竞选，在年初遭到美国 Google 公司和美国 yahoo 公司的全面封锁。

在我决定起诉这两家美国公司后，农历大年初三，美国 Google 公司向我屈服，恢复了我的网络信息。但是，美国 yahoo 公司还在负隅顽抗，

2 月 20 日，我向全世界发出了我在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美国 yahoo 公司的新闻稿。我在新闻稿里这样写到：

美国 yahoo 公司违反国际有关人权的相关法案，也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

美国 yahoo 公司协助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坚决反对。

美国 yahoo 公司的这一丑恶行径，不只是抽象的商业道德规范问题。它对美国政府在全世界的良好民主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如果美国法律、美国政府继续对美国 yahoo 公司在中国协助专制统治实行网络信息封锁的行径不闻不问的话，必将使中国人民在民主进程的目标上遭遇更多的障碍。那么，中国人民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就将是必然的。

我的新闻稿发出的第二天（2 月 21 日、星期四），美国雅虎公司创办人杨致远致函美国国务卿赖斯，希望她协助要求中方释放中国的异议人士。赖斯计划从 2 月 23 号到 28 号访问韩国、中国与日本。

杨致远在信中表示，对雅虎公司曾经向中国官方提供使用者资料，中方以此为证据关押记者师涛以及网路作家王小宁，感到深深遗憾，这与雅虎公司的价值观并不符合。

杨致远还在信中表示，在倡议释放中国政治犯方面，雅虎将扮演重要角色。雅虎知道美国政府对私营美国公司介入对外政策的限制。

今天，一位 QQ 770112451 的朋友给我发来贺信，称“这是您的功劳！佩服！”

我立即回信：不，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功劳！

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的伟大道路上前赴后继、顽强拼搏的精神，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在我起诉美国 yahoo 公司的当天（2 月 20 日），百度公司也悄悄向我屈服，这是继美国 Google 公司向我屈服之后的，第二个国际网络搜索公司向我屈服。

百度公司是中国公司，长期受共产党的控制，今天百度能有这样的表现实在很不简单。向我屈服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接到了中国共产党要求百度解除对我的封锁的命令，一是百度良心发现，勇敢地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命令。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我屈服了。如果是后者，那我就最开心了。

因为，我想，全民觉醒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人民必胜！民主万岁！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 QQ115659144，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郭泉：民主先声 134：人民、教授、学生，民主的三方面力量终于在 21 世纪又联合起来了

爱国学生在革命运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力量。上个世纪，所有的革命都离不开学生运动，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专制革命（例如文化大革命）。上世纪上半叶的学生运动主要是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而上世纪的下半叶，爱国学生的运动却表现出了十分复杂的情况。

1949 年前的“54 运动”、“129 运动”、“520 运动”等一系列推动民主进步的革命运动都与学生有着不解之缘。甚至“西安事变”中都有学生运动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热血青年和革命教授是 1949 年前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1949 年后，学生们开始被中共的“阶级斗争”观念洗脑。洗过脑的学生，开始认为教授是资产阶级，到了 1966 年，中共中央煽动革命学生反对“反动”教授。文革开始后，很多大学的校长、教授被革命学生活活打死。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就是这样在学生的仇恨中，被学生活活打死了。

人类历史上，要求自由民主、要求科学真理的学生运动第一次成为了专制独裁的帮凶。

好在 1989 年，在共产党“官倒”腐败逾演逾烈的情况下，热血青年和革命教授再次成为靓丽的风景线。

89 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远没有现在苦难。也就是说，学生和教授的民主思想超前了。其实民主思想应该来自人民，而不是学生和教授。人民不要民主，学生和教授要民主那就是错的。所以，89 的失败也就不奇怪了。

枪林弹雨、履带碾压之后，青年不再热血了，教授不再革命了。89 之后的十多年来，很多学生成了不问政治的娱乐机器，不少教授成了只问经济的挣钱动物。

这十几年里，人民的苦难终于让人民要求民主了，于是以维权群众和大学教授为主体的中国新民党成立了，今天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致信给我，寻求合作和支持。

这样，民主的三方面力量终于在 21 世纪又联合起来了。
附：中国新民党、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 2008 年 2 月 23 日往来公函两份

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致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邀请函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

我盟将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自由事业发展、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中挖掘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才。现因我盟正处在起步阶段，急需社会广大的力量巩固和发展我盟。我盟郑重邀请郭泉先生担任名誉主席，并能对我盟给予支持，为盼。

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2008 年 2 月 23 日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致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函

中新党中央外联函字（06）号

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贵盟中央 2008 年 2 月 23 日邀请我党郭泉代主席担任贵盟名誉主席，并希望我党能对贵盟给予支持。经我党中央党部研究决定，现回函答复如下：中国新民党完全赞同并支持贵盟在学生中的民主启蒙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决定派遣郭泉主席担任贵盟名誉主席，代表中国新民党全力支持贵盟工作。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　二 00 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郭泉：　手机 13151423196、QQ115659144，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中华学生爱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联系 QQ：337699658

郭泉：民主先声 135：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致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开信

我这封公开信是写给一切正直、高尚的中国共产党人看的。

我于去年底被中国广大维权群众推选出任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并起草了中国新民党章程。这个党章，我相信会有不少中国共产党人阅读过。

是的，我毫不避讳地说，中国新民党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新民党，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同盟后，并没有成立过共产党，相反，他们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

我用 12 年时间系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认为，虽然马恩著作汗牛充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只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让人贫困的书，一本是让人富裕的书。他们先写了让人穷的书，后写了让人富的书。前者叫“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叫“社会民主思想”。

不幸的是，我们可爱的中国，选取了一本“让人穷的书”，而欧洲多国万幸选择了“让人富的书”。每晚睡觉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无法入眠，揪心裂肺之痛难以言表。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认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得人类社会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想要消灭阶级压迫，必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得到解放。这就是著名的“阶级斗争理论”。

但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年龄增长，他们的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认识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深刻，他们开始意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全体人员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矛盾的。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是“公权”而不是“专政”。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社会民主思想”，建立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思想”即只有在建立以国家政权公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前提下，才能和平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国际采纳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思想”，于是欧洲各国走向民主和富裕，而列宁、斯大林组建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采纳的是“阶级斗争理论”。

很不幸，中国加入的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国家，无一例外全是贫穷落后。

在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通过多党竞选、议会斗争、群众维权，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促使了社会的进步，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所以，我才在 2007 年 11 月给胡锦涛主席上书探讨“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并把这个理

论重新命名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理论。

中国新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但是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由这个初衷出发的手段和途径不一样。中国新民党提倡人民组党、多党竞选、走向全民福利；而中国共产党却认为可以一党带领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参政议政）在监督制衡方面有先天的不足。

没有监督和制衡，天使都会变成魔鬼。

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参政议政的政党制度，无法解决两个根本的制度问题，第一、当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再次出现类似“毛泽东思维”的人时，几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毫无制止之力。“文革”的发生和肆虐，就是如此产生的。第二、执政资源垄断，各自为政，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不过长安街”。

21 世纪，中国正在全面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也被人民推到了紧迫的层面。

中国共产党在 21 世纪如何应对历史变革，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全世界现在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

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上来！

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新民党一起，接受人民的选择！

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根本力量！

郭泉，男，1968年5月8日生。原中国民盟盟员（2007年12月17日因提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被开除盟籍），现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料室资料员。

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附件：2007 年 11 月以来，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致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公开信一览表

1、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

——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2、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中石油中石化 59 万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案”、“李国宏案”、“劳动教养制度”

3、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中国工商银行 13.8 万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案”

4、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的社会安置机制”

5、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郭泉告中华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同胞书

——关于“在家革命”的和平民主革命理念

7、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告中华全国退役军官书

8、中国新民党告全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书（暨 2008 年新年贺词附党章）

9、中国公民郭泉致全世界媒体的公开信

——正式起诉美国 Google 公司、美国 yahoo 公司

10、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就中国网民党的成立告中华全国人民书

11、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郭泉就美国 yahoo 公司的“王小宁事件”、“师涛事件”、“郭泉事件”

——告中华全国网民同胞书

12、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彻底解决文革思维下经租房问题”的策论

13、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致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开信

郭泉：民主先声 136：钟华教授、季广茂教授，你们有本事联手骂中共独裁去！

我虽然是法学（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但是我在南师大当副教授担任的是文艺学的研究生导师。2007 年底，因为我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立即取消独裁、开放党禁，而被南师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剥夺教授职称。中华民国时代，鲁迅把中国国民党骂成那样，国民党也没有对鲁迅怎么样，相反鲁迅在好几个大学做兼职教授，风光无限。而我依古代文人的传统“文谏”了一下皇帝而已，立即就被中国共产党剥夺了教授职称。好在学位制度是与世界接轨的，否则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把我的博士、硕士等等学位一捋到底，让我成了文盲或半文盲。

哈哈，言归正传。就在我奋力发起中国的新一轮民主运动的时候，最近，我的两位文艺学同行钟华教授、季广茂教授，进行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骂街热身运动。其火暴程度，连我这个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民运界都算是“拼命三郎”的人都自惭形秽、自叹弗如。

2007 年 11 月，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先生在《文艺研究》第 11 期上发表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评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下略称“钟文”）。 指出该书存在如下 8 个方面的错误：“总体架构实与名乖、文题不符”、“对中心概念不做任何明确界定或说明”、“阐释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甚至前后矛盾”、“避重就轻、重复拉杂并且时常跳跃的论述比比皆是”、“信口开河、‘宏大’而绝对的惊人断语时时出现”、“知识不落实、阐释不到位”、“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外语优势变成一种炫耀，有时又出现曲解或误读”。

我当时看了，我觉得钟教授的这八点说中国共产党及其十七大报告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有什么必要把骂共产党的话用于骂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先生呢？

后来我没再多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直在“文谏”共产党。就在我为钟教授没有用这八点骂共产党而感到万分可惜之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先生开始回击了。

季广茂教授在 08 年伊始一口气写了 5 篇文章开骂钟华教授。 季广茂教授在《做回畜生》一文中骂道：“这种鸟人，在下一般不去理他。不理有不理的道理：跟畜生摔跤，输了，畜生不如；赢了，比畜生还畜生。总之，不是畜生，也成了畜生。……不过，这回有当一当畜生的必要，因为见过无知的，没有见过这么无知的；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狂妄的，没见过这么狂妄的；见过下流的，没有见过这么下流的。其知识之贫乏，其逻辑之混乱，其用心之险恶，其语言之变态，罕见”。

我读到季广茂教授的这段文字，我忍俊不禁，季广茂教授如果这段是骂共产党独裁的话，那就再贴切不过了。

此后不久，季广茂教授在博客上又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哦的神啊，救救我们吧》、《昏话连篇·臭气熏天》、《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在这四篇文章中，充斥了侮辱、谩骂之辞，其用词之肮脏无忌，不堪卒读。但是如果把季广茂教授攻击的对象换成是共产党独裁，那一定深得人民的喜爱！

于是，我扼腕叹息，钟华教授、季广茂教授这样的“好身手”，不去骂共产党独裁实在是人民的损失、国家的不幸！而共产党看到钟华教授、季广茂教授的互相攻讦，一定窃喜无比，“群众斗群众”是共产党最喜欢看到的闹剧。

我从钟华教授、季广茂教授身上再次得出了一个我早就得出的结论，在专制独裁统治下，如果人民的所有激情都用于人民之间的互相攻讦，那么专制独裁一定会万岁、万岁、万万岁的。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37：我们天堂相见：致中国的“基督七君子”及汪兆钧先生

2007 年秋季学期，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做兼职教授，担任 4 个班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课堂上时常谈到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例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等等。

课间有同学问：“郭教授，你真的不怕死吗？”我笑起来，说：“在这个独裁统治下生不如死，我怕生不怕死。”

后来，我被共产党剥夺教授职称，在告别大学同学的最后一课上，我送了很多我的哲学和文学专著给同学们。题字签名一律是“人总是要死的。某同学雅正。郭泉，年月日。”

2007 年 1 月 30 日，我完成了《民主先声》的第 119 篇（《我现在已经成了史上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人了》），其中写道：

其实，我一直是个不怕死的人。其原委有三，第一，我的博士专业学的是中国哲学，其主攻方向是隋唐佛学圆融思想，其中的生死圆融不二思想让我早就参透生死了；其二、我教学的主要课程是国学，其中的仁学思想例如“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对我的影响简直就如同“武士道”对日本人的影响；第三，我是基督徒，耶稣

明知道自己要被法利赛人害死，仍然走向十字架，死后复活升天。

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生不如死的独裁专制统治下，死真的是一种解脱呢。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话对我也适用的。

最近，不断地有人对我说，他们也有民主思想，但是却在“生死”、“家人”这一关上过不去。他们问我革命的动力是什么。我说，第一是人民的苦难，第二我是基督徒。

现在国内外已经有多个学术团体和政治组织在系统研究我提出来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模式。其实他们一直忽略了一个我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就是我的基督徒身份。我 1995 年在南京的莫愁路教堂受洗入教，并一直致力于儒释道三学和基督教的结合研究和教学。

基督教徒大体分为两类人群，一类是最大量的“很田园化”的信众，另一类就是著名的“文化基督徒”。我属于典型的“文化基督徒”。

基督教和基督徒（特别是文化基督徒）是世界民主的最伟大的推动力量。

入教 14 年来，我不断阅读圣经和了解基督教的发展史。最后，我整理出了基督教的主要民主思想，如下：

1、主张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

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

3、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

4、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5、对于改变（如社会的结构）抱持着开放态度，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

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

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

8、排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我先举两个推动世界民主进程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历史事件：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要求与日俱增。1955 年 12 月 1 日，蒙哥马利城黑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被捕入狱，成为民权运动的导火线。在青年黑人基督教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民权运动队伍迅速扩大。金牧师被极端种族主义者刺杀后，在世界人民谴责面前，美国政府于 1965 年 8 月要求国会通过了《 选民登记法》。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是现代非暴力运动的典型，在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之中影响深远，它使人们看到可以通过合法的群众运动获得民主权利的可能，也使人看到世界必将走向民主平等的趋势。

其特点归纳如下：1 基本目标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实现种族平等；2、规模空前，成果显著；3 主要斗争策略：非暴力；4 联邦政府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1989 年 12 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因抗议解除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神父职务举行的群众示威，演变成骚乱。不久，布加勒斯特也开始了骚乱，军队倒戈。外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捕，并被秘密处决。救国阵线委员会取代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

下面我再来举几个我认识的一直在奋力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基督徒吧，也许大家知道他们的杰出的“世俗工作”，却不知道他们的基督教徒身份。

除我之外，全力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著名基督徒，还有我的好友任畹玎先生、孙文广先生、袁红冰先生、高智晟先生、郭飞雄先生、郑恩宠先生等等，再多的人名也不需要多举了，就我们“基督七君子”，就足以让中国的民运事业永远记住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贡献了。

2008 年 2 月 25 日汪兆钧先生发表文章，也说到生死，与我同此心、同此理。

汪先生写道：如果我幸运，我能活着，我将对中国的产业技术革命有较大的贡献。当然，我对自己的命运也并不乐观。我这门“大炮”得罪的不是一般人，被利益集团收买的黑社会或某个极端分子，用几颗子弹或某个突发事件就可以把我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消灭，这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如果这样，这也算成就了我！如果说我汪兆钧生前的力量很小，甚至很可怜！那么我死后的力量就会变得无比强大！我的死会大大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感悟到这股强大的力量就使我现在不仅无所畏惧，而且内心非常充实！我的命运服从于国家的命运，我很幸福。

我与汪先生在新年伊始互通手机短信致敬问候，尚未谋面，估计我们的见面会遭致中共中央和北京地方和南京地方的所有中共警察全力围堵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汪大哥及“基督七君子”的所有教友、同志能在中国的民主天空下开怀畅饮。

如果，我们在这条带领中国人民奋进的民主之路上被中共杀害，也无妨，我们天堂相见！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38：中共对大学实行党文化控制后，中国大学沦为中共独裁的帮凶

1949 年中共在大陆实行独裁以来，中国的大学就没有了思想的独立性了。

日前，中共对多所大学校长的任命再次昭告天下，中国大学不只是没有思想独立性的问题，而是已经彻底地沦为了中共独裁的帮凶。

来自北京的消息显示：中共已任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方滨兴担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教育部农林医药教育协调办公室主任吴建伟出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高思华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青海省教育厅长杜小明调任华南理工大学副书记，等等。

这些人均为政府官员，如非坚决彻底的拥护独裁者，在中国是根本不能在体制内从政的。另外，各高校的正直且有民主思想的学者多如牛毛，舍弃学者而任用官员，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民主的独裁思维。所以，我把中共此举判断为中共着手加强对大学的进一步控制应是题中之意。

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校长、什么是大学教授呢？

我先举两个例子：胡适先生先在中国公学当校长，后任北大校长。罗尔纲回忆学校生活的时候这样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虽是理科出身，但有人文气质。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最难得的是中华民国的国立大学的校长虽然按照民国法律也是政府任命的，但是，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是高度独立的。

中华民国大学分为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只有国立大学的校长是政府任命，其余都是校董选择。

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

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

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

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作一个官员来做。中华民国大学里的校长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不受迫害。

我们先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怎么爱护学生的。

学生被捕，校长力保，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到竺可桢、傅斯年、张寿镛等，过去凡做过大学校长的，在保护学生方面，大体都是一样的。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他们对学生总是保护第一，开导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有一次北平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管事的人是清华毕业的，对梅贻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力主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

蒋梦麟先生也是这样。"一二．九"学潮后，北大开除了一些学生。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收到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许多人就是靠这笔钱后来出国留学的。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怎么爱护教授的。

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不是一路人。但在教授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国民党政府无奈，才把叁位教授释放。这在当时是大学校长的起码素质。

张芝联教授在上海光华教书时，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一九四八年叁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

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衎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要说思想倾向，张芝联和朱经农也是不同的，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不妨碍校长去保护他手下的教授。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学教授们是怎样对抗党派对大学的干预的。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先生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

王瑶先生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 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 1943 年 5 月 9 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张奚若先生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 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先生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张奚若先生真幸福！他要蒋先生下野滚蛋都没什鸟事，继续幸福地做他的教授。

而我只是上书胡锦涛主席探讨了一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模式，就被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吊销了教授职称，而且还不给吊销我教授职称的书面材料。

这是什么鸟世道啊？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39：国家绝不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应该是人民的管理工具

1949 年，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取得政权。之后的 59 年，中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长期以来，我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采取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提倡人民民主，而反对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

因为任何单方面的专政，诸如某阶级、某党、某利益集团的单一统治，都是独裁。

当国家这一本该是本国全社会共同拥有并行使权利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必定依然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对象。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操作平台。如果人民不能亲自对国家公仆进行选择，那就一定不是民主国家。

所有国家类型中，只有两种，一是专制国家，一是民主国家。据此，执政，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为己，一是为民。为己执政的，那是专制统治。为民执政的，是民主制度。

当然，也有专制集权打出“执政为民”的口号的，但是很快就被人民发现其实是用华美的衣裳包裹着一颗肮脏的心。

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真正实现“执政为民”。

因为，民主制度的多党竞选，其实就是人民在选一个可以在现阶段代表大多数民意的政党。这样选出来的执政党，必然“执政为民”，而且也必须“执政为民”，因为，人民的选票决定了这个执政党是否还能继续执政下去。为了监督执政党对人民的服务，人民还用手里的选票，票决出了宪法。于是，一切政策都必须在这个宪法之下，这就叫宪政。

宪政即“限政”，人民指定的宪法，必须能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那么，人民如何通过宪法来对政府进行“限政”呢？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国达成民主宪政，必须籍由以下三方面的津梁：

第一、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将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确定为无效并予以排除，最终使宪法的规定能够在法律法规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贯彻。从中国 59 年来的问题看，中国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个违宪审查制度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

第二、推进宪法的司法化和司法的独立化。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和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这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普通法律法规未对宪法有关规定具体化或者普通法律法规违宪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若遭侵害将无法通过法院得到救济。司法的独立化是指司法工作不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控制。

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遭到中国共产党的迫害，人民却无处申冤。英国有句谚语是，“无救济即无权利”。用这句话描绘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第三，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这就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核心是要确立程序本位观念，赋予程序以独立的价值。这对人权的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主要针对政府，用以排除政府随意剥夺、恣意侵犯人权的行为。你要剥夺我的自由或财产权，必须依据事先确定的、公正的法律程序。只要你的程序不合法，你的行为就会被宣布无效；而不管你自我辩护的所谓的动机是多么“高尚”，所谓的目的是多么“合理”！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未经审判、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的罪恶制度。从 50 年代实施以来，这一罪恶的制度已经让千百万中国人民丧失了自由、甚至生命！

天理昭昭，罪恶必罚！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40：马化腾先生，请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年后，我一直在为中国广大经租放房维权群体和中国建设银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写维权书和公开信，期间还与美国 yahoo 公司在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打人权官司，案件编号是 C08－01068（2 月 22 日正式受理）。

现在美国 google 公司、美国 yahoo 公司甚至北京百度（baidu）公司，都向我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屈服。就在我开心之余，无数网友却给我消息说我的腾讯 QQ 空间被您封了。

其实，我对 qq 的封锁功能早有耳闻，所以我的主要网络聊天工具是 skype。但是，考虑到中国大陆有不少因为喜欢 qq 游戏而使用 qq 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所以，从传播民主思想的角度，我还继续使用 qq。所以，很久以前，我在 qq 空间里放了大约 20 篇不到的《民主先声》。

考虑到安全性以及与国外朋友联系的便捷性方面的问题，我使用 skype 要比使用 qq 多得多。要不是网友们对我提及我的 qq 空间被封，我都不记得在遥远的古代我还曾有过 qq 空间。

截止今天，我的《民主先声》已经写到第 140 篇了，也就是给您写的这一篇。

今天（2008 年 2 月 28 日），我一登陆 qq 空间，果然跳出了一行字：“您要访问的这个 qq 空间因为涉及使用和传播恶意代码或不良信息，被网友举报严重扰乱他人空间的使用，现已被禁止访问！”

看到这个东西，我忍俊不禁。马先生，你真是太搞笑了。

当然，我有渠道报告说你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压力根本就不是你我不作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借口。

你是广东人，广东人会做生意在中国是出了名的，但是再会做生意也不能这样做生意呀。

好在让我感到很温馨的是我效力的中国新民党的第一个国内党部就是广东党部，这让我觉得广东人的革命精神还是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的。

我在想，如果马先生要是能继承和发扬广东人的伟大革命精神就好了！

好，我先请教你两个问题：

一，我传播的民主先声您真的确定为是“恶意代码或不良信息”吗？这是您的定义，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定义？

二、现在是网友向我举报你封掉了我的 qq 空间，怎么变成了我的 qq 空间“被网友举报严重扰乱他人空间的使用”。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在别人的空间里发表什么任何民主先声。您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算了，估计你也不敢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你怕中国共产党！

和你聊聊家常吧！

你 1971 年 10 月出生于广东汕朝阳。当时朝阳是县治，现在已经是汕头的潮阳区了。1989 年 9 月，你考入深圳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读书。89 年的六四，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是一次世纪洗礼。凡是经历过的人，无不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些人至今坚持民主思想，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捍卫、丰富民主思想，如我；另一些人放弃了民主思想，进入中国共产党，例如威胁你封我 qq 空间的中共特务。你是在 89 年 9 月入学的，当我们在街头经历日晒夜露、枪林弹雨、履带轰鸣的时候，您还在高中准备高考呢。我不知道你对民主的渴望是否有我们这些六四学生这么炙烈。但是，有一点我知道，那就是我们中有女朋友、男朋友死在北京，而您一定没有。

您 93 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先在润迅公司服务，98 年您创办腾讯公司，出任 ceo。你让以色列人的 icq，汉化为中国的 qq。当然，刚开始，腾讯的日子非常艰难，好些时候，qq 是近似用一种卑鄙的手段去偷人家的空间和带宽，没有钱来买服务器。 最后，风险投资公司帮助腾讯在香港上市了，qq 当时是没有现金资本的，如果一定要讲资本的话，那就是象我这样 qq 用户在帮您。

当时，我和我的朋友们作为你的 qq 用户，全力支持你，而现在，我们这些老 qq 用户通过 qq 传播我们至死不渝的民主思想，您怎么就不支持我们了呢？

您以前曾经自豪地说：“在网上我才会获得完全的兴奋。”那么，你兴奋地挣到钱之后，怎么不让我们兴奋地争取民主了呢？

你曾经在网络上认识了后来网易的丁磊先生，约了出来喝酒。你后来回忆到：“当年一起喝啤酒的时候，我们只是打工仔而已，都还不知道未来。”

那么，请问，您现在知道中国未来会是继续一党专制，还是实现多党民主呢？

当年你不知道象你这样的打工仔也会成为 qq 的 CEO，那么，现在你怎么能知道我未来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呢？

你自己也说：“丁磊后来的成功为我带来了启发，只要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是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好，现在我要和你谈正事儿了。

你封掉我的 qq 空间是接到中共特务的口头通知还是书面通知？当然我排除是你自个儿做出这样的傻比决定的。因为，我想你还不至于与中国的民主事业为敌！

你可以提供你封我 qq 空间的法律依据吗？我想，如果你敢于提供的话，这样你本人就可以解脱罪责了。

过去，我们在 qq 上互通信息，你也算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做了不少的贡献，但是现在你做的这个事情就完全伤害了你 qq 的商业形象，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成了中共独裁、信息封锁的帮凶了。

你我都不是年少无知的年龄了，你 38 岁，我 41 岁了。建设民主中国，你我正当年！

我无意掀起中国网民抵制 qq 的浪潮，毕竟你设计 qq 不是为了传播民主思想，而是为了挣钱。另外，我也抵制不了，因为，喜欢 qq 游戏的年轻人还根本不懂什么叫民主，他们也根本不懂他们即将面临的独裁专制统治下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不如死和度日如年。

但是，我想我抽空喊上几个朋友，专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写一款即时聊天工具 cndp 软件也不是很难的事情。cndp 是中国新民党（China new democracy party）英文缩写。以后，我想，喜欢玩游戏或喜欢看“艳照门”的人上 qq，想争取民主、热爱民主的人上 cndp。这样，就不用麻烦你封民主人士的 qq 号、 qq 群和 qq 空间了。

现在美国 google 公司、北京百度（baidu）公司都已经解封了我的姓名搜索，也请你尽快解除对我的 qq 空间的封锁。谢谢

人生短暂，可以“声名传于后”的人不多，而精神永存的人更少。“商女也知亡国恨”，何况马先生这样的大民族商人呢？

你我都注定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会留下怎样的一笔，完全取决于我们今生的在世操作。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41：福建沿海各地人民联合起来驱逐 PX，扩大“我反对”运动成果

2007 年 6 月，厦门人民集体散步，在一片“我反对”的呐喊声中，厦门 PX 寿终正寝了。

但是，中共政府本性不改。福建省召开了省委所有常委参加的专项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决定迁建厦门 PX 项目，预选地将设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同时，厦门市委、市政府当晚同翔鹭集团高层初步达成迁建意向，并承诺中共政府赔偿翔鹭集团一切经济损失。

这场斗争中，中共厦门政府失掉的不仅是 PX，他们还失掉了民心！而厦门人民获得的也不只是碧海蓝天，还获得了空前的人民大团结。

这是一场民意的胜利，这是厦门人民的胜利。甚至，中国最著名的一张报纸《南方周末》还把“厦门人”这三个字遴选为 2007 年最有影响力人物的候选人名单里。

但是，事情远没有完。我在《民主先声》第 91 篇《“中国化学化趋势”下中国人民对中国专制集权统治的反抗》里，预测了漳州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PX 一定也会在漳州遭遇人民的迎头痛击。

果然，今天（2008 年 3 月 2 日）中午，电话声把我从恬美的午觉中吵醒，这是中国著名的民运律师唐荆陵先生。他因为发起“赎回选票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不参与一切非人民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而遭到中共警察的骚扰。

唐荆陵先生告诉我：“收到福建东山友人消息，今天福建东山人民为厦门PX迁建漳州一事，到政府散步陈情，人数可观。具体人数还在统计之中，是否上万，还在等待进一步核实。”

我立即到我电子地图上查到了东山县的位置。东山离福建省常委选中的漳浦县古雷镇只有 2-3 公里。如果厦门 PX 迁至古雷，对东山海产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

福建省东山县（岛） 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位于汕头和厦门之间，全县由 33 个岛屿组成，总面积 194 平方公里。主岛海岸弯曲，总长 141 公里，状若翩翩彩蝶，亦称“蝶岛”。全县设置六镇一乡，人口 20 万。岛上绿树成阴，绿化率达 93.2%，素有“东海绿洲”之称。

东山县（岛）为福建省最大的海洋水产品集散地。这里海产资源十分丰富，分别有笼捕、拖网、灯光、钩钓、定置网、流刺网等多种作业方式和大面积发达的养殖业。这里盛产各种螃蟹类（三点蟹、黑蟹、扁蟹等），鱼类（鱿鱼、墨鱼、章鱼等多种软体类，竹荚鱼、带鱼等各种中上层鱼类），虾类（花虾、沙虾）等。东山海域为闽南渔场的中心，盛产马鲛、带鱼、黄花鱼等四百多种鱼类，名贵珍品龙虾、鲍鱼、石斑鱼等名闻遐迩。

福建东山人民世代以海为生，环境污染将使人民生活难以为继。

伟大、勇敢的东山人民的抵制 PX 行动是完全正义的。在民主制国家里，人民可以用手里的选票反对政府的决定，最可怜的是生活在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这些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专制集团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如此众多的有毒的化学工业。

没有民主监督的专制集权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只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中国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而专制集权集团却无须担 心中国人民投中国政府的反对票，因为中国人民手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

即将召开的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实就是专制集权者“钦定”了一些拥护专制集权的所谓的“选民”欺骗中国人民的把戏而已。

但是智慧、勇敢的福建沿海人民，依然不畏强暴，走上街头，发出“我反对”的呐喊。

“我反对”，这三个字，不只是厦门人民的心声，不只是东山人民的心声，这也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心声。现在，这更是历史对中国人民的召唤！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42：郭泉胡温公开信谈“两会”、“奥运”和“建行 11 万买断工龄职工”

贵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十七大之后，我先后多次致信两位领袖恳请两位领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内切实解决两类问题，一个是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的苦难问题，另一个是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问题。

长期以来，我所关注并在法律、道义方面帮助解决的中国人民的苦难问题有“中石油中石化 59 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问题”、“中国工商银行 13.8 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问题”、“370 万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问题”、“4000

万经租房业主及其后代的维权问题”、“中国建设银行 11 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问题”，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民疾苦问题，容我以后再表。

多年来，我充分思考了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些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参政议政的政党模式下，是根本无法得到解决的。

1992 年至 1994 年，我在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担任办公室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社编辑的同时，我考察了国企改制、科教文改制、医改、金融改制、社管改制等等实际改革事业，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果这些改革在十年、二十年后，人民富裕安康，社会公平公正，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成功的。如果，十年、二十年后，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那么就可以断定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

1994 年，我离开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工作。1999 年，我离开法院，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2000 年，我去云南参加中国博士后“西部论坛”的研讨工作。2001 年，留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虽然，我是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但是我在硕士阶段是社会学专业，1996 年被授予法学硕士学位。所以，长期以来我的学术的出发点和归宿，一直都是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法律是我帮助人民的武器。

2001 年，我做完博士后研究以后，重返社会进行各类调查，发现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严重。从 02 年起，我开始帮助苦难人群，没想到这种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苦难行业、贫困人群越来越多。

现在，我断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了。

下面我想就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向两位领袖作一个简短的汇报：

一、全国的维权访民为什么会选择两会和奥运期间进京上访

二、中国建设银行一次性买断 11 余万职工工龄是违法行为

三、中国建设银行在“一次性买断工龄”中的罪恶行径

四、中国建设银行 11 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们的苦难

五、中国的法律机构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禁止建行职工依法起诉

一、全国的维权访民为什么会选择两会和奥运期间进京上访

每天，无数等待我帮助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军转干部、经租房业主，拿着他们的诉状冤屈地对我说，“郭教授，您说根据法律我们可以起诉，但是你看，法院根本不受理！”

看着他们手里的一份份“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书”，我不禁仰天长叹！

五年来，我常哀叹中国法律根本无法帮助我正在帮助的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法律之间，有一条鸿沟，那就是蔑视人民疾苦的政策。这让我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吗？这就是先辈们浴血奋战换来的中国吗？

这就是我爷爷、我外公、我家多人为民捐躯、为国捐躯、为党捐躯，换来的中国吗？

年前，一个河南省工商银行的买断工龄姐妹带着孩子来南京看我，她的女儿和我儿子同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我请她们在我家楼下的“口外羊”吃火锅。她女儿对我儿子说：“小哥哥，我们家几个星期都没吃肉了。”孩子的妈妈眼里盈着泪、一脸的难堪，然后，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对女儿说：“少吃肉减肥呀，小哥哥的爸爸会帮我们讨个公道的，我们明年就有肉吃了。”

那天我真的一口饭都吃不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脸说是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

那么，到底这个社会让谁优越了？我环顾四周，汽车洋房、夜夜笙歌、煮肉蒸馍、鞭炮焰火，而我长期服务的维权群体，缺衣少食、满面愁容、水深火热、怨声载道。

同样是人，生活在同样的天空下，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

这样的贫富悬殊、这样的两级分化，一切的愤怒和抗争都是完全有理的！

在帮助穷苦人民的过程中，面对两个阶级的激烈冲突，想到我家族里许多为人民打天下而捐躯的先辈，我只能说：中国共产党，你们变质了！你们早已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再也不是那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了，你们现在完全沦为了特权阶级的代言人了。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用这首诗来描述我服务的苦难人民的心情是再准确

不过的了。

蒋经国先生去世前几天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执政党千万不要对不起工农！"。中国国民党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到了 21 世纪却还在时刻发生这样大量虐民的恶性事件。

欧美劳工，在民主体制下，虽仍为弱势群体，但却拥有最多的选票，因此当政者不得不忌惮，在涉及民众利益的决策方面必须与民众商讨，力求达成共识。

最可怜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独裁体制下，我们没有选票，没有说话的地方，没有可以争取到权利的独立司法机关。政府、乃至法律机构，都被专制特权利益者抢夺操纵。

21 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状态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建设银行于 2003 年以来实行减员增效的非法改制，一次性非法裁员达 11 万之众。非法买断职工工龄，非法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导致 11 万建行职工和数十万家属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人神共愤！

在汇报这个特大虐民事件之前，我想先谈谈 08 年的两个大事，一是本月召开的两会，一是将于八月举办的"奥运"。

关于两会，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两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作用到底可能会有多大：

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孙文广教授参加区人大代表竞选的遭遇。

孙文广先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民主人士，已经 73 岁了，但是一直重于以行动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2007 年 11 月，孙先生打破了山东大学的死气沉沉的"选举"气氛。他用行动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圈这种现状的进行了宣战、示威和反抗。

孙先生说："如果说农村基层都可以实行乡、镇、县级人大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的话，那么，山东大学这样一个国家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的重点大学就更能实行基层人大民主的直接选举。山东大学，一所号称百年历史、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集各类大学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共 3 万优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国家级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就更应当够条件实行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然而，在这样的大学，人的文化素质之高，现代人文精神之强，山大仍然要强行禁止民主选举制度在这里通行。这怎么能行？"

于是，孙先生开始了他的选举之路。他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孙先生在学校贴了许多选举海报，但是孙先生白天贴出晚上就被共产党撕掉。孙先生就反复贴，共产党就反复撕。孙先生还在山东大学新校区食堂摆展板，发表竞选演讲，散发竞选资料。中国共产党十分恐慌，每日深夜撕下孙先生的竞选海报，还明令不许山东大学学生阅读孙文广教授的竞选传单，不许听孙文广教授的竞选演讲。最可耻和罪恶的是，共产党还在学生投票时，不许大学生投孙文广的票，激起了山东大学师生的愤慨。

共产党还派出便衣特务阻止孙教授在校园内发表竞选演讲，被山东大学师生呵斥得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最后，由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原因，孙教授落选了。

看了孙教授的竞选遭遇，我有理由怀疑那些被钦定当选的人大代表是否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奋力抗争。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本家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的故事。

2008 年 2 月 17 日，在广州政协小组讨论中，一位委员在介绍了今年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之后，郭锡龄先生说："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郭锡龄紧接着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并说道，"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不料，2 天之后（19 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大谈"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疏运工作如何出色，并针对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感到惊讶，难以理解"，最后，王勇平还拿出中共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的话来给郭锡龄先生定性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议政"。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对铁道部的批评完全属于共产党钦定的"议政"行为，却遭到如此不堪的批判，我也有理由怀疑政协会议上政协代表是否有权利为人民的利益多说几句话呢？

我本以为，今年的一号提案是民生问题，不料，今天看到《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已经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一号提案"，不禁唏嘘不已。这个政协一号提案完全是为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服务的。该提案认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

但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安置问题才应该是永远的"一号提案"。

我很难指望这样的两会会为人民幸福做出什么实际的工作出来。

虽然，两会代表为人民的利益抗争的可能性无法乐观，但是全国各地的维权访民并不知情。数以千万计的维权访民，都渴望能把自己的冤情、委屈递交给两会代表。于是他们一次次地进京，一次次地被遣送回来。但是他们依旧认为他们的情况一定能通过进京上访得到解决。事实上，如果我帮助维权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愿意解决的话，我相信两位领袖一定早已解决了，根本不会让人民走到"上访"这个非法制时代才有的最后的法律救济程序。

现在，之所以他们永不放弃地走在上访之路上，其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第二、地方政府和法院不公正处理和审理他们的要求。

于是，他们只能到北京。他们宁愿被北京的警察殴打，他们也要上访。

法制时代了，应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不依法受理他们的案件，那么他们一次次进京，并以"两会"和"奥运"相威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中国人民天性温柔、老实厚道、忍辱负重、热爱和平，只要两位领袖能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苦难，谁愿意辛苦地上访呢？ 在温暖的家里，通过电视看"两会"、看"奥运"这多好啊！

胡主席、家宝总理，上访、访民、维权，这些词汇应该从 21 世纪的政治、社会、法学话语里彻底消失。

让 21 世纪的中国人民安居乐业，让中国人民所有的苦难都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公正的审理和裁判。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的历史职责。

在此，我恳请两位领袖能借"两会"、"奥运"的绝好时机，反思改革失误、主动还权于民，努力推进民主，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

惟有如此，人民才能使用手里的选票决定自己的命运，否则，中国人民永远任人宰割。

"两会"、"奥运"是国家最重视的两个大事情，其实维权访民的生活之事比这两件大事情还要重要"五倍"。所以，广大维权访民想通过这两个大事件，让胡主席和家宝总理重视本该更重视的人民生活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如果胡主席和家宝总理解决了这个比"奥运"重要"五倍"的人民生活问题，人民就不会到北京去关注"两会"、"奥运"，最多也就是在家看看电视品头论足一番了。

另外，中国的访民喜欢进京上访，我认为是他们爱戴胡主席和家宝总理的表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在城市和省份的共产党是坏的，而你们是好的。所以他们才会想到要找你们。如果中国人民认为你们也是坏人的话，中国人民才不想到北京去找你们呢。他们就会直接到南京来找我了。所以，我认为胡主席和家宝总理应该高兴。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人这样做的道理就是认为皇帝是好的，皇帝会主持公道的。现在，胡主席和家宝总理就是好皇帝，应该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只有把人民的问题解决好了，人民才不会沦落为维权访民。

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里，"两会"只是个政治娱乐节目，而"奥运"是体育娱乐节目，谁会拿这两个娱乐节目说事呢？

然而，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出现一方面是人民要在"两会"、"奥运"期间进京维权，另一方面是警察对人民的上访围追堵截。

禹治水用"疏"，鲧治水用"堵"，其治水结果连我儿子都知道！

二、中国建设银行一次性买断 11 余万职工工龄是违法行为

中国建设银行于 2003 年以来实行减员增效的改制，一次性非法裁员达 11 万职工。

几年来，大量建行职工流落街头、生活艰难；无处伸冤，告状无门。这样残酷的虐民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们向各级政府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得到的答复是不受理！

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得到的答复是，根据上级精神，法院不得受理有关企业改制的案件。

他们回过头来再回建行苦苦哀求，泪水洒落在建行的门前还没有干，建行就喊来公安警察，把这些手无寸铁、饥肠饿肚的兄弟姐妹，抓关打骂，惨不忍睹!

现在，11 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一部分还在坚持维权，一部分早已含冤入土了。

四川茂县的王国林跳楼自杀了；

河北保定的张兰香也跳楼自杀了；

陕西西安的李强上吊自杀了；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民族兄弟门肾革也上吊自杀了；

湖南株洲的军嫂陈平就在株洲市分行金融大厦七楼上吊，再摔到楼下，死得好惨！…………

没自杀的职工，年龄大了，身体也累垮了，找活干更难了，领到的那点补偿费也早花光了。现在所有的“断友”都已经负债累累。

患病、负债、离婚、绝望、疯癫、自杀……更悲惨的命运正在向他们逼近。

一些职工常年拖着生病、饥饿的身体，四处上访，被打、被关，但是，他们继续走在艰难无望的维权道路上。

中国建设银行非法买断职工工龄，非法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完全是违法行为。

1、1999 年劳社部颁发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买断工龄’或为职工提前办理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2003 年建行就是以“买断工龄”的形式终止了 11 万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把 11 万职工推向社会。

2、《劳动法》第二十七条及劳部发《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只能是“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显然，建行既不是濒临破产，也不是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而且是在不断发展盈利的金融企业，不属于法定的裁员企业。

3、国家人事部早在 1998 年 7 月 23 日就已经颁发人发[1998]53 号文件《人事部关于禁止赎买工龄和违反规定办理提前退休等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最近，发现少数地方为精简人员，自行制定政策，对机关干部采取工龄赎买方法，按工龄长短给予不同的经济补助，实行所谓‘一次性买断’，个别地方和单位赎买‘工龄’，对某一职务的工作年限进行经济补偿，这些做法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干部人事工作的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损害了国家公务员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纠正”。由此可见，“买断工龄”是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建行自定政策与职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依法均属无效合同。

4、建行买断职工工龄各种方案程序违法。建行出台所谓的“有偿解除”、“协议补偿”、“自谋职业”的暂行办法，其实质是对 11 万职工强行“买断工龄”，不通过职代会讨论和表决通过“买断”方案，把本应属于平等民事主体双方的劳动关系视为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将劳动者视为下属、被管理者、被支配者而剥夺法律所赋予劳动者的民事权利。极大地侵害了劳动者作为民事主体的权益。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些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方能实施。

5、国务院《关于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职工安置的条款，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破产职工的安置，是严格控制适用的规定，其他非破产企业改制不能适用。因为一次性买断工龄或一次性支付安置费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剥夺了职工因工龄产生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利益，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是不合法的。

上述事实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说明，建行大量买断职工工龄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中国建设银行在“一次性买断工龄”中的罪恶行径

2003 年，中国建设银行采用欺诈、威胁、强制和巨额减员奖励等非法手段疯狂裁员十一万职工。

1、建设银行总行文件明确规定将减员计划作为指令性计划下达，并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经济制裁措施。例如：建行江西省分行 2003 年 9 月 16 日转发总行关于印发建行总行(2003)192 号文《中国建设银行县(市)级及以下地区机构调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明确强调：“省分行在调整撤并县支行下辖分支机构和精简机关人员的基础上，测算各分行减员计划，并将减员计划作为指令性计划下达。”“200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工龄每满一年发给 3500 元安置费，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就只发给 2500 元安置费；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办理的，就只发 1500 元安置费。”

2、各省行首先通过“定职责、定岗位、定编制”，确定了撤并机构和裁员的总体方案。如建行河北省分行文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完成核定的减员计划”。如建行唐山市分行强调：“坚定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信心，主动加压，加大机构调整和减员工作的力度”。实行层层下达减员指标、定死任务，并对建行“减员增效”改制的管理层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以加大裁员力度。

3、各省行在裁员前作宣传动员时，采用诱骗和误导宣传，剥夺了职工的知情权。建行文件这样告诉职工：上级将要连续三年裁员。减员补偿标准的执行上，采取“首年优惠，逐年递减的原则”。例如：建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

文件建冀营发(2003)72 号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 2003 年度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及经济补偿实施细则》的通知。

4、建行所谓减员增效的大裁员是由建总统一部署的。建总行文件下达的是“指令性计划，人员总量计划纳入综合经营计划，由总行统一考核”。超高压性质的指令性计划并且与绩效管理挂钩，导致二级行严重扭曲操作使事态向严重违法违规的局面发展，而且造成严重后果。各省行为了完成裁员计划，制定了苛刻的竞争上岗和待岗条件，对职工施加压力，致使一些奉献了青春年华，为建行的发展和壮大做出重大贡献的职工，被逼无奈而“买断工龄”。

5、建行“买断工龄”决非职工自愿，而是采用行政命令强行“买断工龄”。如建行沈阳城内支行通知职工到建行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明文规定，“逾期不到单位办理的，后果由本人自负”。而且该“通知”时间是 2004 年 9 月 30 日，强迫职工写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是在其后的 2004 年 11 月 1 日。沈阳城内支行职工梅显靖“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

建行内蒙古兴安盟分行 64 名被买断工龄职工于 2006 年 10 月 30 日向建行总行递送了《还我公正，我要上班》的上访材料，反映买断工龄决非职工自愿，只要领导决定要你走，就算你不想走，并且考试合格，群众评议也合格，你也上不了岗，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最终过不了领导考评这一关，其实质是所谓考试和群众考评只是形式，而撤并机构大量裁员都是按指令性计划执行，所谓自愿、民主、公开、公平、公正都是强制、欺骗的外衣和遮丑布。

6、更有公然伪造“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伪造职工签名的行为。现已发现建行湖南省分行长沙市河西支行伪造了一份被买断工龄职工文永霞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2006 年 8 月 23 日，经支行人力资源部有关人员从湖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调出的文永霞档案中，文本人发现了这份由建行伪造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并证实自己从没有写过类似申请，更没有在该申请上签名。该申请书上“文永霞”签名系他人伪造。

7、通过抓阄和投票选举等方式买断工龄下岗的，如建行陕西省分行职工张宏、孙艳枫证实他们所在建行先“三定”，后强迫职工采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被裁减职工，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就是建行的强盗逻辑。

8、对一些罹患重病的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如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保定建行女职工曹丽娟，1981 年参加工作，曾多次在全国建行技术比赛中名列前茅，1992 年 12 月被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曹丽娟将全部精力和青春年华献给建行，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患上了腰椎尖盘突出症、胃溃疡、胃下垂、美尼尔氏综合症等多种疾病。然而，就在曹丽娟患病治疗期间，2003 年 11 月建行将积劳成疾的曹丽娟同志买断工龄，赶出建行。

9、将正在休产假，哺乳期的女职工强行逼迫其买断工龄。公然违反我国《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建行湖南省分行长沙市华兴支行女职工王星英，2004 年 5 月 28 日生育小孩后正在家休产假及哺乳期间，华兴支行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强行解除与王星英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且长达 8 年不依法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拖欠其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偿费、工资、奖金，独生子女补偿费不支付。王星英的工龄已超过 10 年以上，华兴支行不依法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反而在王星英休产假，哺乳期间违法将其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10、将因公负伤的职工强行逼迫其买断工龄。如建行江西赣州分行南康市支行职工唐美荣 2002 年 4 月 18 日 15 时许随运钞车押远时摔伤致残，南康市劳动人事局将其定为公伤。经赣州市劳动鉴察委员会鉴定为陆级伤残。2003 年 9 月 15 日经赣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赣州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认定为肢体残疾，残疾等级为肆级，并发给残疾人证。然而，因公致残的唐美荣也逃脱不了被逼迫买断工龄的命运，照样被建行赶出了建行的大门。这又是建行严重违反我国《劳动法》的铁证。

11、建行“买断工龄”在实际操作中已将其作为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工具。一大批在建行有突出贡献和业绩的人员，只是因为他们成为了一些无德无才领导的竞争对象和眼中钉，这些领导就采用各种手段，将一大批优秀的骨干“买断工龄”，赶出建行。 如建行江西赣州市分行科技处职工黄端林，不愿买断工龄，2002 年底参加竞聘上岗“择优录取”考试综合成绩为本处第 2 名。但受到赣州市分行的打击报复，将其党委领导考评分只给 30 分(满分为 100 分)致使黄端林被迫买断工龄。

又如建行湖南娄底支行职工罗斌文，1978 年入伍，正营职军转干部，1995 年 9 月转业安排到建行工作。曾于 1981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火线入党，1984 年评选为广州军区优秀干部，即便在 1985 年全军裁员 100 万时，罗斌文所在部队被撤销，他仍作为战斗骨干留任部队，并多次立功受奖。转业到建行年年被评为省、市系统先进个人和优秀党员。尽管其在部队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及长期积劳成疾，但在建行岗位竞聘中，罗斌文的考试分、演讲分、群众评议分等多项综合评分均高于同岗竞聘者。由于建行领导的打击报复，竟然采用带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到场，当场宣

布：如果在 2004 年元月不办理“买断”手续，就一点“买断”费也不给，强迫其买断工龄。

如建行湖南蓝山县支行职工周和平，1988 年分配到建行工作，1989 年起一直担任中层干部，先后担任所长、股长、办公室主任，多次被评为市(县)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及技术能手。2000 年为永州分行智囊团成员。然而，建行某些领导为了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在考评时将他打出最低分，于 2004 年 12 月被逼迫买断工龄。周和平在其被迫书写的申请书中写下：“因受打击报复才申请解除合同关系”。这份申请书也就成为建行所谓职工自愿买断工龄真相铁证。

建行安徽阜阳分行职工吕士武，1992 年在建行安徽省分行招考金融干部时，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被聘调安徽阜阳分行任分理处主任等职。1996 年在分行系统第一个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及安徽则经大学本利毕业文凭，取得学士学位。2003 年安徽省分行试行会计主管委派制，吕士武报考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被委派到颍东支行任支行会计主管，将原会计核算差错率 4.9%0 降到 2%。，差错率降幅达 60%!然而，如此优秀的业务骨干，建行领导还是要铁定为裁员对象。

12、建总行对各省分行实行“减员不减工资总额”是建行刮起“买断工龄”风暴的重要因素。由于建总行规定各分行领导的工资报酬与本行职工平均工资挂钩，职工人员越少，工资总额不变，领导个人的收入就越高。从而促使建行这些领导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强行非法大量买断职工工龄。

13、建行将减员减机构计入效益贡献同绩效挂钩，是建行疯狂血腥大裁员的驱动力。

建行为了达到一次性裁员 11 万职工的目的，各分行以机密文件规定，将裁减职工，与效益贡献同等业绩挂上钩。如《中国建设银行唐山分行关于机构调整和减员工作实施方案(机密)》文件的第六部分“机构调整和减员工作的组织实施及要求”规定：“减员减机构计入效益贡献同绩效挂钩：(2)．减员：按减 1 个中长期合同工 6000 元、减 1 个短期合同工 2000 元，计入经营绩效，挂钩工资。机构撤并：按撤并 1 个分理处奖 8 万元、减一个储蓄所奖 5 万计入经营绩效、挂钩工资。(3)．机构撤并安排专项奖励费用，按撤并一个分理处奖励一万元、一个储蓄所奖 8000 元执行。将机构撤并和减员工作纳入经营管理者目标责任管理，根据下达的机构撤并和减员计划，调整年度目标责任书，纳入机构撤并和减员目标责任，并与经营管理者的目标责任奖直接挂钩；每减一个中长期合同工，奖励领导班子 3000 元，按市分行下达的减员计划，每少完成一个减员计划，扣减领导班子目标责任奖工资 1500 元。在等级行评定实施意见中，进一步加大经营集约在指标的考核权重。对完不成机构撤并和减员计划的行处，按一定比例延期兑现或扣减绩效工资；同时对未完成减员计划人数按全行人均工资额相应扣减该行处下一年工资总额”。

建行上述机密文件的规定充分证实了建行的管理者为了确保和增加本分支行处的绩效工资总量和领导班子成员本人的绩效工资、目标责任奖工资，及机构撤并专项奖励等经济利益，就疯狂进行血腥的大裁员。

根据 2005 年 12 月 26 日的《建设银行报》发表的《内部改革报告》统计，建行一次性撤并机构 7025 个，裁减职工 11 万人，再根据上述减员绩效工资，减员责任奖工资及专项奖励等推算，建行的管理者及各分支行处就可以获取巨额的奖金和工资。而且等级行还要进一步加大考核奖励。而且各项减员和撤并机构奖励，对建行管理者是多项重复奖励。更加加剧了建行管理者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实施不择手段的疯狂大裁员，其结果是建行管理者口袋的钱装满了，ll 万职工失业贫困了。更有被逼走上绝路，用鲜血和生命见证了建行充满血腥的大裁员事件。

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分行(人力资源部)建邯人(2003)42 号《关于邯郸分行解除劳动关系(合同)人员经济补偿政策的报告》称：“我行依据省分行政策措施，决定为加大对各支行减员工作的激励约束力度，除将省分行奖励的绩效工资全部兑现给各支行外，二级分行再拿出一块绩效费用，加大对支行减员工作的激励。具体政策支持和激励约束措施为：(一)减员和人员总量控制计划纳入领导班子的年度责任目标；(二)减员计划纳入等级行考核，完成下达的减员、年末员工总量控制指令性计划的，给予该支行领导班子一定金额的奖励(证明减员指标是用人单位强行下达的，没有协商的余地，“多减多奖” 否则就要扣除该支行领导班子的奖励)；(三)加大政策支持与约束力度，二级分行对各支行减员实行绩效工资激励与约束，每减员一个正式工的，奖励绩效工资 2 万元(这就比唐山分行的减员奖励高出数倍!)该文件由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分行行长办公室于 2003 年 12 月 19 日审批印发。

14、建行大量裁减军队转业干部，严重违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的规定。

建行赣州市分行职工谢才发在给江西省分行领导的报告中反映，他出生于 1949 年 9 月，1969 年参加工作，1970 年参军入伍，1973 年入党，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长期驻守在祖国边防和海岛，多次受奖，1981 年 11 月由部队转业被政府安排在建行赣州市分行工作，先后分配在市分行机关人秘科、监察室，(曾任副主任)铁路支行(副行长)等部门工作，1992 年被中共赣州地区纪委评为“优秀纪检干部”，同年考取经济师资格，任分行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

其工龄为 33 年 4 个月。2002 年 12 月 28 日市分行以“减员增效”为由强行要求他与建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其按建行人事部统一要求填写“本人自愿与建行赣州市分行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字样并签名，否则，扣押补偿金不发。如此类似的还有龙厚柏、肖正基…”，等多名职工。仅赣州市分行 1986 年参加省行在庐山举办的军转干部培训班学习的 10 名军转干部，就有 9 人已被建行逼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显然违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发(2001)3 号文件《关于印发(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该通知第三条指出：“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人才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事业、军队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优待。”第二十九条规定：“军队转业干部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或者有固定期限劳动聘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违约解聘、辞退或者解除聘用合同”。

建行江西赣州市分行寻乌县支行职工刘联芳，1989 年从部队复员转业到该支行工作。2001 年 11 月他所在的寻乌县支行被撤销，只异地安排了十几个职工，还剩下十几个职工没有安排工作，至 2002 年 4 月 1 日起市分行宣布他们十几个人内部待岗，待岗时间三年。同时劝说他们十几个职工办理买断工龄手续，否则三年后自动与建行解除劳动合同。然而，他坚信这种强制性买断职工工龄是错误的，坚决不同意买断工龄。在他待岗的三年之中，建行没有通知他参加培训和岗位竞聘。到 2005 年 5 月 11 日，赣州市分行向他送达“关于解除刘联芳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随后建行又多次电话及派人来通知他去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手续，均被他拒绝。建行于 2006 年 7 月 26 日又送达一个通知：“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领取经济补偿的通知”。该通知称刘联芳工作年限为 20 年零 8 个月。每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 845 元，补偿金额为：20 年 8 个月 X845 元 / 月二 17463 元。要求在 60 天内办理手续，否则视为放弃，后果本人承担。即便在这样违法而强硬的逼迫下他还是拒绝办理买断工龄的手续。赣州市分行就向刘联芳承诺，只要他现在同意办理手续，建行就为他解决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并可增加补偿费，但要求他必须签上“自愿与建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字样，不签就不给补偿费，不办理他的养老保险、医保、住房公积金等。就这样，他坚持依法维权长达三年之久，在赣州市分行逼迫和欺骗下，于 2005 年 10 月被迫无奈办理了买断工龄手续。然而，至今也未见赣州市分行为刘联芳办理养老保险、医保、住房公积金等手续。事实充分揭露了建行买断职工工龄所谓是“职工自愿”的欺骗性和违法本质所在。揭露了建行违法大量强行裁减军队复转人员的事实。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建设银行与职工签定的“买断工龄”协议是根本违法、显失公平的协议，依法属无效合同。

四、中国建设银行 11 万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们的苦难

中国建设银行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大多年龄偏大，40 岁一 50 岁的职工占大多数。而且由于银行业务的特殊性，技能单一，适应面狭窄，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部分人无业可就，坐吃有限的补偿金。

随着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物价、养老、医保不断上涨，补偿金相应已不断缩水。绝大多数买断工龄职工已陷入困境，有些已陷入绝境，更有已走上了绝路的。

军队转业的职工和 40 岁一 50 岁等职工失业后，享受不到当地政府的优惠待遇，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承认和接收，这批失业人员多数是单就业家庭，现在被建行解除劳动关系后，致使家庭零就业、零收入。建行支付的补偿金，不足以支付社保、医保、家庭生活等基本开支。已使得很多家庭失去了和睦、失去了幸福，家庭没有生气、没有希望，离婚不计其数。种种困难还将不断袭来。

中国建设银行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已成为被社会遗弃的弱势群体。身体每况愈下，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很多人在绝望中已经陷入困境和绝境。

建行四川省达州市分行职工龚小华，中共党员，1988 年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建行，长期从事金库管理员、出纳员工作。2003 年 3 月被建行欺骗、强迫下岗后，妻子谭玲也下岗失业，儿子读高中，家里无经济收入造成妻子离婚，目前靠亲友经济帮助，由于龚小华长期从事金库出纳工作，长期接触钱币上的细菌和病毒，而患上严重的肝病，现无钱医治，病情日益加重，曾多次想自杀了此残生，只因儿子未成年。一家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建行四川省达州分行职工陈雄是在建行工作了 23 年的业务骨干，2003 年 3 月被欺骗买断工龄，因年龄偏大，找不到新的工作而长期失业，没有经济收入，造成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被建行给活活地拆散、毁掉了。

建行四川省达州分行职工王世江于 2003 年 3 月就被建行欺骗买断工龄，因无钱买医保，又因年纪大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只好干苦活、累活、危险活，不幸一场车祸将其左肋骨折断 5 根，胸椎粉碎性骨折，左下肢失去活动能力，腰部永远性损伤，功能丧失，经一年多抢救治疗用去医疗费 90000 多元，还要继续治疗，现负债一身，成了残

疾人，已处于生活的绝境。多次要求建行达州分行解决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均遭建行拒绝。

建行广东省云浮分行罗定市支行职工黄霞梅 1997 年毕业于广东省建设银行学校，同年 7 月被分配到该支行工作。2000 年结婚不到一年，丈夫患癌症已到晚期，为给丈夫治病，负债累累。2002 年 5 月丈夫终因抢救无效死亡，丧夫之痛未平，裁员风波又起，2003 年 11 月行长赖文锋一夜之间撤并所有网点、建行以其年轻下岗后容易找到工作为由，将黄霞梅逼迫下岗，使其经受沉重的打击，2006 年 4 月又患上严重的甲亢病至今长期服药，生活十分艰难。

建行江西省分行赣州市南康市支行谭口分理处职工王海伟，2002 年底因所在谭口分理处网点撤销，被逼迫、欺骗"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长期处于失的痛苦、彷徨、挣扎之中，一个多月后被医院诊断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个精明能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建行职工被折磨成一个精神病人，2003 年 2 月他又怨又恨，用油漆刷了建行南康支行的大门和自动提款机，南康支行要公安机关将神志不清的王海伟抓获，经审查是被建行逼疯的一个疯子，就将其释放。现王海伟一家人为了给他治病已经花光了他"买断工龄"的全部补偿费和家里所有的积蓄。年迈七十岁的老父亲背井离乡到广东打工，挣点血汗钱为儿治病。王海伟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从 2003 年元月已无钱缴纳。而且为了成全妹妹的婚事，母亲只好带儿子王海伟搬迁到另一处民房居住治病。

其中已经走上绝路，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兄弟姐妹们有：

王国林，建行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茂县分行职工，因所在县分行撤并被强迫其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他多次上访要求恢复工作未果，全家生活处于绝境，于 2005 年 6 月 9 日上午从 5 楼跳楼身亡。

周丁生，建行赣州市分行原保卫处职工买断工龄后，患病无钱医治，才 48 岁就英年早逝。

张兰香，建行河北省保定分行押运中心职工，买断工龄后于 2005 年 1 月跳楼身亡。

李强，建行陕西省西安高新开发区支行职工，买断工龄后于 2005 年 7 月上吊身亡。

门肾革，建行内蒙乌兰察布市分行职工，买断工龄后于 2004 年 8 月上吊身亡。

陈平，建行湖南株洲市城东支行职工 2004 年 5 月因在建行工作的丈夫王长刚(复转军人)面临下岗，而上吊在金融大厦株洲市分行七楼后摔到楼下身亡……。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揭露建行大规模买断职工工龄的黑幕和呼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与此同时，这批失业人员中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不知转到哪里去了，至今无法过组织生活。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也被建行剥夺了。

改革应该使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让人民失业，生活无保障，家庭破碎。

11 万建设银行的职工，把青春、才华奉献献给了建行，现在，他们青春不再，建行就无情地把他们抛弃!

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标榜自己"三个代表"，但是发生在建设银行 11 万职工身上的事情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五、中国的法律机构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禁止建行职工依法起诉

2006 年 4 月、6 月、9 月、12 月，2007 年元月、4 月…接连发生全国各分行职工更大规模的赴京上访维权行动。

11 万职工的代表先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劳动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等信访办上访，得到的一致答复是："由建设银行总行解决。"

于是，赴京上访职工一次又一次到总行上访，总行后来竟然拒绝接待，拒绝解决问题，上访职工只好在总行门前静座。然而，总行又伙同警察，强行将走投无路的上访职工驱散，特别是出动警察拘留上访职工。

建行为进一步掩盖其大量裁员的违法违规事实，继续欺上瞒下，于 2006 年 6 月 22 日以建总发[2006)185 号文件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将建行 11 万被裁减职工依法派出代表信访、上访的维权行为认定为"少数人串联、煽动离行人员和内退人员越级、赴京聚众滋事闹事。"企图欺骗公安机关出面来镇压维权职工代表。继续激化矛盾，扩大事态，以达到完全掩盖建行一系列违法事实的目的。

建行自 2003 年一次性非法裁减职工 11 万人，由此引发劳动争议。

全国各省市分支行被裁减职工先后与所在建行协商解决未果，又先后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和向所辖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

然而，受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均以"涉及企业改制"为由拒绝立案受理。

1、湖南省长沙市华兴支行一百余名被裁减职工，发觉自己上当受骗时就在 60 天之内一直依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希望通过协商、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湖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04

年 12 月 23 日以[2004]湘劳仲字第 074 号《不予受理申诉通知书》拒绝立案受理。

随后这一百余名职工又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该法院至今拒绝立案受理，也不依法送达《不予受理裁定书》。

现在，在依照正常法律途径的路一条条被阻死的情况下，湖南 5 千余名建行被"买断工龄"职工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誓死要讨一个公道。

2、建行江西省赣州市分行 326 名被裁减的职工一直依法维权。各级信访部门均要求上访职工走"一裁二审"的法律程序，326 名职工于 2006 年 7 月 13 日向江西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江西省劳动争议仲裁委于 2006 年 7 月 17 日以赣劳社仲不字(2006)第 7 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定"不符合受理条件"而决定不予受理，并告知可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326 名职工又依法于 2006 年 7 月 18 号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7 月 18 日、7 月 27 日两次收下民事起诉书，然而，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今没有受理立案，也不送达"不予受理裁定书"。

为此 326 名职工向赣州市人大、政法委、江西省人大、政法委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投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6 年 7 月 26 日、10 月 17 日二次出具信访转办介绍信，要求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可至今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立案，也没有任何答复。

3、建行张家口分行被非法买断工龄职工郭卫平等 5 人、马卫民等 4 人、乔民军等 5 人、田国良等 5 人、刘琳等 5 人，鲁焕霞等 5 人，王旭霞等 5 人、王海斌等 5 人分别向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建行张家口分行补交申请人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补发拖欠申请人的工资；请求裁决建行与申请人所签欺骗性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无效。

然而，张家口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未作审查，就于收到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的当天就分别以张劳仲不字(2006)第 158 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共计六份，认定共计 39 名建行非法买断工龄的职工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为此，其中 36 名被裁员职工又依法向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事项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一致)。然而，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以(2006)东立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起诉人的请求不符合法院受理范围，其诉讼请求是企业改制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其请求应由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裁定王国园等 36 人的起诉，法院不—予受理。

36 名被裁员职工又依法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桥东区人民法院(2006)东立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然而至今，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驳回他们的请求，没有任何劳动部门和司法机关愿意出面依法查处这起建行非法裁员 11 万人的特大案件。

有些省市强调不受理集体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不受理集体劳动争议民事诉讼，然而，以个人名义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和民事诉讼的结果又怎样呢?

4、建行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支行职工单计坚(又名单卫国)1992 年 6 月从河北省财经学校毕业分配到建行永年支行，其有双大专文凭，是建行业务骨干，2003 年 12 月 11 日被建行邯郸市分行永年支行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的形式通知单计坚"解除(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单卫国对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不服，多次找建行协商解决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问题，遭到建行的拒绝。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分别两次于 2005 年 3 月 1 日和 11 月 2 日向邯郸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建行邯郸市分行永年支行依法为申请人交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邯郸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05 年 11 月 8 日以《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形式，通知单计坚："不符合受理条件，本委决定不予受理"。

单计坚又于 2005 年 9 月 29 日以建行邯郸市分行永年支行拖欠其工资和加班费为由向永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建行永年县支行依法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和加班费。

永年县人民法院于 2005 年 11 月 17 日以(2005)永民初字第 1369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单计坚的诉讼请求。单计坚不服一审判决，于 2005 年 11 月 28 日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 1369 号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事项。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6 年 3 月 24 日作出(2005)邯市民二终字 5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单计坚不服，于 2006 年 5 月 9 日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审，至今未见答复。

单计坚又于 2005 年 12 月 23 日以建行邯郸市分行永年支行“送达本人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严重违法，是无效通知书为理由，向永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建行永年县支行和邯市分行送达单计坚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无效。

河北省永年县人民法院于 2006 年 8 月 14 日作出(2005)永民初字第 17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单计坚的诉讼请求”。单计坚又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以要求恢复其建行职工身份。由建行支付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为由，再次向河北省永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送达原告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无效，为原告依法缴纳各项社会劳动保险。由于长期诉讼、上访、申诉，长期下岗失业，生活十分贫苦，为此向永年县人民法院申请减免诉讼费。然而、至今没有任何答复和结果，这真是投诉无门，泣血申告，身处绝境，天理何在!

单计坚在一面依法定程序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提起民事诉讼，上诉、申诉的同时，一面向建行邯郸市分行上访，请求协商解决，自 2004 年起直至 2006 年 1 月 25 日，4 月 19 日，5 月 23 日，连续上访无数次，均被建行拒绝答复和解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走上了赴京上访的漫漫长路。

5、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支行职工阎勇被建行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买断工龄”后，于 2006 年 1 月 23 日，向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法院于 2006 年 1 月 27 日以(2006)锡民立字第 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协、议是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期间一次性安置职工时所签协议，因此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主管范围，裁定对阎勇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可见以个人名义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和提起民事诉讼同样被拒绝受理。中国的立法越来越多，难道就没有保护这 11 万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吗？

6、湖南省娄底市建行 135 名被非法“买断工龄”职工向中共娄底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银监局报送了《建行娄底市分行全体被骗(逼)买断人员的“血泪控诉”，明确指出，买断工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是“国法”大，还是“行规”大？改制裁员，建行的霸道和强权代替了职工的自愿和平等；谁是和谐社会的破坏者？谁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控诉材料，上报中央军委、国务院、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等有关单位，然而，所有控诉材料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7、建行赣州市分行 238 名被非法买断工龄职工于 2006 年 11 月 20 日向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发送上访材料《绝境中的悲情申诉》，用大量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反映了建设银行非法买断职工的欺诈、强迫行为。请求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建行 11 万被迫买断工龄职工的生存权益问题。同时也表示了决心，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依法赴京上访；将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集会游行。但是也没有任何音讯。

上述事实证明，中国的所有法律、行政渠道对中国建设银行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 11 万职工全部关闭了。他们早已没有任何出路了。

他们不在沉默中死亡，就会在沉默中爆发！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43：当以百姓心为心，请胡主席、家宝总理洗耳恭听老子的话语

蒋经国先生去世前再三叮嘱身边众人：“我们执政党千万不要对不起工农!”。随后的数年里，中国国民党一系列民生、民主改革，证明了中国国民党是一个知错能改、顺天应民的伟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之举，对台湾影响深远。

那么为何蒋经国先生晚年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尤其他早年在前苏联当过红军军官，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到了台湾后又主持情报与政战工作。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一样，都曾在组织严密与战争苦难的岁月中，塑成了敌我分明的单一意识形态。但是，他并没有敝帚自珍，而是选择与时俱进。他深刻意识到，一党大权在握，极可能拖垮国家社会，古今中外这类悲剧不知凡几。经国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在台湾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

蒋经国先生的这一伟大的决策，就是民主。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

人类历史上统治方式只有三种，一是家天下，一是党天下，一是民天下。

家天下，以帝王之心为心；党天下，以一党之心为心；民天下，以人民之心为心。

以人民之心为心的“民天下”，就是民主制度。

最近，我赋闲重读老子文章，颇有心得，愿意与胡主席、家宝总理以及全国人民分享。

七十一章太上有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意思是说，努力去知道还不了解的事情，是很高尚的，而不知道应该知道的事情，是失误的。只有找出失误的原因并改正，才能不失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知道什么是失误以及如何改正错误。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大失误就是走上了一条专制主义的道路，人民的一切苦难都根源于此，而中国共产党却不拨乱反正走向民主。民主是中共本该知道的“好东西”，但是中共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拒绝人民渴望的民主，这就是病了。专制条件下，中共有病却无外来之医治疗，其又不愿自治自改，结果那一定是死于非命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不改专制、不开民主呢？

因为中共不懂“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的道理。宇宙万物阴阳和合乃生，阴阳不合近死。阴阳，既是事物的本质规定，也是事物的存在形态。阴阳有偏便是病，阴阳离决命乃绝。和气生万物，和气可致祥。和气，是阴阳两气相互负抱、相互渗透、相冲相荡、相互和谐的结果。这是生命的两条根本规律，一是负阴抱阳律，二是冲气为和律。专制就是阴阳有偏，于是得病；不知悔改，于是病死。

目前，中共只贪图一己之欢娱，无视人民之苦难，窃人民之民主权利，夺百姓之生活保障。纲常尽失，民不聊生，人神共愤，天理难容。

七十八章圣人言曰：“受邦之垢，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意思是说恩泽百姓、承受全邦之垢恶，这是社稷的君主；德施天下、承受全邦之不祥，这是天下的君王。而如今之中共，不顾社稷之众生苦难、无视天下之道德沦丧，非主非王，是谓“含灵巨贼”。

社稷之主、天下之王皆爱民之君也，区别在爱民之心之多寡；而含灵巨贼无有爱民之心，其心只为私心。常人之私心，或可曰无分享之心而已；而专制之贼心，却是劫夺民财、扼杀黎民之心。

四十九章曰：“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即是此理。一切以百姓的利益为指归，“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恒善救人，而无弃人”。 “家天下”、“党天下”中的佼佼者皆在“以百姓之心为心”着力甚重。古往今来，在此问题上，稍有私心，即沦为民贼独夫。

“民天下”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最高阶段，就是让百姓可以顺心顺意地选择执政者。

中共初创之始，抵制中华民国“党天下”之专制，倡“民天下”之民主，民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竞相帮助，及中共颠覆成功、掌权执政之后，立刻将此弘愿弃之脑后，转而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致我中华大地千疮百孔、生灵涂炭，至今惊魂未定。

然中共“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当今之世，民主昌明，国人于中共之爱戴尚有余存，此即中共终结独裁，重开民主之绝佳时机。

二十七章有曰：“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善于摄生爱民之人，是吾辈之师，不善于摄生爱民的人，是吾辈之资。“师资”二字即来源于此。此师资，包含自我人生历程和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切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尤其是失败的痛苦的教训，更加深切而可贵。

中共一切失误的罪魁，即专制，故中共应贵师爱资。

中共的师，就是民主制度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幸福，中共之资，就是中共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于民主制度，应以之为“师”，勇于实践；对于独裁专制，应以之为“资”，谢罪改过。

此一师一资，为中国各政党竞选、接受人民选择之时的唯一标准。执民主思想之牛耳，即可“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三十五章）。

如中共一意孤行，必将“反者，道之动也；弱者，道之用也”（四十章）。专制者敢于实施专制的唯一理由就是武器，但是，最终让专制者放下武器的一定是手无寸铁的人民。

专制统治的一个恒常的定律是“物极必反”。而之所以“反”，是“道”的推动而已。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不是别的，就是“民心”。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所以明天命也。

柔弱是“道”的作用显现。“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七十八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七十六章）。

老子所说之“柔”、“柔弱”，非今人之谓软弱，而是百炼金钢化为绕指柔之柔，虽外现柔弱，却能战胜至坚。何则如此？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专制行将结束，民主终将到来。尔今普及自由民主知识、推广多党竞选理念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此谓“天下之然”也。

大道实践当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党及一切爱国爱民各党遵循之要旨。道重身体力行，民主方至；德贵实践体验，赞誉必来。人生大道千里之行，民主之途始于足下。迷途不返，祸害百姓。再回头已百年身，悔之无及。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百姓心为心”知之。

大旨已明，兹不复赘也。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44：在“全民福利”已成世界潮流的时候，中共再次不与国际接轨了

国际上凡是对中共有好处的事情，中共都要求与国际接轨，凡是对中共不利的事情，中共都强调“中国国情”，例如西方国家普遍执行的公务员制度中的“高薪养廉”，其中的“高薪”对中共官员有利，于是就与国际接轨，而“养廉”对中共不利，于是就强调“中国国情”。

不仅公务员制度如此，中共在经济制度上也是如此。中共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对中共有用，于是就与国际接轨，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福利政策”对中共不利，于是就视而不见。

2007 年 11 月，我就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体”问题，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不料 20 天后，就被中共剥夺教授职称，下放资料室劳动。我想，中共不接受我的民主思想就算了，至少你应该接受我的“全民福利”思想吧。说我要共产党下野是违宪也就算了，我的符合宪法的“全民福利”思想中共怎么就不在 20 天内进行关注了呢？

我的理论出台 3 个月不到，没想到“墙里不香墙外香”，美国、新加坡、香港先后出台了 2008 年的“还富于民”的福利计划。

2008 年 2 月 7 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 1680 亿美元的退税法案；13 日布什总统签字使退税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不仅包含了个人退税的内容，还将两千万老人和二十五万残障退伍军人纳入了退税的范围。退税计划为可调整毛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s）7.5 万美元以下的个人提供 600 美元退税，夫妇俩人年收入在 15 万美元以下可获得 1200 美元，每位儿童获得 300 美元。低收入人群，包括依靠社会福利的退休人士和不交收入税的伤残老兵，将收到 300 美元的退税。退税支票将于 5 月寄出。

2 月 15 日，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向国会宣读政府新财政年度预算声明时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农历新年)红包。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 64 亿新元(约合人民币 320 亿元)，创下 1994 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 18 亿新元(约合人民币 90 亿元)还富于民，其中 8.65 亿新元(约合人民币 43 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 4 月和 10 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 21 岁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新加坡人口约为 450 万，18 亿新元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 400 新元(约合人民币 2000 元)。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针对所有 2008 年介于 7 岁至 20 岁的孩子，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 600 新元到最低 150 新元不等的津贴。

2 月 27 日，香港市政府也宣布，计划把 400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370 亿元)以多种形式回馈市民，尤其要向老人倾斜，希望他们也能分享到香港经济增长的成果。

最让我欣慰的是，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这个称呼，与我提出的“全民福利”的思路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有没有政府盈余？如果有的盈余的话，中共政府愿不愿意让全民分享呢？

我们先来看看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胡怡建先生的一段话：“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处于黄金周期，我国 GDP 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国外经济学界有人称这是中国的黄金十年。而且，随着财税收入改革效果的显现，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五年来以比 GDP 年均高 10%左右的比例增长，现在的国库实力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那么，中共政府是不是把这些盈余的钱给人民了呢？但是，我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五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我 01 年博士后出站留校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年收入是 4 万，而六年之后（2007 年）的年收入是 5 万。收入涨幅为 25%，但是物价（副食品、蔬菜、日用品、房价）的涨幅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了。再例如，芜湖市民张鸠妹女士说，“2002 年，我月工资 1853 元，丈夫月工资 2400 元，家庭年收入 5 万元。当时，猪肉 7 块/斤，我们住的地区的房价只有 2000 元/平方。到 2007 年，我退休后工资 1300 元，丈夫加了一次工资后，现在月工资是 2600 元，家庭年收入还是 5 万元。但现在的猪肉是 15 元/斤，房价 5000 元/平方。我觉得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了”。

是的，这五年全国人民都看到政府快速富裕了，政府公务员以及“视同”公务员的人员工资在不停地涨，“阳光工程”奖不停地发，一些地区的处级干部的年收入都能达到 12 万。

物价的上涨，对公务员的工资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怜的是那些在田地里干活的农民、城市里没有工资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以及工资平平的普通工人职员。

这些可怜的人，最可怜的还不是工资难以抵抗物价涨幅，而是他们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可以对自己的生

存处境进行票决。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人民就无法出席真正意义上的物价听证会；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人民就无法为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工作待遇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所以，我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其实是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全面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政治权力的一个良方。

但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中共如果是一个爱人民的党，就应该执行我的这一思想。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人民的思想。只要让人民对“一党独裁”和“多党竞选”进行一下公投，就可以知道我的思想是代表我一个人，还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了。

无独有偶，2008 年春节期间，上海政协委员，同时也是经济界人士的刑普先生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个《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 1000 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结果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非常干脆地拒绝接纳。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是，“这是全国的问题，不只是上海的问题”。

刑普先生当即表示，他会想办法递交到三月份的全国两会。日前，结果出来了：不予立案！

说实在的，我听到这些消息后，悲愤之情难于言表。

今天，中国的财政税收占 GDP 比重比美国都高，但是中国人民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

相反，一个大学教授要求在中国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竟然被剥夺教授职称，而一个政协委员要求“人民分享财政收入”的提案却被中共羞辱如斯，这个执政党的本来面目，中国人民应该看清楚了吧。

最后，我列举出一些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说明这个执政党霸占财政收入的状况：200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46619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11.4%。 2007 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 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左右，三年翻了一番。但是近五年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 6.8%。

也就是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 1/3，农民的收入增长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约 1/5。而且，随着 2007 年初以来 CPI 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正在贬值。如果问一问普通市民，大家都会觉得，工资是增加了，但是生活压力却加大了，因为食品价格在涨，房价更是在涨，幅度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加。

很显然，人民是苦难了！

那么谁在笑呢？这也很显然！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Email：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145：很高兴中共说我有六个女人，看来中国政党竞选已提前开始了

前段时间，我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的“笔杆子们”研究竞选策略、选票政治和竞选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问家，虽然分属不同的专业，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文学等等，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都是六四学生。现在我们都过不惑之年了。想起十九年前死在北京的许多同学，我们就潸然泪下。

一个同志提议，大家应该重读一下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先生写的《竞选州长》。责无旁贷，我在被中国共产党剥夺教授职称后，再次执鞭开课讲授《竞选州长》。

其故事情节，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梗概如下：

“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其他政党展开竞选。

竞选对手的各种“竞选手段”使人目不暇接。先是一家报纸造谣说“1863 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 34 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从此，这家报纸以后但凡提到“我”时，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接是《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地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叫“我”做“蒙大那的小偷吐温”。

以后的报纸消息有： “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祖父曾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纯属粗暴无理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之人甚为沮丧。” 此后这家报纸总是称“我”为“拐尸犯吐温”。

再接着是一则消息：“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下我们终于把他们抓住了。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是谁？’”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

后来还有匿名信若干，例如，“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你干

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拿出几块钱来孝敬鄙人，不然，报上有你好看的” 等等。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敲诈案件硬“栽”在我头上。这样，可怜的吐温先生又得到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再接下来的消息更吓人：“一家疯人院妨碍吐温先生家的人看风景，吐温先生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 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吐温先生为了吞占其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

最有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落幕：有人教唆 9 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吐温先生的双腿，大喊“爸爸!”

最后，吐温先生怀着痛苦的心情在退出候选人的声明上签下了下面的一段话：“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 • 吐温。”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更有趣的是，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也领教了。不过我的心情要比吐温先生好“五倍”。

今天，江苏一位著名的军转维权人士向我电话汇报说：“昨天国安部门的人找我，要我们军转干部离您远点，说您是个危险人物，还说您有 6 个女人，是个坏人。我回答，郭教授有几个女人和他为我们军转干部维权有什么关系呀。你们扯这个干什么呢？然后，那些人灰溜溜地走了。”

首先，我很开心的是，国安部门使用这样一个半世纪前的劣质伎俩，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黔驴技穷。说法律说不过我，讲政治讲不过我，三个代表也没我代表，于是就只好谈“生活作风问题”了。

好，既然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喜欢“生活作风问题”，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如我这样一个一贯强烈谴责独裁，要求中共立即终结独裁、实现多党民主竞选的人；一个因为提出上述主张、并上书国家领导人的人；一个随时准备坐牢被杀的人；一个不怕老婆孩子和全家被中共杀害的人，我很怀疑会有女人爱上我。

幸亏我的这些举动是在我结婚之后才做出来的，否则我老婆是肯定不会愿意嫁给我的。这点，我刚才得到了确认。老婆洗漱好准备睡觉，我问：“如果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在你刚认识我的时候做的，你会嫁给我吗？”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嫁！世界上哪有这样为你提心吊胆担心受怕的傻女人愿意嫁你呢？”

我笑起来，是的，我这样的“危险人物”想找个情人真难。第一、没钱给情人用。被警察抄家没收了我的三台电脑和所有的银行卡，现在的电脑是朋友借的，生活基本靠老婆、父母养活；第二、不能给情人一个稳定的怀抱，随时入狱不说，还害人家焦虑揪心；第三、天天忙着帮全国各地的苦难人民出主意写材料，陪他们伤心陪他们落泪，就是没时间陪情人看星星看月亮。

我记得有个小笑话这样说，一个破产的人夜晚形单影只睡在寒冷的床上，一个小偷翻窗进来偷东西，惊醒了这个可怜的主人。他对小偷客气地说：“亲爱的小偷，我白天翻箱倒柜都没有找出钱来，难道您晚上能找到？”

我一想到这个笑话就乐不可支，我也要对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们说，“亲爱的警察同志，如果你们能帮我找个愿意和我共赴生死的情人给我，那我真要感谢死你们了。”

其次，中共警察这样的伎俩大家都看眼熟了，例如，最近几年来，中共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几乎很少使用政治罪名，而较多地是找个其他的普通刑事犯罪的罪名收监。例如孙大午案用的是非法融资，南都案用的经济犯罪，陈光诚案用的是破坏财产和扰乱交通，郭飞雄案用的是非法出版，孑木案用的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等。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给我电话说，中国的一个有民主思想的画家，被诬陷偷自行车，这位画家在反驳的时候，警察先生说：“你算了吧，说你偷自行车还算好了，没告你强奸算不错的了。”其他类似在你出差的时候，找个小姐敲开你的房门，然后诬陷你嫖娼的事件层出不穷。

幸亏 1997 年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否则中共找 6 个妓女联名作证说我和他们都上过床，那我一定可以按流氓罪判个死刑。我知道中共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朱老总的孙子，就是因为和几个女人睡过觉，被以流氓罪执行了死刑。

朱德的孙子是按照当时的刑法第 160 条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的，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当时还有几个老红军的孩子一块儿被开除军籍并被枪毙。上海当时被枪毙的还有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工作的原上海宣传部部长的儿子陈晓蒙，也是同样罪名。

这个罪名是在我担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书记官期间废除的。我 1994 年到 1999 年在南京中院刑庭工作，五年间参与审理特大刑事案件数百起，经我手办理，执行死刑的罪犯有 43 名。

如果这个罪名一直保留到现在的话，我想，时下估计会被枪毙起码 5000 万人以上，这还是我的最最保守的计

算。如果严格按照 83 严打的“和三个女人睡过觉”就执行死刑的话，我想中国可能要枪毙 2 个亿。大家感谢上帝吧，这条罪名和刑罚已经在 1997 年被取消了。

第三、要谈到丑闻，谁的丑闻会超过中国共产党呢？前一段，广大网友对贪腐众官在情妇工作上所做出的贡献搞了一个排行榜，其中：

有因包养情妇 146 名而获“数量奖”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

有因包养 17 名未婚女大学生而获“素质奖”的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

有因撰写性爱日记 95 本，保存性爱物证（阴毛）236 份，而获“学术奖”的原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

有因运用 MBA 知识管理 7 名情妇，而获“管理奖”的原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杨枫；

有因召集 22 名情妇举办群芳宴并选出最美者，而获“团结奖”的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

有因向 5 名情妇保证，60 岁之前每人每周性生活 3 次，而获“干劲奖”的原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

有因宠爱自己下属官员的 11 位官太太，并成立公司安排所有 11 位情人合作工作，而获“组织奖”的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宝鸡市市委书记庞家钰。

我不知道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还会有这样的丑闻，但是我知道，中国即使再多发生这样的丑闻，中国人民也无可奈何。这些官员当然是要下台的了，但是他们下台的原因，绝不只是性丑闻。

贪腐众官下台的根本原因是有经济或其他刑事犯罪。如果只是性丑闻，他们是不会下台的。因为，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们的性丑闻即使是公开的，也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以揭露，因为媒体也是他们自己的。另外，事实上即使人民知道这些丑闻，下台的只是直接涉案人员，他们所隶属的党，却无需为他们负任何一点责任。

在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的高级党员发生这种丑闻，而不影响这个执政党的下届选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中国，这很正常。

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里，恐怕只有中国的执政党是最不怕人民知道执政党的丑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却是最怕本党出现丑闻。

究其缘由，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那么人民的选票就不再投给执政党。于是西方的公务员最怕人民不满意，并努力做到让人民满意；

而中国的执政党地位的获得，不是凭借着人民的选票的，而是半个世纪前那场内战的结果。因此，中国的执政党根本不惧怕其执政地位的丧失。

所以，在中国，执政党对丑闻的管理理念是：首先，严密控制丑闻泄露。其次，如果泄露，立即丢卒保车。第三，发动舆论工具，宣传中共所谓的反腐决心。

于是，即使中共发生再大的丑闻，对丑闻官员的清理，都成为了执政党反腐决心的美丽展示。于是，再大的丑闻，都会成为更大的庆功会的契机。

如是这般，还有什么丑闻人民不能承受？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开心，毕竟共产党说我有六个女人也算是政党竞选的竞选手段之一了，中共还没直接把我暗杀了事就算是极大的人类进步了。

如此可见，其实，中国的多党竞选已经悄然提前开始了。

大家努力吧！人民必胜！民主万岁！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郭泉：民主先声 146：人大代表您真的代表人民了吗？政协代表您真的可以政治协商吗？

最近在开两会，可是不断地有人问我，两会到底是哪两会？

这让我唏嘘不已。一个国家搞到国人连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召开的会议都不知道，这个执政党也太有才了。可见，这个“两会”能对苍生百姓的生活起到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想，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人民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但是我下面说一个独立候选人是怎样落选的，大家就知道人大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了。

我的一位老朋友孙文广先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民主人士，已经 73 岁了，但是一直重于以行动来推进民主化进程。2007 年 11 月，孙先生打破了山东大学的死气沉沉的“选举”气氛。他用行动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

圈这种现状进行了宣战、示威和反抗。

孙先生说："如果说农村基层都可以实行乡、镇、县级人大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的话，那么，山东大学这样一个国家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的重点大学就更能实行基层人大民主的直接选举。山东大学，一所号称百年历史、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集各类大学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共 3 万优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国家级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就更应当够条件实行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然而，在这样的大学，人的文化素质之高，现代人文精神之强，山大仍然要强行禁止民主选举制度在这里通行。这怎么能行？"

于是，孙先生开始了他的选举之路。他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孙先生在学校贴了许多选举海报，但是孙先生白天贴出晚上就被共产党撕掉。孙先生就反复贴，共产党就反复撕。孙先生还在山东大学新校区食堂摆展板，发表竞选演讲，散发竞选资料。中国共产党十分恐慌，每日深夜撕下孙先生的竞选海报，还明令不许山东大学学生阅读孙文广教授的竞选传单，不许听孙文广教授的竞选演讲。最可耻和罪恶的是，共产党还在学生投票时，不许大学生投孙文广的票，激起了山东大学师生的愤慨。

共产党还派出便衣特务阻止孙教授在校园内发表竞选演讲，被山东大学师生呵斥得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最后，由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原因，孙教授落选了。

看了孙教授的竞选遭遇，我有理由怀疑那些被钦定当选的人大代表是否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奋力抗争。

那我们再看看政协代表是不是就真的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了呢？

我的本家郭锡龄先生是广州政协副主席。2008 年 2 月 17 日，在广州政协小组讨论中，一位委员在介绍了今年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之后，郭锡龄先生说："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郭锡龄紧接着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并说道，"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不料，2 天之后（19 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大谈"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疏运工作如何出色，并针对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感到惊讶，难以理解"，最后，王勇平还拿出中共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的话来给郭锡龄先生定性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议政"。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对铁道部的批评完全属于共产党钦定的"议政"行为，却遭到如此不堪的批判，我也有理由怀疑政协会议上政协代表是否有权利为人民的利益多说几句话呢？

我本以为，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是民生问题，不料，日前看到《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已经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一号提案"，不禁仰天长叹。这个政协一号提案完全是为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服务的。该提案认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投资者呢？我长期服务的苦难人民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什么钱搞投资呢？其实，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安置问题才应该是永远的"一号提案"。

看到这些情况，我和全国一切苦难人民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两会为人民幸福做出什么实际的工作来呢？

前天，我又看到新闻，标题把我吓了一跳，《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现在中国连人民组党都不行，没有解除党禁和报禁，怎么突然冒出来个《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了呢？

等我仔细读完，我才知道又是中共在忽悠人民了。原来，故事是说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本山先生在辽宁省十一届人代会上由铁岭市作为知识分子界继续提名为全国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经差额选举，获 270 票，按会议法定的选举办法，没有超过最低的 319 票应当选票数，差 49 票而落选。

这就是一个政协代表落选而已，怎么成了"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呢？

那么什么叫民主制度呢？

民主制度就是人民可以组党，多党竞选，取悦于民，接受人民的选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在污蔑民主和自由这两个神圣的词语。例如，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在哲学史、在政治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毛泽东却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这个独裁者在文章中写到"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那么，大独裁者毛泽东列举的十一种自由主义是什么呢？原来是 1、明知不对，也不争论；2、 当面不说，背

后乱说；3、事不关己，高高挂起；4、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5、泄私愤，图报复；6、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7、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 8、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9、敷衍了事，得过且过；10、摆老资格、学习松懈；11、知错不改，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大家看看，这个独裁者对伟大的"自由主义"的理解就是这样的，这种带有强烈污蔑色彩的弱智思维，还怎么能让涉世不深的青年朋友们热爱上自由主义呢？

上周，中国新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两位负责人到我南京家中看望我，我们谈到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异同时，我 8 岁的儿子突然对我们说："我们老师说了，自由主义就是上课讲话，不听讲，坏孩子才自由主义呢！"

真是把我们笑得喷饭。江西党部主席徐先生笑着说，"看来，我们的民主启蒙要从娃娃抓起了。"

我们再看看中共是怎么恶搞民主制度的。把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说成了代表选举，或是中共内部的无关痛痒的互相提提意见的"民主生活会"，并且还忽悠人民说"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我看，你们真是把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当白痴了！

有人说，中共钦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其实都是中共特务，我看也没有错。他们的特务任务，就是"举手"、"鼓掌"，通过一切既得利益者的独裁决议而已。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47：亲爱的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弟兄们，请你们好好学习老子的思想

今天下午（2008 年 3 月 7 日）我在给新闻专业的同学上《文学概论》，突然手机闪烁。我在上课的时候手机都是调成无声的，一般到课间休息才看一下是否有未接电话。今天我本能地看了一下手机，是我妈的电话。我妈从来不在我上课的时间给我电话，一般都是在晚间和周末，这次很异常，我立即接通了电话。

我妈声音很低沉很严肃："你马上回家！"我回答："下课以后立即赶回。"

大约下午五点钟，我赶到我妈家。在我进门低头换鞋的时候，我妈突然挥手照我后脑勺上重重地刷了一巴掌。我今年 41 岁了，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妈打我还是我上小学，大约是 30 年前了。我很诧异，立即焦虑地问："妈，您别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妈没好气地说："你现在怎么会变的这么没有教养，你真是丢我们家的脸！"

我说："妈，孩儿不孝！我现在帮穷苦人民维权，最多是让共产党丢脸，怎么会让您丢脸呢？怎么会让我们郭家丢脸呢？"

正好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的家谱。我族始于西周文王封百子定姓氏。武王伐纣后，封其叔为号国公。文王不言叔讳称叔为郭叔，由此确立吾族之姓。先祖后裔子仪公平国乱、功高五岳、德及万家，受封汾阳王。我族宗祠为山西汾阳堂。汾阳堂始祖子仪生有八子，我族为始祖次子郭暧后代。二世郭暧"醉打金枝"的著名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我是郭家唐代以来的第三十九世孙。我郭家世代为官治学，满门忠烈，偶有朝代避乱务农，也铁骨铮铮。

我妈说："你交代，你怎么会对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位叔叔辈的长辈自称老子？我看你是活昏了头了，你要把我气死了！"

胡锦涛主席是我妈在泰州中学读书时候的校友，胡叔比我妈高二届。这真是把我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说："妈，我什么时候对胡叔叔自称老子的啊？我怎么可能啊？我和胡叔的政治观点再不一样，我也不会这样无礼的！政治斗争绝不能搞成人格侮辱、政治迫害或政治谩骂。妈你放心，我这点政治素质还是有的！"

说实在的，这场新一轮的民运中，除了个别中共特务搞出一个"郭泉有六个女人"的小插曲算中共先输一招外，总体说来，政治斗争的双方都还是比较克制的。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政治较量中，如果我犯下我妈说的那样的低级错误，岂不贻笑大方？

我妈说："下午 2 点左右，南师大的党办主任刘主任给我电话，要来拜访我。我一听就知道是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下午约了两位老朋友来聊天的，我就请刘主任下周一再来详谈。不料，他说晚上就要急飞北京向在开两会的南师大党委沈健书记汇报工作，只能现在拜访。我说，我家里有客人，而且你又是来谈郭泉的事情，这不方便，就电话里谈吧。大概谈了接近一小时，其中说你最近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一份信自称老子，叫两位领袖看老子的文章、听老子的话。我一听到这个话，我都快发心脏病了。你想害死你妈啊？"

天哪，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我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终于想出原委了。我大声笑起来，把我妈吓

一跳。

我笑说："妈，估计这个刘大主任只看了一下我的文章标题而没有读我的那文章内容，或者是某位国安的弟兄没有看懂我的文章就匆忙向刘主任汇报了。其实，我是要胡叔温总理多读读老子的文章的，这份信是《民主先声》第 143 篇。文中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十章、二十七章、三十五章、三十六章、四十章、四十二章、四十九章、七十一章、七十六章、七十八章的句子。此老子非彼老子也！"

我妈释怀而笑，喃喃道："他们怎么会把这个老子想成那个老子的呢？"这下轮到我妈百思不得其解了。她想了一会儿，一边摇头一边到厨房看为我煮的我最喜欢吃的芋艿熟了没有。

对这个事情，我有两个心得：

第一、我的政治对手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失控。先是搞出一个"六个女人"已经棋输一着，现在又搞出一个"老子事件"又暴露其心理的恐慌，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已经手忙脚乱，无处下手了。他们想实施狙击，但是又苦于毫无手段，且我毫不畏死，最后他们只能胡乱落子，满盘皆输已成定局。

第二、我们的国家公务员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确应该多读读国学著作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呀。我早在 2007 年 11 月 14 日给胡锦涛主席的上书中就提到过要建立"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管理技术极大丰富了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这一只有 200 年不到的德国思想来指导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中国人亲切把有关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尔今普及国学知识、推广国学思想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

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国学是一个国家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至于所谓的国学糟粕，其实来源于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之后发布的伪国学。这个伪国学，才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两个字"吃人"。

所以，鲁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对的根本不是"国学"，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伪国学"。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批孔"，其实都搞错了对象。在这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犯了同样错误的。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国家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标识，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宪法规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新思想来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以至于国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异在"，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目前，学国学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且错误地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我认为必须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至于西方的新思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

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文教学体制。

最后，我要说，亲爱的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弟兄，请你们好好学习老子的伟大民主思想。但愿，这次你们不要再理解错误了。谢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48：四种民运、三种愤青、两种情怀，中国民运的前世与今生

2008 年 3 月 6 日早晨一上班，香港《太平洋》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欧阳劲先生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等我了。

我领欧阳劲先生到文学院的草坪大树下的石栏杆边的石凳上坐下。他看到我们身后有几个晨读的女生，他很紧张，对我说："这里说话不方便吧。"

我笑起来，对他说："我的观点和行动都是公开的，我都不怕，您怕什么呢？"

他说："这正是我们感到奇怪的地方，你的文章、你的新民党、你现在的状态，都让我们觉得很目眩。您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还是安全的吗？"

我说："这很简单，我的文章不是写我的心声，满满地写的都是人民的心声。新民党也不是我组建的，而是苦难的人民自己成立的党，只是请我做了代言人而已，我乐意为大家服务。另外，中国新民党的目的在于终结独裁，实现民主多党竞选，但是不是要消灭共产党，只是想和共产党一起接受人民的选择而已。您说，中共有什么理由对我们打压、镇压呢？如果对我们的镇压，不是反人民是什么呢？不是与人民为敌是什么呢？"

他问："我们很多海外朋友觉得这轮新民运来势迅猛，而且与前面的民运，包括 89 年的民运有很大的不同，您认为是这样吗？您认为这轮民运有什么特点呢？"

我回答："中国民运分为四种，第一种叫铁窗民运，如徐水良先生、任畹町先生、刘晓波先生等；第二种叫文化民运，如余杰先生；第三种叫海外民运，如王军涛先生、伍凡先生；第四种叫维权民运，如我和中国新民党。"

欧阳劲先生问："这四种民运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呢？您属于哪一种呢？"

我答："铁窗民运的主要观点是任畹町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把中共牢底坐穿可以使人民觉醒；文化民运，其实就是民主启蒙，倡导者认为民主必须先从意识上入手解决；海外民运情况比较复杂，是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而组成的多个团体。他们的任务是声援国内的一切民主运动，向民主制度国家的领袖、政府和其他组织要求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我提出的维权民运，昭告只有终结独裁、实现民主才有可能解决人民的实际维权，所以，维权必须和民主相联。"

欧阳劲先生说："是的，我们发现了这一轮民运的这个特点。你能再具体地谈谈吗？"

我说："我是 89 六四学生，当时我在街头游行的时候，有工人抱怨说，你们游行挡住了我们上班的路，我们就没有工资没有奖金了。其他同学听到这样的话，就抱怨人民群众不觉悟，但是我心中一懔，这说明我们超前了，人民没有跟上，或者说，人民还没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却有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大学生怎么能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呢？所以，最后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借口镇压了 89 民运。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人民的苦难指数已经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一次性买断工龄、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问题，高物价低收入问题等等，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人民现在已经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相反，大学生们已经完全不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了。现在，我们接受 1989 年脱离人民群众的教训，我们的民主思想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只有当民主思想和人民需求完全吻合的时候，人民才是真正推动民主革命的强大力量。"

欧阳劲先生问："我们注意到您以前是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活跃在国内国外的政治舞台上的，现在以民主主义的身份出现，我们有些感到突然，请您解释一下。"

我回答："是的，我被南方都市报评为两个著名的反日愤青之一，还有一个是冯锦华先生。愤青就是愤怒的青年的缩写，是指那些对看不惯之事之人会产生愤怒之情的人。我看不惯日本一直霸占我钓鱼岛，所以我成为民族主义愤青，但是我也看不惯独裁专制对我本人和人民的迫害，所以我成为民主主义愤青。单纯的前者也叫爱国人士，后者叫民主人士，这两者的结合，叫爱国民主人士。这三个情况，有一个递增关系。例如，爱国人士未必是民主人士，但是民主人士都在某一个层面上也爱国，而爱国民主人士，则在两方面都非常杰出。我想，从我走过的路，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的。我现在既要爱国，也要民主！但是，我的爱国民主，爱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民主也是理性的。"

欧阳劲先生问："和你谈话很愉快和轻松，这和我与其他海外民运人士谈话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谈到中共的时候过于紧张。消灭、推翻、颠覆之语不绝于耳。而您却丝毫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我笑着说，"这是两种情怀的问题。海外民运的朋友分为两批，一批是四五运动后被逮捕、入狱，刑满释放后出国的朋友，如徐水良、魏京生，另一批人员是八九运动后躲避打击或刑满释放出国的朋友，如吾尔凯西、王军涛、王丹。他们出国时的中国社会的总情势和现在相比，当时的中共呈现出强压的态势，这是造成他们心情紧张的重大原因之一。但是，现在中共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上已经焦头烂额、捉肘见襟，强势不在，已成惊弓之鸟。所以，我们的新一轮民运，不是以消灭中共为旨归，而是以揭露其管理之无能、统治之非法为核心。换句通俗的话，就是我不杀你，但是我羞死你。我不亮剑，但是我把你执政上的问题端出来给你看，端出来给人民看。让大家看看，你懂不懂管理、会不会执政。如果人民用苦难生活，证明了你不懂管理不会执政，那么你执政还怎么能执政的下去？如果人民因为你不会执政，而进行维权，你的子弹怎么能打到人民的身体上呢？"

欧阳劲先生笑着说："我在海外很多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思维，很好，很智慧。"

我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不要消灭共产党，相反我还要保全共产党。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竞选关系。当今世界，凡不是经过人民的

票决上台的执政党，其执政行为都是非法的，因为，他无法代表人民。不能代表人民的执政党，就是专制独裁，就是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欧阳劲先生问：“中国新民党在两会期间和奥运期间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呢？”

我回答：“中国新民党不会有什么行动的，但是，我想人民却是会有很多行动的。两会、奥运是国家最重视的两个大事情，其实维权访民的生活之事比这两件大事情还要重要五倍。所以，广大维权访民想通过这两个大事件，让胡主席和家宝总理重视本该更重视的人民生活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如果胡主席和家宝总理解决了这个比两会、奥运重要五倍的人民生活问题，人民就不会到北京，最多也就是在家看看电视新闻品头论足一番了。”

欧阳劲先生笑着说：“是的。你说的对!”

我又补充说：“另外，中国的访民喜欢进京上访，我认为是他们爱戴胡主席和家宝总理的表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在城市和省份的共产党是坏的，而中央是好的。如果中国人民认为中央也是坏人的话，那么中国人民才不想到北京去上访，而直接到南京来找我了。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人这样做的道理就是认为皇帝是好的，皇帝会主持公道的。现在，胡主席和家宝总理就是好皇帝，应该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只有把人民的问题解决好了，人民才不会沦落为维权访民。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里，两会只是个政治娱乐节目，而奥运是体育娱乐节目，谁会拿这两个娱乐节目说事呢？现在，如果中央不帮人民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相反却用国家机器进行围追堵截，那结果就不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了。那一定是贪官、皇帝一起反了！”

我们又聊了一会非政治的问题，然后欧阳劲先生帮我拍了两张照片，立即告辞回去整理我们的这次谈话内容了。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49：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败局，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立即启动政改

1990 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省金陵汽车运输总公司工作，先是在第一分公司担任政工干事，后调任总公司宣传干事。1992 年通过南京市政府公开选聘干部考试，进入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先是办公室秘书，后担任《改革与开放》杂志社编辑。

在体改委工作期间，我有幸在体改第一线考察了国企改制、科教文改制、医改、金融改制、社管改制等等实际改革事业。同时，我还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结合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果这些改革在十年、二十年后，人民富裕安康，社会公平公正，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成功的。如果，十年、二十年后，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那么就可以断定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

1994 年，我离开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工作。1996 年获得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9 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9 年 9 月，我又离开法院，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2000 年，我参加了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中国博士后“西部论坛”的研讨工作。2001 年博士后出站，留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虽然，我是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但是我的本门功夫是我的硕士阶段的专业——社会学。所以，长期以来我的学术的出发点和归宿，一直都是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

2001 年，我离开书斋，重返社会进行各类调查，发现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民苦难、贫富不公、两级分化严重。从 02 年起，我开始帮助苦难人群，随后的几年里，没想到这种两级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苦难行业、贫困人群越来越多。

这一状况，使我开始思考改革的成败问题了。

关于改革的成败，有两种观点。一是改革还算成功的，理由是社会财富增加了。而我断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了，理由是两级分化。

那么我们来看看，社会财富增加算不算改革成功？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清朝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会不会有冰箱、彩电、空调、高楼大厦？

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别说清朝到现在，就是秦朝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也会有冰箱、彩电、空调、高楼大厦的。

所以，改革成败的标准根本不是社会财富增加。那么是什么呢？

改革成败的标准其实就是是否导向“全民福利”。其中的具体的标志是：

1、国民收入分配是否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2、社会是否出现两极分化；

3、工农生活是否幸福；
4、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是否以人民（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5、教育是否说真话，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负历史责任；
6、执政党内是否出现大量的腐败分子。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六个方面完全失败了。所以，我可以宣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失败了。那么，如何挽救中国呢？

我想，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要得到全面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个对内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模式"。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另外，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国人知道的四个现代化，其实都是物质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但是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前四个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而民主化是人的精神层面。

社会民主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特别是触及权贵者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 革难于贯彻，也是必然导向两级分化的。

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目前中共，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一直没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原因，还是惧怕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专制，就是一党执政；民主就是多党竞选。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导向多党民主制度。

多党民主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来说，当然是没顶之灾，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说，那简直就是人民的福祉。

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执政以来，一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对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会比中国国民党好。这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促使社会改进。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兑现承诺，而是一旦它真的成为一种在社会上实行的制度，便立刻显出了比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弊病。并且，它医治自己弊病改善自己制度的机制远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完善。

我承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其理论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它对特权独裁制度下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嫉恶如仇。

那么，该如何对抗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

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社会特征表现在经济基础上就是生产资料的特权阶级所有制，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国家权力的特权阶级所有制。

而社会公平、全民福利的社会特征表现在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制，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制，就是人民根据各自的利益组党，参加多党竞选，实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或称社会所有。其实现方式，就是票决。

目前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特权阶级所有制，上层建筑是国家权力的特权阶级所有制。

在这样的被特权阶级把持的执政平台上，人民怎么能不苦难呢？

更有甚者，这个特权阶级对人民的苦难，不是投去体恤、怜悯的目光，相反却是傲慢、漠视或极尽羞辱之能事！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50：中共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是"三权分立"，这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今天（3 月 11 日）我看到一则新闻，标题把我惊吓得半死，题目是《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实现了"三权分立"》。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热血沸腾之余，我还是决定先看完新闻，再喊"万岁"。不料，读完后把我笑得半死。

原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下午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说，"十七大报告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中国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郑新立说，“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的思路将体现在国务院机构改革过程中，大部制改革会围绕“三权分立”进行。

中国人民谁都知道，在中国，虽然决策权在法律上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各级人大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中国人民谁都知道，在中国，虽然执行权在法律上属于人民政府，但是各级政府都要听中共党委的；中国人民谁都知道，在中国，虽然监督权在法律上有“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等，但是，司法归中共政法委管，而新闻归中共宣传部管。

那么，很显然，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先生所说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完全是忽悠人民的江湖卖艺。原来，此“三权”非彼“三权”也。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到底是什么呢？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 17—18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关于政权设置的思想。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联邦法院行使，“三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并保持平衡。

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英美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

对于这种制度，我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

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古代皇帝的家天下、现代独裁的党天下，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美国的立国者对执政党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最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

三权分立的核心思想是：三权不能由一人或一党控制。为什么不能有一党控制？因为，一党没有监督。监督的核心思维，就是不信任，这就是怀疑精神。三权分立，互相监督，这样一种思维来自国人对执政党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这种不信任，就是多党民主制最核心的内容。没有监督，天使都会变成魔鬼。

我想，如果我能碰到郑新立先生，我一定会问个小小的问题：“请问，在一党专制下，如何三权分立？”我想，郑新立先生一定还会百般解释，但是我要说的一定是：“忽悠，忽悠，您接着忽悠”。

郭泉：民主先声151： 3月10日，社会党国际（SL）彼德博士来华与中国新民党接触

3 月 10 日上午，我在南京安德门接待了安徽民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之后，又到菊花台与来自法国的社会党国际（SL）彼德博士会晤。彼德博士和我一样都是哲学博士，不过我是中国古代哲学博士，他是德国古典哲学博士，更有趣的是，我和他都是社会学硕士。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而我也是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和他都是“驴友”。

一见面，我们就互相盯着对方的鞋子看，我和他都穿着登山鞋。一问果然是驴友。驴友是我们户外背包客相互的戏称。驴子，是一种皮糙且擅长负重登高的吃苦耐劳的可爱动物，用驴友称呼自己，既是旅游的谐音，也是一种明志和鼓励。

彼德博士说，他此次来南京并不代表社会党国际（SL），与我的接触纯属私人会晤。对此，我表示了理解和意会。彼德博士是中国通，但是他说他也是西藏通，法国建有世界上最出色的藏学研究机构。他精通汉语和藏语。我在博士阶段的第二外语虽然是法语，但是现在完全还给老师了，所以只能用汉语交流。好在他的汉语水平很高，如果转过身去，那是绝对听不出他是外国人的。

他说，目前他们有专门的人员在研究发生在中国的所有事情，但是最主要的研究力量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二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新民党。

他首先请我介绍了中国新民党的主要思想，我说，中国新民党是由中国苦难的工农兵学商组成，提倡人民组党参加竞选，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其具体主张是 1、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3、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4、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5、对于改变（如社会的结构）抱持着开放态度，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8、排

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彼德博士说："是的，我们从你们的党章里读出了你们体系，也看到了中国新民党在致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公开信里承认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我要来与您和贵党接触的原因所在"。

然后，我们交换了各自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观点，最后达成共识。即中国新民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

结束会晤之前，我们还交流了一下我们的登山攀岩经历和经验。我 2005 年 8 月曾经攀登过川藏交际处的贡嘎山，徒手无保护到达海拔 5800 米雪线以上无人地区。彼德博士 04 年到达过离珠峰最近的大本营，大约海拔 6500 米。最后我们相约 5 年内结伴攀登珠峰。（攀登珠峰的最大年龄一般为 45 岁。我和彼德同龄都是 40 岁）。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 SI）起源于 1864 年，即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时期。1876 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 80 年代末欧美已有 16 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恩格斯为了击败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组织领导权的企图，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 18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 100 周年纪念日，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有 22 个国家的 393 名代表参加，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 等 27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巴黎大会主要讨论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了关于每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等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交战，第二国际正式分裂。1923 年在汉堡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是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停止活动。1944 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该组织。1947 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召开会议，成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经 4 年筹备，于 1951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大会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自称其历史始于 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之时，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继承者。会上宣布原则纲领，决定章程。

在 1989 年召开的第 18 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是该组织最新的原则纲领，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社会党国际对和平与发展问题极为关注，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积极主张裁军，赞成南北对话，倡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9 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经 1992 年的调整后成为其原则纲领。

社会党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形，成员主要是欧洲地区受纳粹压迫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当葡萄牙与西班牙于 1974 年及 1975 年正从独裁转为民主政体时，社会党国际曾经支援这两国的社会民主党重新建立。另外直到 1976 年的日内瓦大会之前，社会党国际仍只有少数位于欧洲以外的成员，且于拉丁美洲仍无正式影响。到了 1980 年代，尼加拉瓜的左翼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之后社会党国际又准许了中间偏左的波多黎各独立党、原为共产党的意大利左派民主党，以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加入。

截至 2007 年 6 月，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约 161 个，其中有 50 多个成员党在约 50 个国家执政，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此外，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为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

彼德博士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新民党是以帮助苦难的中国的劳工为使命，提倡多党竞选，所以，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是符合社会党国际原则的政党。鉴于你们的实际维权工作，我建议中国新民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

我说，目前中国还不具备注册政党的法律条件，中国新民党无法进行注册和登记工作。当然，即使是目前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也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性质上的法律上注册手续。所以，中国新民党可能在中国开放党禁之前是不会寻求注册的。

我还请彼德博士转告社会党国际理事会，鉴于中国的特殊的状态，有三点要求：一、中国新民党可能会以"非注册政党"方式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二、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前，不可能去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三、涉及到会费等财务问题，中国新民党目前无法提供任何形式的会费；四、在国内没有合法注册开展公开的政党活动之前，中国新民党不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政治捐款，但是中国新民党遭受中共镇压迫害之时，接受一切政治声援和人道主义援助。

彼德博士说；"好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如实转告。"

最后，我和彼德博士谈到了西藏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重大问题。关于西藏，他说他反对西藏独立，但是他不反

对我提出的包含西藏、新疆、台湾等地在内的“大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概念。关于中国共产党，他和我一致认为中共实施的独裁专制，完全背离了“全民福利的社会理想”，已经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唾弃。

郭泉：民主先声 152：和平长入共产主义：读于光远先生的新作《生长老病死》有感

于光远先生是我家的老朋友了。

1992 年，我妈妈作为新华社海南分社的客座记者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海南）采访期间结识了于光远先生。采访期间，中科院院士何作麻先生也在场。何作麻先生听说我妈是扬州人，就格外高兴，说“我也是扬州人”。我妈老家是江苏泰兴县，以前隶属扬州，现在隶属泰州市。扬州著名的“何家花园”就是何作麻先生的祖辈居所。

于光远先生听说我母亲还是作家后，很开心。当时，于先生正想学习写作散文。此后，我母亲和于光远先生的多次访谈里散文写作总是必谈话题。于光远先生的多篇散文先后发表在我母亲担任专栏编辑的《天涯热风》杂志上。事后，于光远先生一直称我母亲为他的散文老师。从 1995 年起，每年春节，于光远先生都给我母亲致信拜年。

于光远先生今年 93 岁了。去年一年里有半年是在医院度过的。07 年 10 月，他还坐着轮椅列席了中共的十七大。出院后，稍有精神，就笔耕不辍。于光远先生著作等身，先后出版了 80 多本专著。08 伊始他的新作《生长老病死》面市。

这几天，我在研究学习于光远先生的两个材料，一是他的新作《生长老病死》，另一个材料是于光远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发表的“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

《生长老病死》这本书名非常有趣地在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成语“生老病死”中加了一个“长”字。

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懂于光远先生的这本书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独特涵义。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手段是暴力还是和平，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社会各阶层能达成对全民福利有帮助的协议，那么，我们就无需杀人。例如，恩格斯 1848 年 2 月 15 日在爱北斐特的一个演说上指出：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但是必须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于是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

恩格斯的这篇演讲，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声，后来也叫“和平长入共产主义”。使用“长”这词是很传神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的两个指标，一是物质极大丰富，另一个是人性极大发挥。这两者都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都不可能是“天上落下个林妹妹”，必须如雨后春笋般“当春乃发生”。

无论什么革命对人性和物质都不能是摧毁，革命只能是对这两者的发展。检验革命成功的标准就是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和人类幸福，是否促进了物质和人性的极大化。

所以，共产主义必须是“和平长入”的，而不能是“暴力杀入”的。

那么 1949 年中共利用暴力获得政权之后，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夺取政权后，中共并没有在人民民主方面对人民兑现夺取政权前的民主承诺，相反，却发动了各种专制集权运动，从 57“反右”，到 66“文革”，再到 89“平暴”，中国人民只看到权力的一步步集中，而看不到任何人民民主的端倪。于是，中共政权在刚刚诞生就开始了“老”、“病”和“死”的发展过程，如今已是病入膏肓。

解放思想，实行民主，才是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

这些道理，其实中国共产党都是明白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邓小平先生召见胡耀邦先生、于光远先生等人谈论“解放思想”、“实行民主制度”。邓小平对于光远说，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这个谈话以及前后的多次谈话，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十三日闭幕会上所作的讲话，后来成为三中全会上的主 题报告，这份讲话稿就在邓小平的旨意下由于光远先生起草的）。

中共现在的问题在于，知道该怎么办，却不这么办。其中的要害问题是既得利益者担心由于执政党的位置被人

民手里的选票选下来，而丢失既得利益，或遭遇人民的清算。

中共其实就是用既得利益（钞票）来对抗人民民主（选票）。人民是很生活化很实在的，在“选票”和“钞票”之间，人民要了“钞票”就完全有可能不要“选票”了，因为“选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得“钞票”。 所以，中共应该用“钞票”来买“选票”。但是中共却自己把持着钞票，而不给人民“钞票”。中国人民在既没有钞票也没有选票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要么做奴隶，要么革命。

如此可知，中共的命运也就是生老病死了。不要谁杀掉它，因为它是病死的。对罹患绝症且不想吃药的中共来说，面对人民的民主呼声，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任何挣扎、反抗和出击，都会加速其死亡的速度。而我，就是指出它病因的人，我最仁慈的地方就是，其他人知道对中共指出病因可能会遭致杀身之祸，而我即使明知道我会被这个病人杀死，我也要给他看病，但是这个病人是否吃我开的药方，那就看它自己的造化了。

小荷才露尖尖角，一切都在生长之中。一个不知道生长的党，其死指日可待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光远先生的这部作品是的解读，也许于光远先生并不以为然。但是，我想，于光远先生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是好人。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所有的罪恶，其实都是不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去做造成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与于光远先生、甚至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都应该同此心，同此理的。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于光远先生。于光远先生原姓郁，1915 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 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 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他参加了 1935 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 年 3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 50 年代，于光远先生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 年-1982 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

于光远先生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1-7 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靠理性的智慧》、《生长老病死》等八十多部著作。

于光远先生 93 岁了，我想今年去北京看看他。但是，别说我到北京，就是我在南京的活动都受到中共特务的监视和跟踪，我想我到北京去看 93 岁的于光远先生是极其困难的。

我不知道，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作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是否准许我这个更为年轻的中国新民党人，去看望一下 93 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于光远先生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53：汪兆钧和郭泉，分别象征着什么

执政者对自己的执政地位的认识问题，是确认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

如果执政党认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那就是民主制度；如果执政党认为人民无权选择执政党，那就是专制独裁制度。

其实，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是一种管理方法而已。任何管理方法的管理对象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人。而人有两个生活需求，一个是人的物质层面，一个是人的精神层面。

在人的物质层面匮乏的时代，人们对执政者的要求，主要是在物质层面的。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那么人民其实是根本不需要知道当朝的管理制度到底是民主还是独裁。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帝国时代。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精神生活），如果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满足，人们就会希望参与政治事务。

所以，执政党不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人民会在争取物质层面上反抗，例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例如“杀富济贫”，这些农民革命的口号直指物质生活层面。

而执政党满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人民就会在争取精神层面上进行反抗。例如，“不自由，勿宁死”；例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些民主革命的口号直指精神生活层面。

总之，搞独裁专制的执政党不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人民会反抗；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人民也会反抗。

但是，这两种革命的总人数要求是不一样的。要求物质生活的革命，只需要大约全社会的十分之一人口感受生活苦难，革命就会随时爆发。而要求精神生活的革命，却需要全社会多数人在物质层面上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能爆发。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这两个革命条件全部得到了满足。

的确，中国目前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对此，我不持疑议。例如，中共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多次对我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改善了，我们很好很和谐。对我提到的我维权的庞大数量的工农，中共认为，大多数人很幸福，穷的人是少数，而且，这些问题以后都会解决的，发展是需要牺牲掉一些人的利益的，但是，要相信明天会更好。

但是，要求物质生活的革命，总是由少部分缺衣少食或“感受迫害”者发动的。“感受迫害”，就是指即使有衣有食，但是在社会中明显处于被剥削阶级的地位。

那么我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些苦难的“少数人”会是中国革命的力量呢？第一，我从 02 年介入各行业的维权工作，至今已经接触帮助并形成很好感情联络的大约有 5000 万各种各样苦难的中国人民。他们每日对我诉说的就是，“我们要爆发了，我们要爆发了”。第二，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 10% 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 2.4%，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快速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

中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这在全球，是第一次记录到的现象。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以及我和我的调查团队，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

而我和我的调查团队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并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我和我的调查团队，从生活层面来说，我们不是弱势群体，但是在精神层面来说，我们教授、企业家等一切非权贵特权阶层的人，都是弱势群体。

于是，我和我的调查团队在陪弱势群体哭完最后一滴眼泪后，决定为他们流第一滴血。

这就是郭泉和中国新民党人要在 21 世纪做的事情。因为，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中国，中国不是少数权贵集权者的中国。

汪兆钧先生是企业家，他和我们一样，也关心人民疾苦，但是，汪先生更多地阐述了第二类革命的理念。汪兆钧先生代表着中国大多数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积蓄有相当财富的人群。

汪兆钧先生以及这些在中国属于大多数的人群，在满足了生活需要之后，开始要求精神生活了，这个精神生活不是“酒足饭饱后的小姐”，不是“豪宅别墅里的二奶”，而是权利制衡、民主竞选。

严格来说，我也属于汪先生代表的这个阶层。我也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当然，在财富上与汪先生是没法比的。不过，我们在“权利制衡、民主竞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我在从事第二类民主革命的同时，也发动了第一类的革命。

苦难的中国人民的维权运动，如果是单纯的维权，如果不和民主诉求相结合，那么这样的维权，其实就是乞丐的乞讨。因为，本该就是您的东西，被坏人剥夺了，您去要，而坏人不给，于是您就再要，坏人再不给。这样的要和不给的无限反复，您不是把您自己放到了乞丐的地位上去了吗？这不是乞丐是什么呢？

堂堂中华好儿女，怎么能是乞丐呢？在乞丐和气概之间，请让我们选择气概！

千年前，我们汉族的祖先就发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最强音，如今，我们也要发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犯我民权者，虽强必覆”！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54：今天得知又有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自杀了，我感到很难过

我是 1999 年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的。但是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校园长大的。我父母是南师大 64 届毕业生，毕业后，我妈分配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我爸留校做行政工作。我家就在离南师大一路之隔的省级机关宿舍里。

我家临街，从我小房间的窗户就可以看到街对面的南师大食堂（现在是一幢二十多层的研究生公寓）。小时侯，我每天一放学就到南师大玩儿，拣石子、捞小鱼、捉蝈蝈，真是开心。当时，我就想，大学生一定很幸福，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玩。可是，等我成了大学生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学生是最痛苦的了。

89 年，我在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现名南京科技学院）的文法系中英文秘书专业上大学二年级。那年，所有的大学生都激烈地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中共结束独裁，实现民主。百万大学生在全国各城市的主要街道开始了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我们在街头向每一个过路的市民介绍民主思想，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支持我们。

但是，当时的工人、农民很奇怪我们在做的事情。一些工人说：“小祖宗哎，你们让些路给我们吧，我们要去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全国的农民也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娃娃们在折腾个啥。

最后，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理由，镇压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美好的心灵和年轻的身体。93 年，我到南京大学读社会学（法学）研究生，一些苦难的工农到南京大学找到我，请我帮他们维权，我没好气的说：“我不干！当我们在街头最需要你们工农帮助的时候，你们却在奚落我们。现在你们知道我们当时在做什么了吧！你们现在活该！”96 年，又有军转干部来找我维权，我更愤怒了，说：“你们枪杀我的好兄弟，你们碾压我的好姐妹，你们是杀人犯，去死吧你们！”

但是，2002 年 6 月 4 日晚，我梦见一位牺牲在北京的女同学，她对我说：“蝈蝈！你傻呀，你应该帮他们，我们死这么多人，不就是为了让人民得幸福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六四学生变成了一个维权民运人士了。之后我做的维权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如今，到南师大已经 9 个年头了。这 9 年里，亲眼看到中国大学生的变化，他们对人民生活的漠视，对独裁专制的无视，都让我揪心。我时常对他们说：“89 年社会腐败情况根本没有现在严重，但是我们站起来了。而现在，你们到哪里去了？”学生的回答真让我感到悲哀。女生说：“谈恋爱呗”；男生说：“打游戏嘛”。

说实话，南师大因为我给胡锦涛先生写要求终结独裁的公开信而解除我教职，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一直就对当今的大学生是否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学校可能以为我会煽动学生闹事，但是我负责地告诉大家，估计给每位同学发 200 元，叫学生上街搞半天反腐宣传活动，都没人理睬你呢。而八九年，我们自费购买红布做旗子，自费购买毛笔纸张，写标语，要是钱不够，就省伙食费、省交通费。为了能买到更多更好的纸张，我还去偷我家里的钱。

那么，现在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呢？现在的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

其他大学的情况可能我不是很清楚，但南师大的情况我却很清楚。因为，我代过很多本科生的课，也做过 4 年的研究生班主任。

在南师大的几年里，给我刺激最大的就是这个学校在不断地死学生、不断地出丑闻。而现在，我做的民主事情，不知道给南师大挽回了多少脸面呢。不过，中共南师大党委一定会认为是我丢了南师大的脸，我想，正相反，历史会证明我为南师大增了光。

好，下面我来说说南师大最近几年不断死学生的事情吧。

南师大的新校区很莫名地把一个学生宿舍（南区）建在了教学区的街对面，而这条街就是著名的仙林大道，大道的车速简直如高速公路。先是一女、后是一男在下课回宿舍、过街购物穿越马路的时候，如风中纸花凋谢在仙林大道上。我曾经提议学校建过街天桥，但是学校有关部门的答复是“这不是学校的事情”。后来我又萌生过自费为同学们建一个过街天桥的想法，结果一打听需要至少一百万不说，而且国家有关部门还不准私人建天桥。

之后，学校游泳馆的温水游泳池里有一个女生溺水死了，奇怪的是，她是在浅水区一米二深的地方淹死的，当时，竟然没有救生员。

后来又有漂亮女生去东北会见网友而被奸杀深埋的情况通报，而据说直到这个女生的家长接到罪犯的勒索电话，学校才知道女生几天没来上课了。再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杀，先是一个经女院的学生跳楼自杀，今天又是一个数科院的男生跳湖自杀。

今天我得到的这个消息是：数科院 05 级计算机专业男同学，上周末补考被某老师认定作弊，但该同学当场申辩其没作弊，是被冤枉的，但老师不信，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们的面说这个男生了很多话。结果，学生投湖了。

下面我再来说说南师大最近几年不断出丑闻的事情吧。

学校新建了一个新校区，花了大几亿。学校到省里把几年后的经费指标都用完了，学校的经济压力十分巨大。但是学校基建部门却很开心地享用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个小小的基建处，竟然几乎全部涉嫌经济犯罪，最后，一个科级干部从他家的 20 多层的大楼上跃身而下，一人承担了所有的钞票漏洞。

另外一个举世闻名的超级丑闻是“南师大陪舞事件”。这是发生在 2004 年 9 月 27 日的学校领导要求 10 名舞蹈专业的漂亮女生接待“上面”来的领导的事件，我想，大家也许都知道了。现我综合一下《南方都市报》和《新周报》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以飨大家：

一个学生事后回忆道：“那些来访干部大都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女生们一去，就被叫过去陪着跳舞。那些女孩子虽然是舞蹈专业的，但她们大都不会跳交谊舞。但是那些男的还是半搂半抱地要教她们跳，一边跳舞一边还和她们闲聊，讲着一些什么身材好、皮肤好之类的话。有些人还追问她们的手机号码，有的还故意透露自己的身份……女生年纪大多都才十七八岁，这样一群女孩子居然被和她们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抱在怀里跳舞，就因为那些男人都是什么干部吗？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

2004 年 9 月 27 日下午，南师大音乐系的陈新坤教授正在为 2003 级舞蹈专业全班学生授课，他很无奈地被一个“紧急任务”宣布提前下课。而“领导们已等候多时”的催请，使得漂亮女生们甚至来不及回宿舍放下书本，就按通知地点向校内宾馆“教师之家”奔去。此刻，南师大校方有关负责人正陪一群领导等候这班还根本不懂男女之事的女大学生。

陪舞之后，领导们又要求漂亮女生陪吃，但是女生们不知道陪吃以后还会陪什么，就团结起来，坚持说有事，最后都逃离了虎口。学校只得怏怏不快地撤掉了多余的几桌菜肴。

陪舞事件被披露后，组织陪舞的南师大领导和接受陪舞的省厅领导，都受到了高层的调查，最后的结果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是不了了之。

那么，以上的这些事件能不能说南京师范大学的学校管理出了问题呢？我看不是的，因为，至少在我被解除教职这个事情上，南师大的管理层还是雷厉风行的。

2007 年 11 月 17 日，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久，我就被口头通知不得继续在大学讲台上进行“有损教师形象、与教师身份不符”的教学，更不得继续指导我的十四名研究生，立即下放资料室做资料员。随后，我的副教授津贴立即被降成了资料员津贴，对此，至今我也没有接到任何书面材料。

这充分说明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学校管理，还是很强大的，只是用错了地方而已。我想，如果学校的管理力量用对了地方，那么，我们会多救一个孩子！救救孩子吧！南师大！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55：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反对西藏独立，支持西藏民主

2008 年 3 月 15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特别会议，就西藏局势决议如下：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在远古时代，就与中国内地的华夏民族及其他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到公元 7 世纪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当时统治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松赞干布，两次派遣使臣前往中国内地，向唐朝皇帝请婚，迎娶了文成公主。藏汉民族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形成统一的中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至今在拉萨的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 9 世纪的藏汉双方的“会盟碑”。

此后，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关系继续发展。公元 l3 世纪，西藏统治者与中国的元朝皇子，正式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定，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自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在这以后的几百年中，中国的中央政权和西藏地方政权虽历经更迭，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不断加强，西藏作为中国一个行政区域的地位从未动摇。建立于 14 世纪的明朝和建立于 17 世纪的清朝，中央政权都直接掌握着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的权力，还派大臣驻藏，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

西藏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悠久的形成过程中，派别较多。17 世纪中国清王朝建立后，中国皇帝先后于 1653 年、1713 年分别册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中国皇帝并颁布命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选定须报中央政府批准，并派中央大员亲临监视。现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办法，于 1940 年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予以批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即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和班禅分别致电中央或发表声明，支持“十七条协议”，表示要“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954 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 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9 年 3 月 17 日，达赖喇嘛受“藏独”思维的影响，出走印度，并成立西藏流亡政府。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西藏是否独立与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并无直接关系。能让西藏人民生活在宗教自由、人权保障的蓝天白云下的“法宝”，不是“藏独”，而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西藏问题，不应该是“独统问题”，而应该是“民主问题”。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长期致力于“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走势的思考，对藏传佛教各派历史和发展均有较深的辨析研究，并多次深入藏族地区考察调研，与藏民结下深厚的友谊。

中国新民党愿意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为西藏人民提供一切在民主智慧方面的帮助。

郭泉：民主先声 156：如果中国不是专制国家，中国人民将迎来全民福利的幸福生活

3 月 16 日全天从早到晚，因为我长期为企业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复转军人（企业军转干部、复员军官、抗美援朝志愿军）、经租房维权业主服务，并组建中国新民党和筹建中国共产党新党一事，遭遇中共抄家和刑事传唤。

这天全天，我看着前前后后讯问看押我、以及繁忙地出入我家撬门扭锁、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的 30 人次以上的中国警察官员，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是民主制度的国家，那么，这么多警察都在街头维持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这该多好啊！如果中国是民主制度的国家，那么，我所服务的这么多人民将根本不需要我为他们服务，他们可以用自己手里的选票来实现对他们的各项民生和民主权益的保护和发展，这该多好啊！然而，中国不是。

专制，真的是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大敌。

下面，我列举一些数字，大家就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到底是被谁给糟蹋掉的了。

叶剑英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害死了二千万，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李先念 1979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中国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运动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16 日全天真的很有趣。

大约凌晨 2 点左右，我刚睡下不久，10 来位中共警察突然敲门，传唤我 3 点到汉中门派出所接受调查。我说，警察先生，现在还是睡觉时间，请天亮再来找我。我还保证，早上我起床后，一定会跟他们走。不料，这些可爱的警察开始研究起我家的防盗门锁了。折腾了一小时没折腾开，又找来了撬锁的专业人士带来了无数的工具开始实施破门而入的计划。一直弄到 5 点半，他们都没折腾开我家大门。于是他们实施了更可爱的行动，开始抡起大锤砸门了。夜深人静，我估计全小区几百户人家都能听到大锤砸门的“暴力”声音。

又不料，还是没砸开。这可把我乐坏了，我本想制造个“中共警察破门而入、暴力抓捕郭泉”的新闻看样子是无法实现了。于是，我说话了：“警察先生，再砸就会把防盗门砸变形，到时候，我出不去就别怪我不跟你们走了。”警察说：“那你出来。”我说：“那你先承认你砸不开门，我才出来。”门外的警察立即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承认砸不开。”我笑起来，说：“好，等我十分钟，我穿衣服。”

出门，我看了一下我家的防盗门，只有一点撬砸痕迹，整个大门纹丝不动。我家防盗门是“长春铸诚牌”，于是我就在想，等中国实现民主了，我一定要做“长春铸诚牌” 防盗门的形象代言人。这家伙太结实了！我们所有的维权民运人士，都要向它学习！

在中共警察的派出所里，警察们主要询问了我目前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新党的情况。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长期维权服务的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 200 多万军转干部。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和我接触以后，面临一个巨大的思想困惑。他们对我说：“郭教授，我们完全同意您的中国新民党党章。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而现在执政的是坏共产党，他们已经变质了。我们希望您和中国新民党帮我们，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虽然不愿意加入中国新民党，但是我们愿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党。但是，我们中又没人敢做这个领头的，于是我们推选您做我们的党主席。”就这样，我又奉命组建中国共产党新党。

2 月份，中国共产党新党的骨干委托我起草中国共产党新党章程和宣言。我说，“不行。既然大家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而现在的执政党是变质的，那么我们是真的，他们是假的。为什么要重新起草章程和宣言呢？其实，现在的执政党的问题出在根本不执行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章而已，所以，我们是捍卫者，他们是篡改者。”另外，我要对原共产党宣言增加两点意见，一是信仰自由，不提唯物主义，二是多党竞选，放弃阶级专政。以上两点都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

目前，中国的维权人士已经完全达成了“一切维权问题的产生都是根源于专制体制”这一基本共识。民生维权已经走向维权民运的道路。

维权的政治化，必将使得维权不再是乞丐的乞讨，而成为政治的对话。

乞丐的乞讨，是权利主体的不对等。而政治的对话，是权利主体的对等。民主制度的根本政治理念，就是人民

组党，进行各政党的平等主体间的对话、合作和竞选。

这一政治对话的结果只能是一样，那就是，要么杀光全部的维权人民，要么在中国实现民主。

当天晚上 18 时到家。我给警察们上了 12 小时的民主课程，他们认真地做了 12 小时的听课笔记。哈哈，我们是 21 世纪最好的教授和最好的学生。

我一到家，夫人就拿出 06 年、07 年和 08 年三年来的所有的警察抄家清单，笑着说："你看，这一叠清单都快赶上你的《民主先声》厚了"。

这次，家里又被抄家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和很多维权文件资料、往来信件便笺，还有很多我打印好的《民主先声》和维权的公开信。

希望家里有闲置笔记本电脑的朋友，提供给我继续革命，谢谢！

人民必胜、民主万岁！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与诸君共勉！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157： 让善良的老人伤悲心碎的执政党是没有良心的

上周回家看望老爷子，不料老爷子在生闷气，白天不思茶饭，夜晚不思睡眠。

我惟恐是我的不孝惹老人生气了，于是惴惴不安。后经多方打听，才知原来是老爷子最近上街给小孙子买春衫的不爽遭遇让他落落寡欢了。

前几天，老爷子为我儿子买春衫上街转了一趟。一出门没走多远，就听见几个中年妇女在说："什么两会啊？一点正经事不做，物价不降下来，两会开死了也没用！"

老爷子正想说两句诸如"要提高觉悟相信党"的话，不料一个妇女说："说这些有什么用呀，共产党就落了一张嘴，他们用涨物价的办法来抢夺我们老百姓手里的钱，当然，他们给这种抢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共产，于是他们就叫共产党。"

老爷子平时最讨厌我们在家说共产党不好了，没想到连街头妇女都在骂共产党，这令他感到很难堪。

他匆忙到商店里买了衣服就打车回家，不料，这个出租车司机一路上都在骂共产党。从养路费、汽油费一直骂到幼儿园的入托费，简直把共产党骂得体无完肤，最后，这个司机一句"共产党不得好死"的话，把老爷子气出病来了。

我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对老爷子说，"爸，大家骂的共产党不是你热爱的共产党，大家骂的共产党是变质了的共产党。你是好共产党，他们是坏共产党。"

老爷子听我这样一说，立即开心起来，很有精神地说"对，我们是好共产党，他们变质了。我支持你继续革命。人民就应该革这些贪污腐败分子的命"。

3 月 16 日，我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就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郭泉，赶快来我家，我老爸快不行了，说要见你。"

我立即赶到老伯家。这个老伯是抗美援朝的企业军转干部，是南京抗美援朝的企业军转干部的"领访"（维权访民的负责人）。

计划经济时代，在企业工作和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在经济方面是完全一个样的。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两者之间的待遇差别就泾渭分明了。在市场经济时代，从企业退休的国家干部要比从政府事业单位退休的人的退休工资低很多很多。

造成这样的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单方面改变了社会经济形态，而没有对旧经济体制下的所有人提供相同的社会保障。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事业单位退休干部的退休金是企业单位退休干部的好几倍。

这怎么能让企业军转老人们感到公平呢？

另外，由于抗美援朝的企业军转干部退休的早（一般都在 90 年代初），所以，现在退休工资就特别低，一般都在 1400 元左右。

这个老伯 80 岁了，以前是 12 军的一个营长，抗美援朝战役结束后，转业到南京企业，90 年退休。我为了写有关抗美援朝的文章经常去找他聊天，知道了很多抗美援朝战役的内幕。例如，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其实并不是美国军队，而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战争的爆发也不是美国人挑起的，而是北朝鲜的金日成不满意"三八线"的南北分界线，为了统一朝鲜半岛而对南朝鲜先发开战的。南朝鲜向联合国投诉北韩侵略，于是联合国组织了多国部队开赴朝鲜半岛。联合国的多国部队在收复南朝鲜后，又想乘胜追击，一举消灭北韩，战火这才烧到鸭绿江边。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才开赴朝鲜作战，最后，南北韩又回复到以前的三八线。中国志愿军出动总人数大约是 300 万，大约有 100 万人没有魂归故里。

电话里，我得知，这个老伯从大年三十晚上，就一直卧床不起了。

原来，年三十晚上，四世同堂吃年夜饭。儿女子孙都在比工资，有 2000 的，有 3000 的，还有 5000 的。比着比着，一直没开口的老爷子就伤心地说"你们这些娃娃个个都比我工资高啊？我们当年一个营冲上去，最后只能回

来 10 来个人。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待遇。看来我们年后还要到北京！”老人一脸的倔强和愤怒。

一个女儿说，“爸，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在家歇着吧，别到北京了。你缺钱用，我们给！”其他孩子也一个劲地说：“对，我们养活老爸！”

这时，老爷子愤怒了，大喊一声，“我们为国家，为党，浴血奋战，流血流汗，现在老了，理应得到国家的荣誉优抚，怎么能落到个让孩子养活的下场？共产党到哪里去了？瞎眼了吗？死了吗？”

孩子们还在七嘴八舌地劝老爷子，这时，老爷子突然把年夜饭的饭桌掀翻了。独自一人进到自己的房间躺下，2 个月了就再也没起来过。

我连忙赶到老伯家，我一坐到老伯的床边，老伯就来了精神。

他说：“郭教授，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以前我反对过你，现在看来你是对的！中国人不搞民主不行了，让这帮兔崽子执政，早晚把中国人的家底败光。他们这是在祸国殃民啊！我们赶走了一只虎，又来了一群狼！所有的独裁者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人民的敌人。看来继续革命理论没有错，我们还要继续革命。郭教授，我老了走不动了，去不了北京了，我就在床上等着看你们成功吧。不过我们现在推选出一个年轻同志带领大家上访。他马上就要来见你了。”

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情，这时老伯说的“年轻同志”来了，我一看，真的是欲哭无泪，另一个老伯，七十八岁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企业军转干部。

一个执政党，这样苛刻地对待为了这个党浴血奋战的共和国军人，这真让人感到愤怒和悲哀。

让善良的老人伤悲心碎的执政党是没有良心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联系办法：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58：如果我们不能选择如何生，那我们就该选择如何死

前天（2008 年 3 月 20 日），中国工商银行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的维权代表陈冰女士从广西给我电话，谈到两会期间北京当局对工行断友的特别待遇，她说，只要被发现是工行维权“断友”，立即实施抓捕。我也得到一个有待证实的消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对抓捕到工行维权“断友”的警察实行奖励制度。

两会期间，北京的客房爆满。当然几千人的两会代表是不可能让北京的客房如此紧张的。两会代表住的都是大宾馆，而把北京的小客房甚至家庭旅馆都挤爆的是进京上访的维权访民和奉命截访的各省地方官员。

今年的两会，是建国以来奉命截访的各省地方官员进京最多的一次。各省均有数千截访官员进京，一些“问题”大省的截访官员甚至逾万。这些截访官员的进京的目的，除了截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把北京的所有宾馆客房住满，让各地进京访民没地方住。访民们只得住桥洞、睡马路，再或者就是住北京的亲戚熟人家。

那么，为什么访民要到北京呢？温家宝总理在 3 月 18 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不是说“中国是个法制国家”吗？法制国家的人民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却要从全国各地到遥远的北京去上访呢？

中国果真是法制国家吗？我帮助维权的千百万朋友，都是因为无法诉诸法律而转入中国新民党寻求政治对话的。例如，中共下令，所有涉及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等案件，各级法院不得受理。

这无疑在法律上宣告了数千万名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业主的死刑。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彻底失望了，于是就自杀了。以建设银行系统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为例：四川茂县的王国林跳楼自杀了；河北保定的张兰香也跳楼自杀了；陕西西安的李强上吊自杀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民族兄弟门肾革也上吊自杀了；湖南株洲的军嫂陈平就在株洲市分行金融大厦七楼上吊，再摔到楼下，当场死亡! 这样的中国能叫法制国家吗？温家宝总理的法制国家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决心与中共斗争到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串联各地维权人士到北京上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中共宣告：你们在残害人民，你们在危害国家民族。

当然，他们中会有很多人因为到北京上访被暗杀或被集体屠杀，但是，他们也知道，即使不上访，他们最后的结果也与王国林、张兰香、李强、门肾革、陈平等是完全一样的。

目前，全国数千万的维权群体面临的生命状态是：自杀、乞丐、斗争。

自杀和乞丐，是放弃权利的表现。要争取权利，唯一的方式，只有斗争！

在争取民权的斗争中，可能我们会“身先死”，但是我们的壮志一定会“酬”的。

“壮志未酬身先死”，这句话对我们而言，不是懦夫退缩的借口，而是我们的英雄绝唱。

为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中国而死，是值得的；

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主和自由而死，是值得的。

为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而死，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不能选择如何生，那我们就该选择如何死！
不能在尊严中生，那就用战死来获得尊严。
刑场上，面对最后一眼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我们应该想的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59：中国必将实现民主统一：祝贺马英九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2008 年 3 月 22 日 18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特别会议，决议如下：

现在是 2008 年 3 月 22 日 18 时，虽然选票还没有最后统计完毕，但是，马英九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已成定局。这不只是基于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同人的政治判断，更是大陆两岸人民的众望所归。

1949 年，中华民国被迫屈居台湾，但中国国民党励精图治，诚心爱民，最后终于在上世纪末完成了国父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民主义三阶段的最后一段路程，实现宪政，还权于民。

中国民主进步党在促进中华民国民主方面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受到台湾人民的喜爱，并当选为台湾宪政之后的第一、第二届的执政党。

如今中国国民党当选中华民国宪政之后的第三届执政党也是台湾人民的明智选择，中国新民党完全尊重中华民国人民的选择，也完全相信两岸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期间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必须结束两岸隔海分治的状况，两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必须统一。

但是，统一的方式既不能是一国两制，也不能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武力统一，这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之道。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之道，一个统一整体的最佳状态是一阴一阳、阴阳合和、阴阳交相胜。目前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宪政，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最后形成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两党政治。在野党对执政党进行的有效监督，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民主宪政方面做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表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再也不能继续专制下去了。因为，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不答应，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华人不答应！

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中国人民，没有理由继续生活在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下了。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民主统一的努力。

中国新民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道，为在 21 世纪实现大中华的民主统一而努力工作。中国新民党人相信，惟有民主统一，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0：幸福的黄手绢：中国新民党关于人权圣火传入中国的决议

美国小说家皮特·哈米尔有一篇作品叫《幸福的黄手绢》，后来被日本人拍成了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刚出狱的囚犯与一直在北海道等候他的妻子的故事。著名演员高仓健在片中成功地塑造了获释囚犯这一普通人的形象。该片当年在日本和中国等地放映时曾引起热潮。

从此，黄手绢和黄丝带就成为了善良的人民要求幸福的标志。这一标志的出现，本身还表明了，当下正处于一种不幸福的生活状态，有时还不只是不幸福，甚至是被迫害。然而，正是因为不幸福和被迫害，人民才有了对幸福的渴望，于是，人民才会用黄丝带表明自己要求幸福的决心。

当然，决心总是要通过行动表达出来的。2007 年 6 月 1 日，厦门市民为反对生产有毒物质 PX 的生产线落户厦门而爆发了"满城尽戴黄丝带"的人民群众大散步运动。结果，厦门 PX 落马。

现在，人权圣火传入中国了。

2007 年 8 月 9 日，在奥运的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了人权圣火。2007 年 10 月 25 日到达英国伦敦，2008 年 3 月 22 日空投入中国大陆。直到 2008 年 8 月北京奥运开始前，人权圣火将会横跨全球五大洲超过 130 个城市。

人权圣火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人权、反对迫害而设置的世界性人权活动。

人权圣火特别希望能在奥运前，中国实现民主，还权于民。

多年前，中共政权为了赢得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曾向国际奥委会承诺遵守奥运宪章、改善其人权记录、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中国。然而，联合国及国际特赦组织最近的报告中都清楚的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其实是越发恶化。显然，中共当局没有信守承诺。相反，中国的人权状况每天都在恶化。

中国目前的人权问题在以下四个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灾难，一是获取报酬和保障权利，如中共禁止法院受理中国

新民党帮助维权的各类苦难人民的起诉书；二是宗教信仰权利，如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大法弟子；三是民族自治权，如本月发生的西藏问题；四是人民组党并多党竞选的政治权利，如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等地的数以万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犯”。

解决以上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终结独裁，实现民主。世界的全部历史就在昭告世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人民只有生活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下，人民才是幸福的，人民才真正的是国家的主人。否则，就是仆人或奴隶，毫无人权、尊严可言。

2008 年 3 月 21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就人权圣火进入中国召开特别会议，决议如下：中国新民党人完全赞同人权圣火运动的宗旨，即宣传人权、提倡民主、反对迫害、崇尚善良。中国新民党人以网络传播、纸张复印等多种方式进行人权圣火运动的宣传活动。中国新民党人在人权圣火的传递过程中，以左手腕系黄丝带或黄色护腕作为人权圣火运动的标记。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祝愿人权圣火运动在促进中国民主进程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让我们大家早日生活在人权保障的民主中国，让我们的庭前院后，挂满了幸福的黄手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1：心疼与愤怒：这样的中国就是温总理所谓的“法治国家”吗？

范燕琼女士（网名寒星泪）与我是同龄人，但是却比我苦难。近二十年来，她跋涉在遥遥上访路上，至今顽强不屈。2001 年 11 月她因为策划发起筹备成立“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而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出狱后继续从事维权工作。2002 年 10 月 22 日，她又因为帮助身边的穷苦百姓而被逮捕坐牢。在牢里她心血管疾病频繁发作，几次昏厥，双腿瘫痪。出狱后，多方治疗，终于重新站起来，但双腿日夜疼痛，从未间断。

她也比我更坚强，她从地狱中走来，却毫不放弃对独裁专制的批判。2002 年她开始进行社会问题写作，著有《一个无罪女囚触摸过死神的手》、《中国上访人》和《妈妈，您的儿女是罪恶之人》等长篇纪实。

她的报告文学《中国上访人》通过大量苦难的上访材料，指出“中国上访人”是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先驱！“中国上访人”是中国漫长法制进程功不可没的奠基人！“中国上访人”是中共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罪恶累累的见证者！

前天，她跟我联系，她说“我前几天到了南京。原本要来看看你的。可惜当时福建警方在追捕我，我怕连累你，便匆匆走了。”

我忙问，“你怎么了？”

她说：“我在帮助水口库区移民追诉移民款。华东水电站樟湖等各村镇 7 万移民数 10 亿移民款被各级贪官污吏侵吞，我在帮他们追诉。”

听她说完，我不禁黯然神伤。范燕琼女士是演员出身，美丽大方，本该享尽人间荣华，而今柔弱之身、病患之体却与村民们一起挑起了如此承重的担子。

这哪里是法治国家嘛？温总理 3 月 18 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真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感到心虚！

范燕琼女士所说的“水口库区”维权案件，就是华东水电站樟湖等各村镇 7 万移民数 10 亿移民款被各级贪官污吏侵吞案件。

2000 年 4 月，樟湖等各村镇得知自己的移民款被各级贪官污吏侵吞后，移民们开始诉求。不料这个被温总理称为是“法治国家”的法律，却根本不予受理。相反，仅樟湖镇就有 56 位村民遭到当地政府不同程度的迫害（最高获刑 3 年半）。

2006 年 1 月，当最后一名维权村民董昌钦刑满释放后，村民们开始了“第二轮”的集体上访。村民们向南平市政府提出两项诉求：“移民款”和“平反”。在多次要求面见现任市委书记徐谦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向其下级中共南平市延平区委书记张国旺诉求。张国旺书记对村民代表提出的“平反”诉求作出了这样的表态：“除非共产党倒了，你们才有机会。”

此后，陷入极度贫困而缴不起电费的村民与前来拆卸他们电表的电力公司人员进行长达 6 个多小时的围堵。得知此况后的有关部门立刻筹集 600 万资金，以每人 300 元为准下发，这跟他们数十亿移民款相比，犹如杯水车薪。

可有关部门却还要求每个村民在领钱的同时，必须与政府签订一份——将以往一切问题从此一笔勾销的承诺书。

对此，村民们一致表示强烈抗议！村民们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这一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这位好朋友范燕琼女士的肩上了。

真是除了心疼，就是愤怒！心疼她，愤怒专制！

现将水口库区诉求移民款遭中共当局制裁的部分村民名单附后，让全国人民、也让温家宝总理看看，这样的中国就是所谓的“法治国家”吗？

郑瑞英（女，56 岁，判刑 1 年）；

郭兰秀（女，49 岁，判刑 1 年半）；

陈丹妹（女，35 岁，判刑 1 年）；

甘袋太（男，70 岁，判刑 1 年）；陈登银（男，66 岁，判刑 1 年）；

欧延延（男，59 岁，判刑 1 年）；陈登寿（男，50 岁，判刑 1 年）；

胡宗宋（男，49 岁，判刑 1 年）；黄德生（男，42 岁，判刑 1 年）；

廖益林（男，41 岁，判刑 1 年）；廖奕金（男，40 岁，判刑 1 年）；

陈由钦（男，40 岁，判刑 1 年）；杨维石（男，39 岁，判刑 1 年）；

杨道辉（男，37 岁，判刑 1 年）；陈宝金（男，37 岁，判刑 1 年）；

陈友栋（男，30 岁，判刑 1 年）；陈学銮（男，44 岁，判刑 1 年半）；

郑能干（男，42 岁，判刑 1 年 5 个月）；杨良基（男，57 岁，判刑 3 年）；

董喜星（男，44 岁，判刑 3 年）；胡敬雄（男，42 岁，判刑 3 年半）；

陈由平（男，40 岁，判 3 年缓 3 年）；陈学忠（男，33 岁，判 3 年缓 5 年）；

胡松平（男，45 岁，判刑 1 年半）；董春钦（男，44 岁，判刑 3 年半）；

王有亮（男，35 岁，判刑 2 年半）；黄信光（男，53 岁，判刑 3 年半【狱中死亡】）

【注：1、以上为被捕时年龄；2、刑期为一年以下的还有很多，本文略；3、本名单尚未收集齐全】

写完上述文字，偶有一网友上传一文章与我，是于右任先生于满清灭亡前夕发表在《民立报》上的《亡国三恶因》一文，全文百余字。

此文至今已近百年，如今重读，深感当年于右任之远见卓识，确非常人所能及。好在文章不长，现录全文如下，以供人们今古对照。

“亡国恶因有三：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宵小拨弄中，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读罢此文，提笔将题目中“国”字改为“党”字，请温家宝总理阅。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2：不变的中国心：我所认识或了解的海外民运组织及其领袖一览表

2008 年 3 月 6 日我在接受香港《太平洋》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欧阳劲先生的采访时介绍了“四种民运、三种愤青、两种情怀”。其中，“四种民运”“第一种叫铁窗民运，如徐水良先生、任畹町先生、刘晓波先生等；第二种叫文化民运，如余杰先生；第三种叫海外民运，如王军涛先生、伍凡先生；第四种叫维权民运，如我和中国新民党。”

这次访谈的记录编号为《民主先声》148。文章发表出来后，国内很多朋友请我介绍一下海外民运的情况。现就我所掌握的海外民运组织和领袖姓名、电话等情况作一汇报，如下：

魏京生基金会　主席　魏京生 202-277-0809　　　秘书　黄慈萍　202-543-1538；

中国宪政协进会　　主席　王丹、理事长　王军涛（宪政民主论坛　主任）917-288-8348

中国过渡政府、中国事务　总统、主编　伍凡　　626-458-1020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　主席　徐文立　401-2745120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主席　林牧晨　　510-428-2595（家）/510-282-0276（手机）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主席 刘国凯 646-714-4018
《北京之春》 主编 胡 平 718-830-9526
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 主席 刘因全 626-379-2810
民主中国阵线 副主席 盛 雪 905-272-2737
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美西协会 主席 莫逢杰 626-319-8907
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 主席 周 建 312-404-5466
公民力量 主 席 杨建利 857-472-9039
网络文摘 主 编 徐水良 718-760-0281
未来中国论坛 发起人 梅凤杰（草庵居士）310-254-8886
以下各民运组织及其领袖没有公布电话，但大家可以到这些民运组织的官方网站上与他们联系：
自由中国平台 顾问 王有才；民主中国阵綫（民阵） 主席 费良勇
中国民主联盟（中国民联） 主席 薛伟；中国民主联合阵綫（民联阵） 主席 林牧晨
中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 主席 潘晴；新闻自由导报 主编 吴仁华；
奥运自由衫运动 发起人 陈凯；全德（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 主席 彭小明
中国青年民主同盟（法国） 负责人 张健；民主中国促进会（香港） 发起人 甄燊港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旅欧知识分子群代 表 仲维光；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 主席 王 军；
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主席 刘东兴；中国民主党（法国） 主席 吴江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亚洲分团副团长 司徒华
当然，海外民运组织还有很多，但是请相信我，本一览表中所列组织和领袖，均一直在真实、有效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着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上述所列海外民运组织和领袖们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拼搏。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3：中共到底有没有智商：五点一万亿元是造假还是掠夺？

本来的标题是《中共到底有没有政治智慧：五点一万亿元是造假还是掠夺？》，但是想想还是别侮辱了“政治智慧”这四个伟大的汉字，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标题。

看到一个数据资料，说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达五点一万亿元。而二零零七年各级政府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是六百亿元，也就是五点一万亿元的百分之一点一七；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是一百四十亿元，占五点一万亿元的百分之零点二七；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则刚刚超过百分之一。

三件跟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天大的事情”，加起来也不到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三。

那么，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七，到了哪里了呢？

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各级政府造假，要么是中共政府掠夺了本该是属于人民的财富。

我们先看看中共造假的历史。

别的不说，就说《人民日报》吧，这可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了吧，不说要多真实，至少不能是《日人民报》吧。

1958 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了湖北襄阳专区“夏收作物增产一倍已成定局，二十万亩小麦亩产可达千斤”。而根据当时的条件，实际的亩产最多是南方 800 斤，北方 500 斤。

然而，短短 2 个月不到，《人民日报》就正式成为了《日人民报》。

1958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 5 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2105 斤。

6 月 12 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 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 3530 斤。随后，各地陆续放出了小麦亩产“卫星”。

6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 4689 斤。

7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 2 亩小麦创亩产 7320 斤的记录。

7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 2.6 亩早稻试验田亩产 5806 斤。

7 月 25 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 9195 斤。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 10597 斤。

8 月 13 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 36900 斤。

9 月 5 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 1.73 亩中稻亩产 60437 斤。

我收集到的截止 1958 年 9 月 25 日的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 8586

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 130435 斤。

那么，这些伟大的数字背后的粮食呢？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究问一下《日人民报》呢？答案很简单，谁要是究问《日人民报》，中共就会要了谁的命。

现在，我来究问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高达五点一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到哪里去了，我是不怕中共杀我的头的。我的头为中国而断，那将是我的光荣，必将光宗耀祖、流芳百世。汉语中有个很有意思的词叫“笑死”。如果中共因为我帮中国人民而杀了我的话，我真的“笑死了”，哈哈。

好，言归正传，我们来算这五点一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到哪里去了。

据《瞭望》杂志报道，中国二零零四年公款吃喝费用高达三千七百亿元，即使零四至零七的三年里，中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没有增长，那就意味著零七年公款吃喝这一项就是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点二五。而事实上公款吃喝这一项中国政府每年的增长是 25%。也就是说 2007 年财政收入的 10%到 15%被中共官员吃掉了。这还不包括公车私用、公款消费、公款出国旅游、政府豪华大楼、按摩艳情报销等等。

另据资料，二零零四年中国的行政支出是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而美国的同比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就是这样，还有无数的财政收入到了哪里去了呢？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

至 2006 年 12 月底，在大陆区域内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 27310 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 3220 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 2932 人本人就是中共高层的干部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 亿元。其余 24378 位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与中共权力者的各种关系。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 1566 人；浙江省 462 人；上海市 225 人；北京市 195 人；江苏省 172 人；山东省 141 人；福建省 92 人；辽宁省 79 人。

这个数字是2006年的，最新的数字我的调查团队还没有向我汇报，但是从已经到我手的情报看，增加25%以上是没有任何疑议的。

下面，我们要得出结论了。

一边是三项基本公共服务加起来不到百分之三，一边是公款吃喝一项就丢掉至少百分之十，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百分之三十七。

我认为，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高达五点一万亿元财政收入，要么是中共各级官员谎报“基地屁”，要么就是被中共权贵者装入了私人集团的腰包。

如果是前者，那就太弱智了。因为到21世纪了，还想让《日人民报》忽悠中国人民，这实在是白痴政府。政府就是人民的公仆、保姆而已，我的《民主先声》第59篇里写了这个保姆又老又丑，又脏又臭，又凶又恶，应该再加上“很傻很弱智”。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巨贼了。通过这五点一万亿元，政府实现了邪恶的“收入再分配”，把普通公民口袋里的钱“再分配”到了中共政府官员的手里。如今，面对五点一万亿元的税收，政府再也不能狡辩“我们的服务不到位是因为缺乏资金”了。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社会的吗？

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共产的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人民养家糊口的生计费共产到中国共产党的腰包里的吗？

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人素质差，不能搞民主。真是胡说八道！中国人的素质再差，能有中国共产党差吗？

你们为什么怕民主，说白了，就是怕人民有权知道：中国的财政收入究竟上哪去了？

你们为什么怕民主，说白了，就是怕民众更想知道，官员的公款吃喝以及行政支出，有没得到人民的监管？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4：警察与月经：最近我已经收到来自人民的两台电脑了

3 月 16 日，我被警察传唤 12 小时，并抄家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和很多维权文件资料、往来信件便笺，还有很多我打印好的《民主先声》和维权的公开信。我为此写了《民主先声》第 156 篇，希望家里有闲置笔记本电脑的朋友，提供给我继续革命。

结果不断有朋友表示要送我全新的电脑。我说，“二手的就行，没必要全新的”。

不料，这些朋友说，“不，郭教授您为我们吃了苦，我们一定要买全新的送到南京。”

我忙说，“全新的给我，也等于给了中共警察。因为他们大约每月会来找我一次，以抄家扣押我的电脑为名，来窥视我的硬盘数据。”

最近我已经收到来自人民的两台电脑了。一台二手笔记本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深圳朋友快递给我的。另一个台式机，是一个朋友在网络上向我兜售电脑，我们谈好电脑连运费 2990 元，我正要问如何付款，他说“货到付款”。一天晚上，快递公司把电脑送到我家，我发现包装被拆过，而且主机也被人拆开过，硬盘的电源线被拔除。于是我立即上网向他说明了这一情况。没想到，他笑着说，“看来有特殊部门的技术人员检查过给你的电脑，根据本人经营准则，如果客人发现包装或货物有瑕疵，可以拒绝付款。所以，这台电脑郭老师您不需要付费了”。

我当然很清楚他说的特殊部门的技术人员是什么人。他们大约每月来一次要我电脑和这次检查我购买的新电脑，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很关注我的硬盘数据。

我亲切地把他们大约每月来一次找我谈话或抄家，称为“月经”；如果一月来好几次的叫“血崩”，好几个月来一次的叫“月经不调”，当然，以后再也不来的，那就叫“闭经”或“绝经”了。

美国作家欧·亨利先生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叫《警察与赞美诗》，于是我给我的这篇文章取名《警察与月经》。以前我的《民主先声》各媒体在转载的时候可能会修改标题，但是，我恳请大家，这篇文章的题目不要修改，就叫《警察与月经》。

一些已经为我准备了新的或旧的电脑的朋友，就不要再寄送给我了，等警察下次来月经以后，再寄给我。

最近，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外地的朋友来见我，结果约好时间地点，等我赶过去，这个朋友却人间蒸发了。例如，今天（3 月 26 日）上午 11 点左右，一个镇江市的大学男生给我电话，约好 12 点在宁海路 122 号的南京师范大学门口见面，吃饭聊天。不料我在门口傻站到一点也没人来，倒是有几个中共便衣在四周如鬼魅游荡。我给这个镇江男生电话，一直打不通。其实他也就是来南京陪我喝茶吃饭、喝酒聊天，因为思想方面的沟通早就在网络上完成了。

估计现在中共警察的智力还停留在“敌人接头，密谋反党”的弱智时代。于是，中共警察一看有人来找我喝酒，就当成是“敌人接头”，于是蜂拥而上“和谐”走了他。估计，南京之行后，这个镇江的男生就会每月见识一下镇江警察的“月经”了，而且估计在半年之内，镇江警察要血崩了。

对了，我写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歧视妇女的意思，相反，虽然我是位男性，但是我绝对是支持女权的。我一直的信条就是：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根本标志之一！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5：让耕者有其田：从“晋江圈地”谈中国必须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实施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制度化。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农民始终是推动历史变革的诱发力量，究其原由，皆在土地问题。各级官吏不体恤民情，贪脏枉法而饱私囊，地方豪强巧取明夺而贪豪奢，致使耕者失其田而居者无其屋。

如今，中共执政当局与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末年一样，也陷入了“豪强巧取明夺而贪豪奢，致使耕者失其田而居者无其屋”的历史泥潭里。

但是，中共的农民土地政策是在建国前、甚至到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1954 年）颁布之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例如：

1931 年 2 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 ，“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

这个意见在各根据地得到贯彻。

1933 年 6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表布告，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1947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归各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

1949 年 9 月 29 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4 年 9 月 20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可见，新中国所要消灭的，不是土地私有，而是土地剥削；所实行的，不是土地集体公有制，而是土地农户私有制。正是因为毛泽东搞的是土地农户私有制，才彻底调动起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井冈山的红军才能够迅速壮大，解放战争才能够很快胜利。显然，“耕者有其田”，就是土地农户私有制，是最得人心、最革命的政治纲领，是中共成功颠覆中国民国的农民基础。

如果，当时毛泽东实行的不是土地农户私有制，而是土地集体公有制，那么，参加革命和支援前线的农民的人数肯定要大打折扣。或者，如果农民知道将来毛泽东要废除“耕者有其田”，改成土地集体公有制，那么，农民是不会跟毛共闹革命的。

但是，毛共在利用完农民之后，立即废除“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1955 年 7 月，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错误，预言“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1955 年 10 月，高级社的“高潮”开始了。“入社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其中土地是无代价地转归集体，耕畜和大型农具则按照当地的正常价格转为集体。”

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于是，发生了严重的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灾害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 3700 万人，从此中国农业黯然失色。

无独有偶，在 1932-1933 年间，原苏联斯大林政府为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强迫乌克兰农民放弃土地，人为造成严重饥荒，但该事件作为秘密一直被隐瞒多年。2003 年 11 月，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将 11 月 22 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可见，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土地集体公有制都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废除土地农户私有制，推行土地集体公有制，是中共所犯的最大历史错误。这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延误了工业建设，造成了中国几十年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其后果与影响，远比“文化大革命”严重得多得多。

这一罪恶农民土地政策至今越演越烈。

今天，在土地集体公有制下，农民不能“转让”自己耕种的土地，必须先被中共政府“征用”，然后由政府“转让”给开发商，政府和开发商赚大钱，批土地的官员收巨额贿赂，农民只能得到少量的“青苗补偿费”、“房屋拆迁费”。农民不仅没有自己的农田，就连宅基地也是“集体所有”，农民真的成了“无立锥之地”。

下面，我来举例说明中国农民在丧失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后的悲惨景况吧。

本月（2008 年 3 月），被强征土地的福建晋江池店镇清濛村数以千计的、控告无门的农民历时多日徒步来到泉州市政府门前，垒砌锅台，一边沿街煮粥、一边沿街乞讨，他们打出一道巨幅标语——“我们是失地的农民，请路过的行人行行好！”

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

福建省晋江县——这个被誉称为“全国百强明星县（市）、全省第一经济大市（县级）”的富裕县，竟然有 2 万亩土地被圈走，3 万名农民生活无着，买卖土地款项下落不明，而失地的农民还必须上缴“三金”，一个个失地的村庄在躁动不安，农民们不断地为生存拼命呐喊。从 1991 年起，中共晋江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强征土地的不法行为。

本案自发生以来，曾得到过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和副总理温家宝的批示，并且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的广泛披露，可是，这一不法行径不仅没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一片又一片大面积的良田被政府官员大肆非法炒卖！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分子！十几年来，这里的农民从没有停止过对土地、对霸权的抗争！

最早反映这一问题的是晋江深沪镇教师吕孙建和村民吕江波，他们将有关官员自 1991 年以来以“开发”名义将晋江市深沪镇科任村 800 亩良田非法强征这一严重问题反映到了朱鎔基总理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得到了国务院高度重视，并下发了“国办 98－96 号督查”文件，然而，这样的文件下达到晋江市政府手中却犹如一张废纸！

对此，各媒体也在做着与不法官员抗争土地的努力——

1998 年 11 月 28 日，《福建法制报》以开发区“开”而不“发”为题，对科任村 800 亩承包责任田被非法强征的事件予以披露；

1999 年 1 月 28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 30 分》栏目组记者到深沪镇科任村采访时，一名叫潘西林记者被镇政府非法拘禁长大 10 个小时，所拍摄的录像带被抢走；

1999 年 5 月 10 日，《农民日报》群工部以《镇政府强行征地，开发区“开”而不“发”》为题，刊登在内参，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全国人大、中纪委、中央政法委、中办、国办、中组部、中宣部、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农业部、人民银行等部委领导批阅；

然而，中央的督查文件和媒体的监督报道并没能处罚晋江政府官员这一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更不能阻止这些官员疯狂地强征土地的行为！

1999 年 6 月 24 日，晋江市政府官员又以搞“高科技开发区”为名，大肆侵占青阳镇岭山等四个村庄共计 1550 亩良田！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被侵占，农民们竟连一张白条都没能领到！为此，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也在不断地四处奔走投诉，并也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2001 年 4 月 15 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这一严重违法事件：

2001 年 4 月 30 日，《北京法制报》披露了这一严重违法事件；

2001 年 6 月 23 日，《南方周末》也披露了这一严重违法事件；

如此强大的媒体介入，不仅丝毫震慑不住有关政府官员一再非法强征土地的胆量和气魄！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强征强卖！甚至竟对反映问题的农民进行接连不断地打击报复，他们以各种手段残酷迫害上访的农民——

首当其冲的是人民教师吕孙建，他被迫从一名中学校长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去当一个小学教员，经济也同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四十年代就开始参加革命、今年已经七十八岁的老共产党员、青阳镇许厝村老支书许文道，在上访途中被抓，当晚与一个即将枪决的死囚关押在一起，精神倍受摧残；

深沪镇科任村村民吕江波被关押了三十四天，致使其骨髓灰质炎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

东石镇村民蔡绣英被关押 21 天，在狱中，她的手与脚被铁链锁在一起，血肉模糊，使其痛不欲生……

诚然，我无法将所有被迫害的上访农民一一写在这张纸上，我们更无法将腐败的政府官员全都罗列在一份名单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福建晋江的土地和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虐民、反人类的境地了。

更让人愤怒的是，全国各地中共各级政府均是如此。

中国新民党的农村政策是：

1、“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2、“居者有其屋”：保护农民的私人房产权；

3、“均贫富”：全民福利制度（养老、医疗、教育保障等）；

4、“等贵贱”：人民组党自由，多党竞选执政；

5、“均田”：核定均等农民土地份额

6、“免粮”：免除农业税。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6：为维权斗士李盛玉先生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通知

为维权斗士李盛玉先生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救第四号令）

本案案情：

2008 年 3 月 27 日，接到李盛玉先生的儿子（李鑫，17 岁）的电话，说李盛玉先生因帮助沈阳苦难群众维权而被迫害，现被警察带走，已通知行政拘留 15 天。估计会被劳教或劳改。李盛玉先生，男，1958 年生，是沈阳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离婚后带着儿子，虽经济拮据，但顽强拼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常年为其他与他一样苦难的东北人民维权呼喊。

2001 年，李盛玉代理曲仁泰起诉沈阳医药贸易大厦的案件。曲仁泰因使用被告所卖假药患“精神病、二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等三十多疾病”，经中国刑警学院等鉴定患病与使用假药“消疣灵”有因果关系。2006 年 7 月，李盛玉代表 6 户低保户和 4 名残疾人，对沈阳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违法、违规提出行政复议。2006 年 10 月，李盛玉代理宫蕾（女，低保户）自住房动迁补偿款维权案。等等

为了表彰和支持所有因为维护人民的生活权利而被捕入狱或遭遇各类经济、政治迫害的维权英雄们，为了让正在浴血奋战在维权第一线的维权英雄们无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更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投身维权的第一线，中国新民党再次向中华全国各族同胞启动对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请大家接此通知后，将善款（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直接打入李盛玉先生之子李鑫的银行卡中。

中国工行（沈阳南站支行）卡号：6222023301007114415，户名：李鑫，电话：13190000891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程序为：

1、当出现维权人士被中共非法劳教、劳改，或遭遇各类经济、政治迫害，其本人或家属应立即提供维权英雄或其配偶、父母、直系子女的旧有或新办的银行卡号给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

2、由中国新民党统一发布"为维权英雄（某）的募捐一事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3、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打卡金额，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

4、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奋力转发此信息，力争迅速传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权英雄的作为，争取更多的国民救济。

5、维权英雄家属应当根据实际处境，定期告知善款到帐金额。

希望中华全国全体人民都来接济被迫害的人民英雄，让他们的家属得到最好的经济补偿。一人募捐 50 元，1 万人的募捐就是 50 万。2 万人的募捐就是 100 万。

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不仅要得到荣誉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同时，还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奖励。

为中国的民主和幸福而奉献牺牲的人，理应得到来自中国人民的丰厚待遇。

最后，郭泉恳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要阻挠维权英雄家属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来自全国人民的国民救济。如果发生任何阻挠事件，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承担。

附件：国救字号"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启动一览表

1、国救第一号令（李国宏）邮政储蓄卡号：6221886530061797032，户名：皮运霞

2、国救第二号令（赵德富）中国农行卡号：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富

3、国救第三号令（孔强）中国农行卡号：6228481330364939314，户名：孔强

4、国救第四号令（李盛玉）中国工行（沈阳南站支行）：6222023301007114415，李鑫

郭泉：民主先声 167：大转折：3 月 29 日空降警察部队把我从北京押送回南京

3 月 28 日，我陪我母亲到北京去见 93 岁高龄的于光远先生。

我们坐的是 28 日 12 点 36 分从南京站驶出的上海到北京的 D32 次动车组列车。晚上 8 点 50 分到北京站，下榻于事先联系好的离于爷爷家很近的圆元缘商务酒店。办理好所有的入住手续，我在大厅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想，应该是有了尾巴。但是，我却无法确定是南京跟去的尾巴，还是北京新长的尾巴。哈哈，反正都是尾巴。尾巴是人类进化不完全的象征。等到人类社会进化到民主社会，尾巴就会从人的身后消失了。

第二天（3 月 29 日）上午 10 点，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阿姨在一楼大厅等我们，然后我们打车到了于爷爷家。于光远先生坐在轮椅上，非常慈祥。耳朵已经听不清楚了，说话那就更费力了。他看了我很久，吃力地说，"笑寒怎么没来？"笑寒是我妹妹，现为惠普公司安徽地区负责人。原本我母亲通知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阿姨说是女儿笑寒陪同的，结果我妹妹公务繁忙实在脱身不得，只好我做了我妈妈的随从。但是，由于我是临时出任随从副官的，所以，于爷爷并不知道。

我和于光远先生的交流只能是笔谈。他说的最清楚的两句话，一句是"是的"，另一句是"谢谢"。

第一句"是的"，是我们在谈到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否是诗歌，是否可以进行文学批评和评奖的时候，我写到"流行歌曲的歌词，是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他立即清晰地说："是的！"

第二句"谢谢"，是我写道："于爷爷，您和其他前辈对中国在 1978 年以后的解放思想和民主进程方面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正是有了你们前辈的贡献，才有了中共 17 大以后，汪兆钧先生、郑存柱先生和我致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要求民主宪政的举动，为此，我代表汪郑两先生，向您致敬。"他笑着说："谢谢！"

看着他慈祥的笑容，我真想哭。

于光远先生一生坎坷，就是在 1978 年之后的三十年里都一直处在政治颠簸之中。但是他笔耕不辍，已出版 80 余部专著，真可谓著作等身。

于爷爷送给我六本书，并一一签名留念。其中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我爱不释手。装帧大气精美、极具文献价值。于是我就又多要了一本，请于爷爷签上名，我准备送给汪兆钧先生。

中午在于光远先生家吃饭，于爷爷的饭量不小，我注意到他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碗芝麻糊，3 块红烧肉，和 4 调羹的蔬菜。

于光远先生的孙女小非非喊我哥哥，上初一了，周六是她最忙的一天，要上很多课外兴趣班。于爷爷曾经为小非非写过一本书，叫《非非，我的观赏动物》，据说被很多书店放到了宠物书架。哈哈，笑死人了。我要非非送这一本书给我儿子，小非非很认真地在书的扉页上给我儿子郭称义（小名“对对”）写下了一行字：“送给对对小朋友，我经历过的事情，不知你是否也会经历呢”。

一点半，我们告别了于爷爷、孟奶奶还有小非非，离开了于光远先生的家。

我和我妈先去了火车站购买了 30 日晚上回宁的卧铺票，回到我们下榻的圆元缘商务酒店已经 2 点多钟了。

我妈休息后，我就到我的房间给我在北京的一位记者大姐打电话，告诉她我住的酒店的位置。她说她联系北京“四合院文化保护”人士华新民女士一起来看我。这真是太好了。华新民女士的父亲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北京古城的维持设计者，祖上曾经留有“四合院”传到了华新民女士的手里。上周我看到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把我吓得几乎当场晕倒，竟然北京有家房地产公司要拆除故宫，其拆除故宫的目的竟然是“为北京人民服务”。这家房地产公司在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把故宫拆了建设居民住房，可以解决 120 万北京居民的实际居住困难。而且网络上的点击投票显示，有 58%的点击支持拆除故宫。所以，我想和华新民女士对北京正在疯狂拆迁的“老北京四合院”以及“故宫”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给这位记者大姐打过电话后，我想晚上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吃饭的，于是我就用我的客房电话给汪兆钧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汪大哥，我是南京的郭泉，今天我陪我妈来北京看望于光远先生，于先生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我想送给您，您要是方便的话，晚上我们一起吃个便饭，我把书给您。”汪兆钧先生说：“好的，在哪里呢？”我说：“吃饭的地方我还没有定，等定下来，我再跟您联系。”

大约 4 点 40 分，王大姐和华新民女士到达我住的酒店，我说我的房间太小，我们到街上找一家饭店，先聊天，等到快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来接我妈下楼。

于是我们在我住的酒点附近找了一家环境比较幽雅的“大成家快餐店”坐下聊天。我先给汪兆钧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吃饭的地点。我有三个手机，一个是对外公布的号码 13151423196，开通了免费接听服务。另有一个号码是专为呼出用的，当然为了特殊的需要我还可以在街头随时购买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临时电话卡。所以，我一般随身携带三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还是双卡手机。

不料，汪先生说：“我怎么知道您是郭泉呢？请你用你在网络上公开的电话与我联系。”

我不禁笑起来，心想，这个汪大哥真的不是行动派的。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形势的判断不足，第一，当今之世，谁还敢冒充郭泉？第二，只要我用我公布的电话一打给他，南京和北京的所有负责我和汪先生的警察都会紧张地出鼻血。

实在没办法，我知道如果我不用 13151423196 给汪先生打电话，他就不相信是郭泉在邀请他共进晚餐。给汪大哥打过电话以后，我就继续和华新民大姐讨论北京几乎被全部强拆的“四合院”。华大姐给我看了很多“北京四合院”的曾经美丽的照片，现在这些曾经美丽的四合院被拆毁后，原址上建起了高楼大厦。

于是我就在想，这些美丽的北京四合院，历经满清、中华民国、日本入侵、国共内战，都没有被损毁，现在竟然被共产党拆除了。从房子再想到人，中国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在 1949 年前没有被日本人打死，没有被军统中统害死，却在文革期间被共产党害死了。如今，伟大的故宫建筑群屹立了数百年，历经无数战乱，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人想要拆除，如今在 21 世纪中共执政下，却被集权专制者觊觎。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如今，权贵们在惦记全体华人的“故宫”。

为了改善所谓的 120 万北京人的居住条件，而要拆除全体华人的故宫，全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华人都不答应。

和华大姐谈话过程中，我一直在注意门口，我焦急地等待与汪大哥的会晤。可是一直等到 6 点汪先生还没有到。于是，我请记者大姐去接我母亲。大约 6 点 15 分，南京的三位警察出现在饭店门口。我不禁笑起来。因为，我知道我的这期民主先声开始了“大转折”。

因为我一直到六点，都在想如何撰写这期的“民主先声”，如果我到北京，见到了于爷爷，又见到了华新民女士，再见到汪兆钧先生，那我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中共正在往“民主”转折。如果我受阻，那只能说明中

共正在强化专制。我希望是前者，但是不幸是后者。

警察把我带走后，在到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劲松派出所的途中，并没有要求我关机，所以我接到了汪先生的电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现有事情处理了，来了几位南京的朋友，请您等一会。"我想他应该能听懂我的话。不料，过了几分种，汪先生又给我电话，说："郭泉，你怎么能既约了我，又约了别人去做别的事情呢？你这样怎么能做大事呢？"

我倒！看来汪先生从没有被警察同志"骚扰"过，我只好当着警察的面大声说，"是南京警察找我的！"汪先生这才明白。

然后，警察叫我关机。我委托一个警察捎给我妈一张火车票和一千元钱，并请他到我的住处取我的东西，结果，我后来回到南京家里才发现他少带回来一件我的"T 恤"。郁闷，这是我们南师大百年校庆的"T 恤"。

我用警察的手机和我妈妈通了电话，叫她放心，并说，"请我先行离开北京，是两地警察不放心"。

随后，一辆北京公安局的黑色别克商务车把我和南京警察送到北京火车站，换乘江苏（或南京）驻京办事处的另一辆灰色别克商务车直接开到了一辆列车旁。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享受被用汽车直接送上火车的待遇，据说这是部长级待遇，太有趣了。

到火车上，才知道他们是应北京警方的要求，从南京空降到北京的"警察部队"三人小分队。哈哈，很可爱吧。他们有板有眼的程式化运作背后透露着憨憨的可爱和一丝丝无奈。

30 日早 7 点到南京。一路上，我除了吃饭、睡觉、与警察聊天外，还看了一个警匪枪战片，另外还有一部反映纳粹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主体思维在德国确立的全过程记录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的简称，就是纳粹。其实，就是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加社会主义的一个怪胎。我很担心中国会转折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我想，如果中国不走我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话，变成"国家社会主义"那是迟早的事情。

一下火车，立即就有一个南京警察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老熟人了，问好握手，仿佛他们是来迎接公安部领导似的，就差没对我喊："首长好"了。又是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我怀疑公安部装备司是不是和别克公司签定了供货协议。

我们一路开心地到了汉中门派出所。共进早餐后，我们热烈地探讨了一些敏感话题。当然他们认为敏感，而在我看来都是应该让黎民百姓知道的话题，熟读《民主先声》的朋友都知道这些所谓的敏感话题。这次最开心的是，我知道有一位警察仔细、全面阅读了我的《民主先声》和中国新民党的所有文件。

12 点之前，汉中门派出所的一位警官开车送我回家。一到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她说她病了，要我 31 日早 7 点去车站接她。我问她哪里病了？她说不知道，反正就是浑身不舒服，到医院也查不出来。

今天（31 日）早 7 点我准时到南京火车站，我妈妈一脸病容地出现在我面前。不过她一看到我，立即来了精神。到家后，我妈完全康复了。

和我妈聊了一会天，我就溜回我自己的家，写下了这篇《民主先声》（167）。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8：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坚决反对中共把奥运"政治化"

2008 年 3 月 31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特别会议，对即将在中国举办的奥运问题和杨春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问题，展开辩论，最后作出决议。决议要目：

第一、支持中国承办 2008 年夏季奥运会；

第二、坚决反对中共把奥运"政治化"。

决议全文如下：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2008 年由中国承办夏季奥运会是中国的不朽之盛事。其意义不在体育运动本身，而在其精神终于传递到中国。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首先，奥林匹克精神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国和国之间的差异、文化和文化的差异。然后在各差异群体间，

才有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行为。

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可能引发冲突。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就是要形成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可以摆脱各自文化带来的偏见，在不同文化的展示中，看到的不是矛盾与冲突，而是人类社会百花齐放、千姿万态的文化图景，从而使文化差异成为促进人们互相交流的动因，而不是各自封闭的藩篱；使矛盾成为互相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互相轻视的诱因。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才能打破各自狭窄的眼界，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领悟到各个民族都有着神奇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学会尊敬其他民族，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自己，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国际交流真正得以实现。

其次，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竞技运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但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所以，奥林匹克精神传递到中国之后，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落实

第一：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中共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文化和文化的差异。

例如，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差异，有人认为中国承办奥运好，有人认为中国承办奥运不好。这是完全正常的人类思维。任何人都有喜欢体育的自由，也有不喜欢体育的自由；任何人都有喜欢这种体育项目的自由，也有喜欢那种体育项目的自由。

中共目前的政策把奥运这样一个体育比赛“政治化”，认为凡是提出反对奥运的人，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这显然是荒谬的和法西斯的。

日前，杨春林先生与中国黑龙江省富锦地区失地农民代表王桂林、于长武等组织失地农民签名，认为“办奥运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我们主要是依靠财政，而老百姓有的还念不起书、看不起病”、“我们没地种了还看奥运有什么用啊”。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两级分化的阶级国家（无论中共承认不承认，但是人民承认），类似杨春林先生这样的“要人权不要奥运”想法和认识，是有相当社会基础的。要不要奥运，完全是公民的个人的喜好和自由表达。奥运会本身不涉政治，更不涉及“国家政权”，不喜欢奥运在中国举办根本不会导致国家政权遭颠覆。

结果，杨春林先生却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马丁·路德金先生说过：“当我们对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之日，就是我们的生命走向结束之时。”

今天，中国新民党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撤消对杨春林先生的判决，立即放弃把奥运“政治化”的思维；并告戒中国共产党：相信历史总是以极大耐力等待着被屈辱者的胜利，相信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第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奥运是中国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宪政体制的最佳时机。

根据奥运精神，比赛与对抗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公平与公正。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前者是经济政策，后者是政治制度。这两者都贯穿着一根红线，即公平与公正。

公平与公正的经济政策就是“全民福利”；公平与公正的政治制度就是“多党竞选”。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可以实现中国古代人类的大同社会的梦想，即“均贫富”、“等贵贱”。前者“全民福利”就是“均贫富”，后者“多党竞选”就是“等贵贱”。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说“中国国民党腐败”，必须“均贫富”、“等贵贱”，于是中国人民听信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打土豪分田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直至颠覆了中华民国。不料，自从 1949 年到现在，中国人民发现，情况并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前说的那样。如今，两级分化程度超越中华民国时代，政治专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到了再次选择的时代了！

的确，正如中国共产党所说，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各民主党派的选择。但是，1949 年之后，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选择前中共的虚假承诺欺骗了。而且事实上，之后的 59 年，中国人民的各种沉重灾难都是一党专制造成的。

世界上没有一种选择可以管到 59 年。人民有权根据执政党的所作所为进行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选择。

一切反对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行为，都是专制主义的，都是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奥运的所有比赛，其实就是在选择。这个选择的结果就是“最快、最高、最强”。

民主政治的所有选举，也是这一结果。人民有权选择“最有执政能力、最符合民主潮流、最能代言人民”的执政党出来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民期待着可以选择执政党的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英国思想家 Edmund Burke 说过：“邪恶取胜的必要条件就是让好人无动于衷。”

如今，中国人民对邪恶再也不会袖手旁观了。人民奔走相告这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场战役要打，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这场战役就是“为民主中国而战！”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国人民没有理由不享受这些美好的管理思想和执政技术。

对这些思想的渴望，以及在这样的渴望下发出的一切言语，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连马克思都知道“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 卷 94 页），马克思的徒子徒孙怎么会不知道呢？

中国必将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历史终将是中国人民书写的！

伟大的奥运精神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民主中国万岁！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69：伊莲与阿黛尔：《巴黎日报》记者 Emilie Torgemen 对我的采访

3 月 24 日中午，《巴黎日报》记者 Emilie Torgemen 和她的汉语翻译到南京来看我。我领他们到上海路上的长春藤茶馆喝茶、聊天。

Emilie Torgemen 是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姑娘。她站在南京师范大学古色古香的校门旁的一棵大树下等我，让这个被公认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增色不少。

我在南京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时候的第二外语是法语，当时除了上法语课之外，还学了一首法语歌 je m'appelle helene(我的名字是伊莲)。这是一部 20 年前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我一直没有时间看，但是我一见到 Emilie Torgemen，突然感到，这个形象就是我想象中的伊莲。一下子，我的脑海里满满的是 je m'appelle helene(我的名字是伊莲)的旋律。

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叫陶莉莉。

在我认识的众多外国记者里，有三个出色的外国女记者，一个是美国纽约的 New Republic 周刊 Mara（汉名马语琴），一个是英国第一 24 小时新闻频道天空新闻的亚洲制片总监 Eve Johnson 女士（汉名韩莺）、还有一个就是法国《巴黎日报》驻上海记者 Emilie Torgemen（汉名陶莉莉）。我发现，欧洲的女记者起的汉语名字都很中国田园乡土化，例如韩莺、陶莉莉等，美国的马语琴却比较中国都市化。

在走到长春藤的路上，她突然问了她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有名？”

这是标准的法国式提问吗？我笑起来，说：“因为勇敢！”

真的没想到，我们坐下来不久，长春藤的背景音乐里就播放了 je m'appelle helene(我的名字是伊莲)，而且播放了好几遍。这让我想起很多我的大学生活。1996 年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住在七舍 605 室。当时的博士宿舍是三博士居住的，另外两位博士是冯锋教授和侯西安教授。冯博士的专业是科技哲学，侯博士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是中国哲学专业。我们每晚都卧聊很久，聊到自然睡，睡到自然醒。醒来各自去图书馆看书，下午去跑步，晚上下楼吃饭打开水，再带上一瓶二锅头和半斤花生米上来，605 辩论会开始。

哈哈，我们是南京大学的一道风景线。我们是中国的“三剑客”。法国作家大仲马的这篇长篇小说有两个译名，一是《三剑客》，一是《三个火枪手》。我认为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三个火枪手》。因为达达尼昂开始并不是火枪手，直到故事结尾处才加入火枪队，小说是从他接连遇到三个火枪手展开的。《三剑客》属于不太准确的意译。达达尼昂当然不属于三个火枪手之列。这篇小说里的一句话，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思维和行为，那就是 All for one，one for all。

陶莉莉的第二个提问很直接，她问：“我们在海外都知道中国是个党禁的国家，中国新民党为什么没有受到打压？”

我的回答更直接，我说：“这是你们外国人的误解，其实中国法律从来就没有阻止中国人组建政党！”

她吃惊地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她的翻译是个中国留法小伙子。法语不错，但是对政治术语却不熟悉。我的法语也丢光了，所以说到关键的一些政治术语的时候，我只能选用合适的英语单词说给陶莉莉听。

她说：“您的意思，中国不是党禁国家？中国新民党注册了吗？”

我说："中国并没有政党注册法，现行所有法律也都没有对组建政党的禁止条款。对社团有必须登记注册的条款，但是对政党从来没有过要求注册的条款。事实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到国家的有关部门注册过。中国共产党都没法注册，中国新民党如何注册呢？"

这下她更吃惊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我斩钉截铁地说："是的！不信你到中国民政部采访调查。"

陶莉莉的下一个问题是西藏问题。她问："您对最近在西藏发生的事情怎么看？"

我说："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在 3 月 15 日作出了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反对西藏独立，支持西藏民主。我提倡对话，反对对抗。香港回归是谈回来的，不是打回来的；澳门回归也是谈回来的，不是打回来的；如今，胡锦涛主席也认为台海政策是对话而不是对抗，那么根据胡锦涛主席的和谐理论，我们在西藏问题上也应该采用和谈的方式。中国有句俗话叫捆绑不成夫妻，说的就这个道理。"

陶莉莉又问，"您认为西藏真的发生暴乱了吗？"

我回来："对不起，我在没有得到确切的事实真相之前，我无法进行您要的判断。"

她再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您看了吗？"

我立即笑起来："华南虎照片很好拍吧，那么，西藏虎的照片也很好拍。所以，我在没有得到真实的咨讯之前，我无法判断老虎的真假"

这时候，长春藤的背景音乐里再次响起 je m'appelle helene(我的名字是伊莲)。

我对陶莉莉说，"我除了喜欢伊莲外，我还喜欢一个法国女人，她的名字是阿黛尔・雨果。"

陶莉莉很开心地说："是维克多・雨果的女儿。"

我说："是的。这两个法国女人代表了全部的法国浪漫主义。"

于是，我对陶莉莉介绍了我眼中的阿黛尔・雨果。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一个中国人向一个法国人介绍法国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丽的女孩执着地爱着一位英国军官，不远万里追寻他。但他并不爱她。那个女孩，就是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女儿阿黛尔。

阿黛尔从富庶奢华的家中偷偷出走，为了寻找她心爱的庇松中尉来到哈利法克斯。她坚信庇松仍然爱着她，但庇松其实从未认真过。

远涉重洋，女孩来到了心上人所在的地方。她寻找、她跟踪、她给他写信说："没有你，我就不是我自己！"；可是他冷漠、他拒绝、他回答："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可悲在于爱情里一个人深挚地爱着，而另一个人却一点也不了解、不在乎。

阿黛尔把庇松的像放在神龛里，含着泪注视：他是她的一切，但在这一刻，她知道，她的爱、空虚的爱，终于连影子也没有了。

可是，在阿黛尔的生命里，除了爱再无其他了。

老雨果寄给她回程路费，但她拿到钱仍不顾一切地追随庇松去了新的驻地巴巴多岛。在巴巴多岛上，阿黛尔流落黑人区，孩子们欺负她，踩她裙子破损的边缘，而她茫然不知。当庇松得知阿黛尔来了后，他决定去找她，让她离开。

庇松跟随头发蓬乱、面颊苍白、披着破旧的拖地披肩，像幽灵般游走的阿黛尔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犹豫着。但是，这完全不需要了……当他终于站在阿黛尔的面前时，她，阿黛尔，已经不再认识他了。她疯了。

一个黑人把阿黛尔送回了法国。她在圣曼德医院的独立病房里又生活了四十年。美丽、执著的阿黛尔死于 1915 年。时值一战，所以无人在意。

阿黛尔的一句话，我终生不忘，那就是"万水千山、千山万水，能够跟随你到海角天涯，这世上只有我一人！"

这句话里的"你"，在我的生命话语里，是"中国"!

结束采访，和陶莉莉说再见的时候，耳边再次响起 je m'appelle helene。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70：郭教授，您的事业成功后，我就要失业了，但是我还是支持您！

日前，一个在美国工作的网名叫“偶然落泪”的中国女孩子给我电话，说她在美国看到我被中国警察抄家的消息，很难受，于是决定给我汇 100 美圆让我自己去买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

前天，她给我电话，说钱已经汇出来了，汇到中信银行了。她告诉我了密码和她的真实姓名，然后对我说只要我把她的名字、我的名字和密码告诉中信银行就可以取到钱了。

我很好奇会有这样的银行业务。于是感谢之后我问道，我要到中信银行的哪家银行去取呢？

她很干脆地回答，全中国任何一家中信银行。我又问什么时候去取？这下她回答的更干脆，她说：“我在美国汇钱之后 15 分钟，您就可以取。”

天哪，现在的银行业务竟然便捷到如此地步！中美两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竟然 15 分钟就可以取到彼岸的外汇。

昨天下午（4 月 1 日），我抄下她的姓名和密码，带着我的身份证，路过江苏省政府旁边的一个中信银行业务部，下车、进去。我把这个情况对银行大厅的导服小姐一说，她立即说，是“速汇金”业务。

果然，我给出了“偶然落泪”的姓名、密码和我的身份证，立即取到了 100 美圆。

回到家不久，“偶然落泪”给我电话，说：“郭教授，您的事业成功后，我就要失业了，但是我还是支持您！”

我大吃一惊！从来都是百姓们给我电话说如果我的事业成功人民如何幸福，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如果我的事业成功他就会失业。真没想到“偶然落泪”会这样说。

我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她介绍说：“我在一家专门为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每天都有很多中国人申请政治庇护。我看到这些苦难的中国人，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为他们要求离开专制中国而高兴，另一方面我又为中国失掉大批优秀人才感到难过。”

是的，这也是我平时最痛心的事情。我的很多优秀的学生都离国而去，下落不明。他们不只是为了出国去学习，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学的专业，最强的师资队伍在中国而不在外国。例如，中国古代宗教、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等等。这些完全是国内的强项专业，竟然我的很多学生要到美国去读研究生，这真匪夷所思。中国大学已经沦为西方大学的预科班。

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为什么要出国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他说，“我反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因为像您这样的正直学者都受到中共的打压。我们看不下去”我真是无话可说，我真的不希望他们看到我被中共迫害而离开我们可爱的祖国。

“偶然落泪”说：“是的，事实上，中国很多优秀人才，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人士，也根本没有受到明显的政治迫害，他们只是无法忍受中共的独裁专制，而走政治庇护这条途径出国。而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可以帮他们办好一起政治避难的手续。我们律师事务所每月都能赚到十几万美圆。”

最后，她说：“郭教授，我希望你的事业早日成功，这样我们的同胞就不要出国避难了，我们的祖国就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报效国家了。您的事业成功后，我就要失业了，但是我永远支持您！”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71：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台海两岸民主统一的谈判大纲

2008 年 4 月 3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就敦促中国尽快进行台海两岸的民主统一案展开讨论，决议如下：

第一、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十分关注的大事，也是中国新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中国新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与台湾实现民主统一。

台湾所有的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大陆民主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台海两岸政体上完全对立。目前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

中国新民党认为，如果中国不实行民主宪政，台湾就永无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性。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一是除非台湾军队先行攻击大陆，否则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大陆军队在任何情况下的先行攻台军事行为。二是中国新民党坚决不承认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独立出去。但中国新民党会以各种形式与台湾各政党进行友善民主磋商。以期与台湾各党各界人民达成民主统一中国的共识。三是积极与台湾各党各界人民进行政体上的联邦宪政思路的广泛讨论和公投。

第二、由于 1945 年到 1949 年的四年国共内战，中国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中华民国，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治下的一个省份。中国必须是一个“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中国。

两岸的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统一。是一个“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的中国，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上，而不是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之下。

中国新民党认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的中国的名称，可以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的称号，或进行多种名称的人民公投。

第三、“中国执政文化”应从民本思想上升为民主思想。“中华民国经验”应该成为未来一个中国的执政文化的新典范。

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已远远脱离、落后于现代化的西方文明。近百年来，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始终未能建立自由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大陆人民至今仍不能当家作主。

儒家文化主张天下为公，提倡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在本质上有其相互贯通之处。台湾地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汇的枢纽，接受西方现代化文明影响甚早，终于能够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顺利完成创造性转化，从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实现主权在民，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台湾文化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思想的圆融性，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

第四、“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的中国，在经济上主张均富：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即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均贫富”；在政治理念上，主张平等权利：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此即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等贵贱”。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72：清明，我在苏州灵岩山下的林昭墓前

今天（4 月 4 日，周五）早上 5 点，我和家人就早早出发赶往苏州昆山的周庄踏青。

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顺路到苏州灵岩山下的林昭墓前给她磕头。今年，我 40 整，而林昭女士被中共枪杀也整 40 年。

林昭女士 1968 年 4 月 29 日被中共以“现行反革命”罪枪决，8 天之后（5 月 8 日），我降生到这个苦难的神州大地。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会有很多使命，但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为林昭女士复仇。

下午 2 点，我赶赴苏州灵岩山，而此刻八百米外的林昭墓并不寂寞。我到达林昭墓后，发现有很多鲜花和一柄正在闪耀的红烛。一个村妇说刚刚有一群学生才下山。我眺望，果然有一群活泼的孩子在田间跳跃着。

我转身跪下对林昭说：“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来了，所有热爱您的人都来了。”磕头之后，我又跪拜灵岩山神，唱：“青山有幸埋忠骨，绿水无媒娶圣女”。再拜林昭，依依不舍。

林昭和我都是基督徒，这使我比其他人更懂得她的内心世界。基督教与中国民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伟大的基督徒。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民主运动中，基督徒都首当其冲。如今，推动中国新一轮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也以基督徒为多。

下面简要介绍林昭女士生平：

林昭女士，1932 年 12 月 16 日生，苏州人，1949 年 7 月考入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 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期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1954 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 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 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 2 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 年 5 月 19 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 月 22 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1957 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她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

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7 年 12 月 25 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 1500 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 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1958 年 6 月起，林昭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 年 9 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 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

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张春元等人。张春元正在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 年 10 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 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 年 12 月，林昭又被捕入狱。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

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

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中国监狱当局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 年 3 月 23 日，林昭开始写《告人类》。

1965 年 5 月 31 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

1965 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 年 5 月 6 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 36 岁。5 月 1 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 5 分钱子弹费。林昭母亲当即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

1980 年 8 月 22 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 435 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是至今中共也没有为林昭被虐杀而道歉，更别说国家赔偿了。

2004 年 4 月 22 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 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中共封存，不准昭示人民。

今年 4 月 29 日，我相信会有很多热爱民主、热爱林昭的朋友从全国各地赶赴苏州灵岩山祭奠林昭。我也知道我一定会如以往那样在这一天里被限制不许离开南京。

今天是清明，林昭，我给你磕过头了，4 月 29 日就不去看您了，请您不要责怪我。

等中国民主之后，我一定让您的塑像矗立在您的母校北京大学里。您等着！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73：“版权”不能成为阻碍民主传播的障碍

最近，很多海外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朋友来电，询问是否可以刊登我的《民主先声》、中国新民党章程和 14 份公开信；也有很多国内网友问是否可以转载我的文章到他们的空间或博客里；还有很多朋友问是否可以印发、制作成传单发给朋友阅读，对这样的询问，我都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目前之中国，虽然人民皆有要求民主之心，但是对民主的有关知识和实际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国人仍有许多疑问，因此，我们现在还处于民主启蒙时代，只不过，现在的启蒙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一种新阶段的民主启蒙。

无论是什么阶段的民主启蒙，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即传播。民主和专制的对抗，不是武器的对抗，而是双方有效传播的竞赛。所有的社会相互作用，都必须伴随着传播；任何社会过程都是传播过程。也就是说，传播是社会成立、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当我们进行传播的时候，其实就是试图与他人共享咨讯、建立共同的观念和态度的过程。

因此，传播的目的在于接受者的最大程度的接受。这个最大程度，在接受者人数方面，就是需要最大量的接受者；在接受者个人接受度方面，就是力图让接受者完全信服传播者的理论和提供的事实。

专制主义的传播，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对信息源的垄断，二是对信息传播渠道的垄断，三是对民间（或海外）渠道传播的打击。在专制主义控制下民主主义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却是最有挑战性的。因为在民主制度国家，民主主义的传播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且并没有强大的反对民主的力量存在。

因为，从民主主义者的内心成就感来说，在专制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的斗争更有成就感，因为，专制国家里的民主主义者的每一次奋斗和反抗，都在步步逼近民主。一切游戏的乐趣都在走向“答案”，而不是最终获得“答案”。

但是，对民主制度国家来说，民主已经是“答案”了。于是民主国家的民主人士在本国无法获得成就感，开始转向帮助专制国家里的民主人士争取民主了。这就很类似于已经完成游戏的小朋友，很乐意去帮助还没有完成游戏的小朋友。

民主国家的民主人士对专制国家民主人士的帮助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他们可以带来传播媒介，而这个传播媒介，是专制国家的人民看到本国真实情况的唯一窗口。

在非网络时代，专制国家对人民收听外电是作为罪行加以打击的。但是在网络时代，中国 2 亿网民可以使用“破网软件”（自由门、无界）等直接收听收看外网新闻、外电报道以及外埠杂志。收听收看外媒是罪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在专制国家里，如何才能做到民主思想的有效传播呢？

我认为，第一必须方向正确，是以民主对抗专制，而不是一种专制对抗另一种专制；第二必须得到人民认可和需求，即有群众基础；第三必须有超越专制舆论控制的传播媒介。

针对以上第三款，我向全世界宣布，我对一切海外纸质媒体杂志、报纸和网络媒体、国内外朋友的空间或博客，放弃版权，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任何需求任意使用我的所有文章，但是必须署名。但是，我的所有文章在编撰和正式出版书籍（文集）方面享有版权，即任何出版机构不得未经与我协商而非法结集出版我的书籍。

“版权”不能成为阻碍民主传播的障碍。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的定位，不会是别的，而只能是民主启蒙者。最有效地传播民主思想，这是我们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郭泉：民主先声 174：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胡佳是人民英雄，中共却正相反

4 月 5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特别会议，通报了胡佳案的最新情况，并展开讨论，决议要目如下：

一、胡佳是人民英雄，中共却正相反；

二、中共必须立即结束独裁统治，实行“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

三、通令全党向胡佳先生学习。

决议全文如下：

4 月 3 日，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决胡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显然是枉法裁判。本党代主席郭泉先生曾撰文（《民主先声》92）为胡佳先生辩护，称胡佳先生根本无意“颠覆国家政权”，因为胡佳先生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有利于国家政权，即有利于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人民民主。相反，专制独裁者的独裁政治和权贵经济才颠覆了中国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

历史之网，是用善恶两种线交织而成的。善的是胡佳，恶的是专制。

中国新民党认为，从长远来看，人民能作出最好的评判。当然无须评判胡佳，而是评判对胡佳作恶的专制执政

者。来自人民的审判，即将临到专制者头上。

执政者的最大效用在于主持正义，但是如果执政者不是主持正义，却与为人民主持正义的有识之士为敌，那就是与人民为敌了，这样的政府也就丢失了最坚固的支柱：人民。

非正义的政府，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为政府的非正义性，教育了人民必须争取民主。

在正义的事业上，弱者能够打败强者。胡佳先生就是这样的“弱者”。他罹患多种疾病，他的每一种疾病都威胁他的生命，但是，这些疾病都没有专制独裁对人民的威胁大。因为专制独裁者在扼制人民的心灵，心灵的疾病比身体的疾病更危险。

虽然，胡佳先生拖着病体被独裁者戴上桎梏，成为了中共的囚徒，但是，他是胜利者，他在这个久病的国度里，是最健康的人；病入膏肓的则是将胡佳先生身陷囹圄的执政者和对此麻木不仁的看客。

精确地说，做人就是尽责任！现在，胡佳先生为中国人民尽到了责任。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伟大的目标及达到伟大目标的决心。这两样，胡佳先生都有。胡佳先生还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昭告，“爱”是我们解除人生的一切重担和痛苦的根本思维。胡佳爱人民，中共却不！

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苦难和胜利，这就是胡佳的人生！

胡佳，不仅仅属于他的妻子曾金燕女士，也不仅仅属于他年迈的父母和才四个月的女儿。胡佳，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胡佳是全世界一切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朋友。一个人受到了公众的信任，他就被看作了公众的财产。而迫害他的独裁者，正相反。

胡佳被宣布判刑的消息一传出，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因为无论何处的不公正，对于任何地方的公正都是一种威胁。国际主义，正是为了反对人类的共同敌人——专制独裁而形成的。在全人类获得自由之前，无人能完全自由；在全人类都有道德之前，无人能称拥有完全的道德；在全人类获得幸福之前，无人能享受完美的幸福。

中国目前的专制政府根本没有从人类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不按照从历史推论出来的原理去行事。他们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试图扼杀民主的先声。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共必须立即结束独裁统治，实行“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历史留给独裁者的时间不多了，中国人民，准备战斗！

郭泉：民主先声 175：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俞可平先生却不是

最近，仔细阅读了三篇文章，两篇不长，一篇很长。两篇不长的文章分别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和《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作者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俞可平博士；一篇很长的文章是《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

在《民主先声 175》里，我先谈谈读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和《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的感想；读周天勇等先生撰写的《攻坚》感想，将在《民主先声 176》里表述。

俞可平先生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

俞可平先生的以上话语，无疑是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篇文章里，我注意到俞先生反复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这些话本是正确的，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俞先生的这篇不长的文章竟然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诸如此类的“民主的局限性”，这就不得不让我心存警惕。

很快，我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里找到了我警惕的原因了。

当我读到俞先生这篇文章的前几小节的时候，我几乎爱上了这个大我 8 岁的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这几个小节分别是“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浴血争取的结果”、“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的历史潮流”，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几小节，就让我忍俊不禁了。

我一看到“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个小标题，我的大脑里马上就本能地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东西来，于是我忍俊不禁。这是个哲学话题，在我 12 年前读哲学博士的时候，政治学博士一和我们哲学博士谈到哲学问题，就会让我忍俊不禁。果然，12 年后依然如此。其实，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国人民

没有理由不享受这些美好的管理思想和执政技术。

俞先生从所谓的民主的“特殊性”立即武断地得出了“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而否认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于是我含笑读到了我早就猜到的他的结论，他说，西方学者判断民主政治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多党制，二是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三是政府领导人的普选制。但这是西方民主的标准，不是所有民主的标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例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的制衡方面，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重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在选举制度方面，国家领导人不搞全国性普选，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

最后，俞先生还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它的成功需要长期的探索。”

随便俞先生怎么掩盖他的真实意图，我却从他的字里行间实实在在地读出了一句他想表达的话，那就是“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不能被民主掉”。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俞可平先生却不是。

郭泉：民主先声 176：攻坚，到底要攻的是什么坚？我看，就是要攻一党独裁之坚

最近仔细阅读了多达 300 多页的一篇长文《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牵头组织编写的。作者名单还包括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李良栋等 15 人。

下面我先把这些人的主要观点介绍给大家：他们首先肯定了过去 30 年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然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 60 年左右的时间”（1979 年—2040 年），并给出一个完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步走”方案。

这三步是：第一阶段，从 1979 年到 2001 年，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从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到 2020 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十八年的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同时，在中共的领导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子阶段”：2002 年－2010 年，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进行一些国家权力和司法机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2011 年－2016 年，重点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2017 年－2020 年，在前两个阶段培育社会组织和发挥宗教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对社会有益的宗教体系，形成现代的公民社会。2020 年前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特别是通过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

第三阶段，则从 2021 年到 2040 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读完这篇长文，花了我几乎一周的时间。但是最后，我却用了一秒不到的时间，认定周天勇等 15 位教授，都是和俞可平先生一样的可爱。当然，爱他们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人民。

首先我们来看看 15 位教授排名第二的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是怎么说的。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下，改革靠谁来推动，得靠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现行体制下改革得靠既得利益者，我们更多地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因为改革必须得靠手握权力的人去推动”。

在他的思维中，似乎人民就不是改革的推动者。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人民反对既得利益者对人民的剥削才奋起要求民主的。如果人民不要求民主，哪个专制者会主动政改呢？所以，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力量。所以，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从人民的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

针对有人批评这份政改报告是“党主立宪”。王长江教授气愤地说：“搞民主不能抛开现状，从零开始。这不是对党有没有利的问题，关键是对民众有没有利。从零开始，民众不可能得利，党是掌权的党，出了事，最后倒霉的都是民众”。

这简直就是在恐吓人民了！对王长江教授来说，如果搞了多党竞选，就叫从零开始。其实，民主的要旨就是从零开始。所有的党都必须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即没有特权没有优先地接受人民的选举。但是，王长江教授却威胁道：“从零开始，民众不可能得利，党是掌权的党，出了事，最后倒霉的都是民众”，言下之意不言而喻，那就是“从零开

始中国共产党不答应”。那么人民是否答应呢？这个问题，王长江教授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事实上，从零开始，就是要先取消专制独裁，让中共和其他所有的党一起参加竞选。我想，中共对这个竞选结果早就心知肚明，所以，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竞选结果。于是，他们压根儿不想也不许“从零开始”。

如果不从零开始，那从哪里开始呢？最后又走向哪里呢？

人类有三个终极问题，即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

民主也有同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即民主是什么？民主从哪里来？民主往哪里去？

我们先来看看 15 人集团中挂号第一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是怎么说的。

针对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的不同看法，周天勇教授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

从周天勇教授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他对民主的三个终极问题的回答是：民主就是一党专制，民主从一党专制中来，民主往一党专制里去。

周天勇教授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思路，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人大及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形成一个公正和正义的司法体制；改革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构建职能合理、层次清晰、管理科学、规范有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预算公开透明、公众民主参与、社会有机监督的公共财税体制，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三级政府格局；发展民间组织，探索形成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并更大程度上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随便他怎么表述民主的具体指标，但是他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这一所谓的“民主政改”前提，就向世人昭告了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民主。

那么周天勇先生的政改，到底要改掉些什么呢？于是我找到这样一句话：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也就是说，周天勇先生要改革的是中共在执政过程中的不高效、不利于巩固执政地位的政策而已，而根本不是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呢？于是我又找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认为用经济学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有没有风险，有没有不确定性”。

当然，这些操作、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是他在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要周天勇先生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考虑人民在专制下生活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显然是一种奢望。

即使就是这样的完全是在捍卫一党专制的所谓的民主的计划，15 人集团竟然都要搞出 60 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来，这不是想让中国人民都死了这条民主的心吗？

15 人集团，连中国的民主宪政的最大的“坚”就是一党专制都没搞清楚，竟然还好意思把自己的书取名叫《攻坚》！最后，我引用中共早年的一句话来奚落这 15 人集团里的教授和博士们。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27 日社论说：“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郭泉：民主先声 177：今夜无人入眠：可怜的奥运圣火，伟大的胡紫薇女士

胡紫薇女士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知识、最有革命精神的美丽女人。

她能从一个很小的家事出发，去思考伟大祖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问题，这让我感动不已。她的演说只有 2 分钟，但是却注定萦绕在我心头一辈子。她所指出的问题，正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即我们伟大的中国必须向世界人民输出最美好的人类理想和最灿烂的东方文化。

昨晚我一夜没睡，因为我得知 2008 年北京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国受到抵制，特别是在伦敦和巴黎，竟然不得不“改变传递方式”，由街头接力跑，变成了“车载圣火”。

辗转反复到凌晨 2 点，我耳边突然回响起意大利歌剧《图兰朵》里的一段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眠》。《图兰朵》写的是一个中国故事，一个发生在古代燕蓟国的故事。美丽的故事，动听的旋律。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歌曲，她一直陪伴着我的辉煌岁月。而法语歌曲《我叫伊莲》则总是在我徘徊的时

候响起。

《今夜无人入眠》在我一次次获得学位直至成为博士后、在我一次次获得其他各方面重大突破之时，就在我耳边响起；在我的祖国每一次有重大荣耀的时候，她也响起。

最让我激动的一次响起是 2001 年 7 月 13 日。那天的 22 时 15 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世界贸易中心会场庄重宣布：2008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我当时激动地泪流满面，耳边突然响起《今夜无人入眠》，那一夜，我无眠。

但是 2008 年 4 月 7 日夜，当耳边再次响起这个旋律的时候，我知道我注定今夜无眠，我不知道是否全体中国人都“今夜无人入眠”。

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发疯般地寻找一切和 2008 年北京奥运圣火相关的消息，一切都那么糟糕，我们的奥运圣火在各国遭遇人权卫士的抵制。当然，人权卫士抵制的并不是奥运圣火本身，而是承办这次奥运的中国的独裁专制者。上周六（4 月 5 日），1968 年奥运会 200 米短跑铜牌获得者约翰•卡洛思（John Carlos）在美国旧金山人权集会上说：“中国人民是高贵的，有权利、有资格承办 2008 年奥运会；而中共政府没有资格。”1968 年，他在当时的奥运会颁奖仪式上，与队友汤米•史密斯，举起了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并低下了头，以代表争取黑人权利的诉求象征，成为奥运史上著名的一刻。他一直为推动人权事业作努力。

这一夜，我反复看着发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圣火的消息，一遍又一遍，我唏嘘不已。

当我看到一个可爱的法国青年举着一块牌子，笨拙地写着六个汉字：“爱中国，爱自由” 的时候，我泪水流得淅沥哗啦。这是我看到的所有照片中最让我震撼的一张。最后我得出结论：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是一个尊重并不断发展人权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实行各民族大团结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国家，那么全世界人民都会全力支持中国人民承办奥运的。如果这样，2008 年的奥运，就是所有地球人的节日，这一节日的快乐，必将传遍整个宇宙。

天明的时候，我想起了胡紫薇，她在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北京央视的一次关于奥运的隆重庆典上，即兴发表了一个不到 3 分钟的演说，震惊全世界，也彻底折服了我。她在演说的过程中，遭遇数名中共男人官员的围追堵截，试图迫使她退出场面。但是她坚持说完，费时 2 分 58 秒。从此，她成了我的女神！

她说：今天对于奥运频道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明年是奥运的一年，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中国。但是法国的一位外交部长曾经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那么眼前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意义？中国，离一个大国还差得太远了。

她还对试图控制并驱逐她的中共官员大声斥责道：“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儿良知啊？！ 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吗？我只说最后一句话，让我们可以保持风度地对抗。放开我！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儿良知啊？！”

天哪！这样的一位女神让我们所有的男人汗颜！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她的这个简短而伟大的演讲，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如重锤砸在我的心上。她在控诉这个专制独裁的中国，这本该是我们男人的工作，现在却巾帼不让须眉了。

中国的男人们，当奋起！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什么法国外交官说的，而是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的。胡紫薇女士记错了，但是这一点不影响她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2005 年 2 月 23 日的法国《费加罗报》刊登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 • 德斯坦和《回声报》编辑部副主任埃里克 • 伊兹拉莱维奇关于中国发展的长篇对话，题目就叫《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

德斯坦说：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埃里克回答到：确实，中国不大可能输出价值观，它更热衷于捍卫自己的东西。

另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类似的观点，她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2000 年 7 月 19 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Hoover Institution 做了"A Time for Leadership"（领袖的时代）的演讲，有一段专门谈到了中国的崛起，其中最关键的是这一句话 China will not become a superpower to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 at least, not while it is held back by the dead weight of socialism（中国将不会成为一个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至少在它依然背负着死沉的社会主义负担的时候）。

其实，胡紫薇女士是否记清到底是谁说了“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美丽、勇敢、正直的女人用最有效的方式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听到了这句值得深思的话。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国，是人众吗？是地广吗？是钱多吗？不是，绝对不是！

中国只有终结独裁，实现民主，才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儿女的最优秀品质和最灿烂的东方文化。

世界的一切最优秀的科技和管理思想都源于中国或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无耻的专制和邪恶的独裁，使得我们最辉煌的文化变得黯然失色。

中国，只有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才有成为大国的可能性。

专制、独裁，无论多么强大，都是极其卑微和渺小的。

中国需要奥运！中国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的奥运！中国需要全世界一切善良、正直、热爱和平民主的人民支持的奥运！

真正的奥运圣火，必将永不熄灭，因为她在我们每人心中都点燃着，这个圣火，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奥运圣火。

感谢胡紫薇女士，你是中国人的英雄！

你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奥运！

你让我们思考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国！

你更让我们知道了大国崛起的途径不是专制、不是独裁、不是强权、不是迫害，而是民主！

最后，我要对张斌先生 man to man 地说一句：这样美丽、勇敢、正直的女人你都不要，你还是不是男人？英法媒体说各国对中共奥运火炬的抵制，让中共北京蒙羞，而我要对你说的是，你这样虐待胡紫薇女士，让我们所有的男人蒙羞！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78：“老子不比你矮”：说人民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的执政党是最邪恶的党

最近抽空重读了一遍曹征路先生的小说《豆选事件》，读到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很开心，我想现在看我的这篇《民主先声》的朋友也会很开心的。原文如下：

继仁子猛然觉着，国梁原来并不可怕，原来他也怕着自己，继仁子嘿嘿地笑了。他简直想象不出，自家五大三粗一条汉子凭么子要怕这瘦精精的东西呢？这东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凭么事骑在自家头上屙屎撒尿呢？他完全想不通！他大声说：走吧，滚吧，你有多远滚多远！你喊老子当代表，老子今个就当一回真代表。哎，老子不选你了，老子要弹……弹你妈的了。哎。从前活矮了，今个老子站起来了，老子不比你矮！继仁子喊着，吼着，跳着，心里一热，眼睛水喷了一脸，他不擦，还喊，还吼，还跳……

乱了，全乱了，主席团宣布暂时休会了，继仁子还不能住嘴，他有一肚子话，一肚子心思，一肚子打算。他想着，该给姆妈的坟修一下了，该把鸡舍扩大了，该对菊子去讲一句实话，其实他想伢都想疯掉了。

这是农民弟兄方继仁在乡人大会议上的一次演说。我读到这里，简直笑翻了。特别是方继仁说到要“弹劾”副乡长方国梁的时候，不知道弹劾的“劾”字怎么读，就干脆说：“老子不选你了，老子要弹……弹你妈的了。”

当然最让我感动的是，人民终于喊出了“老子不比你矮”的伟大心声，其实，这不比“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差。我觉得前者更实在，后者那是毛泽东忽悠人民的话而已。

我对曹征路《豆选事件》这篇小说的篇名里的“豆选”是非常熟悉的。

我以前除了研究国学、政治、宗教、古筝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研究，那就是民歌，特别是对晋陕民歌非常熟悉。我还做过很多民歌讲座、给研究生演唱过民歌，另外还开过民歌的博客和论坛，只可惜这些都在我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立即终止独裁之后，被中共当做“毒草”给“和谐”掉了。

有一首陕北民歌是这样唱的“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这就是在唱“豆选”。 在延安“豆选”让陕甘宁边区人民亲身感受民主的芳香，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时的农民几乎都不识字，于是就自发创造选举的“豆选法”，即在候选人演说之后，让候选人背对选民。每人背后放一个蓝瓷大海碗或一个箩筐，选民们每人手里一个豆子（黄豆、蚕豆、绿豆）向粗瓷海碗或箩筐里放，最后豆子多的获选，豆子少的落选。

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 1937 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 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 1941 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 25175 人，参加选举的为 20223 人，占 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 3505 人，参加选举的为 2961 人，占 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80%以上。这些数据请参阅宋金寿先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7、

243-244 页）。

其实，当时除了“豆选”，还有“红绿票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举胳臂等。其实选举的关键不在于选举的技术问题，而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

我每次读到这些 70 多年前的资料，再想到现在中共认为“人民素质差不能民选”的混帐话，就感到强烈地愤怒。

日前，我的博士后师弟王洪岳教授来南京看我，他现在是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对我说：“你是对的！选举是人类的本能”。他还举了他山东老家的一个村长选举的例子，他说，连 80 多岁的老太都强烈要求子女用小推车把自己推到选举现场投票。

既然上个世纪 30、40 年代的不识字的西北农民都能想出“豆选”的办法选择自己的政治“心上人”；既然本世纪的 80 岁农村老太都能要孩子用小推车推去投票，那么，为什么中共要说中国人民素质低，不能搞选举呢？

很显然，中共是怕自己身后的“豆子”少！

那么，中共现在的执政党位置是怎么来的呢？也很显然，是 1949 年的“豆选”的结果。

那么，1949 年，中共身后的“豆子”怎么会多起来的呢？

从我 1993 年在南京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时候，我就在寻找这个答案，最后，在 2001 年我读完“博士后”，我终于找到答案了，那就是中共身后的豆子是用“政治诈骗”的手段骗来的。

诈骗，根据目的不同可以略分为三，一是爱情诈骗、一是经济诈骗、还有一个是政治诈骗。这三种诈骗虽然目的不一样，但是手段其实都一样，即“虚构事实，骗取信任”。

下面我举几个中共在 1949 年前对人民“政治诈骗”的铁证：

1945 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民主人士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个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人。这就是著名的“民主是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的法宝”的“窑洞对”，当然这和历史上的“隆中对”是根本不能比的，因为以后的事实证明“窑洞对”是一场“政治诈骗”。

我们再看一个中共对人民实施“政治诈骗”的铁证：

1944 年 2 月 2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

社论还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

社论甚至还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我以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连我都差点“中招”了，如果我活在 1949，我手里的“豆子”一定会被中共骗到他的“大海碗”里去的，就更别说善良、正直、苦难的中国人民了。

如果大家再看到下面这个证据，我想所有中国人的“豆子”都会被中共骗走的：

1945 年 9 月 27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21 世纪了，中国人民的素质果真差到连自己的政治“心上人”都没素质选了吗？

我劝中共，你们不要把人民想成和你们一样的都是白痴。延安时期，不识字的农民就能自发进行“豆选”，难道今日中国民智的水平还不及当日吗？

你们以为你们不让中国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道路，你们就能有“豆子”了吗？我负责地对中共说，如果中共现在搞民主政改，或许还会得到一些豆子，如果不改，你们一颗豆子都别想，甚至，你们连背后放“蓝瓷大海碗”的机会都没有，就更别说豆子了。

郭泉：民主先声 179：请您别担心我，我们都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和中华民族！

今天（ 4 月 9 日），傍晚六时我下楼，突然发现有两个中共特务跟踪，一人站在我家楼下的传达室，另一人开摩托车。我骑车出门，那摩托车一直跟着我。摩托车陪我转了一圈，又跟我回来了。现在我到家了，不知道今晚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我立即打开电脑，给我所有在线的朋友发了一个通知，请大家在晚上 11 点看我在不在线，如果不在线，就给我电话，如果关机或不是我接的，那就是我又被中共警察请走了。

网友“自由的雨”立即说：郭教授，我担心您。

我回答：请您别担心我，您应该担心中国和中华民族！

其实，目前的中国真的让人太揪心。一个伟大的国家，被一小撮独裁者蛮横地把持着，不让人民当家作主，不给人民伸张正义，还不让人民说话。

国已不国，家何以家？

我的家在美丽的南京秦淮河边，得空就常在秦淮河边徜徉，走过那伤心的桃叶渡，看着悲情的石头城，最让我想起的是李香君。

李香君是秦淮八艳之一，余怀的《板桥杂记》说她“身躯娇小，肤埋玉色，慧俊婉转，调笑无双……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以为荣。”

她自小被贩入青楼，但深明大义、嫉恶如仇、不畏强权、不慕富贵、不贪钱财。她做出了《却奁》、《拒婚》、《骂筵》三件事情，足以让当代人汗颜。

她不爱财主官僚，却爱上了义气书生侯方域。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合称明复社四公子，又与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文章三大家，才华横溢。

国破之后，她所爱的候方域投清变节，她于是唱着那首让人潸然泪下的“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留下一柄桃花扇，恹恹投入冰冷的秦淮河水里。

关于李香君之死历史上有三种说法，但是我只相信这一种，因为每次我抚摸秦淮河水都能感知香君的爱国之情。

我母亲姓顾，虽为泰州人氏，但祖籍苏州昆山，是顾炎武的家族后辈。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后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段文字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上对顾炎武的“亡国”和“亡天下”的理解诸说纷纭，莫一而衷。而我认为这个“天下”特指华夏风俗文化。亡国只是朝代更迭而已，而亡风俗文化却使一个民族万劫不复。

顾炎武《文集》四里的《与人书九》这样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据我考证，清军于 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此后，汉人苦于明宦压榨久矣，只盼换王治理，故并无甚力抵抗。然而，1645 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文书里公然写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中国自古有“衣冠古国”的美誉，蓄发、衣冠为中国文化的外在象征。“五胡乱华”时代，汉人大规模南渡撤退，史称“衣冠南渡”。所以，汉人发现清人不只是要换王而治，甚至还要换文化的时候，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开始全力抵抗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都与“剃发易服”有直接关系。当然，在强权下，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

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例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最后，王国维竟然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投湖殉清，为清朝尽节、殉节。

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极坏。

所以，顾炎武认为"亡天下"比"亡国"要糟糕。

今天，我们先看看中国宪法里的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里的第二条"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国，我们的天下，到底是谁的？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天下，还是德国马克思文化的天下？ 如今，我们中国人活在自己的国土，却要被宪法规定去坚持什么"德马"。

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经济、管理的一种学术研究未尝不可，但是把它作为全体中国人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正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中国的宪法不让中国人坚持中国文化，却强迫中国人去坚持连外邦都唾弃并在中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德马文化"，这不是"亡天下"是什么呢？

中国，您危险了！

中华民族这才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

我死不可惜，可惜的是美丽的祖国竟在 21 世纪还遭专制蹂躏；

我死不可惜，可惜的是勤劳勇敢的中华优秀儿女竟被独裁者玩于掌中。

顾炎武除了捍卫汉文化外，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

多么好的文化啊！多么好的思想啊！可惜，中共领导人不懂！

胡佳因为写五篇批评中共独裁的文章就被中共判刑三年半。"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可惜，中共领导人不懂。

刚才，民主人士曾庆彬先生给我发来短信，一来探勘我是否安全，二来激励我勇敢前行。

他的短信是梁启超先生的诗《自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我立即回诗一首，是顾炎武先生的《精卫》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2008 年 4 月 10 日 1 时 53 分，此文完成，尚安全。

郭泉：民主先声 180：感谢奥运火炬，中共当局终于知道自己的形象不好了

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希望找一家公关公司，协助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修复中国的形象。

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开心，因为中共当局终于知道自己的形象不好了。另外一个让我高兴的是，我在 1996 年提出的要建立"社会冲突中政府公关的安全阀机制"的设想，终于在长达 12 年后的 2008 年，被中共当局意识到了。

1996 年 9 月，我在《公关世界》（1996 年 09 期）上发表论文《论社会冲突中政府公关的安全阀机制》，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激化，有的矛盾已形成冲突，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冲突的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概念"群体不满意识"，即社会冲突起因于一种认为"现存系统不公正"的"群体不满意识"，并给出了对策。

很可惜，12 年来中共当局对我的这一"社会冲突中政府公关的安全阀机制"的设计置若罔闻。如果中共当局在 1996 年采纳我的这一设计的话，我想，中共当局不会在今日遭遇如此的败局。

时值今日，中共找一家或几家公关公司，能否"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修复中国的形象"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中国的形象并不需要修复，要修复的是中共的形象。中共和中国是两个概念。这点连外国朋友都知道，我举两个外国朋友的爱中国而不爱中共的例子：

一是 4 月 7 日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遭遇世界人权组织的大规模抵制，一个可爱的法国青年打出的汉字标语是"爱中国、爱自由"。另一个例子是 4 月 5 日的美国旧金山人权集会上，1968 年奥运会 200 米短跑铜牌获得者约

翰•卡洛思（John Carlos）说："中国人民是高贵的，有权利、有资格承办2008年奥运会；而中共政府没有资格。"

但是中共却一直在中共和中国的问题上忽悠中国人民。其实，任何执政党执政，中国都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不以任何执政党的存在与否为转移。

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中共要想修复形象，还要知道中共现在到底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调查显示，中共目前的形象是：1、独裁；2、腐败；3、冷酷；4、暴力；5、弱智。

当然中共也许不答应，不过中共从来不说自己不答应，而总是喜欢说是"人民不答应"。好，那么，搞一个公投，看看，人民心目中的中共是不是这五大形象呢。看看到底人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那么政府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呢？首先，各级政府首脑必须是人民依法选举的结果，向人民负责。各级政府其他官员由政府首脑聘用，向政府首脑负责。其次，政府的工作原则是一切为了公众利益。其具体指标是：1、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2、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对待公众，对公众负责；3、从公众的立场考虑问题；4、接受人民的监督、质询和弹劾。

归纳如下，政府的形象应该是：1、民主；2、清廉；3、热情；4、温和；5、智慧。

其实，所有的政府只有两种形象，第一是独裁，第二是民主。

独裁的政府，必然带来腐败、冷酷、暴力、弱智的形象；而民主的政府必然导向清廉、热情、温和、智慧。

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至今为人景仰，此林肯在演讲中提出的政府执政原则已成当代政府的理想典范。这个原则其实蕴涵了一个重要的公关话题，那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该保持怎么样的关系？答案已经很明确，即林肯先生提出的"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那么，政府如何改善政府形象、处理危机事件，赢得公众信任呢？这就需要政府公关。　那么，什么叫"政府公关"呢？

政府公关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行政功能：

1、它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接受和合作；

2、负责解决和处理各种公众问题；

3、对公众舆论不断了解和及时做出反应；

4、强调和认定以公众利益为核心的政府行政责任；

5、使政府行政活动与有效利用各种变化保持一致；

6、确立政府危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利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政府公关发生作用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民主"。

而民主政府，则需要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开放"报禁"和"党禁"。

开放"报禁"，就是让人民有权力自办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播发事实真相。"公共关系之父"艾维 • 李于1906年的《原则宣言》中鲜明地提出，"讲真话"是现代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开放"党禁"，就是让人民根据各自的不同政治见解组建政党，参与竞选，获得执政地位，在任期内施展政治抱负。

就目前中共的实际执政状况看，必须走先开放"报禁"和"党禁"的这一民主必经之路，才能最终实现民主。

实现民主，这需要时间，我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同人对此都能理解，但是，必须立即开放"报禁"和"党禁"。没有这两个条件，政府公关根本是无法实行的。

不开放"报禁"，就不能"说真话"；

不开放"党禁"，就没有"说真话的人"。

执政者不说真话，同时又没有"说真话"的在野党，那么所谓的公共关系不是"公共忽悠"是什么呢？

20世纪的"公共忽悠"能忽悠到人民，21世纪的人民能这么简单地被忽悠到吗？

也许中共当局会很生气我说他们在"忽悠人民"。好，我不说你们"忽悠"，我现在要你们兑现你们以前对人民的承诺：

请中共当局仔细看好：

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社论："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中共《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报导，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的提问时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

缺乏民主。……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周恩来说：“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如果中共当局兑现了 60 年前的承诺，我想，中共还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的，奥运火炬也是能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的。但是如果中共继续忽悠人民的话，那么“苏共”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81：好人须群，君子必党：介绍我的 18 位同党的经济、政治和法学思想

最近在听达明一派的歌，其中一首歌叫《同党》很吸引我，是陈少琪先生写的词。陈少琪我很熟悉，他是香港人，1982 年毕业于观塘玛利诺书院。八十年代曾长时期与达明一派合作，之后经黎小田介绍为梅艳芳写了不少词，经典作品为《夕阳之歌》。之后他转与张学友合作，筹备《雪狼湖》音乐剧。去年，他写了一首诗《始终有你》成为了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主题歌。

《同党》里并没有介绍什么才能称得上“同党”，但是陈少琪先生却写出了什么不是“同党”。这样的写法，其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明确地表述过共产主义是什么，但是马克思却指出共产主义反对什么。马克思说：“我们所称的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制度的现实运动”。于是我们就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了。

陈少琪先生在《同党》里写道：

同党不是昨天和你一起高呼吹东边的风，而今天他又吹起了西风的人；

同党不是昨天和你讲有情有义，今天又假装不认识你的人；

同党不是昨日和你说愿一起担当，今天却又躲避你而飞奔远岸的人。

其实，“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不是一个好词，但是“群”却是一个中性词。例如，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那么，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群”是中性词而“党”不是一个好词呢？因为，群是指聚集，因恶而聚即为恶，因善而集是为善。而党，却是因一固定之利益而聚集的群体，是故，孔子认为，“党”是非君子所为。

至于后人有言“好人不群、君子不党”之语，则谬矣。好人不群，则成群狼口中之羔羊；君子不党，即是奸党掌中之玩物。

所以，好人须群，君子必党。只是此“党”乃因真理而聚集之义士，非为本党之稻梁所谋。

同党之人，非谓固定章程之会众，亦可相同思想之神交。

现列出我与其思想神交之 18 位同党经济、政治和法学思想如下，以飨笔友、读者：

1、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思想：　中共“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

2、于光远（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主要思想：“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我们非常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

3、李慎之（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主要思想；“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而到了叶利钦上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

4、何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思想：“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为何现在还体现不出来呢？”

5、王蒙（著名作家、文化部前部长），主要思想：“20 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

6、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主要思想：“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

7、李君如（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理论家），主要思想：“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二次”、我们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

8、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主要思想：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

9、朱厚泽（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原部长），主要思想：“争取自由的呼唤始终回荡在因不自由而历经痛苦的千万人中间。”

10、钟伟志（资深记者），主要思想：“我们的社会应该从一个‘革命’的社会转变到一个以成熟方式处理矛盾的社会。”

11、任仲夷（已故，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主要思想：中国应建立西方国家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

12、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思想：“‘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

13、邓伍文（江苏电视台记者），主要思想：“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

14、李锐（中组部原常委副部长），主要思想：“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

15、王珏（中央党校教授），主要思想：“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有企业的天下。”因此，“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

16、张寒松（经济学家），主要思想：“我认为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

17、张贤亮（宁夏文联主席、著名作家），主要思想：“咒语必须由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

18、周瑞金（笔名皇甫平，《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主要思想：“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当然，以上所列诸君思想也许是一面之辞，而另一面未必是别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也许他们自己有其他的思想反对此文中所列之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也说不定。

但是至少，上面所列诸君思想，与我是同党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82：与邓伍文先生、景凯旋先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料分析问题

昨天（4 月 13 日），我与在南京的邓伍文先生、景凯旋先生等同志小聚，席间，谈到“西安事变”，甚欢。

邓伍文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目前供职于江苏电视台，邓先生有一言必将传世，“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

景凯旋先生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前才有一文问世，得世人瞩目，即南方都市报发表之檄文《民主政治成熟需要六十年？》。景先生所言“民主从来不会造成社会的安全问题”，相反专制才是中国动乱的本源，此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余诸君恕我不一一介绍。

席间诸君新闻界、史学界朋友较多，所以必然谈到对史料的收集、披露和分析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谈到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时候，我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划的，目的并不只是逼蒋抗日，而是逼蒋不剿共。因为从事后的事实看，蒋公一直在焦土抗战，而中共却始终在保存势力”。

不料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邓伍文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他还特别是西安事变史的专家。于是，邓伍文先生对大家介绍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事实。

现将我收集整理的西安事变“不为人知”的史料提供给大家。目的在于告诫中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忽悠人民！

目前中国当局所修之西安事变史，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自行”发动的，中共并不知情。例如，中共党史这样定义西安事变，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蒋介石答应抗日要求，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推动并实现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转变。

最近发现的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部准尉司书、一等录事汤宝田的日记里也有张学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下午六时，张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两周之后，1936 年 12 月 25 日，汤宝田的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叙张学良：“下午 4 时，张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另外， 1989 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以上所列三个文件，一是共产党说不知情，二是东北军录事文稿说张自言“好汉做事好汉当”，三是张学良本人事后陈述，皆说张学良之西安兵谏与中共无关。

那么，“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呢？

张学良在 1936 年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我列举两个史料，供大家思考：

一是，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中。这份文献是 1936 年 8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到：“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中共）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也许大家要说，这样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表示担忧的电报不能证明张学良的身份，好，那我再提供一份文件。我们还发现了一封 1936 年夏天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将周恩来、甚至刘鼎(共产党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均称为“同志”。

另，张学良在 1936 年 6 月底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申请入党。6 月 30 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出同意决定。因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领导，7 月 2 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遭遇共产国际否决后，中共中央不顾共产国际否决意见，决定其为中共党员。

我们再来看看 1936 年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接触的中共人员到底有哪些？

第一、李克农，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

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张学良的剿共部队，李克农奉命联张反蒋。李克农决定从一个特殊的战俘为突破点策反张学良。这个人就是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的团长。经李克农工作，高福源表示愿回去做张学良工作。临行前，李克农向高作了交代，要高不可泄露受中共派遣，先用个人身份试探张的态度，如果张有意，红军即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见张后，张表示愿意谈判。高随即重返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李克农一行四人 1936 年 2 月 21 日从瓦窑堡出发去洛川与张会见。1936 年 3 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到西安张学良驻地。3 月 20 日，刘鼎和张学良第一次接头，此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第二、周恩来。1936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东北军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国共

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5 月 12 日，周恩来再次赶到肤施和张学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第三、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 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共。1926 年赴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军工技术与理论。1929 年秘密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科长为陈赓）。4 月 10 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 4 月 26 日返回洛川，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此后，刘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中共中央。

1936 年 6 月底，张学良渐渐萌发了加入中共的念头，他通过刘鼎向中共提出了加入中共的申请。中共对张学良的政治要求极为欢迎，中共在电报中称张学良为"同志"，张学良也在信中称周恩来为"同志"。7 月初，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曾就此事请示共产国际，并表示"拟许其入党"，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后中共中央一再争取未果，这样，张学良成为了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中共党员"同志"了。

成为"同志"以后，刘鼎和张学良抓紧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 15 名志愿入会者于 9 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 70 多人，形成骨干。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请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刘鼎即代张学良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

但是，14 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并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从斯大林的这个电报里，可以看出中共当时的思维遭到了苏联的猛烈批判。

一时间，中共从兴奋中冷却到了极点。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即"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即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不再剿共"。同时，中共担心蒋介石失约，还派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释蒋必须在和谈协议上签字的指示。

但是，蒋介石拒绝签字。对张学良来说，他所肩负的劝蒋、逼蒋联共抗日的使命已经完成，西安事变的初衷已经达到。他认为蒋介石这种"中国式"的妥协已经足够，如果再纠缠签字之类的保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破坏和谈气氛，甚至引起内战这样的不良后果。遂决定 25 日下午亲自送蒋返京。

事后，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最后，我再交代一个史料，1993 年 4 月，张学良将自己培育多年的"爱国号"兰花托人转交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窃以为张将军是在表其"爱党"之心。2001 年 10 月 15 日，张学良溘然长逝。

不知道我提供的这段历史何时才能被中共写进党史。但是我知道，如果中共继续这样不喜欢"说真话"，那么谎言仍将继续。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83：中共的民族政策：49 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 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本人在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期间潜心研究民族和民俗问题多年，特别对中共民族政策颇有心得，后攻读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后，无暇继续研究民族和民俗问题，现将部分“中共民族政策”研究成果公布，供大家批评研究查阅引用。

1921 年，中共为了能有效地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在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让各民族从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中独立出去的“民族自决”政策。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这个宣言里就明确的说：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

1922 年 7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宣言中说：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

1925 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赞成外蒙古独立，赞成苏联派军队驻扎在外蒙古。

1928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大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我上面列举的中共党史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决。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政策下，中共是如何具体运用的。

1928 年以后，共产国际要求原来被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共产党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 45 号一家照像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个纲领叫“三大主张”：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这是台独的第一份政党文件。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天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此“宪法”1934 年正式颁布）。

中共的这一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中共被迫长征之后，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 3 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中共一路上鼓励各族人民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政权。

在这种“民族自决”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政权。

1935 年 11 月 8 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

1936 年 5 月 5 日，波巴人民共和国（藏语译音，意“藏族”）在甘孜县宣告成立。

我收集到了红四方面军在 1936 年 5 月 5 日关于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表的宣言：

“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摘自红四方面军：“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1945 年，毛泽东在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

1949 年，一切发生了变化。

1949 年 1 月 8 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Henderson ）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

这一情报被共产国际获悉。斯大林认为西藏独立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注：俄国图谋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当时以“商务往来”为名，刺探军事情报并了解当地物产；然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然后再运用军事手段，“加以占领”。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俄国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不断变本加厉，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达到顶峰）。

1949 年 1 月，斯大林秘密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传达斯大林的重要指示。2 月 1 日至 3 日三天，米高扬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是师哲。

2 月 4 日，米高扬用电报向莫斯科汇报了自己向毛泽东转达的斯大林对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并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

1949 年 7 月 8 日，西藏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 7 月 11 日、17 日、20 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当日的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来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这一情况再次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此时他已经断定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背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斯大林立即指示中共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

1949 年 9 月 3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逼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

9 月 7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1949 年 10 月，中共夺取政权。斯大林立即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商谈“一系列问题”，随后 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电报中特别申明：“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

另外，我还特别注意到，此电报还特意落款为“一月二日上午四时”，而同时代的其余电报只落款月日从未落款到“时”，可见，此电报之重要，且毛泽东等人在苏联一夜未眠。

17 天后，1950 年 1 月 20 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独立”。

此年，距中共一大（1921 年）提出“民族自决”政策惟 29 年矣。

2000 年 3 月 22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宗淮大使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民族自决为幌子公然鼓吹分裂主权国家的活动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坚决反对”。

是年，离中共一大（1921 年）提出“民族自决”政策惟 79 年矣。

郭泉：民主先声 184：接受韩国 KBS 采访：中国的民主主义就是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

昨天下午（4 月 14 日），韩国 KBS 三名记者来南京采访我。访谈记者是金大宏先生，摄影记者是金民秀先生，翻译是金明玉小姐。

韩国 KBS 是韩国的国家电视台，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是韩国最大的国营电视台。共有两个频道：

KBS-1 以新闻为主，每当重要事件发生时，韩国人不论在国内或世界其他地方，都会及时收听或收看 KBS 的新闻节目。KBS 通过可信而公正的报道赢得了全体韩国人民的青睐。

KBS-2 侧重于娱乐及综合节目，制作的电视剧中，大陆观众比较熟悉的代表作有：《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夏日香气》、《豪杰春香》、《新娘十八岁》等。

来采访我的是韩国 KBS-1 新闻频道的采访小组。我们在美丽的南师大的“德风园”池塘边坐下。

我一看到访谈记者的名片上的韩国名字“金大宏”，我就笑起来，我说，中国人都知道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他一生因为争取民主，受尽折磨。1997 年 12 月 18 日他赢得选举。1998 年 2 月 25 日就任韩国总统，2000 年获得当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金大宏先生幽默地说：“恩，他是我兄弟，只是太久没联系了。”于是我们都笑起来。

金大宏先生说，郭教授，我们了解到您以前研究过韩国佛教，您对韩国应该很熟悉吧。

我笑着说，我研究的是韩国新罗时期（相当于中国唐代），对韩国的古代很熟悉。韩国古代完全使用汉字和汉语，所以我研究韩国佛教根本无须学习韩语。我曾经在不同时期学过两学期韩语，但是都没坚持下来，所以，现在只能简单的韩语对话。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用一句话说说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差别是什么？”

我回答：“中国新民党的经济政治主张真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治特征却是权贵经济条件下的独裁专制，这与中国新民党完全相反。”

金大宏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中国目前很多人民生活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回答：“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问题，即中共执政当局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搞独裁垄断。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垄断专权。”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新民党在现实生活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我回答：“中国没有在野党，于是就没有权力制衡。中国新民党是来自人民的党，我们的实际维权和思想传播工作，实际上就起到了在野党的作用。竞选是迟早的，我们不能等到可以竞选了，再匆忙组建政党。”

金大宏先生的第四个问题是：“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在适当的时候针对合适的对象是有利的，在不适当的时候针对不适当的对象是有害的。例如，针对钓鱼岛主权而出现的反日民族主义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日前，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主权国家里的一个民族（藏族）而表现出的大汉族狭隘民族主义，是有害的”。

金大宏先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理解的民主主义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吗？”

于是我拿出一份中国新民党章程，在首页空白处写下：

“对中国人民来说，民主主义就是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韩国 KBS 金大宏先生留念。”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85：《火树》：吴邦国 2008 年讲话和孙中山 1917 年演讲的比较

30 年前，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每周日在赵绪成先生家学习国画。赵先生在 60、70 年代和我母亲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共过事，后来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

画了一学期以后，我就忙于学业而不再绘画了。虽然“画业”未成，但由于有国画的底子再加上后来的文学、史学、哲学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使我形成了很好的艺术鉴赏能力。

最近经朋友介绍，欣赏了一幅画。这幅画是 150x200cm 1999 布面油画，作品名是《火树》，作者是尹朝阳。尹朝阳比我小两岁，1970 年生，河南人。199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99 年参加《新锐的目光—九七零年前出生的一代》作品展，并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及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展出。2001 年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神话——尹朝阳作品》。

《火树》让我感慨万千，画面截取一个烧荒中常见的场景：几个男人正在围观他们点燃的一棵树，枝头的火焰如同开满的红花，点亮了整个夜空。似乎是这棵树鼓起最后的力气在垂死挣扎，但是，这颗树注定孤独地毁灭。男人们用燃烧的枝条点燃了自己的烟，悠闲地等着这棵树变成一段炭木。

看完这幅画，我点燃一枝烟。我想，我应该就是画中那吸烟的人，那烟是我用点着树的火，在点树之后，再点烟的。至于那燃烧的树、垂死挣扎的树，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今天（4 月 17 日），我看到了吴邦国先生发表在最近一期《求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就突然想到了那“燃烧的树、垂死挣扎的树”。 吴邦国先生的这篇文章最突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绝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人大与‘一府两院’不是相互掣肘，不是唱对台戏”；“人大工作，　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篇文章是吴邦国先生 2008 年 3 月 19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读完吴邦国先生的文章（讲话），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 1917 年的一次著名的演讲，可惜的是中央电视台在播出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时候把这一著名的演讲完全给删除了。现在我把这段演讲恢复，请大家结合目前中国的“火树”时局思忖，谢谢！全文如下：

“我知道诸位议员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必须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啊，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

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孙中山撩开衣服，露出里面暗兜）

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

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形式，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从中国目前情形看，我认为，孙先生在民国六年（1917）的这个演讲也完全适用于 2008 年（民国九十七年）的中国大陆。

郭泉：民主先声 186："人言"真的不足恤吗？温家宝先生应当慎重引用古语、诗文

温家宝先生 3 月 18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八处引用古语、诗文。中国古语诗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东西，就更别说外国朋友了。至于温先生在引用古语、诗文中的错误，能够发现并敢于指出的，我想除我之外，不会有第二人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天温先生引用的八则中国古语、诗文：

一、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三处引用古语和古诗句：

1、“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出自《明太祖宝训》朱元璋语。原文为“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

2、“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名句；

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语出《宋史·王安石列传》。

二、在谈到抑制物价上涨的问题时，引用了古语“事不避难”。语出《后汉书·虞诩传》：“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

三、在回答台湾记者有关提问时，两处引用古诗句：

1、“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是宋代郑思肖《德佑二年岁旦》中的两句。原作全文是：“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南宋灭亡后，郑思肖隐居吴下，坐卧不肯向北。 “下泉”典出《诗经·曹风》。

2、“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语出自鲁迅的《题三义塔》，全诗是：“奔霆飞焰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四、在谈到有关思想解放的问题时，温家宝引用了两句古语：

1、“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2、“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出自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第三品纤穠》。

先来谈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的出处问题。温家宝先生这样说：

我想集中回答一下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一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我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一直很欣赏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诗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两个。一是南朝梁钟嵘《诗品》，一是唐人司空图的《诗品》。

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萧刚纪室，世称“萧纪室”。历时十余年，写作成《诗品》。钟嵘《诗品》成书年代大约是梁天监十二年，《梁书》本传中称《诗评》，《隋书·经籍志》中或曰《诗品》，唐宋时二名并行，宋以后，《诗品》一名渐次流行，直至今日。该书品评了自汉魏到齐梁共 120 多名作家五言诗之上下优劣，故称《诗品》。钟嵘仿照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和刘歆《七略》的品论方法，把诗人分入上中下三品，每品又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一一予以品评，每品为一卷。

现存最早全本为宋代张如愚辑的类书《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流行较多的是明代胡文焕《津逮秘书》本和清代《学津讨源》本。注释本有许文雨的《诗品讲疏》、陈延杰的《诗品注》、吕德申的《钟嵘诗品校释》等。

唐人司空图的《诗品》由二十四首四言诗构成，后人为区别于锺嵘的长篇诗评散体著作《诗品》，称司空图的《诗品》为《二十四诗品》或《诗品二十四则》等。该文成文年代不详，也有学者认为该文非司空图所作。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虞乡人。黄巢起义后，隐居山中，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唐哀宗李祝被弑后，绝食而亡。

温先生所言“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出自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第三品纤穠》，全文如下：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由于《诗品》这一名称从宋代开始就特指钟嵘《诗品》，故本人认为，温先生以后在引用“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时，还是称出自《二十四诗品》或司空图《诗品》更严谨些。

我们再来看看温先生所言“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里的“中国”到底是什么？

在说宋代的“中国”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郑思肖的时代，南宋到底发生了什么？郑思肖(1239—1318)，字忆翁，号“所南”，连江(今属福建)人。太学生，南宋末年画家。元兵南下，曾上疏论国事。宋亡后，隐居苏州佛寺，终身不娶。极重气节，不忘故国，宋亡后，坐卧不北向。画兰不画土，根尽露外，人问何故，他说“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耶？”他的名、字、号都寓有怀念故国(赵宋)之意。作诗也多表达故国之思，在当时诗人中，是最少顾忌的一位。

在南宋沦陷后的许多年，大批遗民沉浸在心灵创伤和悲痛中。其中一些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思念其故国和失去的美好家园，怀着对征服者和奴役者的无比憎恨，用他们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时代心灵的创痛与荒芜。郑思肖正是这些不服从、不合作者中的代表。

如《德祐二年岁旦》“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过徐子方书塾》“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等，直明心迹，毫不掩饰。

由此可知，这里的“中国”其实是指被元人侵占的中原。在中国古代，“中国”指“京师”或“中原”。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中国，践天子位焉。” 裴骃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而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同意。初时本指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史书·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到了 19 世纪中叶，“中国”才专指我国家全部领土，不作他用。

所以，宋遗民郑思肖诗中之“中国”与台湾毫无关系，相反，如果这诗让蒋介石、蒋经国、马英九三先生引用却正合适，因为大陆对中国国民党来说是“失地”，是“中国”，而温先生引用却很不合适。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温先生引用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温先生的意思是说他的“解放思想”遭到了反对，但是温先生表示，他不怕这些“劳什子”。

但是，我要问的是，温先生你解放了什么思想呢？中国共产党你们解放了什么思想呢？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2008 年 3 月 19 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说：“中国绝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人大与‘一府两院’不是相互掣肘，不是唱对台戏”；“人大工作，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针对这样的状况，人民发表自己的不满言论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民意。

“人言”有两种，一是坏人对好人或好事情的诽谤，这当然要“人言不足恤”。
但是，还有一种“人言”，那就是好人对坏人或坏事情的批判，当政者还坚持“人言不足恤”，那就是无耻了。

我们来看看王安石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个“三不足”的。

“三不足”论跟宋朝改革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嘉佑三年（1058 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支持改革的宋神宗赵顼（1048 年－1085 年）在 1069 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 年王安石升任宰相。（这里顺便说一下，我 2007 年向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三先生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却遭中共不法抄家、革职、下放。）

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拥有大批土地的官员，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反对势力一直都用“天变”来恐吓宋神宗。有的说“天灾屡见”是王安石久居庙堂“唯务改作”所致，有的“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是搞了新法的结果。御史中丞吕诲下个结论：“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反对派还认为王安石新法违反了“祖宗成宪”，而“祖宗成宪”必须要“谨奉”，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另社会上流俗之言纷纷，“豪杰有力之士，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据《长编》卷二百一十：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

可见，王安石变法的艰巨，所以王安石才坚定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信心。原因很简

单，因为，此“人言”属于坏人对好人的谗言。

那么，对温先生有什么“人言”呢？3 月 16 日，十一届人大选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2959 张有效票中拿到 2926 张赞成票，算是高票当选。只有 21 张反对票和 12 张弃权票。这 33 张不支持票怎么会让温先生说出“人言不足恤”的狠话来了呢？

目前，中国老百姓最多的怨言是物价飞涨、失业下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这才是中国最大的“人言”。 唐太宗尚知：“立国，先须存民；国家富庶，先须百姓衣食有余。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也”，我们的温总理怎么能说“人言不足恤”呢？

如果说，温先生针对的是反对“解放思想”的“人言”，那就更大可不必了。因为中国人民最渴望中共解放思想了，怎么可能人民会反对中共解放思想呢？

当然，根据我的调查，反对中共解放思想的只是少数中共内部的“左”派权贵势力而已。但是，人民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绝对大过中共体制内的“左”派反对声音。

对改革者来说，“人言不足恤”的“人言”是指反对改革的声音；

而对不改革的人来说，“人言不足恤”的“人言”是指要求改革的声音。

那么，中共现在是改革者吗？

君不见，经济改革养肥了权贵者，君不见，政治改革再后推了三十年。

不是改革者而敢言“人言不足恤”，此“人言”，无他，惟“民怨”也。

昨天，刚刚看完今年初新拍的热播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三之邗沟魅影》，顿觉剧中社会的黑暗现实与今无二。剧中扬州的地方官勾结权贵黑恶势力铁手团，劫夺朝廷官盐，再高价卖给卧虎庄黑盐商葛天霸，由葛天霸分发给各地不法盐商，最后高价卖给老百姓。原先只值 20 文一斗的盐，卖给百姓竟暴涨到五六百文一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反观今日之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异乎？各地方政府把土地高价卖给黑心开发商，开发商再把房子抬高价格卖给炒房者，最后卖给老百姓的房价就暴涨到六七千、一两万甚至十几万一个平方……剧中最后狄仁杰终于消灭了铁手团，惩治了贪官，老百姓又可以吃上便宜的食盐了；可是今天中国的狄仁杰又在哪里？！老百姓又什么时候才能住上便宜的房子呢！

对今日之百姓而言，苛政酷法使得人民只敢“人言”不敢“行动”，而政府却来个“人言不足恤”，呜呼！“民为政本，民顺则国兴，民怨则国不长久”，古人皆知，而温先生不知，吾国不幸久矣！

郭泉：民主先声 187：“家乐福中国”是三资企业，中国法律规定三资企业是中国公司

最近“家乐福中国”在中国遭遇中国人抵制。随后，我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4 月 1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法方应对中国民众合理、合法表达的意见和情绪进行反思。

这让我感到很疑惑，因为我知道根据中国法律，“家乐福中国”是中国公司，不是法国公司。

今天（4 月 18 日），又有同学给我消息说，一些地方，例如 4 月 16 日昆明的抵制“家乐福中国”的中国人和“反对抵制家乐福中国”的中国人打起来了，互相砸矿泉水瓶子。据说，双方的“攻击武器”还是从“家乐福中国”里买的矿泉水。

看来，我这个上世纪的法学硕士和过期法官，需要再次给国人上一堂经济法课程了。我在 1996 年获得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五年，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在开讲三资企业法之前，我先来谈谈“卖场”经营。

我有五位学生在“沃尔玛”、“麦德隆”、“欧尚”、“百安居”、“新世纪商城”国际连锁店担任部门经理或见习经理，我帮助其中三个单位进行过公关策划和其他法律实务。

“卖场”经营，其实就是先进行租用场地、柜台装修，然后进行柜台招租、店堂管理。所有柜台货物均与“卖场”没关系。柜台货物里绝大多数是卖场所在国的产品，例如“家乐福中国”的卖场里，95%的商品是由中国供应商提供。

“家乐福中国”在中国卖的是中国货，用的是中国人，连场地都是租中国人的。

柜台货物是否能卖掉，与卖场毫无关系。因为，柜台招租合同生效时，柜台租用费必须同时支付给“卖场”。也就是说，卖场获得的是柜台招租费，而非商品销售所得。

因此，柜台商品销售不掉，倒霉的是柜台租用者，而不是“卖场”经营者。

那么如果是柜台租用者未到期撤出“卖场”，其结果是涉嫌违约，因为柜台租用者受“和卖场签定的合同”的制约。所以，无论是消费者抵制“卖场”，还是“柜台租用者”抵制“卖场”，“卖场”都毫发无损。

“卖场”的商品分为自采和代销商品。自采商品也就是商品“卖场”自行采购而来，此类商品一般是品牌响、销路好、风险低的生活必须品，例如可口可乐等。代销商品就是由供应商提供商品，“卖场”提供场地。可以是自己组织销售，也可以是外租柜台。这类商品一般风险大。所以“卖场”把风险转给了供应商或柜台租赁者。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三资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不得在中国从事直接经营活动。其在华常驻代表处只能在中国境内从事非直接经营活动。

外资只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入中国，所形成的公司，是中国公司。

三种方式为：1、中外合资企业又叫股权式合营企业，由外国投资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照各自出资比例分担风险、共负盈亏的企业形态；2、中外合作企业又叫契约式合营企业，由外国投资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通过合作协议来组成的企业形式；3、外资企业又叫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由外国投资者单独投资，在中国国内设立的企业。

三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三资企业是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企业形态。根据经济法上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三资企业在涉及税收、外汇管理、投资机制等方面均由中方控制管理。

针对三资企业这样的“虽有外资注入而使中国人民得益”的中国公司进行的抵制，无疑是没有经济头脑的。

那么，用“家乐福中国”里的矿泉水对砸是否有政治头脑呢？我想，如果中国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在 21 世纪真正要抵制的是独裁和专制，那么中国人也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

郭泉：民主先声 188：“狗日的粮食”：权贵们可以到国外吃饭，但是中国人民怎么吃呢？

袁隆平先生最近发出严厉警告，“很多地方国家粮库存在严重虚报现象”。

媒体也爆出新闻说：安徽当涂的粮食储备严重亏空，库存连 10%都不到。

然而，国家粮食局副局长郄建伟却用我熟悉的汉语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他说：“粮库常态是应该有粮食的，但粮库没粮食本身不能说明问题。都说粮库没粮食好像是多大的问题，这其实不是；如果粮库应该有粮食，但它没粮食，这才是问题。”更让人感到惊诧的是这位副局长对粮库亏空的一段解释，“因为粮库的储备粮得轮换，如果轮换时刚好有人去看了，就据此判断粮库没粮食，这种说法其实不全面。”

我看到郄建伟副局长说的这段话后，我差点惊呆了。这哪象一个有 13 多亿人吃饭的大国的粮食局长啊？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规定，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但每年轮换的数量一般为储备粮储存总量的 20%至 30%。也就是说，中国任何一个粮库都必须保持库存的 70%-80%，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粮库没粮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公务员拿着人民的纳税钱，到底在干什么？

最近又读了一遍刘恒先生的小说《狗日的粮食》。洪山峪的农民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买来媳妇曹杏花，而后生育了六个用粮食命名的儿女。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摞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与饥饿相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们到处寻找粮食，最后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女人因为丢了只有每月 20 斤的购粮证而吃农药寻了短见。

曹杏花临死前的一段对话，让人潸然泪下：大谷唤他：“爹，娘有话！” 门板撂稳，天宽把耳朵凑上去。听不清，他挨她嘴近些，只听女人说：“狗日的！” 静了半天，又吐出两个字，“粮……食……”

天宽赞同地点点头，很悲哀。他在女人头发上摸了一把，最后一把。

小说的最后，粮证找到了，但是曹杏花却再也吃不到粮食了。

我接触很多苦难、善良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奢望什么民主，他们自己也坦言，他们的一生，就是吃粮食的一生。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最低级的愿望，我们的国家粮食局都无法保障，这实在让我要思考，到底是狗日的粮食，还是狗日的粮食局？

4 月 9 日，粮农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 1980 年以来最低水平，只有 4.05 亿吨，仅够全球人食用 8 至 12 周。

那么，中国的粮食情况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

保证我国 13 亿人口粮食供应的耕地是 18 亿亩。这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一根“红线”。 耕地低于 18 亿亩，就要饿死人。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透露：“截止到 2006 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为 18 亿 2700 万亩，人均只有 1.39 亩。” 2007 年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征地进行，新农村建设要征地、城市扩建要征地、基础设施建设要征地、招商引资也要征地，几乎是发展中的每一步都在打土地的主意，土地似乎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2007 年，中国发生了大量政府圈耕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的事件，失地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统计显示，截至 2007 年 10 月底，甘肃当年耕地减少了 6.7 万亩，其中建设用地占 34.89%。利用廉价的土地来“招商引资”，致使征用土地越来越多。

2008 年 3 月 20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广东就表示：“耕地持续减少，仍然令我国粮食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之一。”

去年来，中国新民党在帮助失地农民的维权案件中顺带调查了土地情况，发现 2007 年一年中国大约减少耕地 500 万亩，而中国国土资源部日前发布的 2007 年《国土资源公报》称减少耕地 354.76 万亩。

今年以来，全国耕地受灾达到 2 亿亩，减产是确定的事实。

另外，由于农资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粮食直补和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带来的收益基本被涨价的农资吃掉了，因此农民已经没有种粮的积极性了。

例如，嘉兴种植技术推广总站的《嘉兴市春耕生产调研报告》指出，农资价格 3 年来像脱缰的“野马”，化肥、种子、农膜和农业用工费用等都大幅度上涨，最高的同比增长了 70%。而作为收益的农产品价格，虽也有上涨但远不能跟上成本上升速度。以嘉兴市农民主要种植的晚稻为例，亩均成本增加了近 100 元，亩均收益已连续 3 年呈下降趋势。农民种粮收益减少肯定影响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由于农资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2008 年嘉兴春粮面积就比去年减少了 1 万多亩。另据调查，在江西农村，由于农资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农民纷纷撂下土地而外出打工。

目前大量农民弃田外出打工，已使春田出现大面积荒芜。

今天网友(双凤亭)给我信息说：“今年我回去上祖坟，发现大量土地荒芜，村里人都出来打工去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修了一条几乎没车走的外环线，侵占农民土地无数。每亩只给农民 1000 元就强买走了。一亩白菜也不止卖 1000 元，可是农民敢怒不敢言。”

综合多方情报，2008 年中国将出现粮食危机已成定局。

《管子•枢言》有曰：“慎富在务地”， 如今大量的良田被非农征用，人民将无粮可食。

《墨子•七患》有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 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此道理，古时人人皆知，而今日之执政党不知，岂不怪哉。

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一旦粮食发生危机，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

如今，国家储备粮库严重匮乏，中共当局意欲何为？

中共已经造成了一次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难道还想再作一次孽吗？

1959 至 1961 年，全中国陷入饥饿状态。2005 年，中央政治局两次下令对 1959 年到 1962 年大饥荒档案解密，已证实那三年因饥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民众的总数为 3755.8 万人。

这还只是官方统计的数字。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它竟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饿死人数 1 万人以上的其他 28 次大饥荒的饿死人数总和。那三年的中国，许多地方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

最为邪恶的是，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就算农民饿得快死了，中共当局也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或人吃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与直接杀人有什么两样？有农民控诉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

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目前中共对那场灾难的辩解一是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金辉先生在《方法》1998 年第 10 期上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指出中国当时根本没有可能造成全国死亡几千万人的自然灾害。

1961 年 4 月 8 日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上说，“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 8 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 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新华社 4 月 8 日电，原载 1961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报》）

另据前苏联资料，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这说明，中共栽赃陷害苏联完全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那么，那场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共的农业政策。

很不幸，我们在现在政府疯狂的圈地运动中再次看到了“那三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的影子。

权贵们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或工业园区，他们挣到了钱，可以到国外吃饭，但是中国人民怎么吃呢？

曹杏花在那个时代被粮食逼死了，不知道杨天宽和他的六个孩子现在是否还活着，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曹杏花的临终遗言：“狗日的粮食”。

如果他们还活着，如果他们还记得，我想，再加上这么多年的思索和觉醒，他们一定会喊出：“狗日的世道！”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89：股崩与救市：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信托责任”到哪里去了？

日前，中国证监会等机构调查显示，中国投资者把家庭的主要储蓄（39.05％）投资股市，但是约 70％的投资者投入股市的资金少于 30 万元。

而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对中新社记者表示，中国证监会并不会承担“救市”角色。

于是，中国证监会的调查一经公布，广大股民不约而同地在网络上贴出了一个消息：

证监会：中国家庭投入股市大多少于 30 万，损失不大。

这个标题的后四个字虽然是股民自己添加上去的，但是却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股民对中国证监会的深刻认识。

1992 年到 1994 年，我在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工作。当时的企业的股份制改制、股票的募集、发行和上市工作就是由体改委来牵头负责的。

我对股票的认识，就是普通股股票是公民投资企业的一种财产所有权凭证。1600 年股份制在西方出现，当时就有学者评价说：股份制出现的历史作用不亚于瓦特发明蒸汽机。

在体改委工作的短短两个春秋，我阅读并撰写发表了大量关于股份制和股票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股票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马克思曾指出：股份公司“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马克思还指出：“在工业上应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609-610 页、第 37 页)

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

恩格斯在《1891 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一文中也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408 页)

我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最后和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股份制可以使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甚至“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96 页)

但是，这一切在中国，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本来，购买股票是一种长期投资，在中国却成了短期赌博。

原因有两个，一是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制下，中国老百姓无法获得财富快速积累的渠道。在中国，勤劳致富的机会很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快速致富的途径也不多，一般是官方背景和关系、二是违法致富、三是赌博。没

有前两项致富的条件和胆量，于是中国人民把储蓄中的很大比例都用在了购买股票的上。

第二个原因是，一开始，中国人民还是想做长期投资的。但是，当机构（某种利益集团）进入股市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大规模地购买一些股票，造成上涨事实。当股民大量拥入而把股价抬到了一个高度时，机构突然撤出，把股民高高地晾晒了起来。

机构毫无道理地选择哄抬股票，结果造成中国股民不按个股业绩和企业发展购买，而是一味跟风投机，这一状态是不成熟股市的特征。中国离成熟的股市差距还太大，一切责任不在股民而在机构。

今年以来，机构在高位全面撤退抛出，股市一路绿灯，直落 3000 点大关。那么快到底了吗？不，还没有！我们来看看底部状况的特点：

历史经验看，真正的大底出现时，有如下特征：

1、清一色基金跌破面值，相当部分跌到只有五六毛；

2、出现券商破产倒闭事件；

3、日成交量经常在 200 亿以下（上海）；

4、大部分股票跌到净资产附近，出现 1-2 成股票跌破净资产；

5、有 2 成股票跌到 2 元以下，5 元以下股票占到 60%以上，消灭 50 元以上股票；

6、证券营业部大户室、中户室基本无人，偶尔有几台麻将，营业大厅空无一人，散户不再看盘，大厅的屏幕只开一半；

7、报刊亭上的证券类报纸、杂志无人问津；无人谈论股票的事，谁谈论股票大家都以为他是神经病。

对照一下，现在具备那一条了？好像还没有，这样看来，是不是离历史大底还很远很远？是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来自大户室的消息，说有人出 300 万赌今年的底在 1800！

3000 点都已经有很多人自杀了，1800 点还不知道自杀成什么样子呢？

那么，中国股市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让它继续熊下去呢？继续让更多的人自杀呢？

显然不行！那有什么办法？我认为，一是加强监管，一是“政府救市”。

证监会的职责是打击不法交易、内幕交易以及操纵股价，并鼓励股票升值。但是中国证监会做到了吗？他们没有打击不法交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并鼓励股票升值，相反，他们却提高了“印花税”，美其名曰：“打压股市泡沫”。

其实，股市泡沫是无法判断的，只要市场接受就是合理的。

但是，中国证监会在提高“印花税”，造成股市一落万丈之后，却说“中国家庭投入股市大多少于 30 万”，但中国证监会不会承担“救市”角色，因为中国证监会认为明天会更好，“要对中国股市有信心”。

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政府到底需不需要救市？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了解，政府和人民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一生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只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经济承担信托责任”，即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政府有责任保证政府政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增涨。

如果，这个都保证不了，那么人民有权投不信任票，直至选举新的政府。

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一个政府得以执政的根本承诺。人民委托政府管理社会经济，使得政府对人民有了一种信托责任。

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证监会的“不予救市”，却根本无视这种“信托责任”。

放弃对人民的“信托责任”的政府，人民也必然弃绝这一政府。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指出：“政治是一个信托机构，而政府官员则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

美国政府这次在爆发“次贷危机”后，立即出来“救市”，受到美国人民的一致好评。美国政府的这一爱民举措，其本质不只是在拯救股票市场，而是在经济遇到危机的时候对人民负责，负“政府的信托责任”！

一位美国参议员关于美国政府必须立即挽救金融危机的话令人深思 ：“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机除外。”

日前，郎咸平先生高度赞扬美国政府，他说：“美国政府受美国全民之所托，在碰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当然有义务站出来为民众解决困难。而中国的证监会有没有？我发现根本没有，这一点值得他们思考、学习，甚至值得他们反省。”

虽然范福春先生后来怒斥媒体“他从来没说过不救市”，但其实投资者心寒的不是其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表达了救不救市的观点，而是其在谈论中国股市暴跌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冷漠，以及对股市中诸多制度缺陷的

刻意回避。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名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指出：在转型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没有一个建立在民主共识基础上的政府，没有一个对人民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尊重的政府，那么，想要实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参议院 1973 年《证券行业调查报告》中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证券行业的监管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原因并不是证交会权力不够，而是他不愿意行使他所拥有的权力。就权力而言，中国证监会的权力比美国 SEC 的权力不知大多少，但就其对投资者的呵护而言，确实难以相提并论。中国证监会的眼睛应盯着投资者利益的得失，而不是权力机构的涨跌。

利维摩尔在《股票作手回忆录》里说："营业厅里那些中小投资者，他们是这个行业永远的衣食父母。"

最后，我引用中国 1 亿 5000 万被深深套牢的股民的文学作品来结束我的这篇《民主先声》，据此，当知国人之苦难！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跌停，割的人多了，就成了跌停。

王进喜说：有条件要跌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跌停。

金庸说：侠之大者，跌停板上见。

黄健翔说：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在跌停

陈凯歌说：跌停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王小丫说：股票跌停了，你可以选择打一个电话，你是要打给 110 还是 120。

文天祥说：股市自古谁无赔，留着帐号给后人。

李商隐说：曾经跌停难为鬼，除非解套才做人；炒底时难抛亦难，反弹无力割肉寒

沉痛悼念"中石油"在北京逝世

2008 年 04 月 19 日

伟大的炒股阶级革命家、跌停家，久经考验的一线权重股、伟大的跳水战士、今年活跃在股坛引领股市暴跌数十周的著名领跌股中国石油（601857），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 10 时 10 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狂跌破发行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疾病缠身，体重从出生时的 48KG，在不到六个月时间内急剧下降至 16.7KG，享年 163 天。中国石油出生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从小就接受马列暴跌主义思想熏陶，刚出生便参加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工行的红色政权，在 A 股广场竖起了绿色大旗。中国石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把无数股民改造为无产阶级的一生!

今天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中国石油的灵堂庄严肃穆，哀乐齐鸣。灵堂的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中国石油"的横幅，下方是大小庄家敬献的花圈，中国石油躺在翠绿的松柏丛之中，身上盖着翠绿的跌停大旗，安详地闭上了 K 线眼睛。中国石油当日的盘口走势图，被摆放在灵堂的显耀位置，供各界股民瞻仰。

下午 15 时 30 分，中国石油悼念仪式正式开始，证券大厅外积满了告别的人群，都身穿绿衣，臂带绿纱默默无语，眼含泪水，个别因愤怒而情绪失控的股民同时高呼"操他大爷"、"去死吧"等口号对中国石油表示深深地哀悼。前来和中国石油作最后告别的有中石化、中神华、万科、宝钢、联通以及平安、国寿、工行、中行、招行、民生银行、建行、交行等一大批跌停股。在中国石油大幅下跌和跌停期间，通过以同样放量下跌等各种方式来表示慰问的还有 ST 浪莎、STTCL、 ST 吉炭、ST 金杯等大量 ST 股。港股、日股、美国纳斯达克以及中国石油的生前友好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等同行也发来唁电、唁函，对其不幸跌停逝世表示沉痛地哀悼。

中国石油的遗体，将在明天下午送往 A 山火化。按照中国石油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将撒遍 A 股大地。中国石油的暴跌主义思想，将在 A 股市场发扬光大，生根，发芽。

伟大的暴跌主义思想家、英雄的跳水跌停战士，中国石油永垂不朽!

郭泉：民主先声 190：平生未酬同仁恩：有感于妙觉法师和"人间佛教"

日前，妙觉法师给我发来短信："悟后空空无大千，但悲不见四海同；平生未酬同仁恩，随喜丹心微躬补。末学妙觉敬上"。

翌日（4 月 18 日），我就得到消息说，妙觉法师为胡佳先生发起了"种悲田、悯众生"的"普贤行动"。

妙觉法师是一位比丘尼，今年是她出家的第十个年头。

我认识两位比丘尼，还有一位是韩国的周峰法师。1996 年我在南京大学跟随赖永海教授攻读隋唐佛学（中国哲学）博士时，周峰法师也同在赖先生门下。她比我低两级，喊我"郭师兄"。我与她交谈过韩国新罗时期佛学源流，

后我完成了《新罗佛学圆融思想研究》一文。她学成归国时，我为她篆刻过一枚“周峰藏书”的印章，以示留念。

我读过妙觉法师写给国家主席的两份公开信，其中第二份是为恳请主席特赦胡佳而写的，信的第一句话是“尊贵的主席菩萨慈鉴”，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号召我们大家和她一起签名，“忏悔释子妙觉慈智合什和你并肩敬请签名支持主席菩萨特赦胡佳”。这让我感动不已。

妙觉法师是中国大陆首位以佛法援助艾滋病人的比丘尼。妙觉法师让我想起了德蕾莎修女（1910 年 8 月 27 日—1997 年 9 月 5 日，又称做德兰修女、泰瑞莎修女）。特蕾莎修女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于 1979 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 2003 年 10 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

德蕾莎修女初到印度教区时，受到当地婆罗门的强烈反对。但是，德蕾莎修女不畏反对，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治疗。有一天，德蕾莎发现了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德蕾莎蹲下来仔细一看：破布裹着脚，爬满了蚂蚁， 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她赶紧替老妇人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为老妇人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送到医院治疗。

有个老人，被德蕾莎修女带回收容所的当天傍晚即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德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德蕾莎修女感动了印度。

妙觉法师是中国的“德蕾莎”。她常年奔赴在河南各个艾滋病高发地，帮艾滋病人募集资金、给艾滋病人做临终关怀。

她的佛教不是清冷古庵、不是经卷繁复，她也可以象一个小姑娘一样笑着坐在你面前，喜欢看《大长今》、谈论霍金和《时间简史》，她认为《魔戒》是一部阐述心灵抗争的文艺片……

但是，她更是一位“心存百姓苦、济救天下难”的法师。

以下是我收集到的她的净言：她说：“心灵要靠帮助他人才能成长”；

“出家不是要逃避这个世界，而是要戒除自己的私心，以此来帮助众生”；

“众生苦皆我苦，大家和我有什么区别呢？多解救别人的苦，那我自己也就能解放了”。

“我们出家人应该对世人伸出援手，我们要用行动改变世俗对出家人的看法。要告诉大家我们是积极的，入世的。只要不是为私利，就是出世。出家一样可以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2004 年妙觉揣着化缘来的 500 块钱，去了郑州上蔡县的后杨村。那时是中秋节前后，她看到了田野间一个又一个的麦垛和坟头。妙觉把化缘来的钱和自己带去的积蓄都给了村民们，走的时候她只为自己留下了 50 元路费。在三天时间里，她走访资助了 10 户人，每推开一户门，迎面看到的往往是桌子上的遗像。种种悲惨景象刺痛着妙觉的心，她知道自己个人能募集到的资金有限，于是赶去了江西庐山东林寺。她向东林寺的大安法师说明了情况，请求帮助。几天之内，就在 2005 年春节前夕，妙觉成功带着从东林寺募来的 10 万元现金和 3 辆车、17 名“僧兵”队伍赶去河南省，一气走了信阳、驻马店、周口、开封四个灾区，每到一地就让村干部把困难群众组织起来，挨个送米粮和救困金。之后，妙觉平均每年都会有近百天的时间在河南和各个灾区的艾滋病人在一起。几年来，在妙觉法师的发动下募集到的善款已近百万：其中东林寺募集到 50 万，深圳的六祖寺募集到 20 万，民间有 10 万。

上述妙觉法师的净言所表达的思想，是“人间佛教”思想。

佛教本就是人间佛教，例如：《阿含经》有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中阿含》说：“如来世间生，世间长，出世间行，不著世间法”。《增一阿含》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上而得也。”

《增一阿含》说：“如来出现世间，甚为难值；人身难得，生正中国，亦复难遭……比丘当知：如来今日现在世间，得闻正法，诸根不缺，堪任闻其正法，今不殷勤，后悔不及。”于此也可见佛法是“以人为本”的。

《增一阿含》还指出了明释尊“由人成佛”的方法，“世尊告曰：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云何为六？一者施；二者教诫；三者忍；四者法说、义说；五者将护众生；六者求无上正真之道。”

古往今来，一些人为了成佛便出家为僧为尼，以为避世苦修，即可成佛。他们一来错解了“佛”的本意，二来远离了“修行”的法门。佛，梵语为“觉悟”；成佛，意即成为有觉悟者。一个人能在觉悟中成长，不断觉悟到人生的真谛，而又拥有慈悲之心，那便是进入佛的圣境。

既然佛教本是人间佛教，为何再提人间佛教一词呢？

人间佛教的提法，其实是太虚法师为对治世俗于佛教的偏见而发明的词语。例如，梁漱溟先生于战火苦难之中，悲痛的说：“佛教对此时、此地、此人的痛苦和问题，没有关怀，没有解决，根本对人没有用”。如今，类似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仍然大有人在。

“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源于释太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该文系太虚法师在 1933 年 10 月的讲演稿。印顺法师、星云法师也对“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力行也贡献极大。

星云法师说：“过去传教者鼓励信徒舍弃人，抛妻弃子，入山修道，埋没了佛教的人性，致使佛教衰微，了无生气。人间佛教，是要把最原始的佛陀时代到现代的佛教融和起来，统摄起来。在今后的工业时代里的佛教，一定要从入世重于出世做起”。 “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

宗教的现代化包涵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关怀，一是社会批判。基督教早在上个世纪就完成了向社会批判层面的转型。从妙觉法师身上，我可以看到佛教的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佛教正在从信仰层圈出发，逐渐契入社会、文化层圈，目前已经到达了社会关怀的层面。

妙觉法师住在广东四会六祖寺贞山。四会贞山六祖寺是南禅宗六祖慧能藏身论禅之地。佛学经典《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于黄梅东山禅寺五祖弘忍大师处得法并受衣钵后，遵从五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授记，“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

惠能大师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想，妙觉法师是完全参透了。

妙觉法师俗名叫张玲，她为援助胡佳和帮助中国爱滋病患者设立的捐款帐号是：

农行：9559980660429796213 张玲，妙觉法师的邮箱是：zmh541@126.com。

读佛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佛经是《妙法莲华经》，最喜欢的古筝曲是《出水莲》。时常掩卷叹息，不知一颗莲子到成华，要遭遇怎样的苦难，等待多少的時日呢？

郭泉：民主先声 191：我与胡锦涛先生的唯一矛盾就是“一党专制能不能导向社会主义？”

最近阅读了胡锦涛先生 2008 年 4 月 12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0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合作共赢》的演讲。其中有两段文字让我感慨万千，如下：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着力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首先，我完全同意胡先生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坚决反对最近一些不明真相的国人在反对中国三资企业“家乐福中国”事件中反对改革开放的立场和谬论。

其次，我不赞同胡先生所言的关于“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判断。

结合胡锦涛先生在 2008 年第 1 期《求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可以得出结论，胡先生所说的“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是一党专制建设社会主义。

胡先生的这篇文章最突出的观点不仅仅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与决心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相结合。

改革开放是对的，但是，一党专制能搞好改革开放么？

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的，但是，一党专制能搞好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么？

我和胡锦涛先生之间，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在中国的发展总方向上并无矛盾，即都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中国。

我和胡锦涛先生之间的唯一矛盾，就是胡先生认为一党专制可以导向社会主义，而我认为一党专制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多党政治才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方式。

我的思想可以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即使用多党竞选、接受人民的选择的方式，确保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即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权力腐败、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提升国民素质与道德、增进社会和谐等。

社会主义目的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手段，并不矛盾。

去年 2 月 26 日，温家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但是温先生和胡先生一样都认为一党专制可以导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和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所在。是手段、途径的矛盾，而不是目标的矛盾。

虽然，我与胡先生有这样的矛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胡先生是好人，心里满满地装有人民。温家宝先生也应该是如此的。

其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都是好人，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为了全社会公民的经济和政治公平而设计的幸福计划。但是，一党专制却有悖于这一“幸福计划”。这是胡先生还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想，不久胡先生就会意识到的。

其实，我的这些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 60 年前都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来看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的言论吧。

1941 年 10 月 28 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以上这段话，对当今之中国共产党也是完全适用的。

下面的两则剪报，60 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理解还是很深刻的：

1944 年 3 月 30 日《新华日报》：“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5 年 4 月 8 日《新华日报》：“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60 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

例如针对“国情特殊论”的错误言论，1944 年 5 月 17 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

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

针对“稳定压倒一切”的错误言论，1946 年 5 月 17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92：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评中共针对“新义和团”的“跳火”防治

继 21 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共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始乱终弃”一事对我采访之后，今天（4 月 23 日）又有美国华尔街日报请我分析这一周来中共在新义和团“扶共灭法”运动中的新动向。

4 月以来，针对多国人权组织要求中共还权于民的抗议活动，中共知道自己无论在“民心”还是在“法理”上都无法回应，于是中共使出惯招，那就是“中国人民不答应”。

于是，中共开动了新闻机器竭力高调仇外。原本封锁一切敏感话题的网络媒体，突然被中共开放，所有的网络上反对西方、仇视外资的言论被“坚决果断”地发表在首页。

上周末，中国多个城市发生“反藏独”、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其中合肥、武汉等地有不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参加。与此同时，反对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也在展开。

随后，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演变成了“新义和团”的“扶共灭洋”，逢外必反，并高呼“外国人滚出去”；而中国奥运火炬手金晶对抵制“家乐福”稍有置疑，立即被“拳民”们斥为“汉奸”。

反对抵制“家乐福”的人士不失时机地引导中国人民思索：“当中国人民遭受中共专制迫害的时候，你抵制了吗？当物价飞涨、股市成灾、腐败盛行的时候，你抵制了吗？”

于是，在抵制家乐福的示威的背后，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力量也在积聚。这种力量终于在物价飞涨、股市重创和越来越近的奥运难题面前，让中共感到极度恐惧了

本周以来，中共各媒体均刊登文章称“爱国就是干好本职工作”；新华网也从前段时间高调煽动仇恨西方的口径转向，宣称“冷静”、“理性”等。坊间还传出胡锦涛责令周永康严禁学生上街活动的消息。

立刻，各高校辅导员挨个班级、挨个宿舍地通知学生不要上街。刚才，一个学生给我电话，抱怨说：“因为家乐福事件，周六周日洛阳学校集体补课不放假，我们很想家！”

那么，为什么中共在点燃新“义和团”的“扶共灭洋”火炬之后，又匆忙灭火呢？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可以造成重大事件的“火”的种类。

我们把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森林，就森林火来说，可以造成重大事件的“火”有四种：地下火、地表火、树冠火、对流火。

地下火燃烧速度缓慢，但是却是隐蔽而有毁灭性的。对应的社会学术语，就是“民众觉醒”。

地表火是从地表面可燃物开始燃烧,沿地表面蔓延的一种火。按蔓延速度可分为急进地表火和稳进地表火。“稳进地表火”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上访维权”；“急进地表火” 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群体事件”。

树冠火即沿着树冠蔓延的火。树冠火强度大、温度高、烟雾大。按蔓延速度可分为急进树冠火（狂燃大火）和稳进树冠火（遍烧火）。稳进树冠火（遍烧火），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动荡”；急进树冠火（狂燃大火），对应的社会学术语是“动乱”。

但是，这时的动荡或动乱都是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区域或某一个特定行业的。如果要蔓延到全社会，这就需要“对流火”。

对流火，即在燃烧区上空形成一个对流柱,表现为升起的火焰和烟柱。对流火为高能量火， 高能量火能形成强大的上升气流，有 5% 以上的热能转变为动能，产生对流柱和旋涡。对流柱一般能上升到层积云，高达 2-7km 或更高处,能将着火物带到高空传播到远处形成“跳火”（俗称飞火）。

“跳火”是由高能量火的对流柱和气旋将燃烧物带到空中而产生并传播到远处的火。有资料表明,在森林火灾中飞火的传播距离最远竟达 29km。

当火头前方出现许多“跳火”时， “跳火”积聚到一定数量就发生爆炸式的联合燃烧，形成“火场”，吞没前方许多分散的火点,在火头前方又形成一个火峰，迅速扩大火场面积。

在火场上，如果火的强度和蔓延速度突然增加，火伴随猛烈的对流柱，火场由平面转为立体，可燃物产生的能量进入对流柱，这时会有大量火星和易燃物如同“阵雨”般落在火头前方，扩大火场，这种现象称为暴发火。“跳火”一旦形成“暴发火”，就无法扑救了。

也就是说，“跳火”是一个关键的质点。

当“抵制家乐福”的规模和强度达到一定的能量级的时候，必然出现向其他领域“跳火”的现象，而其他领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种“勇敢的示范”，于是，“火场”形成，“火锋”出现。当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出现“跳火”，并且“火场”的“火锋”一致的时候，“革命”就爆发了。

这时，中共只能两选一，即要么抉择镇压，要么抉择民主。

而对目前的中共来说，这两者他们都不要，于是，只能降温灭火、防止“跳火”出现了。

其实，五四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一场反对“巴黎和约”的爱国运动，最后“跳火”成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反政府运动了。

1919 年，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合理要求。英、法、美等国操纵会议，竟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中国民众听到交涉失败的消息后则无不愤怒。

失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签定的 1915 年中日条约、1918 年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和山东问题换文，于是，办理两次外交的当事人成为众矢之的。

1919 年 5 月 4 日下午，北京学生 3000 余人集于天安门开示威大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等口号，意欲赴东郊民巷，向英、美、法诸使馆表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抢占山东的愤激，请求各国主持公理。遭遇阻拦后，学生赶赴曹汝霖私宅。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章宗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

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 32 名学生。5 月 19 日，北京大中学校 2．5 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 月 3、4、5 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 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 20 多个省区，100 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 月 5 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 月 7 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 月 10 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

但是，6 月 17 日，北洋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 7000 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以上介绍的是社会运动中的“跳火”效应。中国新民党的政治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一是“蝴蝶效应”、一是“跳火效应”。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蝴蝶效应”和“跳火效应”，那就是：“一只蝴蝶扇动的风很小，但是亿万只蝴蝶翅膀可以让火焰蔓延成火海。”

郭泉：民主先声 193：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支持王千源女士

4 月 23 日，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紧急召集部分在南京的中央党部委员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了王千源女士最近在接受采访中发表的若干政论时评、一封公开信、以及王千源女士对古筝、国学方面的学习情况，会上展开充分辩论，决议如下：

第一、现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一年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女士的思想与中国新民党之主张完全一致；

第二、中国新民党反对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对王千源女士的失实报道和非法人身攻击；

第三、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号召新民党人学习并传播王千源女士的思想。

王千源女士虽然今年才 19 岁，但其对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文化之深刻认识，令人深思赞叹。现公开郭泉先生收集整理的王千源女士思想片段 43 节及公开信一份，抄录如下：

1、“我觉得西藏绝对是中国的一部份，正因为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所以对待它就要像是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要用的方式和对待外人是不一样的。对待外人，你可以不予理睬、你用比较强硬的手段也好，都可以。但对同胞兄弟的话，是自己的亲人，就要更加理性，要注意情感上的交流。跟藏族讲话更多的是要考虑，这不是简单地这几年或几十年或奥运会几十天的事情。我们跟他们是几百年、几千年的渊源，并且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2、“我从来不支持国家分裂，我也不愿意有意识针对任何国人。爱国，要用理性的方式，不能像在网上攻击我的人那样，用非常不理性的方式，用红卫兵式的谩骂，也不能用暴力的方式，包括网上、Email 和电话的暴力，用威胁别人的方式。这不是爱国。他们这样才是真正的叛国，才是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

3、“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自己感觉是，一种比较强烈的社会思潮在人民其他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的情况下，每个人不是心理特别感到舒坦的时候，他们需要发泄的地方。而随着网络的出现，他们的发泄可以由一个非常虚幻的概念转化为针对某几个人。而当他们成为几千几万人结合在一起，就感觉到自己去攻击别人时有人保护。这像历史回潮，我感觉这跟“文革”太像了。我读过那些历史，当时还不信。他们认为文革以及过去的一些事没有发生过，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4、“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需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声音。我希望一个国家有更强大的人民，而不是

一个强大的政府逼迫人民连话都不敢说。现在有点像秦朝。秦朝当时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暴政。现在我担心的是，这个暴政既有可能出于政府，也有可能出于人民，这太可怕了。”

5、“我觉得中共政府就是一个暴力政府，所以有的国民产生现在这些（反对）声音，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他们也是可怜的受害者，大家都是受害者。”

6、“中国现在的体制，令民众的才能没有发挥的余地，让民众没有敢说话的机会，说真话变得越来越难，只好戴着假面具做人。其实这有悖于人伦道德和自然规律。面对这些，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还是有中国人在顶着这个风头，在实事求是讲真话的。”

7、“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大家还是能看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府，百姓在私下都明白。”

8、“不要由于害怕而扭曲自己正确的思维，信心特别重要。”

9、中国的社会问题“其实这是党文化造成的，现在是一种虚伪文化和恐怖政治。就好像，当一个小孩在他出生的时候，如果父母就是用暴力来教育这个孩子的话，这个孩子的心理肯定有问题，以后长大也会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思想也会很压抑。”

10、“共产党始终都是在撒谎，撒得很厉害。大家都知道很多东西是谎言，但是没有人敢出来说。”

11、“我并不是一个想惩罚别人的人。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不会用同样暴力的方式对待他们，而是采取法律方式。”

12、“中国存在很多问题，根子上是政权体制问题。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是在给自己造棺材，中国人民在觉醒当中，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将有更强的力量反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将自毁于这一代。”

13、“中国，应该让那些真正有才华、真正有能力、能够深层思考的人，对中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14、“真正能够促进国家进步的不是相同的声音，而是不同的声音。真正让一个国家能够强大起来的，不是让大家闭嘴，而是让大家能够说话；真正让国家能够强大起来的，不是一个表面上很威武实际上很无能的这种中央政府，而是有强大的人民。只有民强才能国家强。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5、“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会有很多反对党，很多反对的声音，而且媒体起的作用就是纠正很多不正常的事情。媒体经常是用一种批判的方式出现的，而在中国，媒体基本上是共产党打击人的工具、撒谎的工具。我们看 CCTV，他们没几句话是有用的，有用的话也没几句是真话。他们把撒谎当成是一种职业。”

16、“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说用特别夸张、谄媚来说话的人没有几个是好人。中国政府只能听好话，听不了这种逆耳忠言的话是很危险的。”

17、“真正爱国的人是敢于说逆耳忠言的人。不是跟着大家随大流的随便乱说，而是像屈原那样，哪怕大家都不能理解他，都能够很清晰的分析问题后，真正的为国家的进步做一些事情。”

18、“很多真正对人有用的话都是有建设性的批评的语言，不是那种谩骂型的话，而是说我真的给你提出建议会让你有进步的这种话。”

19、“中共所谓的政治，实际上等于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比如，他们说的‘颠覆国家政权’，隐含意思是说，你想把我已经从你那里夺来的利益拿回去，这与民主国家的政治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政治蕴涵完全不同。”

20、“我觉得，媒体的作用很重要。敢于说真话的媒体出来，大家都连起手来做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会对中国未来走势的影响会很大。”

21、“如果你自始至终是一个谎言的话，就要用更大的谎言来掩饰前面的谎言，那谎言是很容易被揭穿的”。

22、“当所有的谎言连在一起的时候，读谎言的人，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我觉得中国人非常聪明，只是因为信息封锁，才会被迷惑一段时间。还有另外一部份人，知道真相的人，他们暂时没有勇气站出来说真话。但是，这不会是永远的。”

23、“民族主义源头就是中共当局，因为它解决不了很多的问题，只能是转嫁危机。过去说改革，每个改革都改不好，再换个改革再重新改，不停的换各种各样的领域。”

24、“中共政府就是害怕人们变得太强，就是害怕人民变得太稳定。因为它自己在不稳定状态下，所以就要一直煽动大家没事儿也要找出事儿来，每天打打杀杀，每天都要闹呀闹呀闹，革命来革命去，才能够保证大家都在忙于其他的事情，而不会管到它们的头上来。”

25、“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就是在给自己造棺材，一方面，得罪了西方社会，另一方面，又得罪中国自己的人，它们把民众当作煽动工具的时候，实际上是小看了人民的力量。其实，多强的工具都是一面双刃剑，这个力量能往外打，也可以随时往回打。所以当局处境很危险，就是因为它们现在已经控制不了局势，我感觉它就要玩火自焚了”。

26、“尽管部份中国人在某些特殊时期内，可能会有一种民族主义倾向，但是不会被完全蒙住。随时会发生变

化，变成一种更强的力量反对中共政权。可能这几个月就弹回来了，甚至几个月都不要，可能是刹那间，这股愤怒的矛头就会转向中共政府。”

27、“人民开始成长，‘民贵君轻’的这种情况现在渐渐体现出来，人民发现了自己力量的强大。人们在过程中也会进行反思，会认识到，中共政权是阻碍中国发展的因素。”

28、“有的人一开始是一种发泄，我觉得这种发泄是很正常的，发泄一段时间后，后面就会有新的，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人民会尝试自己在哪些利益上可以说话，哪些利益上可以做事，能做什么事，力量也会整合，就会发生大的改变。现在还在积蓄当中。”

29、“中国存在很多问题，根子上还是政权的体制问题。比如愚民教育。现在中国的教育如果继续是这样的愚民教育的话，政府觉得让百姓越愚它越稳定，因此把稳定当作第一位，这就是最可怕的、最不稳定的一种方式。”

30、“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是必须要变的。事物都是在变的，如果你的政策不变，还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的话，还有新闻封锁这些东西，都会使中国越来越落后。”

31、“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经济上这么一点点小的好处、小的甜头，远远不够。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很好，而且很不稳定。政治等其他领域都会影响到经济。”

32、“中国要腾飞起来，就要找到最适合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展的机制和政体，这样才能把所有的问题一一扫清。她说，如果一个房间特别乱，只有一个桌子比较整洁，你在里面做事的话，也很难安下心来。就是混乱现象互相渗透的结果。”

33、“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expectation（期望值），如果你这种期望值是一种很健康、很向上的话，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走得很好。期望值往往是由政府的体制决定的，如果政府体制不好的话，法律跟不上，经济发展就会小心翼翼，你可能发展了很多很多年，积累下的资本，可能由一次政府的暴动洗劫一空，什么都没有了。或者说，政府改一个政策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让大家投机心理很严重，但真正是建立起资本的可能性很小。”

34、“现在中共统治下的经济既有欺骗性，也有滞后性。它是滞后于时代的，不是跟时代连着走，而是过去的积累留到现在的基础。如果往上走的话，就需要积累，需要合理的政治体制作为基础。否则，如果往下走，就会突然一下子崩盘。”

35、“现在所有的隐患都把底儿已经掏空了，还没有掏空之前，好像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壮。但实际上，有些问题在内部越来越大的时候，要垮掉是非常容易的，要重建却很难。”

36、“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政权不会长了，这一代会毁在它们自己手里。像共产党这样的做法，不出多久，肯定要灭亡，大家就看着吧。”

37、“大厦将倾，墙倒众人推。人民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对人民不信任，政府内部人和人之间也不信任，人人自危”。

38、“自西藏事件以来，国际社会有一种趋势，不是排华，而是排中共政府和中国大陆内部搞的不正常的思潮。”

39、“哪怕是苟延残喘的政权，也会有它很可怕的、会放冷箭的可能性，毕竟这么多年了。哪怕是苟延残喘的政权，始终是一个暴力政权，还是要对它很小心。”

40、“中国人现在沉不下心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中共在文革时期把孔子等都打成这个派，那个派的，指鹿为马。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非常多的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如果连自己的文化都不能接受，恐怕走得不会太远、不会太深。没有根的东西没办法发芽，即使发点东西也会很快就枯萎。”

41、“文化是最强大的武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创造出来的文化价值，不会比过去几千年创造出来的文化价值更大。现在一些新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表面现象”。

42、“能够和所有中国人手拉手在一起，创造历史，创造一个中国未来积极发展的历史，这个事情很好，比人生庸庸碌碌的过要有价值得多。”

43、“爱国不是爱党，也不是爱政府。真正的爱国是为了国家的进步。真正爱国的人是敢于说逆耳忠言的人。”

44、公开信一份：

今日的示威游行已然结束，然余波未平。我就是今天站在两方之中做调停之人，有些逆耳忠言在人前不便多言，如今汝愤气稍停，不得不向你尽述。

今者示威不可谓不雄壮，各位尽兴而归不可谓不快意。然若只知拳脚相加，怒气相向，那是初学者的姿态，也无君子雅量岂不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恰中了后发制人者的圈套曹植被逼而赋《七步诗》，至今忧思难忘：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西藏既乃我国之领土，岂可随意抛弃抑或给予他人！然步步相逼，只会化友为敌，将原本平和的西藏各众逼上梁山，从而背水一战，造成不可收拾的严重冲突。试问西藏与中国和美

国孰亲孰远？卧榻之上，岂容他人安睡？亲不记仇，才不致引虎归山，将我们的西藏向外推去，自给别人。我与西藏逾亲，则美与西藏逾远，否则彼必倒戈，则我方身旁插上美之飞地也。

孙子曰：穷寇莫追。亦言：损刚益柔。老子云：上善若水。战略上，攻心为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大事者，能忍人之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为中华之崛起，此方为用人之时，我们要有容人之度，容人之量。我不是让你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备战，消除怒气，头脑才会清晰，思维才能敏捷，决断才会正确，看清局势，方可从容应对。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后退一步，让对方露出破绽，然后一招致命。愚蠢的拳师一上来便大施拳脚，使出全部看家本领，反而会被对方摸出门路，为敌牵制岂不闻"棍棒之下无孝子"，拳头威逼之下，别人的满口应承哪里能是真心？因而应该以德治国以理服人，退避三舍而后发，卧薪尝胆而后能，而非图一时之快，争一朝之胜负。汉武帝的"有为而治"之初用了一招非常厉害的"无为而治"的"推恩令"，表面上遵从各藩属国的意愿，恩泽四方，实则将大国化为无数无法作为的小国，矛盾自解。我们应该努力让道义的天平倾向于自己，把舆论压力留给对手，让他们的拳头打在蜘蛛网上，让其像小丑一般自讨苦吃，何必苦苦相争，反而给自己造成无限烦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他们的观点不甚了解，其实又何尝完全洞悉己方观点？由此可见，在知识领域，我们也没有占据战略上的制高点，并没有比对方高明多少，反而自揭伤疤，在人前落得个不好通融的形象，对树立良好的中国大国风范没有益处。自然，西方主流媒体的报导有失公允，但是反顾自己，难道我们的媒体就完全公正，不偏不倚？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要主动沟通，掌握先机，方能克敌制胜。此外，关于讲英语的事，我有一言相劝。语言是重要的沟通工具，技艺高超者，母语外语都能从容应对，主场客场都可打赢，其实依我看，国人不愿讲英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原则问题，不过是学业不精，不愿在人前露丑，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总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大智大慧，岂可因噎废食，因小失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西藏与我们唇齿相依，所以关系处理方面应比美国更小心谨慎才是，美国人是要把我们放在炭火上烘烤啊！切莫让其得了便宜还卖乖！杜克乃修身养性之地，愿诸位今后能够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槁朴而震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成为经世致用的奇才，而非为五斗米而折腰。

王千源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写于凌晨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94：2008 年 4 月 29 日中国新民党悼念林昭女士的吊文祭词

昨天（4 月 24 日），我与中国新民党南京党部部分同志去坐落于南京郊县溧水的无想禅寺春游。这里群山环绕，山森葱郁，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环境幽雅宜人，众多文物古迹散布其间。

无想寺始建于六朝时期，得名于佛教经典。无想，即无念。禅宗认为“无想”是众生修成正果的根本途径。在唐、南唐、宋代曾四次重建，几度易名，直至清代又复名无想禅寺。当时，香火极盛。

可惜寺院在清末战火中被烧毁，仅留遗址及简易佛堂一间。目前，当地人民正在努力重建，已在原址兴建了毗卢宝殿，另有西方三圣、天王殿、观音殿、钟楼、鼓楼、藏经楼、方丈楼、放生池等正在施工中。

世间欲望的根本在于一己之权力。财欲，就是对财的权力欲望，色欲，就是对色的权力欲望。妄图让一己权力永不易手的就是专制专权。公权民治就是反对专制专权的思维，也就是民主思想。

专制专权，是为一己或一党私利思想，而公权民治是为黎民百姓公权思想。前者即为“党同伐异”，后者必将“天下为公”。

“党同伐异”，是对私利的“想”，而“天下为公”是对私利的“无想”。

民主主义者，对私利“无想”之人也，一心“讲信修睦、天下为公”；而专制者，“大道既隐，各私其私”。

当我登上山巅，在清澈的“天池”旁流连，眺望远方的“无想禅寺”。我突然想到，“无想”境界其实就是坐忘“私利”、泯灭“专权”，一心为民，实现民主。建立民主体制，让世人无有专权之想，即是“无想”。

环顾四周，吾等众人决意在民主实现之日，定当在此修建中国民主人士灵堂，让无数民主先驱在此安眠。

中国民主人士灵堂为中式古典青砖绿瓦建筑，另改北京毛泽东纪念馆为中国民主纪念堂，陈列所有为中国民主而牺牲的民主先驱的事迹史料。

至于毛泽东尸体，本党认为尸体暴于大庭广众之下，不符合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建议民主政府应联系其家属，将其搬迁至原籍入土。

晚上回到家中，重庆的胡世晨先生发来成都古井兄撰写的《吊林昭赋》，请我过目修改。此文字字珠玑、掷地有声，读后令人回肠荡气。

我当即回信曰："此文极好，无须修改。"

胡世晨先生与林昭女士为同时代人，且与遇罗克、遇罗锦兄妹为故友，又是辛灏年先生的挚友，为人真诚忠厚、做事稳妥可靠。

4 月 29 日，是林昭被中共杀害 40 周年的纪念日，日前，在各地组织悼念林昭女士的同志悉数被中共盘查讯问。且有密报中共警方已在苏州灵岩山下的林昭墓前安设了监视器，且告知当地村民不要为悼念者带路。

呜呼，被枪杀于 40 年前的林昭女士，竟让 40 年后的中共惶恐如此！

悲愤之余，亦有喜念，中共的气数和民心之觉醒，于此可见端倪。

现公布中国新民党 4 月 29 日悼念林昭女士的吊文祭词，全文如下：

吊林昭赋

昔有彭氏令昭者，苏试榜首，北大俊彦，蕙质兰心，沉隐多思。研习文学，呼名林昭。昭者，刀在口上之日矣，言时无心，一语成谶。

当其时也，前途未定，众意彷徨。强国无路，主义死胡同；役民有方，思想活阎王。

魑魅魍魉，小鬼本是恶欲当道；琴瑟琵琶，大王妄颂盛世荣昌。

言左言右，制造争斗，浮夸之风日盛，乱世之象渐呈，民不聊生之祸，匿于群情激奋中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上不免开朝元勋，下不嫌躬耕农黎。

口舌之牢，文字之狱，遍之中国，腥风血雨。

五十万莫名罪者，一千三未名湖人，枉受羁押，屈遭身辱。昭列其中，犹沧海一粟耳，然其自杀殉志，未遂益罪，既入高墙，不思改悔。

人造天灾，饿殍浮渠，怒斥方遒，无惧后生。

语似惊雷，敢言人众受一骗；体如弱柳，堪承狱杂施千凌。

书至日报，信达有司，欲以其明，而昭世昏，蚂蚁撼树，奈其根深。

累挫，日受酷虐，未稍减其刚烈。

其狱中诗云：祇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昭之言，之行，诚如是也。而其言凿凿，以志抗暴，宁死不屈，血书不断，密杀之祸必至矣。

身死体灭，谁曝残行。中共索取五分弹钱之时，亲属方惊林昭噩耗之至。家受其累，居无宁日，父辞于早，母癫于后。

寄世亡躯何在，雨潇潇而音杳杳：伴冢衣冠空存，松茸茸而草青青。离奇夭娇，山河愤色。云漫漫若祭幡，风飒飒以招魂。屈子前远，董道而蹀躞，汨罗江水沉屈愿；昭女后继，独醒而罹难，灵岩寺鼓鸣昭心。私有民主福利，文明三大基石;囹圄凌虐子弹，越世一介孤魂。长歌当哭，风雨如晦。挽我勇者，独此一人。

其思想者，清明而澈；其胸怀者，且博且爱；其勇气者，坦己过而抗强暴；其执着者，累仆不辍，虽九死其犹未悔。

因思而言，因言获罪，因抗成囚，因持而殇。由思至变，忤强不遵，大智者之道，大勇者之瞕。

以其弱女柔躯，亦刚亦直，生死置之度外，举世须眉赧颜。

党圣不死，大盗不止，欺世盗名，欺民盗利。国命多舛，个岂独避。

追之慷慨，念之唏嘘。前赴后继，岂曰无人。沧海虽阔，众志成济。

横槊而赋，击戟而歌曰：民运无需主，自由福当来。霹雳一声雷，混沌天地开。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95：今日吾友在杭州被"禁茶"，以是观之，人谓中共不仁，吾信也

刚刚得到消息，今天（4 月 25 日)五十多位浙江省的维权人士聚会喝茶竟遭中共八十多位特务、警察包围，随后，邹巍、陶恒良等三人被中共警察强行带到西湖区玉泉派出所盘查讯问一小时。释放之前，他们被警告不要"聚众喝茶"，否则会被抓捕。所有喝茶的人均被检查、登记、录像。

邹巍表示，公民有权在家一个人喝"独茶"，也有权在茶馆约请朋友喝"众茶"。喝茶议政，是行使"参政议政"的公民权利。人民是主人，中共是仆人，主人有权"清议"仆人。

不料，中共警察却要求公民喝茶要提前请示，并在得到中共警察批准后，才可以到茶馆喝茶。

得此消息，我唏嘘不已。我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以茶闻名于世久矣。从“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顿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等诸多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茶与中国人的关系。

国人“聚众喝茶”久矣，据记载两晋时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的称呼多见于长江流域；两广多称为茶楼；京津多称为茶亭。此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茶屋等称谓。

顺便说一下，我对西藏的研究考证显示，如果中国没有茶叶，古代西藏是根本不会愿意和内地统一的。藏族由于地处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大量的高脂肪，由于没有蔬菜，需要用茶叶分解体内脂肪。故藏族特别嗜茶。茶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自然成为藏族地区所需的大宗商品。唐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随之西藏饮茶习俗蔚为时尚，以使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西藏高原，地势高亢，气候干燥、寒冷，藏族同胞主食以糌粑、牛羊肉、酥油及奶制品为主。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茶品成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须品。据《滴露缦录》记载：“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民间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可见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

2005 年，我在川藏地区的贡嘎山与藏民生活在一起，每日喝藏民的油茶，吃藏民的糌粑，以至于回到南京后，面对汉食多日没有胃口，一心思念油茶糌粑，夜不能寐。

西藏地区由于它的特殊地理环境，根本不适宜生产茶叶，所需饮用茶叶全靠内地运去，千里迢迢，马驮车载，从唐时开始，已有千年。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条被誉为“第二条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这条滇藏贸易的重要通道，远在西汉时已现雏形。它东起云南和四川，会合于西藏昌都地区，并穿越西藏中南部。藏人需茶，汉人需马，于是茶马交易成为汉族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此即“茶马古道”的由来。

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古代印度向西藏不断输送茶叶，西藏一定百分之百的归向印度。所以，我们在西藏问题上，也要感谢茶叶呢。

杭州人爱茶，与西湖是中国高品质茶的著名产地有关，我知道 4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杭州有 2008 中国(杭州)国际名茶博览会，其主题是“聚天下茶事，展神州茶品”。没想到杭州市民在 4 月 25 日，也就是在这个国际茶会期间喝茶，也被中共禁茶，实为咄咄怪事。

其实也不难思忖，中共杭州警察的“禁茶”，实质在于不让中国人民在一起“清议国事”。因为中共特务认为，此等“清议”对“党国”不利。其实中国人民谁都知道，“清议” 对专制政党不利，但是对国却很有利。而专制政党的思维，向来就是“朕即国家，党即国家”，所以，他们自然要“党国不分”，对党不利的清议民意，也就自然被他们界定为“清议误国”了。

今天的杭州禁茶事件，让我想起了春秋时代的一个故事，即“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

郑国在春秋属于强国之一，但是郑国原本是一个小国，它之所以能变成强国之一，依靠的是明主和贤臣。最初是葛繻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郑庄公声威大振。宋、卫、陈等宿敌都来求和，郑国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前 701 年，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结盟，俨然已是诸侯霸主。再后来是郑子产成为千古名臣。

子产就是公孙侨，是郑国的首相。孔子对子产推崇倍至，“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当时，郑国的人民喜欢聚集在“乡校”议论当政者的得失。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只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的。毁乡校的确很容易，但是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不做；不如开个小口导流，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

然明听后很惭愧，对子产曰：“小人实不才”。

仲尼闻是语，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与子产不毁乡校比起来，今日中共禁止人民喝茶，“以是观之，人谓中共不仁，吾信也”。

中共的“禁茶”，与王安石的“钳天下之口”有的一拼。王安石施行新法，原来的中书和台谏多为变法的反对派。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后，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御史，《宋史·王安石传》列举了四年中被王安石罢免的 19 位台谏名单，之后“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南宋章如愚在《山

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安石对中书、台谏实施“禁谏”之后，熙宁五年，王安石下令设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议论新法。并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以严厉的措施管制和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其结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离散，40 多年后，北宋灭亡。

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令人百读不厌，但是我想中共领导人一定没读过，否则也不会有今日“禁茶”之丑闻。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

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中共居天安门以治地理，住中南海以辖黎民，其间皆有华表树立，不知中共是否知晓此华表为何物也？

华表即古之“谤木”。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汉孝文皇帝时期也曾明令竖立谤木，因而一朝盛世与此有极大关系。《后汉书·蔡邕传》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因为有此等胸怀，汉武帝同样成为一代天骄。静心听取不同意见，不仅仅是胸怀博大，那也是自信和勇气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

复观中共今日之“禁茶”，当知中共无人懂得“华表”之深意。

呜呼，我巍巍中华，竟被宵小窃据，实乃吾族之大不幸。仲尼如在，当叹：“以是观之，人谓中共不仁，吾信也”。

郭泉：民主先声 196：谈 CNN 主播卡弗蒂先生“China”的英译汉问题暨中国与中共之关系

4 月 9 日，CNN 在转播北京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主持人卡弗蒂说中共“过去五十年就是一帮‘goons and thugs’”。此话引起中共强烈不满。因为中共把 goons and thugs 翻译成“蠢汉和暴徒”。

15 日中共外交部说，卡弗蒂的言论反应了他对中国的“无知和敌意”，并要求 CNN 和卡弗蒂向中国人民道歉。

此后，卡弗蒂在时事栏目中澄清说，对于他此前所说的“goons and thugs”，他指的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

CNN 也发表声明说，不论是卡弗蒂先生本人，还是 CNN，都无意冒犯中国人民 (CNN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at it was not Mr. Cafferty's, nor CNN's, intent to cause offense to the Chinese people) 。CNN 声明说，评论是对“中国政府而非中国人民”;“多年来卡弗蒂曾对包括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内的很多政府发表过批评性言论”。 CNN 并在 16 日的文章中质疑中共外交部是否看到了卡弗蒂的声明。

北京时间 4 月 17 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在头条文章刊登中共外交部 16 日再次要求道歉的报导。报导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指出，CNN 在 15 日发表的声明中“未作出任何道歉”。此后，卡弗蒂和 CNN 都不再搭理中共的胡搅蛮缠。

于是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组织，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等，煽动民族主义并组织发动了在海外反对 CNN 的活动。

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CNN 主播卡弗蒂先生到底发表的是“辱华”言论还是“反共”言论？

其实，全世界并没有所谓的“反华”言论，只有“反独裁专制”言论。对目前中国来说，由于中共在中国实行独裁专制，所以，反对中国的独裁专制，就是“反共”。

对中国新民党来说，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实行独裁专制，那么新民党和中共就是竞选党。多党共同接受人民的选择，也就无所谓反共之事之言了。

我们先看卡弗蒂先生的第一句话：“Well, I don’t know if China i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这句话我们应该这样翻译：我不知道（五十年来）中国是否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与中共政府的关系肯定有所变化。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翻译问题，就是关于 China 的翻译。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英文秘书专业，我们的学习目的要么是做外资企业中方经理的英文秘书，要么是做外方经理的中文秘书。我的这个专业的主要科目是英语、秘书学、商务和社会学。虽然在国内学英语无法达到精通，但是关于翻译的“信、达、雅”三境界，我还是很清楚的。

China（中国），其实有很多层面的含义，例如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等等。卡弗蒂先生的第一句话里出现里两处 China，而卡弗蒂先生本人是美国著名的政论时评主播，所以这里的 China，应该理解为“政治中国”。

再从他说的与 China 的关系（relationship）可知，他说的是两国关系。那么是两国什么关系呢？是文化关系还是经济关系，还是军事关系等等呢？这些关系的核心关系是什么呢？

答案是唯一的，卡弗蒂先生所说的与 China 的关系，是政治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才可以维持或改变政治关系呢？答案也是唯一的，即两国政府。

那么两国政府又是谁在主持政治业务呢？答案更是唯一的，即执政党。

美国的执政党是民选的，而中国的执政党是在五十多年前颠覆中华民国政府而获得的。于是才有卡弗蒂先生最后的一句话：“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目前，我所看到的所有中共网站和中国左派极端民族主义的网站文章都把 goons and thugs 翻译成呆子和暴徒。其实他们都错了。

我们先来看看 goons 这个词。1938 年 E.C.色加的作品把这个词用作“受雇暴徒”， 根据《美国传统词典》定义：“受雇暴徒，恐吓或伤害反对者。”

再来看 thug 一词，根据《兰登书屋词典》，其意义为“残暴的，邪恶的流氓，强盗，或凶手”。其来源为 1800 年到 1810 年间，印度语“thag”一词，印度语意为“恶棍，流氓，骗子”。1810 年时，印度一群杀人凶手和强盗勒死了很多老百姓。自此，该词被列入英语词典之中。

很显然这两个词带有政治和法律色彩，当然针对特定的人和人群使用。

所以，这一句话的准确翻译应该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肯定有改变。我认为，基本上同过去 50 年一样，中国政府一直是一帮恐吓或伤害反对者的暴徒和杀人凶手。”

我们再来看看卡弗蒂先生这一段话里的其他句子。

卡弗蒂先生提到了美国对中国的“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的贸易逆差。中共左派民族极端分子的翻译是“数以亿计”，而我收集的美方商务部情报是 2007 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达 2563 亿美元。

我再交代一下什么叫贸易逆差。所谓贸易逆差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口贸易总值大于出口总值，俗称 “入超”或叫“贸易赤字”；2007 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达 2563 亿美元，这说明相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外汇储备减少，美国商品国际竞争力弱，美国在对中国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大量逆差将致使美国国内资源外流，对中国债务增加，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国民经济正常运行。

卡弗蒂先生并没有指责中国不对等进口美国的产品，他认为造成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是美国在伊拉克的“the war in Iraq”（伊拉克战争），这说明卡弗蒂先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卡弗蒂先生为什么要评价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是“junk”呢？

“junk”有很多意思，不过含义都有些相近。1、泛指任何旧的或废弃的材料，如旧金属，废纸或破布等。2、泛指任何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或可轻视的东西、废物等。该词于 1480 年到 1490 年间被创造出来。原源不清。

他说，“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ed pet food”。这话的翻译是“我们不断进口他们的垃圾产品，比如带铅油漆的垃圾产品和有毒宠物食品”。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让美国人震惊的“中国带铅油漆的玩具产品和有毒宠物食品”的事件。首先是中国含铅玩具问题，2007 年 8 月美国玩具制造商 Mattel 在世界范围内召回中国制造的含铅玩具。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百分之六十的回收产品为中国制：其中有十八件、共六百七十万份的儿童玩具首饰配件因含铅量过高遭到回收的案例，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数据显示，美国市售玩具的八成为中国制，为防止有毒玩具流通，四名国会参议员（杜宾、纳尔逊、舒默与克罗布查）联名致函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要求七日内评估美国是否应该扣留检验所有自中国进口的含漆玩具。

在这封给委员会代理主席诺德的信件中，他们表示，“中国进口产品公然违反美国安全标准的次数频仍，令我

们感到不安。”

2007 中国绿色人居地产大连峰会上梁晓先生的一篇文章这样写到：“绿色建筑是从 1970 年开始提出的，美国提出了一个绿色的标准，就是污染的一个标准开始，到 1971 年又成立了一个不允许带铅的油漆用于婴儿床或者玩具上面的法律，开始禁用。我们前一阵发生的中国的出口美国的玩具含铅，后来被美国打回来了。后来又发生深圳的制造商用的商标含铅的质地。为什么铅在美国的反映那么大，但是在中国无所谓，因为美国调查，铅对孩子的学习能力有非常坏的影响，他们说小孩因为有了铅的影响，学生没有办法集中，成绩不能提高。欧洲国家也认为小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差异，跟铅有关系。让这些小孩子接触到这些铅的东西，他们的智力会下降。”

2007 年 6 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禁止由中国进口五种养殖海产，直到有证据证明这些海产没有毒物残留；此前，美国国家公路运输安全管理局也因安全问题下令回收四十五万只中国制轮胎。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有毒宠物食品”事件，2007 年 4 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饲料中被发现含有有毒化学物质，造成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宠物食品回收；其后，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也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国制的牙膏。

我记得 2007 年我收看美国电视，一个美国小女孩子抱着她的已经死去的宠物狗在电视里哭着说：“我再也不要中国的宠物食品”。

后来我的一个美国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的狗都有抗毒性？这让我感到很难为情。

言归正传，结合上下文，卡弗蒂先生在此针对中国政府的言论里所说的“China”是特指“中共”。而中国外交部的翻译人员却将此翻译成中国或中国人，我认为，他们不是英语水平不好，就是别有用心。

附原文如下，请大家研读、思忖：

“Well, I don’t know if China i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We’re in hawk to the Chinese up to our eyeballs because of the war in Iraq, for one thing. They’re hol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our paper.

We also are running hundred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rade deficits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ed pet food and export, you know, jobs to places where you can pay workers a dollar a month to turn out the stuff that we’re buying from Wal-Mart.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97：明天灵岩山会发生什么？从此中共的敏感日又将增加一个“429”

今年春节后，号召大家祭奠林昭的“林昭七杰”在祭奠文告里这样写到：有人告诉你们要为国家争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我告诉你们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绝不是靠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他们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地景仰林昭、热爱民主的同道中人响应。目前已得到消息，各地才俊正向苏州集结。

但来自前线的情报显示，苏州灵岩山下已经草木皆兵。安息公墓隐蔽的角落已经安设好了摄像头，当地的村民也被警告在 4 月 29 日全天不得出门为祭奠者带路。警队、警车均已各就各位。

429，终于成了中共的“敏感日”。所谓“敏感日”即中共认为可能造成群体事件，需要严加防范的日子。一个中共警察曾对我抱怨说：“公安部下达的全国性敏感日 100 多天，省厅市局下达的地方性敏感日好几十天。两项合计全年的敏感日接近 200 天呢。”我后来看到过一份中共警察的“敏感日”材料，密密麻麻地几乎写满了年历。

我想，明年公安部下发的全国性敏感日材料中，一定会增加一天，即 4 月 29 日。

刚刚得到消息，“林昭七杰”悉数被中共拘禁在家中，不得离开。他们是：张辉、李铁、刘兰、胡迪（林年锦）、黄飞、王海、李龙。

但他们都在家中写好了遥祭林昭的吊文。

关于林昭女士的详细事迹和其他吊文祭词，可参阅《民主先声·172：清明（4 月 4 日）在苏州灵岩山下的林昭墓前》和《民主先声·194：2008 年 4 月 29 日中国新民党悼念林昭女士的吊文祭词》。

一小时前，“林昭七杰”要员胡迪（林年锦）先生给我发来了他的祭词，请我修改润色。

此文情真意切、爱憎分明。调整数句并稍许润色后，予以公布，如下：

林昭遇害40年祭——胡迪遥祭

循着心灵之约，踏上一级又一级的石梯，一直往上走到安息公墓的铁线网围墙处，然后再向右手的方向走三米，这时你会感触到一个伟大而高尚的灵魂正在与你心灵相通。

四十年的风吹雨打，四十年的刻意抹除，林昭依然屹立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林昭并不孤独，她从来都不孤独，无论在她的身前还是逝后。

五次的灵岩山之旅，使我认识到林昭女士是真正的强者。

但是今年，我却被曾经杀害林昭的凶手的同党们拘禁在岭南家中。真乃“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万分悲愤，黄碟祭洒，眺望吴越，愿与林昭并肩奋战，愿与国人同仇敌忾。

多年来，我一直想在灵岩山林昭墓前唱一首歌，一首能让林昭听见的歌。

可是，每次在林昭墓前，微风息来，心香一瓣，都能听得见林昭在对我低语。

我的歌永远都是多余的，因为，每一缕微风，每一瓣花香，分明是一首首无言的诗、无声的歌。

可恨当年中共为巩固用暴力夺得的政权，先用引蛇出洞的“阳谋”骗取林昭等一大批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后就是对那些“百花”的无情摧残、残酷打击。

一时间，为图生计而放弃理想的有之，为稻粱谋而噤若寒蝉的有之。然林昭不顾生死，捍卫真理。面对利诱、毒刑，林昭毫不动摇，乃真英雄也。

1968年4月29日，中共在上海龙华机场的第三跑道上将顽强不屈的持异见者林昭女士秘密枪决、并毁尸灭迹。

天理昭昭、罪恶必罚。

林昭虽被中共秘密杀害，但她却依然活着，她活在一切反专制、争民主的中国人心中。杀害林昭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林昭的笑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再有十几个小时，我的战友们就会在林昭墓前祭奠林昭了，而我却不能来到林昭面前，但中华民族的高尚灵魂已在此刻缠绕在我的心田。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林昭的思想之花已经在当代绽放了。

时间记忆着、历史的脚步印记着、大地的磁场记录着、四季的雨水滋润着、人们的热泪在心底刻画着林昭思想的痕迹。

林昭，我们没有忘记你，林昭，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

到灵岩山上寻找林昭灵魂的人们就如万家灯火相拥着映照尚是黑暗的大地。

在林昭墓前流淌的热泪，那是对高尚灵魂的敬仰。

一排排一个个留在灵岩山上的脚印，那是通往自由的前哨；

一个个深深的鞠躬，那是冲破牢笼铁幕的前奏！

一首首悼诗祭词，那是发出时代最强音的战斗檄文！

林昭长眠在灵岩山，守候着太湖水；但林昭是树立在我们心中的灯塔，时刻为我们引航。

尧舜曾生活过的大地不再是单纯的大地，对于专制独裁者来说是个表演历史丑剧的舞台，但对于追逐自由和想拥抱自由的人来说却是我们与独裁者生死搏斗的战场。

逝去之圣女必将流芳百世，未死之权贵早已臭不可闻。

左右宵小随处监视，前后鹰犬时刻骚扰。叹不能亲去墓前祭洒，后生胡迪作上文以遥祭。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198：中国新民党关于“428”列车颠覆相撞事件案情分析会议通报

4月29日凌晨，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集全体中国新民党交通委员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的党员同志，就“428”淄博列车颠覆相撞事件的召开案情通报、案情分析会议。

根据中国新民党山东党部的调查，案情如下：

4月28日4时41分，北京开往青岛的T195次旅客列车运行至山东省境内胶济铁路周村至王村间的弯道处T195第9车厢至第17车厢脱轨、颠覆，脱轨车厢侵入上行线轨道，被上行线由烟台开往徐州的5034次旅客列车碰撞，造成5034次列车机车及机车后第1至5位车辆脱轨。已证实70人罹难，416人受伤，罹难者均为T195乘客，5034

次乘客没有死亡。

中国新民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的专家认为，列车脱轨、颠覆只有两种原因，一是针对铁轨或是针对列车车轮的爆破，二是弯道超速，致某节车厢的离心力达到脱离轨道的最大值时导致车厢间的连接头脱落。

而爆炸会留下十分明显的痕迹，例如火药等（爆炸物）残留、爆炸中心点的位置、爆炸损伤等，但是，截止 4 月 29 日 12 时，中国新民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并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情报。另外，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也断定中国共产党不至于会隐瞒这样的情报，所以，中国新民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排除此案为爆炸案件。

中国新民党交通委员会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认定本案是由于弯道超速导致第 9 车厢与第 8 车厢间的连接头脱落，在后部车厢的强大推力下，第 9 到第 17 节车厢出轨离线、颠覆。其中第 17 节车厢侵入上行线轨道，遭遇上行线的 5034 次旅客列车撞击。

T195 第 9 车厢至第 17 车厢脱轨、颠覆，本已有伤亡，又遭遇 5034 次旅客列车撞击，导致伤亡扩大。

中国新民党交通委员会认为，此案案情复杂，可分为两个过程，第一，T195 第 9 车厢至第 17 车厢脱轨、颠覆，系弯道超速导致。第二，5034 次旅客列车撞击侵入 5034 次列车轨道的 T195 倾覆车厢，系“刹车制动无效”或“根本没有实施刹车制动”导致。

关于 T195 次列车的车速问题和弯道问题：

胶济铁路是德国设计建造的，1897 年 6 月，德国在柏林设立山东铁路公司。1897 年 9 月 23 日，胶济铁路动工。1901 年 4 月 8 日，青岛到胶州段通车。1904 年 6 月 1 日，全线竣工通车，至今仍然在使用。

周村至王村区间是个很复杂的线路，弯道很多，有一个弯道几乎是直角。在较后的车厢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列车机车，且由于地基设施等问题，周村至王村区间限速为每小时 80 公里。

也就是说，“大提速”到周村至王村区间就必须是个“大减速”。但是，4 月 28 日，T195 次到达周村至王村区间，非但没有减速，却开到了时速 131 公里，结果导致车厢出轨、颠覆。

那么，T195 次列车为什么不减速？

列车司机是严格按照列车操作手册驾驶列车的，绝对不会擅自在限定时速为 80 公里的区间提速到时速 130 公里。

根据列车时刻表 T195 次列车 04:25 应该从淄博出发，4 点 41 分应该到达打虎山附近。而根本不应该到周村至王村区间，显然，T195 晚点。

即使如此，列车司机也不能私自提速，列车司机只有在接到铁路局调度监控室的全线提速到时速 130 公里的命令后，才有可能在限速 80 公里的轨道上开出 130 公里的速度。

路基在设计速度（时速 80 公里）之内无法承受高速（时速 130 公里）拐弯带来的压力，发生变形，这是列车出轨的主要原因。

关于 5034 次列车“刹车制动无效”：

一列时速在 100 公里左右的列车需要 800 至 1000 米的刹车距离才能完全停下。也就是说，如果 T195 倾覆车厢侵入 5034 次列车轨道时距离正在迎面行驾的 5034 次列车只有 1000 米内，那么 5034 次列车此时刹车制动已很难避免惨剧的发生。在 1000 米内，时速在 100 公里以上的列车遇到前面有障碍，在进行紧急刹车的情况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撞上去。

关于 5034 次列车“根本没有实施刹车制动”：在没有发现前方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直接撞击。

关于 5034 次列车“能见度”和 5034 次列车的前照灯问题：

T195 倾覆车厢侵入轨道，两车相撞之时是 4 时 41 分，此时为黎明前的黑暗，列车司机凭借列车的前照灯观察前方铁轨。

目前全世界最好的列车前照灯只能照到 800 米。而我国的列车前照灯的照射距离均不足 300 米。目前，铁路机车前照灯主要使用封闭式机车灯泡，例如，在广九线上运行的瑞典进口摆式列车前照灯是由六个封闭式灯泡组成，在青藏线上运行的美国进口机车前照灯是由四个封闭式灯泡组成。当四个灯点亮处于强光时，照射距离约 200m，六灯全亮也不会超越 300 米。

国外机车目前基本使用卤钨灯泡为前照灯光源，如：德国 NY6 型、前苏联 8G 型、法国 ND4 型机车等，照射距离 200m 到 400m 不等。从日本进口的 6K 型电力机车使用氙前照灯，亮度较高，照射距离约为 700m。金属卤化物灯（简称金卤灯）可达到 800 米。

因此，如果 5034 次列车司机通过列车前照灯观察到 T195 列车的侵入车厢，再刹车制动完全无法避免撞击的。

但是，列车司机真的只能通过列车前照灯观察前方的障碍物吗？

列车司机在夜晚主要是依靠“通过信号机”的指示决定行驶还是停驶。“通过信号机”的作用是防护自动闭塞线路上的闭塞分区或非自动闭塞线路上的所间区间，指示列车可否进入它所防护的闭塞分区或所间区间。通过信号机一般设在闭塞分区或所间区间的分界点。

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第 61 条，通过信号机应设在闭塞分区或所间区间的分界处。自动闭塞区段的通过信号机，不应设在停车后可能脱钩的处所，并尽可能不设在起动困难地点。两架通过信号机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1200 米。当采用 8 分钟列车追踪运行间隔时间，在满足列车制动距离及自动停车装置动作过程中列车走行距离的条件时，可小于 1200 米，但不得小于 1000 米。

T195 次列车的机后 9-17 位脱线颠覆并侵入上行线的限界后，肯定有车体架在上行线的钢轨上，这就会让防护这个闭塞分区的信号机显示停车信号，在 5034 次列车没有进入该闭塞分区及司机正常驾驶及机车信号设备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撞上 T195 的。

所以，5034 次列车撞击 T195 次列车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T195 次列车的机后 9-17 位脱线颠覆并侵入上行线时，5034 次列车恰好在此闭塞分区里，5034 次列车刹车制动无效。

二是，T195 次列车的机后 9-17 位脱线颠覆并侵入上行线时，5034 次列车不在此闭塞分区里，但是，“通过信号机”没有自动亮出一个红色灯光。红色灯表示：列车应在该信号机前停车，不准列车越过该信号机。相反，该“通过信号机”却亮出了“一个绿色灯光”，表示准许列车按规定速度运行；或是亮出了“一个绿色灯光和一个黄色灯光”，表示“准许列车按规定速度运行，要求注意准备减速”；或是“一个黄色灯光”，表示“要求列车减速运行，按规定限速要求越过该信号机”。

中国新民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认为此案件当事人（济南铁路局相关人员及其负责人）明知该区间为限速区间（限速 80 公里），却指示列车司机提速到 130 公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为中国新民党交通委员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向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提交的案情的调查分析报告，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委员充分研究、辩论，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签署此文本。

附件：

T195 是青岛三趟特快进京列车的“三朵金花”之一，其前身为 1950 年 4 月开行的 39 次列车，在当时，是山东省第一趟进京列车，全路首批红旗列车。

北京申奥成功后，青岛被指定为北京奥运帆船比赛的分会场，是除北京以外，唯一能够举行开闭幕式和点火仪式的地点。当年，青岛客运段脑筋急转弯，为红旗列车注册了全国第一件旅客列车服务商标“海之情”。受此影响，青岛市决定用“海之情”作为对外商标大力宣传，施行奥运战略，并扩大至整个山东省。

2004 年 5 月 15 日中国首列“奥运宣传列车”揭牌仪式在北京火车站举行，两列对开的青岛—北京列车被作为奥运主题列车，“海之情”作为其中之一，这一创意被中共称为“将载入百年奥林匹克史册”，“海之情”作为第一列以奥运为主题的国内宣传列车而倍受吹捧。

李莉作为该奥运主题列车的列车长和青岛城市形象大使，也一时成为当地奥运政治宣传的红人。

2007 年 5 月 15 日，“海之情”奥运宣传列车开行三周年后，又被青岛政府授奥帆旗，加装了第六次大提速用的“和谐号”动车组，宣称：“以更快的速度冲向 2008 年”。

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

奥运宣传车作为青岛客运段的政治大投资，进展一帆风顺。

2008 年，奥火冲刺，李莉又被指定为北京奥运火炬手，直到今天这列“奥运第一列”惨遭灭顶之灾。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Skype：gwnguoquan

郭泉：民主先声 199：致胡锦涛、温家宝两先生：虐待老人的执政党是邪恶的执政党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善待老人及落实 30 万“政调企退休干部”待遇问题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

两位领袖好：

2007 年 10 月，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2008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李克强、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在与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再次提出“中国是法治国家”的伟大执政理念。

现本人就“依法治国”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信条，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应立即解决 30 万“政调企退休干部”的国家干部待遇的问题。

一

“政调企退休干部”，是指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调进企业任职并于 1993 年以后在企业退休的国家干部。

1993 年 7 月 5 日，国家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发出了一份转发深圳市劳动局《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即国劳办发 78 号通知）。

从此，这一本是地方法规的文件，竟然在全国企业非法地普遍推行，造成 30 多万“政调企退休干部”。

那么深圳的这份文件关于“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文件能否成为全国企业都严格执行的法律文件呢？

我们先来看看深圳特区的立法权限：

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 41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同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0 月，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

1988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包括财政计划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2 年 7 月，全国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会议通过决议，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有制订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也就是说，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有权制订地方法规。之所以叫地方法规是因为这是根据本地方的特殊情况制定的有利于本地方的法规。

地方法规只能适用于地方，深圳的地方法规只能适用于深圳。

如果要想让深圳的地方法规，成为全国遵照执行的法律，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得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转发并通令全国照此执行。

所以，1993 年 7 月 5 日，国家劳动保障部办公厅的国劳办发 78 号通知，是完全非法的。

政调企退休干部，原为国家行政在编干部，是经各级中共组织考察、审查批准的，很多人手中还留有批准文书，后来走进企业也是中共调去的。

政调企退休干部很多是 1953 年前参加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无论在机关，在企业，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讲条件，艰苦拼搏。

这批老干部的确在企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正如国发（1978）104 号文《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中，高度评价与肯定了这些干部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并具体明确规定这些干部的退休条件和退休待遇标准，同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这显示当时“政调企退休干部”与机关事业人员同样享受着国家干部的待遇。

但是，自 1993 年之后，国家劳动保障部将根据法律本应由国务院转发的深圳地方法规私自下发，造成了国家对企业和机关事业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工资制度和两种不同的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干部待遇起了极大的变化，企业与机关事业的待遇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所谓的企业改革的最根本目的，其实就是，让企业干部的退休金与企业的效益、个人的效益挂钩；而让机关事业干部的退休金“旱涝保丰收”地吃国家财政。

一些效益不太好、负担比较重的企业，工资分配不高，导致退休金收入不高。同时企业职工退休时纳入退休金的项目不包括工作时的津贴、补贴，基数相对少了。特别是近年来在开放改革中，除极少数垄断企业效益尚可，绝

大多数已濒临关闭、破产、解散的边缘。

上述这些因素，都对企业早期退休的国家干部十分不利。

而机关事业单位，采取的却是结构工资制，不与效益挂钩，虽然没有奖金，但国家确定相应的标准加以保障。例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①在职时的津贴、补贴可部分带入退保统筹；②基础工资、工龄工资百分之百，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按适当比例打折扣后计发退休金；③在职人员调整工资时，退休人员亦按在职人员的调整幅度相应提高退休金；④住房补贴、物价补贴、年终奖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贴以及遗孀供养等照常享受。

两项一比较，就客观上造成了企业早期退休的国家干部待遇极度偏低，难以度日的惨景！

由于国家干部身份被取消，“政调企退休干部”每月只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相当于机关干部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吃饭、穿衣、房租、水电、治病、人情往来均在其中，生活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在对 30 多万“政调企退休干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中共当局也有注意，但是却“光说不练”。例如：2007 年 3 月 13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先生答记者问时说：“养老待遇分配结构很不平衡，很不合理，这类人员具有‘七大’特点（工龄很长、年龄很高、贡献很大、吃苦很多、待遇很低、矛盾很多、诉求最多），是我国实行养老制度后首批退休人员，也是不久将自然消失的人员。”

刘副部长还当记者面表示：“对存在明显的不合理问题，要逐步解决。第一个重点，要放在企业退休老干部、政调企老干部、老科技、老模范、老军转干方面。通过快速调查研究，制定方案，据国务院批准，用一年时间，使这部分老同志的养老金收入水平达到当地机关事业同类人员的平均标准。并同时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彻底化解双重标准矛盾，让这一部分老同志同样享受开放改革成果，同时步入小康。”

刘永富先生信誓旦旦地说，“据国务院批准，用一年时间，使这部分老同志的养老金收入水平达到当地机关事业同类人员的平均标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问题依然如旧！

二

尊老养老，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和美德。虽然，各个历史时期，尊老的制度和做法有所不同，其实质，都在于充分表达政府对耆老之人的关心和爱护。

但是，现在，我们在“政调企退休干部”的长达 15 年的上访维权斗争中，看到了太多虐待老人的事件。

第一：层层推委，矛盾上交。例如，滨海县劳动和社保局局长裴玉霞回答“政调企退休干部”的上访时这样回答：“政调企退休人员要求享受行政事业退休待遇处理办法处理，在国家、省没有新的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能否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有待于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来解决的问题。”

第二：有的地方对上访的“政调企退休干部”粗暴拒访。这简直连汉朝都不如。由周代倡导的高年授杖一事，一直延续到两汉以后，并且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特别在汉代，非常突出。 汉成帝建始年间，每年秋季，由地方的县、道政府调查户口，登记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举行授杖礼。皇帝诏书明确规定对 70 岁以上的老人不得欺殴辱骂，如地方官吏敢违犯者，全都“应论弃市”（即公开处死）。惩处如此严厉，正是确保 70 岁以上老人的应当享受的权益。东汉王杖诏书，记载了一件关于地方小吏殴辱受王杖者案件的批复，最后由皇帝判为“弃市”。事情经过记述清楚：汝南地区云阳白水亭长张熬，殴辱了受杖者，还拉他去修治道路。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件。汝南太守上报廷尉。汉代廷尉，相当现今的最高法院院长，立即奏闻皇帝。皇帝的回答很简单：还议什么？就该弃市（公开处死）。

在抄录的建始元年九月成帝刘骜即位当年所颁布的王杖诏书内，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为“人所尊敬也”；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生日久乎”？这与宣帝时所发诏令“养老令”所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耆老之人……朕甚怜之”的心态，在善待老人和尊养爱悯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现在的执政党对老人的态度，哪里赶得上汉代皇帝的“朕所怜也”、“ 朕甚怜之”的万分之一呢？

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年人是不能这样被执政党虐待的！

虐待老人的执政党是邪恶的执政党！

泱泱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善待老人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古代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就是你做再多的好事善事，首先要孝敬老人，如果不孝敬老人做再多的好事都是不善不孝之人。

在“政调企退休干部”长达 15 年的上访维权事件上，我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你们不孝！

其实，进入暮年的老人，经历了风风雨雨，对物质的东西往往是看的最淡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份公平，一份尊重。同样时间参加工作，同样为人民服务，最后退休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在中共政府机关，一个在企业，就相差好几倍，这公平吗？这是尊重吗？这能让人民满意吗？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一个国家的首要价值。

缺少公平正义的政府，是反人民的政府。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可是，我们看不到中共政府的良心。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古代帝王能做到的这十六字真言，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吗？

其实中国共产党也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把这 30 多万的老人放心上呢？让老人们在憋屈中死去，你们忍心吗？

温家宝先生曾在 2008 年 3 月 18 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时说：“我明确地讲，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

那么，我们在“政调企退休干部”问题上能看出中国是“法治国家”吗？

好，就算温家宝先生说中国是法治国家，那么，为什么在“政调企退休干部”问题上，就不法治了呢？

郭泉：民主先声 200：中国新民党（CNDP）党建党务大纲

2004 年组建的“中国民生党”自 2007 年 12 月 17 日更名为“中国新民党”（ China New Democracy Party）以来，已形成了以哲学、法学、行政等专业知识分子为核心层，广大受迫害的维权工人、农民、商人、学生、退役军人、城市市民等为基本力量的政党。

进入 2008 年后，中国新民党在各省均有长足发展。目前全国各省均有 1 至 10 个县市成立了县市党部或党小组。

为适应民主运动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中国新民党在各县市的党部建设和现阶段基本任务，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作出如下决议：

第一、关于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民主党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党。中国新民党反对专制独裁，认为只有走人民自由组党、多党民主竞选的道路，中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中国新民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

第二、关于目前本党是否需要注册的问题：

由于中国至今没有政党注册法，且中国共产党也从没有进行过任何合法注册手续，所以，中国新民党目前不谋求注册。俟中国有政党注册法之后，中国新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其他各党一同到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政党注册登记。各党完成政党注册后，依法享受平等竞选之权利。

第三、关于党员入党的问题：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大陆目前为完全开放的民主党。任何人，无论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只要反对专制、支持民主，认同中国新民党章程的年满 18 周岁的人，皆可自行宣称为中国新民党党员。入党不履行任何形式，例如，免介绍人、名册登记、党员证、宣誓等。

有志于在未来参与竞选的党员，可以自行组建本地区的党部或党小组。例如，新民党每一党员都应当尽力发展志同道合的民主人士，最少10人为一党小组，党小组成员每人再发展至少10人，依次类推，力图瞬间扩大组织。各小组或党部之间，无须联系，一切按党章及本《党建党务大纲》为工作指南。

第四、关于各县市、省、中央党部建设问题：

有志于在未来参与竞选的党员，可以自行组建本地区的党部或党小组。在目前无法展开公开竞选县市党部主席之前，各县市任何新民党人皆可以自行组建党部或党小组。俟可以公开竞选县市党部主席之时，本县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投票选举出本县市党部主席。

任何党员都必须首先归属县市党部。中国新民党任何党员皆可参选县市党部主席。各县市选举产生的县市党部主席，参加省党部主席的竞选。各省党部主席参加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海外各国的中国新民党党部也照此执行。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各国）党部主席与中国新民党大陆各省党部主席的地位平等。海外各党部主席必须回国参加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第五、关于中国境内各党部或党小组的现阶段基本任务问题：

中国新民党国内各党部的工作任务，就是用一切手段对民众宣传民主思想和积极帮助受迫害人群维权。

1、学习、实践和宣传民主思想是中国新民党最重要的工作。中国新民党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所有中国新民党党员都要深刻认识到惟有民主才能拯救中国。而未来民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我们今日的努力宣传。

中国新民党的学习宣传文件目前为：1、中国新民党党章；2、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所有公开信；3、民主时评集《民主先声》。

为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中国新民党所有党员都必须努力传播"破网软件"，例如：自由门（动态网）、无界、世界通、火凤凰、花园网。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网友获得以上五种"破网软件"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2、中国新民党的社会工作思路是"以维权促民主"、"以民生争民主"、"以服务求选票"。切实作好每个维权个案，总结提高。在实际维权工作中，把民主思想灌溉到每个维权人员的心灵深处。中国新民党为人民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各党部所在当地出现任何重大维权事件，新民党人都要积极帮助维权群众，出力、出钱、出主意，赢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力图在未来多党竞选的基层民选中获得最大量的人民选票

第六、关于海外各党部或党小组的现阶段基本任务问题：

海外各党部的工作是带领海外党员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及政治主张，寻求各民主国家民主政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积极配合中国新民党在国内民主运动的最新形势。

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各国党部，目前的活动以联络各国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为主，广泛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和政治主张。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中国即将进行的全民参与的"21 世纪的中国和平民主革命"，争取各国人民的声援和财物支持。

当国内新民党各党部同人遭遇中国共产党的逮捕和迫害时，各海外党部应在第一时间联络海外民主力量聚集到中国驻各国使领馆门前进行抗议、声援、游行和募捐活动。

第七、关于中国新民党是否需要组建武装力量的问题：

中国新民党反对任何政党组建武装力量，提倡"军队国家化"。

国家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而不是执政党的御林军。

国家军队之宗旨在于保家卫国，而非用于政党对抗。

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国家军队维持执政党地位"的歪理邪说。

第八、关于中国新民党是否需要组织大规模游行的问题：

中国新民党反对组织大规模游行。一旦游行，将难免执政党派出特务混杂其中实施"打砸抢烧杀"等特务行为，从而给执政党找到镇压的"借口"。1989 北京"64"，2008 拉萨"314"，均有特务行为。中国新民党人应努力做好具体细致的"21 世纪的中国和平民主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国民的"在家革命"要比"街头游行"更具威力。（参见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告中华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同胞书》）

第九、关于中国新民党是否需要实施恐怖袭击的问题：

中国新民党反对实施恐怖袭击。真正让执政党恐惧的不是恐怖袭击，而是民心向背。

中国新民党的国内外党员都要有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的精神。并肩作战，奋力工作，不计报酬，争取民心，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这才是让中国共产党最感到恐怖的真实有效的"袭击"。

第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如何被终结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专制独裁的日子已经不长了。专制独裁所导致的腐败、冷酷、暴力、弱智是无法得到根治的。落后、凶残的专制独裁目前呈现出的对自由经济的阻碍、对传统文化的毁灭、对美好心灵的扼杀等邪恶面目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清。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彻底中断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与世界民主潮流为敌，也彻底让中国人民觉醒了。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将在其无法实施其统治的情况下，自行终结。其自行终结的方式有二，一是前苏联模式，即立即实施多党竞选，"还权于民"；二是蒋经国模式，即先开放党禁报禁，制定民主时间表，按期进行多党竞选。

无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如何被终结，中国新民党在当前的任务就是，真诚为民服务，积极争取民心。告诉人民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民主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民主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

历史必将证明，中国新民党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道路。

郭泉：民主先声 201：从我儿子的围棋升段赛谈我与胡锦涛先生的政治对弈

前日（5 月 2 日），我儿子郭称义参加了围棋升段赛，七局三胜四负。对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来说，能有这个成绩我已经很开心了。不料，还有更开心的事情。

原来郭称义有一场比赛的对手是一个 40 多岁的韩国选手，我儿子说："我 20 分钟就把他杀得落花流水，他中盘认输了。"这真让人开心！我笑着说，"他有没有哭啊？"我儿子一边玩他的陀螺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但是我感到他很委屈。"

我想，如果他们是在打架而不是对弈，那么我儿子肯定输，因为我儿子的体力不如他，但是他们对弈，靠的却

是棋力。体力相争是动物性的，而棋力却是“君子之争”。

琴棋书画里，我学棋是最迟的，也是最差的。原因是我一直以为围棋是战术沙盘。白黑“围而相杀”就是两军对垒。“提子”就是杀人，“征子”就是追杀，围棋的结局“胜败和”完全是战争结果的模拟。

所以，初学围棋时，我根本学不下去，拈子落子，都仿佛看到金戈铁马、血流漂杵的景象。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这些都直接影响我学习围棋的兴趣和棋力的提升。

直到我读到“尧舜以棋教子”的故事，才改变了我对围棋的认识。

原来，围棋并不是起源于“战术沙盘”。 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朝人张华《博物志》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是个狂莽不羁的人，“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博物志》中还记载：舜觉得儿子商均不甚聪慧，也曾制作围棋教子。《路史后记》也记载“尧以棋教子、以闲其情”。

后世，由于战事频繁，军事学知识渐渐积累起来。下围棋和军事上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有几分相似。战争的需要势必加速围棋的发展。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使得围棋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西汉桓谭在《新论》中指出“围棋之戏，兵法之类”。东汉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

《隋书·经籍志》干脆把棋谱直接收入了兵书。唐代王积薪的《围棋十诀》，从军事角度观察和思考围棋，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宋代《棋经十三篇》继承以兵言棋的观点，模仿《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体例系统研究围棋作战理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我知道“尧舜以棋教子”之后，我对围棋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以后，我和别人对弈，就不再是“打打杀杀“，而是“心语手谈”了。

后来我的棋术理论用于我的文史哲法的学术研究，直至浸入我的民主政治理论。

民主（政党多选）政治就是“心语手谈”，大家有什么政治观点可以摆出来谈，在报纸上、电台电视上，最后以选票来决胜负。而专制统治就是“打打杀杀”，统治者的唯一思维就是把所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杀掉或关起来。前者是雅趣，后者是野蛮。

对围棋来说，“打打杀杀”的叫不会下棋；对政治来说，“打打杀杀”叫不懂民主。把“异议人士”都关、管、杀，那就叫“君主”，而不叫“民主”。

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些非党派的独立思想者悉数被中共关押，例如高智晟、胡佳（嘉）、妙觉慈智法师等，而中国新民党所有骨干（代主席、秘书长、各省党部代主席）虽然都被中共调查过，却都还在进行广泛、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开始和中国新民党对弈了。毕竟，两党都认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两党都提倡为人民服务。两党区别的只是中共认为一党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而中新党认为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执政，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前者叫专制社会主义，后者叫民主社会主义。

鉴于中国新民党这样的政治认识，如果中共还采取“打打杀杀”的办法，那无疑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自相残杀。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多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也赞同并践行了民主社会主义。

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民党的“打打杀杀”必然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于是，两党只能对弈。

围棋的胜负是以实际控盘点数来计算的，而两党对弈，其实就是对民心的争取。

双方下子完毕的棋局，计算胜负采用数子法。先将双方死子全部清理出盘外，然后对一方的活棋（包括活棋围住的点）以子为单位进行计数。 双方活棋之间的空点各得一半，一个点即为一子。胜负的基准以棋局总点数的一半 180 又 1/2 点为归本数。凡一方活棋与所属空点的总和大于此数者为胜，小于此数者为负，等于此数者为和。

而两党对弈的结果，就是计算选票，选票胜出的，获选。

围棋对弈和多党竞选，是完全一样的。棋力，就是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对弈的胜负。而独裁专制虽然为了其统治也会适当考虑“民生”问题，但是其根本出发点绝对不是“民心”，而是“独裁之心”、“专制之心”。

独裁者根本不屑于“争取民心”，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直接把反对者杀掉了事，例如杀害林昭、遇罗克、89 学生等等。虽然，中共整体上是个独裁专制党，但是我注意到中共党首胡锦涛先生却不是一个“独裁者”。

例如，胡先生 2004 年 1 月 27 日在法国对全世界承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当然很多人对我说胡先生这些话根本就是“胡说”，不仅忽悠中国人民，还忽悠了全世界的。对此，我却持不同观点，我认为胡锦涛先生所言代表了真正共产党人的胸怀，胡先生和我一样，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我和胡先生在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一个关键的分歧，那就是胡先生认为可以一党建成社会主义，而我认为应该多党竞选建成社会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两种思维，如何进行甄别。是“打杀”，还是“对弈”，其实就成为鉴别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标准。例如，胡先生指派共产党杀害新民党，那么胡先生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我指派新民党杀害共产党，那么我也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的话，那么唯一的甄别手段，就是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即展示各自的政治主张，接受人民的投票选举。这在围棋上，就是对弈。

围棋对弈又被称为“手谈”，意思是说非言语的谈话。目前情况下，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对弈就是“手谈”。双方以落子作为语言进行交流，每手棋都传递着信息。

从战术上讲，围棋中有“金角银边草腹”之说。意指围取同样多的地，在棋盘角上可利用棋盘的两条边，所需子力(手数)最少；在棋盘边上只能利用棋盘的一条边，所需子力(手数)较多；在棋盘中腹没有边可利用，所需子力(手数)最多。

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居腹地，中国新民党为在野党，为“金角银边”。执政党世事繁复，本就费时费力，再加稍有不慎立刻捉襟见肘。做对了是应该的，做错了顿失民心。所以叫“草腹”。

而中国新民党立足于民，为民请命，人民只见其对不见其错，民心自得，故为“金角银边”。另外中国新民党在中共执政党的“错招”上大做文章，例如“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企业军转干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些就是围棋对弈中的“眼”。对这些“眼”，执政党如果无意解决或久拖不决，必然民心尽失。

围棋和政治，其实都是一门经济学。不同于其他棋类项目以先擒获对方某种棋子为胜，追求达到目标的过程，围棋以控制地盘大者为胜方，追求数量的优势。民主亦是如此。

不知胡先生棋力如何，有幸得闲手谈一局，此乃免除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之义举。如此，吾国有幸，胡先生定当千古垂名！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学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2：从南北韩粮食产量对比谈民主（多党竞选）也是重要的生产力

首先，开始这课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我要在民主后面加上“多党竞选”这四个字。这是因为，本该是多党竞选的“民主”这两个字，在中国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搞成了“中共特色”，并美其名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例如，胡锦涛先生 2004 年 1 月 27 日在法国对全世界承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如果胡锦涛先生把其中的“民主”直接表述为“多党竞选”，我想，胡先生的历史地位将是上下五千年最伟大的。

可是，我在胡先生的御用文人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好东西》、周天勇先生的《攻坚》中可以看到，原来御用思维下的“民主”，竟然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见《民主先声》175、176）

所以，为了区别于中共忽悠人民的“民主”，我必须在民主之后加一个括弧，在括弧里面写上“多党竞选”四个字。

最近，中国新民党从北韩传来的消息让我想起了在 1996－1999 年的朝鲜大饥荒期间，有 50 万－100 万北韩人死于非命的悲惨景况。如今，这一粮食危机开始升级。2008 年 3 月、4 月，食品价格暴涨；到了 4 月中旬，每公斤大米价格涨了三倍以上，涨到了不可思议的 2500 北韩元（合人民币 20 元左右）。

5 月 1 日开始，食物分配部分停止了，甚至在首都平壤也是如此。自去年开始，有些地方城市已停止接受粮票分配食品。有报导说，农民吃草和树皮充饥，逃亡难民人数在增加。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负责亚洲事务的地区主任班伯里(Tony Banbury)在 4 月中旬说：“北韩的食品安全形势显然很糟糕，而且还在恶化。情况很可能是，只有外部提供紧急援助才能避免一次严重的悲剧发生。”

养活朝鲜人，每年需要 520 万吨粮食，但是朝鲜自从搞了独裁专制之后，就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历史上最好的收成是 2005 年的 460 万吨，这竟然也被朝鲜独裁领导人认为是“丰收”。为朝鲜独裁提供粮食的是中共。当然中共是拿中国人民的粮食去支持朝鲜独裁者的。

另外，同一个民族的韩国政府，从人道主义角度，在过去 10 年里一直维持“阳光政策”，既单方面且无条件地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自 2000 年以来，南韩每年免费向北韩提供 45 万吨粮食，而且其分发完全不受监督。

2006 年、2007 年，朝鲜的农业产量每况愈下，2007 年朝鲜的粮食产量只有 380 万吨，远远低于 520 万吨这一关键的基准。

与中共一样，朝鲜独裁者也喜欢把农业危机归咎于“自然灾害”。

中共到现在都坚持称 59-61 年间造成饿死 3750 万中国人的政治罪行为“三年自然灾害”。而根据金辉先生在《方法》1998 年第 10 期上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 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中国那几年根本没有可能造成全国死亡几千万人的自然灾害。（参见《民主先声》188）

跟往常一样，朝鲜独裁者将产量下降归咎于洪水、气候等等“自然灾害”。这简直是把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当傻子了。韩国和朝鲜在同一个半岛上，气候、水文、地形、农作物品种等等几乎完全一致。而韩国自从战后数十年都没有出现粮食短缺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农作物的收成与哪些因素有关系？

小时侯，每年暑假都到农村外婆家，虽然外婆家没有地，但是我的农村小伙伴们却都是标准的庄稼人。他们暑假里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我也陪他们到田里，他们是劳动，我却是玩儿。现在他们也都 40 岁左右了。曾经见过他们中的几个，我立刻感受到了鲁迅《故乡》里中年“闰土”看“我”的木讷的神态。只是，现在他们再也不带我到田里去了。

影响农作物收成的因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自然因素（土地和气候）；人为因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农业机械和田间管理技术、农业管理体制等）。

韩国和朝鲜在同一个半岛上，天是一样的天，地是一样的地，中间还是一样的空气，所以造成差别的只有可能是人为因素。

朝鲜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农业机械和田间管理技术，这些都与韩国并无差异。

所以，造成根本差异的是“农业管理体制”，即“农业政策”。

目前，朝鲜的农业政策还是“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即实行完全的集体公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即使是中共这样的独裁体制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朝鲜竟然还在使用。

朝鲜人每天规定 300 克粮食，而且副食匮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阳节，也就是领袖金日成生日的时候才供应两块豆腐。1996－1999 年，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朝鲜人，大都黑瘦。有人开玩笑说，朝鲜除了金日成父子以外，没有第三个胖子。

下面是我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朝鲜人生活在独裁专制体制下的生活场景：

“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华侨家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华侨家下水道排出的一些食物的残渣沉淀在那里。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擦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我说你生活得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笑话：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夏娃在吃禁果的画。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情侣裸体散步。”一个朝鲜人看了，却说：“不，他们一定是朝鲜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

其实，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便于通过高涨的生产劳动热情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社会财富。但是独裁却制约了人民的思维和热情。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的本质是反对财富垄断，在政治层面的本质是反对权力垄断。而中共和朝鲜的独裁者所搞的“社会主义”，只为了捍卫其一党统治，而无视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主愿望，更完全无视民主（多党竞选）给生产力带来的极大提升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生产力不只是工具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人的思想的解放。任何工具和技术，都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只看到工具可以造出产品，却不见工具的背后是人的精神探索和选择，其结果，必然是使得劳动者成为工具。于是主体就异化为客体了。

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让主体异化为客体，而是让客体呈现出“主体向度”，因此，要解放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人的思想，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也只有民主（多党竞选）才能实现。相反，专制作为一种破坏力量，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民主（多党竞选），既是生产关系，也是重要的生产力。

郭泉：民主先声 203：请中国新民党甘肃党部调查岷县“中国新民党”被中共虐杀情况

今天（5 月 7 日）清晨到南师大签到上班，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的信。信封上字迹一眼望去就觉沧桑。拆信一看，果然是位长者。全文如下：

郭泉教授：您好！我首先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今年四月，我在路行中拾到一份《觉醒》（2008 年 3 月第 36 期），有一篇文章对您进行报导（内容大意是向法轮大法郑重道歉），并称您是中国新民党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为此来信探询是否真实。

因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0 年）在甘肃岷县也出现中国新民党，参加人员都是在饥饿线上的群体，目的是要政府开仓分粮，抢救人命，结果被镇压。全体党员都被打成反革命，枪决、判刑。大部分被病、饿死在监狱。那时，由于我年青、体质好，幸存至今，现年 75 岁。我们这些 60 年代残存的老新民党员给你去信的目的是向您讨教。望来信说明本党宗旨以及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看法。恳盼，敬礼！2008 年 5 月 2 日

阅罢此信，感慨良多。

首先，信中所说我向法轮大法郑重道歉一事是真实不虚的，可参见《民主先声 125》。原文片段如下：

“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研究法轮功并发表文章的学者，不过说来惭愧，在《生活导刊》上发表的是一篇在没有完全掌握原告（中共）和被告（法轮大法）双方资料的情况下，根据原告的一面之辞而写的“揭批”文章。根据我事后的观察，这篇“揭批”文章是 1999 年“425”事件后第一篇由独立学者撰写的研究、批判文章。很显然，原告和被告的官司应该有法官审理裁判，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原告自己先控告，而且还不让被告辩护，最后原告自己当了法官进行了刑事判决。这哪里是审判呀？当时我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做审判工作，竟然当时没有想通这个道理，现在想来真的很傻。现在，愿借这篇文章的写作，为我在 99 年的卤莽和偏颇，向法轮大法郑重道歉。”

其次，我赞叹国内的大法弟子的工作效率。

其实突破中共的新闻封锁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点对点的传播。这种点对点的传播，在网络上就是通过各种网络手段发送民主、真相文件和破网软件，例如自由门（动态网）、无界浏览、世界通、火凤凰、花园网等。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点对点的传播，就是人际传播或街头派送。最近，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很边远地方的请求加入新民党的来电来函，这其中自然有我们新民党当地党部的工作，但是，我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在迅速传播中国新民党的信息，那就是在最艰难条件下越战越勇的大法弟子。

中国新民党是提倡政教分离的政党。但是一切提倡真、善、美、忍的宗教团体、一切反对专制支持多党民主竞选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在此，感谢大法弟子和其他各界友人对中国新民党的奋力推广。

再次，让我感慨的是就来信所知 1960 年甘肃岷县的中国新民党提出的“要政府开仓分粮，抢救人命”的主张，与当今中国新民党的拯民救国完全一致，而且党员的主要成员都是受难的弱势群体。所不同的是 60 年代的中国新民党被虐杀，而当今的中国新民党还没有被杀。不过我们即使面对虐杀，我们有准备有主张，那就是，第一，我们反对；第二、我们不怕。只要是代表民意的，别说多数国民的意见，就是代表的是少数国民的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民主“票决”，虽然是多数派意见得到认可，但是民主票决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保护少数派”。

所以，1960 年中国共产党虐杀“要吃饭、反饥饿”的甘肃岷县的中国新民党人是极其不人道，其实罪恶的。

最后，请中国新民党甘肃党部立即组织力量赶赴岷县调查 1960 年该县被饿死的黎民百姓的数量、1960 年中国新民党的发起和组织建设情况以及中国新民党被中共虐杀、冤狱的情况。形成调查报告后，立即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以期指导展开后续工作。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学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4：中华民族根柢全在《道德经》，其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是民主

最近我注意到一些“伪爱国主义者”叫嚣着反对西方，当然他们的幕后老板的真实目的是反对民主，捍卫独裁。于是“伪爱国主义者”在反对西方的同时，也反对民主，并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了一起，叫“西方民主”。

一天，一个“伪爱国主义者”对我说：“郭教授，你是国学专家，怎么也提倡西方民主了呢？”我很奇怪，这些自称爱国主义者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民主并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呢？

于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给“伪爱国主义者”们上一堂国学课了。

1990 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江苏金陵汽车运输总公司的第一分公司工作。这个分公司在南京城外很远。遇见刮风下雨，我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夜。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其间一本书一直陪伴着我，那就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道德经：华夏民主思想的先河》，编者是赵毓民、赵琳两位先生。当时阅读这本书只是为了背诵《道德经》，并没有注意这本书的副标题：华夏民主思想的先河。直到 1992 年我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当时叫选调干部考试），进入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感受到中国政治体制的独裁和专制之后，我才突然想到这个副标题里的“民主”两字。

后来在南京大学读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脑海里一直萦绕着“民主”二字。

2007 年 11 月 14 日，我终于把我这么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之关系研究，提交给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那份公开信里的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参见《民主先声》72）

全文如下：

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奠基的。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阳）而没有在野党（阴）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就是不合“阴阳”之道的国家。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历朝历代，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因此，两党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关于阴阳学说，研究最好的是老子，其五千言《道德经》文约意丰、义蕴深邃，不但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上发行最多、流布最广的两本书一是《圣经》、一是《道德经》。

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6）博士，对《道德经》有着深刻的见解，其《道家与道教》（The Tao Chia [Taoist] and Taoism），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卷二《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xxxii]，他指出：“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和博士六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两年，期间遇见很多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他们除了谙熟《圣经》外，他们的《道德经》水平足以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汗颜。他们和我交谈中大段大段地背诵《道德经》原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讲“中华民族根柢全在《道德经》，其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是民主”之前，我想先讲一讲《道德经》对德国

哲学的影响。16 世纪以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都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并对老子思想有极高的评价。

《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 82 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 700 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位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

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1919 年，德国诗人柯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二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二战后的德国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由此可见，《道德经》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道德经》里的思想与当今现代民主政治有哪些契合，或者说《道德经》里有哪些现代民主政治的基因。

1、“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政府是有形的组织，但是这一有形的组织（政府）却来自于国家社会中无数非组织化的每一个人，即百姓。所以，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百姓的认可和支持。

2、“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政府表面上看高高在上，其实却是下人仆役（公务员）。人民乃政府之本源，政府之基础。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说：“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譬如此。在民主国家，每年都有曾被委托行政者的权力被收回，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

3、“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 宪政的实质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宪政始自限政。“宪政主义”必将终结“权力时代”。

4、“三生万物”——三权分立，是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5、“我不敢为主而为客”——民主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执政官是仆人。

6、“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倡民治，反独裁。

7、“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一一即 “民有、民治、民享”。

8、“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民主之宪政约束执政者不得胡作非为，一切皆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9，“功成，名遂，身退”——对执政者来说，反对终身制；对执政党来说，反对专制独裁。执政党应在规定期限结束后还权于民，归政于法。

10、“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家天下，以帝王之心为心；党天下，以一党之心为心；民天下，以人民之心为心。以人民之心为心的“民天下”，就是民主制度。（参见《民主先声》143）

11、“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民主制度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12、“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全民福利”。

13、“乐其俗”——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文化多元。

14、“我无事而民自富”——经济自由主义。

15、“有道司契，无道司彻”——民主社会提倡契约，专制社会崇尚暴力。

16、“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老子》的这句话，代表了他整个深邃繁复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

17、“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严复说：“道德经是言治之书。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言礼，专制则用刑。”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学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5：陈水扁先生伟大之处在于没有像中共那样把执政党地位写进宪法

再有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进行新总统的接任仪式了。在此，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民进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1949 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对台湾施行高压统治，当时的主流社会、媒体都为中国国民党所控制，但依然有部分所谓“党外”人士争取民主与自由。“党外”声势逐渐发展壮大，1979 年的“美丽岛事件”可以说是党外运动的高潮，施明德、黄信介等多人因此入狱。到 1980 年代，这股“党外”实力逐渐组合、统一，并最终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由 132 名与会的“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组建民进党。

“民进党”的全称叫“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成立后来逐渐强调“体制内斗争”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台湾各项公职选举。

组党后的民进党在 1986 年参加第一次的“立委”与“国代”选举，总得票率都在 20%以上。此后民进党也发动了多次街头游行活动，争取当局解除戒严、争取民代直选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初期的民进党虽视自己为台湾的本土政党，将国民党政府称为“外来政权”，但主要的政见还是争取民主自由，让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在此时，民进党主要通过发动游行、街头抗争等与“政府”斗争，被称为是“街头党”。

1987 年“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民进党继续参与台湾政治，要求“总统”直选。1989 年的台湾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民进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1992 年的“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再度获胜，得票率高达 33%，次年的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已经达到 44%。1994 年民意支持度颇高的“立法院议员”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显示民进党已经成为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制约力量。

1997 年民进党夺得了全台 12 个县市的执政权，首次超过国民党，“绿色执政”下的人口占全台总人口的 71.59%。1998 年的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虽失去了台北的执政权，却夺得了高雄市长选举的胜利。1999 年民进党推选落选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水扁与“美丽岛”事件的参与者吕秀莲参选“正副总统选举”，并胜选，实现台湾历史上的首次政党轮替。

2001 年，民进党获得了“立委”与县市长选举的胜利，民进党首次成为“立法院”的第一大党。同年，民进党中央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宣称民进党的目前方针是“维持台湾现状”，淡化“台独”色彩，得到民众支持。

2005 年，民进党在“立委”与县市长选举中败给了国民党，降为“立法院”的第二大党。2008 年 3 月，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当选新一届总统，不日上任。

我们再回顾一下民主进步党的各届党主席，他们是首届党主席江鹏坚，之后担任党主席的有：姚嘉文(第二届) 、黄信介(第三、四届) 、许信良(第五)、施明德(第六届)、许信良(第七届)、林义雄 (第八届) 、谢长廷(第九届) 、陈水扁(第十届) 、 苏贞昌(第十一届) 、游锡堃(第十一届) 、陈水扁(第十一届)、目前柯建铭暂时代理党主席，直至第十二届新主席产生。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的主要思想有两个，一是民主进步，二是台湾独立。对前一个普世理想，我和中国新民党完全赞同，但是根据《中国新民党章程》第五章第二条“中国新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与台湾实现民主统一”，我反对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的“台湾独立”。

虽然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在民主进步方面受到世人称道和尊敬。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写进宪法。

例如，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就没有在《宪法》里这样写：“2000 年，以陈水扁主席为领袖的民主进步党领导台湾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在《宪法》里这样写：“台湾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民主主义事业的成就，是民主进步党领导台湾各族人民，在陈水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在《宪法》里这样写："台湾各族人民将继续在民主进步党领导下，在陈水扁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民进党领导、坚持陈水扁思想、坚持台湾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进主义道路。"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也没有要求"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席兼各县市议会议长"，而中共却出台了"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制度。1999 年开始，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开始担任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前组织部长张全景称："这样兼职，党委的意图可直接转化到人大"，" 便于协调"，" 现在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都是中央向全国人大推荐的，省里面也是这样的，人大副主任、整个常委班子都是地方党委向人大主席团推荐的。"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也没有自称民进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党。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也没有自称："民进党始终代表台湾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台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台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进行大量的政治思想宣传，让民进党从思想上变成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把民进党的执政地位写进"宪法"中，将国民党成为参政党，控制好一切舆论工具，让所有的声音都服从党的利益，维护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领导台湾人民一心一意的进行经济建设，稳步发展民主建设的脚步。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抓捕异议人士，没有宣判异议人士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对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环境的人民进行污蔑，没有利用所掌控的舆论工具，宣布其为反党、反社会、反人类的暴乱。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让"不明真相的被蒙蔽的群众"认清国民党的丑恶行径，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刻骨仇恨。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没有说："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要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陈水扁先生和民进党更没有站在"国际战略格局和时代发展的高度，依据陈水扁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陈水扁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精辟分析国际形势和台湾安全环境，深刻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台军要为民进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6：说"中日友好历史悠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胡锦涛先生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于是中国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一个腔调地扯着嗓子喊："中日友好历史悠久"。

那么，中日关系在中日关系史上的主流真的是"中日友好历史悠久"吗？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历史悠久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地显示，"中日友好历史悠久"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其主流关系根本不是中日友好。

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留学，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

唐朝结束后，日本认为与他们"友好"的"大唐国"被宋灭亡了，于是开始怨恨宋朝。但是，这时还是谨小慎微的。

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

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唐代有过友好，后来就没有了。从 1931 年的"九一八"开始到 1945 年的"八一五"，14 年间，日本侵略中国，杀害中国四千多万人，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延误中国国家发展更是不堪回首。

我们先来看看"东夷貌柔顺"的伪装。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开始显露。唐大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遣刘仁轨领兵击之，"仁

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贱众大溃”。

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国民带去了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人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计”。史称东夷貌柔顺，中国直到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

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

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

嘉靖年间数十年，中国国内的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头目安徽歙县人士王直与日本倭寇联合组建了庞大的倭寇海盗战舰队伍，此时的倭寇头目为王直。

明史书随处有倭寇记载：如成祖三十四年，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馅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俞大猷、戚继先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数十万之众，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后，明军诱捕处死了倭寇首领安徽海盗王直。以后，日本奉王直为日本“海神”。

2000 年，日本福江市在王直的原籍安徽歙县楚雄乡柘林村违章搭建了“王直墓”和“芳名塔”。随后，日本福江市政府每年派人到中国土地上“参拜”倭寇首领王直。

2005 年，我对日本人到中国土地上“参拜”王直的行为实在无法忍耐，在多方投诉中共各级政府无果的情况下，我携带斧头和榔头，和浙江丽水学院的邬伟民老师，“夜袭”了这个倭寇首领的墓地。砸毁了“王直墓碑”和“芳名塔”。至今，中共政府和日本政府对我异常憎恨。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料。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

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

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

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

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等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

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抢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

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

至今，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仍然在日本人的控制下，2004 年 3 月 24 日 6 时 26 分，我的好友王喜强、冯锦华、张立昆等七位勇士驾船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却被日本海上警卫队抓捕移送日本冲绳那霸警署，在我保钓人士的大规模抗议下，中共政府反复与日本交涉，日方于 26 日才释放了这 7 位中国勇士。

由上可见，说“中日友好历史悠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

日本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了呢？我还是来看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府至今坚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其实钓鱼岛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就在中国的海防图里。

对此问题我有长达十年的研究。

那么，中日未来有没有可能中日友好呢？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中日友好的前提是：归还钓鱼岛！

关于未来中日关系具体如何友好，请大家参阅我在 200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罹难日）写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民主先声》81：与胡锦涛先生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7：胡锦涛先生、李白《静夜思》和“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

中新重庆网 5 月 10 日电　据中新网报道 5 月 9 日下午，胡锦涛先生参观了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当他步入三楼小三班的教室时，孩子们正在集体朗诵《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胡锦涛先生问：“小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刚才读的《静夜思》,是谁写的知道吗？”“李白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我看到了胡锦涛先生参观那所学校的照片，学校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唐）李白”。不知道胡锦涛先生有没有看教室里的黑板。

胡锦涛先生又问“李白写这首诗，表达了怎样一种心情？”

小姑娘郑阳举起了手，回答道：“是思念故乡的心情。”

胡锦涛先生接着说：“李白是一个大诗人，他离开了故乡，云游到外地，时间长了，他想他的爸爸妈妈了，想他的亲人、他的故乡，这首诗正是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心情……”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李白的《静夜思》并不是这样的。宋本《李太白文集》、宋刊《乐府诗集》、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嘉靖本（现存此书的最早刊本）所收此诗均是：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最早修改李白《静夜思》的是明代赵光等的万历刊本《唐人万首绝句》，改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清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里，又有新的修改：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直到清乾隆年间，蘅塘退士选编《唐诗三百首》，才确定了“新版”《静夜思》。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胡锦涛先生所说的李白“他想他爸爸妈妈了”。

李白一生诗作 990 余首，无一字一句提及他的父母。丝毫没有过“想爸爸妈妈的”任何表达。李白并不思念故乡，甚至从来没回过故乡，涉及思乡的也仅《静夜思》和《三春三月忆三巴》这两首诗作。

李白的身世简直是千古悬案。

李白在其诗作《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白家本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金陵”指李在西凉所设的建康郡，地在酒泉与张掖一带。又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

关于李白的身世，只在李白死后出现过两个材料，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无一例外皆依据于此。可是这两处记载却语焉不详，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这里有提到李白的父亲李客。那么，李白的父亲李客究竟因何“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如果是国破家亡，出奔异域，那么早就应该返回原籍；假如是因为触犯刑律，流放远方，时隔百余年，也用不着“潜还广汉”。这就使人猜测，或许是什么更直接的原因促使李白的父亲“逃归”、“潜还”，跑到大巴山中去，进而也使李白对自己的家世一直闪烁其辞，以致后人无法真正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身世了

陈寅恪先生 1935 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认为所谓的“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之说完全出于依托，乃千古谎言。我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

天宝元年（742 年），唐玄宗下诏，宣布李暠为始祖：“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

如李白确为李暠九世孙，对李白宠幸已极、“亲为调羹”的李隆基，为什么不予承认，不把李白隶入宗正寺呢？天宝二年（743 年），玄宗始特批准李白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毫无疑问是玄宗的厚爱开的后门，因为李白并无任何可资以证明的谱牒。即使如此，有唐一代，皇室也从未明确过李白的同宗身份。

那么，李白到底来自哪里呢？陈寅恪先生认为，“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与陈寅恪先生的“胡人说”完全相反的观点是国际汉学会会长王元明先生，他认为李白在其诗《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中已经明确地交代了自己是洛阳人，而且是“北门厄”事件的杀人逃犯。《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如下：

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开吴食东溟，陆氏世英髦。多君秉古节，岳立冠人曹。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

学术界对李白的身世一头雾水，李白自己对其父母也闭口不谈，那么，请问胡锦涛先生，您认为李白在这首《静夜思》里“想爸爸妈妈”，又从何谈起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胡锦涛先生的一句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话语。

其间，八岁的小男孩松田浩季迫不及待地站起来问：“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胡锦涛回答说：“我要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

我一看到这段文字，我差点当场晕倒，我立即想起了那个“被逼当大总统的黎元洪”来。原来全国人民（除我之外）选的人竟然是个不想当主席的人。

不料，胡锦涛先生的回答引起了符祥瀚小朋友的极大兴趣：“我也想当国家主席，怎么样才能当国家主席？”

胡锦涛先生却再也不提选举了，胡先生答非所问地说：“不管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从小都要好好学习，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锻炼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样将来不管干什么你都一定能成功。”

日前，我儿子刚刚当选小学一年级班上的小队长。他们经过了“报名、演说、才艺表演、投票、唱票”的严格竞选程序。

我问他：“如果一个同学不想当队长，却最后当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儿子很奇怪的反问，“爸爸，你有没有搞错啊？不想当队长的人，大家就不会选他。如果最后当选了，那一定是作弊了。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于是我又问：“我也想当队长，怎么样才能当队长？”

我儿子立即说：“好好学习，培养好品德，锻炼好身体，然后报名竞选，接受班级同学的选举。”

我长叹一声！我儿子问我为什么叹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怕我回答了，他会嘲笑我们的大人世界很傻很弱智，竟然连竞选都不会。

现在连 8 岁生日还没到的我儿子都知道应该如何竞选，而中共却说中国人民的素质太差，不能搞多党竞选，这真是让人感到悲愤！

附件：湖北武汉吴志金先生提供以下信息：

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先生拍摄了武汉市常青第一小学三（一）班竞选班长的经过，纪录片名叫《请为我投票》（please vote for me）。

纪录片不长，仅有四十多分钟。故事曲折动人。

但是，该片却被中共当局禁映。

南方周末也有评论《民主只需要八岁的智商》。由此可见中共的孱弱和色厉内荏。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8：致国家军委：“自谋职业军官”必须与“自主择业军官”同等待遇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

致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关于立即解决 “自谋职业军官”与 “自主择业军官”的同等待遇问题

尊敬的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先生：您好！

现将我调查的 5400 余名 1993 到 2000 年期间自谋职业军官的情况，向您汇报，请您将此件转军委同志着手研究解决。

此 5400 余名军官都是在部队工作 15 年至 20 年以上的营、团级军官，一部分军官参加过南沙保卫战，大部分军官参加过对越反击战，均有功勋。

1993 年，国家开始设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体制改革。出台国发（1993）36 号文，承诺给军转干部一定数量的贷款、办企业减免税收、优先安排住房、医疗保险享受优惠待遇等等，号召军官“自谋职业”。

于是，5400 余名军官听信了这个在后来根本没有兑现过的国发（1993）36 号文。5400 余名军官手持这个国发（1993）36 号文离开军队“自谋职业”，却遭遇到了政府的百般刁难。国发（1993）36 号文承诺给军转干部一定数量的贷款、办企业减免税收、优先安排住房、医疗保险享受优惠待遇等等政策无一落实。

5400 名营团级军官无一例外地全部沦为打工者，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10 多年来，这 5400 名军官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的任何支持，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

他们一无生活费来源，二无住房、三无社会养老保险、四无医疗保险。转业时还被各市军转办强交了 2 至 6 万元的管理费。至今，5400 名军官没有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一分钱补偿和任何政策规定的待遇。

2001 年中发（2001）3 号文《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的意见》规定了住房、医疗保险、社会保险、退役金、地区补偿、抚恤金、丧葬费等 11 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但是 2001 年中发（2001）3 号文只适用于 2001 年以后的“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不适用于 2001 年前的“自谋职业”的军官，致使 5400 余名“自谋职业”的军官群情激愤。

由于多年的生活困难和对政府的积怨，部分“自谋职业”的军官开始出现轻生念头和其他极端倾向，本人和中国新民党各省党部、以及各省“自谋职业”军官的中共党支部，一直在做积极的思想工作。

为了妥善解决 5400 余名“自谋职业”军官的越来越严重的生活困境和情绪压力，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自谋职业”军官自发形成的中共党支部，恳请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先生立即召集国家军委和国务院，彻底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隐患。

现公开部分“自谋职业”军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请各媒体一线新闻人士进行采访：

李占林：13416332485　　黄振华：13826068068　贺世炜：13316278911

李京考：13312863035　　王立三：13825006056　雷志清：13802941613

张医生：02088295791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09：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反对民主人士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

5 月 1 日，李国宏先生在狱中发出了绝笔信。李国宏先生因帮助中石油、中石化的 59 万“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维权而被中共当局决定劳动教养 1 年半。

除李国宏先生外，郭飞雄先生也曾在监狱中绝食多次。但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通过特别渠道恳请郭飞雄先生放弃绝食斗争，并提出“保重身体，保存力量”的建议。此建议已得到郭飞雄先生的采纳。

5 月 11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为李国宏先生狱中绝食一案，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了李国宏先生的绝笔书《李国宏：用最后的生命燃烧人权事业》

绝笔书重要章节如下：

耶稣最后对我们说的话是“成了”，他给我们示范了把生命做事业的一个过程。

生命中的尊严更重要，每个人生来是平等的，但往往不在公平之中。劳教制度加在我身上的惩罚，使我无法忍受，按目前的法律三个月应审结我目前已上诉的案件，现时间已过，迟迟不下判决。即使我最终胜了“官司”，但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在劳教所里，变相的体罚令我受尽屈辱，每日打骂声使我精神上无法承受其苦痛，我左眼有严重的疾病，申请保外就医，劳教所的答复是：“瞎了后就可以走了”……

我不愿再忍受这没有尊严的生活，我宁愿要人生命中的尊严而愿放弃这没有尊严的生活，我宁愿要人生命中的尊严，而放弃生命，决不屈服恶的势力对我压力。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遭遇不公正待遇、受刑入狱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当以平常心待之（参见《民主先声》100：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入狱被杀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

关于中国新民党人的基督徒问题：

李国宏先生是基督徒、郭飞雄先生是基督徒、高智晟先生是基督徒、郑恩宠先生是基督徒，中国新民党核心力量的大部也都是基督徒，可以说当代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的主力是基督徒。因民主和维权入狱的基督徒当然也就众多。的确，基督徒不怕死，也都愿意死，正如李国宏先生所言：“耶稣最后对我们说的话是‘成了’，他给我们示范了把生命做事业的一个过程。”但是，圣经里还有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和地上的“盐”。做光照亮众人、做盐调谐百味，这就需要我们顽强地活着。圣经规定：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

关于中国新民党人的狱中生活：

中国新民党所有入狱党员，当以曼德拉和金大中为榜样，此二人皆由囚徒成为总统。

1962 年 8 月，43 岁的曼德拉因为追求民族解放而入狱而被南非政府以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判处 5 年监禁。1964 年 6 月，他又被指控犯有以阴谋颠覆罪而改判为无期徒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在狱中长达 27 个春秋，他备受迫害和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1990 年 2 月 11 日，南非当局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同年 3 月，他被非国大全国执委任命为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1991 年 7 月当选为主席。1994 年 4 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同年 5 月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金大中先生反对韩国的独裁统治，1973 年被监禁，后软禁。1976 年因要求恢复民主再次被捕，判刑 8 年。服刑 33 个月后获释。后又以煽动和阴谋为罪名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审讯和判处死刑。1980 年 1 月改为终身监禁。1982 年 12 月获准去美国就医。1985 年 2 月 8 日返回韩国首尔。1987 年组建和平民主党。1997 年 12 月 18 日，竞选韩国总统获胜，1998 年 2 月 25 日就任。2000 年因促成朝韩两国首脑的首次会谈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民主初启，励精图治；身陷囹圄，勿言绝食；吾国俊杰、吾党同志，有此信念，方能成事。

郭泉：民主先声 210：揭穿“中国需要的是强大（强人）而不是民主”的中共独裁面纱

最近，一些中共官员对我说，“中国需要的是强大而不是民主”。甚至有《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强人》的言论招摇过市。

无论他们要的是“强大”还是“强人”，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以下两点：

一是中国要了民主就不强大；二是只有中共独裁才能使中国强大。

关于他们的第一个观点，我在《民主先声》202 中已经论证了“民主（多党竞选），既是生产关系，也是重要的生产力”，这里不再赘述。

中共独裁者的第二个观点的核心意思就是一个，中共需要独裁。

今日之中国，若是让中国人民从众多选项中评选出最适合中共特征的政治名词，非“独裁”莫属。为什么中共会对这个幽灵心驰神往呢？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既得利益。

在中共独裁者的大脑皮层里，独裁就是万能钥匙，什么大门都能打开；独裁就是仙丹妙药，什么杂症都能根治。独裁，真就这么神奇吗？

如果神奇的话，就不会有朝代更迭了。可是历朝历代的独裁者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中共独裁者为甚。中共独裁者看到历代皇帝很威风，于是就认定独裁是个好东西。至于中共独裁者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那只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如果不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那就不是好东西了。

其实，中共对独裁趋之若鹜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过电感应。中共到底有几人能感受历代独裁者的内心孤独与恐惧呢？。

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瘦金体”瘦细有弹性，运笔挺劲犀利，具有秀美洒脱的风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虏，后病故于五国城。清代诗人郭麟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字重光。当他 25 岁继承父业做国主，40 岁时被宋俘虏到汴京。“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如果李煜不做帝王，相信“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惨痛也将幸运地避免。如果说李煜与赵佶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身不由己，那么，今天的中共应该以史为鉴，认清自己的方向，选择好自己的道路，于国、于民、于己都善莫大焉！

可惜中共不学无术，不知历史灾难之惨烈，非走上天怒人怨的不归路。

中共向往独裁专制，是基于自身受到的约束，总觉得权力不够大、金钱不够多、女色不够美、酒食不够甘。故而对独裁心存妄意，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

独裁真的可以让独裁者获得绝对的自由吗？

文革时候，中共（毛共）很自由，想揪谁就揪谁，想斗谁就斗谁，想抄家就抄家，想贴谁的大字报就贴谁的大字报，那世道真的让中共独裁者自由吗？文革后期，连毛泽东自己都说“不得人心”。但是，后毛时代的中共并没有从毛泽东的独裁失败上汲取教训，而是继承发展了毛共独裁，形成“邓共独裁”，以至后来的“各共独裁”。

那么中共独裁能让中国富强吗？三十年来，中共独裁者的确是让一部分人又富又强了，但是富强的绝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中国。一个至今都不敢从日本人手里夺回被占领土钓鱼岛的中国，根本不富强；一个不断用割地（例如东北黑瞎子岛）换和平的中国，根本不富强！一个不断造成虐民虐军事件的中国，根本不富强！那么到底是谁富强了？中国人都知道！

我想告诫中共独裁者，不要幻想独裁能让你们安稳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中国的乾坤必须是中国人民来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

裴多斐有句名言：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

中国人民的怒火将烧净一切独裁者！

郭泉：民主先声 211：佛诞节（5 月 12 日），我与妙觉慈智法师共同声援李喜阁女士

5 月 1 日，凌晨零点 12 分，宗教界维权民主人士妙觉慈智法师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共河南商丘宁陵警察正在门外敲门。她没开门，准备天亮再与警察交涉。不料，凌晨 3 时，中共河南商丘宁陵警察翻墙闯入其住处，将其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河南爱滋病维权人士李喜阁。带往何处下落不明。

我在第一时间接到中国新民党河南党部的密报，立即部署刺探中共下一步行动。

5 月 1 日中午 12 时，我对全世界华文媒体发出了紧急通知《宗教界维权民主人士妙觉慈智法师五月一日凌晨三时被中共警方带走》。

此后的数天里，中国新民党河南党部不断传来消息，先是从刑事传唤转为刑事拘留，后又有消息称当地警方正在进行申请逮捕令的报批手续。情势紧急！

我立即与海外党部取得联系，特别要求印度、欧洲、美国的党部同志立即与所在国佛教领袖、佛教协会或佛教志愿者组织取得联系，确定统一时间声援妙觉慈智法师和李喜阁女士。

5 月 8 日，是我的生日。这天“奥运火炬”登上珠峰，但是这天还有一件事情比“奥运火炬”登上珠峰还要让我兴奋，那就是妙觉慈智法师被中共释放。虽然，李喜阁女士至今还没有被释放。

妙觉慈智法师一直为河南爱滋病患者传播佛法、募集善款，得到河南人民的爱戴。妙觉慈智法师曾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请求特赦爱滋病患者维权活动家胡佳（嘉）先生，未果。关于妙觉慈智法师的事迹见《民主先声》190《平生未酬同仁恩：有感于妙觉法师和“人间佛教”》。

妙觉慈智法师的“人间佛教”的出发点是：“我们本着菩萨的慈心，为转化社会而努力”。

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在过去几年内猛增，截至 2007 年底，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 70 万人。虽然政府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新的医疗改革有不少项目试图改善针对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维权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妙觉慈智法师多年来一直不辞辛劳为他们服务。

今天，5 月 12 日，是佛诞日。妙觉慈智法师给我发来请我共同声援爱滋病维权人士李喜阁女士的信件，特此转发，全文如下：

郭泉菩萨万延海菩萨常坤菩萨慈鉴：首先感恩在关中您们和各位菩萨发出慈悲音喜舍音，用一切善巧方便大力护持我的生命安全，成就我的法身慧命，感恩感恩再感恩！

我八号“出关”，喜阁还没出来。我昨天联系喜阁的丈夫孙建峰，他也不知道喜阁的下落。在宁陵谨园宾馆“软禁”期间，宁陵警方对喜阁生活方面很关心。喜阁想吃什么就给她买什么。建峰说八号的时候省委的一个副书记还专程到宾馆陪喜阁打麻将，喜阁精神状态不错。警方和我开玩笑说她快“乐不思蜀了”。不管怎么样喜阁是一个 CD4 只有 300 的 HIV 病人，最好是能在家里和女儿丈夫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分享生命最后的难得的欢乐时光。这种人为的把病人和家人隔离是不人道的，建峰和琳琳在家常常以泪洗面。建峰失去了妻子，琳琳失去了妈妈；喜阁没了丈夫和女儿；这纯粹是人为造成的。

我出关时问过警方，喜阁什么时候能放出来，他们说很快了很快了。

很快了又是什么时候？宁陵的输血感染者的赔偿和道歉的问题。政府一直都是说研究研究，很快了恨快了！很快很快就快四年了！一个靠人民供养的政府对受害者就是这样的一拖再拖敷衍了事。包庇肇事的卫生系统和渎职的医生。无视受害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哀和痛苦，剥夺了他们的上诉权生命权和健康权生存权上访权。

请各位菩萨慈悲呼吁宁陵警方出于人道主义向上面反映情况，停止非法软禁病入膏肓的受害者李喜阁，让她早日回家，回到深爱她的丈夫和女儿身边。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如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一起回家一起解脱同登彼岸！！！

均鉴至祷　　　　妙觉慈智合什 2008 年 5 月 12 日于合肥（请慈悲转发感恩）

郭泉：民主先声 212：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四川党部全体党员立即组织献血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截至现在（5 月 13 日 9 时），震中汶川等县还完全与外界隔绝，伤亡不明。但是，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 1 万名以上。

5 月 13 日 9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四川党部立即组织全体党员赶赴各地区献血点献血。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号召全国各省党部组织人员献血。

从昨天晚上 7 点半到现在，我一直坐在电视机旁。从最早公布的死亡 107 人，到 800 人，到 3000 人，到 5000 人，到 8000 人，现在已经到了 1 万多人了，但是，这只是震中外围的死亡数字，而到现在救援人员还没有进入震中汶川县。

在收视中，我一直很困惑两个事情，一是地震中为什么总是中小学房屋倒塌的最多，另一个事情是中国的空降部队竟然 20 多个小时都到不了离成都机场只有 100 公里的震中汶川县。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小学房屋倒塌的情况。从昨天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消息说当地政府大楼倒塌，却不绝于耳是中小学房屋倒塌/

新华网成都 5 月 12 日电(记者 肖林)四川省地震局说，受汶川地震影响，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一批学生被压埋，人员伤亡情况不详。

新华网四川都江堰 5 月 12 日电（记者苑坚 刘大江）12 日下午，都江堰市聚源镇聚源中学一栋教学楼垮塌，部分学生被埋。据当地村民称，在这里上课的有初二、初三的 18 个班，每班约 50 人左右。聚源镇中心中学全校师生

共 1800 多人，其中学生 1700 多人。截至 17 时 40 分，当地部门和村民只抢救出数十名学生。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埋压的学生身体还在痛苦地扭动，同时能听到被埋学生的呼救声。截至 12 日 20 时，已经挖出死亡学生尸体 50 余具。

新华网重庆讯，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一是重庆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顶楼发生垮塌；二是梁平县文化镇小学教学楼发生垮塌。伤亡情况不详。

每次灾难都在重复着同一个规律，只要是发生地震、洪灾等等，最先倒塌的一定是学校！而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办公大楼先于学校而倒塌！

这是这个时代的耻辱！这种状况莫说在发达国家，即便在贫穷的非洲国家都难以看到！

再来看看另一个事情，中国的空降部队竟然 20 多个小时都到不了离成都机场只有 100 公里的震中汶川县。

中国的空降十五军成立于六十年代初期，其基本骨干力量来自朝鲜战争中血战上甘岭的英雄部队，素以英勇善战而享誉海内外。部队极其珍惜其光荣传统，至今还保留著黄继光的铺位，保留著铺上的被褥。十五军现有第四十三、四十四和四十五三个空降师，军部驻地为湖北孝感，部队分布在湖北、河南一带，由空军直接指挥，人数为三万人左右。15 军直属一个装备了安-2（Y-5）的轻装运输团和一个 MI-8/M-17 直升机团。直接负责空中运输的是驻扎在武汉的空 13 师。十五军在八四年提升了军中技术兵种的含量，明确划分了各兵种的具体分工和作战协同关系，现由引导兵、防化兵、汽车兵、工兵、炮兵、侦察兵、通信兵、步兵等八个兵种组成。

进入九十年代，空军运输能量进入快速增长期，中国空降兵的装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传统热兵器向机械化、信息化和自动化快速发展。空降兵虽然也是快反部队，但对他们的要求比其他快反部队的“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还要高一个，对他们的要求是“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用我必胜。”

根据中国新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15 军从军长到士兵都可以在全天侯的条件下从五种不同机型，在九种不同地理环境下实施空降。15 军完全可以做到：徒手跳、带备份伞跳、单带武器跳、全副武装跳、夜间跳、编队跳、从大飞机尾部跳。

特种空降营连还完全掌握了海面跳、山地跳等。在从难从严的实战要求出发，他们在 70 年代就达到了全副武装最低跳伞高度为 400 米。

15 军的红三连官兵甚至掌握了 3 种机型、5 种伞型、多种复杂气象和地域空降作战硬功，近年来，还圆满完成了技能性强、科技含量高的新伞型、新机型示跳和空降战术演练等 10 余项重大任务。

但是，中国的空降部队竟然 20 多个小时都到不了离成都机场只有 100 公里的震中汶川县。这实在不正常！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13：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赈灾委员会谴责当局忽视大量地震前兆

5 月 13 日下午 5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联合召开特别会议，会上，各委员就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一案展开讨论，决议如下：

第一、支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切救援行动；

第二、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全体党员立即赶赴各献血点献血，全国各省党部组织党员献血。

第三、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谴责中共当局忽视大量地震前兆，以致人民群众措手不及、伤亡巨大。

关于 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的前兆，四川省地震局称汶川地震前未发现前兆（宏观异常）。例如，在 12 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邓昌文表示此前监测未发现宏观异常，也未捕捉到相关信息。国家地震局一位官员表示，短期预报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难题。

但是，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指出，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有足够多的前兆，但是却没有被当局重视。

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认为，岩体在地应力作用下，在应力应变逐渐积累、加强的过程中，会引起震源及附近物质发生物理、化学、生物、和气象等一系列异常变化。这些与地震孕育、发生有关联的异常变化现象，也称地震前兆（或地震异常）。它包括地震宏观异常和地震微观异常两大类：

人的感官能直接觉察到的地震异常现象称为地震的宏观异常。大体可分为：地下水异常、生物异常、气象异常、

地表异常等。

一、地下水异常：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 7.8 级地震的地下水异常

1、2005 年 1 月 3 日，四川大邑县 800 亩烟霞湖一夜之间湖水变色泛白，冒出硫磺味，湖中的鱼虾大量浮尸。成都市地震局的专家赶到现场进行调查，草率判断湖水出现异常与地震无关。

2、2008 年 4 月 26 日早上 7 时许，与四川相邻的湖北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的观音塘，平静的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伴有轰鸣声，不到 5 小时，一池碧水全部消失，现出黑色淤泥。约 8 万立方米蓄水突然消失。现场观察如下：池塘呈圆形，口面直径约百米，深数十米。池塘已水干见底，塘底留下黑色淤泥。村民们说，平时池塘水面与地面平齐，常年不干，水色碧绿，蓄水量约 8 万立方米。 一陈姓村民只身下塘，捉得两条 10 多公斤重的大鱼，但塘底没有其他任何生物。据《白果乡志》记载，这种现象自全国解放以来出现过 3 次，时间分别是在 1949 年、1976 年和 1989 年。此三年大事分别为：1949 年中华民国被颠覆、1976 年唐山大地震和 1989 年“六四”冤案。

二、生物异常：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 7.8 级地震的生物异常。

1、2008 年 5 月 10 日，媒体报道了四川绵竹市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的新闻，数十万只大小蟾蜍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行走。蟾蜍集中出现在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观察发现：“看到黑压压一片蟾蜍，在地上爬行，已经被车和行人轧死、踩死很多，血淋淋地躺在地上”，经查，该地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当地村民曾一度怀疑与天灾有关。但绵竹市林业局局长解释正值蟾蜍繁殖季节，降雨加上排水沟水温略高，非常适合蟾蜍产卵和孵化，大量幼蟾集体上岸迁徙是正常现象。并称“这种大规模的蟾蜍迁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据了解，绵竹距震中汶川县不足 100 公里。

2、2008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时许，武汉动物园的鹤类无故叫，大象攻击人，狮虎不午睡，斑马频撞门。武汉动物园动物安全察看员乌基明介绍，大象馆里的两只非洲象阿南与阿海一反常态，竟用长鼻子攻击平日的“亲密朋友”饲养员小甘和草料队袁师傅。夜行动物老虎和狮子平时每天中午都要午睡，但昨天园内 20 多只狮子、老虎都没有睡觉的迹象，它们在活动场不停地走来走去。鹤岛饲养员沈鸿飞介绍，上午 10 时许，岛内的 10 余只灰鹤、丹顶鹤无故昂头大叫不止。

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的地震学专家和动物学专家认为，一些动物的视觉、听觉、触觉、振动觉、平衡觉器官功能比人类强大。伴随地震而产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振动、电、磁、气象、水氡含量异常等），往往能使一些动物的某种感觉器官受到刺激而发生异常反应。如一个地区的重力发生变异，某些动物可能通过它的平衡器官感觉到；一种振动异常，某些动物的听觉器官也许能够察觉出来。地震前地下岩层早已在逐日缓慢活动，呈现出蠕动状态，而断层面之间又具有强大的磨擦力，于是有人认为在磨擦的断层面上会产生一种每秒钟仅几次至十多次、低于人的听觉所能感觉到的低频声波。人要在每秒 20 次以上的声波才能感觉到，而动物则不然。那些感觉十分灵敏的动物，在感触到这种声波时，便会惊恐万状，以致出现冬蛇出洞，鱼跃水面，猪牛跳圈，狗哭狼吼等异常现象。动物异常的种类很多，有大牲畜、家禽、穴居动物、冬眠动物、鱼类等等。

三、气象异常：地震之前，气象也常常出现反常。主要有震前闷热，人焦灼烦躁，久旱不雨或霪雨绵绵，黄雾四塞，日光晦暗，怪风狂起，六月冰雹等等。发生六级以上强地震会出现“地震云”。

2008 年 5 月 10 日傍晚 7 点 15 分，阿坝州上空出现大片地震云。

四、地表异常：

2007 年 4 月 17 日，四川省宣汉县三墩乡方圆 10 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总数逾千的“天坑”群。最大的“天坑”，面积约 100 平方米，原是一块冬水田。当地人称，田中的水突然疯狂旋转，一眨眼田地不见了，成了一个深邃莫测的大坑。

2008 年 3 月 25 日凌晨，宜宾江安县红桥镇五阁村发生了局部地面塌陷，形成大小不等的 3 个巨型“天坑”，呈直线展开，长约 400 米。

2008 年 3 月 27 日，四川达州达县大风乡白果村一带陆续出现土地沉陷，形成不少“天坑”。最大的一个在半山腰上，直径超过 10 米，深数十米。 据调查，在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挖煤等采掘行为，历史上也没有。

综上所述，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认为地震前有足够多的前兆，但是未获当局重视，以致人民群众措手不及、伤亡巨大。

以上为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向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提交的 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的前兆调查分析报告，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委员充分研究、辩论，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签署此文本。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的地震学专家和动物学专家 39 人签名列后（略）。

郭泉：民主先声 214：拒绝国际地震救援组织来华协助搜救是极不明智之举

5 月 14 日上午 8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就中共政府拒绝国际地震救援组织来华协助搜救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议如下：

拒绝国际地震救援组织来华协助搜救是极不明智之举！

案情介绍：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次日凌晨，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表示，目前未适宜接待外国救援队协助搜救。但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表示，愿意接受捐赠款物。

经查，中国发生地震灾害后，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德国、以色列、罗马尼亚、智利、墨西哥、葡萄牙阿富汗、塞浦路斯、西班牙等政府领导人和相关政府机构，向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表达了慰问并提出了援助的意愿。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指出：

第一、遭遇强烈地震，被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在 72 小时内如果得到解救，生命可以得到拯救。超过 72 小时，由于失血、疼痛、饥饿、干渴，将失去基本生理特征。

第二、国际救援是一种国家行为，大的灾难发生以后，各国救援队必须在接到受灾国的接受外国援助的意思表示后，才可以派出救援队伍。如果受灾国不主动提出愿意接受援助，各国的地震救援队伍，不可以主动开往受灾国。

第三、中国多来积极参与国际地震灾害救援工作，多次接受地震受援国的请求，派出了中国国际救援队。中国国际救援队七年来在灾害现场累计救治近 1.7 万人次。

第四、中国早 2006 年模拟过在发生一个重大破坏性地震后，中国政府接受国际救援，并组织协调国际救援队和国际救援资源，快速、有序地开展救援工作。

2006 年 7 月 11 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在中国北部城市石家庄举行了一系列地震救援演练活动，以增强各个国际救援队伍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能力。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印度等 17 个国家的国际救援队，在联合国官员的协调和配合下，模拟了在发生严重破坏性地震的地区开展救援的场景，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实战演练。

2006 年 8 月 3 日至 8 日联合国首次在中国组织国际地震救援演练，演练地点为石家庄。来自 13 个国家的救援队、政府组织参加演练活动。这次演练活动的目的是使各国国际救援队、地震灾区政府了解和熟悉联合国框架下国际救援启动、部署和行动的机制，同时让当地政府了解国际救援队到达时，为有效开展救援行动应该协调开展的工作及流程。

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提供的情报显示：

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对外称中国国际救援队）由国家地震局、解放军某工团及武警总医院于 2001 年初组建，参加过 2003 年阿尔及利亚 6.7 级强震、2004 年苏门答腊附近海域 9 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 2005 年巴基斯坦 7.8 级大地震等国际地震灾害救援工作，抢救危重病人 200 人次，开展各类手术 1158 台。在巴基斯坦国巴拉考特地区发生地震后，巴基斯坦立即向全世界发出紧急请求救援的呼吁，在 48 小时内，有将近 20 支的国际救援队到达灾区。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是在灾后第 45 小时到达灾区现场的。

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两次到印度尼西亚参加地震救援。2006 年 5 月至 6 月间，在印度尼西亚地震救援中，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当地搭建一所野战医院，展开医疗救援，成为当地第一支展开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综合救治的外国救援队，先后为 3015 名伤病员进行救治。

以上为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向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提交的中共政府必须在 72 小时内呼吁国际地震救援组织来华协助搜救的报告，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委员充分研究、辩论，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签署此文本。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的地震学专家和灾难救援学专家 27 人签名列后（略）。

郭泉：民主先声 215：反对“主流科学家”的地震不可预测谬论，临震预测不是“伪科学”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后，“主流科学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为国家地震局解脱没有预报的责任，他说：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中国地震学“主流科学家”认为，破坏性地震（5 级以上）的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和 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 7.8 级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

但是，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的地震专家指出，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和 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 7.8 级地震都被中国“非主流科学家”成功临震预测。

中国“非主流科学家”采取的预测理论是中西科技文化优势互补的预测理论。

512 四川龙门山地震带 7.8 级地震被中国“非主流科学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耿庆国先生在 2008 年 4 月 26 日预测，他在 4 月 30 日急报国家地震局等国家机关的文字报告中明确指出：“阿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 5 月 8 日(前后 10 天以内)”。

但是，这一重大科研预测，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下面介绍一下，中国地震学方面杰出的“非主流科学家”耿庆国研究员的科研成果。

1966 年 4 月 27 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请李四光和翁文波来谈话，说我请你们来是要你们做地震预报，这是我给你们的任务。周总理给了李四光和翁文波地震预测的任务。他们二人一直到临终前都在努力工作。李四光先生搞的是地质力学和地应力，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搞法，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测，例如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翁文波的信息预测研究取得了很多预测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果。

1970 年 1 月 5 日 1 时 0 分 34 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 7.7 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 10 度强，震源深度为 10 公里，死亡 15621 人，为中国 1949 年以来继 1954 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

时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技术台长的耿庆国先生当天上午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即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总理凌晨作出的重要指示，周总理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周总理问耿庆国先生：“耿庆国同志，你刚才讲，你们现在用 10 余种方法手段进行观测，到底有哪 10 余种手段，要一个一个地说给我听。”

耿庆国先生和其他同志一一做了具体汇报：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形变电阻率、地电……

周总理说：“你们说有 10 余种方法，才说 9 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气象与地震有没有关系？天体的因素都要考虑。中国县志上也讲了一些现象，有些是有道理的，别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载。”

此后，耿庆国先生根据历代（包括 1956-1970 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 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 1-3.5 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公元 512 年-1879 年中国大旱后 2-3.5 年,发生了 7 次 7.5-8 级大地震）。1972 年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 1975 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 1976 年的唐山地震，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前数日，耿庆国等先生就预测到了，并立即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电话。“26 日那天，国家地震局来了 15 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就这样，唐山大地震在已经预测到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唐山人民，以至死亡 24 万之众。地震后，耿庆国、张闵厚等先生抱头痛哭。他们测出来了，却报不出来。

耿庆国先生在 1980 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主流科学家”的利益，耿庆国被调出预报队伍，去了地震报社。

2008 年 5 月 12 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 7.8 级强震，中国“非主流地震科学家”耿庆国研究员悲痛欲绝。2006 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2008 年 4 月 26 日、27 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 6-7 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于 4 月 30 日以密件形式发报中国地震局等国家机关）。

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 5 月 8 日(前后 10 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

作出这一预测的中国“非主流地震科学家”有耿庆国、汪成民、任振球、王迪兴、李世煇等。

让中国人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中国的英雄！但是，却被埋没了！埋没他们的直接结果，是数万人被埋没在地震的废墟里！

“非主流科学家”在中国被埋没是中国科技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他们的很多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成果和学科在国内遭到了“主流科学家”、“主流学者”打击。

为天灾预测作出杰出理论和实际贡献的已故翁文波院士与为中国和世界解决粮食问题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先生……由于尊重和出色地应用了东方科学思维，致使他们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翁文波院士天灾预测方法被攻击为“伪科学”。袁隆平先生当年在评选院士的问题上多次遭受到压制和中伤，要不是袁先生在国外取得引以自豪

的成绩，再也压不住了，才最终授予了工程院院士。

而今更可恶的是“主流科学家、主流学者”们还将批“伪科学”的矛头集中指向汉字和中医。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分分合合，人民倍受战乱之苦，其中更是经历了几次文化大浩劫，然而中华民族在磨难中却巍然屹立。她吸纳百家文化，有容乃大，更加熠熠生辉。

一个民族能不能长存，一个国家能否长久保持独立，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基于文化之上的人民。两者缺一不可。

为恳请国家领导人重视“非主流科学家”、“非主流学者”，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呼吁国家有关方面立即停止以所谓“伪科学”对中国“非主流科学家”采取的中西科技文化优势互补的预测理论的漠视和打压，任命“非主流科学家”担任其相关行业的专业顾问。

现公布反对“以所谓‘伪科学’对中国‘非主流科学家’的中西科技文化优势互补的预测理论进行漠视和打压”的“非主流学者”名单：

耿庆国：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李世煇：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李志超：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及天文与应用物理系教授
陈一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孙文鹏：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刘易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刘定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杨雨霖：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
杜乐天：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张治平：上海地震局地震观测技术所研究员
徐业林：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徐好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
徐海亮：水利部减灾中心客座教授
张　哲：湖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
徐道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高建国：中国地震局地质所教授
萧钦羡：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高级工程师
王凤保：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晓彤：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所副研究员
王伟勇：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七〇四研究所研究员
王文光：中国专利局高级工程师
朱　震：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
朱建国：总参三部原副局长
任振球：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田淑贤：山东煤矿泰安机械厂高级工程师
庄寿强：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于成全：原辽宁社会科学合作与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马凌环：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王达水：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站
王延生：原辽宁省《湖滨工程报》和《海北科普报》主编
王金龙：河北省张家口卷烟厂
卢卫华：湖南省娄底冷水江市一中高中（中学高级）
文裕庚：中央台副研究馆员
孔祥林：中国普天首信集团工程师
尹育凌：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石益祥：浙江海洋学院数学系副教授
田合禄：太原市新闻出版局主任
叶眺新：四川省《绵阳日报》社研究员
冯宝生：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所研究员，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秘书长
匡调元：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吕应钟：台湾自然医学教育学会理事长，台湾南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吕嘉戈：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所长
邱　浩：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邱 锋：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健身与长寿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刘长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刘东风：石家庄市热电一厂
刘月生：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刘先志：成都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高工
刘明基：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管理部副经理
刘福芳：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汤学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庄一龙：上海市科技党校副教授
齐 新：《北方经济报》社主任
江正杰：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孙开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孙振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牟重行：浙江椒江区气象台高工
纪　由：中国河洛易经学院易学教授
李升平：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李光福：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学院教授
李全起：北京创造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李纪兵：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南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法律诊所）执行主任
李伯淳：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杨少山：杭州市中医院国家级老中医
杨金城：贵州省六盘市水城二中高级教师
杨俭华：首都师大物理系教授
严谷良：国家发改委原副司长、高工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苏云放：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基础教授
余传琮：武汉供电公司高级经济师
沈今川：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汪国风：天津画院教授
宋孔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
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宋安群：原新疆石油地质调查处副研
辛立洲：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闵家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 帆：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
张 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 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以宽：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张进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副主编
张伟荣：中国船舶工业七〇八研究所研究员
张宝印：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张启斌：河北张家口卷烟厂基层干部
张建军：河北省邯郸县粮食局
张培林：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副院长
张崇安：山西省煤炭地质公司高级工程师
陈 帆：湖北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
陈 宽：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陈亚平：北京画院资深专业画家
陈先德：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七〇五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陈其翔：北京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邸振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能源协会原组织部长、高级工程师

邵传贤：《新知客》杂志编辑、文字统筹
邵邻相：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苗玉章：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苒 丰：煤炭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研究员
武月萍：河南中医学院讲师
武茂灿：山东煤矿泰安机械厂高工
欧阳首承：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美国）世界广义系统研究所研究员
周文斌：《光明日报》原科技部主任、高级记者
周吉善：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周光华：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周勤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审
季 灏：上海东方电磁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孟运余：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
胡祖尧：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原总设计师、高级工程师
柏青山：吉林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
南文政：《中国水利报》主任记者
荣葵一：武汉理工大学高工、教授
段文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姚春鹏：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袁 立：北大资源学院副教授
贾 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徐欽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研究员
徐德江：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钱书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研究员
殷 杰：华夏意象文化艺术书院院长、教授
郭上同：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副研
黄 拓：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研究生
黄友直：《发明与创新》杂志社原主编兼社长
梅开丰：江西省南城县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江西名中医
萧启宏：东方文星汉字研究所所长
程崇仁：江西财经学院副教授
章健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高工
商宏宽：地震出版社编审
彭 贤：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蒋春暄：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 4 部高工
韩行高：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高工
吴瀛洲：国家级农业专家、农村实用科技全国通联山西常务副秘书长、语言学家
徐朝阳：北京亘原生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硕士
陈松鹤：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
傅玉玲：华夏意象文化艺术书院副教授
傅伟敏：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傅景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郭铁峰：吉林大学副教授、工学博士
高懿德：曲阜师大教授、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郭 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法学硕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16：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第一批接纳 1000 名灾区孤儿

今天（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Family Day），今年，联合国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定为“父亲与家庭：责任与挑战”，目的就是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重要职责。

今天 17 时到 20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特别会议，首先由本人介绍了中国《收养法》收养子女、收养孤

儿或残疾儿童的有关法律条文，特别是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年满35岁、只能收养一名”限制的条文。

随后，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就四川灾区的孤儿问题进行充分研究、辩论，并与各党部充分沟通，决议如下：

第一、中国新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向民政部门登记接纳四川灾区孤儿；

第二、第一批落实1000个中国新民党党员家庭接纳1000名灾区孤儿；

第三、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及各省党部继续组织献血、捐款、捐物。

第四、各省党部向中央党部上报各省向民政部门登记接纳四川灾区孤儿的党员名单。

关于“国际家庭年”：

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1993年纽约特别会议提出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以此提高各国政府决定和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单位。家庭在社会的组成和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根据其本能的特征，需要同类的关怀和怜悯，而家庭就是为满足人的这一天性需求，而建立的一个集体。家庭作为对社会最有影响的单位，在解决困惑人类社会的危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灾区孤儿必须进入家庭，享受家庭温暖。

关于《收养法》的有关规定：

被收养人系不满14周岁的儿童。收养分为两种，一是收养非孤儿，一是收养孤儿或残
疾儿童。

一、收养非孤儿的，收养人必须无子女、年满35岁、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无子女收养人分为无配偶收养人、夫妻收养人。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

无配偶的女性收养儿童无此“年龄相差”限制。

二、收养孤儿或者残疾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年满35周岁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三、收养必须履行的手续：

1、收养应当由收养人、送养人依照法定收养、送养条件订立书面协议；

2、收养人或者送养人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3、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的，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

以上法律条文与中国新民党第一批接纳1000名灾区孤儿直接相关的条文为“收养孤儿或者残疾儿童的，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年满35周岁以及收养一名的限制。”

在今天晚间的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特别会议上，本人决定收养一名灾区孤儿。

拟定温总理家宝先生视察临时孤儿院时拉着一个小姑娘的手说“别哭，别哭”的那名儿童。如该儿童已被其他同志收养，可接受其他儿童。

郭泉：民主先声217：中国新民党敦促中共政府立即提升学校、医院的建筑等级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5月16日晚20时至22时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建筑质量问题展开讨论，敦促中共政府提升学校、医院的建筑等级，决议如下：

第一、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应确定为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所规定的甲类建筑。即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其值应按批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措施，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当为9度时，应符合比9度抗震设防更高的要求。

第二、近期（奥运之前）应对全国所有中小学的老旧砖（石）混结构房屋进行全面的抗震加固。建议采用钢筋锁固山墙，增强抗震能力。

第三、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的旧有砖（石）混结构房屋必须在2年内拆除。新建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严禁使用钢筋混凝土空心预制板，必须为全框架结构建筑。

会议纪要：

5月16日下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先生称，汶川地震的烈度达到10到11度，大大超出了规定的建筑抗震设防标准。

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的抗震专家对此持不同意见。姜伟新先生称汶川地震的烈度达到 10 到 11 度的目的是为了学校建筑的坍塌寻找借口。

地震烈度分为 1-12 度，是指地面及房屋等建筑物受地震破坏的程度。对同一个地震，不同的地区，烈度大小是不一样的。距离震源近，破坏就大，烈度就高；距离震源远，破坏就小，烈度就低。 10-12 度属于毁灭性的破坏。

但是，事实上，包括震中的汶川县的建筑都没有完全被摧毁，但是绝大多数的学校都被摧毁了。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一些坍塌学校旁边的其他使用时间更长的建筑都没有遭遇“毁灭性的破坏”，而学校却无一幸免。这一状况的发生，显然不是因为“毁灭性的破坏”，而是因为建筑质量。

根据 2002 年实施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我国城镇建筑必须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认为，从 1974 年原国家建委发布全国第一个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起，我国对建筑抗震设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对“74 规范”进行修改，颁发了“78 规范”；1989 年，又发布“89 规范”，6 度区的建筑工程正式纳入抗震设防范围；2001 年，对“89 规范”进行修订，从 2002 年 1 月起实施新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根据 2002 年起实施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我国抗震设防烈度分 6-9 度，度数越高要求越严。6 度及以上地区的建筑必须进行抗震设计，要求做到：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50 年一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475 年一遇)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1641-2475 年一遇)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根据《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汶川、北川、绵竹、都江堰、江油、什邡等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也就是说，国家规定这些地区的建筑必须达到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但是，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的专家仔细研究分析了有关学校坍塌的照片后，认定学校的建筑材料有重大瑕疵。例如，水泥预制板里的钢筋直径只有 5 毫米左右，例如立柱里的螺纹钢筋数只有 4 根，另外还发现梁柱钢筋没有连接等。上述各地的学校建筑根本达不到 7 度，相反，完全是不设防的建筑。

所以本次地震中，学校建筑的大规模坍塌的原因除地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筑质量。

以上为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向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提交的地震中的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整改意见，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委员充分研究、辩论，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签署此文本。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专家 25 人签名列后（略）。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18：中国新民党敦促中共政府尽快发布四川核设施的安全报告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核能源安全委员会 5 月 17 日凌晨 5 时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川北地区的核设施和增派防核防化部队等问题展开讨论，敦促中共政府尽快发布四川核设施的安全报告，决议如下：

第一，四川全境及周边地区所有核设施应立即进行辐射检测；

第二，敦促中共政府尽快发布四川核设施的安全报告。

会议纪要

一、中国新民党核能源安全委员会对四川核工业的调查报告：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NPIC（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在四川省夹江（县）基地兴建了一批核反应堆工程实验研究设施，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核动力的工程实验研究。

四川是国家重要的核科研生产基地，境内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燃气涡轮研究所等国防研究院所 18 家。其中主要的有：

核工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 所），位于夹江县。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902 所），中国核武器研究基地，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国防第九研究院)迁建。基地为绵阳“839”核工业基地。由高级建筑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李海峰先生设计，839 工程曾获核工业部建筑设计二等奖。

总装备部中国空气动力发展与研究中心：机关位于绵阳，各研究所位于安县各镇。

乐山核聚变研究院（585 所），由长春 503 所迁建，位于乐山县。

白龙江核基地。中国第二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1968 年开始从 404 厂搬迁兴建。3 万人。位于四川广元。

221 厂：海晏金银滩（已废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国防第九研究院)，原定

设在北京，1958 年开始在青海建设，1962 年建成，1964 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68 年开始搬迁到四川绵阳即西南物理研究院。

525 厂：峨嵋机器制造厂

814 厂：位于乐山市境内金口河区（成昆线经过）的金口河境内，距金口河火车站大概有 30 公里左右。中国第三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中国重水工厂。4 万人。

816 厂：涪陵核燃料元件厂。未建成，现转为大型化肥厂。其中的巨大洞体建筑由 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梁宏发先生设计，“816 工程洞体设计”曾获国家科技大会奖（集体）。

821 厂：四川广元县西北部 15 英里处：白龙江核基地。1968 年开始从 404 厂搬迁兴建。中国第二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制造核弹头，是中国最大的核反应炉生产地，也是现代核武器所需主要成分——核燃料钚的主要生产厂。3 万人。民品为电解铝

857 厂：四川江油，中子弹制造厂。

核工业建设总公司有两个建设公司位于四川：

位于广元县的 23 建设公司和位于绵阳的 24 建设公司。

二、四川核工业单位的人员伤亡情况

根据中国新民党核能源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显示：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 7.8 级地震，在此次震灾中，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成员单位中核二三公司绵阳基地管理处、广元基地管理处、四川核工业工程学校都江堰校区、夹江双福基地和 909 基地由于距震中较近，受灾严重，通讯和交通基本中断。

截至 17 日凌晨，四川军工、民爆行业已有 21 人死亡，63 人受伤，其中 9 人重伤。有 19 家单位财产受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尚在进一步调查、统计、核实当中。

其中，总部位于绵阳的二四建设公司在德阳某施工现场有五人在地震中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两人轻伤），在广元某施工现场有一人死亡，广元安全坝地区有一退休女职工头部受伤。

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宝轮镇的四川核工业技工学校（原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技工学校）有学生受伤情况发生，但没有死亡报告。

夹江双福基地和 909 基地也无人员伤亡事件发生。

624 项目部已暂时停工，人员全部及时疏散，无人员伤亡。

绵阳基地房屋墙体裂缝、地基下沉、屋面开裂、楼板松动、错位受损 41 栋，涉及职工群众 943 户；广元基地房屋受损 18 栋，涉及职工群众 388 户。

以上为中国新民党核能源安全委员会向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提交的地震中的川北核工业单位的相关情况，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委员充分研究、辩论、决议，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签署此文本。中国新民党核能源安全委员会专家 17 人签名列后（略）。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19：中国新民党提醒中共政府密切关注因地震引发的山洪爆发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水利工程委员会 5 月 17 日下午 2 时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可能因地震引发的山洪爆发问题，展开讨论，提醒中共政府密切关注因地震引发的山洪爆发，决议如下：

第一、应紧急运送、转移山区河道附近的居民至安全的高地。

第二、启动战备程序，最大程度地动员运输力量进行灾民的转移。

第三、对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实施爆破。

会议纪要：

中国新民党水利工程委员会介绍了灾区可能发生的山洪爆发的情报：

四川省因地震出现险情的水库有 391 座。

重庆 11 个区县共有 129 座水库受损，其中 40 多座是中型水库。

北川县上游，由于地震造成山体滑坡，江面上的堰塞湖，不断抬高的积水严重威胁着下游的救援人员。

北川县茶坪河由于山体滑坡已经形成了五个堰塞湖，水位越来越高。

绵竹市汉旺镇天池乡的绵远河上游堰塞湖水量已经超过 100 万立方米。

青川县关庄镇东河口附近山体滑坡，阻塞了青竹江、红石河，导致水位大涨，在青川县石板沟地区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已经形成约 40-50 米高的坝，水位则达到 20 多米左右，其上游有 5-7 公里的回水，蓄水量已达 800 万。上游部分地区已形成漫坝，存在溃坝引发洪水的危险。

安县靠近北川的两个乡镇，震后该地区形成 3 较大的堰塞湖，水位急增。

特大水电站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大坝面板发生裂缝，厂房等其他建筑物墙体发生垮塌，局部沉陷，500 千伏 A 向出现避雷器倒塌，整个电站机组全部停机。

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正常蓄水位为 877 米，最大坝高 156 米，总库容 11.26 亿立方米。

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岷江上游，都江堰城西北 9KM 处。岷江是长江一级支流，全长 711KM，流域面积 13588 平方公里。都江堰以上为上游，河长 314KM，落差 2062M，流域面积 23037 平方公里。

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22662 平方公里，占岷江上游面积的 98％，多年平均流量 469 立方 / 秒，年径流量总量 148 亿立方米，占岷江上游总量的 97％

中国新民党水利工程委员会认为：

以上地区的堰塞湖悬在上面，其正下方就是灾民的集中安置点。决堤后，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紧急运送、转移山区河道附近的居民至安全的高地；启动战备程序，最大程度地动员运输力量进行灾民的转移。对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实施爆破分流。

必须确保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严密控制总库容，空库运行。同时，做好下游人民群众的移民工作。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20：中国新民党在汶川地震中认真履行了在野党的议政职责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中国四川龙门山断裂带发生 8 级地震。一周内，中国新民党召集本党各专业人士，召开了七场有关地震的专业会议。

5 月 13 日 9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四川党部立即组织全体党员赶赴各地区献血点献血。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号召全国各省党部组织人员献血。会上，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高度关注地震中大量中小学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新民党军事委员会呼吁中国的空降部队（15 军）立即出动实施空中支援。

5 月 13 日下午 5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联合召开特别会议，会上，各委员就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 7.8 级地震一案展开讨论，决议如下：第一、支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切救援行动；第二、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全体党员立即赶赴各献血点献血，全国各省党部组织党员献血。第三、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谴责中共当局忽视大量地震前兆，以致人民群众措手不及、伤亡巨大。

5 月 14 日上午 8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新民党赈灾委员会就中共政府拒绝国际地震救援组织来华协助搜救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议如下：拒绝国际地震救援组织来华协助搜救是极不明智之举！

5 月 15 日 17 时到 20 时，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就四川灾区的孤儿问题召开特别会议，决议如下：第一、中国新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向民政部门登记接纳四川灾区孤儿；第二、第一批落实 1000 个中国新民党党员家庭接纳 1000 名灾区孤儿；第三、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及各省党部继续组织献血、捐款、捐物；第四、各省党部向中央党部上报各省向民政部门登记接纳四川灾区孤儿的党员名单。

5 月 16 日晚 20 时至 22 时，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建筑质量问题展开讨论，敦促中共政府提升学校、医院的建筑等级，决议如下：第一、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应确定为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 所规定的甲类建筑。即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其值应按批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措施，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6-8 度时，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当为 9 度时，应符合比 9 度抗震设防更高的要求。 第二、近期（奥运之前）应对全国所有中小学的老旧砖（石）混结构房屋进行全面的抗震加固。建议采用钢筋锁固山墙，增强抗震能力。第三、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的旧有砖（石）混结构房屋必须在 2 年内拆除。新建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严禁使用钢筋混凝土空心预制板，必须为全框架结构建筑。

5 月 17 日凌晨 5 时，中国新民党核能源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川北地区的核设施和增派防核防化部队等问题展开讨论，敦促中共政府尽快发布四川核设施的安全报告，决议如下：第一，四川全境及周边地区所有核设施应立即进行辐射检测；第二，敦促中共政府尽快发布四川核设施的安全报告。

5 月 17 日下午 2 时，中国新民党水利工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可能因地震引发的山洪爆发问题，展开讨论，提醒中共政府密切关注因地震引发的山洪爆发，决议如下：第一、应紧急运送、转移山区河道附近的居民至安全的高地。第二、启动战备程序，最大程度地动员运输力量进行灾民的转移。第三、对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实

施爆破。

5 月 17 日，本人被中共当局传唤 24 小时，并再次被抄家。中共当局要求我提交各专业委员会的名单，遭我拒绝后，中共决定我入狱 10 天（18 日至 28 日）。

5 月 28 日 17 时，我被中共释放。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21：将谴责进行到底！出狱后继续谴责当局没有依法进行地震预报

5 月 13 日，我依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掌握的一些地震前兆情况，发表文章（《民主先声：213》）强烈谴责有关当局没有依法进行地震预报。

5 月 17 日，我被中共当局传唤 24 小时，并再次被抄家。中共当局反复询问我的民主先声 213 里的内容。他们强调，我谴责有关当局没有进行地震预报是没有与党中央保持“和谐”，并要求我提交和我一起参与谴责的专业人士名单，遭我拒绝后，中共决定让我入狱 10 天（18 日至 28 日）。

5 月 28 日 17 时，我被中共释放。

5 月 29 日，我继续强烈谴责有关当局没有依法进行地震预报。

根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5 号），中国地震局是管理全国地震工作、经国务院授权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赋予的行政执法职责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地震局的主要职责有 11 项，其中 第六个职责是：管理全国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制定全国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提出全国地震趋势预报意见，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除《民主先声：213》中所提的地下水异常、生物异常、气象异常、地表异常等情况外，今天（5 月 29 日），我再提供以下 10 个材料，其中前 9 个材料是国内外科学家对本次地震的预测，至于最后一个材料，请大家自己去琢磨了：

1、　　　　地震预报专家耿庆国的几次预报

2006 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2008 年 4 月 26 日和 27 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 6-7 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 月 30 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 5 月 8 日(前后 10 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

2、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 5 月 3 日向中国地震局发生强震的预报

从 2006 年三年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特别是 2008 年 5 月 3 日，陈一文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据陈一文所知，还有其他人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预测。但是，这些严肃科学的预报一再泥牛入海无回音，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与中国地震预测研究所的所长们从来没有就预报访问过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们地震预测的工作。因此，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们现在称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完全是在撒谎。

5 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 CCTV9 频道英语节目有一个讨论“汶川 512 大地震”的嘉宾访谈节目，在有关专家涉及到汶川地震造成如此巨大伤亡是否有个责任问题时，主持人杨瑞说，我们现在联线一位权威人物就此发表意见，他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于是陈一文通过电话用英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NASA 科学家五月初发现中国四川会有状况发生

五月初，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从地球红外监测图像上发现，中国西南部地区有异常迹象。一位名叫迪米塔•奥佐诺夫(Dimitar Ouzounov)的科学家在给同事的一封邮件中指出：中国四川会有状况发生。

对 NASA 地球物理研究员弗里德曼•弗洛伊德(Friedemann Freund)来说，这为他那套简单但引起热烈争论的理论提供了又一力证。这位曾从事化学研究的科学家认为，地震是地球物理活动持续积聚的结果，有时，在大的活动发生前一周多时间就可以发现征兆。

弗洛伊德的主要想法是：岩层承受足够大压力之后（比如因地质构造板块移动而受压）会变成类似“电池”那

样的蓄电体，其产生的电流能在地层里传输到数英里之外的地方。他说，NASA 观测到的红外图像集中在离此次四川地震震中位置几百英里的地区。

已经 75 岁的弗洛伊德说，他已将自己和小说家妻子 Hisako Matsubara 共同积攒的 100 万美元拿出来投到了研究工作中。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图像应用部门负责人奈文•布兰特(Nevin Bryant)说：我认为弗洛伊德在某些地方说到了点上。在所有天气条件足够观察的地震案例中，我们都从地球卫星图像上看到了反常迹象。

NASA Ames 中心地球科学分部同意这个说法。该分部负责人斯蒂文•希普斯金(Steve Hipskind)说，人们感觉到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中至少有很强的合理成份。

摘自：[地层电流地震预报理论引起关注] 《华尔街日报》 2008 年 05 月 20 日

4 、《地壳》杂志（美国）2007 年 7 月对四川大震的预报

《对西藏高原东边缘北川和彭灌断层频繁地质活动的研究》（Active tectonics of the Beichuan and Pengguan faults at the 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他们还建议：藏东的边缘平行断层的活动对于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可能代表着重大的地震危险。”（They also suggest that activity on the margin-parallel faults in eastern Tibet may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seismic hazard to the densely populated Sichuan Basin.）

本文作者共六人，除四名外国人外，还有两名中国科学家。 这六名科学家是：

美国: Michael A. Ellis， 美国: Gregory S. Hancock， 英国: Alexander L. Densmore，瑞士: Nicholas Richardson, 中国：李勇，成都理工大学油气地质及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周荣军 四川地震局工程师。

该研究项目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号：49802013）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号：EAR-0125565）,ETH Forschungskommission 基金(TH-4/03-0)的联合资助。

5 《灾害学》2006 年 9 月的预报

（季刊 创办日期：1986 主办单位：陕西省地震局 协办单位：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陕西省减灾协会、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论文：《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

作者:龙小霞、延军平、孙虎、王祖正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摘要:“从以上所进行的推算与预测结果看, 在 2008 年左右, 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 级强烈地震。为了更好地配合防震减灾活动,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五点建议：1、完善预防措施；2、加强抗震能力建设；3、健全紧急救援系统建设；4、广泛宣传动员；5、加强地震检测网络建设等。”

“可公度法”是由已故的国家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翁文波院士(1912--1994)开创的方法论,翁文波先生被称为预测科学宗师。

6、2005 年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学忠博士预测四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

2002 年，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员陈学忠博士的一篇短篇论文《四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危险性分析》发表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刊物《国际地震动态》（2002 年第 12 期）上。当时，陈学忠博士预测在未来 1～ 2 年内, 四川地区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从 2003 年起就应该警惕四川地区发生 7 级以上地震的可能!；在 2005 年第一期《国际地震动态》上，陈学忠博士继续跟进了一篇论文《印尼 8.7 级地震对我国大陆地震趋势的影响》。陈学忠说：我的两次预测，方法上还不是什么模型分析，都还是处于数字的统计分析和经验分析。

7、甘肃省省委书记陆浩说甘肃地震局对 512 大地震做过预测报告

甘肃省省委书记陆浩在全省抗震救灾工作会议上对省地震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甘肃地震信息网信息，在 5 月 20 日上午召开的全省抗震救灾工作情况视频通报会议上，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陆浩同志通报了甘肃省地震灾害的基本情况和省委省政府震后应对情况，对下一阶段抗震救灾的主要任务作了部署，

会上，陆书记对甘肃省地震局准确地分析判断震情趋势提出了表扬，他说，省地震局是国家的一支重要队伍，具有很强的地震科技能力和地震预报能力，在四川汶川 8.0 级地震的震前、震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震后迅速地提出了准确的震情判断意见，并在应急期及时提供了较准确的震情信息和震灾风险评估信息。为省委、省政府组织抗震救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摘自新华网甘肃

频道（2008-05-20 18:08） 甘肃地震信息网

8、2003 年 美国科学家罗格•比哈姆的预警: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罗格•比哈姆称，他收集了中国最近公布的文献，根据最近翻译出的西藏地震资料历史记录比哈姆认为，１５０５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中部的一次大地震比以前想象的震级要大得多，这次地震可能夷平了沿印度和西藏交界处６００公里的地带，估计这次地震至少为 8.2 级。

比哈姆说，这次地震可能破坏了地表层，并可能导致约 9 米深的断层滑移。自那以后，印度板块每世纪向北亚推移 1.8 米，如此推算，这一断层积累了 9 米的受压位移。比哈姆在一次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年会上说，这一地区可能快到发生另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了。摘自 《“印度板块”找“靠山”将引发地震？》（2003 年 4 月 09 日 新华网）

9、 1975 年法国地震学者保罗和美国同行莫尔纳创立了板块“研磨”理论

地质研究发现，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本是完全分离的两个板块，大约 4 千万年以前，这两个板块发生碰撞，从此，印度就在不停地“ 研磨”它的亚洲邻居。这一板块“研磨”现象尽管十分缓慢，但其力量却十分惊人，不仅造就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而且不断使地壳起皱、变形，因而时不时带来破坏性极强的地震。它的“神力” 覆盖从喜马拉雅到西伯利亚、从咸海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带。有人把它比喻为一座巨无霸式的天然推土机，一年却只“作业”数厘米。这就是印度次大陆乃至我国北方和中亚地区地震不断的根源所在。

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地震活动在像印度次大陆这样远离已知的地震“冲突区”的地方仍如此活跃。直至 1975 年，法国地震学者保罗和他的美国同行莫尔纳创立了板块“研磨”理论之后，这一疑团才得以解开。他们通过卫星照片发现，次大陆“内部” 的地震和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的灾变性摩擦有直接联系，这种摩擦已在整个亚洲“刻”下了 6 条断层线。 摘自《印度大地震的根源：大陆板块“研磨”》（ 2001 年 02 月 02 日 新华社）。

10、震情信息保密知识培训班在杭州举办

震情保密事关政治社会影响，责任重大，鉴于当前复杂严峻的震情形势，为切实作好震情信息保密工作，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于 4 月 23 日——26 日在杭州组织举办了震情信息保密知识培训班，地震系统各单位地震分析预报部门主任共 40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监测预报司预报处刘桂萍处长亲自到会并讲话，向学员解释了举办这次培训班的背景，强调了保密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介绍了中国地震局机关当前落实保密工作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要求学员认真学习保密知识，增强信息保密意识，落实责任，确保万无一失。

培训班期间，学员们学习了震情信息保密的有关规定，还观看了保密知识相关录像资料，并就震情信息保密工作展开了讨论。本次培训班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讨论年度地震趋势研究报告编写规范征求意见稿。为了提高各单位年度地震趋势研究报告的质量，规范格式，同时也为报告评选工作更加公平公正，进一步规范化，监测预报司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这个征求意见稿，利用这次培训班的机会进一步征求学员的意见和建议。讨论会上，学员踊跃发表意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为报告编写规范的修改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浙江省地震局副局长兼中国地震局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傅建武同志也出席了培训班开幕式并致辞。在培训期间，浙江省地震局苏晓梅局长专程看望刘桂萍处长和与会代表。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22：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郑思潮先生出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2008 年 5 月 30 日上午 8 时至 9 时，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召集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要成员对 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间中国新民党的工作进行了研讨分析，经充分辩论，决议如下：

1、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入狱期间，中国新民党各项工作在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的部署下，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地进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成熟的政党对其《党章》和《党建党务大纲》的执行能力。

2、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思潮先生在 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期间召集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要成员召开过三次特别会议，分别形成三份决议案，受到世人瞩目。特别是在 5 月 20 日作出的“祝贺马英九先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决议案，更是立意深远。

3、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无罪入狱和安全出狱，标志着本党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即组党任务。本党工作现进入第二阶段，即全面开展社会工作和完善理论体系的工作。

4、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将在上述第二阶段里负责召集本党学部委员从事完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的理论体系的工作，并具体指导本党社会工作。

5、由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思潮先生出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负责召集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各专业委员会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进行问责、建议，并发布中国新民党决议。

6、新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郑思潮先生身份保密。

附：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间中国新民党的三份决议

一、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当局应立即释放郭泉

2008 年 5 月 19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特别会议，就本党代主席郭泉被中共当局强行带走及被抄家一案，进行了情况通报和充分辩论。

案情如下：5 月 17 日下午 6 点左右郭泉先生在接其孩子回家的路上遭到 7、8 名警察强行带走，随后警察到郭泉家抄走电脑。18 日下午，来了 3 名公安口头通知郭泉的家属：对郭泉教授处以治安处罚。家属问及罪名，警方称，郭泉没有罪名，但必须被拘留十天，十天后再做处理。并警告家属，对外不要讲太多，讲得多对郭泉不利。

本党同仁对案情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此案系中共当局针对本党在四川地震事件中发表多份专业报告而进行的刻意报复。

经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充分辩论，决议如下：

1、警方以“莫须有”罪名拘捕本党代主席郭泉先生，与温家宝先生的“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的执政理念完全背离。

2、本党强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郭泉先生。

3、在当局未释放郭泉先生之前，中国新民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此案进展。

4、本党接受海内外一切政治声援。

5、中国新民党海内外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释放郭泉先生，但必须采取非暴力原则，保持克制。并继续关注灾区情况，随时向中央党部通报。

6、在本党代主席郭泉先生未恢复自由期间，本党党务工作临时由秘书长郑思潮先生代行主席职务。

以上决议由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通过，由秘书长郑思潮签发此决议。

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祝贺马英九先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今天（5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先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向马英九先生表示祝贺。愿马英九先生在任期内为大中华的民主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由于以下两个特殊的原因，本党决定取消为马英九先生就任的庆祝活动。一是本党响应中共当局提出的 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为全国哀悼日的倡议。二是本党代主席郭泉先生遭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

以上决议由中央党部通过，由秘书长签发，特通告全党知悉！

三、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全力声援郭泉先生，但必须保持克制

今天（5 月 23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各地党部声援本党代主席郭泉先生一事展开辩论。

自本月十七日本党代主席郭泉被拘捕后，各地党部同人义愤填膺。并有消息显示，各地党部已有人员近日赴宁。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认为：本党应全力声援郭泉先生，但必须保持克制。

决议如下：

1、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入狱期间，本党同志不得私自集结前往南京抗议。

2、各党部应密切注意灾区情况，按有关地震的本党决议行事。力所能及的为灾区尽一份力量。四川党部应组织人力进入灾区对中小学垮塌建筑的砖石和钢筋进行调查取证，并专题讨论灾后灾区如何重建家园及惩治相关责任人。

3、无论郭泉先生的案件进展如何，本党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宗旨永不改变。郭泉先生多次指出，本党的真正核心是《中国新民党章程》、《党建党务大纲》和《民主先声》。

4、团结一致，努力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学习、传播、执行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起草的上述各文件，就是本党的历史使命。

5、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感谢各届朋友以各种方式对郭泉先生的支持和声援。

中国新民党　郭泉手机：13151423196　QQ：115659144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收

郭泉：民主先声 223：中国地震局 2006 年的“自信”与 2008 的“谦虚”比较

2006 年 7 月 28 日，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中对“地震预报可否预测”的问题肯定地说：“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肯定的，地震是能够预报的。特别是从科学技术方面不断深入研究，通过这么多地震震例的总结，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对某种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预报。”

中国位列地震预报的先进国家之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地震部门的中长期预报能力较高，中期预报的准确率已达到 30%，基本上可以满足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工作的需要。第二、1975 年 2 月，我国曾成功地预报了辽宁海城 7.3 级地震，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此外，对 1976 年云南龙陵、四川松潘的 7 级以上地震，1976 年四川盐源的 6.7 级震群，1995 年 7 月 12 日云南孟连 7.3 级地震，以及 1998 年宁蒗 6.1 级地震等，也都作过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报震例，所以，中国被全世界公认位列地震预报的先进国家之首。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尹京苑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对现代地壳运动、地球内部结构、地震震源过程、地震前兆图像的观测，在分辨率、覆盖面、动态性等方面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这种技术进步的意义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观测技术的进步给地震预测研究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华表示，可以通过对地应力的测量和地形变的监测，实现地震预测。例如，就在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天，甘肃酒泉地应力监测站就监测到了地应力的异常。

但是，在四川地震发生后，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地震局的预报职责的问责，中共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突然对地震预报都变得“谦虚”了起来，认为这是“世界性难题”。

例如：张晓东（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说，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难题，由三方面因素所决定：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对地下发生的变化，只能通过地表的观测来推测；二是地震孕律的复杂性。通过专家多年的研究，现在逐渐认识到地震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十分复杂，不同的地理构造环境、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震级的地震都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孕律过程；三是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全球每年都有地震发生，有些还是比较大的地震。但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进行科学研究需要统计样本，而这个样本的获取非常困难。由于上面三种原因，地震预报到目前仍是世界难题。

例如，孙士鋐（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说，一场地震一个样，地震预报难度很大。汶川地震是我国从 1966 年开始搞地震预报以来，得到震前信息最少的一次，这也表明了汶川地震的复杂性。前兆与地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例如，张国民（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说：地震以前出现动物习性的异常，在地震历史上有记载。但是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也是很多的，地震是这些异常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蟾蜍出来很多，这种情况除了跟地震有关以外，跟气候因素、天气条件都有关，所以这种情况跟地震有没有联系，或者说跟地震发生有没有密切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按照上述地震科学家的说法，仿佛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事情。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家地震局的教课书是如何规定地震局科研人员的地震综合预报的工作程序和内容的。

根据《中国地震预报概论》(梅世蓉、冯德益等著，地震出版社 1993 年版)，地震综合预报五阶段工作程序包括：即地震形势预测、年度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地震临震预报与震后预报。

地震预报是根据地震地质、地震活动性、地震前兆异常和环境因素等多种手段的研究与前兆信息监测所进行的现代减灾科学。

地震预报技术是从地震监测、大震考察、野外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室内实验研究等多方面对地震发生的条件、规律、前兆、机理、预报方法及对策等的综合技术。

我国根据观测到的大量前兆异常资料及一系列预报地震的经验，逐渐形成了“长(数年至一二十年)、中(一到数年)、短(数月以内)、临(数天至几十天)”的渐进式预报模式；采取“震源形成及演变过程的追踪与区域应力场变化的动态监测相结合”的工作方式；用“条、块、带、源、场、兆、触、震逼近思想”，进而研究了地震预报的判据、指标、方法以及技术程序。

地震综合预报的工作程序与内容

长期预报：对数年至一二十年内强震活动的地区与强度进行趋势预测

地震形势预测：对三五年内区域强震的发展趋势、活动水平与地区作预测

年度中期预报：预测一二年内地震活动的趋势、水平、强度，圈定地震危险区

短期预报：缩小预报区范围，进一步判定与修正地震三要素

临震预报：使预报时间缩短到一个月到一周内，预报范围缩小至 100～200 公里内；尽量减小预报误差

震后趋势预报：在中强以上地震发生后对震区及临区在短期内(一般几天至几十天)的地震趋势与强余震活动作预报

那么，中国地震局从 2006 年的“自信”到 2008 的“谦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可能有三种情况：

第一、中国地震局可能真的对这次特大地震无论在宏观异常方面还是微观异常方面都一无所知；

第二、中国地震局可能获得了相关异常报告，但是却没有向中央政府作出地震的预测报告；

第三、中国地震局可能向中央政府作出地震的预测报告，但是中央政府没有决定发布。

到底是上述三个环节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想，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我期待着。

中国新民党　郭泉手机：13151423196　QQ：115659144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收



郭泉：民主先声 224：为什么奥运会到了中国就与“人权”有了冲突呢？

5 月 17 日，奥运火炬传递到温州。始发点是温州体育馆。在“祖国大地一片红”的“红海洋”里，我的一位朋友高举着写有“人权”的白底红字的牌子，显得格外醒目。

我这位朋友是黄伟先生，45 岁，是一位民谣吉他歌手，经常到广场街头演唱，他的网名叫“广场浪人黄伟”。他人高马大，长相酷似西方人，在公共场合经常被误认为外国人。

我是弹古筝的，朋友间学民族乐器的比较多。吉他弹唱的朋友，只有黄伟先生一个。

他从早上 7 点开始就举着“人权”标语站在人群中，二小时后，圣火传递过去，他把牌子托在胸前逆着人流行走，很多人停留下对他拍摄。

这时，来了两个中共警察。做手势意示他停下，一边用英语说“NO ，NO”。

黄伟先生说：“我是中国人”，而且是“正宗的温州人”。

那两个中共警察立即凶恶地抢走黄伟先生的“人权”标牌。

黄伟先生夺回牌子，并把“人权”高高举起。大声质问中共警察，“我究竟犯了什么法？”

中共警察竟然对黄伟先生说，“你举人权牌子，就是不爱国，就是学达赖搞分裂！”

随后两个警察一人一边抓住黄伟先生的左右手，把黄伟先生押到了奥运火炬传递组委会。

途中，警察还质问道：“你举人权的标牌不怕被群众打死吗？”

黄伟先生对中共警察的这句话感到很奇怪，他说：“如果在中国举着人权的牌子都会被中国人民打死，那我无怨。”

中共警察在查看了黄伟先生的身份证、登记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进行了验证。

中共警察最后没收了黄伟先生的“人权”标牌，并要求他承诺不再另行制作“人权”标牌来体育馆展示就放他回家。黄伟先生说：“火炬也传递完了，也没必要再另做牌子了，这块牌子就留给你们做纪念吧”。

下面选三首黄伟先生的歌给大家看，让大家认识我的这位音乐朋友：

一、美丽的囚笼

——为布什名言“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而作

翻开历史，最美丽的：
不是上帝的梦幻天堂；
不是佛祖的极乐世界；
不是真主的朝觐圣地。
翻开历史，最珍贵的：
不是求真的科技发明；
不是寻善的哲学智慧；
不是唯美的艺术灵感。
翻开历史，最残忍的：
不是纳粹的焚尸炉；
不是那年的天安门；
不是九一一的纽约城。
天在落泪，背叛真理的知识最残忍；
地在抚慰，浇灌正义的鲜血最珍贵；
人在歌唱，驯服统治者的囚笼最美丽！

二、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随想）

——写于 2006 年 12 月 10 日

目视台历泪触魂，眼浮旧年此日景。
小城抛诗咒逆党，当街飘歌扬人权。
王侯掠国装公仆，昧签宣言蒙世界。
将相暴政假温柔，书生六四祭人权。
可悲睡狮成病猪，更怒龙子学狗吠。
琴震全民阿斗梦，曲记阿 Q 共和传。
休道文明五千载，独问奴役何时了？
引颈笑唱改朝诀，只借一句人权谣。

三、黄土下的歌声

——2007 年 6 月 4 日清晨 5 点 30 分首唱于温州松台广场

那年今天，天安门前。
“儿子”拿枪弹，亲吻一窝窝书生。
“母亲”用坦克，旋开潘多拉盒子。
凄凉十八年，
沙漠成草原，
丰润的豺狼，
嚼着兔筋吸着羊髓得意的嗥叫盛世喜洋洋。
悲怆十八年，
枯山变丛林，
肥硕的虎豹，
啃着猪蹄吮着鹿血忘形的嘶吼和谐乐悠悠。
今年今天，小城广场。
淡淡的清香，飘散祭者的羞愧。
郁郁的琴声，嘲笑苟活者的尊严。
“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GOODBAY TAKE CARE。
最后的晚宴即将落幕!



郭泉：民主先声 225：中共在堰塞湖问题上贻误战机，唐家山围堰应早期爆破

5 月 17 日下午 2 时，中国新民党水利工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可能因地震引发的山洪爆发问题展开讨论，提醒中共政府密切关注因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溃坝引发洪水的危险。决议如下：第一、应紧急运送、转移山区河道附近的居民至安全的高地。第二、启动战备程序，最大程度地动员运输力量进行灾民的转移。第三、对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实施爆破。

5 月 17 日的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情况远没有现在的高度，对堰塞湖实施“早期爆破”是最有效的手段。

可是，就在我们作出应该立即对唐家山堰塞湖实施爆破的决议后不到 4 小时，我被中共当局抓捕入狱。28 日出狱。

今天，6 月 1 日，唐家山堰塞湖已经进入最后的晚期，已经完全失去了爆破的有利条件。因为，晚期爆破，就等于溃坝。

唐家山堰塞湖，是目前四川震区已发现的三十四处堰塞湖中体量最大的一处。滑坡体坝高约八十二至一百二十四米，集雨面积达三千五百五十平方公里，蓄水容积约三点二亿立方米。5 月 17 日，蓄水只有几千万立方米，6 月 1 日，蓄水已经超过两亿多立方米，并正以每天约两米的速度上升。

在贻误战机的情况下，中国国家水利部日前只能选择开挖“泄流渠”。

那么，让水流随着水位上涨自动地流入“泄流渠”，是不是有效呢？

如果，唐家山堰塞湖的湖水只从“泄流渠”里老老实实地流出，而不进行“渠底切割”，那简直就可以形成另一个“黄果树大瀑布”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愿望，但是，事实却不会这么美丽。

因为，唐家山堰塞湖的围堰构造其实是两边的山体滑坡形成的，其土石结构松散、堆积杂乱无章，根本无法应对高位泄洪的巨大“渠底切割”力量。奔腾的泄洪会把“泄流渠”的土石瞬间卷走，形成溃坝。

唐家山堰塞湖“泄流”的情况会是这样的：

1、水位涨到“泄流渠”的高度时开始“泄流”。

2、洪水会带走“泄流渠”底的泥土，使得“泄流渠”越来越深。

3、“泄流渠”两侧泥土开始垮塌，“泄流渠”宽度和深度都在迅速增大。

4、洪水迅速“切割” 围堰构造，渗透和冲刷掉土坝的根基，使得大坝的厚度越来越薄，最终整个大坝崩溃。

5、唐家山堰塞湖的围堰长 800 多米、宽 600 多米、顶部面积 30 万平方米，预计完全崩溃只需要 200 小时。

所以，不在早期实施爆破，而在晚期开挖“泄流渠”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唐家山堰塞湖的“泄流渠”将于 6 月 4 日左右开始“泄流”，何时崩溃，完全取决于山体滑坡的土石结构。

如果长 800 多米、宽 600 多米的围堰完全为巨大的山体石料，那么，我们会欣赏到一个比尼亚加拉大瀑布还要壮观的世界第一瀑布：一条长 800 多米，落差 100 米以上的大瀑布。

天佑中华吧，愿我们看到的是这条世界上最美丽的大瀑布，而不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大溃坝。

郭泉：民主先声 226：“315”至“512”间发生的事件还不足以作出地震预报吗？

2008 年 3 月 15 日，甘肃陇南文县地震局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短临预测，预测在 3 月 17 日至 4 月 1 日，在东经 101 度，北纬 32.6 度发生黎克特制 5.0 至 5.4 级地震，误差范围直径 100 公里。

3 月 22 日，汶川县威州镇发生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

3 月 30 日，汶川县映秀镇发生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

4 月 8 日，汶川县绵池镇发生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

（以上三则“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摘自 5 月 7 日汶川县政府办公室汶府办发[2008]48 号文件《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08 年地质灾害的紧急通知》）

4 月 18 日，甘肃陇南文县地震局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短临预测，运用 SE 电场分析法，预测在 4 月 18 日至 5 月 20 日，在东经 101 度，北纬 35.7 度发生黎克特制 6.8 至 7.2 级地震。

4 月 23 日，中国国家地震局在杭州举行针对地震预报员的震情信息保密班。摘录内容如下：震情保密事关政治

社会影响，责任重大，鉴于当前复杂严峻的震情形势，为切实作好震情信息保密工作，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于 4 月 23 日——26 日在杭州组织举办了震情信息保密知识培训班，地震系统各单位地震分析预报部门主任共 40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4 月 26 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举行会议预测震情。

4 月 30 日，地震专家耿庆国、陈一文等，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密件，指阿坝地区未来半年会有 7 级以上地震，危险时间在 5 月 8 日为中心，误差前后十天。由于部分文件陈一文、耿庆国已经掌握，相信他们根据国家地震局震情数据作出。最早提出旱震关系的地震专家耿庆国曾多次上书中国国家地震局，预报四川将有大地震，但不获理会。耿庆国的预报资料指，他早在 2006 年 11 月便上书地震局局长陈健民，根据汶川县附近马尔康 2002 年发生大旱，发出 7.3 级地震预报。他在今年 1 月，上书总理温家宝，预报四川有 7.7 级地震。有关预报经地震局预报员签收。

5 月 3 日，阿坝藏族自治州防震减灾部门，收到大量查询电话，主要与马尔康县传达全省地质灾害电视会议内容给公众时，梭磨乡马塘村村干部指地震将临，要求民众搬出屋外住。

5 月 7 日，汶川县政府办公室发出汶府办发[2008]48 号文件，标题为：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08 年地质灾害的紧急通知。要求加强人员值班，留意异常情况。该通知表示，县内曾在 3 月 22 日、30 日和 4 月 8 日，有最少 3 次不寻常滑坡，造成 7 人死亡。

5 月 9 日，四川省地震局就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的“查询”辟谣。省地震局在“四川防震减灾信息网”上登载了一条信息：《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信息说，5 月 3 日晚 8 时，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的传言是否属实。阿坝州防震减灾局经过调查了解，认为此传言属于误传，并及时给予平息。

5 月 10 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四川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数十万蟾蜍走上马路。绵竹离汶川只有几十公里。绵竹在此次地震中心范围之内。村民表示担扰：“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但绵竹市林业局接报赶到现场后却解释说，这是因为蟾蜍繁殖季节，爆发大量幼蟾上岸迁移，与天灾无关，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专家称这是正常现象，证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5 月 12 日，北京时间 14 时 28 分，汶川大地震。

郭泉：民主先声 227：狱中札记之一：“你是我永远的情人”（暨缅怀“六四”）

5 月 18 日至 28 日，我因为针对中共当局未依法作出地震预报、中小学豆腐渣教学楼、可能的核泄露等问题，召集有关专家撰写文章，而获“无罪入狱”10 天。

10 天里，每日上午、下午都要接受中共官员的临讯。每次“号房”的铁门响起开锁的声音，号房的狱友都笑称：“来喊你上班了。”有一次下午，中共官员审讯我到 5 点半，而号房里的开饭时间是 5 点，我以为一个晚上要饿肚子，没想到我一进“号房”，狱友们一声“下班啦”，端出给我留的饭菜，这让我感到很温馨。

我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我的“号服”上的编号是 70105。我的“号房”是 7 区 2 号。

同号房的还有 4 位狱友。他们都是普通刑事犯罪的已决犯。所谓已决犯，就是已经被判刑的犯罪分子。一般而言，已决犯都必须送交劳改监狱执行，但是刑期太短的或有其他不适宜送交劳改监狱执行的，可留所劳动。

他们中 3 人每日也上下班，有时还上晚班，他们在做“二极管”和电脑线什么的，我想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劳改产品”。 但是，具体是什么产品，我没问。

“别打听别人的任何事情，别碰别人的任何东西”，这是牢房的一条很重要的不成文的规定。

晚上 6 点以后是娱乐时间，他们四人喜欢打牌，我喜欢打坐。

他们无论开心还是难过都会大声地唱歌，而且只唱一首歌——刀郎的《情人》。

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毕竟我只要坐 10 天的牢，而他们已经坐了一百天或几百天，有一个叫老韩的狱友和我挺谈得来，还要再坐好几年呢。

刀郎的《情人》，我也会唱，但是从来没有象这样在 10 天内连续听过好几十次，于是我开始研究起这个歌词来了。

这首歌的主词是：情人、消魂、伤痕、温存。

全歌四段如下：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消魂。

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

我梦中的情人，忘不了甜蜜的香吻，每一个动情的眼神，就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消魂。

有一天，他们四人都不在。上午九点，到了放风时间，而临讯我的中共官员还没有来喊我“上班”。我一人到天井里晒太阳。天井的高墙上用一个大铁笼子覆盖着。阳光很眩目，我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情人》。我还没唱到第二段，左右隔壁牢房都传出了合唱。

我突然感到，这个“情人”不应该只是女人。对一般的饮食男女来说，情人只是另外的饮食男女而已。而对我来说，这个情人却是一种盼望、一种期待、一种引力，是一种“未来时”。

这样的思维，一下子让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很久很久以前就非常迷恋矗立在美国海岸的“自由女神”像。原来，自由，是我的女神，而民主，是我的情人。

前天，讴歌“六四”的黄伟先生（见民主先声 224）告诉我他还没结婚，这让我大吃一惊。他写过摇滚《黄土下的歌声》，并于 2007 年 6 月 4 日清晨 5 点 30 分首唱于温州松台广场。最后一段歌词为：“今年今天，小城广场。淡淡的清香，飘散祭者的羞愧。郁郁的琴声，嘲笑苟活者的尊严。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GOODBAY TAKE CARE。最后的晚宴即将落幕!”

我今年 41 岁，他 45 岁。当时我没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后来，他说，自由是他的情人。

昨天（6 月 2 日）晚上，妙觉慈智法师（见民主先声 190、211）写了一首纪念“六四”的诗发给我，题目是《以伟大佛陀慈悲智慧的名义》，第一段是：“以伟大佛陀慈悲智慧的名义/ 以无比高贵的生命的名义/以人类终极价值自由的名义/以鲜红的忠诚和赤子的鲜红的血的名义/八九六四/让这一天成为永恒。”

妙觉慈智法师在 1989 年和我一样都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她因去北京声援而被校方开除。

黄伟先生讴歌“六四”、高举“人权”，妙觉慈智法师热心维权、济世博爱，皆为心中有此“自由女神”、“民主情人”。

1989 年，我在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现名南京科技学院）的文法系中英文秘书专业上大学二年级。5 月 28 日，我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济南站，我认识了一个山东大学的女学生。她是青岛人。第二天，我们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一路上，我们聊的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她叫陈青。她说她的小名不叫青青，叫陈陈。我问，为什么不叫“青青”呢？她不好意思地说，那是给“未来的先生”叫的。我说，哦，那正好，我的同学都叫我“蝈蝈”。

5 月 29 日、30 日两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都没找到我们学校的旗子。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听说我们学校的旗子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两天我一直和陈陈在她们学校的旗子下。

6 月 1 日，我决定回南京带旗子和同学来北京。和陈陈分手时，她给了我她家的电话，要我暑假里到她家玩。她家在海边，有吃不完的海鲜。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北京就出事了。

6 月 3 日晚，对大学生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理由，镇压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美好的心灵和年轻的身体。

之后，我给她家里打了无数的电话，都说“没消息”。直到 7 月 27 日，我才知道陈陈在北京胸部中弹牺牲。他家里人很悲伤，也不敢说什么，只说，“你以后不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陈陈的同学说她被枪打死了，胸口被枪打了一个大窟窿。”

我不知道陈陈的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是否作为暴乱分子的骨灰“弃灰”，是否通知家属领取骨灰等等，对此我一无所知。

1989 年 8 月份，我想去青岛安慰陈陈的父母，却再也打不通电话了。

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很多年来，我都在进行痛苦的“六四”反思。

1989 年，中国所有的大学生都激烈地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中共结束独裁，实现民主。百万大学生在全国各城市的主要街道开始了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

我们在街头向每一个过路的市民介绍民主思想，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支持我们。

但是，当时的工人、农民很奇怪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南京的鼓楼广场上游行的时候，一些工人说：“小祖宗哎，你们让些路给我们吧，我们要去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

全国各地的农民也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娃娃们在折腾个啥。

1993 年，我到南京大学读社会学（法学）研究生，一些苦难的工农到南京大学找到我，请我帮他们维权，我没好气的说：“我不干！当我们在街头最需要你们工农帮助的时候，你们却在奚落我们。现在你们知道我们当时在做

什么了吧！你们现在活该！”

1996 年，又有退役军人、军转干部来找我维权，我更愤怒了，说：“你们枪杀我的兄弟姐妹，你们是杀人犯，去死吧你们！”

但是，2002 年 6 月 4 日晚，我梦见了陈陈，她对我说：“蝈蝈！你傻呀，你应该帮他们，我们死这么多人，不就是为了让人民得幸福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六四学生变成了一个维权民运人士了。之后我做的维权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008 年 3 月 6 日，香港《太平洋》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欧阳劲先生来南京问起我对“六四”的看法，我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我对“六四”的反思。

我说：“我是 89 六四学生，当时我在街头游行的时候，有工人抱怨说，你们游行挡住了我们上班的路，我们就没有工资没有奖金了。其他同学听到这样的话，就抱怨人民群众不觉悟，但是我心中一懔，这说明我们超前了，人民没有跟上，或者说，人民还没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却有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大学生怎么能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呢？所以，最后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借口镇压了 89 民运。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人民的苦难指数已经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一次性买断工龄、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问题，高物价低收入问题等等，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人民现在已经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相反，大学生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了。现在，我们接受 1989 年脱离人民群众的教训，我们的民主思想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只有当民主思想和人民需求完全吻合的时候，人民才是真正推动民主革命的强大力量。”

今晚，让我们点燃蜡烛，缅怀六四先烈。

你们的死不会白死，我们的牢也不会白坐！

惟有民主，才能抚平中华大地的伤痕。惟有民主，才能让中国人民感受到无边的温存。

民主，你是我永远的情人。

最后，我引用妙觉慈智法师的诗歌的最后一段，结束我这次最痛苦的写作。

“八九六四
这一天是如此的无以伦比的完美高贵
有什么比赤子的血使这个日子
成为不朽和永恒。”

郭泉：民主先声 228：中国新民党称赞中共当局采纳本党关于灾区建筑的建议

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在野党，中国新民党各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四川龙门山断裂带发生 8 级地震后，召开多次专家会议，向中共政府公开发出了 7 份建议。

中国新民党各专业委员会的这些建议一一得到中共政府的积极落实。

昨天（6 月 4 日），中共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

草案重点作了以下规定：对过渡性安置的方式方法、安置地点选址、配套设施建设以及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使用等，条例要求安置资金、物资和临时住所的分配使用公开透明。条例还对地震灾害调查评估、损毁的重要公共设施的工程质量鉴定以及地震资料收集、保存、建档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实施恢复重建的责任主体和相关环节等，条例也有明确规定，要求灾后恢复重建优先安排交通、通信、电力、供水、住房、学校、医院等。

6 月 4 日中共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学校、医院等公用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特殊要求。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

一、对建筑损毁情况的调查取证；

二、对灾后重建的学校、医院等公用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特殊要求。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对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的 516 决议的积极回应。

5 月 16 日晚 20 时至 22 时，中国新民党建筑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建筑质量问题展开讨论，敦促中共政府提升学校、医院的建筑等级，决议如下：

第一、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应确定为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 所规定的甲类建筑。即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其值应按批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措施，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6-8 度时，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当为 9 度时，应符合比 9 度抗震设防更高的要求。

第二、近期（奥运之前）应对全国所有中小学的老旧砖（石）混结构房屋进行全面的抗震加固。建议采用钢筋

锁固山墙，增强抗震能力。

第三、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的旧有砖（石）混结构房屋必须在 2 年内拆除。新建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严禁使用钢筋混凝土空心预制板，必须为全框架结构建筑。

2004 年组建的“中国民生党”自 2007 年 12 月 17 日更名为“中国新民党”（ China New Democracy Party）以来，已形成了以哲学、法学、行政、各门类自然科学专业知识分子为核心层，广大维权工人、农民、商人、学生、退役军人、城市市民等为基本力量的在野党。

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民主党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党。中国新民党反对专制独裁，认为只有走人民自由组党、多党民主竞选的道路，中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新民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Skype：gwnguoquan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29：余秋雨先生的专制：灾民为孩子鸣冤是被“反华势力”利用？

2000 年，余秋雨先生曾说：在今年（2000 年）完成《自传》后，将比较彻底地告别文坛。但是，近几年，我又发现余秋雨先生频繁出现在政治、文化的边缘，发出了一些“不和谐音”。不过，说余秋雨先生“不和谐”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他和中共是很和谐的，只是时常与人民不和谐而已。

显然，余秋雨先生与人民和谐不和谐，似乎他不很在意，他在意的是如何与中共保持和谐。

严格来说，余秋雨先生和我都是文艺学专业的。文艺学在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在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服务的问题上，显然，余秋雨先生和我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对余秋雨先生的学问，我没有象我的同事那样去指出余先生的诸多“硬伤”，例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苏东坡最后一个官职是“舒州团练副使”，其实应该是“朝奉郎”。 余秋雨先生说雨果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那会儿，雨果还没生呢！余秋雨先生说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而事实上“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余秋雨把他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却是唐代的道士。余秋雨先生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的，其实，当时范仲淹正在邓州任知州，写作地点应在邓州。余秋雨先生说金圣叹为大明灭亡而痛哭被杀，其实，金圣叹是因哭庙案受累被斩，时离明亡已经 17 年矣。余秋雨先生还说娥皇、女英是舜的女儿，其实，此二女不是舜的女儿的而是舜的后妃。

我之所以没有参与指出余秋雨先生学术上的硬伤，是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准确记忆所有的文化信息。我从来不指出任何学者的学术错误，但是我却很愿意指出学者政治上的错误或政治家学术上的错误。例如我曾经指出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上的学术错误。（见《民主先声》186、191、207）

最早让我对余秋雨先生不再景仰的是他对汉族的本民族服装的鄙夷态度。

我是汉族人，经常应邀去全国各民族大学做中国传统文化报告，看到各民族学生都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来听课，这让我和其他汉族同学深深感到一个汉族的民族外在特征（汉服）失落后的尴尬。

于是，从 2005 年底，我开始亲手缝制我们汉族（华夏族）的本民族服装，在传统节日全家穿着汉服逛南京夫子庙、扫叶楼。

汉族的本民族服装经历过很多朝代的发展，在清军入关后，被“马褂旗袍”消灭。

我研究了从夏朝到明朝的汉服的流变，提炼出“交领”、“右衽”、“衣缘”、“带结”、“曲直”等主要汉服元素，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做了一些改进。

于是，我从 06 年初开始，扛着数十公斤的近百套男女汉服，在全国数十所高校免费举办中国华夏（汉）族传统服饰文化讲座。

我在各大学说到我们华夏族的族名涵义时，在座同学无不动容，皆哀叹华夏民族已沦落到不知道本民族服装的数典忘祖的田地。

“《左传注疏》卷五十六，定公十年，杜预、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不料，日后，余秋雨先生却发表文章奚落、进而诅咒汉服为“恐怖主义”，称我到各大学介绍汉服文化为“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

余秋雨先生说：“一切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的本质，是用专制主义剥夺广大民众的生态自由。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说实话，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我认为很不妥，但是面对余秋雨先生的“污蔑汉服的言论”，我不得不引用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全世界只有汉族没有本民族服装，而我自己穿出我们华夏（汉）族的本民族服装（汉服)，却成了专制？

首先，我要问的是，余秋雨先生，您懂不懂什么叫专制？第二，您懂不懂什么叫自由？

余秋雨先生，您是什么民族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告诉您，您有不穿您的本民族的服装的自由，我也有穿我的本民族服装的自由，这就叫自由，反之，就叫专制。

我没有反对您不穿您的本民族服装，您为什么要反对我穿本民族的服装呢？到底是谁在专制？

很高兴余秋雨先生终于知道了“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了，那么，我再问您，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有选择文化和思想的自由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规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不是专制？

余秋雨先生不去反对思想、政治的专制，却来反对汉族人穿自己的本民族服装，这是什么道理呢？

今天（6 月 7 日），我看到了余秋雨先生的一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文章，我似乎明白了余秋雨先生的文艺学到底是为什么政治服务的了。

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说：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

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余秋雨先生在文中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他的意思是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明白，即学生在 8 级的地震中被教学楼砸死，在理论上是应该的。

他还说：“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

我想余秋雨先生一定不知道这些学生家长为什么要起诉建设部门和教育部门吧。我告诉您，这是因为这些小学和中学周围的大部分建筑时间更早的居民楼都没有倒，而新建的学校却倒了。

余秋雨先生还告诫死难学生的家长们：“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原来，这个更危急的事就是他下文中的“堰塞湖的问题”。他说，由于堰塞湖和卫生防疫等问题急不可待，所以“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

余秋雨先生可能不知道，处理法律事务的人是检察官和法官，而不是在堰塞湖堤坝的“武警水电部队”和灾区的卫生防疫人员。“武警水电部队”处理堰塞湖问题、卫生防疫人员处理“大灾之后防大疫”问题。而检察官和法官的职责是惩治腐败、打击犯罪等。

最后，余秋雨先生写道：“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就太搞笑了，余秋雨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谴责或追求中共政府的错，那么，不是“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就是“被反华势力利用”。

余秋雨先生，如果您的孙子没有在垮塌的豆腐渣教学楼中罹难，那么请您对灾区那些天天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在瓦砾堆前徘徊、悲愤的学生家长善良些吧。他们一生都没有出过国，他们根本不知道“反华”和“反共”的区别，他们要反对的，只是那些用铁丝替代钢筋的黑心建筑商。

余秋雨先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举国哀悼日为地震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我的那三分钟，是在监狱里默哀的。我为了帮四川地震灾民说话，谴责中共当局在有大量前兆资料的情况下没有依法作出预报，而被中共当局决定入狱 10 天。

无论您有没有为地震死难者，特别是死难孩子默哀过三分钟，我建议，因为你的这篇文章，您要默哀一辈子。

郭泉：民主先声 230：温家宝先生，接下来的中国金融地震，中国能挺得住吗？

2008 年 3 月 18 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10 时 15 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12 点 11 分，温家宝先生在回答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的提问的时候，说：“最近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造成美元贬值，几次降息，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每桶 110 美元，这对世界的股市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出现了震荡。我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十分关注，而且深感忧虑。”

根据我对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所谓的次级贷款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温家宝先生对美国经济“深感忧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温家宝先生要“深感忧虑”的是中国经济。

2005 年 6 月美国银行投入 30 亿美元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现在这些股权按市场价格计算已经上升到 190 亿美元，从账面价值来看，增加了 160 亿美元；另外按照当初的协议，美国银行还可以选择将在建行持有的 8.5%的股权上升为 19.9%，这个选择若兑现可折合约 160 亿美元。两者相加，美国银行在建设银行的潜在获利共约为 320 亿美元。

这些数据与 2005 年的 30 亿美元相比，已足足超过 10 倍。这也足以弥补美国银行在次级贷中的损失。

次贷危机（次级按揭贷款）给美国金融行业带来的损失为 400 亿美元以上。美国银行在次贷市场的损失将近 40 亿美元。虽然次贷风波对美国银行业影响很大，但美国银行在中国的投资获利却足以弥补这一损失。

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称，美国银行从建设银行的投资中潜在获利约 320 亿美元，足以抵消其因美国次贷造成的近 40 亿美元损失。

次级贷款是指那些放贷给信用品质较差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的贷款。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根据信

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贷款，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两个层次的市场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高 2%～3%。

由于信用不良或不足，次级贷款的借款人往往没有资格获得要求借款人有优良信用记录的优惠贷款。放贷机构之所以愿意为这些人发放贷款，是因为次贷利率通常远高于优惠贷款利率，回报较高。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

次级抵押贷款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由于它给那些受到歧视或者不符合抵押贷款市场标准的借款者提供按揭服务，所以在少数族裔高度集中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很受欢迎。

次级贷款对放贷机构来说是一项高回报业务，但由于次级贷款对借款人的信用要求较优惠级贷款低，借款者信用记录较差，因此次级贷款机构面临的风险也天然地更大。

的确，美国最近两年是出现了次贷问题，但是，美国的次贷是国内问题，其实中国的次贷问题却更严重，而美国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中国找谁补呢？只有中国人民来痛苦地承担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是怎么从中国获得补偿的。

2005 年建行 5 月 27 日发布公告，美洲银行将行使认购期权，在 6 月 5 日前向中央汇金公司购入 60 亿股 H 股，交易价格是 2.42 港币，而建行 H 股当日收盘价为 6.65 港币，折价率高达 63.60％。

按照建行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协议，第一个入股的美国银行除了直接以 1.15 元购股以外，还被授予一大笔认股期权。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期权购入的股本数目总数应该为 52.70714 亿股。根据期权的价值规律，这份长达 5 年的期权协议有可能为美国银行提供难以预测的获利机会。

2005 年 6 月 17 日，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订立投资协议及战略性协助协议，获 9%股权；同年 8 月 29 日，作为建行大股东的汇金公司又与美洲银行订立股份及期权收购协议，再获最高 19.9％股权。美银持有建行 191.33 亿股的成本不超过 240 亿港元，以目前 6.7 港元的价值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为 1282 亿元，在股权投资上美银目前账面赢利为 1042 亿元。如果美银增持至 19.9％，理论上可以增持的股份达到 273.71 亿股，若以 2.52 港元的行权价计算，按照公告当日收盘价计算，这部分的账面赢利可以达到 1100 亿元以上。美洲银行还可以通过抛售过解禁期的旧股低价吸股，进行无风险套利。

汇丰银行 2001 年以每股 2. 49 元人民币入股上海银行，获得每年每股 0. 5 元左右的回报，五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上海银行 8%的股份。后，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价格为每股 1.86 元，美洲银行入股建行的价格是每股 1.17 元，苏格兰银行入股中国银行价格为每股 1.22 元，工商银行的定价只有 1.15 元。外资银行购买的中国国有银行的每股价格越来越低。

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的每股价格之所以这么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各大银行在接受外资机构购买国有银行的股权之前，已经经过几次不良资产剥离和注资，中国的国有银行甩掉了包袱，轻装上阵，这是外资机构热衷参股国有银行的一个重要背景。

国内银行剥离数万亿不良资产，背后是全社会付出了代价。核销坏账之后的国有银行得以轻装上阵，未来的利润有了保证。外资其实完全是坐享其成。

例如，某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外方股东根据协议对管理公司股份要增持到 49%。不到 5 千万元的一次性投资，未来每年可以持续地从中国拿走 6 亿元的财富，相当于 20. 44 万中国农民为外来资本所在国每年生产的 3. 07 亿吨粮食。如果中国设立 20 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未来每年汇出境外的财富将达到 120 亿元人民币！”

再如，汇丰银行以每股 1.86 元入股交通银行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 19 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 46 亿元的金凤凰了呢？事实上，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以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当然，这些好的财务表现的一部分，很轻松地奉献给了海外银行。

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根本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

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据一项市场统计，仅 2006 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 7500 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超过 1 万亿。不过，这样的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那么，海外银行真的向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投资了吗？

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中国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投资，真实的游戏过程是：外资投入于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美元或其它外币，而这些仅仅是代表财富的符号，外资并没有动用实际的物质资源。商业银行的外币资本金并不能用来放贷款，只能用于境外国债投资等，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很低的利息回报。例如，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别以 3500 万美元投资中国平安保险 11 年共获得了 9.7 亿美元的回报，但中国取得的 3500 万美元资本金买成美国国债，11 年只能取得大约 1500 万美元的收益。

业内人士称，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之后回到了美国，同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

世界银行的一期《中国经济季报》认为：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损失。该报告毫不客气地说，原始股投资者是受益者，但大多数原始股都被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大投资者持有，此外，上市公司管理层也从中获益。

撇开金融股上市定价高低不说，在“配售到原始股的”机构投资者之前进入这些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世行报告指出，中国银行(4.76,0.03,0.63%)股被贱卖。

国内金融业在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这将会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

日前，余云辉等学者在《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一文中发出警告，将外资可以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为八步：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外资再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再将外汇回流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

事实上，就目前来看，人民币大幅升值、通胀压力下，外资进入金融业带来危机的某些征兆已经显露。这实际上是一场“金融地震”。我的地震预报是 3 年内发生。

郭泉：民主先声 231：狱中札记之二：保卫钓鱼岛、怒砸王直墓和我的格瓦纳

2008 年 5 月 17 日下午 6 时，我因为帮四川地震灾民说话，组织各方面专家召开专业委员会谴责中共当局在有大量前兆资料的情况下没有依法作出预报以及向中共发出其他各专业的多份公开信而被传唤 24 小时。

5 月 18 日下午 6 时，我被中共当局押送南京市看守所。5 月 18 日至 28 日，入狱 10 天。

南京市看守所坐落在南京江东门，看守所的正门朝南，对面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的号房的门朝北。5 月 19 日早上，我透过牢房的铁门上的只有巴掌大的观察孔，看到一个巨大的橙色的建筑。开始我还没有想起来这是什么建筑，只觉得面熟。后来，看守所的王所长找我谈话，在回牢房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应该是欧尚国际超市。于是我立即问王所，他说是的。这让我很兴奋。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些难忘的事情，都记得一些难忘的地点。当然，这些地点和时间，都与一些特别的人物相联。如果，很多的地点都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就是你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人了。

“可爱的小撒旦”就是我生命中这样的一个人。“可爱的小撒旦”参与过我的很多“反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活动，家住在欧尚国际超市附近。

我和“可爱的小撒旦”在网络上认识是在 2002 年夏天，当时，我在南师大的一个讨论版上担任副“斑竹”，我的网名叫“南京的基督”。其实，《南京的基督》是梁家辉先生出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根据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

介同名小说改编的。

“可爱的小撒旦”2002 年只有 18 岁，还在上高二，为了准备一年后的高考报名而来南师大讨论版看看这个学校的情况。我在网络上详细介绍了南师大的情况，由于我们俩的名字的针锋相对性，而且也很谈得来，后来就认了兄弟。第二年，“可爱的小撒旦”没有考来南师大，而是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可爱的小撒旦”高三和大一期间，我们经常在网上聊天，谈了很多事情，都很有共鸣。

2003 年底，我真的很想见见这个小弟弟，于是，我们在网上约好了在我办公室见面。结果，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小姑娘。原来，一直做我弟弟的网友竟然是个女孩子，这让我又惊奇又尴尬。惊奇的是，原来网络真的不能信任，尴尬的是，我不记得我是否和“他”讨论过什么男性话题。

在思考之后，我决定让她做我妹妹。由于我们都是南京人，而且我在南京一直从事着民间“反日”的工作，从 2002 年到 2004 年间，我们在网络上谈论的最多的就是中日关系问题。于是，见面之后，她参与了我很多次重要的“反日”活动。例如，我在南京街头向市民发放“保卫钓鱼岛”的传单，她一次又一次地见证着我被警察带走的激烈场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 2005 年 1 月 31 日 7 时与浙江丽水学院的郘伟民老师潜入安徽腹地，成功砸毁了位于安徽黄山市歙县的汉奸王直墓碑，而此时，她就在我南京的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消息。

王直是明朝的一个海盗，受明朝海军的打击后，出逃日本。以王直、徐海等为首的海盗集团，在日本纠集数十万倭寇，不仅对浙江、南直隶沿海疯狂侵犯，而且还对广东、福建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甚至内地肆意劫掠，整个东南沿海几乎处于一种无处无倭的状态。可以说，王直已成为嘉靖时期侵略中国的倭寇中坚。

史书记载，王直被擒后三司集议时所云：王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此人“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

王直在中国被明军所杀，却在日本被奉为海神。2000 年，日本福江市（古日本之萨摩洲之松津浦）派人到王直的家乡（安徽黄山市歙县楚雄乡柘林村）联系，在新安江边的农田里非法修建了王直墓并建立了日本修墓人的“芳名塔”。

2005 年 1 月 30 日，我与“可爱的小撒旦”联系，说我明天要去砸这个墓。家里保姆下午 6 点下班，而这时我妻子还没有到家，请她下午到我家，带孩子直到我妻子回家。我会在 31 日每一小时给她发一个信息，如果有两小时没有信息，请她在网上发布“郭泉被捕”的消息。她立即答应了。当年，我儿子 4 岁半。

1 月 31 日 7 时，我在砸毁王直墓碑后，立即给她信息，她回信：“放心了，你快回来。我回家了。注意安全。”

由于我从 2003 年开始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坚持免费为市民举办钓鱼岛的相关知识的讲座，且多次对她说，我最喜欢的人是切·格瓦纳（见《民主先声》74）。他有两句话我终身不忘，一是当他被捕时，面对枪口，他说：“我叫切·格瓦纳”。二是他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她在 2006 年 5 月 8 日那天送我两件 T 恤，一件 T 恤的胸口是巨大的切·格瓦纳头像，一件是胸口写着“捍卫国土钓鱼岛”、后背有个小小的切·格瓦纳头像的 T 恤。

入狱之后的第二天下午，狱卒来给我送家人送到狱中的衣服，是四套换洗衣服。我打开一看，顿时楞住了。其中一件，就是胸口写着“捍卫国土钓鱼岛”、后背有个小小的切·格瓦纳头像的那件 T 恤。

1945 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领土钓鱼岛一直在日本人手里。所以，作为一名南京人，我一直认为“中日战争”并没有结束。中国新民党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前提是“日本必须无条件归还钓鱼岛”。

我入狱的十天里，一直穿着这件 T 恤，晚上洗了，白天再穿。被中共官员提审的时候，外面套着编号为“70105”的橙色号服，贴身的是“钓鱼岛”和“切·格瓦纳”，这让我感到特别的鼓舞。

出狱的那天（5 月 28 日），我穿着这件 T 恤。

一个中共警察把我“送”到门口。他看到我的衣服上的“捍卫国土钓鱼岛”的字样，对我说：“钓鱼岛的事情说不清。”其实以前所有抓捕或传讯我的中共警察都持这个观点。

我立即义正辞严地说：“不对，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现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那个中共警察一脸的怏怏不快，但是在我脱口而说的法律条文面前，不作敢声了。我一直对中共警察的法律素质感到困惑，他们甚至连很多刑法和刑诉法条文都不熟悉，就更别提其他法律了。

今天（6 月 9 日），我在环球时报 • 环球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让我扼腕叹息。

日本 TBS 电视台 7 日报道称，中日两国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已经达成基本协议，两国将在跨越中间线的海域设定多个区域，进行共同开发。目前，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此消息进行证实。我真诚地希望这是日本在造谣。

但是，日本 TBS 电视台援引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称，在至今为止的协商中，日中两国搁置意见对立的分界线问题，一致同意在跨越中间线的海域，设定多个共同开发区域，开发的成本和权益都各半。

日中两国搁置意见对立的分界线问题，其实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臭名昭著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具体实践。这条“中间线”是日本人单方提出的，而钓鱼岛在这条所谓的“中间线”日本一侧，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因为，承认“中间线”就意味着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了。

如今，中共政府却与日本“一致同意在跨越中间线的海域，设定多个共同开发区域，开发的成本和权益都各半，”这不是卖国是卖什么？

我真希望，今天我看到的这条消息是日本在造谣。

如果这条消息不幸是事实的话，那么我想，这件事情对中国人现实的和未来的损害和影响将几百万倍地超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郭泉：民主先声 232：反对人民问责政府的执政党是反人民的党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以及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让中国人民弄明白的三个关系。

其实，政府就是人民为了生活的便利和秩序而根据行业门类而设立的服务机构，类似于家庭里的保姆。政府公务员的工资，与我们支付给家庭保姆的工资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家庭里，保姆必须认真完成主人交办的任务，才能顺利地领取主人支付的保姆工资；政府公务员，必须认真完成人民交办的任务，才能顺利地领取人民以财税方式支付的公务员工资。

普通的三口、四口之家只要一个保姆就够了，但是一个四世同堂、拥有几十口人的家庭，显然需要多位男仆女仆。这么多的男仆女仆必须有人进行分工协调。这个重要的进行分工协调的人，当然可以是主人。但是无论哪位主人都不会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上的。于是，管家这个职业出现了。管家，就是管理家中所有仆人的仆人。仆人的工作就为主人服务，而管家的工作就是带领众多仆人为主人服务。

人民在多党竞选中投票选择执政党，其实就是投票选择一个大管家来管理政府，使得政府能更高效地为人民服务。

所以，执政党，其实就是类似管家的高级仆人而已。

这个高级仆人在竞选的时候，必须展现才华，让人民对其有信心。在竞选成功后，必须兢兢业业、认真兑现和履行竞选时对人的承诺。

如果，这个高级仆人在服务期间没有带领低级仆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作为主人，当然应该问责。其实，政府发生什么问题后，人民在第一时间“问责”已经是给足了执政党面子了，要是不给面子的话，那么就“先弹劾，再问责”。

以上才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以及政府与执政党的真正关系。中国共产党非常恐惧中国人民了解这三者的真实关系，于是，中共妄图用“三个代表”掩盖中共的高级仆人的身份，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仆人，再高级，也是高级仆人。

于是，这次四川龙门山断裂带地震过后，人民开始向政府问责了。

人民向政府问责，其实就完全类似于我们数落家里办错事的保姆。

办错事的保姆，经主人批评教育后，知错改正、态度诚恳，主人是会原谅保姆的。如果，保姆做错了事情，而在主人问责保姆之时，保姆立即跳将起来，把主人关进了厕所。这个保姆不是反主人，是什么呢？

最近，我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都因为帮四川地震灾民说话，向国家地震局、教育部、建设部、安全质量检验局等多部门问责，而被传唤或入狱。因此，我 5 月 18 日至 28 日，入狱 10 天。

今天（6 月 11 日），我听说又有三位长沙朋友因为问责政府而被中共警察抓捕。情况很简单，李卓熹等三位朋友，欲做 100 件文化衫，在上面印上一些问责政府在这次四川汶川地震中救灾的责任和存在的问题的话语，分发给所有自愿获得的朋友，结果失去人身自由。

人民问责政府，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力，但是，中共把所有依法问责的民主人士任意搜捕，这不是反人民是反什么呢？

中国必须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民主竞选”的政治体制，人民才能够成为主人。否则，中国人民永远是独裁者跨下的玩物。

郭泉：民主先声 233：民主远吗？爱情近吗？和校内的朋友谈追求爱情与民主的相似性

民主远吗？爱情近吗？

——和校内的朋友谈追求爱情与民主的相似性

这两天，我在校内网（http://xiaonei.com/gwnguoquan）的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的民主事业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甚至有些校内朋友失望地准备打起了退堂鼓……

对这些校内朋友的焦躁心理，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从校内出来的，也一样焦躁过、苦闷过、失望过……但是，等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我也就明白了对民主的追求，其实和对爱情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

谈到爱情，校内的朋友一定很熟悉了。

我们在恋爱的时候，谁能确定我们未来就一定能成功呢？

我们爱一个人，要在有成功的前提下才去爱吗？

如果我们的爱，是建立在已知成功的前提下的爱，那么，这样的爱，有什么意义或乐趣呢？

结果，当然是我们追求的，但是，一切快乐在于朝向结果的追求。

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说，来吧，追我吧，我保证你追上。请问，这还有什么乐趣呢？

爱在刀锋边缘，爱在两难抉择之中的人，才能获得爱的乐趣。

至于爱的结果，上帝会安排的。

其实，爱情和民主相比，爱情比民主的确定性要小很多。

而民主，则是国之未来，势之必期。

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民主是全民的大事。

天道酬勤，这让我快乐；即使不酬，我也快乐。

因为，我爱过了，这才是我最美丽的回忆。而回忆，是可以随着灵魂带到天堂的。

《论语·述而》 子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对民主和爱情的追求，皆是如此。

与校内的朋友共勉。

郭泉 2008 年 6 月 14 日，写于校内

中国新民党 代主席　　郭泉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郭泉的个人主页：http://xiaonei.com/gwnguoquan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234：支持马英九保卫钓鱼岛，谴责中共当局“搁置主权”的政策

今天下午（6 月 15 日），香港、台湾和美国的保卫钓鱼岛的朋友，纷纷给我电话，说今天晚上十时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等 9 位保钓人士将驾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

我嘱咐他们千万小心，我将今晚不眠等待他们的好消息。他们的出发地点是台湾苏澳码头。此次出海船号是“全家福”海钓船。

最近，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

首先是 6 月 9 日，我在环球时报·环球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让我扼腕叹息。日本 TBS 电视台 7 日报道称，中日两国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已经达成基本协议，两国将在跨越中间线的海域设定多个区域，进行共同开发。日本

TBS 电视台援引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称，在至今为止的协商中，日中两国搁置意见对立的分界线问题，一致同意在跨越中间线的海域，设定多个共同开发区域，开发的成本和权益都各半。

目前，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此消息进行证实。我真诚地希望这是日本在造谣。因为，日中两国搁置意见对立的分界线问题，其实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臭名昭著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具体实践。这条“中间线”是日本人单方提出的，而钓鱼岛在这条所谓的“中间线”日本一侧，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因为，承认“中间线”就意味着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了。

第二天（6 月 10 日），台湾台北县瑞芳籍“联合号”海钓船 10 日凌晨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追逐时撞沉，船长何鸿义及两名船员则被日本押送那霸警署。

钓鱼岛，全称钓鱼台列屿，自古为中国与古琉球王国的分界线。其分界线的地理结构为一个深长、绵延数千公里的海沟，叫宫谷海沟。海沟的东侧是古琉球王国，海沟的西侧是中国的钓鱼台列屿。钓鱼台列屿及其所属海域，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出海口，也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储藏区。二十一世纪谁拥有这个石油储藏区，谁就执世界之牛耳。万幸的是，这一巨大的石油储藏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中国的现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中共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对日本采用了“主权搁置、共同开发”的政策。对钓鱼岛主权的搁置，就是对历史事实、中国法律和中国人民捍卫领土领海的坚强意志的践踏。

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政府采取了绥靖政策。

“搁置钓鱼台主权”的政策的始作俑者是邓小平先生，这一政策是极端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这一绥靖政策，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事实上，邓先生的这一错误政策出台之后，钓鱼岛就完全被日本实际控制了。

我的同行、朋友冯锦华先生、王喜强先生、殷敏鸿等七名保钓勇士在2004年3月24日早上五时经历生死考验，成功登上了钓鱼岛。但是，就在登上钓鱼岛数小时后，就被日本政府逮捕并移交日本的那霸警署审查。这就是钓鱼岛被日本霸占的明证。

从2004年9月18日开始，每月逢18日，我在南师大免费开设面向全南京市民的钓鱼岛知识系列讲座，场场都有300余名市民、学生到场研讨。不幸的是，在2005年3月，这一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免费的爱国教育被中国警方以及南师大校方以“破坏中日友好关系且不合时宜”的理由取缔了，实为憾事。

邓小平先生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未经中国人民的同意，且违反国家海洋法明文规定钓鱼台列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法律条文，所以应坚决废止“搁置”政策。

我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邓小平先生的“搁置主权”政策应修正为“捍卫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钓鱼台列屿及其海域的巨大能源及海洋交通价值，将是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在。中国丢失此岛，将使中国在21世纪的一切复兴希望破灭。

以上内容参见本人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民主先声81：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很高兴，这次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在钓鱼岛海域追逐并撞沉台湾台北县瑞芳籍“联合号”海钓船后，短短数小时，“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立即发表声明，开宗明义就直言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地理上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其次马英九阐明维护主权的决心从未、也绝不改变，显示他早年是保钓运动的成员，现在不会因为身为“总统”而有调整，未来也不会。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刘照玄在立法院中答履立委质询是否准备对日开战时，表示战争是两国争议最后阶段的手段，刘兆玄表示为了维护主权不排除对日本开战。

国民党中多数立法委员主张强硬对付日本，除了有立委为国防部出谋献策表示应派空军炸射钓鱼岛外，他们也要求国防部长派出军舰前往钓鱼台宣示主权。对于台湾若因此与日本发生冲突，这些国民党立委也表示并不担心。长期担任立法院国防委会员成员的国民党立委林郁芳说，如果发生对峙，台方的后勤补给方便很多，若是要进行持久战，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可以休会，上舰与官兵进行长期抗争。

在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下，“国防部”14 日同意派出海军最大、战力最强的基德舰，于 18 日搭载 “立委”巡

视钓鱼岛宣示“主权”。

中国新民党在钓鱼岛问题上反对中共当局的“主权搁置、共同开发”的绥靖政策，坚决支持马英九先生捍卫祖国领土钓鱼岛主权的一切政治、军事行动。

郭泉：民主先声 235：强烈抗议人民网与日本一起把钓鱼岛海域称为“日本领海”

今天（6 月 16 日）一早，海外的保钓朋友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清晨 4 时 55 分台湾的保钓人士驾驶的“全家福 6 号”保钓抗议船到达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往钓鱼岛靠岸时，遭遇日方舰艇不断以喷水、广播等方式阻挠。

“全家福 6 号”距离本岛约 0.3 海里处时，日本舰艇放下拦阻索，阻挠保钓船接近钓鱼岛本岛。

此次保钓行动总指挥黄锡麟先生作出返航决定。保钓船上午 6 时 23 分，绕行钓鱼岛一圈后返航。

我很奇怪为什么黄锡麟先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中国新民党海外党部得到的情报是，台当局“海巡署”派出四舰五艇全程护航，5 时 44 分，“海巡署”船舰到达距离钓鱼岛本岛 0.5 海里处待命。“海巡署”命令海巡护渔船舰的维安特勤队全程待命，若保钓人士下令泅泳登岛，维安特勤队将以两人一组护送的方式，在旁协助维护泅泳安全。

“海巡署” 协助维护泅泳安全的命令应该来自总统马英九先生，不知道黄锡麟先生是否获得这一重要的情报。

我立即电话询问了拦截我们保钓船的日本舰艇的编号，朋友们告诉我是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 PS-11 和 PS-204。我当即表示，这些入侵中国领海并拦截中国船只的日本舰艇将来一定要被中国海军击沉。

下午，老友王喜强先生与我联系，说中国红网把钓鱼岛称为日本领海，很是气愤。王喜强先生是 2004 年 3 月 24 日成功登上了钓鱼岛的中国七勇士之一，网名叫黑皮，是我的驴友，擅长海岛攀岩。

他提供给我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我立即登陆（中国红网 http://china.rednet.cn/c/2008/06/16/1530740.htm），果然， 今天下午 15 点 54 分 发表了一篇新闻，题目是《10 艘台湾船只驶入日本领海抗议撞船事故》。

全文如下：人民网东京 6 月 16 日电（记者于青）据共同社报道，16 日清晨 5 点 50 分左右，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位于那霸）的巡逻船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西南偏西方向约 22 公里的海域上确认有一艘名为“全家福 6 号”的台湾抗议船和 3 艘台湾巡逻船进入了日本领海。此外还另有 6 艘台湾巡逻船驶入日本领海，对此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出了警告。截至上午 8 点 44 分左右，10 艘台湾船只全部驶离了日本领海。

抗议船由沿岸警戒巡逻船陪同的情况十分少见，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对这起发生在台方主张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海域的撞船事故表示强烈抗议。

原来，中国红网的新闻是来自人民网的。而我到网上一查，真是气愤异常。人民网的这篇将中国领海钓鱼岛海域称为“日本领海”的文章，竟然被红网、网易、新浪等媒体广泛转载。

收集证据如下：

http://china.rednet.cn/c/2008/06/16/1530740.htm
http://news.163.com/08/0616/13/4EIJAKAC0001124J.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16/133015754136.shtml
http://www.jsw.com.cn/misc/2008-06/16/content_1641227.htm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7386934.html

（为防止以上网站修改或删除，我保留了网站截图，以备日后起诉这些无良网站或无良记者。需要这些网络截图的朋友，请 QQ 与我联系，我发压缩包给大家）

6 月 17 日补充：昨天我的文章发出后，以上网站，都做了修改。去掉了“截至上午 8 点 44 分左右，10 艘台湾船只全部驶离了日本领海”的最后 5 个字，这样就成了“10 艘台湾船只全部驶离”。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腾讯新闻中心的“台海态势”里还是看到了《10 艘台湾船只驶入日本领海抗议撞船事故》的标题，不过，点击这个标题，却发现被腾讯修改为《10 艘台湾船抗议日方撞船事故 台湾巡逻船跟随》。

郭泉：民主先声 236：请在我死后把我眼睛挖出葬在东海边，我要看着钓鱼岛回归中国

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被日本侵略多年之后，昨天（6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我们愿意再次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同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也强调，“钓鱼岛是中华民国领土，是台湾属岛。”

类似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年，日本也听了很多年。但是日本不仅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灯塔、神社，还修建了直升机停机坪，甚至日本还在钓鱼岛上进行了户籍管理，有 100 多名日本人的户籍迁到了钓鱼岛上。

目前，日本在钓鱼岛海域的监控任务由海上保安厅第 10、11 管区兵力共同负责。

第 10 管区共下辖各型巡视船 27 艘、飞机 5 架，其中 3200 吨级巡视舰 2 艘、1000～2000 吨级巡视舰 3 艘；第 11 管区共下辖各型巡视船 20 艘、飞机 11 架，其中 3200 吨级巡视舰 1 艘、1000～2000 吨级巡视舰 5 艘。

平时，海上保安厅 1 至 2 艘巡视船每天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数次巡逻，并将钓鱼岛周围划分为三个巡逻区域，距钓鱼岛 12 海里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对进入该海域的大陆及台湾民间船只“不惜代价”地进行驱逐；12 海里～24 海里为“严格监控区”，对进入该海域的非日籍船只进行目标识别和喊话驱赶；对 24 海里以外试图接近钓鱼岛海域的船只，保安厅根据外国军舰、政府船舶、民间“保钓”船只、外国渔船以及“不明国籍船只”等类别，对不同性质目标采取尾随监视、警告、驱离等方式予以密切监控。

为提高海上保安厅的实战能力，从 1999 年开始，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定期以“钓鱼岛”为背景实施联合射击训练、情报交换训练和实兵演习。仅 2002 年，双方的各类联合训练就达到 30 余次，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为应对两岸“准军事力量”比如“保钓人士”武装登岛，日本还于 2002 年成立了一支特殊的“离岛防卫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在可能的危急状态下，配合海上保安厅，以小兵力夺控钓鱼岛，并将事态控制在较小范围内，防止武装冲突升级。

目前，该连队编制为 660 人，由两栖突击、特种空降、情报侦察等若干分队组成。为了便于岛屿机动作战，各分队除了装备标准轻、重武器外，还从美军购入了大量夜视仪以及两栖特种器材，并专门配备了直升机。

从 2004 年开始，“离岛特战部队”以钓鱼岛为背景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

2006 年 1 月 9 日至 29 日，“离岛特战部队”还首次前往美国与美海军陆战队举行联合“夺岛演习”，重点演练了包括两栖奇袭、跨海夺岛以及试探侦察在内的多个科目。

针对钓鱼岛局势，日本海空自卫队也做了充分准备。 平时，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报侦察任务就要由自卫队承担。海上自卫队第 1、5 航空群 P-3C 反潜巡逻机定期对钓鱼岛海域实施空中巡逻侦察。自卫队在宫古岛、久米岛设立的雷达站也负责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监视。2006 年，日本防卫厅拨款 25 亿日元，在距离钓鱼岛仅 180 公里的宫古岛增设一套电磁监听系统，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大陆及台湾舰艇、飞机之间的通讯信号、雷达频率等进行电磁监测，并对重要目标精确测向和定位，引导海上保安厅舰艇实施拦截。

另外，海上保安厅还能够得到日本情报机关的支持。据了解，通过日本在香港、台湾地区建立的情报网，海上保安厅经常提前获悉两岸渔船和保钓人士的行动海域、时间、路线等。此次（6 月 10 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凌晨 3 点复杂海况下对一艘仅 27 吨的渔船进行精确定位和驱赶，很有可能从台湾方面事先得到了相关情报。

针对台湾甚至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惜一战”的可能，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准备。2005 年，日本自卫队“西南岛屿防御计划”被媒体曝光。根据该计划，一旦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岛屿“有事”，日本将迅速启动三阶段作战方案，自卫队除出动战斗机和驱逐舰外，还将派遣多达 5.5 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参战。

可以说，日本已经为长期侵占钓鱼岛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

最近，中共政府和中共军方做的两件事情，让我觉得钓鱼岛回归祖国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

一是，今天（6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确定由以下各坐标点顺序连线围成的区域为双方共同开发区块： 1、北纬 29°31′，东经 125°53′30″；2、北纬 29°49′，东经 125°53′30″；3、北纬 30°04′，东经 126°03′45″；4、北纬 30°00′，东经 126°10′23″；5、北纬 30°00′，东经 126°20′00″；6、北纬 29°55′，东经 126°26′00″；7、北纬 29°31′，东经 126°26′00″。

这一区域完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上，完全是中国领海，竟然被中共政府认为是“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东海“未划界”的说法完全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中国的大陆架的底土和底土上的海面都是中国的，这毫无疑问。而日本却不问大陆架，蛮横地提出以中日两岸的中间线作为两国海域的划分，这根本就是置大陆架于不顾，这是中国人民不答应的，而中共政府却答应了，并认为东海是“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这不是卖国是什么呢？

二是，才得到一个情报，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邀请，日本国海上自卫队“漣”号驱逐舰将于 6 月 24 日至 28 日访问中国湛江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四护卫队群司令德丸伸一少将任指挥官，随访官兵 240 人。访华期间，中国海军官兵将与“漣”号驱逐舰官兵互相参观对方舰艇，开展专业交流和文体活动。日方舰艇将向湛江市民开放。

请问中共军方三个问题：

一、在 6 月 10 日，日本舰艇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将中国渔船撞沉，并把一名船长和两名船员押送日本那霸警察署，请问，这不是侵略是什么？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

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请问，钓鱼岛是不是中国的？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请问，抵抗入侵中国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舰艇是不是中国海军的神圣职责？

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钓鱼岛被日本侵略的情况下，不积极抵抗，这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吗？

钓鱼岛是中国的，但是在目前中共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下，我想钓鱼岛可能无法回归祖国了。

但是，我一定要亲眼看到钓鱼岛回归祖国。

如果我到死还没有看到，请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在我死后把我眼睛挖出葬在东海边，我要看着钓鱼岛回归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 237：中国新民党热烈祝贺中国民主党成立十周年

1998 年 6 月 25 日，民主人士王有才、王东海等先生在中国浙江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认为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公众，服务公众；政府只能根据公众的意志而产生，依照公众的意志来运作，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政府是公众的服务者，而不是公众的支配者。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中国民主党成立伊始，在王有才、王东海等先生的率领下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数月间，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得到相应并相继成立了各地的筹备组织。

但是，1998 年 11 月，中国民主党被中共政府镇压，多名组党人士被判处 10 年以上徒刑。王有才先生出狱后被迫流亡海外；王东海先生出狱后坚持在国内从事民主活动。另有秦永敏、吴义龙等组党人士目前尚在监狱服刑。

2006 年 5 月郑存柱在美国加州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美西支部，在洛杉矶地区宣传中国民主党的主张，并随时声援国内被迫害的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美西支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国内的民主事业。

2007 年 12 月 17 日，2004 年组建的“中国民生党”正式更名为“中国新民党”（ China New Democracy Party）。

坚持在国内工作的中国民主党人立即发来贺信，并派人与中国新民党联络，商讨合作事宜。

2008 年 4 月，中国新民党发出了一份有关台海两岸民主统一的谈判大纲，敦促中国尽快就台海两岸的民主统一案展开讨论。中国新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在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与台湾实现民主统一。

中国民主党大陆负责人王东海先生立即回应支持，王先生指出：中国新民党发表对两岸问题看法是一件好事，这样才能有不同的声音，才能实现两岸的和平谈判和互相交融、交流。

2008 年 5 月，中国民主党王东海先生与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在南京第一次会晤。两党领导人认为，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在要求民主宪政方面完全一致。两党应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达成共识如下：

两党均以增进全民自由幸福为己任，广纳社会精英、融汇人类文明精华，锐意使中华民族摆脱近百年来贫困、落后、愚昧、专制的状态。

两党所有工作目标的制定，首先应以是否增进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福祉为标准进行衡量，以确保两党政策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一道，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有序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提倡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民主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反对恐怖活动。共同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支持经济建设和代表民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新民党真诚祝愿中国民主党蓬勃发展，得到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郭泉：民主先声 238：中国新民党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黄琦先生并启动救济程序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通知

为维权民主斗士黄琦先生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救第五号令）

本案案情：

四川成都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先生在“512”特大地震中，积极了解并发布灾区灾情，使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第一时间了解灾区的真实情况，有力地帮助了灾民对非法建筑商的控诉。

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还承担了多位维权民主人士的赴川中转工作。5 月 16 日，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致电黄琦先生，请求黄先生接应赶赴汶川的妙觉慈智法师。在黄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妙觉慈智法师自成都赴汶川映秀等地为死难同胞超度亡灵。

6 月 10 日，因黄琦先生及其同事多次进入灾区对灾民进行救助，不畏强暴披露震区灾情，使国际社会能够了解真相，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震区真实灾情）”罪决定对黄琦先生刑事拘留。黄琦先生现关押于成都市郫县安靖镇的成都市看守所。

中国新民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残酷打击公民问责政府的合法行为，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黄琦先生。

为了表彰和支持所有因为维护人民的生活权利而被捕入狱或遭遇各类经济、政治迫害的维权英雄们，为了让正在浴血奋战在维权第一线的维权英雄们无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更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投身维权的第一线，中国新民党再次向中华全国各族同胞启动对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请大家接此通知后，将善款（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直接打入黄琦先生之母蒲文清女士的银行卡中。

中国工行（内江大千支）：2307484101200681453，户名：蒲文清，电话：0832-8991528

曾丽（黄琦妻子）电话： 13032883761(成都) 、13717752661(北京)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程序为：

1、当出现维权人士被中共非法劳教、劳改，或遭遇各类经济、政治迫害，其本人或家属应立即提供维权英雄或其配偶、父母、直系子女的旧有或新办的银行卡号给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

2、由中国新民党统一发布“为维权英雄（某）的募捐一事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3、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打卡金额，最少 50 元，上不封顶。

4、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奋力转发此信息，力争迅速传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权英雄的作为，争取更多的国民救济。

5、维权英雄家属应当根据实际处境，定期告知善款到帐金额。

附件：国救字号“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启动一览表

1、国救第一号令（李国宏）邮政储蓄卡号：6221886530061797032，户名：皮运霞

2、国救第二号令（赵德富）中国农行卡号：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富

3、国救第三号令（孔强）中国农行卡号：6228481330364939314，户名：孔强

4、国救第四号令（李盛玉）中国工行（沈阳南站支行）：6222023301007114415，李鑫

5、国救第五号令（黄琦）中国工行（内江大千支）：2307484101200681453　蒲文清

郭泉：民主先声 239：中国新民党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对侵华（钓鱼岛）日军的不抵抗政策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至少是在中国东海的钓鱼岛海域还在延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但是，日本自 1945 年宣告投降后，至今仍然占领着中国领土钓鱼岛。

侵略者还在侵略。日本不仅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灯塔、神社，还修建了直升机停机坪，甚至日本还在钓鱼岛上进行了户籍管理，有 100 多名日本人的户籍迁到了钓鱼岛上。

日本负责侵占我钓鱼岛海域的兵力归属日本海上保安厅第 10、11 管区。第 10 管区共下辖各型巡视船 27 艘、飞机 5 架，其中 3200 吨级巡视舰 2 艘、1000～2000 吨级巡视舰 3 艘；第 11 管区共下辖各型巡视船 20 艘、飞机 11 架，其中 3200 吨级巡视舰 1 艘、1000～2000 吨级巡视舰 5 艘。

每天，日本 1 至 2 艘巡视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数次巡逻，并将钓鱼岛周围划分为三个巡逻区域，距钓鱼岛

12 海里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对进入该海域的中国船只“不惜代价”地进行驱逐；12 海里～24 海里为“严格监控区”，对进入该海域的非日籍船只进行目标识别和喊话驱赶；对 24 海里以外试图接近钓鱼岛海域的船只，日本根据外国军舰、政府船舶、民间“保钓”船只、外国渔船以及“不明国籍船只”等类别，对不同性质目标采取尾随监视、警告、驱离等方式予以密切监控。

2004 年 3 月 24 日，中国公民冯锦华先生、王喜强先生、殷敏鸿等七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但是，就在登上钓鱼岛数小时后，就被日本逮捕并移交日本“那霸”警署审查。

2008 年 6 月 10 日，日本舰艇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将中国渔船撞沉，并把一名船长和两名船员押送日本那霸警察署。

对此，中共当局却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偶尔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反对下，中共当局才发表诸如“我们愿意再次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外交辞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这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神圣职责。

但是，中国人民看不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履行这一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

相反，2008 年 6 月 18 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确定由以下各坐标点顺序连线围成的区域为双方共同开发区块： 1、北纬 29°31′，东经 125°53′30″；2、北纬 29°49′，东经 125°53′30″；3、北纬 30°04′，东经 126°03′45″；4、北纬 30°00′，东经 126°10′23″；5、北纬 30°00′，东经 126°20′00″；6、北纬 29°55′，东经 126°26′00″；7、北纬 29°31′，东经 126°26′00″。

而事实上，这一区域完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上，完全是中国领海，竟然被中共政府认为是“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东海“未划界”的说法完全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中国的大陆架的底土和底土上的海面都是中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日本却不问大陆架实际存在的状况，蛮横地提出以中日两岸的中间线作为两国海域的划分，这根本就是置大陆架于不顾，这是中国人民不答应的，而中共政府却答应了，并认为东海是“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

那么，面对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岛这一事实，中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在干什么呢？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邀请，日本国海上自卫队“涟”号驱逐舰将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至 28 日访问中国湛江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四护卫队群司令德丸伸一少将任指挥官，随访官兵 240 人。访华期间，中国海军官兵将与“涟”号驱逐舰官兵互相参观对方舰艇，开展专业交流和文体活动。日方舰艇将向湛江市民开放。

东海、钓鱼岛对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一、东海钓鱼岛海域，是中国唯一的“出海口”（出外洋的自由通道)；第二、东海石油储量约 1 亿 8 千万桶，按目前的世界石油行情算，东海石油总价值约 252 万亿美元。以 2007 年中国财政总收入约 9 万亿人民币计算，东海石油总价值相当于中国 168 年的财政收入。以中国每年免费医疗和教育支出 1.35 万亿人民币计算，东海石油总价值可以为中国人民提供 1 千年的免费医疗和教育支出。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

这是我们中国人在 21 世纪的命根子！

钓鱼岛岂有拱手让人的道理？

那么，为什么我们蕴藏巨大财富的钓鱼岛海域被日本侵略，中国政府却主动要求与日本“共同开发”，而中国强大的海空军却毫无捍卫国土之举呢？

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 1901 年 2 月 14 日清廷颁谕中的话；慈禧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还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清廷卖国求荣、丧权辱国之心昭然若揭。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在所有教科书上在国共抗日问题上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怎么教育的。中共在所有教科书上，说当年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国民党不抵抗，而共产党是抗日主力。

那么事实上，到底是怎样的呢？还是让史料来说话吧。

早在 1931 年 9 月 22 日，熊式辉自龙华呈蒋总统电报请示：“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如何行动？”

蒋总统次日复电指示：“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0 月 6 日，日本军舰大举驶沪，蒋即电令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兄（即熊式辉）商妥决定。”（《抗战史论》，第 127 页）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蒋总统发表讲话：“凡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日之责”。“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

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我们再来看看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 1939 年对（黄埔系）国军抗日的评论，他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摘自大本营陆军部上 519 页）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共是在抗日还是在不抵抗，提供以下史料给大家：

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41 年 1 月 6 日，毛并连带朱德、王稼祥复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二日电悉，部署是对的，惟须注意：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大家看看，中共到底是抗日还是抗国。

1959 年 7 月 31 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 182 页）

1959 年 8 月 17 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 260 页）

196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回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还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写到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了！

我也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只想说，一切爱好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的善良正直勇敢的海内外同胞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民主目标，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奋勇杀敌！

郭泉：民主先声 240：中共当局利用校内网对大学生进行“脑控”

6 月 16 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发表了一篇被全国人民唾骂的“新闻”。

文章概要如下：人民网东京 6 月 16 日电（记者于青）据共同社报道，16 日清晨 5 点 50 分左右，一艘名为“全家福 6 号”的台湾抗议船和 3 艘台湾巡逻船进入了日本领海。此外还另有 6 艘台湾巡逻船驶入日本领海，对此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出了警告。截至上午 8 点 44 分左右，10 艘台湾船只全部驶离了日本领海。

人民网的这篇将中国领海钓鱼岛海域称为“日本领海”的文章，被红网、网易、新浪等众多媒体广泛转载，引起公愤。

6 月 18 日，中共政府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确定中国东海里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为双方共同开发区块。

这一消息，日本在 6 月 7 日就宣布了。日本 TBS 电视台 7 日援引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报道，中日两国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已经达成基本协议。日中两国一致同意在跨越东海中间线的海域，设定多个共同开发区域，开发的成本和权益都各半。

其实，这一东海完全是中国领海，完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上，根本不是中日政府所说的“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且有日本占领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事实存在，所以，在未夺回钓鱼岛之前，中共政府与日本签定的“共同开发”协议，完全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行为。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由于媒体完全被中共掌控，所以全国人民只能通过网络进行抗议。一时间，各爱国团体纷纷通过网络进行联络整合，发表一致对外，反对侵略、反对卖国的声明。

6 月 20 日，在风起云涌的网络爱国运动汹涌澎湃之时，胡锦涛先生来到了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表示愿意与网友进行网络对谈。

不料，短短 5 分钟内，热情空前高涨的网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发贴、跟贴新浪潮。其间网友发来几百个问题，跟贴数万条，同时看贴达数十万次之多。

虽然，人民网上显示的是 300 多个问题，但是据网友反映，被人民网当场删除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胡锦涛先生和身后站着的一排负责文宣的中共官员对人民的空前热情始料不及，胡锦涛先生并没有回答一连串敏感提问，他只回答了三百个问题中的两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小问题。

这两个问题，一是“您平常上网时喜欢看些什么内容？”胡锦涛先生回答说：“当我有空上网时，喜欢看些国内和国际新闻，同时也想知道网友们关心什么事、有什么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否有看到贴在网路上的意见和建议？”胡锦涛先生回答说：“有。我同时也想知道我们的网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然后，胡锦涛先生就说有其他公务在身，不能陪大家网聊了。于是，留下一头雾水的数十万网友，胡锦涛先生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胡锦涛先生走到哪里了呢？原来，胡锦涛先生去和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全体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编辑记者代表进行了座谈。胡锦涛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讲了 5 点意见：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更加自觉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原来，这就是胡锦涛先生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的用意。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严谨的网路审查制度，和所谓的“超大防火墙”（Great Firewall），以限制任何被中共文宣部门视为危害中共安全的反独裁言论。

胡锦涛先生的这一网络思想是不是从 2008 年 6 月 20 日才形成的呢？不，这是胡锦涛先生一贯的思想。我们来看看 2007 年 1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说的一段话。

他强调，要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胡锦涛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二是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三是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四是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五是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

2007 年 1 月 23 日讲话中的“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就是 2008 年 6 月 20 日讲话中的“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

2007 年和 2008 年的讲话核心，就是“阵地意识”。

就在胡锦涛先生来到了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发表了“阵地意识”后的第三天，即 6 月 23 日，在强大的“阵地意识”的战争思维下，我的校内网帐号被中共查封。

校内网的用户主要是大学生，也有部分中学生。对大学生和中学生进行民主启蒙，一直是我的两大工作重点之一。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帮助全国的受迫害群众维权。

我在校内网上只是发表了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领土钓鱼岛以及我反对中共当局在钓鱼岛被日本侵略占领下和日本共同开发东海的观点。

我的校内网帐号被封之后，很多大学生都来安慰我，说，“校内网就是这样，只要是中共认为对中共的专制统治不利的，都一律查封的。”

于是我问，那么什么文章和什么观点是校内网允许的？

大学生们立即回答：“色情文字呗，例如最近火暴的海南师范大学女生的闺中密照啊！”我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海南师范大学女生宿舍楼遭遇对面男生宿舍楼里的男生偷拍，近百名女大学生闺中密照被上传至校内网，内容多是早间女生穿着睡衣在阳台洗漱或清洗内衣物，以及在宿舍房内更换衣服的照片，很多照片是全裸露点的，其人物面部均清晰可见。大约有 300 多张照片。从照片拍摄的角度分析，拍摄者很可能分别是在对面 2 号男生楼的 2、3、4、5、6 楼拍摄，共有近 10 间女生宿舍和近百名女生被偷拍。

这些“美丽”的照片，在校内网上广泛传播。

“那么，校内网的管理员不删除这些照片吗？”我赶忙问。

大学生们笑着说：“校内网只会删郭老师的文章，而这些裸体女大学生的照片是能给校内网带来人气的，当然不能删了。除非有女当事人指控，否则校内网才不会删呢，开心还来不及呢。”

果然，直到海南师范大学女生自己在校内网发现了自己的被偷拍的裸照，投诉之后，校内网才作了撤消照片的处理。

于是，我立即明白了，原来中共一方面对宣传民主的文章实施“阵地意识”，一方面对毒害大学生的色情文章和图片纵容传播，以此对大学生进行“脑控”。

好在我昨天收到了一名大学生“金成工一”发来的为我写的一篇博文，让我感到很欣慰，毕竟，还是有大学生没有被中共的色情文字“脑控”的。

附件：

金成工一：郭泉老师的校内网“终于”被“和谐”掉了

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您的帐号被“封”或许更能体现出您的价值。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在这个国度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高中的历史老师曾大力推荐我们读蒋梦麟的《西潮》。他认为“思潮”对于社会的变革是起着关键作用的。新的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推动社会变革、时代进步的源泉。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相比一个世纪前已全然不同。食不饱、穿不暖、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经离大部分国人远去。如今中国人的需要不同了，因此能带领国人飞跃的思想也必然要有所进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思潮带来的巨大社会改革时代变迁已成为历史，但是改革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看到社会还存在种种问题，每天在各大论坛（包括校内网），各种要求进步、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没错，中国需要新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潮，这一新的思潮将引领国人迈向新的时代，实现民族真正的复兴。

我想这新的思潮的主线就是民主、自由。

回到题目，对于郭老师的思想和中国新民党(CNDP)的产生，我是抱欢迎态度。 因为他们呼吁的民主自由，代表着引领中国进步的先进思想。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郭老师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我表示欣赏。他的被封，我感到突然，但并不意外。

今天先想到这点。

网络无穷大，希望也相信郭老师离开校内网后会一如既往宣传民主自由。

支持所有的民主自由人士！

郭泉：民主先声 241： 中共当局必须尽快解决全国百万城镇退役士兵安置问题

2008 年 6 月 28 日，广州市城镇退役士兵陈志光先生（电话：020-31211001）给我电话，诉说了他最近两周来的遭遇。现通报如下：

陈志光先生，网名西藏工兵，广州人。1998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2 月在西藏服役。退役后属于广州市 2001 年的重点安置对象，2001 年 7 月由广州市增城市退伍安置办、劳动局分配到镇龙镇政府。镇龙镇政府竟然实行欺上瞒下的假接收假安置、变相拒收。不但没有给陈志光先生办理进编，还把陈志光先生当作下岗分流人员使用。中国官员公然践踏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城镇退役士兵安置政策。陈志光先生多次与当地中共政府交涉，无果。

2008 年 6 月 10 日，陈志光先生进京上访，被广州进京截访的中共区镇干部强行押送回广州。为防止陈志光再次进京，中共当局没收了陈先生的身份证，并派四个中共特务 24 小时守在陈先生家门口附近，实施监控和跟踪。2008 年 6 月 26 日上午，广州市市长、区长、镇长“大接访”。陈先生向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市长反应情况后，张广宁市长表示一定关注解决。上午 10 点，陈先生走出会场，刚到门口就被中共当局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软禁，并没收手机。

陈志光先生遂绝食抗议，绝食三十小时后心脏开始疼痛。27 日晚 6 时，中共当局被迫释放陈先生。7 时许，陈先生回到家中。但是，家门口依然有 4 个中共特务日夜看管，随时跟踪。

中共当局的这种公然违法剥夺城镇退役士兵陈志光先生的合法权利，公然违法禁锢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罪恶行径，在全国范围内，每天都有发生在要求落实安置政策的城镇退役士兵身上。

城镇退役士兵安置，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3 号对城镇退役士兵安置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但是，各省市一些单位片面强调局部困难，不愿意主动分摊国防义务，违反《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拒绝或者变相拒绝接收城镇退役士兵，强迫城镇退役士兵参加单位自己组织的考试，强迫退役士兵签订自谋职业协议领取安置费等。这是当前发生城镇退役士兵安置纠纷的主要原因。

然而，根据中国法律，城镇退役士兵却无法对当地政府不安置城镇退役士兵的行为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首先，由于城镇退役士兵在接收安置前，尚未与接收单位建立或者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故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受案管辖范围，对于接收单位不接收安置的行为，无法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解决。

其次，城镇退役士兵与接收单位虽是平等民事主体，但对退役士兵的安置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合同约定，而是属于国家强制性行为，因此对城镇退役士兵的安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既不能申请仲裁，也不能提起诉讼，那么，城镇退役士兵，面对一些单位拒绝或变相拒绝接收安置城镇退役士兵的违法行为，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上访。

因为对退役士兵的安置是国家的义务，所以，政府首先应当承担安置的义务。政府再制订相关政策将国防义务分摊给单位。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当找政府就应当能够解决安置问题。

那么，城镇退役士兵是否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让政府履行行政监督职责，纠正单位的拒绝或变相拒绝安置城镇退役士兵的违法行为呢？

这也是没可能的。因为在中国，立法、司法、行政的关系并不是三权分立的。立法、司法、行政这三者之上都由中共辖制。因此，如果中共支持中共政府，那么中共法院就不会反对中共政府。

现实就是如此！一些单位会将自己的安置办法报政府审批，政府同意后再实施。所以，如果法院不是独立于中共的法院的话，那么，城镇退役士兵是很难让政府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

于是，就发生了中共当局非法截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罪恶行径。

陈志光先生的要求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他请求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3 号对城镇退役士兵的安置政策，停止损害一个正式分配的职工合法权益，办理进编，补发职工工资，补办 2001 年工作以来和兵龄总共 9 年从未购买的所有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合理、合法的要求，中共政府也不答应。相反，却把陈志光先生当作敌人限制人身自由。

目前，百万城镇退役士兵的安置问题，在中共政府不受法律制约、不受人民监督的独裁专制体制下，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可能性的。

只有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下，城镇退役士兵才能得到妥善安置。

郭泉：民主先声 242：作为一名前南京刑事法官，我谈谈 628 贵州事件的证据采集问题

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法学（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

1994 年到 1999 年，我先后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担任刑庭内勤、法庭书记员工作，并持有初任审判员资格证书。5 年间，参与办理过刑事案件百余件，担任庭审、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记录的案件数百件。

现从证据采集、采信的角度，谈谈 628 贵州事件的证据采集问题。

目前已经出现的 628 贵州事件的判断有三种：

一是女生李树芬家属谢新发先生对案件的判断（刑事案件）；

二是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先生对案件的判断（民事案件）；

三是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先生对案件的判断（与他人无关的自杀事件）。

现将三种判断一一列出：

一、女生李树芬家属谢新发先生对案件的判断（刑事案件）：

据谢新发和几位民众介绍，受害女生名叫李树芬，今年 15 岁，老家是玉华乡，从小听话懂事，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很好，人缘也很好，深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上周六(6 月 21 日)傍晚 6 点左右，李树芬班上有个女同学王骄(音)，把李树芬叫出去，当晚李树芬被当地两个社会流氓强奸杀害并抛尸河中(瓮安县西门河)。

当晚 11 点多，有民众听到有人喊“救命”。12 点半左右，王骄打电话给李树芬的哥哥，说她“跳河自杀了”。李树芬的哥哥及其他人一起赶到河边后，看见王骄和两个男子站在桥头，而且发现李树芬肚中无水，且事先无任何想要自杀的迹象，于是凌晨 2 点左右，将三人扭送公安局。但后来获悉，次日上午 10 点多，三人已被无条件获释，公安局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和笔录工作，还声称，受害人是“自杀”身亡。

次日就有人告诉李树芬家人，李树芬是被人强奸后害死推入河中的，警方未作全面尸检，也未作强制措施，对家属提出的全面尸检要求不予理睬。李树芬家人从当地民众提供的信息中获知，王骄与两名男性凶手，与县公安局、县委领导、省委领导都有关系，因此在被拘押 8 小时后即获释。

二、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先生对案件的判断（民事案件）：

贵州日报 7 月 1 日报道：6 月 30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专程赶到瓮安县，现场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

石宗源先生强调，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石宗源先生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省委、省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切实把尽快平息事态、维护稳定放在第一位，连夜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组成一线指挥部。迅速控制了事态。

三、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先生对案件的判断（与他人无关的自杀事件）

中新网 7 月 1 日电，贵州省新闻办今天晚间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瓮安“6・28”事件，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介绍了关于李树芬溺水死亡事件的“事实”。

王兴正表示，现已查明：2008 年 6 月 21 日 20 许，李树芬与女友王某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某及陈的朋友刘某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

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

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

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刘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李树芬。王某急忙打电话给陈某，并大声呼叫救人。陈立即返回河边，跳下河中帮忙施救，陈见刘已体力不支，便用力先将刘拉回岸上。王某、刘某随即报警，并打电话通知了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1989 年 12 月 9 日生，瓮安县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生)。

以上为贵州 628 事件的三种判断。

从刑事侦察、刑事证据采集和采信角度，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女生李树芬家属谢新发先生主张的“上周六(6 月 21 日)傍晚 6 点左右，李树芬班上有个女同学王骄(音)，把李树芬叫出去”， 请探员调查以下问题：

1、 王骄(音)因为什么事情请李树芬出去？请调查同学或手机录音文字记录。
2、 王骄(音)与李树芬是否有过节？请调查同学和老师
3、 在哪里吃饭的？店家观察李树芬的表情怎么样？
4、从店家出来后，有无路人注意到此四人的表情和状态？

第二，女生李树芬家属谢新发先生主张的当晚 11 点多，有民众听到有人喊“救命”。

请探员调查是否有民众的证人证言？

第三，女生李树芬家属谢新发先生主张的 12 点半左右，王骄打电话给李树芬的哥哥，说她“跳河自杀了”。 请探员调查：

1、作为一个好学开朗的中学生李树芬是否有自杀的原因或前兆？

2、如果没有任何自杀的原因或前兆，很显然是不能采信与李树芬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一起的人的证言的。且王骄等三人有最大犯罪嫌疑，应立即收监讯问

第四，溺水死亡不代表是自杀。被强奸后投河，也是溺水死亡；被威胁要强奸后投河，也是溺水死亡；被强奸后被推入河中，也是溺水死亡。

最后，关键要调查李树芬溺水死亡的真实原因。 请中共当局本着执政为民的基本准则认真调查案件，还民公道。谢谢。

郭泉：民主先声 243：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成立 628 事件特别调查小组，调查溺水原因

本案事态发展已不适合由贵州方面进行独立调查了。

恳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无利害关系的特别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并向中央、国务院单线汇报。

需要调查的几点：

一、在一起喝酒的是六人而不是四人，分别是，王娇、刘言超、陈光权、李树芬、秦明、刘思桃。请调查，他们为什么聚会喝酒，以前是否有过类似喝酒的习惯？

二、陈光权称“与李树芬是恋爱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旁证（书证、人证）。

三、刘言超称“当晚 10 时许几人喝完酒后，原本准备各自回家，可李树芬却提出到西门河边玩”。请调查李树芬以前是否有过与他人深夜喝酒并到西门河边玩的经历。

四、刘言超称“李树芬跳河自杀”是因为“她觉得父母重男轻女，且哥哥经常欺负她，父母时常谩骂她，所以想跳河死了算了。”是否属实，是否有旁证。

五、李树芬为什么在跳河自杀前对刘言超说要自杀且说明自杀原因，而不对“男友” 陈光权说呢？

六、恋爱中的少女，是否会因为父母、哥哥对其不好就跳河自杀？如果真是自杀，请调查自杀的真实原因。

七、李树芬溺水后，为什么其男友不报警，而是由王娇拨打了 110 呢？事后也没有任何其男友陈光权哀痛的意思表达呢？相反，却在事后反复强调：“我和李树芬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呢？

八、调查王娇、刘言超、陈光权三人的 6 月 21 日到 6 月 22 日的电话录音材料：

1、王娇手机(尾号为 3349 的移动手机)；

2、陈光权手机（尾号为 8345 的移动手机；

3、刘言超手机（尾号为 4372 的移动手机)；

4、王娇的手机 6 月 21 日到 6 月 22 日共通话共 29 次，其中，与陈光权通话 10 次，与刘言超通话 5 次。 6 月 22 日零时 27 分 31 秒、31 分 40 秒、36 分 50 秒三次主叫“110”报警；

5、王娇手机 6 月 22 日零时 27 分之后，15 分钟之内，分别与刘言超、尾号 8267、8823、4355 等的手机用户通话 9 次。

6、刘言超手机在 6 月 21 日通话 33 次，其中，与陈光权、王娇分别通话 11 次、5 次。当日晚 7 时 48 分后，没有通话记录。

为了一次聚会吃饭，如此频繁地电话联系，这正常吗？请向移动公司提取全部电话的录音记录，即知原委。

九、如果，上述八项均为真实，那么，特别调查小组应该继续调查“打、砸、烧”群体事件的发生。重点调查以下 2 点：

1、是否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先生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

2、是否存在深层次的因素

例如：石宗源先生强调，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郭泉：民主先声 244：谢有明律师在杨佳案中已违反有关法律和律师执业道德纪律规范

2008 年 7 月 1 日，北京人杨佳先生持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先后奋力搏杀 11 名中共警察，数分钟内，杀死 6 名、杀伤 5 名中共警察，引起世人高度关注。

本案缘起于杨佳先生 2007 年 10 月长假到上海游玩时，在闸北的上海火车站一带租用了一辆自行车，却被闸北分局民警认为涉嫌购买赃车，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据了解，杨佳租用自行车为“黑车”，是被人偷盗后转卖的车辆，作为一名普通租用者，杨佳与其并无瓜葛。杨佳先生被带到派出所后，随着事件的取证调查，闸北分局民警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了自行车而已，所以数小时后释放了杨佳。

杨佳先生在被中共警察扣留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从此杨佳先生就开始投诉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了。杨佳先生投诉的结果是，2007 年 10 月 16 日，闸北公安分局派员专程到北京，上门

走访了杨佳及其母亲；双方就赔偿问题发生了分歧。2008 年年 3 月 15 日，闸北公安分局第二次派员到北京，上门走访杨佳，在赔偿问题上再次发生分歧。

2008 年 7 月 1 日，杨佳先生持刀搏杀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的 11 名中共警察，致 6 人毙命。

杨佳先生力竭被捕后，立即要求法律帮助，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立即通知谢有明律师为杨佳先生提供法律援助。

首先，经查谢有明（名江律师事务所主任）已于 2008 年 1 月 8 日，出任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顾问。参见：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网站 2008 年 1 月 8 日的《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通知》公告。

鉴于杨佳袭警的对象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谢有明律师同时担任犯罪嫌疑人的代理人和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显然违反了《律师法》第三十九条关于“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规定。

谢有明律师明知自己身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顾问，却担任袭击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下级单位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显然是违规的。

第二，谢有明律师在与杨佳先生首次会面后，立即对媒体说了违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有关规定的不负责任的话语。

例如：谢有明律师对媒体宣称：1、杨佳先生精神状态正常。2、杨佳十分冷静，头脑清醒，逻辑清晰。3、杨佳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

谢有明律师的这些个人判断，显然是未经鉴定部门的专业技术鉴定的。虽然谢有明律师的这些个人判断属于主观臆断且对委托人不利的个人判断，但是却足以左右普通民众的思维。

谢有明律师的上述不负责的主观臆断，已经违反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第二十四条“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谢有明律师根本不懂死刑辩护。

谢有明律师对媒体宣称：“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

谢有明律师的这段话，完全不懂死刑辩护的基本辩护常识。定罪量型，那是法官的事情。死刑辩护律师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委托人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死刑辩护律师是绝对不能作出“有罪该杀”的判断，尤其是对媒体记者。

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慎重性、谨慎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

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犯罪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被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

死刑案件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

这就要求律师在进行深入调查以反驳控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有关被告人的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辩护的任务”。

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

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

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死刑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辩护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以留存，那么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就应当采取不同于一般辩护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死刑案件首先要以能够保留当事人的生命为辩护的前提。死刑案件的辩护没有一定之规，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辩护方案：

本案的辩护核心在于：

1、“犯罪嫌疑人是否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 所谓无行为能力人，是指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所谓限制行为能力人，是指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2、 “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或过失”。

本人曾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出任法庭书记员，且持有审判员任职资格证书，现对本案发表个人意见，如下：

一、 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作为被害人（单位）不应介入本案的刑事侦察和调查取证工作。

二、 谢有明律师同时又是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闸北区政府与闸北公安分局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双方有利害关系。谢律师应当主动回避。

三、 杨佳向上海警方提出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时，上海警方应通知上海市司法局，由上海市司法局与北京市司法局协商沟通，由北京市司法局为杨佳提供两名以上律师由其选择，方显法律公平。

郭泉：民主先声 245：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来为人民服务

最近，有一个中共特务冒充美国华人来向我请教什么是民主。我说，正如想要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必须阅读整本《圣经》一样，想要了解中国新民党的民主理论必须先阅读全本的《民主先声》。

结果这个中共特务很不耐烦地打断我，说，“郭教授，请你用 10 个字来说下什么叫民主就行了。”

这真的是勉为其难了，因为，我不是做烧饼的，我的理论也不是烧饼，你掏 10 个美分就立即可以买一个去啃的。最后，我只得做了一次标题党，我说：“民主就是人民能选择执政党”，就这样还是超过了 10 个字。

不料，这个中共特务立即抛出了他的观点，他说：“你错。民主就是多数决定少数。”

我笑起来，我说，当然，多数决定少数的结果就是票决执政党。票决执政党，当然是多数决定少数。所以，民主就是人民选择执政党。

于是，这个中共特务的狐狸尾巴终于夹不住了。他说，“错，现在人民多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以，现在的中国就是民主的，共产党执政就是中国人民民主选择的结果。”

于是我叹了一口气，中共特务真的都是白痴和弱智。他的这些话要是放在文革里，或许还是会“愚到一些民的”。但是，在 21 世纪的中国，还在推销中共执政就是中国人民民主选择的结果，那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了。

当然，估计这个中共特务是别有用心，但是，用这个“心”，不是弱智，又是什么呢？

好，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理念，就知道什么叫民主了。

中国新民党在政党理念归属方面，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大家庭。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中国新民党的宗旨是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其实质就是在经济方面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接受人民的选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共产党呢？中共在中国长期推行一党独裁，反对多党民主竞选。中共为了达成它永远执政的目的，也搞出了一个伪民主选举制度。当然这个竞选的结果只能一个，那就是中共永远是执政党。这个伪民主选举，就是上面的这个中共特务所说的“多数决定少数”。

这个“多数决定少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中共只给人民一个候选党，即中国共产党自己。

表面上看，伪民主竞选也是“多数决定少数”，但是由于并没有可供选择的另一个选项，所以，这样的选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选举，其实就是掩耳盗铃地使用了一个民主的“外观”，而获得了一个独裁的实质而已。

中国新民党坚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坚持分权制衡，坚持开放选举。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反对多党民主竞选，坚持独裁统治。

中国新民党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主张用累进税的办法调剂贫富，促进社会公正。

中共呢？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府有意给富人提供偷税漏税的机会。这种状况就连中共的国家计委经济所的陈东琪先生都承认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劫贫济富”。这不正和中国新民党的主张完全相反吗？这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它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强盗主义。

郭泉：民主先声 246：顺利完成借款 18 万，感谢大家对我和中国新民党的信任和支持

5 月 18 日到 28 日，我因为组织各高校、科研单位的 30 多位教授撰文谴责中共当局掌握大量地震预警资料却没有发布，遭遇中共传唤。后我拒绝供出其他教授的名单，而被恼羞成怒的中共警察决定入狱 10 天。

这件事情让我母亲终于觉醒了。我母亲叫顾潇，是江苏省一级作家，曾获得文化部电视金鹰奖、莽原文学奖等。她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上世纪 60 年代就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任职的老中共党员。在我应邀出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之后，母亲大人曾明确地对我说，虽然她不认为我的民主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她认为虽然中共目前忽略了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总体在前进，她始终相信中共是会做出符合人民、符合历史的正确抉择的！这个抉择就是多党竞选。她说，未来在多党竞选的时候，她会选择投中共的票。

我说，儿子投中国新民党的票，母亲投中国共产党的票，这本身就是民主。妈妈您随便投谁的票，其实都在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谢谢妈。

但是，5 月 18 日之后，我母亲认为中共因为我和其他多位教授撰文问责政府，而将我抓捕入狱，这显然违背了中共的人民性原则。于是她开始反思中共，以后越来越多的帮助弱势群体说话的维权民主人士入狱，使得她不再坚持以前的看法了。

6 月中旬，她和我长谈了一次，她说，鉴于我目前已经成为全国维权运动的核心并应邀出任了基层民众组建的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共一定会对我下手的。凭她对中共的了解，中共一定会在经济上彻底打击我，例如，现在已经取消了我的副教授津贴，只保留千元左右的基本工资，阻止我去各高校担任兼职教授贴补家用等等，所以，她认为一旦我被中共收监入狱，中共一定会没收我的全部财产，包括我现在的住房，直至让我妻儿流落街头。

我说，是的，根据中共的秉性和一贯作为，他们完全做得出。

于是，我母亲为了让我在入狱被没收全部财产之后我的妻儿不至于流落街头，决定把她现有的座落于南京鼓楼区碧树园的一套 90 平米的精装修“学区房”出售，然后用得款购买一套 150 平方米的大房子，好让我在出狱后与妻儿和她住在一起。

由于这个事情有利于我在做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工作中无后顾之忧，所以，我立即同意，并积极实施。

我母亲现居住的 90 平方米的房子由于属于南京最著名的琅琊路小学（芳草园分校）的学区而受到南京市民的青睐，目前的价格是每平方米 15000 元左右，这样我目前的现住房的价值是 135 万，再加上我母亲的 15 万积蓄，于是，我母亲的置换计划是完全可行的。

首先，我们看中了在南京奥体新城区的一套大约 160 平方米住房，每平方 9300 元，合计需要 150 多万元。6 月 20 日，我和这家房地产公司签约，并支付定金 2 万元。

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我母亲的新购房屋的首付款 30%应该在年底支付。所以，我立即开始积极销售我母亲的房子，根据以往情况，销售二手房屋，需要 3 个月左右。

不料，6 月 30 日，我妈接到房产公司的电话，要求在 7 月 10 日前首付 30%（50 万）。我立即和我母亲凑到 30 万积蓄，但是还有 20 万的缺口。

我立即进行房屋抵押贷款，结果银行告知房屋抵押贷款只限房屋装潢和购买汽车这两项，所以，银行无法进行放贷。

7 月 3 日，我与本党同志商谈，最后达成共识。我在我的 QQ 和 SKYPE 签名里挂上借款通知，信任我和支持中国新民党的民主主张的朋友，如有条件，一定会帮助我的。如果到 7 月 9 日，还没有人借款或借款尚存缺口，由本党同志借款进行首付。

这项决定，其实是在测试我本人和中国新民党在国内国外的公信度。

7 月 4 日，开始有各地朋友询问我的借款目的。我一一作了回答。7 月 5 日早上，旅居加拿大的网名叫“十方”的兄弟答应借款 7000 加元。他问我要我的工行卡的银行“汇路”，不料我到工行一问，竟然要等到 7 月 7 日（周一）上午 8 点半负责外汇“汇路”的职员才能来上班。

7 月 5 日中午，广东潮州的曾先生借款 5 万。

7 月 6 日，浙江省温岭市李先生借款 1 万元；云南省玉溪市杨先生借款 1 万元；河南南阳刘先生借款 3000 元 ；陕西省咸阳彭先生借款 2000 元。

7 月 7 日一早，我到工行取得了“汇路”，可是银行职员告诉我，这种汇款需要 3 天左右。我立即告诉加拿大的“十方”先生，请他立即办理。

7 月 7 日中午，重庆市李先生借款 1 万元。7 月 7 日晚上，复转军人代表韩先生借款 3 万；经租房代表蒋先生借款 15000 元。

至 7 月 7 日深夜，除加拿大的 7000 加元尚未到帐外，共到帐 13 万。

7 月 8 日一早，加拿大的“十方”先生与我联系，考虑到工行“汇路”需要几天，可能会耽误我在 10 日支付首付款，所以他采用西联汇款的方式汇出 7000 加币。他要我带上我的身份证立即到农业银行，报出他的名字和密码，就可以当场取款了。

我立即赶到了湖南路的农行办事处办理提款，7000 加币折合美圆是 6777 元，再折合成人民币是 46378 元。

这样，总数达到了 176378 元。

7 月 8 日中午，我妈来电话说，妹妹郭笑寒打过来 2 万元。这样只剩下 3700 元的缺口了。

下午，“可爱的小撒旦”（参见《民主先声》231）给我电话，约我见面。见面后，她给了我一张卡，说：“工作一年，工资都乱花了，只存了 3000，都给你用吧。密码是 196858”

这是我的生日！我傻傻地站着看着她，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不好意思地说：“太少了太少了，以后我再也不乱花钱了，这样就能多一些钱给你用了。”

取出她的 3000 元后，我又从我自己的卡里取出 700 元。

7 月 8 日晚上，我把借到的 18 万送给我妈妈，加上我妹妹打过来的 2 万，50 万首付款就全部到帐了。

除河南南阳刘先生的地址不详，和“可爱的小撒旦”、加拿大“十方”兄弟、复转军人代表韩先生、经租房代表蒋先生不需要借条外，其余我都一一快递了借条，另外随信还送上我签名的专著《自由与文学》以作留念。这本书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2001 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库存已经十分有限了，再版也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

7 月 10 日，我和我妈办妥首付。

办妥首付之后，尽快销售我妈的旧有住房就是我的重要任务了。借此机会，帮我妈做个广告，也许海内外朋友正好也需要这套房子也说不定呢。

我母亲现居住的 90 平方米的房子，在南京鼓楼区龙江地区碧树园小区，学区是南京琅琊路小学（芳草园分校），精装修，虽为一楼，但地下室抬高半层，且前有小区花园，阳光充足，售价 135 万人民币。

这次借款，完全是建立在大家对我和中国新民党的民主理念的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的，这让我和我的同志们倍感鼓舞。在此，再次感谢大家。

郭泉：民主先声 247：我们相信正义必胜：许向前先生与“走四方维权工作室”

今天（7 月 16 日），我出席了一个各地维权法律人士的小型宴会。来自江苏无锡“走四方维权工作室”的许向前先生一见到我，就说：“郭教授，我读过您的所有文章。现在我们工作室就是在做您提倡的以维权促民主的工作。”

许向前先生今年 28 岁，政法大学才毕业不久，他立志为人民服务，从基层的民众维权做起。他的“走四方维权工作室”为苦难的维权民众代理案件。

考虑到弱势群体经济拮据，虽确有怨情需要诉讼，但他们不懂法律，被地方保护势力欺蒙和威胁。许向前先生和“走四方维权工作室”决定，为弱势群体先行服务，而不是先行收费。在完成委托之事以后，委托人根据事先拟定的劳务费标准支付必要的劳务。

许向前先生递给了我一张名片，正面是：

走四方维权工作室

为您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追讨工资；代理工伤、交通等事务的处理和赔偿；婚姻、合同、债务、医疗、知识产权等纠纷的调解和诉讼。

我们的宗旨：贴心服务、实力保证、负责到底、胜诉后收费。

关注底层民众，为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的朋友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许向前　地址：江苏无锡新区梅村镇新华路手机：13961834545　QQ：345195535

Email：xu2525163@163.com 网址：www.overstar.51.com

背面是：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

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正义公理何处在？法律维权“走四方”。

许向前先生的名片的背面文字，让我思考良多。第一句话：“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让我想起一部我最喜欢看的美国电视剧《黑暗的公正》里的一句台词：“正义女神闭着眼，但她明察秋毫”。

电视剧《黑暗的公正》的主人公是尼克法官，他的故事在我做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的时候时常激励我前进。他有一句话，我至今倒背如流：

“作为警察，我无法阻止我的猎物钻法律的漏洞，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检察官，我的案子经常被无孔不入的律师推翻，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法官，我的手脚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可我还相信法律制度；直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被害，从此我不再相信这个制度，我开始相信正义！”（Judge Nicholas Marshall: As a cop I lost my collars to legal loopholes, but I believed in the system. As a D.A. I lost my case to crooked lawyers, but I believed in the system. As a judge my hands were bound by the letter of the law, but I believed in the system. Until they took my life away. Then I stopped believing in the system and started believing in justice.）

一切受独裁专制迫害的善良的人民，都应该觉醒，为自己的权利抗争。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正义公理何处在？法律维权“走四方”。

许向前先生做得非常好！　分手的时候，我们握手道别。保重，许先生。

郭泉：民主先声 248：社会动荡源自专制制度：会晤伦敦 BBC 记者傅东飞先生

昨天（7 月 17 日）伦敦 BBC 记者 Rupert 先生（汉名傅东飞）飞抵南京。晚上 8 点半，我们见面。

伦敦 BBC 之前已有两次来南京采访我，一是在我 2007 年 11 月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要求取消独裁实现民主之后，另一次是来采访我关于中国土地私有化的见解。

他和我年龄相仿，40 岁左右的中国通，英俊、果断，具有欧洲新闻记者的所有优良品质。

他的汉语口语已经完全可以与中国人媲美了。他是在台湾学习汉语的，他 1992 年曾是伦敦 BBC 驻台湾的记者。他现在是 BBC 驻俄罗斯的记者，2 个月前被抽调中国担任特别记者。

这次来南京见我之前一周，他在北京采访了上访维权的民众；在广州就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问题，采访了太白村村民；就中英关系采访了袁伟时教授。这次傅东飞先生要来和我讨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

傅东飞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最近的中国发生了很多民官冲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回答：

6 月 28 号，贵州瓮安至少几万人围攻了当地党、政和公安机关，发泄他们长期积压的不满和愤怒。贵州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先是说瓮安事件是坏人和黑恶势力挑动的结果，后来又半遮半掩地承认是当地党政官员多年来滥用公安暴力、欺压民众导致的必然结果。7 月 1 日，杨佳先生持刀进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死 6 名警官，杀伤 5 名警官。瓮安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个星期，浙江台州市玉环县 7 月 11 日至 13 日连续三天爆发外地民工与派出所公安的冲突事件，派出所逮捕抗议打人的民工，导致成千名民工示威围攻派出所。

在瓮安事件之后被免职的当地公安局局长坦率地承认：“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公安局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中国各地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官员长期作恶多端，造成大量社会矛盾、社会不满和愤怒大量积压。

自从中共在 1970 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民众的群体抗议事件数量近年来呈现爆炸性增长，每年数以万计。

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增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和独裁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公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制，人民的苦难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判，除此之外，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增强、民主意识提升也都是重要原因。

但是，归根结底，中国的一切社会动荡源自专制制度。

傅东飞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共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回答：

应该说中共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中共考虑到执政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中共不敢进行多党民主的竞选模式，因为他们很清楚多党竞选的结果是他们将出局。

于是，中共就想了很多办法，例如，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半个月前下达命令，要求中国各地所有 2300 个县的党政领导人接纳群众投诉，就地解决地方矛盾，严控有冤情无处申诉的地方民众到北京上访，以避免给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如果这些所谓的“就地解决”真的是中共想化解矛盾，但是由于专制制度不改，那么，这就是在“作秀”而已，根本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其次，有足够的迹象显示，这些所谓的“就地解决”，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而是为了奥运的“和谐”举办。

当然，我希望中共是真实地意识到了人民的苦难到了必须立即解决的地步了。因为，人民真的到了必须要有个说法的历史时刻了。如果中共再不给人民一个说法的话，那么 628、71、711 等事件会越来越多的。杨佳先生有句话，我想中共应该反思。杨先生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最后，傅东飞先生问到，您认为中国会以一种什么方式实现民主？人民的暴力革命，还是中共的自行改革？

我回答：

您分别担任过伦敦 BBC 驻台湾和俄罗斯的新闻记者。您一定知道台湾和前苏联的民主实现，都不是人民的暴力革命所导致的，而是因为独裁统治在其无法实施其统治的情况下自行终结的。其自行终结的方式有二，一是前苏联模式，即立即实施多党竞选，“还权于民”；二是蒋经国模式，即先开放党禁报禁，制定民主时间表，按期进行多党竞选。

我认为，台湾模式是适合中国的。中国的专制制度所导致的腐败、冷酷、暴力、弱智是无法得到根治的。落后、凶残的独裁目前呈现出的对自由经济的阻碍、对传统文化的毁灭、对美好心灵的扼杀等邪恶面目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清。专制统治彻底中断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与世界民主潮流为敌，也彻底让中国人民觉醒了。

但是，尽管如此，人民的暴力革命都是不足取的，毕竟，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对社会总财富的摧残，都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我赞同“台湾模式”。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无论中国的专制统治如何被终结，中国新民党在当前的任务就是，真诚为民服务，积极争取民心。告诉人民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民主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民主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

历史必将证明，中国新民党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道路。

郭泉：民主先声 249：黑瞎子岛、钓鱼岛和奥运数万中外记者的一美圆自助餐

周三（7 月 16 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严修先生给我电话，请我谈谈黑瞎子岛的问题。

我说，黑瞎子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据抚远县志记载，公元 1411 到 1433 年间，明朝著名的太监亦失哈曾先后十次率大规模船队经过黑瞎子岛，到黑龙江上游巡视。公元 1854 年，清政府在岛东北角设立了乌苏里昂哥卡伦(边防哨卡)。

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俄语称其为大乌苏里岛），位于中俄边界抚远县境内的黑龙江（俄语称其为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主航道西南侧，是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它的面积约 327 平方公里（一说约 350 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三分之一、澳门的 12 倍、珍宝岛的 500 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夺去黑龙江以北约 63 万平方公里土地，1860 年又强迫签订《北京条约》，约定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原住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仍准留住。这一条约又强行割占了中国领土 40 多万平方公里。共计割中国 160 万平方公里。

1929 年，中国东北当局将中东铁路电报电话权收回，将苏联职员遣送回国，就此引发了中苏争夺中东铁路所有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最后中国战败。当年 12 月 20 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方签订《伯力协定》。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就是在该次武装冲突期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这是历史上中苏之间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场鲜为人知的“冲突”。从此黑瞎子岛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以前，中国人上下黑瞎子岛并不受限制。待中苏关系交恶后，中苏边防部队，都加强了对黑瞎子岛周边的戒备。从那时候起，中国人就不能登岛了。

根据 2004 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归中国所有；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

一分为二，靠近哈巴的一部分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归中国所有。

2008 年 7 月 4 日俄罗斯方面表示，2008 年 8 月即可将黑瞎子岛的一半移交给中国。

然而，这一关于领土的协定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和同意，完全是政府行为。关于领土的割让和争夺，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和同意，否则就是无效协定。

关于中日的东海钓鱼岛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也完全是政府行为，也未经全国人大的讨论和同意。

今天（7 月 19 日），我看到中国食品产业网 （2008 年 7 月 17 日 07:51）的新闻，让我愤恨无比。 （记者 沈德森 报道）奥运期间数万中外记者吃什么？这个答案现在得到揭晓。在 2008 北京国际新闻中心（2008 Beijing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er，简称 BJMC）主餐厅，记者只需花 1 美元或 7 元人民币，就可以享受到中、西风味的餐饮服务。

在餐厅入口处，设有数台刷卡机，用餐记者只需将特制的用餐卡在该刷卡机上轻轻一刷，便完成了用餐付费，十分便捷。上面的公告显示，每次用餐只需 1 美元或 7 元人民币。

餐厅不仅无限量提供有意大利面饼、肉串、蛋挞、鸡翅、蔬菜、玉米、蛋炒饭等食品，还无限量提供有新鲜水果、汤和冷饮，食品种类十分丰富、营养搭配也很科学合理。

看到这个新闻，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们的国人在为了食物而艰难地工作，面对高昂的物价，我们的国人已经无法昂起高贵的头颅。一个中国母亲因为猪肉涨价买不起，而偷肉被捉，羞而撞墙。但是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却可以用一美圆无限量享受 20 多种美味佳肴呢？

中共政府，请问你们用了人民的钱去办奥运，为什么不让那个偷肉的母亲带着小孩去吃奥运的一美圆（7 人民币）的自助餐呢

才一美元啊，所有中国老百姓都能享受的起吧！但是为什么只让外国人享受，却不让中国人民享受呢？

一位不幸的母亲，一位绝望的母亲，一位可敬的母亲！她为了孩子要吃肉被抓了，要丢人了，于是她痛不欲生，不断地撞墙，撞地，撞击我们每个人的良心。

面对这样一位母亲，面对这样一个小偷，我们是怨他们无能赚不到钱呢，还是怨猪肉涨得太快，抑或，是怨我们的社会保障没做到家？

但是，为什么一边是吃不起肉的母亲，一边却是一美圆的无限量的自助餐呢？

而一美圆，即使在美国，也只能买 1 个苹果或一个小面包而已。

中国人民举国力而办的奥运，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的食物？作贱自己的人民？

中共政府让外国人吃一美圆的无限量的自助餐，经过中国人民的同意了吗？

1901 年 2 月 14 日清廷颁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又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清廷卖国求荣、丧权辱国之心昭然若揭。

现在的中共政府的“一美圆的无限量的自助餐”，和慈禧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有区别吗？

欲哭无泪！今夜，我无眠！我想，中共政府应该为那个偷肉撞墙的中国母亲忏悔！

中共政府，你应当改悔！

郭泉：民主先声 250：中国，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7 月 22 日我又被刑事传唤）

7 月 22 日上午 11 点左右，我的驴友（户外旅游者对自己的戏称）“大力哥”给我电话，说他的自行车队已经在离南京 27 公里处了，正在休息，很快就要进城了。

“大力哥”是浙江省景宁县地税局稽查科科长，是当地著名的驴友。2005 年 1 月，我穿越浙江十万大山中的最艰险的金牌峡谷“炉西峡”的时候，“大力哥”担任我的向导。“大力哥”临危不惧、吃苦耐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电话里说，他和他的驴友们骑自行车路过南京，我立即表示愿意为他们接风洗尘。下午 3 点半，“大力哥”给我电话，说他们住在了南京雨花台附近的一个路边旅馆。我说，我 6 点前与你们会合。

不料，我 5 点下楼，三名中共警察就堵在了我家楼下。开车把我带到了南京汉中门派出所，出示了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刑事传唤书。刑事传唤书上没写任何案由。讯问 7 小时后，当晚 12 时，开车送我回家。

7 月 23 日上午，我在浙江的另外两位超级驴友来南京看我，一位是 2005 年和我一起砸日本人非法在中国境内修建的明朝倭寇首领王直墓的浙江丽水学院郛伟民老师，他的网名叫“流浪兔”；另一位是 2004 年 3 月 24 日，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七勇士之一的王喜强先生。他的网名叫“黑皮”，但是，就在他们登上钓鱼岛数小时后，就被日本逮捕并移交日本“那霸”警署审查。

“流浪兔”和“黑皮”到南京后给我电话不久，有关部门就给我电话，约我吃饭。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告知，不得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特别是外媒记者。

我知道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但是，这是我的宿命，我视死如归。

最近在听陈国华先生作词、作曲、编曲， 杨培安先生演唱的《爱上你是一个错》，其中有一句歌词“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让我感慨万千。

我想，所有的爱，其实只有两种，一是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另一个是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

“老鼠爱大米”，是一种生理需要，是一种世俗层面的爱。因为老鼠爱的是大米而不是别的。米除了是食物外，在 80 后的话语系统里还是钱的意思。例如我一个 80 后的朋友买了一碗面条，立即用手机拍了照片传到她的 QQ 空间，抱怨说：“18 米，不值哇~!!!”我才知道原来“18 米”是“18 元”的意思。

而“飞蛾扑向火”，却是一种“向死”的追求了。舍弃生命，追逐理想，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爱。

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虽然我知道我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也知道也许我的一切行为最后导致我“壮志未酬身先死”，但是，我愿意做那飞蛾扑向火。因为，我爱你，中国！

陈国华先生是我喜欢的作曲家、词作者。他作词、作曲、编曲的电视剧《雪地里的星星》的主题歌《你知道我爱你》，非常好听。 为水木年华的《完美世界》的作曲，也让我难以忘怀。他作词、作曲、编曲的《風中的羽翼》成为中视歌手献给四川的爱心歌，其中第一段歌词让人感动不已：“黑夜過後太陽就要升起，暴風雨過後也就會天晴，讓我們一起手牽手向前，彩虹就在我們心底”。

其实，《爱上你是一个错》的主旨并不是如歌名一样的带有否定色彩，相反，却是对自己的爱的肯定。

于是，我就在想，我们爱中国、爱民主，经常遭遇别人质问，“你们的爱有结果吗？”我总是回答，没结果我也爱！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并不需要呼应，更不在乎结果。

歌词里最出色的一句，是“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

最早听到这首歌是在一个超市，特别是听到“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这一句，我立即傻傻地站在那里，暗自神伤。感伤，真的是一种美丽。

回想我认识的所有民主人士，的确个个都像痛苦的恋人。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那扑向火的飞蛾。

我们失魂落魄着了魔，我们漫漫长夜守寂寞。

但是面对迷惑、冷漠、伤痛，我们仍然认为爱上民主决不是一个错，我们会为此一直等待下去，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郭泉：民主先声 251：中国新民党获悉中国即将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新民党情报部门获悉全国人大即将在 10 天内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公布。

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两个公约，一个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另外一个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般通称前者为 A 公约，后者为 B 公约。

中国政府已于 1997 年 10 月签署了 A 公约，这一公约在 2001 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在中国正式生效。

1998 年 10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项公约自签署 8 年来一直未获全国人大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制订的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1966 年 12 月 16 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该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公约》包括序言和六个部分，共 53 条。《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

本人系南京大学法学硕士、哲学博士，曾担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法官，现就《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对我国检察权制度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变，进行如下判断：

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检察权制度的改变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66—70 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需报检察院批准。这与公约第九条第三款相违背。

公约第九条第三款：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

《公约》第九条全文如下：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第二：我国的检察院重复追诉权，是对《公约》第十四条的“一事不再理”精神的违反。

《公约》第十四条：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後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而中国的刑诉法司法解释的 117 条第三项：根据刑诉法 162 条第三项即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事实，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该受理。更进一步的是刑诉法 205 条第三款关于检察院有权对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发动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根据刑诉法不但对于证据不足被判无罪的被告人可以再次发动追诉，就算当时定案充分宣布无罪的检察院同样也可以在起诉，而且还没有时限次数的限制，可以无休无止。当事人不能够摆脱国家公权力的无休无止的追究诉累，人身权利很难得以保障。

《公约》第十四条规定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不仅仅要惩罚和控制犯罪，而且应保障人权。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应以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作为代价，同时应兼顾程序的经济性。一事不再理原则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第三、中国目前的检察院的审查批捕程序不当和检察院诉权的滥用

从《公约》角度，中国目前检察院的审查批捕程序不当，应考虑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羁押审查制度，把拘留逮捕以及未决羁押都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已达到对超期羁押现象的控制。

必须制止检察院滥用诉权，不当追诉被告人。法庭中退回补充侦查应当禁止，检察院可以撤诉，但不得基于同一事实再起诉，法院宣告无罪后不得再次以发现新的事实与理由重新起诉，检察院提起再审只能基于有利被告人的考虑。在检察权的性质上我们可以不纠缠于司法权说，行政权说等，但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检察权是一项有强烈功利色彩，滥用倾向的权力，必须加以规制，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检察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不能期待其中立超然的地位，必须受到法院，律师乃至社会公众的监督已成共识。

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变

《公约》涉及的权利既包括实体性权利，也包括程序性权利。程序性权利中涉及刑事诉讼内容的在《公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内容构成了国际社会应当普遍遵循的刑事诉讼基本准则。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列举如下：

第一、司法救济原则

《公约》第二条第(三)项要求缔约国承担下列义务：

(a)确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约确认之权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获有效之救济；

(b)确保由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该国法律制度规定之其他当局裁定上述救济权利

(c)确保这一救济能切实执行。

第二、限制死刑适用原则

《公约》第六条宣告“人人皆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被任意剥夺”，同时规定“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最严重之罪，且依照犯罪时有效并与本公约规定及防止和惩治残害人群罪公约不抵触之法律，不得科处死刑。死刑非依管辖法院终局判决，不得执行”，“受死刑宣告者，有请求特赦或减刑之权”，“未满十八岁之人犯罪，不得判处死刑，怀孕妇女被判死刑，不得执行其刑”。

第三、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原则

《公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待遇或刑罚”。
第四、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原则
《公约》第八条规定除非经管辖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使服强迫或强制之劳役。
第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被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
援引《公约》第八条，中共罪恶的劳教制度必须立即废除。
第五、给予自由被剥夺之人的人道待遇原则
《公约》第十条规定“自由被剥夺之人，应受合于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严之待遇”，“除特殊情形外，被告应与判决有罪之人分别羁押，且应另予其未经判决有罪之身份相称之待遇”，“少年被告应与成年被告分别羁押，并应尽速予以判决”。
第六、司法独立原则
《公约》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一律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判定时，均有权由一个依法设立并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
第七、无罪推定原则
其实《公约》最光辉的思想并不只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是在政治方面。根据《公约》，中国人的政治权利应该包括有：
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必将把中国的专制政治引向民主宪政！我们拭目以待！

郭泉：民主先声 252：谁动了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
最近在阅读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
这个小说生动地阐述了“变是唯一的不变”这一生活真谛。或许每一个人看完的感受都不一样，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追求变化。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就是一个变化史，那么为什么中共却惧怕改变自己呢。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表面上看是怕别人动了中共的奶酪（既得利益），深层次看是中共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从独裁到民主的历史规律。
今天看到了北京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新闻，让我想到很多。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 (记者 赖海隆)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北京警方在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奥林匹克中心区售票点，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维持现场购票秩序。
北京警方宣称，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王智强先生进入临时管制区域拍照，与执勤民警张玉柱先生发生争执，争执中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被王智强先生踢伤。
看到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新闻，我就立即想到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受伤的事情来了。
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信息，是由警方宣布的。由于张先生属于警方人员，所以等同于张先生自己发布。
那么，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受伤或是没有受伤，应该由谁来宣布呢？有苏州网友说杨佳的生殖器被警察打伤，于是警察立即逮捕了这个苏州网友，并宣称杨佳的生殖器没有被警察打伤。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杨佳先生本人的关于他的生殖器是否受伤的任何言论。
其实，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到底有没有受伤，只有男性生殖专科医生的医学检查和功能实验报告才能权威发布。
那么，为什么中国新闻只发布警察提供的消息，而不发布杨佳及其家人提供的向警方索赔的消息呢？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并没有新闻自由的问题了。
新闻自由，应该包括新闻记者采访的自由、新闻单位发布新闻的自由和公民接受采访的自由这三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公民是否有接受采访的自由，别的不说，我说我自己。一周前，国际金融时报（英国）的记者给我电话，请我在 7 月 24 日在南京等待接受采访。不料，我 7 月 22 日就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7 月 23 日又被告知“请不要接受采访”。7 月 24 日下午，我家楼下的中共警察比我家小区的狗都多。最后，国际金融时报的记者无功而返，怏怏不快地坐夜航飞机飞回北京。而我得知，中共政府应许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中国的任何一

个公民。那么，中共政府一方面应许外国记者“两个任何”，另一方面又阻止我接受采访。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新闻记者是否有采访的自由，别的不说，我说我的学生。2001 年，我做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至今已有 7 个年头。从人民日报、CCTV 到我们南京的南京日报，都有我的学生在做记者。他们几乎天天在对我抱怨，说他们采访的新闻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有的还被“改反”了。中宣部和各省市的各种新闻规定让他们每天不知道什么是可以采访的，什么是不可以采访的。有些甚至昨天还是有文件规定可以采访的，今天就又有新的文件规定不可以采访了。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新闻单位是否有发布新闻的自由，我举两个例子：

7 月 24 日 《新京报》报道了曾获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记者刘香成先生。

《新京报》用 C12、C13 和 C15 三个版面，报道了刘香成的“个人史”，其中还有对刘的专访，报道的总标题是“刘香成——走遍世界看中国”（“刘香成：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这组报道是《新京报》“改革开放 30 年见证”专题报道的第 16 期。

《新京报》选了刘香成先生拍摄的四张照片作为配图，其中有一张照片的题目叫《伤者》。《伤者》就刊登在 C15 版的右下角，除了“伤者”这两个字，没有其他文字说明。照片《伤者》上方是刘香成先生拍摄的其他三张关于中国的照片。这是一张我熟悉的照片。照片中的两名伤者正是 19 年前那场血案的受害者。19 年前我就在天安门广场（参见《民主先声》227）。

有情报显示，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这一事件界定为“严重政治事件”，理由是“北京《新京报》24 日在刊登对前美联社驻京记者刘香成的专访中，登出了一张刘香成在 1989 年“六四”事件时拍摄的市民遭戒严部队枪伤，被群众用三轮板车运往医院的相片”。

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下令对此事进行追查，并在市面上全面收回《新京报》，该报电子版刊登出的有关版面和内容也被撤回。估计该报有多名高层、版面编辑及採访的记者会因此事受到牵连。

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再举一个例子，2007 年 6 月初，四川“养花人”陈云飞先生到《成都晚报》广告部付费要求在 6 月 4 日刊出一条“向坚强的六 4 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小广告。当时的广告部小姐问，什么是六四，陈云飞先生说“一个矿难”。于是广告部小姐就收费了。报纸出来后，宣传部门大惊失色，《成都晚报》和陈云飞先生立即遭到调查。经调查，承接这则广告者是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女职员，根本就不知道“六四”为何物。后该报常务副总编辑李少军先生与广告部其它二名编辑被开除。

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综上，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我们怎么能知道到底是谁动了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呢？

最后，我想引用刘香成先生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他说：美国媒体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政党，但是也要服从国家利益。所谓“自由”是指，各种思想和意见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但是有所谓正统、主流的思想，也有相对边缘的思想。说到底，边缘思想是不能打败主流的，你只是可以存在。

而在中国的问题是，只能有中共警察的睾丸，而不能有杨佳的生殖器。

郭泉：民主先声 253：中国新民党（CNDP）反对针对公共设施的恐怖袭击

7 月 21 日早晨 7 点 10 分，昆明市开往眠山 54 路公交车(车牌云 AS2035)由东向西行驶至潘家湾人民西路与西昌路交叉口，公交车停靠在站台时突然发生爆炸。致 2 人死亡，9 人轻伤，车箱两侧玻璃全部破碎，部分座位变形。车体前三分之一损毁比较严重，爆炸时车上明火不多，浓烟很大，有刺鼻气味。

8 点 10 分，另一辆 54 路公交车(车牌为云 AS1822)，由东向西行驶至人民西路与昌源中路交叉路口时爆炸。致 1 人当场死亡，4 人受伤。

经现场勘察，两爆炸事件系针对公共设施的恐怖袭击。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尚未查获。

中国新民党刑事侦察与追踪委员会根据现场勘察图片、中共警方的犯罪调查报告、目击者口述等文件，决议如下：

第一、此两起爆炸应为同一人或同一团伙所为；

第二、爆炸物应属硝胺类炸药；

第三、定时装置应为干冰；

第四、犯罪嫌疑人应锁定为爆破专业人士（例如，爆炸物生产厂家的生产、科研人员、解放军、武警的工兵爆破专业军士等）

爆炸物和爆炸过程分析：

爆炸物不是简单的矿山炸弹，如果用雷管引爆的话，应该找到相应的碎片物质。引爆雷管的声音和状态也会被车上的人很容易发现，所以不是雷管引爆。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把硝胺装在一个很小的钢制罐内，并对硝胺进行过深加工（例如加易于常温引爆的磷）。

硝胺炸弹外面用干冰保持温度，并用塑料纸密封干冰。

犯罪嫌疑人将硝胺炸弹带上车后，立即揭开密封干冰的塑料纸，干冰开始挥发。

犯罪嫌疑人将炸药放置在座位下，在下一站下车。

干冰挥发完以后，温度上升，磷自燃，引爆硝胺炸弹。

在爆炸的中心应该可以检测到大量的碳、硝化合物。

用 TH1 试剂就可以快速知道是硝类炸弹。

色谱分析就可以知道炸弹里有没有加磷。

从现场图片可以简单的估算出爆炸当量，爆炸中心点的最高温度不超过 1000 度。

犯罪嫌疑人显然没有在炸弹里加镁、铝粉，所以没有大量失明者的报道。

中国新民党（CNDP）党建党务大纲（参见《民主先声》200）第九条明确规定：中国新民党反对实施恐怖袭击。真正让执政党恐惧的不是恐怖袭击，而是民心向背。中国新民党的国内外党员都要有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的精神。并肩作战，奋力工作，不计报酬，争取民心，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这才是让独夫最感到恐怖的真实有效的“袭击”。

中国新民党（CNDP）反对一切针对公共设施的恐怖袭击。

郭泉：民主先声 254：中国新民党（CNDP）反对目前中共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

目前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中共在政治上推行专制主义，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

中共在政治上推行专制主义的问题，在《民主先声》的其他文章中多有表述，本篇着重批判中共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新民党情报部门获悉，7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建议应建立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委员称，现在对国企反映比较多的是管理者和职工年薪差距太大，大者高达数百倍。

中国新民党劳工部的调查显示，目前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

不久前，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企业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彭炜因受贿、贪污被查处。据调查，公司投产当年即亏损 1 亿多元，而彭炜从公司筹建到投产，却以各种名目领取奖金、福利 113 万多元。这暴露了国企高管薪酬与经营绩效脱节的问题。据统计，国企高管年薪高低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仅为 0.4。相当多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关，不少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利润下降时还在上升。

部分上市国有保险公司公告显示，其“一把手”薪酬从上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副总一般在 80 万元以上，经理一级收入在 30 万至 40 万元。

国企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大、高管自定薪酬、薪酬与绩效脱节现象，已经引起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两个日渐对立的阶级开始出现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

调查显示，2002 年国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是 12.7 倍，2003 年达到 13.6 倍，而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收入差距最大的地产行业达到 27.6 倍。2007 年，这一差距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50 倍。

2007 年 5 月 28 日公布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对 1391 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同时列出了从董事长、总经理到董秘的平均年薪，并统计了 2006 年 902 家国有企业薪酬最高的高管的平均年薪，达到了 344887 元，而 463 家民营企业的这一数字为 316803 元。这是该调查进行 8 年来，国企高管年薪首次超越民企。 8 家 A 股上市银行 2006 年年报显示，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法兰克·纽曼以 995 万元年收入成为银行业高管首富，收入“最低”的则是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年薪为 101.4 万元。

2006 年，在证券市场“造富”的同时，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也一路高歌猛进。在已披露 2006 年年报的 1254 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年度薪酬共计达 26.17 亿元，高管个人平均年薪为 16.28 万元；比 2005 年高管个人年薪平均值 13.8 万元增长了 17.97%。其中，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以个人薪酬 1710.275 万元高居沪深两市之首。

在2006年净利润增长65.23%的背景下，中行高管们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全年中行共向高级管理人员支付3471.33万元薪酬。中行年报显示，21名高管共领取了3211.33万元的薪水，平均每人获得152.90万元。 此外，中行还为其中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支付了260万元的社会保险、补充保险及福利、住房公积金等。在高管当中，前任首席风险官LonnieDounn的收入达到791.5785万元，是这21名高管中收入最高的。中行董事长肖钢和副董事长兼行长李礼辉两人的收入分别为152.37万及152.86万元。年报显示，在中行29名管理人员当中，8名非执行董事没有从中行领取薪水。除了肖钢和李礼辉外，中行的6位副行长分别获得118万到143万元不等的年酬，两名监事各有87万元，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分获14万至60万元。

以上是2006年和2007年的状况，现在时值2008年，高管的工资又翻了好几番。

例如，中国新民党从2008年7月17日召开的中国平安本年度第二次股东大会上获悉，平安老总马明哲先生2006年的税后薪酬为1338万元，2007年的年薪是6600万元。

那么，我们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收入情况呢？

中国新民党从2008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获悉，2008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100元/月，其中，城镇国有经济单位2300元/月；城镇集体经济单位1200元/月；城镇其他经济类型单位2100元/月。

改革三十年来，中共使得中国一边是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中国人民,一边是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新权贵。与亲权贵站在一边的，还有无数的中共贪官污吏。

这就是与人民为敌的中共经济政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新民党（CNDP）反对目前中共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中国新民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

1、通过积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知识文化水平，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

2、实行民主政治，工农群众控制议会的多数。逐步从企业主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转成职工集体的股份，逐步使职工集体成为企业的控股集团，使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而不是相反。

3、实行高额累进制和高福利制。企业家可以合理地获得所提供资金的增殖和风险补偿。他们提供的经营管理服务，也可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但高收入者可能要缴纳高达70%的所得税，遗产税应高达85%。

4、对低收入者有各种各样涵盖生老病死的福利补贴，从小学到高中免交学费（12年义务教育）。

5、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允许有生成特权高官和富豪大款的土壤。

6、全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实现共同富裕，和谐相处。

7、有强大的国防军，但奉行的是和平宽容与世无争的国家政策。

8、全国上下，奉公守法、敬业爱岗、行善积德、互助友爱，与天、与地、与人、与世无争。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郭泉：民主先声255：以剥夺中国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将在2008年遭遇重大挫折

江湖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是说江湖恩怨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话对中共也适用。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快六十年了，这就是江湖。

有江湖就有恩怨。中共出来混了60年，恩恩怨怨，也总是要还的！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胡锦涛先生虽然是说官话的行家里手，但是，他说的这话却不是官话，他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改革开放30年，本该是人民得福利的30年，不料却成了中共贪腐的30年。“鸡地屁”一涨再涨，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其实更高昂的成本是道德成本。

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鸡地屁（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和心理崩溃。

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跟中国的鸡地屁（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2008年，股市崩溃、房地产低迷，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虽然鸡地屁（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 令人颓废的股市、民怨沸

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

30 年来，鸡地屁（GDP）一直是中共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89 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 89 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

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 GDP 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 GDP 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

中共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外的特殊利益集团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 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 80%的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 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 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 40 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 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 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 1978 年的 2.7 倍扩大至 2003 年的 7.4 倍，25 年中扩大了 4.7 倍。这还是很保守的数据，真实数据我们不得而知。

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

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 1990 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

以剥夺中国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将在 2008 年遭遇重大挫折。

中共，请记得这句话，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备注：本文观点和数字参考袁剑先生的文章《大裂变来了？（之一）》（《南风窗》2008 年 7 月第一期）

郭泉：民主先声 256：奥运前我还掉了 18 万借款，我的手可以再次戴上手铐了

因为帮我妈妈置换一套住房，急需 18 万现款。消息发出后，4 天之内，国内外各界支持我的民主思想的网友借款 18 万元。（参见《民主先声》246）

借款的时间、朋友姓名和借款金额分别是：

7 月 5 日，广东潮州的曾先生借款 5 万。

7 月 6 日，浙江省温岭市李先生借款 1 万元；云南省玉溪市杨先生借款 1 万元；河南南阳刘先生借款 3000 元 ；陕西省咸阳彭先生借款 2000 元。

7 月 7 日，重庆市李先生借款 1 万元；复转军人代表韩先生借款 3 万；经租房代表蒋先生借款 15000 元。

7 月 8 日，加拿大的“十方”先生借款 7000 加币（折合人民币 46378 元）；网友“可爱的小撒旦”（参见《民主先声》231）借款 3000 元。

虽然所有的朋友都提出“三不要”（不要借条、不要利息、不要限期），但是 7 月 9 日，我还是快递出了借条（10 月 1 日前还款，年利息 7 厘）。

除河南南阳刘先生的地址不详，和“可爱的小撒旦”、加拿大“十方”兄弟、复转军人代表韩先生、经租房代表蒋先生不需要借条外，其余我都一一快递了借条，另外随信还送上我签名的专著《自由与文学》以作留念。

7 月 10 日，我办妥首付和余款的房贷之后，立即着手销售我妈的原有住房。

7 月 20 日，成功销出，成交价 120 万元。对方支付定金 1 万元。

7 月 22 日，对方首付给我房款 30 万元。

7 月 23 日，我与上述 10 位同志联系开始还款，除加拿大的“十方”兄弟联系不上外，所有的朋友都对我这么快进行还款表示惊奇。

在我表示感谢之后，最让我感动的是军转干部代表，他对我说：“谈不上谢。你能为我们直言，全国的复转军人都感谢你。你说的不错，这次各方借款，完全建立在对你的民主理念的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借款计划，足以说明了民心所向。说实话，对借这笔款子给你，我们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我们完全相信你的为人和信用，但不能保证在你还款之前当局不把你抓起来。”

我回答：“我安排好了如果我被抓，有人会主动和你联系还款的。”我还说：“我做事情,后手一般都要安排 3 手以上，确保任何事情都万无一失。”

他说：“知道你做事的风格。但我不可能到班房里跟你要钱，要去也是去看你。更不可能向你家人提的。”

此时，我真的很感动。我说：“我刚才说了，会有人主动和你联系的。我知道你们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们是军人，面子、义气大于经济。我对军人很了解，因为我是军人后代。”

他说：“你先还别人的钱，我们复转军人不着急的。你的这次借钱，绝对不是钱的事情，而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7 月 25 日，我在还完了其他朋友的借款后（加拿大的“十方”一直联系不上），给复转军人代表的卡上打了 3 万。次日，他给我信息：“还款三万，已于 2008 年 7 月 26 日全部查收。请放心!”

由于我母亲购买的新住房需要 2010 年才建成交付使用，而我妈现住房已经销售，并且购买我妈现房的“朱经理”急于迁入，所以我立即帮我妈租赁房屋过渡。

7 月 30 日，我在离我妈购买的新住房不远的地方选中了一套三房两厅的毛坯房，月租金 1000 元。这是个十楼的景观房。我妈妈看后很满意。签约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妈对我说：“你有没有注意，这次事情都和‘十’有关系。7 月 10 日首付，7 月 20 日我们的房子卖掉，7 月 30 日我们租到满意的房子。还有，我们 2010 年建成交付的新房子是十楼 1001，而今天承租的房子是十楼 1005。”

我想了一下，笑着说：“这就叫十全十美呀”。其实我心里想的却不只是这些。

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中华民国的国庆是 10 月 10 日，世称“双十节”。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日，源起于 1911 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 2000 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

中国新民党诞生在南京，其核心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制度）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五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考试）、“三政路线”（军政、训政、宪政）完全契合。

我想这也许是天意。六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五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考试）、“三政路线”（军政、训政、宪政），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新民党将以“民主社会主义”（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制度）的方式来实现国父的遗愿。

由于我帮我妈租的是毛坯房，今天（8 月 1 日），我到国美电器、五洲装饰和苏宁百货购买了天然气灶具、抽油烟机、厨房橱柜、厨房洗盆（柜）、热水器、盥洗盆（柜）、坐便器等。

忙完这些，下午 1 点多，就在我路过奥体中心东门的时候，中共警察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知道一定是关于奥运的事情。我停下车，看着雨中的奥体中心东门，听着我的手机铃声。我没接。然后，我给他短信：我对京奥没兴趣，我在帮我妈购买厨房卫生间里的东西。

中共警察给我回信：忙完以后再联系，我们见面谈谈。

我立即回信：不见面！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反对的是独裁体制，和你们没关系。

中共警察沉默了。但是我知道他们从来都没有沉默过。我也知道他们在思考什么。

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我都不在乎。

2008 年 5 月 18 日到 28 日，我因为组织各高校、科研单位的 30 多位教授撰文谴责中共当局掌握大量地震预警资料却没有发布，遭遇中共传唤。后我拒绝供出其他教授的名单，而被恼羞成怒的中共警察决定入狱 10 天。

那次，我的手上戴过手铐，我不在乎！

这次，别说手铐了，就是再戴上脚镣，我也不会在乎了。

奥运前我还掉了 18 万借款，我没有让大家失望和亏损。其实我也一直担心在我还款之前再次入狱。现在，我终于放下心来了。我的手，可以再次戴上手铐了。

这就是我！因为我的名字叫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57：悼念索尔仁尼琴并敦请中共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开禁

昨天（8 月 3 日），我整个白天都在帮我母亲整理书籍，晚上搬家公司的一辆厢式车搬运了三趟，直到今天（8 月 4 日）凌晨 3 点半才忙完回家洗澡睡觉。早上送儿子去上围棋课，一回到家打开电脑，浙江绍兴的网友“像少年一样飞驰”给我信息：“索尔仁尼琴先生逝世了”。

我无奈哀叹：“又一个正直的反专制战士在还没有被中国人广为流传之前就去世了。”

我在 1999 年博士毕业后，到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了 2 年博士后，期间研究过前苏联文学，特别是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对索尔仁尼琴先生非常熟悉。

阶段性成果论文《 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 03 期 上。文章的内容摘要如下：

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百花文学”都属于“社会批判文学”。“解冻文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百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百花文学”仿效“解冻文学”的创作路数、文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由于不同的国内形势 ,“解冻文学”得以发展，而“百花文学”却被迫中断。

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自由与文学》（专著，2001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中有一小节文字对索尔仁尼琴先生的《古拉格群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进行了分析研究。

2004 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李红梅女士在我的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前苏联解冻文学研究》，并于同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8 月 3 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 89 岁。

索尔仁尼琴于 1918 年 12 月 11 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 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 年 2 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 8 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 年解除流放，1957 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 年 11 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 1963 年连续发表了 3 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3 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 1965 年 3 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另外两篇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也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

1967 年 5 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 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9 年 11 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

1970 年，瑞典皇家学院 “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并禁止他前往领奖。

1971 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 年 8 月》。1973 年 12 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 3 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 1918 年到 1956 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 年 2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 10 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 4 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 年他迁往美国。

1989 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 1969 年 11 月 5 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74 年 2 月 12 日的命令。

1994 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索尔仁尼琴先生虽然一生坎坷，但是，最后却受到前苏联和俄罗斯人民的崇高赞礼。但是，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国江西赣州人高行健先生却没有这么美妙。

高行健先生 1940 出生于江西赣州。2000 年 10 月 12 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 50 年 10 部戏剧”。他在 1981 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引起了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争论。

他的剧作集《彼岸》（The Other Shore）在 1986 年在中共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中共当局禁演，翌年他即离开中国大陆赴法国，隔年再以“大陆异议作家”、“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市郊的巴纽里，加入法国国籍。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都只能在海外出版。

2000 年秋学期，当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三十年（1949-1979）中国左倾文艺路线史》的教学工作。2000 年 10 月 13 日，高行健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我得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了一个申明，与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的思维完全一样。

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当时，我把这段话读给大学生听，所有的人都笑出了眼泪。

没几天，我就接到通知，不得在课堂上讲授高行健先生的一切作品以及与高行健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切相关信息。这个通知被秘密发往全中国所有大学、中学和文史哲研究单位。

最后，我想引用高行健先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里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民主先声》。

高行健先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里说：“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表示中国新民党沉痛悼念索尔仁尼琴先生，另一个目的是中国新民党敦请中共当局立即撤消对高行健先生的一切“不公正的、非人道”的决定 ，邀请高行健先生回归中国，正式出版发行高行健先生的所有文章。

郭泉：民主先声 258：革命就是阶级复仇

《民主先声》写到 258，这篇的篇名是最短的。论证是繁琐的，但是结论却往往是掷地有声的最简捷的话语。

革命就是阶级复仇，这是我的一个学生说的。她才 20 岁，但是，却在一次和中共警察的对话中说出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结论。这个女孩子叫阿花，她在 2007 年秋季学期放假前，对前来学校找学生调查我的中共警察说：

"我说完最后一句话，你们把我抓走我也无所谓。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郭老师认为民主就是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我要再加上一句话，革命，就是阶级复仇。你们等着。"（参见《民主先声》105）

2007 年，阿花要警察等着，果然 2008 年中共警察等到了。

2008 年 6 月 28 号，贵州瓮安至少几万人围攻了当地党、政和公安机关，发泄他们长期积压的不满和愤怒。贵州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先是说瓮安事件是坏人和黑恶势力挑动的结果，后来又半遮半掩地承认是当地党政官员多年来滥用公安暴力、欺压民众导致的必然结果。

7 月 1 日，杨佳先生持刀进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死 6 名警官，杀伤 5 名警官。

7 月 11 日至 13 日，浙江台州市玉环县连续三天爆发外地民工与派出所公安的冲突事件，派出所逮捕抗议打人的民工，导致成千名民工示威围攻派出所。

8 月 4 日，我又得到消息，新疆一个城市的 16 名警察被两名群众杀死，这两名群众还同时杀伤其他 16 名警察。

原以为杨佳先生是希腊战神阿喀琉斯，没想到中国人个个都是复仇之神阿拉斯托。

在瓮安事件之后被免职的当地公安局局长坦率地承认："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公安局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中国各地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官员长期作恶多端，造成大量社会矛盾、社会不满和愤怒大量积压。

自从中共在 1970 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民众的群体抗议事件数量近年来呈现爆炸性增长，每年数以万计。

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增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和独裁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公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制，人民的苦难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判，除此之外，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增强、民主意识提升也都是重要原因。

但是，归根结底，中国的一切社会动荡源自专制制度。

那么，这个专制制度到底造成了什么，导致了人民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内心世界呢？

我把以上的文字发给在线的朋友看，征集修改意见。没忘了在后面写上"写作中，待续"。

不料，才发出去几分钟，就收到无数的回复。其中一个叫"含啸"的网友给我的回复让我印象深刻。他（她）说："这样的社会，让人不得不成为一名愤怒青年，满中国都是民不聊生的事件，让人有股杀人的冲动，现在满中国都是中共败类，走到哪都能杀个痛快，NND！"

从以上事件和众多网友的回复，以及我多年的在各行业的维权经验中，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阶级意识"的提升。而"专制制度"恰恰就是导致"阶级意识"提升，最终形成"阶级复仇"、"阶级斗争"的直接原因。

下面，我们来谈谈阶级意识的问题。

在历史上，剥削阶级是如何对劳动人民进行统治的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剥削阶级掌握着经济力量，但劳动人民人多势众，难道不会剥夺这些剥夺者吗？所以剥削阶级需要用武力来制服被压迫者。

不过，剥削者有武装，劳动人民也可以武装自己。人民的武装就是类似于杨佳先生的杀猪刀，虽然不起眼，但是却非常有效。如果满街都是杨佳先生的杀猪刀，那么所有阶级敌人就如过街老鼠了。现在的中国，随时随地在都复制着杨佳先生的仇恨，也在随时随地复制着杨佳先生的杀猪刀。

再说，剥削阶级的武力统治也还是靠着被压迫者的一部分来实施的。所以经济的、武力的一手总是以少制多，总是不可靠的。

因此，武的一手靠不住的时候，文的一手就发挥了重大作用。换句话说，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不仅是指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指在文化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一句话，剥削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统治。

这个文的一手，就是通过传播和灌输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让劳动人民从内心里接受剥削阶级的统治，服从所谓"命运"的安排，把劳动人民的反抗只局限在小恩小惠的争夺，局限在改变个人命运的努力上。统治阶级幻想通

过这两手统治的实施，保证统治阶级的地位不被推翻。

但是，2008 年发生的人民抗暴事件，足以说明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中国新民党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条，人民当家作主。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干民主社会主义，干"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行民主政治，工农群众控制议会的多数。逐步从企业主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转成职工集体的股份，逐步使职工集体成为企业的控股集团，使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而不是相反。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允许有生成特权高官和富豪大款的土壤。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消灭阶级复仇，实现共同富裕。

郭泉：民主先声 259：中国新民党反对中共蜕化变质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政党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中国新民党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发形成的要求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沦为代表权贵资产者的独裁资本主义政党。中国新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这条不归路上继续堕落下去。

中国新民党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条，人民当家作主。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干民主社会主义，干"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

中国新民党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行民主政治，工农群众控制议会的多数。逐步从企业主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转成职工集体的股份，逐步使职工集体成为企业的控股集团，使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而不是相反。

中国新民党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允许有生成特权高官和富豪大款的土壤。

中国新民党不愿意号召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宣战，中国新民党希望中国共产党回到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里来。现在，全世界所有持有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组成了联盟，即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英文缩写 SI）。

目前，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 168 个，其中有 50 多个成员党在 50 个国家执政，社会党国际（SI）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中国新民党诚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从残害人民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悬崖勒马，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中国新民党一同加盟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中国新民党认为，惟有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消灭阶级仇恨，从而遏止阶级斗争，平息社会动荡，最终达成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蜕化变质成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政党？

原本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党，而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看 1944 年 2 月 2 日的中共《新华日报》社论：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但是，当今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现了比封建帝制还独裁的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实现了比西方民主资本主义还要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

我的祖父和外公，以及我家远近各房亲戚数十人，在 60 年前参加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祖父、外公和亲戚牺牲十多人。这就是我一直反对有人说 1949 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民主"来欺骗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真实原因。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前是真心地代表人民、为人民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变质了，变成了反人民的权贵资本家集团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以后又是怎么堕落成权贵资本主义党的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现了比封建帝制还独裁的一党专政体制。这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们一面对外宣称是"人民政府"，但是背地里却是"中共政府"。

其次，当中共政府把独裁的一党专制的思维用于国民经济管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现象。

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际受益人是少数权贵的时候，理论层面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成为实实在在的“权贵资本主义”。

于是，中共的权贵资本家与广大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和非主流知识分子）就形成了两大敌对的阶级。

近十年来，中国每年发生的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就是这两大敌对阶级对抗的确证。

中国新民党不愿意看到阶级斗争最终爆发成人民战争，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改弦更张、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

中国新民党的具体主张是：

1、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

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

3、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

4、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

5、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

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

8、排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郭泉：民主先声 260：狱中札记之三：苏乞儿丐帮与郭泉新民党及皇帝与中共之关系

2008 年 5 月 18 日到 28 日，我因为组织各高校、科研单位的 30 多位教授撰文谴责中共当局掌握大量地震预警资料却没有发布，遭遇中共刑事传唤 24 小时。后我拒绝供出其他教授的名单，而被恼羞成怒的中共警察决定入狱 10 天。

10 天里每天都有中共警察来提审。审讯期间，我戴着手铐，穿着号服。

我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我的“号服”上的编号是 70105。我的“号房”是 7 区 2 号。

10 天里，除了接受中共警察的审讯外，就是吃饭、睡觉、打坐。还没怎么感觉，就关了 10 天。

5 月 27 日下午，中共警察最后一次提审我。中共警察问我：“怎么才能让你不搞政治？”

我回答：“如果中共解决了我的《民主先声》里提到的所有维权案件，等中共实现民主、搞多党竞选了，我就安心做教授去了，不搞政治了。”

这个中共警察听我这么说，表情很沮丧。这个沮丧的表情，在我出狱后，他找我谈话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他很沮丧地对我说：“郭教授，你的民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对的，这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5 月 27 日下午，当我说“如果中共解决了我的《民主先声》里提到的所有维权案件，等中共实现民主、搞多党竞选了，我就安心做教授去了，不搞政治”的时候，其实我脑海里出现的是苏乞儿和清朝皇帝的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来自周星驰先生的一部经典电影《苏乞儿》。苏哈察尔灿（周星驰饰）本是广州督军之子，但在考武状元时，因受人陷害而被皇上责罚沦为乞丐。此时，天理教太乙真人入主朝廷、到处迫害丐帮。原来上一代丐帮四大长老杀了大理教前任教主，而丐帮帮主也阵亡，打狗棒法失传。加上丐帮四分五裂，群龙无首，于是传功长老选中苏哈察尔灿为接班人，传以打狗棒法要诀。苏哈察尔灿学艺成功，成为新任帮主。苏哈察尔灿团结各地丐帮会员自强，对抗天理教。太乙真人想先下手为强，行刺皇帝，拥兵自立，但消息泄漏，传到苏哈察尔灿耳中。皇上狩猎之时，大理教发难。幸好苏哈察尔灿及时赶到，救了皇帝，皇帝欲恢复苏哈察尔灿官职。苏哈察尔灿做惯了乞儿，懒得做官，只欲皇帝治好国家，最后皇帝无以为报，赠了一个御赐的乞儿钵给苏乞儿，钵底写“奉旨乞食”。

抄录皇帝和苏哈察尔灿的最后一段对话：

皇帝：阿灿

苏乞儿：嗯

皇帝：你的丐帮真厉害。

苏乞儿：还可以。

皇帝：有多少人？

苏乞儿：大概几千万吧。

皇帝（大惊失色）：啊，这么多！朕的军队加起来才几百万啊！

苏乞儿：哦，你也有不少人马啊。

皇帝（狡诈凶狠）：你要解散丐帮！否则朕……

苏乞儿：皇上，我的丐帮人数其实是由你决定的啦

皇帝（迷惑）：此话怎讲？

苏乞儿：如果你安边抚民、国泰民安，个个过上体面的日子，哪有什么人还想做乞丐呢？

皇帝（想了一下后，若有所悟）：朕知道了，朕即刻降税赈灾，大赦天下保民平安！

其实，这个皇帝是很聪明的。他"即刻降税赈灾，大赦天下保民平安"，于是就国泰民安，丐帮哪里还有市场呢？

同理，如果中共解决了我的《民主先声》里提到的所有维权案件，于是就国泰民安，我们中国新民党哪里还有市场呢？

所以，社会动荡的根源，不在民间，而在执政党。

如果执政党清正廉洁、还权于民，人民安居乐业，请问哪位群众想要搞恐怖袭击呢？

如果执政党买官鬻爵、欺压人民，百姓民不聊生，请问哪位群众不想搞恐怖袭击呢？

今天是 8 月 7 日，明天就是 8 月 8 日北京奥运开幕式了。

今天我到南京的苏宁百货批发市场购买便捷衣橱。因为我要购买三个便捷衣橱，老板就去四楼仓库取。我站到楼梯口吸烟。

没想到楼梯口贴了密密麻麻的《市民如何面对恐怖袭击》。这个宣传材料分为三大张，39 个小节。列举了可能遭遇恐怖袭击的 30 多个公共设施的防范知识。

我很认真地读完了这个宣传材料。我觉得中共其实并不了解恐怖袭击。至少中共不知道防范恐怖袭击的最有效途径不是在恐怖袭击的现场制服犯罪嫌疑人，而是消灭恐怖袭击的起因。

古代的皇帝都知道"即刻降税赈灾，大赦天下保民平安"，中共怎么会不知道呢？

郭泉：民主先声 261：奥运与中共：不文、不行、不忠、不信

8 月 8 日的奥运会开幕式终于结束了。我想，每个人都有喜欢的奥运会体育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奥运会开幕式的。

不过，一党独裁体制下的政客们都喜欢奥运会开幕式，因为他们认为搞开幕式就是搞政治。

体育，人人都喜欢，但是政治就不是人人都喜欢了，何况是一党政治呢。于是就有很多朋友对奥运会开幕式持"避孕（运）"态度。

昨晚（8 月 8 日）吃完晚饭，20 时我打开电脑，家人打开电视。我开始了每日的网络冲浪和文字整理，电视里奥运会开幕式的声音不时传来。哈，我这算是"半避孕"吧。

我喜欢的运动是登山、攀岩，可惜奥运会没有这个项目。昨晚一个晚上都在和天南海北的"驴友"们讨论我们的下一个征服山峰。2005 年 8 月，我攀登过川藏地区的贡嘎山。

20 点 20 分，"三千孔子弟子"出场了。我儿子喊"爸爸的汉服！爸爸的汉服！"

我一看，演员果然穿的是汉服。因为我是汉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经常带孩子参加汉服活动，春节我还和孩子穿汉服上街玩，所以孩子一眼就看出是汉服了。

接着，听到场内礼乐司仪反复吟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不禁笑起来。历史上众叛亲离的执政者都喜欢说这句话；同时，历史上所有阿谀奉承的臣子都喜欢对众叛亲离的执政者说这句话。

其实，"皆兄弟也"是必须有前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语出《论语·颜渊》里的子夏之口，而非孔子所说。原文如下：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从子夏回答司马牛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前提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中共残酷虐待中国人民、欺瞒世界人民，这简直就是"不敬而失，无恭非礼"，怎么可能"四海之内皆兄弟"呢？

苍天在上，怎容中共欺瞒天下？

随后，我又听到场内礼乐司仪反复吟诵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这又让我忍俊不止了。如果中国能按照孔子的教学理念对中国人民进行"文行忠信"的教学，中国和中国人民也就不会这么苦难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语出《论语·述而》。孔子一生反对"学在官府"的官府教育制度，首创私学，开门授学。突破了执政者对文化知识的垄断，开创了民间知识分子派别林立的新时代。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多重敏感，毅然肩负起重建社会人文秩序的重任。

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一个十分周全的系统。他设立了"文行忠信"四种科目，又严立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为学、立身、处世的大宗旨（世称"八目"）。具体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达到"智、仁、勇"三德。孔子的教学又分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个阶段。

那么，什么是"文行忠信"呢？

我们先看"文"。

孔门四学的"文"并不是现在所谓的单科"文学"，而是泛指涵盖文史哲法的大综合文科。孔门四学里的"文"，完全应该理解为"中国文化"。

那么，中共尊重中国文化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中共的工作目标。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著名作家老舍在破四旧中被小将们用棍棒殴打，后投湖自尽。其妻坚持认为老舍先生是被杀弃尸于湖中的。因为，尸体过于干净。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女人的化妆品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那么现在中共是不是改弦更张了呢？

2006年7月，我在南京开办免费的私学"金陵国学馆"，由我本人亲自教授四书五经，受到南京人民的好评。8月1日，南京的《金陵晚报》做了整版的专题报道。不料，当天，所有新闻单位都接到了中共宣传部的"通知"，要求任何单位不得转载这篇报道，而采访我的金陵晚报记者受到警告和威胁。

我们再看"行"。

论语里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语，可见，孔门认为"行"更重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这里的行不是"走路"，而是"践行良好德行"的意思。

那么，中共有"行"吗？

中共建党以来，劣迹斑斑。以欺瞒之术，行颠覆之事。49年以后，再施暴行，虐国人于水深火热，害士林致精神全无。

从 "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文革"；从非法镇压89民主运动到非法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宗教团体，再到奥运前对我和其他民主人士的打压、逮捕、拘留、软禁，请问，中共这修的是什么"行"呢?

惟独"改革开放三十年"提升了国民经济，但是中共还造成了让人憎恨的两极分化，这又是修的什么"行"呢？

下面我们要看看"忠"了。

《论语》里记载了曾子的一句话，"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忠，就是“为人谋”的时候必须彻底放下自己，为“人”服务。

那么，中共“忠”吗？

中共宣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人民谋”，但是中共是否忠于人民呢？

相反，中共却要人民无限忠于党（中共）。

看看我帮助的那些维权群体就知道，中共是否在为他们谋？

那么，中共执政到底谋的是什么？

是人民的利益吗？

最后，我们来看看“信”。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那么，中共“信”吗？

1941 年 10 月 28 日的 中共《解放日报》社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4 年 2 月 2 日的中共《新华日报》社论：“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但是，我在 2007 年 11 月，把以上社论的主体思想上书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却立即遭到抄家、传唤、随后我被剥夺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的教学资格，取消副教授津贴，下放资料室。

中共这是什么“信”呢？

郭泉：民主先声 262：昨天楼下警察“突然收队”与“收听敌台”罪的破产

昨天（8 月 10 日）下午 4 点，我接到长期在负责警戒我家状况的朋友的线报。说我家楼下突然增加了很多警察。

这些负责警戒的朋友是住在我家周围五幢 15 层以上的大楼里的网友，他们的凉台可以看到我家和我家楼下的全貌。

他们购买了高倍望远镜架在他们的凉台上，其中还有一个朋友是一台天文望远镜。他们每天分时段警戒。

有一次，我接到他们中的一个电话，“郭老师，快去厨房，锅濮了！”

我立即冲到厨房，果然煮的稀饭开锅了。我向周围望去，万家灯火，实在不知道他们在哪个点上注视着我。

这一次，他们来信息说：电梯口有 3 个便衣堵着。十楼半的楼梯拐角处也站有两名便衣警察。小区保安也增员了。小区门外有多辆不明身份的车辆和分散游荡的人。

我接到这些线报后，知道我的“时刻”到了。我立即向所有我的在线好友发送了消息：

我是南京的郭泉，我家楼下都是警察，他们在等待我出门后立即逮捕我，我在收拾入狱的衣服，马上出门接受逮捕。请转发各新闻单位，谢谢。郭泉手机：13151423196

发出信息没几秒钟，海外媒体立即给我电话询问情况，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等。

我简短介绍了情况，说大队警察到我家楼下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我接受中国新民党的邀请出任代主席，二是我向胡锦涛先生提出终结独裁、实现民主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模式；三是我 8 月 9 日写了一篇民主先声《奥运与中共：不文、不行、不忠、不信》（参见《民主先声 261》）

随后，我请大家在半小时后给我电话，如果关机或没人接听我就可以发布我被抓捕的消息了，如果 24 小时关机或没人接听，就可以发布我被刑事拘留了。

我整理好两条长裤、两件 T 恤、两条内裤、两双袜子，牙刷、牙膏。因为我时常感觉胃不舒服，又带了一盒“胃乐宁”。再带上 3000 元钱。上次入狱 10 天，我花了 30 元钱，这次我想也许 100 天都不止了。

这时我妹妹给我信息，说爸爸在等我了，在国瑞酒店太湖厅。我爸爸的生日是 7 月 28 日，那天他不舒服，我们就约好改日庆祝。于是就改到了 8 月 10 日。我回妹妹信息说，楼下都是警察，不知道我能不能赶到为爸爸庆贺生日。半小时后我关机或没人接电话，你就代表我陪爸爸喝酒吧。

五点半，我和妻子、孩子出门。出门前，我对她说："对不起，这次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你带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希望一切平安，上帝保佑中国人民！"

电梯下到一楼，我以为会象 7 月 22 日那次三名中共警察就堵在了我家楼下的电梯口。电梯门一开，我就被请到了警车上。警察恨不得能把警车开到我家电梯口，这样就能让我一出电梯就直接上警车了。

电梯门开了，但是却没有警察在电梯口。两个小区保安紧张地看着我，而平时这个位置上只有一个保安。我向周围望去，我发现所有的可疑人员都离我远远的站着。与我一侧，在至少 5 个点上都有人员。街对面，还有 3 个点有人员。可疑车辆有汽车、摩托车、电动车一应俱全。

我不禁想起 2006 年 8 月 15 日那天发生的很搞笑的事情了。由于我长期从事民间反日、保钓（保卫钓鱼岛）活动，每逢 77、815、93、918、1213 等涉日敏感日，我家楼下都有大队人马监视、跟踪。

那天中午我要出门到随园大厦办事，结果 10 分钟都没打到车，天特热。我实在不想再打车了。我就向路对面的监视我的两名便衣警察走过去，指着他们的摩托车说，"我有事情要出门，请送我到随园大厦。"

那两名便衣警察面面相觑，十分狼狈。其中一名警察慌忙掏出手机，向我表示，他要向上级汇报。我说好的。那情形真是笑死人。我估计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让他回味无穷的。

我和妻子孩子在小区口打到出租车后，我在车上回头一看，所有可疑点上的人员，都开始移动了。

至此，我知道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让中共警察"突然收队"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发现他们的企图之后，立即与外界联系，外媒立即行动采访并播发消息。

同时，"突然收队"还说明了中共对我还没有形成决议。

我想，对中国新民党，对我本人，中共还没有形成决议，这是一个好现象。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说的好："中国的变革终有一天会到来的。所有的人都会看到，那些勇于直言不讳的人士、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士，对中国的未来决不是一个威胁；正是这些人，将让中国成为 21 世纪的伟大强国。"

中共对我不作出决议是好的，因为如果决意逮捕我的话，至少说明了中共不会走"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了。

另外，我也知道中共虽然对外媒体有忌惮，但是如果对我形成决议后，中共才不会在乎"敌台"呢？

说到"敌台"，最近有个好消息。

中共在奥运前，解禁了以下外媒网站，而这些媒体以前都被中共称为"敌台"。

西方媒体：

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

美国之音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

华尔街日报 http://chinese.wsj.com/gb/index.asp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金融时报中文 http://www.ftchinese.com/sc/index.jsp

路透社 http://cn.reuters.com/

香港媒体：

明报新闻网 http://www.mingpaonews.com/

亚洲时报 http://www.atchinese.com/

明报月刊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main.cfm

南华早报（英文） http://www.scmp.com/portal/site/SCMP/

南华早报（大中华闻摘） http://olympics.scmp.com/GCO_Simpchi_Index.aspx

苹果日报 http://www1.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sec_main.cfm

台湾媒体：

联合新闻网 http://udn.com/NEWS/main.html

中国时报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page.htm

在中国，收音机曾经一度实行过短波要进行登记的制度，人们只能收听长波。因为收听外国广播以"收听敌台"罪名送劳教劳改的也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

别的不说，我就说我熟悉的发生在我们南京的因为"收听敌台"而入狱的任毅先生。

1970 年 2 月 19 日，任毅先生被逮捕。1970 年 8 月 3 日，一纸判决书呈现在他的眼前： 任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九年五月编写反动歌词《我的家乡》（知青之歌），流传甚广，毒害很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

任毅先生 1979 年 1 月 5 日出狱。中国所有的知青都应该知道任毅先生。他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1969 年，任毅先生是南京五中的初三学生，他到南京江浦县插队。69 年 5 月，他的《知青之歌》在偏僻的异乡，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

1969 年下半年，《知青之歌》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学校的学生在唱，营房里军人在唱，工厂里青工在唱。69 年底，《知青之歌》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从此，任毅先生就开始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了。从此也就拉开了“一曲知青歌，九年冤狱罪”的监狱生活了。

我从 2007 年发表要求取缔独裁、实现民主的公开信之后，中共警察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文章被敌台利用大规模播出吗？”

我问什么是敌台，中共警察说：“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伦敦 BBC 都是敌台。”

事隔一年，这些电台就不再是敌台了，中国人民不需要破网软件就可以直接上网收听收看了。这得感谢奥运。要不是奥运，这些电台到现在一定还是中共警察的“敌台”呢。

问题是，对这些电台、报纸的网络解禁，是不是会随着奥运的结束而结束。这是中国政治是否转型的重要标志。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共必须解除报禁、党禁，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

而解除报禁，又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解除“外报”禁，第二步才是解除“内报”禁。

奥运前解除以上外媒的网络封锁，其实就是解除报禁的第一步，即解除“外报”禁。

如果，奥运之后继续解禁，那就说明中共开始民主政治改革了。

如果，奥运之后再次封锁外媒，那就说明中共决意与民主顽抗到底了。

郭泉：民主先声 263：中国现阶段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最近中国发生很多民族冲突，有一些非常激烈，以致于有部分人员伤亡。

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如果只是在相貌、语言、宗教、文化、食物方面的差异，是根本不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的。

当然，为了宗教、田地、水源、婚姻之类的实在事物，群体之间的械斗在各民族之间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民族同胞针对当地或外地政府和政府公务人员的恐怖袭击，那就不能理解为是相貌、语言、宗教、文化、食物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了。

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人民发生的群体事件，哪怕是激烈的械斗，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属于可以由政府调节的民间事务。

但是，民族同胞针对政府的恐怖自杀袭击，就不是简单的民族矛盾了，而是一个有民族外观色彩的阶级斗争问题了。

民族同胞针对政府的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的双方，一方是受到压迫一方的民族同胞对压迫者一方（统治阶级）的斗争；另一方是压迫者一方（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被压迫一方民族同胞的反抗。

可以看到，冲到斗争前线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虽然他们是民族同胞，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阶级斗争中，战斗者的民族名称，与斗争性质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新民党反对任何利用“民族恐怖主义”的借口来否认、掩盖阶级斗争的企图。

掩盖阶级斗争，究竟保护了谁的利益？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人民早就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十年前拉萨发生了骚乱，人民日报驻拉萨的记者刘伟西先生对此采访了群众。

拉萨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对刘伟西先生表示“想不通”，他说：“…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这位负责人接着说：“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

刘伟西先生当年在文章的结尾问了一句：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

刘伟西先生写完这篇文章十年后，2008 年在拉萨发生的事情，地球人都知道了，我就不赘述了。

所有的民族骚乱，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经济问题。当社会的一个集团控制了另一个集团的生产资料，并

形成一个集团利益对另一个集团利益的剥削时，当剥削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阶级意识逐渐提升，直至最后觉醒，阶级斗争就会全面爆发。

发生在内地的阶级斗争被中共称为“群体事件”，发生在民族地区的阶级斗争被中共称为“民族骚乱”。

中国新民党认为，杜绝民族斗争的根本途径是消灭阶级现象。而消灭阶级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中国新民党反对西藏独立、反对新疆独立，还反对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独立，包括反对台湾独立，但是，中国新民党支持所有民族的自由民主运动。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只有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实现 56 个民族的大团结。

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郭泉：民主先声 264：丧钟响起：北京奥运和中国股指的负相关关系

昨天（8 月 12 日），美国之音（VOA）的记者黎堡先生采访我，请我谈谈本周的中国股市。

他说：“中国因为主办奥运会并且以最多金牌领先而光芒四射。不过，奥运会的光环并没有照亮中国的股市。一些被市场套牢的股民感到惊讶和无奈，老百姓感受到了股市下跌和通货膨胀对生活带来的困难。迄今为止，中国股市主要指数今年内已经下跌了 50%以上，下跌幅度在世界各大股市中名列前茅。”

随后，黎堡先生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请问郭泉教授，北京奥运的举办和中国股指的下跌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北京奥运和中国股指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北京奥运和 2008 年的其他很多因素是自变量，而中国股指是因变量。所谓正相关关系是指自变量增长，因变量也跟着增长的关系，而负相关关系是指自变量增长，因变量反而减少的关系。零相关关系是指因变量的增减与自变量的增减无关。

中国股市本就不正常。

中国股民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就从来不是理性成熟的投资者，而是拿股市当成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于是，低了买，高了抛。绝少股民是想投资某个股票企业的投资者。

其次，造成股市时不时就做“俯卧撑”的罪魁祸首是机构。其实，中国股民都知道，所谓的机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的御用机构。

机构大规模注入资金，股民就跟进了，于是股指就“俯撑”了，股指涨高后，机构立即高价位抛售获利，股指下挫，于是股指就“卧撑”了。

机构的信息渠道和买卖渠道与普通股民是完全不对等的，于是，普通股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险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机构”的钱，其实就是中央政府正常运行之外的“闲钱”。2008 年前，这些“闲钱”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为中央政府捞取了大量不义之财。

但是，2008 年春节过后，中央政府的“闲钱”就捉襟见肘了。灾难、接着又是灾难、最后还是灾难。这些灾难都需要钱。但是最用钱的还是“奥运”。从基础建设到军事安保，全国各地耗资万亿都不止。

其次是全世界的经济衰退、世界性的次贷危机都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受到严重影响，以致损失过半。

如此这般，中央政府的“闲钱”忙于救灾和救汇，于是就没钱“救市（股）”了。

而股市没钱注入，那就坚挺不住了。

然而，中央政府的“闲钱”忙于救灾和救汇，还嫌不够，于是中央政府就开始着手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再捞一点用用。

搜刮，用不着到屋里翻面缸、到圈里拉母猪，只要放任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 5％、10％、20％就可以了。于是，我们看到 8 月 11 日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7 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 6.3%，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超过 14%。食品类价格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16.0%（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12.1%），鲜菜价格上涨 8.4%，粮食价格上涨 8.6%，油脂价格上涨 30.8%，水产品价格上涨 18.3%，鲜果价格上涨 17.4%，鲜蛋价格上涨 5.9%，调味品价格上涨 5.9%。

通过这样的掠夺，从 13 亿乃至 14 亿人口中收拢 6000 亿元乃至 15000 亿元，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

这样，一方面中央政府的“闲钱”无暇“救市（股）”，而另一方面人民又没钱“救自己”，于是，股崩就在所

难免了。

黎堡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请问郭泉教授，那么股民会不会因为股票大规模缩水而对北京奥运产生的金牌没兴趣了呢？”

我回答：“这倒不会。尽管奥运会没有为中国股民带来生气，但是老百姓还是会为中国夺得每一块奥运金牌而欢呼的”。因为奥运金牌与股票是零相关关系，即因变量金牌的增减与自变量股票的增减无关。

四川大地震后，6 月 1 日我写了一篇《民主先声》，题目是《温家宝先生，接下来的中国金融地震，中国能挺得住吗？》（参见《民主先声》230）。文章的最后，我写到：

“事实上，就目前来看，人民币大幅升值、通胀压力下，外资进入金融业带来危机的某些征兆已经显露。这实际上是一场金融地震。我的地震预报是 3 年内发生。”

中国股市其实就是集权独裁政治体制和原始资本主义市场人工嫁接的一个怪胎。

这个怪胎罪恶地把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生拉硬扯地嫁接到独裁集权政治制度的躯体上，从而决定了中国股市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独裁集权政治也即权贵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的股市如此，楼市如此，一切市都如此。举目四望，卫生、教育、司法、商务等部门出现的种种弊端，其根源都在这个集权独裁的政治制度。

现在，我要再作一个预报了，那就是，股市崩溃将在屈指可数的岁月里敲响独裁统治的丧钟！

郭泉：民主先声 265：奥运后，我和中国新民党将是中国政治走向的晴雨表

昨天（8 月 14 日），台湾央广新闻网的中央广播电台的杨宪宏先生对我做了一个长达 1 小时的电话采访。

杨宪宏先生是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著名主持人、记者，他主持一个节目的名称我很喜欢，那就是《为人民服務》。

我与杨先生已经合作多次了。具体多少次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中国政体改革问题、四川地震中的核设施问题等问题。昨天（8 月 14 日）谈的是奥运话题。

首先，杨宪宏先生和我谈了我 8 月 9 日发表的《民主先声 261：奥运与中共：不文、不行、不忠、不信》，杨先生对我这篇批判中共奥运开幕式的文章表示完全赞同。

随后杨宪宏先生问我，“请问郭老师，您知道中共奥运开幕式里有两个‘不信’的事情吗？”

我回答，“不，是三个‘不信’。第一个‘不信’是脚印焰火造假，第二个‘不信’是《歌唱祖国》假唱，第三个‘不信’是主题歌《油和米》（You and Me）涉嫌改编”。

杨宪宏先生请我对这三个“不信”作一个简要介绍。

我说，第一个“不信”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场面除鸟巢上空是真实的焰火外，其它 28 处燃花全部是电脑三维立体动画。该消息的最初来源是大陆的京华时报，京华时报引述开幕式视频效果工作小组高晓龙透露，观众通过电视，以及鸟巢内的观众通过大屏幕看到的焰火画面，并非当时航拍即时实景，而是一段历时近一年时间制作完成的三维实景视频。

第二个“不信”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先生良心发现，觉得有个事情不说出来让他“寝食难安”。陈其钢说，开幕式上 9 岁的林妙可小朋友是假唱，而原唱是一个叫杨沛宜的 7 岁小朋友。陈先生说，搞假唱的原因是杨沛宜长得没林妙可“漂亮”。

第三个“不信”是，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开幕式上共同演唱的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改编自一家瑞士乐队班得瑞（Bandari）的《天堂之路》(《The way to heaven》)。《你和我》的第一句与《天堂之路》十分相像，并且也不断反覆这一句。把《天堂之路》附点音符稍微改成一拍的 4 分音符，第一段的“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4 小节”，“为梦想，千里行”，与《天堂之路》开头前 8 小节雷同相似。这一句旋律是最好听的，最优美动人，并且都是反覆，全曲的风格几乎相同；一个是营造“同是一家人”，一个是营造“同在天堂路上”。

我还特别强调，其中第二个“不信”是最邪恶的。其实 10 岁以下的女孩子没有漂亮与否的区分，可爱天真就是最美好的。而中共却把成人看女人的那种肮脏的、性欲的美丑观强加到一个才 7 岁的小女孩子身上，这将对孩子的未来成长带来极大的心理障碍。而中共却美其名曰“国家形象”。

最后，杨宪宏先生问我，“请问郭老师，您认为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我说，综观奥运史，奥运要么给举办国带来财富，要么带来民主。财富这点，显然这次奥运不仅分文不挣，而且还倒贴进无数老百姓的纳税钱。那么，这次奥运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吗？我认为，奥运之后，中共可能有三条道路选择。这三条道路是左、中、右的三条路。

“中”就是保持原状；“右”就是全面走向民主；“左”就是全面走向专制（即中共法西斯化）。

杨宪宏先生再问：“郭老师，您认为中共会走哪条路呢？”

我说：“其实有一个信号灯的。这个信号灯就是我和我的新民党。如果奥运过后，我家楼下警察悄悄离去，那就是中。如果我立即恢复自由，并重返教授岗位，那就是右，即开始走向民主了。如果我被抓，那毋庸置疑，中共全面法西斯化了。所以，现在国内国际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中国，一直在关注南京，一直在关注我。他们说，郭泉及其新民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晴雨表。”

郭泉：民主先声 266：中国，你赢得再多的奥运金牌，也未必能赢得历史的尊重

63 年前的今天（8 月 15 日），日本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今天又恰逢是农历 7 月 15 日。佛教徒称之为盂兰盆节，道教徒则称为中元节。中国民间也称“鬼节”，是日，人们会给祖先焚香烧纸，哀悼亡灵。

今天一早，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纸钱”放进了我的腰胯包里。与每年一样，815 这天全天我是被警察严密监视的，这样的日子还有 77、918、1213。中共警察每年都阻止我组织反日的弟兄姐妹祭奠死难同胞。2005 年，我发出了在 1213 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纪念日），30 万国人祭奠 30 万死难同胞的号召，结果全国各地的反日人士都向南京集结。中共警察“严防死守”，中途无数反日兄弟姐妹被“截断”，但是祭奠的人群源源不断的来到南京。最后，中共警察立即关闭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且一关就是两年。

上午 9 点半，我陪我母亲到南京华侨路上的南京工商银行的房屋信贷中心取贷款，我在帮我妈填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果然，看到了多名中共国保官员潜入银行。为首的是长期负责监视我的南京鼓楼区公安局的国保官员。我办好事情回到我妈家。从楼上望下去，警察潜伏在周围。

下午帮我妈整理屋子。心里却一直盘算着怎么突破警察的封锁去祭奠被日本侵华日军残酷屠杀的 30 万死难同胞。我妈家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远，但是我知道那里中共警察一定重兵把守了。于是我想到了在南京汉中门桥头的一个死难同胞纪念碑。汉中门桥附近当年被侵华日军集体屠杀数万名手无寸铁的南京平民。

晚上六点半我送儿子去“君临国际”参加每周五晚上的少儿英语班。然后骑车到“可爱的小撒旦”家楼下，给她短信。“可爱的小撒旦”是我的网友，因参与过我组织的多次反日活动，警察找过她父母、找到她学校。但她始终支持我的反日活动和其他各种活动（参见《民主先声》231、246）。

一分钟后她下楼。我快速地对她说，我想到汉中门桥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去祭奠，我们周围有很多警察，去祭奠随时会有危险。她说，“我去”。

我把“纸钱”从腰胯包里取出来放在左手容易飞快地取出的口袋里，又把打火机放在我右手可以飞快地取出打火的口袋里。我必须在 2 秒内完成点火动作。如果不在 2 秒内完成，我知道，蜂拥而上的中共警察会立即夺去我的打火机。

我们穿大街走小巷，连闯了几个红灯。把所有跟着我们的车辆都甩得远远的。十分钟后，我们到了汉中门桥头的死难同胞纪念碑旁。我抚摸了一下花岗石的碑体，说：“我来了！”然后飞快地取出“纸钱”和打火机。一秒钟，火焰就腾起来了。“小撒旦”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

10 秒钟后，有路人观看。桥头人来人往，情况开始变的复杂。我立即和“小撒旦”离开了桥头。送“小撒旦”回家后，我去接儿子下课。

晚上九点，孩子睡觉后，我打开电脑。很多朋友都在线上焦急地等我，他们见我一天没上线，担心中共警察又对我作出什么非礼的事情，有人已经对外界发出了警戒信息。很快，“小撒旦”给我发来了今天晚上祭奠的照片。另外一些朋友还发来了“今天上午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有侵华日军灵位的靖国神社”的消息。

让我一夜不能入眠的是我的一位在国家著名媒体工作的“妹妹”给我发来了她今天的“工作+生活日记”。

看完她的日记，我突然想帮她在海外发表，因为我知道这在国内是根本不可能发表的。我认识的记者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们说，他们写的新闻报道是假的，但是日记是真的。

没想到我对她说要帮她署名发表。她说：“我妈还靠我养呢。”

我笑着说，“放心，不暴露你，我养不起你和你妈妈。”

她说：“我你就养不活。我马上修改一下，给你。你谨慎办事，胡子说了，要和谐。”

下面，就是她发给我的她的“工作+生活日记”，题目就是《中国，你赢得再多的奥运金牌，也未必能赢得历史的尊重》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3 周年纪念日，因为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通知，便赶去采访。去之前就在想，又是一群日本人举着横幅默哀，拿着照相机留影，实在没劲，也不知道可以再写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想想，前几次那边搞活动，通知了我我却没去，老是不去不太好，毕竟这还是我的条线，只好打车去了。

出门打的车驾驶员貌似是个老司机，一般有的司机会从茶亭东街那条路走，而这个司机从莫愁路那个方向走，

到纪念馆的时候打车费正好 10 元，一般是 12 元。

到了祭祀小广场，跟我预料的差不多，日本友好人士在上面讲话，比较俗套的，空、虚、大。哎，毕竟我跑这个也跑了 4 年的时间了，有点疲了。看到几张比较熟悉的面孔：松冈环、林伯耀等等，有时候还是蛮敬佩他们的，每年这个时候都来，不管天有多热，穿着严实的衣服在这里祭拜。

仪式结束，我听说有一位幸存者要给那些日本人讲述历史，便跟了进去。让这些经历过现在我们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的人，去回忆她们其实并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还要让她们说出来，让恐怖狰狞的画面重新回到她们脑海里，并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不停的重复，只要世界任何人要听，只要任何人拿出想了解历史真相的理由，她们就不得不去那么做，那么让她们少痛苦一次，或许我心里也会好过一点。

这位老人此前没有见过，我在听她回忆的时候是面向她的背部，她瘦弱的身体深深陷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个会议室宽大的椅子里面，面对她的便是那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那个叫做东瀛的国家来的人。

王桂英，1929 年 8 月 15 日出生，家中有爸爸王庭发，妈妈陈广来，二妹王桂华，爸爸当时以买卖小吃赚钱，妈妈依靠帮人织补填补家用，全家居住在靠近南京新街口莫愁路上的天主教堂后街，也就是现在妇幼保健医院那边的路上，当时在那一代称霸的日本鬼子还是级别比较高的军官。

1938 年 1 月份的某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家里有妈妈，7、8 岁的王桂英、5、6 岁的二妹王桂华及到她们家串门的舅妈，爸爸出去做生意了。有 2 个日本人拽她们家的门，说要找花姑娘，妈妈和舅妈顶住门，死活不让日本人进来，结果日本人把门拽开闯进她们家里，一脚把妹妹踢开，妹妹顿时血流满地，王桂英上前抱住妹妹，结果又被日本兵用刺刀把头给刺破了，接着两个个日本兵分别拖着妈妈和舅妈各到一个房间把她们两强奸了，强奸后穿上裤子便扬长而去。

不久，王桂英的爸爸回来知道了这件事，顿时怒气冲天，先把妈妈陈广来骂了一通打了一顿，气愤不已要找日本鬼子算帐，在路上看到日本鬼子就要跟他们拼命，结果被日本鬼子抓了去，吊起来打，被关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王桂英曾跑到她所知道的宪兵队去找爸爸，双腿被宪兵队门口的狼狗咬伤。家里为了把王庭发救出来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找到在警局里的一个熟人，才把王庭发放出来，但人已经被打得不行，是用板子抬回来的，回来后右手便残废了。

王桂英的舅妈被强奸后就疯掉了，一直疯疯癫癫的，在解放初期去世。

王桂英的二妹头部因被日本鬼子拽倒触地流血不止，王桂英便带着她去河边将头上的血迹洗掉，在用抹布擦洗的过程中不幸感染，后来二妹的脑子一直嗡嗡的叫，剧烈的痛，2007 年去世。

王桂英的父亲右手残废后，家里便失去了主要劳动力，一贫如洗的王家过着再艰难不过的日子，后来王庭发参加了新四军，为苏北的战士采购药品，没想到有一次在中华门被日本人发现，连药带人又被抓去，暴打，被救出来后，新四军曾希望他再次加入部队，遭拒绝，1974 年去世，享年 71 岁。

王桂英的妈妈后来又生了 2 个儿子，3 个女儿，晚年跟家境尚好的 6 女儿住一起，在此期间一直不需家里知道 1938 年冬天发生在她们家那件事的人提过去，直到她 80 岁那年才向 6 女儿透露了一些，至今家中她不少子女都不太清楚日本鬼子对她造成的伤害，老人于 1999 年去世，享年 92 岁。

王桂英后来成家，有 2 个儿子，一个 12 岁的孙女，一个上大学的孙子，其中一个儿子在南京理工大学做教授，目前跟其中一个儿子住在一起，每月有几百元的退休工资。2006 年春天，她才把自己家中的遭遇告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曾 3 次接受过来宁日本人的访问。自解放后，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对她有任何帮助。在很长一段时间王桂英经常做恶梦，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对自己母亲和舅妈的性暴力事件，她一直都很胆小，不敢出去，只要外面有一点动静便会熄灭家中的烛火。

在昨天的证言上，来自日本友人也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

第一位问她的是在 10 年前拍摄的影片《南京 1937》里面扮演松井石根的演员，他问老人有没有想过通过一些适当的渠道进行诉讼，要求得到民间赔偿？老人说没有，但很想，不知道如何做。没人教她，她没有读过任何书，不识字。

还有一个日本人问她，当时日本人闯进你家里，你周围的邻居知道吗？除了你家，其他周围的人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吗？老人说，日本人一来，所有人都跟知道魔鬼要来一样，全部躲藏起来，除了他们家，周围不计其数的家庭都遭遇到或重或类似的遭遇，如邻居一对新婚小夫妻，日本人强奸了新娘，新郎要和日本人拼命，被日本鬼子装进麻袋，活活惯死，这些都是她亲眼所见。还有的反抗者被电电死，被狗咬死的都有，举不胜举，当时几乎每家都遭

到了侵略者的侵犯。

有日本不停问她，是你亲眼看到的吗？你怎么确定是官兵？你不是说他们拿着长长的刺刀吗？官兵们不是应该拿短刀吗？

最后，日本人说，老人为大家讲述了自己这段痛苦的经历，为表示对她心灵上的补偿，将送她礼物，后采才知道是一把小纸扇，一条毛巾，就这样打发了 80 多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结束后，日本友人跟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赶赴酒店吃饭。

80 岁的王桂英和其 6 妹颤巍巍的走出纪念馆大门，连个盒饭都没有。

据我所知，2005 年江苏省政协秘书长、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席戈琳委在江苏省“两会”上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将南京中山东路 307 号中山宾馆大礼堂即黄浦厅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为这里曾是审判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恶魔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等战犯的军事法庭。该礼堂常年只充当会议室的角色，其作为抗战胜利历史遗址的纪念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利用，当年，江苏省有关方面召开督办现场会议达成共识：全面恢复大礼堂军事法庭当年原貌，并于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日前后(8 月 10 日-25 日)免费对社会开放。

2008 年 8 月 15 日，我再次致电江苏省会议中心有关负责人，曾用激昂慷慨的语调说过“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同时也是承载荣耀之地，审判战犯大厅就是中国人民战胜侵华日军的见证!”的原江苏省会议中心(钟山宾馆)董事长薛建华已调至集团，对这里的情况说不清楚，该会议中心企划部文化策划主管张净说，今年没有得到上级的通知，没有任何动静。

建筑还在，历史清晰，但如今的人却已健忘。

郭泉：民主先声 267：2008 年 8 月 16 日，中国在野党联盟成立

2008 年 8 月 15 日，中国新民党、中国共产党（新党）、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三党达成组建中国在野党联盟的共识。

8 月 16 日晚，三党负责人摆脱各自城市的中共特务的追踪，以外出旅游的名义，在安徽黄山市成功会面。

16、17 两日，三党负责人对“中国在野党联盟”的宗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议如下：

中国在野党联盟旨在终结独裁、推进民主，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中国在野党联盟的性质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同盟。

中国在野党联盟实行轮值主席制度。

轮值主席由各党主席轮值担任，任期一届，每届四年，不得连选连任。

中国在野党联盟首届轮值主席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出任。

经中国在野党联盟首届轮值主席郭泉提议，由于中国公民监政会与中国新民党在四川龙门山特大地震问责、钓鱼岛问责方面同仇敌忾、精诚合作，且中国公民监政会负责人郭永丰先生在奥运期间被深圳中共特务软禁，无法出席本次会盟，中国在野党联盟缺席吸纳中国公民监政会加盟。

8 月 19 日，中国新民党“特科”人员发现中共南京特务“李主任”（中共南京市公安局国保特务）等多人跟踪至黄山，意图破坏。

8 月 20 日凌晨，中国新民党“特科”安排中国在野党联盟秘密转移至千岛湖继续会议。

20 日中午，中国共产党（新党）、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两党负责同志从沌西码头上岸，前往杭州方向返回原籍（经中国新民党特科人员汇报，上述各同志均已在 21 日安全抵达各自处所）。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返回安徽，20 日晚间到达歙县深渡码头上岸。20 日晚 22 时，通过歙县火车站安检，21 日早 6 时抵达南京。

另据郭泉先生介绍，中国泛蓝联盟正在与其商讨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事宜。

中国在野党联盟还将与中国民主党各省党部、中国社会民主党等多党联络，谋求最大程度的民主同盟。

中国在野党联盟章程将由首届轮值主席郭泉先生起草，经中国在野党联盟各党主席认可后，近期发表。

凡中国一切要求终结独裁、实行民主的政党都可以在“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共识的前提下自由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郭泉：民主先声 268：中国新民党党员，请高举您的双手迎接中共的手铐

几周前，我路过南京审计学院附近的北圩路，看见几个民工在和一个中共警察争执。具体他们争执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这个中共警察说，“赶快离开，否则铐走”之类的话，我立即停下车，掏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准备拍摄。

这时，一个 40 岁左右的民工弟兄高举双手，平静地走向中共警察，说：“好，你铐我走吧，你铐我走！”

最后，这个中共警察说了几句跌软的话，悻悻离开了。民工们兴高采烈地走了。

因为我有急事，就匆忙离开了，也没有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懊恼。但是让我感到很欣慰的

是，最温柔、最有忍耐力的中国农民终于敢于反抗了，终于敢于高喊“你铐我走”了。

本周，我在组建“中国在野党联盟”之后，21 日早上，我从安徽歙县回到南京家中。当天中午，我去到我妈那里给老人家报个平安，顺便帮我妈做做家务事。

她和我的闲聊的时候，提到中共南京公安局的国保头目在我外出开会的期间给她电话威胁过她。中共南京公安局的国保头目说：“最近郭泉对国际媒体说中国新民党将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这一言论非常危险，再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坐牢的”。

我听后哈哈大笑。

第一，我根本不记得我对哪家国际媒体说了中国新民党将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的言论；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治政策导致了大量苦难民众的出现，这分明是中国共产党在自掘坟墓，哪里还需要我来为共产党掘墓呢？

第三，坐牢有什么好怕的呢？能为百姓说话而被中国共产党逮捕入狱，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刚才，中国新民党的“特科”成员发送了一份经核实的消息给我：

“在美国德州的基督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本周一（8 月 18 日）从中国安全机关高层人士处获悉，中共中央政法委目前正秘密指示中国公检法系统，为了换取中国再有 20 年的稳定而将在 10 月份开展对‘社会上四种不稳定分子’的全国性镇压运动；所谓‘四种不稳定分子’指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上访人员、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人士。”

我一看到这个消息，又忍不住笑起来。

第一、我在“社会上四种不稳定分子”中，竟然占了三种身份（除“上访人员”）。

（备注：不料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 QQ 号为 23333223 的叫“爱你”的北京网友对我说“你不是也帮助别人上访嘛?呵呵”我回答：“是啊”于是他说：“那四条岂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吗?呵呵”）

第二、中共政府已经如同晚清王朝，两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只听得懂枪响和炮弹响，而不愿意看要求改革改良的奏折。

第三、中共根本不懂得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而不是用枪炮来“维持稳定”。

第四、中共对“维稳”的思维，还停留在 1989 年的智力水平。

鉴于中共的这种智力水平，我想我们的“特科”成员的情报可能不会错。

所以，我倡议，中国新民党党员，请在 10 月份高举您的双手迎接中共的手铐。

郭泉：民主先声 269：中共奥运金牌第一能说明中国是第一体育强国吗？

再有几小时，2008 年北京奥运就结束了。

毫无疑问，这届奥运金牌榜的榜首是中国；也毫无疑问，中共要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中国是个体育强国了。

那么，中共的奥运金牌第一，是否能说明中国就是第一体育强国了呢？

我想起了中国在国际物理、化学、数学竞赛上的骄人战绩，但是，这是否能说明中国的物理、化学的教学科研能力是世界第一呢？

如果说中国在国际物理、化学、数学竞赛上的骄人战绩能说明中国是第一物理化学数学强国的话，那为什么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奖，中国至今一个都没有呢？

中共最喜欢说诺贝尔和平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至今没有中国人得奖是“西方势力操纵”，那么诺贝尔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等奖都没有中国人的名字，也是“西方势力操纵”吗？

事实上，中国在国际物理、化学数学竞赛上的骄人战绩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物理学和化学的教学科研的水平是国际第一，同样，中共奥运金牌第一，也说明不了中国是第一体育强国。

而事实总是比较糟糕，我们的教育很糟糕，我们的体育也很糟糕。

国外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国外的体育是“全民体育”，而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体育，都是“极少数人”享用的特权资源。这些“极少数人”的“第一”，是否能代表“全民第一”呢？

有个资料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美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女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问及中美两国运动队参加奥运比赛有什么不同时，郎平谈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她说美国奥运代表队直到比赛前两个月才开始组建。美国女排队员们都是兼职的，平时在各自的公司、单位工作。体育只是她们的业馀爱好，政府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发给她们固定工资，美国的运动员都是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队员就完全不同了，中共用人民的纳税钱养育着她们，一年四季组织训练。为了奥运比赛，多年前就开始准备，通过训练，层层选拔，好中挑优。显然，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培养“极少数体育尖子”，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巨大。

我们再看看中共一面是奥运金牌第一，另一面是中国很多农村中小学连最基础的体育设施都没有。全校只有一

个水泥乒乓球台的农村中小学比比皆是。

这就叫“体育强国”了吗？

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国外运动员的情况，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全民体育”：

本界奥运会夺得了八枚游泳金牌的美国人菲尔普斯，19 岁，密歇根大学 2008 届新生，所学专业是体育管理。他每天训练只有两个小时，周一、三、五加倍。如此少的训练并非是他偷懒，而是因为他要上课，游泳训练只能在课余时间里进行。

女子 100 米仰泳冠军，美国人考芙琳，年龄 22 岁，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心理学。她的日常作息如下：每天清晨开始进行游泳训练，两个小时，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再训练三小时。

女子赛艇单人双桨冠军，德国人斯托姆波罗斯基，29 岁，已婚，是一名时装设计师。毕业于德国时装学校。

女子花剑个人银牌得主，意大利人特里利尼，34 岁，已婚。职业是森林护林员。大学所学的专业是物理教育。

女子射击飞碟多向冠军，澳大利亚人巴罗奇，31 岁，职业是农业保护官员，大学所学专业是农业科学。

女子射击飞碟双多向冠军，美国人洛德，年龄 25 岁，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动物和兽医科学”，其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兽医。

女子柔道 78 公斤级冠军，日本人阿武教子，28 岁。大学所学专业是法国文学，目前的职业是警察局的警官。

女子射击 50 米步枪 3x20 银牌得主，意大利人图里西尼，35 岁。职业是律师。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法律。

女子 200 米蛙泳金牌得主，美国人比尔德，年龄 23 岁。大学所学的专业是“零售及营销科学”。其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室内装潢设计，她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室内设计专家。

女子游泳 100 米蛙泳亚军，澳大利亚人汉森，26 岁，其职业居然是“学生 / 保姆”，所学专业是“市场、通讯和社会学”。

综上所述，中共把中国人民的大量的纳税钱用于“极少数职业运动员”身上，最后获取数十枚奥运金牌，丝毫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体育强国。

用人民的数万亿纳税钱来“购买”这数十枚金牌，这只能说明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

中国人民离全体中国人公平地享受全民体育福利的民主社会还很遥远。

中国人民必须知道，只有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下，中国人民才能公平地享受全民体育福利。

中国人民必须知道，只有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下，中国才有可能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郭泉：民主先声 270：“中国人权同盟”、“中国人权论坛”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中国新民党、中国共产党（新党）、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三党于 2008 年 8 月 16 日正式组建中国在野党联盟。（参见《民主先声 267》）

中国在野党联盟的宗旨是：

中国在野党联盟旨在终结独裁、推进民主，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

中国在野党联盟的性质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同盟。

中国在野党联盟实行轮值主席制度。轮值主席由各党主席轮值担任，任期一届，每届四年，不得连选连任。

中国在野党联盟首届轮值主席由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出任。

2008 年 8 月 23 日，旅居欧洲的中国著名民运前辈任畹町先生发来贺信，并携“中国人权同盟”、“中国人权论坛”两组织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任畹町先生来信全文如下：

郭泉阁下：

十分赞赏你在国内不畏艰险的大胆略有智慧运作。

经考虑，我们以 1979 年老牌“中国人权同盟”及我 2007 年提议组建的“中国人权论坛”两组织加盟大陆的中国在野党联盟。

众所周知，两组织均建基于大陆本土，并在外土扩张。我仍在欧洲访问，诸事繁多，续发有关文件，以证我参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法理依据与深厚根脉，容后再叙。

“中国人权论坛”总联络人，“中国人权同盟”主席任畹町

2008 年 8 月 23 日

接信后，我立即与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中国共产党（新党）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取得联系，决议如

下：

中国在野党联盟认为由任畹町先生担任主席的两大组织的加盟是中国在野党联盟的荣幸，相信“中国人权同盟”、“中国人权论坛”两组织的加盟一定会对促进并最终在中国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起重要的作用。

附件：“中国人权同盟”的《中国人权宣言》（1979·1·1）

（备注：此为历史文献，保持原样）

中国人权同盟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

中国人权同盟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一九七六年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归根结底是一场人权运动。人权的意义，比其他的意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持久的多。这是中国人民政治觉醒的新标帜，是当代真正的历史必然性。

今年（1979 年），我国人权运动又以其崭新的内容和独创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赞赏，加速和推进了中美政府的建交。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我们提出以下十九条：

1、 公民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

把个人思想写进宪法和把接班人写进党章是同样荒谬的，是违背思想言论自由原则的，是违背人脑思维规律，也是违背物质关于“质的多样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封建性的表现，全国人民深恶痛绝。

世界上没有什么神圣的一成不变的和不可侵犯的东西。公民要求彻底铲除神化迷信和偶像崇拜。搬掉水晶棺，改为纪念馆。每年隆重纪念“四五”运动。把信仰从迷信中解放出来。

2、 公民要求宪法切实保障批评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

为免除当代与后代的苦难，为保护真理和正义，为发展生产力，公民要求永远废止仍在实行的反对“个人”就是“反革命”的封建皇权标准。把我国社会真正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原则基础上。

3、 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

我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正视多党派存在的事实。多党派应以党派资格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党派不能进入一个自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及其荒谬的，是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表现，是和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官僚主义的继续发展。我国公民不要“看样子”的宪法。

4、 公民要求在全国实行普遍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各级领导人。

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没有经过全民普遍选举，这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讽刺，也是对九亿七千万公民人权的愚弄。公民要求组成有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公民委员会”或“公民院”作为人代会的常设机构，参加议政和表决，对政府实行监督。公民要求国家用法律制裁违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且用法律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

5、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公开国家预算、决算和国民总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公开军费开支、国家行政开支、科研开支、基建投资和国家税收总额；公开国家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兵员总额和失业人数；公开职工劳保福利、社会救济金额和物价零售指数；公开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对外经军援助（包括在野党和进行武装斗争的党）；公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完成情况；公开人口和人口增长情况、职工因工伤亡情况；公开各种外交协定；公开财政赤字、内债和外债。

6、 人代会再也不得秘密召开。公民要求自由出入会场旁听人代会和常委会及预备会。

7、 逐步取消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

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公民要求监督国家对全体公民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使全体公民的劳动果实不被林彪四人帮这类封建社会主义的骗子们所任意侵夺，使全体公民不再一年又一年的承受“反击右派”、“比例失调”、“撕毁协议”、“全面内战”、“经济停滞”、“濒临崩溃”所带来的无止境的灾难。公民要求讨论规定国家对工、农、商、财、贸的纳税率和纳税额以及工业上交国家的利润率和利润额。

8、 中国党对铁托同志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已经得到修正。

落后的理论必定适应于落后的生产力，正是从所谓“变修”的理论出发，我国社会和各阶层人民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悲剧和喜剧，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张姚所谓民主派向走资派演变和苏联变修是出自同一条理论根据的。近年来我国内外政策和路线的重大变化已经充分证明“变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争论已经完全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公民要求缓和。

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中苏两国人民也要世代友好。公民要求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开谈判，或接受苏联政府的谈判建议，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努力。

9、 公民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的学说。

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都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形式的继承。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如果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不能生存，这是经典学说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徘徊取得的重要教训。

我们不但要借鉴西方的科技，而且要借鉴西方的传统民主和文化。公民要求国家继续打开封闭的大门，让思想冲破牢笼，让自由吹遍天下，让智慧的中国人民分享全人类的宝藏，让苦难的一代享有自由，让年轻的一代免除苦难，根除阶级偏见，取缔欺骗宣传。

10、 公民有出入外国使馆索取宣传品和招待外国记者的自由，有向国外发表作品的自由。开放所有“内部读物”和“内部电影”，在欣赏文化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订阅外国报刊杂志和收看收听外国电视电台的自由。公民要求国家切实给予出版印刷权，以兑现宪法。

11、 坚决废除公民所在单位的终身委身制。公民要求职业自由，穿戴自由，迁徙自由，取消阻碍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规定和制度。干部要求对调自由，保密工作人员有恋爱婚姻的自由、中学毕业生有不插队的自由，反对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和其他号召。失业公民要求享有国家救济的权利。

12、公民要求国家保护农民的基本口粮，消灭乞丐。

13、 国营农场知青应享有再分配的权利，农业知青要求国家取消非人待遇，政治平等，改善生活，提高工资。

14、 公民要求国家禁止在招收各种人员时，采取欺骗手段，法律要制裁进行欺骗的干部和单位，法律要制裁行贿和特别是受贿行为。

15、 一心一意搞现代化，还要一心一意落实政策。假案、冤案、错案受害者要求国家改革上访制度，给予上访机构以直接处理权。国家法律要制裁诬陷者。公民要求国家兑现解放初期对国民党起义官兵极其家属的政策。

16、秘密警察和单位党委无权拘捕公民和对公民进行审查，无权对无辜公民使用侦察手段，无权当旁证。秘密警察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是极不相容的，公民要求取消秘密警察。

17、 取消贫民窟，取消三代同堂，取消大儿大女同室，取消有组织发票，一切内外展览自由参观。取消检查制度，创作自由，新闻自由。高考取消政审，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18、 我们是“世界公民”。公民要求边界开放，活跃贸易，交流文化，出口劳动力。公民要求有出国勤工俭学的自由，谋生和旅游的自由。

19、本同盟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

郭泉：民主先声 271：中国大学教育就是中共利用大学课堂往大学生脑子里灌屎

昨天（8 月 24 日）23 时 47 分，清华大学的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刊登了一则新闻，题目是《清华校长顾秉林：中国大学教育就是往脑子里灌屎》。

今天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中心发表声明称：

8 月 24 日晚 23 时 47 分，清华新闻网遭到恶意攻击，被恶意篡改，假冒新闻，传播谣言。清华大学新闻中心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 清华大学新闻中心 2008 年 8 月 25 日

今天一早，清华大学的多位同学和老师就给我发来了全文，读后让我思考良久。

随后，我到清华大学的清华新闻网一查，结果出现了上述“声明”。

我想，可能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情况如清华大学新闻中心所言，是骇客假托顾秉林先生发表批评中共教育制度；

另一种情况是清华校长顾秉林先生对学生确实说了这些肺腑之言，但是告戒学生不要发表，不料，某位耿直的清华学子整理好顾秉林先生的讲话后直接发到清华大学的清华新闻网上了。

无论是什么情况，我认为这篇文章符合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况。

现抄录这篇文章，以飨大家。全文如下：

昨天下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先生在接受学生记者采访的时候，表达了他对现在大学教育状况的担心，他表示，说得直白一点，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是“在往学生们的脑子里灌屎”。

顾秉林校长表示，在二十世纪初至 40 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界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以内中国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中有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革命义士、抗日英雄，有科学骨干、民族精英。

而这种盛况自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衰落。现在的各高校，包括清华与北大在内，已经没有将培养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严重的学术腐败，枯燥且与社会脱节的课程，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将导致学生们的思想僵化，对课程失去兴趣，对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失去信心，退学正是表达他们对大学教育失望的最极端方式。

他进一步表示，至少有80%的学生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是踌躇满志，报着努力学习的决心的，可是在四年大学生涯的消磨与侵蚀下，能将这一决心坚持到毕业的学生恐怕不到20%。逃课、考试作弊已经被很多学生当成了家常便饭。上大学的目的由最初的学习知识变成了纯粹的混文凭。而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却正在被逐渐磨灭。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大学最终培养出来的成品，将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顾秉林校长痛心地说："如果一直这样下去，20年后，中国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水平将会是什么样子？我简直不敢想象！"

古板的教学方式和教材让社会丢失了许多的达芬奇、比尔盖茨。对于这样损失，我们是否要反省下呢？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学生们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受到无可挽回的扼杀，中国至今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与这种教育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以下是顾秉林先生的原话：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我认为真正的高校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技能、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敢于权威挑战的精神。

1、什么是独立的技能？

不是拘泥于课本上的，如果你对某东西有深入研究，可以考虑研究成果作为成绩。我们要鼓励和发扬这样的模式，因为市场和学生需要这样的鼓励！

2、什么是独特的思考方式？

独特的思考方式不代表爆炸式的思考，而是多种寻根问底的思想，抓住一条线一直往前摸，有这样的科学精神，这条线一定能通往诺贝尔。独特的思考方式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学生得注意研究的方式、研究的目的以及合理性。当然，诺贝尔奖不应该成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培养以及输送人才，但是这毕竟是国际上对最顶尖人才认可的标志。

3、什么是敢于挑战权威？

这个相信学生们都了解，羽毛和石头哪个能先着地？

这个是众人皆知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提出了不相同的结论并用事实证明了？原因就是权威的威慑。教授：这个名词是一个长辈的名词，我不介意别人叫我同学，叫我兄弟，或者学生。因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研究的成果比老师的好,你就是老师,我可以为一个同学"无聊"的问题而停下上课,动员大家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原因为什么?这个问题的隔壁很可能就是诺贝尔奖……

当然，以上的能力，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被赋予学生的。所以顾秉林先生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应该停止再扼杀人才了！应该停止再向学生们的脑子里灌屎了！"

当然，改革会涉及很多未知的因素，以及牵扯很多人的利益，势必受到极大的阻力，可是为了学生以及中国的未来着想，这些阻力都必须被克服。

郭泉：民主先声272：中共正用"四把刀子和一根绳子"猎杀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人民

中国新民党经济情报统计部的调查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已有6.7万家企业破产倒闭，正在形成汹涌的破产狂潮。经济大省浙江省的中小企业倒闭高达20%。一个月内两位浙商企业家相继走上了自杀之路。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阀制造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8月12日浙江一新制药股份公司董事长郑亚津在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自缢身亡。今年以来有21位浙商企业家自杀。

中国民营企业正遭遇"四把刀子和一根绳子"的联合绞杀。"四把刀子"是指原材料价格猛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和外贸困境，"一根绳子"就是指银行信贷收紧。

中共正在用这"四把刀子和一根绳子"猎杀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人民。

中共目前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猎杀，主要是通过收紧银行信贷来实施的。

2008年，中共推出了中期票据业务，为银行攫取企业资产提供了十分方便的金融工具。所谓中期票据简单讲，就是把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变成有价证券，这个东西一出现，任何企业无论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最终都难以逃脱资产被银行侵吞的厄运。而此前由于贷款不能买卖转让，只要企业有能力偿还贷款，银行要想侵吞企业资产便无能为力。

而一旦把贷款变成有价证券，就可以自由买卖转让，价格就会暴涨暴跌，银行就可以像操纵股票那样操纵企业资产价格的变化，或者拉高套现，或者打压收购，无论企业有无偿还能力都难逃厄运。

对中国经济来讲，这一招可谓阴狠之极：

中共通过银行控制中国企业，进而控制中国全部财富，最终把中国人民的财产全部变成"党产"。

前有银行的血盆大口，后有中共从紧货币政策的驱赶，中国民营企业的"党产化"灾难到来了。中国企业除了尽数落入中共囊中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出路。

中共目前对中国人民的猎杀，主要是通过“中国股灾”来实施的。

中国目前正在爆发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灾”。这次“股灾”是有中国特色的“股灾”。这个中国特色，是指这次中国的股灾不是打在全体投资者头上，而是专门打在其中一部分投资者头上，主要是打在老百姓头上。

这是因为目前中国股灾的爆发不是经济原因和市场原因造成的，而是财富分配方法造成的。是中共权贵富豪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

中共用“中国股灾”把金融危机的灾难锁定在了中国老百姓头上，同时，把暴利锁定在权贵富豪的身上。

购买一张股票，中共权贵富豪的购买价是 1 元，而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平均 15 元。原本的中共欺骗人民说，中共权贵富豪购买的 1 元股票不能上市。于是中国人民就认为中共权贵的一元股票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于是就甘心情愿地购买了可以上市的 15 元股票。

不料，后来中共证监会一声令下，所有股票都按照一个价格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美其名曰股权分置改革。如此一来，权贵富豪发了大财，老百姓则被骗得哭都找不到坟头。

其实，中共权贵富豪的 1 元股票，是根本没有任何成本的。十几年来，中共通过转让配股权，实物配股（不算分红），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早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赚了大钱，现在再以高于原价几十倍的价格套现，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对中国人民的公开抢劫。

这个“特色”，不能叫“中国特色”吧，而应该叫“中共特色”才对。

凭借这一经济模式，中国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中共的“党库”。

中共得到人民的这些血汗钱后，立即到西方国家购买连西方国家都不敢在自己国家生产的高污染的装备到中国进行生产。

这样，西方发达国家毁灭性发展方式的各种弊端，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却如乌云般越来越聚集到中国头上。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股市 20 万亿总市值的灰飞烟灭；老百姓 6 万多亿真金白银的惨重损失，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凭空蒸发。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这样任人猎杀了！

中国人民必须清算一切强盗行为。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是中共权贵的中国。

中国人民必须生活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下，如此，中国人民才能拥有自己的合法财产和全民福利。

备注：本文部分数据和观点参考自张宏良先生，特此感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2020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73：中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和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在关于“政教分离”的问题上普遍地存在两个错误的思维，一是认为“政教分离”就是教徒不能从政，二是认为“政教分离”就是教徒不可以组建政党。

政治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都无法回避政治。

政治学是“科学的皇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假如人是宇宙中最高级的存在，政治就是最高级的科学。

基督徒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放弃对社会罪恶的批评、漠视百姓的疾苦，就是悖逆上帝的吩咐。

在今日中国教会中，错误的神学造成了很多敬虔的懦夫！他们自己不谈论政治的问题，也不让别的基督徒谈论。

一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政治的无知，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怯懦。因为他们并不以圣经为标准来合理地看待政治问题；而是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是残酷的，基督的信息与政治无关。

他们人为地把自己关闭在“隔都”里，自诩属灵，却不晓得已经丧失了光亮和盐味，成为“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 5：13）的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发挥“光”与“盐”的作用，要积极地通过自身的好行为，改善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政治领域。

其实，中国的国父孙文先生、国母宋庆龄女士都是基督徒，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和宋美龄女士也是基督徒。现任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中国国民党员马英九先生也是基督徒。

1925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可以说，中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就是从孙文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开始的。

我是 1995 年在南京莫愁路教堂受洗入教的。教堂西南侧墙角镶嵌有中国国民党员冯玉祥将军於 1936 年为教堂落成而题写的正方形花岗岩楷体竖书石碑“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 冯玉祥将军也是基督徒。

60 年过去了，中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并没有因为各种镇压而消亡，相反，基督教徒始终奋勇冲锋在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下面我来举几个我认识的一直在奋力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基督徒吧，也许大家知道他们的杰出的“世俗工作”，却不知道他们的基督教徒身份。除我之外，全力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著名基督徒，还有我的好友任畹町先生、孙文广先生、袁红冰先生、高智晟先生、郭飞雄先生、郑恩宠先生等等，再多的人名也不需要多举了，就我们“基督七君子”，就足以让中国的民运事业永远记住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贡献了。（参见《民主先声》137）

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思想里发展出的民主理念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基督教民主方面的书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我只接受基督教的民主伦理，而不赞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其实，目前欧洲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融入社会主义理念改善社会财富不均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所以，在政治方面，我提倡多党竞选；在经济分配形式方面，我提倡“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

我的理论全称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文明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两大源泉。

提倡圆融思想的中国人民理应让这两朵人类文明的奇葩同时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基督教徒大体分为两类人群，一类是最大量的“很田园化”的信众（也称为普通信众），另一类就是著名的“文化基督徒”。我们属于典型的“文化基督徒”。

基督教和基督徒（特别是文化基督徒）是世界民主的最伟大的推动力量。

入教 14 年来，我不断阅读圣经和了解基督教的发展史。最后，我整理出了基督教的主要八条民主思想，这八条思想，我称为“基督教民主主义（Christian Democracy）”：

1、主张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

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

3、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

4、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5、对于改变（如社会的结构）抱持着开放态度，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

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

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

8、排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此外， 基督教民主运动还倡导各宗教教徒和睦相处，共同建设和享受地区、国家和世界。基督教民主主义在道德和文化议题以及其他公共伦理和传统思想的议题上，提倡尊重民族传统文化价值。

基督教民主主义在经济和财富议题上，主张以“强烈地社会良心”济救贫穷的福利国家 制度，是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将国家经济视为对国民的人道服务，我们认为照顾人民是国家的首要责任。

基督教民主主义在人权、个人进取和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的议题上，是自由主义。

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观点，以传统文化道德和基督教教义作为其广泛的架构。

世界上有两大国际性的政党组织，第一大国际性的政党组织是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I）。中国新民党（CNDP）加入的就是这个社会党国际。

第二大国际性的政党组织是基督教民主党国际 Christian Democrat International（CDI）。基督教民主党国际（CDI）是各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联盟组织，该国际目前有成员党 52 个。

中国部分城市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在遭遇中共的严酷打击下，于 2006 年开始秘密组建中国基督教民主党 China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CCDP）。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的很多成员，在 2007 年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新民党（CNDP）的成员和骨干。

2008 年 8 月 16 日，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成为“中国在野党联盟”的最早三党之一。（参见《民主先声》267）

2008 年 8 月 27 日，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中央党部获悉中共为了换取所谓的中共再有 20 年的“稳定”而将在 10 月份开展对“社会上四种不稳定分子”的全国性镇压运动（所谓“四种不稳定分子”指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上访人员、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人士”，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中央党部决议如下：

一、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并肩作战，共赴国难。

二、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全权委托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出任本党代主席，领导本党抗击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

三、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支持在中国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政治主张。

四、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与一切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团体和组织一道，反对宗教政治迫害，提倡宗教信仰自由。

五、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志愿加入基督教民主党国际（CDI）。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74：中国新民党、中国在野党联盟祝贺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先生出狱

中国新民党、中国在野党联盟获悉中国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胡石根先生已于 8 月 27 日胜利出狱，特此发表声明表示祝贺和支持。

胡石根先生，1954 年 9 月 3 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83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6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担任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英格兰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1992 年 5 月 27 日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担任主席遭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9 月 27 日被宣布逮捕，1994 年 12 月 16 日，中共北京市中级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5 年 6 月 14 日，中共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胡石根先生在监狱中，右手中指被打断、残疾变形,；并患有肝病、心脏病、胃病、耳病和严重神经衰弱症。

2007 年胡石根先生获得减刑。2008 年 8 月 27 日刑满出狱。

胡石根先生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及成立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起草自由民主党纲领、章程和其他该党和自由工会的宣传材料，积极组织纪念“六四”活动，受到海内外民主人士的一致好评。

胡石根先生 1991 年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时的主要政治主张有：

一、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是必要而且可能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

二、要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与民主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

三、民主运动的开展，主要依赖于国内的政治组织、政治力量，依赖于广大的民众。

四、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建立独立于当局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

五、鼓励有政治信仰、政治热情的人做一个职业革命者、职业政治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胡石根先生的上述思想对当今的民主事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当然，胡石根先生在 1991 年的时候也有一些在当今已经不合适的思想，这里就不再一一指出，相信胡石根先生出狱后，会根据当今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进行必要的修改。

2008 年 1 月 18 日，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李清博士来南京与我会面，被中共警察阻拦（参见《民主先声 109》）。

胡石根先生入狱后，中国自由民主党在李清博士等海外其他中国自由民主党杰出党员的带领下发展迅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如下：

一、中国新民党祝贺中国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胡石根先生胜利出狱；

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支持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上述五条政治主张。

三、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自由民主党缔结同盟。

中国在野党联盟联席会议决议如下：

一、中国在野党联盟吸收中国自由民主党加盟；

二、中国在野党联盟联席会议一致通过轮值主席郭泉先生的提议，提请胡石根先生为中国在野党联盟名誉主席。

中国新民党、中国在野党联盟呼吁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关押拘禁的民主人士，兑现中国共产党 60 年前的建设民主中国的庄严承诺，还权于民，实行“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才是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根本制度。

最后，我想以温家宝总理曾引用过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2008 年 1 月 18 日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一起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中英两国公众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但是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交换之后，我们每人就都有两个思想。”

很显然，中共党员、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知道多种思想并存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中华民族。

这是中国人民的共识！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75：中国新民党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中国新民党（China New Democracy Party）与中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虽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但其主张与中国新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思想并无二致。

中国社会民主党 2000 年 11 月 30 日创建于美国纽约，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2007 年 3 月 17—18 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海外部分)。选举了 38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刘国凯、刘因全、周延风、蔡登文、梅威廉 5 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刘国凯当选为主席，刘因全当选为秘书长。通过了党纲和党章的修正案。

中国社会民主党在香港、台湾、日本、英国、法国、丹麦和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都建有党部。在国内一些省市也建有秘密党部。(为保密，具体省市地名略去)

中国新民党坚信中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海外和国内党部高度关注中国的民主事业，对中国新民党亦多次表同情之心意、行声援之义举。

2008 年 5 月 22 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刘因全先生发表了由中国社会民主党澳洲党部主席吕易先生撰写的声援信，强烈要求中共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教授。

2008 年 8 月 25 日，中国社会民主党陕西党部的“力量”先生又发表文章，谈到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

一、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精诚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

二、中国新民党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附件一：中国社会民主党强烈要求中共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郭泉教授的声明（2008 年 5 月 22 日）

附件二：中国社会民主党陕西党部“力量”先生的文章（2008 年 8 月 25 日）

附件一：中国社会民主党强烈要求中共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郭泉教授

据新民党中央党部称：新民党代主席郭泉教授于 2008 年 5 月 17 日下午 6 时许，在去接孩子回家的路途，被江苏省南京市警察拘捕。随后，南京警察又到郭泉教授家中，非法抄走了郭家的电脑等资料。18 日下午，南京警察才

通知郭泉的妻子：对郭泉处以治安处罚。警方称，郭泉没有罪名，但必须拘留十天，十天后再做处理。同时还威胁郭泉的妻子，对外不要讲太多，否则对郭泉不利。

按照中国现在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实施治安处罚，应该出具正式的拘留证，应该依法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应该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应告知被拘留人可以依法提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南京警察对郭泉教授实施拘留十天的治安处罚，并没有严格按法律办案。因而是故意执法犯法。既然南京警方称郭泉没有罪名，那警察到底以什么证据和理由，对郭泉拘留十天？堂堂国家重要执法机关和执法官员，竟然不依法办案，竟然随意将中国公民拘留，限制其人身自由。试问，中共公民的人权保障在哪里？由这样的执法警察如此执法，中国社会怎样能够和谐？！

我们注意到，中共当局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加紧了对维权人士，宗教信仰人士和异议人士的抓捕和打压。即使在国难当头，全民心系四川地震灾难的非常时刻，中共还是要强制统一中国人的思想，统一对震前预报，震后救灾等情况的报道，不容许任何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声音出现。据新民党中央党部的文宣，郭泉教授此次被拘留，可能就是因为他近期发表了七篇有关地震方面的文章。中共当局不追究地震局及有关官员隐瞒地震预测不报的责任，令那些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的当事者逍遥法外，致使数万人顷刻丧命，数十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亿元财产损失，却拘捕关心国家灾难的善良正义人士。真是岂有此理，简直就是逼人造反!!

中国社会民主党强烈谴责中共警察的胡作非为，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郭泉教授，释放胡佳、黄晓敏等维权人士，宗教信仰人士和一切被拘捕坐牢的异议人士。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起草人：中国社会民主党澳洲党部主席 吕易

公元二００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二：专制的灭亡不会以个人意志或某组织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陕西党部　　力量

看了党内同志对奥运的评论，每个人见识不同，接受的信息不同，人生观不同，注定了大家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这实属正常。只要没有大的原则错误，这也有利于在党内培养平等、尊重、包容、妥协的民主精神。

对于奥运，关注不多。身边的朋友叫我评价奥运，我说你们又会说我激进，因为在我眼中，那一块块金光闪闪的金牌对不能看清本质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象毒品一样，会让自己在兴奋中慢慢死去而浑然不知。

我们获得金牌第一，真以为我们是世界体育强国了吗？专制体制下，早已让奥林匹克的精神变了味，而围绕专制转动的各方，奥委会主席罗格，很多民主国家的首脑，为何愿意为中共背书呢？一个字——利！在利益面前，人类总是显得那样的萎琐与卑劣。罗格难道希望这次奥运会搞砸吗？布什看到白花花的银子能不心动？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无时不在以围绕利益而斗争，这些都是人类的本性所决定。只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斗争了几千年，但是却未能建立一个优秀的分配体制，至今为了利益分配充满了血腥与杀戮。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业已证明，专制体制下，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一切都不过是暂时而已。共赢体制的形成，那就是民主，中华民族才可能迎来真正美好的明天！

再说奥运，我们每一块金牌背后藏有多少血泪？一个体育娱乐项目以血与泪去换取，对民众来说，值吗？再看看，各地体校毕业生退役后，他们的就业情况，由于他们受文化课教育较少，以致多数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退役后无一技之长，迫于生活压力，多数不得走上黑道生涯，看看各地黑社会，有几个地方不是被体校毕业的学生所控制。这种举国体制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我们能视而不见吗？

通过这次奥运会，中共可能会认为圆满成功，在国际社会大赚特赚，其实我不这么看，首先，中共落入了民运的所谓奥运大决战的圈套，请问民运有啥资本与中共进行大决战呢？但是愚蠢的中共真以为大决战到来了，而在国内草木皆兵，弄得民怨再次沸腾，民心再失，无疑再次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自我毁灭的一次过程。

其次，中国的民主进程，根本还在于国内民众的觉醒与抗争。打败中共的不会是国内外民运、维权上访人士、宗教团体、外国民主政府，而是中共自己。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奥运盛世谎言的画皮，会在逐步加深的经济危机中，一一展现在普通大众面前。

几千年的专制，早就养成了中国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愚昧无知的民族性，所以，当灾难不降临自己头上，中国人是不会醒悟的，不会起来抗争的。

中国人从某种角度说，连动物都不如，动物尚且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为自己孩子报仇，而我们人类呢？8964，我们没有为不明不白死去的孩子呐喊，全体国民一直沉默着，512，我们没有为冤死的孩子们呐喊，我们全体国民

继续沉默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我们才知道幡然悔悟，可是悔之晚矣！这就是我们可悲可怜又可恨的民族！

今天，有人在为我们呐喊，那就是郭泉！郭泉的命运预示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预示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前途与命运！专制的壁垒需要郭泉这样的勇士去撞击，而我们能在幕后为他做些什么呢？

我也获悉了党国在十月份展开镇压的消息，这才符合共产党的本性，也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专制的灭亡不会以个人意志或某组织意志为转移的！

今天，我们的经济已走如一盘死棋，中共能把这盘死棋下活吗？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76："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8 月 29 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说，虽然近年来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最大的一年，收入比达 3.33：1，绝对差距达 9646 元人民币。

所有读过中国历史的朋友，都会发现，全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起义战争史。那么，中国农民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爆发农民起义呢？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的口号：

一、夏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夏桀是历史上的暴君，极其残酷。农民起义时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日子不好过啊，我们和你同归于尽!"

二、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秦汉之交，政出豪门，权力世袭。普通民众无权过问政治。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打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把想要政治平等的话讲了出来，意义非同寻常。

三、王小波、李顺起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

中国的大宋王朝是一个经济文化强盛，但军事上比较弱小的王朝。

宋王朝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 30%左右。当时到过中国的有些西方人说，大宋开封城门口守城的士兵的生活都好过欧洲的国王。经济如此强大的宋王朝，为什么还是有农民起义呢?

只有一个理由可能解答，那就是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却"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

所以王小波、李顺打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口号。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观点。与东西方所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们相比，他们是最早的社会党人。

四、钟相、杨么起义："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大宋王朝并没有在这次起义中得到教训。社会还是处于两极分化的发展状态，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钟相、杨么提出了"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他们不只提出了均贫富的观点，同时在政治上，也提出了等贵贱的平等思想。他们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财富上平均和政治上平等思想人。钟相、杨么的观点，与中国新民党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是最贴切的。

五、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口号："均田免粮"

李自成起义的条件也是和当时社会发展两极分化有关，所以他提出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均田免粮"。李自成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闯王来了不纳粮"。

六、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

当洪秀全以天父的名义提出这些个理念时，而远在德国的同情者马克思，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

其实，无论是洪秀全，还是马克思，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圣经》使徒行传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各取所需"。

孔子主张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也主张天下为公，使徒讲大家公用，马克思讲共产主义，其实，都来自人类的远古文化。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起义的两个根本要求，就是在政治上要求“等贵贱”，在经济上要求“均贫富”。

那么，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分别是什么情形呢？

第一、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8 月 29 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承认“今年虽然近年来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最大的一年，收入比达 3.33：1，绝对差距达 9646 元人民币”。

第二、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强行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捞取财政收入；

第三、包括种子、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年来大幅度涨价，去年以来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等因素都对农民构成沉重打击。

第四、对维权之农民，中共政府采取高压之劳教、劳改，加以陷害、羞辱。毫无法治可言。

第五，农民在政治上处于下等地位，没有参与权、话语权。

第六，农民饱受地方党霸、权贵的欺压。

中国是农业国家，自古君王皆知重农抑商。国家之根本在农业。农民利益决定了国家利益。

劳有其获, 作有其利，属宪法之论；生有其权，居有其屋，是政治之务；操有其业，守有其产，乃人伦之常。是故天有其道，物有其主，人有其情。天有道者，则阴阳顺；物有主者，则贵贱和；人有情者，则内外睦。圣人之治，亦无非顺阴阳，和贵贱，睦内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国能泰而民自安也。故鹿台钱多，不解民之穷，巨桥粟盈，不养民之饥，是殷纣亡之始也。阿房蔽目，未顾民之怨，长城入海，未悯民之劳，为嬴秦灭之由也。为治者，岂不应每每无眠以警之哉？

但是，中共治下当今之中国，贫富分化已成阶级对抗之势。大量农民成为失地难民。吾常闻百姓之利益，惨遭权贵谋夺！睹颤颤之黎民，难忍泣血如泪。刮民脂民膏竟至此，建鹿台阿宫之何如？问天理人道之安在，疑党纪国法之不存！哀吾生不逢时，叹彼空抛脑颅，每思为孰执政，常闻三个代表，昨犹信誓旦旦，今何荡于缥缈？

痛定思痛，然后有悟，物观其变，然后有验。历史长河，浩浩渺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敢言中共如此行政，偕商猎民，舍本求末，逞权枉法，乃亡党之举！

此行之害，妇孺皆知，一意孤行，背信弃义，必成千古罪人，为万民所唾弃。

中共之政策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无悔改之良心，却含虐杀之歹意。

民已水深火热，国亦危急苦难。

中国新民党为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誓言“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郭泉：民主先声 277：两岸教育法比较：同为中华儿女，陌生至此，真是恍若隔世矣！

今天是 9 月 1 日，所有的学生迎来了新学年。再过几天，9 月 10 日就是大陆的教师节了。中共确定 9 月 10 日为大陆教师节，这个日子既毫无根据，又毫无意义。

而台湾人民的教师节是 9 月 28 日。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是台湾的法定节日。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象征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万世师表典型。以六艺传授学生三千多人，不论其阶级、人品，凡是真心向学，他皆来者不拒、诲人不倦。春秋变局中，孔子力学济世，曾为匡正社会而周游列国，劝谏君王行道；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奠定中华文化万世不易的基石。民国二十八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将孔子诞辰八月二十七日订为教师节。后来经历数及考纪专家将孔子诞辰换算为国历应为九月二十八日；故于民国四十一年由行政院提请总统明令：孔子诞辰及教师节改为九月二十八日，以纪念至圣先师，并慰劳教师们经年的辛劳。

今晨早早起床，照顾孩子吃了早餐，就匆匆忙忙送孩子上学了。回到家，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仔细读了一遍，又找出中华民国教育法认真学习。合上两本教育法，我望着窗外，思索良久。

同为中华儿女，却分别隶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教育法；莘莘学子接受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真是恍若隔世，令人感慨万千！

于是，再次打开两本教育法，抄录以下文字，供大家思考。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陆和台湾对教育的不同理解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教育的理解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中华民国教育法对教育的理解是："为保障人民学习及受教育之权利，确立教育基本方针，健全教育体制，特制定本法。"

中共为政治而发展教育，台湾却倡导教育乃民权的理念，孰优孰劣，当下即判！

其次，我们再看看大陆和台湾对教育之任务的不同理解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华民国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中共为专制统治训练人员，台湾却为民主体制培养人才，孰优孰劣，当下即判！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陆和台湾对教育的指导思想的不同规定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2007 年，我因为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要求中共立即终结独裁实现民主，而被南京师范大学依据这条法律剥夺我的教学权，撤消我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副教授津贴。

而中华民国教育法的规定是："教育之实施，应本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之原则，以人文精神及科学方法，尊重人性价值，致力开发个人潜能，培养群性，协助个人追求自我实现。"

中共之教育在于捍卫独裁，台湾之教育在尊重人性，孰优孰劣，当下即判！

抄毕上文，掩卷叹息：

大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有的只是专门培养奴才的"教化"而已。

然教育的根本乃培养国民质疑之精神，独思之能力，此两样，中共的教育里一样都没有。

呜呼！同为中华儿女，彼此竟如此之陌生，真是恍若隔世矣！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78：同为禁书：笑蜀先生的《历史的先声》和我的《民主先声》

最近，总有人把我的《民主先声》与笑蜀先生的《历史的先声》搞混淆。

虽然这两本"先声"同属禁书，但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4 月 13 日，我曾与邓伍文先生、景凯旋先生讨论过"西安事变"的最新发现史料的分析问题（参见《民主先声 182》），席间，我说到，我有好几位在党媒工作的朋友悄悄给我消息说，接到最高部门的电话通知，不得刊登、报道郭泉的"反动文章"。

我还说，这种用电话通知且不得记录的方式比以往用红头文件来宣布"禁书"的方式要有趣很多。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来昭示了中共明显地缺乏底气，二来也暴露了中共不想留下犯罪证据的心理。

景凯旋先生风趣地说，中共在 2000 年把中共自己说的话都禁止了呢，他们早就没了底气。

我忙问怎么回事？

景凯旋先生说，笑蜀先生把中共 1945 年前后关于民主的言论汇编成册，冠以书名《历史的先声》出版后，立即被中共宣传部门封杀，列为 2000 年的第一大禁书。

我笑起来，说，禁我的《民主先声》，这好理解，毕竟我是在公然挑战独裁。而中共把 60 年前《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中共自己写的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文章也禁止了，那就说明了中共 60 年前摆明了就是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搞政治欺骗，或者说现在的中共摆明了要反对 60 年前的中共的"民主"主张。

景凯旋先生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时常在南方都市报等著名报纸发表民主时评。其中《民主政治成熟需要六十年？》得世人瞩目。景先生所言"民主从来不会造成社会的安全问题"，相反，专制才是中国动乱的本源，此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笑蜀先生的那本书的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1999 年 1 月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内容全部选自40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共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中共官员、学者的论文和谈话。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所有内容，归纳成一句话，就是：立即终结独裁，实现多党竞选。

其实，我认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解决了目前很多反对民主的人提出的三个问题，即国民素质很低，不适合民主；其二、一旦民主将会国家分裂，天下大乱；其三，没有任何政党有能力代替中共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些反对民主的论调，中共在60年前都已经做了最充分的反驳。

结果，中共下令，《历史的先声》的内容为反动言论，立即禁止印刷、销售和转载。

笑蜀先生无奈写了一篇文章奚落中共，题目是《请做一个有尊严的统治者》。现选三小节，以飨读者朋友：

一、中国现在的统治者，不是不聪明，不是不明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实在太聪明太明白了。他们知道世界潮流什么样，他们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不要以为这些方面他们比我们蠢，他们知道的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知道的还多。

二、统治者绝不蠢，但他们的过度的自卑和过度的自大、他们过度的心虚和过度的狂妄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神经极度衰弱的人，有一点亮光有一点声响就睡不着觉。统治者现在正是如此，极度的自卑和心虚使他们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极度的自大和狂妄又使他们对自己估计过高，以为有权就能摆平一切，肆无忌惮。这两种变态心理叠加的结果，就是反应过度，不该出手也出手。他们以为他们踢的永远是豆腐，却不成想往往一脚踢到铁板上，只好呲牙咧嘴地退回去。

三、一个没有尊严的统治者，实际上是自断退路，自己葬送和解的可能，自己葬送得到人们宽恕的可能，实际上等于自取灭亡。这简直是愚不可及。

下面，我把最近几年中共用红头文件形式列为“禁书”的好书一一列出，请大家务必找来学习。

1、《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编者：笑蜀。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来自历史真相的震撼。与其说这本书太有名了，还不如说中共的骗术太高明了呢。

2、《谁是新中国》 作者：辛灏年。蓝天出版社，1999年。

老辛作为1989年的知识分子，90年代初离开大陆前往美国。总而言之，老辛是个褒国贬共的学者，本书是一本以史料为根据的学术著作。书中介绍，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竟然种植罂粟，毛泽东美其名曰：“革命的罂粟”。

3、《往事并不如烟》 作者：章诒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也许你不认识章诒和，但你应该听说过她的父亲——章伯钧，以及章老的挚友储安平，他们都在反右中被打为右派，而且还是所谓的“四大右派”成员。的确，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中往往夹杂着血淋淋的伤痕。该书在大陆发行时，删改较多，网上有台湾版全本。

4、《伶人往事》 作者：章诒和。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浮沉，写出了那些名动一时的戏剧名角怎样被毛时代的政治所淹没，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又是怎样在政治的糟蹋下凋零。

5、国亚的回忆录《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讲述了一个家族的150多年的沉浮（1850年——2004年），有评论称之为“一部能让千百万人流泪的人民信史”，特别是作者记述他所经历的1989年。

6、 旷晨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分为50年代、6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70年代和80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记录了50年代的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创建人民公社，庐山会议；60年代的饥饿记忆、学习雷 锋、学大庆、学大寨、原子弹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大串联；70年代的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周、朱 毛死亡、“四人帮”的垮台、中越之战、平反冤假错案；80年代重大新闻事件、有影响的电影、电视剧、歌星、书籍。

7、胡发云的小说《如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触及到网络时代的真实中国，记录了SARS危机和孙志刚事件中的众生态，有官场的黑暗，官权的谎言，官员的势力，也有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老一代的深切反思，中年一代良知者的呐喊。

8、朱华祥的小说《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年版），记录了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丑态，被评论界誉为新闻官场现形记。（其中有原北大副教授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

9、《哈耶克全集》 作者：哈耶克。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社会主义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 ；而且社会主义违背人性 ，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10、《中国底层访谈录》 作者：老威(廖亦武) 一个个最底层的人物，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多彩。种种是非悲凉在当事人久经沧桑的双唇间娓娓道来时，我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以及这部真正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史记》。（老威其他著作：《沉沦的圣殿》(99 年中宣部发布的禁 书榜榜首)；其他关注下层人民的著作：《中国农民调查》）

11、《庐山会议实录》 作者：李锐。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得到这本书，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庐山会议实录》仍旧是一本禁书－原因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庐山会议上的毛是什么样子?林彪是什么样子?周是甚么样子?彭帅又是怎样应对的?我始终相信，李锐是在对彭德怀深深的缅怀中写完此书的。两个有良心的老党员，在书中再一次心灵相会。（李锐其他著名作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12、《共产主义实录》作者：Richard Pipes，这是一本着重从社会学角度上宣告共产主义——苏维埃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注定灭亡的讣文。作者认为，要用共产主义实现绝对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 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为的失败还是运动本身的先天缺陷呢?看过本书，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13、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版），以亲历讲述了《人民日报》在 1949 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角色，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运动、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 命、拨乱反正等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反右中巴人、徐懋庸、吴祖光等人，文革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夏衍、唐弢、孟超、陈笑雨等人的悲剧命运；还记述冰心、胡乔木、周扬、林淡秋、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人。其中的真相和是非，加上作者多年来珍藏的信件、手稿、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4、晓剑的小说《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书中揭露了中共在延安种植、贩卖鸦片的事实。

15、《劫杀》 作者：唯色。西藏问题是中共的尴尬，文革是中共难以掩饰的耻辱，那么文革中的西藏……你可以不相信流亡海外者的惊人报料，可以嘲笑反华人士的信口开河，但你无法忽视这部照片集所呈现给世人的那段“藏着的历史”。（同样展现西藏历史的还有唯色之夫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

16、《晚年周恩来》 作者：高文谦。人民爱戴的总理形象有时候并不真实，因为他是由一个政权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刻意塑造的。同样，我也无法完全论证书中事件的真实性，不过高文谦当年的身份是真实的：“周恩来档案研究室”成员。 （作为领导人的野史，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王明五十年》以及《张国焘回忆录》）

17、朱凌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海南出版社 2006 年版），记录了一位民间人大代表姚立法先生在人大会议上敢于一次次大声地喊出“我反对”的感人故事。

18、《朝鲜战争揭密》作者：沈志华。一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战争，实则酝酿在一个个暗箱的操作之下。沈志华，一位以档案为依据的现代史学者，他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历史教课书上的内容有时是靠不住的。本书叙述的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书后多达 129 种参考书目提醒我们，这是一本治学严谨的历史著作，无论现代史学者还是欲寻求历史真相的普通读者都应该细细品读。随着时间的推移，韩战的真相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况且书中并未太多涉及“原则性”问题，看来这本书的解禁之时指日可待。（另：网上可以找到沈志华在香港关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演讲视频，很不错!）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79：中国新民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结盟告示

2008 年 8 月 31 日，中国新民党公开发出关于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缔结民主同盟的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参见《民主先声》275）。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如下：

一、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精诚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

二、中国新民党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次日，接到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国凯先生发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谨致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公函。公函如下：

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您好！

亦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更加欣喜万分！

历史悠久、具有系统清晰理论和丰富实践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已取得巨大成就。它将在中国也取得巨大成就是无可扭转的历史必然性。

奉行民主政治，且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主张尽可能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必将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所信奉也是中国明确的政治前景。

中国社会民主党在海外成立八年来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造就相当影响；从前在异议阵容中被忽视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已得到广泛传播，国内和海外的社民党组织也在稳步的发展之中。

郭泉先生领导的新民党提出与社民党结盟我们持积极响应的态度。并拟作如下建议：

1、现阶段社民党暂只与新民党结成在野民主政党联盟为宜。

2、发表结盟宣言。

3、组织暂各自独立，

4、建立密切信息联系，对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共同表态。

5、社民党、新民党应有在今后的某一关键历史时刻组织合一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在名称上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民主党是最正规的名称，且更易于融于拥有 130 年历史、167 个兄弟党的社会党国际体系的现实。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党群体是与中共专制斗争了三十多年的老一辈民主志士，当有适时实行中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世代交替的胸怀。

中国社会民主党非常愿意在以上共识的基础上与郭泉先生暨新民党朋友们进一步商议两党进行结盟的细节研究。

谨致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2008 年 8 月 31 日

9 月 4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会议，决议如下：

1、中国新民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缔结在野民主政党联盟；

2、中国新民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商讨并公开发表结盟宣言；

3、中国新民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两党组织各自独立；

4、中国新民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互通信息，并对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共同表态；

5、中国新民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开放党禁后另行商讨两党更为灵活、紧密的组织形式；

6、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与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商议两党结盟的其他细节问题。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80：中国的左右两翼改革思潮的矛头一致对向中共

今天（9 月 5 日），年轻的自由政治评论家楚天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解析中共十七大前后的公开信风潮》。阅后，赞叹楚天先生的政治洞察力。现发原文给大家，作为参考。

惟根据论文主旨改论文标题为《中国的左右两翼改革思潮的矛头一致对向中共》，把原标题《解析中共十七大前后的公开信风潮》作为副标题列后。

中国的左右两翼改革思潮的矛头一致对向中共

——解析中共十七大前后的公开信风潮

2007 年十月间的中共十七大在一片花团锦簇和欢歌笑语声中“胜利”闭幕了，中共在这次大会上又一次成功营造了“团结和谐”的政治形象。但是让中共当政者始料未及的是，就是在这次动用了数以十万计安保人员的保卫下而“成功”召开的中共政治秀结束的第二天，在网络上就陆续出现了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风潮，为中共的这次“合谐”大会的落幕制造了不合谐的音符。

在这次众多的上书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尤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的公开信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引

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同时汪信也是在中共十七大结束后，确切的说是在中共十七大结束的第二天（10 月 22 号），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的、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第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标题为“对策和谐社会”，正是此信的公开发表，引发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上书热潮，其后不久，在网络上接连出现了多封要求中共执政当局正视当前中国所产生的诸多激烈矛盾，立即启动政治改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转型做出实际的行动。在这些众多的公开信中，不仅提到了当前中国大陆切实存在的诸多体制性因素所引发的激烈矛盾，而且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希望中共政府以天下苍生为念，正视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打破体制性弊端和制约，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平反六四等历史上形成的冤案、错案来谋求破局

公开信风潮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因素，其产生的背景就是体制内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局势严峻的前提下，终于打破了沉默，决定以上书中共领导人的方式来推动国内政治改革的启动和运行。

在他们认为，如果当局再不下定决心实行政改，中国社会将离革命和动乱不会远了。根据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来反思今日中国大陆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也可以说当前中国国内形势非常的严峻：

一方面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 CPI 指数（物价指数）步步攀升，民众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生活质量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的股市却是由去年的 10 月份、国家财政部出台关于调高印花税决定之前的暴涨到现在的狂跌，市场脆弱不堪，股民怨声载道。楼市的泡沫也正在破灭，以深圳为代表的许多沿海城市普遍出现了炒楼者被套牢的不正常现象，由于楼价下跌幅度过大，许多房主的房价大为缩水，银行按揭供房压力徒然加大，已处于停供的边缘状态。而从企业层面来看，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迁移和倒闭的现象，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2008 年上半年仅半年多时间，广东珠三角倒闭企业已达三万多家，而与此同时，浙江省的中小型倒闭企业数量也已超过了三万家。沿海地区很多的港台企业则选择了将工厂直接迁移到越南、印度等人工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去，以此来应对在中国大陆办厂正在逐步丧失的成本优势。

从国内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城市被强制拆迁户以及部队转业军转干部、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的实际生存状态来看，都很不乐观。这些群体一直挣扎在温饱线内，长期以来，他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外来强制力的非法剥夺，进行了一次次不屈的抗争，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只能以上访的途径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当处于强势集团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私下间的不法交易愈演愈烈，他们利用体制内的弊端和手上的权力，打着改革攻坚的旗号、鲜廉寡耻、贪得无厌、权钱交易、强奸民意、漠视人权、大肆侵吞国家、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其行径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引述郭泉教授《民主先声》调查数据：近 5 年来，因腐败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干部为 137711 人，因腐败问题受到纪律处分的达到了 708439 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为 28996 人，省部级干部 98 人，真是前仆后继、连绵不绝。《民主先声》中还有一篇关于中国大陆亿万富豪背景的统计数据，现援引如下：至 2006 年 12 月底，在大陆区域内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 27310 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 3220 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 2932 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 亿元。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 1566 人；浙江省 462 人；上海市 225 人；北京市 195 人；江苏省 172 人；山东省 141 人；福建省 92 人；辽宁省 79 人）。

另一方面是旧的问题却通过上访途径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中共各级官员漠视上访群众的权益和利益诉求，轻则欺骗推诿，不了了之；重则动用政权强制力量，加以打压。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在不断的产生，社会上各阶层对抗性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在中国大陆的各地、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上访人士越来越多的现象。与此同时，国内群体性事件也随之迅速增长，个人极端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据国家有关统计数字调查显示：中国大陆 1996 年 15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为 8700 多起，而这一数字到了十年后的 2005 年却达到了 87000 多起，参与人员数量超过了上仟万，十年增长了十倍之多，社会危机空前激烈。

种种情况显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经济改良政策到今天已经整整走过了三十年，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激发了个人在市场领域的作用和积极性，从法律上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神圣及不可侵犯性，促使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相对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模式的同时并存与发展，特别是私有经济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了的有效的改善和发展；而且还使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拥有了更多个人的空间和自由，旧体制对人们的制约和束缚不断减弱，人们拥有了相对的、跨地区和行业选择从事自己所喜爱职业的自由。不仅解决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物资严重短缺、政

治意识形态异常僵化等弊端,同时也削弱了中共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迫使中共政权从许多领域逐渐退了出来，社会格局再也不像原来的那样铁板一块了，共产党政权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由威权政治向民权政治转型的后威权政治时代。

后威权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而在中国又伴随着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丧失和社会道德的沦丧等诸多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一方面已形成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但另一方面呢？却是连最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德都丧失了，在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下，许多人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光环，扭曲的性格可以促使他们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心和帮助，有的只是尔虞我诈和冷漠的眼神。这些都是现代人们丧失信仰和盲目追求功利的结果。在一个社会缺失了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后,在人们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产生怀疑的时候，在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共产党官僚已经彻底蜕变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今天，社会各阶层利益之间的诉求与斗争已呈水火不容之势，因此，才有学者预言，如不从速改变今日中国之矛盾和现状，新一轮的革命风暴的来临将不可避免。

在这次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中共执政当局表达政治诉求的人士，期望于通过上书的方式来影响中共执政当局对当前现状的关注，寄希望于此来影响中共十七大后的路线方针的走向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一切的希望又要落空了。不过，通过这次上书建言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此次发表致中共领导人公开信的不仅有体制内外的、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潮，要求走西方民主宪政道路的自由派学者；也有共产党内的左派人士。

党外民主派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约束，在于执政党及其官员缺乏监督和制约，他们要求共产党能够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配套已经实行了三十年、目前已处于瓶颈状态、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并希望中共能够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赋予人民有结社、组党和信仰的权力，其核心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这次上书潮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次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一直以正统的共产党人自居的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极左派人士，也以公开信的方式给他们的中央建言建策，在他们的公开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异常的痛恨当前的腐败现象，并且也敢于正视和揭露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他们以工农群众、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大力批评在他们认为已经走上修正主义歧途的执政集团，他们认为中共当前的路线方针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共产党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言人。

我们据此可以看出，民主自由派和共产党左派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看法是惊人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在解决方法上却是迥然不同、完全相反的。党外民主派认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认为中国当前从速要做的是进一步的推进改革往纵深方向发展，要求中共推动政治改革，以民主宪政以及法制的精神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保障民众的政治权诉求和个人权益；而共产党党内的左派人士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虽然曾经为打江山而出生入死，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各种名誉和荣耀，但是作为中共当前执政路线的坚定反对者，他们也已逐渐被边缘化，在党内失去了话语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此次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公开发声的一个原因吧！他们这些人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深深怀念那个时代，他们认为现在一切罪恶的历史根源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对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方针，他们深恶痛绝，直斥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高度计划经济的威权政治时代去，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根本就走不通。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次左、右两派公开信上书的代表人物及左派近几年内的几次重大活动：

就党外民主人士而言，有前面我们提到的汪兆钧，还有要求中共尽快启动县区级政务官直选的安徽省民营企业家郑存柱，同时还有一位从中共十七大后连续起草了十四封公开信，一直在为国内 59 万石油系统下岗工人、13.8 万银行系统的下岗人员、370 万转业军官和复转军人和数量更为庞大的“经租房”户主维权的南京学者郭泉教授。

郭泉教授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中，明确提出了要求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

虽然这封公开信发出之后，中共以开除其中国民主同盟盟籍和剥夺了他的南师大副教授的导师资格作为回复，但是这位具有坚定民主意志、声称已经做好坐牢甚至杀头准备的勇敢知识分子，随后却在各路维权力量的拥戴下，在当今中国大陆政治生态还十分严峻，在目前专制制度高压的恶劣政治气候下，毅然宣布组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诉求和性质的新型右翼政党——中国新民党，并且出任该党代主席，为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的公开信则是一封以马宾为首的十七位老部长、老省委书记联署建言十七大的公开信流传最广，而接着在网络上又出现了一封170位中共老干部署名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正视当前矛盾，反思改革，重新回到中共改革前的老路上去。中共党内左派的这些活动，与2005年9月份毛泽东逝世二十九周年他们在全国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是一脉相承的。

据当时的新华社内参消息：在该年的九月毛泽东逝世二十九周年纪念日期间，全国毛派人士相当活跃，该内参报道这则消息的题目为“朝野毛派谋造反”，异常醒目。在当时以北京、天津、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和延安等十八个城市都出现了追思会，其参与人数有数佰人至数仟人不等，其中在北京的追思会就连续举办了七场之多，参会人员包括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女、有资格甚老已经离退休的中共党内老将军、老部长和老省委书记，还有近年来从事左派思想宣传的中青年学者代表以及来自各地的老干部、老工人代表等。最后，多数会场失控，追思会变成了控诉会，他们在会上大力批评当前中共执政当局的路线方针，有的老干部见面大骂邓小平，认为其出卖了无产阶级，将中国社会引上了歧途。

更有甚者，在延安的追思会上，有人带枪到会场朝天鸣枪，扬言要发动第二次工农革命。北京的追思会上，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在发言时，直斥邓小平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最大的背叛者。在天津的追思会上，会上不仅有著名左派作家魏巍朗诵《让革命的烈火燃烧吧》等战斗性的诗歌，而且还在会场播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文革歌曲以壮声势，中宣部现场观察官员几次到台上制止均为无效。

在湖南长沙的追思会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等中共元老到现场并作了讲话。纪念活动后不久，四位有左派立场的人士因在郑州市人民广场宣传毛泽东思想，在现场派发毛泽东宣传资料而被警方逮捕并判刑，引发了全国左派人士新一轮的抗议浪潮。他们认为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因为宣传本党开国领袖的思想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是一件讽刺性的事件，这正说明共产党已经彻底变质了。这次事件也在网上被称之为郑州“四君子事件”。

通过了解到的上述关于中国大陆左、右两翼政治力量的活动和诉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左、右两派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理念，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政见不仅不相同，而且正好完全相反：

从经济所有制模式上来看，一方认同私有制，承认私有企业民营经济所作的贡献和作用；而另一方却是坚决抵制和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模式，他们认为这些就是万恶之源，他们要求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去。

从政治治理模式上来看，一方坚决反对一党专政，认为一党制度必然会因执政党缺乏监督而导致执政党官员的腐败；另一方则坚决要求捍卫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会逐步走向富强，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对于一党体制下的官员得不到新闻和反对派监督的问题，他们则认为通过毛泽东的那种搞政治运动、党内整风活动就完全可以杜绝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左派人士也在思考着在党内建立监督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底牌还是要以保持一党专政治理模式、维护公有制地位为其基本原则，并不认同党外民主派所倡导的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人民有权利选择执政党和行政官员竞争直选产生等原则。

虽然这两股政治力量的政治诉求、路线方针完全不同，但是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矛头都对准了当前的中共执政当局。他们都对当前中国之现状忧心忡忡、极为不满。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观点迥异，虽然他们也会为了路线方针等中国未来之走向问题的争议而在网络上大加挞伐、相互揭批。

例如去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曾经被共产党打为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谢韬老先生，因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而遭到了国内毛派在各论坛的猛烈攻击。

而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周天勇、王长江、马怀德、李良栋等15人编写的《攻坚》发表后，郭泉教授立即发表文章批判俞可平和周天勇等人是在搞“一党民主”。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今日之中国，不仅只是要求政治改革的党外民主派在国内主流媒体丧失了话语权，同时共产党党内的那些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的老党员、老干部同样也丧失了话语权，他们也只能在他们的那几个网站上面发发牢骚而已，有时他们的网站也会被当局关闭整顿。

因此，就有了中国泛蓝联盟重庆地区负责人张起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在2007年春节，四川和重庆两省市举行了新一年度的异议人士春节聚会，而在这一次的聚会上，聚集了中共建政以来各个时期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受害者和持不同政见人士，不仅有1957年的老右派、文革受害者、1978年民主墙时期的民主先驱者、还有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一代、1998年在中国大陆组党的民主党人，再加上他们大陆泛蓝联盟的代表，代表性不能说不广了，

但是正是在这次的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毛派的代表，可谓感慨万千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一直都同党外民主人士誓不两立的国内毛派人士，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都是一样的，都在遭受中共当局的打压和压制，不仅丧失了话语权，就是自身的个人人权都随时有可能受到侵犯。一样艰难的困境促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握手言和，来共同思考中国未来之命运的问题。

还有一个案例也可以从某个侧面展现左、右两翼的这种复杂关系，本世纪初的 2002 至 2004 年，在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全面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人上街示威游行事件，在那段时间内，在东北的辽阳、鞍山、抚顺、四平、大庆等众多城市此起彼伏的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工潮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事件，参于人数少则数仟人，多的像大庆的工潮号称是达到了十万之众。

其中又以在辽阳市所爆发的那次工潮影响力最大，当时数万名愤怒的工人们手举巨幅毛泽东画像，打着“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标语游行在大街上（龚尚武为当时的辽阳市委书记），事后工人代表姚福信、肖云良等被当局判刑。罪名是参与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煽动工潮、企图颠覆国家政权。而姚、肖两人却并不认同当局给他们定的罪，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共辽阳市地方政府对于他们的打击报复、企图通过对他们的判刑来掩盖当地的黑幕。因为他们举报了辽阳市冶合金厂在改制前的几任企业领导的巨额经济问题（据说还牵连到了辽阳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在他们长期到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申诉上访而无效的情况下，当他们在所谓的企业改制改革的政策下，为之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曾经无比辉煌的工厂突然被宣布破产，当他们即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此时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是值得同情的。相反，倒是那些贪腐的共产党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是可耻的，是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的。然而，让工人们无比愤怒的是，犯罪者们却依然逍遥法外，活得自由自在；而可怜的他们却要为下一顿饭而发愁了！

不管共产党的宣传怎样运用各种媒体、开足马力来宣扬他们的那个所谓和谐社会的，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没有一丝的和谐。至于当地政府定性他们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这个事情，他们也详细的介绍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当时在他们正为了举报企业领导贪腐，在手里掌握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却多次被相关部门拒之门外，举报的问题得不到任何的解决和合理的答复。

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说了辽宁省在几年前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是专门监督共产党，为老百姓说话的。于是他们通过打听并在辽宁鞍山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前后才和他们接触过两次，其中在第二次的时候，正好民主党辽宁省的一些代表正在一起开会，他们也在场旁听了一会，在会上，他们因为听到有民主党成员在会上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专政制度，而当场和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中途退场。

据事后姚、肖这两位工人代表用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工人心里最尊敬的人就是毛泽东，他们深深的怀念那个时代，他们认为那个时代没有工人下岗、没有贫富差距、也没有贪污腐败！也正是由于对毛时代的深切怀念，所以才有了工人们手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走在了游行前列的那一幕！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对他们这项指控也是不实之词，是拿一顶很大的政治犯的帽子强行盖在了他们的头上。对于几个为自己生存权而抗争的普通工人施以如此毒手，其背后的目的就不难揣摩了！

据另案处理的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负责人王文江被警方逮捕后，对这一事件的笔录证实同姚、肖二人所述大致相符，作为律师出身的王文江先生，他的操守还是可敬的。

通个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具有左派意识的工人代表，最终却被中共辽阳市司法部门定性为从事右派组织的活动而陷入牢狱之灾。

从此事可以看出左和右两股力量都在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而罪名可以由他们随意的捏造拟定。事后，在辽阳市有些工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原来对民主党还不了解，原本不是民主党员，怎么他们就被说成是民主党了呢？要是这样，我们以后还就支持这个民主党了！

用理性思维来分析，在这次中共十七大前后所爆发的公开信风潮，是目前中国尖锐社会问题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客观反映,它的产生是建立在民众民生疾苦、生存状况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的，而与此同此，国内那些不法的政府官僚却依旧不顾人民死活，花天酒地，同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干着侵吞贱卖国有企业财产，无视人权，强制拆迁，横行不法等种种恶劣行为。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民众的痛苦指数和忍赖度已经接近了极限。

而国内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借着中共十七大的这个契机而向其建言的，虽然左、右两翼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却是相同的，我们衷心的期望，在共产党体制内外的、具有不同政

治诉求和派别的人士能够早日形成共识、达成合解！。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左派人士能够同国际接轨，为什么不能认可像国际上的左派组织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呢？国际上的左派政党和组织里面已经找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字眼，他们也逐渐认可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等模式，并且遵循宪法的原则，通过合法竞选而上台执政。如今，通过长期的实践，他们已经摸索出一条通过选举而上台执政的新路，像西北欧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还有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力量只有挣脱教条主义和理论的束缚，不断创新，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可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在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像郭泉教授那样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已经走出了书斋，走向了民众中间，他们能够倾听民众的疾苦，并且积极从事着同工农群众结合、为他们维权、替民众排忧解难的新道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威权政治体制下独立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正在从事着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库龙和马佐维耶斯基等所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希望中共执政当局以人民福祉为重，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主动推行政治改革，以政治制度作为保障来促使中国目前的这种坏的市场经济能够向好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化，以此来谋求破解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困境，引导中国社会向着良性转型的路子迈进！如若还是继续抵制政改，那么必将导致中国走向暴力和动乱的深渊，正如现在好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样，中国的未来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主动政改，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和平转型；要么只有等待暴力性的大革命风爆的来临了！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81：致郭国汀先生："均贫富"并非是搞"毛氏贫困社会主义"

9 月 1 日，我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参见《民主先声》276）。

9 月 3 日，郭国汀先生寄来一封信谈了他对我的这篇文章的意见，这让我感动不已。

郭国汀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被称为"中国良心"。

郭国汀先生 1958 年 1 月 10 日出生于中国福建长汀。现为上海市天易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全国律协海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律师协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国际海商法委员会会员、《海事审判年刊》特约撰稿人、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海运学院海商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2008 年 5 月 18 日，我因为组织全国高校的 30 多名教授、研究员发表公开信谴责国家地震局隐瞒地震预报而入狱 10 天。在我被羁押在南京看守所的十天里，郭国汀先生著文替我呼吁。

先生之举义薄云天，弟兄之情血浓于水。郭国汀先生的声援信如下：

郭国汀：敬请各界朋友关注声援支持郭泉教授

据新民党中央党部称：2008 年 5 月 17 日下午 6 时许，郭泉教授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被 7、8 名警察拘捕，随后警察到郭泉家抄走电脑。18 日下午公安口头通知郭泉的妻子：对郭泉处以治安处罚。

警方称，郭泉没有罪名，但必须拘留十天，十天后再做处理。同时威胁其妻，对外不要讲太多，否则对郭泉不利。据分析郭泉极可能是因为就近期四川大地震发表了七篇救灾相关文论而遭中共当局的刻意报复。5 月 16 日四川成都黄晓敏先生亦遭中共当局拘捕。

在此首先强烈谴责中共专制暴政滥用职权打击报复吾国正义人士，强烈谴责胡锦涛再度践踏法律与人权的胡作非为！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郭泉教授并公开向郭教授赔礼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

郭教授因向胡氏三度公开上书而被阉割了精神的大学强制解聘教职，他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批评中共当局及主张自由民主，属依法行使受宪法保护的各项基本人权，完全合法。他一无任何行为，二未违反任何法律，三未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连警方也承认没有罪名，但中共当局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拘留郭教授十天！

中共专制暴政此种行为纯属无法无天践踏法律的蠢行，必须制止！

其实，郭泉副教授原本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愤青，如今已成为杰出的民主斗士，他在大陆中国万马齐喑国人整体

麻木不仁多患政治阴冷重症之情况下，响应汪兆钧先生致胡温公开函挺身而出，依法要求中共当局履行宪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程序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同时公开发表了 200 余篇民主先声等政论时评，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由于中共当局趁四川地震大灾人们无瑕他顾之机逮捕他，国人似乎将这位可敬勇敢的民主斗士遗忘了，面对中共暴政而保持沉默是可耻的。

我认为郭泉博士是一位极有正义感同情心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苦难，因而在中国社会巨变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不顾个人家庭安危勇敢地为民请命，此种大无畏的精神，此种义士情怀值得每位国人学习和效仿。尽管郭教授有时可能存在言说过头的缺点，然而其所作所为足证其动机纯正，其实质是为全体国人为争自由人权民主法治与宪政而战。

是故，敬请全球各界朋友们，特别是全体民运人士及爱国愤青们，关注并声援支持郭教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英雄孤独地承受本应由全体国人承受的苦难。

9 月 3 日，郭国汀先生针对我在《民主先声》276 中提出的“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再次致信发表意见。

《民主先声》276 最后一段写到：

痛定思痛，然后有悟，物观其变，然后有验。历史长河，浩浩渺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敢言中共如此行政，偕商猎民，舍本求末，逞权枉法，乃亡党之举！此行之害，妇孺皆知，一意孤行，背信弃义，必成千古罪人，为万民所唾弃。中共之政策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无悔改之良心，却含虐杀之歹意。民已水深火热，国亦危急苦难。

中国新民党为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誓言“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郭国汀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意见全文如下：

郭泉老兄：近好!

大作拜读，很不错，仅有一点吾不敢苟同：“均贫富”之论。那是小情节，而非现代自由民主宪政理念。应当予国人以创造财富平等机会，而非均贫富。本质上言平均主义是极不公平的，因为人只能人格尊严平等，而能力不可能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乃自然形成的，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社会，只能创造自由公平平等的环境，让国人自由竞争，政府仅是对无能力照料自已的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最低生活保障。若人人均等，那一定是毛氏贫困社会主义再现。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多保重!　郭国汀

关于“均贫富”问题，我的这篇文章发出之后，很多朋友都向我提出类似郭国汀先生的这个问题。

“均贫富”是古代的一种经济、政治主张。春秋时代晏子、孔子就曾提出这一分配观念。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论语·季氏》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宋史·樊知古传》记载：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对贫苦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记载：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

关于这个“均”字，有两个层面的理解，晏子、孔子的“均”其实是“道德层面的先天原则”，而王小波、钟相的“均”是“物质层面的后天技巧”。

王小波、钟相的“均”，即“量的平均和相等”，或“总数相加然后按人头相除”。

晏子、孔子的“均”，　是“道德层面的先天原则”，　就是指财富分配量的比例关系要保持平衡和协调，不是指量的平均和相等。

在分配问题上，孔子认为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占有财富的量的差别应维持某种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这种关系遭到破坏，分配就会出现比例失调，造成“大富”和“大贫”的严重对立。结果“大富”则为“暴”，“大贫”则为“盗”。这样，社会则不能“安”，政权便有“倾”的危险。

所以，“患不均”是指患不公正，不怕你多分多拿，就怕你没有让众人信服的理由和分配制度。这里的均不是平均、均匀的意思，而是“均衡”的概念。均衡就是公平、衡定，让人信服。

汉代经学家孔安国（孔子十一代孙）曾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作注：“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

对于“均无贫”，汉代传播儒家思想的包咸曾做出这样的注释：“政教均平，则不贫矣。”可以看到，这里的“均”，完全可以被视为制度规则设计公平、公正，人们各得其所的意思。

如果将“患不均”、“均贫富”理解为“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的宣言，这种理解离孔夫子的原意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孔子这段话是针对他的两个弟子要辅佐主子攻城略地扩大领土人口而发的议论。所以，“均”并非指平均财富，亦非平均领地与人口，而指各守本分，维持政治均势。

只要不持先入之见，就明白“不均”是指不遵名分、不按规矩分配社会财富，强取豪夺践踏了社会公认的“公正”、“公平”准则。

换言之，人们对分配方式是否合乎“正义”比对分配的结果即财富占有的多寡，更加关注。

证之于古今中外，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

中国新民党不是要搞“毛氏贫困社会主义”，而是要搞“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才叫“取得财富应当程序正义”之“均”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今天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贫富差异悬殊？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堪称世界之最？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果究竟被谁窃取据为己有？

答案只有一个，即中共推行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是中共 1949 年以来施行的维护少数权贵利益、残酷剥削多数公民正当利益的社会制度。当今国内中共官员贪污腐败聚敛财产为国人深恶痛绝，富豪资产也皆依靠制度保护巧取豪夺得之，他们的财富获得丝毫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社会基本准则。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最基本的准则就是要维护公平与正义，这是每个国家有良心的政府的第一要务，而长期以来“公平正义”成为中共口中的稀缺词汇。

以上文字，供郭国汀先生参考，也供其他对此问题有疑问的朋友参考。

郭泉：民主先声 282：苦难的中国学子：谈迟到 22 年的义务教育和高昂的高校学费

今天（9 月 7 日），我的一个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发来信息，他谈到了法国的户籍制度和法国的义务教育制度，让我感慨不已。他说：

相比中国的户籍管理法之严厉，法国的这个法，松弛得简直不像个法。

法国法律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法律写出来不是逗公民傻乐或者生气的。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许……”，政府就得“允许……”。

关于迁徙，法国法律说：无论是临时搬迁，还是永久搬迁，您只要去趟新地址的市政厅，出示您在新住址的电费或者电话费帐单，即可证明您已经在这里住下的事实。有居住事实就有了包括“子女就近上学”在内的各种居民权利。

但是在中国，没有暂住证不能找工作，没有工作就办不了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不能买房子，没有房子就不能办暂住证……我的神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与中国各地各级人大一样，也一直没整明白。

从三岁进幼儿园开始，法国儿童就进入了义务教育体系。什么是“义务教育”，说出来气死你：

1、免费（注意，是完全的彻底的免，不是中国那种免来免去还有好几百万儿童上不起学的免）；

2、强制（家长必须送孩子上学，政府必须安排孩子入学，谁不照法办就要被法办）；

3、走哪儿上哪儿（家庭迁徙的事、时间、地点……均不构成政府拒绝或拖延就近安排孩子入学的理由。

请祖国人民放心，无论我们流浪到法国的哪个犄角旮旯儿，孩子们上学都还是有保障的。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于是我就把这段信息发给我另外一个在法国读大学的女学生看，她回信：“是的，我就在享受法国的高等教育，只要 300 欧元的注册费，其余没有任何学费。”

这次该轮到我喊“我的神哪”，原来，法国的义务教育是从三岁到大学。

于是，我就想到了刚刚 9 月 1 日，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 22 年后，获得了迟到 22 年的“学杂费”免除待遇。

1986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了。这是我国首次把免费的义务的教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 9 年的义务教育。

其中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是杂费不免。

20 年后，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才明确了“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但是城市学生直到 2008 年 9 月 1 日才免掉杂费。

可怜的中国人民，1986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直到 2008 年才完全“义务”。

22 年啊，可怜的中国人民！

那么，国家“义务”掉学杂费之后，中国的学生家长们不再交其他费用吗？所有的中国学生家长都知道各个学校还有一个或多或少的所谓“自愿缴纳”的清单，你敢不自愿吗？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英国政府将英国青少年义务教育的法定结束年龄由以前的 16 岁提高至 18 岁。

前英国财政大臣现任英国首相布朗先生曾经宣誓，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我们必须给所有人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受教育机会，以保证他们拥有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生存的必备技能”。

于是，英国政府为在 16 岁之后还继续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每个学生提供每周 30 英镑的教育津贴。

国外是真正的义务教育，除孩子上学全部免费外，政府还发点心费，每月都有节余，免费校车接送。

而且，国外的义务教育一般都是 12 年制义务教育。

由于我是高校教师，所以写完以上关于“义务教育”的一点感想外，我很想谈谈高等教育。写作之前到网络上看了看，结果发现和我有相同观点的教授比比皆是，现整理一些观点如下：

说实话，当中共政府宣称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作为一名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我感到震惊，当你们宣称我们的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时候，我感到羞耻。

高等教育在专制体制的侵蚀下步步下滑，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主义让我们的基础教育遭受伤害，也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高收费的外衣下有其名而无其实，披上了一层华丽的，薄如蝉翼的金缕玉衣，而它的背后，则是难以数计的寒门学子的苦与泪。

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已经成为高校中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最根本原因。

许多农村学生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之后，就含泪告别学习生涯，再也不敢去梦想大学生活。这一状况源自对大学天价学费的“恐惧”，对背负一屁股债完成大学学业却无法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恐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恐惧”，使得贫困地区超过 70%的初中学生放弃了高中阶段的学习；90%以上的高中学生无法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所有我的同事，在聚会的时候都感叹，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大学生比例越来越低了，是的，我相信，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学子会越来越少，因为绝大部分农村孩子在高中阶段，初中阶段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未来大学的天价费用吓退了，他们可能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当然就没有资格保留读大学这样奢侈的梦想。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教育体制下，知识改变不了农村孩子的命运，辍学打工或许是最适合那些极度贫寒的农村学生最好的生存出路。

你们闻到了飘浮在大学校园上空那股愈来愈浓的铜臭味吗？现在的大学还有多少书香和朗朗的读书声呢？

美丽的大学校园不再是求知的乐园，她的圣洁早就被高昂的收费和低劣的教学质量玷污得无影无踪了。

中共凭什么制定如此高昂的高校学费标准？是否举行过价格听证会？是否考虑到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也许你们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来进行辩解，但如果我们国度里的绝大部分家庭都感到很不容易供养一个大学生，那么这些理由绝对无法获得人民的理解。

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先生也承认，他夫妻的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有困难，中国的高校收费的确有些高了。

其实，高等教育的收费岂止是有些高了，而是高得离谱，高得足以让那些贫寒学子和他们的父母感到绝望。

当然，面对越来越多贫寒学子无法圆梦大学的境况，中共也给贫困生提供了贷款。

我们不否认这的确给部分学子打开了通往大学的门，但当老百姓连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让孩子背着一屁股债去读大学吗？更何况很多寒门学子在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就被天价的大学费用吓跑掉了。

所以，助学贷款不是解决贫困学子上学的根本之策，这是一个表面上很温情但实际上很冷漠的政策。大学日子一天天地流逝，但寒门学子背负的债务却越来越多，他们走出校门，在就业形势越来越差的形势下，在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下，他们却要在漫长的还债路上艰难的行走很长的时间。

新学期刚刚开始了，一些农村孩子经过各种各样的苦难，最终艰难地进入了大学。

在这里，我祝愿你们克服一切困难，勤奋学习，独立思考中国人民的苦难，深刻领会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专制体制，惟有民主政治才能解救中国人民。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8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就从此站起来了吗？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句什么话？现在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头雾水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都被中共灌输的是，当时毛泽东说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于是，中国人民就被忽悠得真以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央人民政府”。

其实，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没有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

翻阅 194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消息，看到开国大典是这样报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而兴奋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前天（9 月 6 日），我读到国家审计署发布的 2008 年第 7 号、第 8 号审计结果公告，分别公布“49 个部门单位 2007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原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 2006 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

读完以后，我知道，站起来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而中国人民却早就趴下去了。

现抄录这些中央人民政府的罪行如下：

国家水利部报销虚假发票共三笔套取现金 476 万。

经查：第一笔：珠江水利委员会机关等 7 个单位以虚开会议费发票的方式套取现金 221.41 万元，用于奖金、旅游等开支。其中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套取现金 16.17 万元存入该局监督管理处一干部的个人活期存折，该干部将其中 15 万元用于个人炒股。审计查出该问题后，这名干部于 2008 年 1 月 22 日将 16.17 万元交回水源局财务。

第二笔：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所属企业，利用虚假发票套取现金 216 万元，其中 138.5 万元已向该中心职工发放。2006 年 5 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河南江河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套取移民资金 39.40 万元，其中 29.1 万元已用于发放该公司人员工资等，10.3 万元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

第三笔：未将所属某单位资金 6.67 亿元纳入预算管理、所属单位违规购买购物卡 75 万元

原交通部挪用 8400 万元“车购税”建办公楼，预算中未编报车购税征管机构经费预算 8.48 亿；新办公楼项目闲置预算资金 2.98 亿。

经查：2005 至 2007 年，交通部未经发改委批准，在其所属公路科学研究所已有办公楼的情况下，动用车购税专项资金 8400 万元为其建设办公楼。2005 年，公路科学研究所将计划投资规模为 9996 万元（其中车购税专项资金 8400 万元）的办公楼项目经原交通部批准后于 2006 年开工建设，截至审计时已封顶。其他问题：预算中未编报车购税征管机构经费预算 8.48 亿；新办公楼项目闲置预算资金 2.98 亿

国家税务总局超预算支出和无预算支出和挤占办案经费举办回顾活动，合计 1.7 亿。

经查：2007 年，税务总局本级在基本支出等方面超预算支出共计 17248.06 万元；在行政经费中无预算支出职工宿舍水质改造等工程款 292.59 万元；举办“中国税务稽查十年”总结回顾活动挤占办案专项经费 40 万元；向所属金三环宾馆等企业拨付基本支出预算资金 223.69 万元。

财政部预算编制不准财政结余 4 亿。

经查：至 2007 年末，财政部预算编制不准，结余资金 41427.41 万元。其他问题：32 个已完工基建项目总投资 10.69 亿元，结余资金未清理上缴

中国人民银行 13 个分支机构超范围支 3606 万，其他 8 个分支机构及 8 个直属企业单位收支核算不实计 6489.71 万元

经查：2007 年人民银行 13 个分支机构挤占公用经费、行政事业经费等，超范围列支人员经费 3606.92 万元。

其中，合肥中心支行在“差旅费”等科目列支人员补贴奖金共计 584.05 万元。此外，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 2007 年末将实际尚未发生的大型修缮费等行政事业类支出采取挂账的形式列支，金额共计 448.95 万元。

国家统计局挪用所属事业单位“事业运行”经费 1653.64 万元用于局本级基本支出。公务用车超编 52 辆尚未移交；

经查：2002 至 2007 年，国家统计局由局领导、财基司批准，将价值共计 1377.38 万元的 46 辆公务用车无偿调拨至地方统计局和调查队（2007 年调拨 3 辆，价值 47 万元）。此外，截至 2007 年末，国家统计局公务用车实有 86 辆，超编 52 辆，未按规定移交给国管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 挪财政专项资金做离退休者经费，累计结余资金 3669.44 万元未及时清理。

经查：今年 2 月至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挪用财政专项经费资金 700 万元，用于离退休干部人员经费；挪用行政经费（其他业务费）36.1 万元用于所属单位北戴河培训中心的维修支出；挪用交通工具等消耗费专项资金 82.9 万元用于奖励费等；挪用财政专项资金 438.2 万元用于机关服务中心人员经费等。

国家发改委 购药专项资金八成长期闲置 ；资金结余 7670.48 万元未纳入预算，其中行政基本账户结余 3421.47 万元

经查：2003 年，财政部拨付给发改委的 7787.64 万元资金用于某项药品的专项储备。发改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减少了采购量，使该项资金结余 6475.47 万元（占拨付资金的 83%）。截至去年底，上述储备资金结余仍在账户中闲置。

国家开发银行违规发放贷款问题金额 91.04 亿元，主要是违规将信贷资金投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国家限制发展产业及领域。

经查：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底，开行山西省分行与一家商业银行合作向某公司发放表外联合贷款 10 亿元，其中因开行审查不到位，有 1.1 亿元被挪用于向发生矿难而被有关主管部门勒令停产整顿的小煤矿的投资。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及部分分支机构 2006 年度违规问题资金达 243.06 亿元。在违规发放贷款方面，办理了大量虚假个人按揭贷款。

经查：2004 年 3 月至 2006 年 7 月，农业银行辽宁省锦州市分行副行长郑凤来、黑山县支行行长刘福德等人采用借款和虚假贴现等手段，累计挪用银行资金 31 亿元借给一些私人企业和个人使用。截至审计时，上述贷款尚有 1.89 亿元逾期未收回，欠息 654 万元。

光大银行违规放贷 108.68 亿，其中半数以上属于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和向证券市场直接或间接提供信贷资金。

经查：2006 年 3 月，光大银行福州华林支行在一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项目还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其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2.5 亿元。

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已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人保财险公司违规压低费率或违规打折承保、以手续费等名义变相返还保费、扩大理赔支出范围等 3.68 亿。

经查：2003 至 2004 年，人保财险公司浙江省南浔支公司采取保费收入不入账等方式进行账外经营，共计收入 4788.36 万元，用以支付手续费 2462.04 万元、赔款 2078.41 万元。

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已更名为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6 家子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违规问题资金达 12.71 亿元。

经查：2000 年 4 月，中再集团（时为中保再保险公司）违规将价值 3.16 亿元国债委托给所属一经济实体进行融资买卖股票，造成 3700 万元亏损。

广电总局： 央视未及时缴 30 亿非税收入

经查：以前年度结余 118769.10 万元，未纳入部门预算安排使用，多申报机动经费和项目支出预算 818 万元；未按项目进度申报项目预算，造成 1183.03 万元财政资金闲置；所属中央电视台未及时上缴财政非税收入 304686 万元。

原环保总局冒领项目预算资金 300 万

经查：2005 和 2006 年，原环保总局在核与辐射安全技术审评项目中虚报冒领并拨付给自行批准设立的原环保总局辐射监测技术中心监测工作经费 300 万元。代编代报非预算单位项目预算 100 万元，挪用公用经费及项目经费 34.93 万元发放临时聘用人员工资。原环保总局机关服务中心 150 万元房租收入被转移至所属公司。

抄录至此，还需要我再抄吗？

呜呼，扁鹊在此也会哀叹：病入骨髓，无药可救也！

看看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再看看以上罪证，足以证明：站起来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而趴下去的是中国人民。

结束这篇文字之时，难掩悲愤之情，泣血如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郭泉：民主先声 284：中国新民党关于毛泽东和"毛派"的决议：支持"继续革命"理论

最近，随着社会矛盾、阶级冲突的升级，来自左右的两股民主思想都将矛头直指执政的共产党独裁统治。

右派，如中国新民党、中国共产党（新党）、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党等，一致决议：立即终结独裁，实现人民自由组党、多党竞选执政党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

左派，如中国共产党体制内外的新老毛派人士，他们也异常地痛恨执政党腐败，并且也敢于正视和揭露社会矛盾和中共的罪恶。他们一致决议：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走上修正主义歧途的执政集团，中共当前的路线方针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共产党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言人。

左派的这一决议，与右派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判断完全一致，但是，左右两派对中国政体的改革方案却是完全不同的。

左派，由于他们对毛泽东先生有着特殊的个人感情，深深怀念那个"祖国江山一片红"的红海洋时代，所以也被称为毛派。

左派（毛派）人士直斥邓小平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最大的背叛者。他们认为现在一切罪恶的历史根源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他们对当前执政党深恶痛绝，直斥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高度计划经济的威权政治时代去。

中国新民党认为，毛泽东先生及其 49 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推翻独裁统治、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确起到关键的作用。

但是，中国新民党还认为，1949 年后，毛泽东先生错误地把"人民民主专政"理解成为了"共产党专政"。这就是导致 1949 年后的中国，人祸、党祸不断的根源所在。

那么，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不能是共产党专政呢？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认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得人类社会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想要消灭阶级压迫，必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得到解放。这就是著名的"阶级斗争理论"。

但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年龄增长，他们的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认识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深刻，他们开始意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全体人员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矛盾的。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是"公权"而不是"专政"。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社会民主思想"，即，民主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的"社会民主思想"即只有在建立以国家政权公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前提下，才能和平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国际采纳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思想"，于是欧洲各国走向民主和富裕，而列宁、斯大林组建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采纳的是"阶级斗争理论"。

很不幸，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加入的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国家，无一例外全是贫穷落后，且实行的是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体制。

在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通过多党竞选、议会斗争、群众维权，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促使了社会的进步，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2007 年 11 月，我给胡锦涛主席上书探讨"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并把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理论重新命名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理论。

我之所以在现阶段提出这个理论，是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完全采纳权贵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完全奉行独裁威权主义。

对此，如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改，那么，"继续革命"理论在当前形势下，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完全适用和唯一的理论。

毛泽东先生在 60 年代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在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和独裁威权主义方面，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先生走对了方向，却走错了路。

毛泽东先生没有用人民组党、多党竞选的方法来消灭独裁威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反，却用毛泽东先生的个人威权，取代了“走资派”的威权。

这就是我说的“毛泽东先生走对了方向，却走错了路”。

9 月 8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纪念毛泽东先生的会议，形成关于毛泽东先生及左派（毛派）的决议如下：

1、中国新民党纪念毛泽东先生，并研究其“继续革命”理论，但对未来民主中国的设计，中国新民党坚持“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理念，反对一党专政。

2、中国新民党团结中国共产党体制内外的左派（毛派）人士，共同批判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中国共产党独裁专制体制。

3、中国新民党努力向左派（毛派）人士传播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左派（毛派）人士共同终结独裁，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人民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政体。

4、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左派（毛派）人士在内的所有左右两个方面的政治异见人士的打击。

5、21 世纪，中国正在全面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也被人民推到了紧迫的层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 21 世纪如何应对历史变革，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全世界现在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其他政党一起，接受人民的选择！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

郭泉：民主先声 285：新版《教师道德规范》是要教师保护学生安全，还是保护党的安全？

今天（9 月 10 日），是中共确立的教师节，而海外华人依据中华民国的相关规定，以“提倡私学”的孔子诞辰（9 月 28 日）为教师节。（参见《民主先声》277）

9 月 8 日，中共教育部和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联合召开学习贯彻《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修订）座谈会。周济在座谈会上表示，要把师德作为教师资格认定和新教师聘用的必备条件和重要考查内容。

于是，我立即找来 1997 年版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 2008 年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照研究。

1997 年版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 8 条，2008 年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 6 条。见附件。

经仔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两个版本的第一条主要思想完全一致，如下：

1997 年版的第一条是：依法执教。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在教育教学中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2008 年版的第一条是：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和义务。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 年版只是要求教师“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并没有涉及“党的领导”，而 2008 年版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却赫然写上了教师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于是，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四川地震后，作为新闻热点炒作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所谓增加“教师要保护学生安全”的真实目的，是要所有中小学教师保护中国共产党的安全。

今天又看到一个新闻，说昨天（9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 8 位来自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参观中南海，并进行座谈。温总理说“明天是教师节，今天我请大家做客中南海”。

“我发表一点意见。”温家宝先生接着说：“第一，（教育）规划要根据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制定。人民群众现在需求什么？就是希望孩子不仅能上学，而且要上好学。第二，我非常赞同教育资金的来源多样化。这项工作可以列入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我们说，企业家身上要留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企业的收益回报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教育。第三，我们要努力实现教育公平。收入的差距可以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接受教育的机会却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们强调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决不意味着把学校办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学校还是要

办出特色和风格。第四，要改革创新。教学改革要使学、思、知、行四个方面相结合，就是学思要结合，知行要统一。”

看完温总理的四点意见，我想发表一下我的四点意见：

第一，关于（教育）规划要根据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制定。人民群众现在需求什么？我想，人民群众除了希望孩子上学、上好学之外，还需要民主、幸福的社会制度吧。

第二，关于教育资金的来源多样化。我同意温总理所说的“企业家身上要留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企业的收益回报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教育”。但是，我想，如果中国的所有大中小学被搞成了党校的话，至少我是不愿意投入的。我想把我的所有资金投入一个传播民主自由思想的小学、中学或大学。

第三，关于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其实，教育公平不只是“收入的差距”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教育公平还体现在可以让学生们获得各种党派的思想，而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所以，在这点上，温总理说的好。温先生说：“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决不意味着把学校办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那么，2008 年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不得有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行”不是在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是在搞什么呢？

第四，关于改革创新。我想，中国的教学改革如果使学、思、知、行四个方面都和“中国共产党”相结合，那么，把全国的所有学校都换牌为“党校小学分部”、“党校中学分部”和“党校大学分部”，那才更贴切些呢。

附件：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

一、依法执教。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在教育教学中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爱岗敬业。热爱教育、热爱学校，尽职尽责、教书育人，注意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不敷衍塞责，不传播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思想。

三、热爱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

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教导，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健康发展。

四、严谨治学。树立优良学风，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

五、团结协作。谦虚谨慎、尊重同志，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维护其他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关心集体，维护学校荣誉，共创文明校风。

六、尊重家长。主动与学生家长联系，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取得支持与配合。积极宣传科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不训斥、指责学生家长。

七、廉洁从教。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

八、为人师表。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以身作则，注重身教。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

一、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和义务。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敬业奉献。忠诚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对工作高度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不对工作敷衍塞责。

三、热爱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健康发展。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四、教书育人。实施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塑造学生健全人格，启发学生创新精神。不违规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五、为人师表。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谦虚谨慎，团结协作。平等对待学生家长，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不以粗鲁言行对待家长。廉洁奉公，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

六、终身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理念，遵守教师培训制度，不断学习，与时俱进，自觉更新教育观念，完善知识结构，潜心钻研教育教学业务，不断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水平。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86：中国民主党地方委员会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9 月 10 日，中国民主党地方委员会主席郑存柱先生致电中国在野党联盟，有意加盟并表示愿意回国投身中国民主事业。

中国在野党联盟多党主席联席会议对郑存柱先生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立即公开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要求实行县市级宪政改制（要求中共尽快启动县区级政务官直选）的行为表示钦佩。

中国在野党联盟多党主席联席会议还对郑存柱先生 2006 年 5 月在美国加州成立中国民主党美西支部表示高度赞扬。中国民主党美西支部在郑存柱先生的带领下，在洛杉矶地区宣传中国民主党的主张，并随时声援国内被迫害的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美西支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国内的民主事业。

决议如下：

1、中国民主党是 89 之后第一个公开组党的民主党。1998 年 6 月 25 日，民主人士王有才、王东海等先生在中国浙江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认为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公众，服务公众；政府只能根据公众的意志而产生，依照公众的意志来运作，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政府是公众的服务者，而不是公众的支配者。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组党初期百余义士均入狱受苦，后部分党员流亡海外，部分党员留在国内坚持斗争。中国民主党应受到国人的尊敬和赞扬。

2、中国民主党地方委员会长期致力于推进中国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民主党遭受中国共产党残酷打击后，独立进行政治斗争，理应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在中国在野党联盟多党主席联席会议上重申了中国新民党和中国民主党达成的共识：（参见《民主先声》237）

2008 年 5 月，中国民主党浙江党部王东海先生与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在南京会晤。共识如下：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在要求民主宪政方面完全一致。两党应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

两党均以增进全民自由幸福为己任，广纳社会精英、融汇人类文明精华，锐意使中华民族摆脱近百年来贫困、落后、愚昧、专制的状态。

两党所有工作目标的制定，首先应以是否增进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福祉为标准进行衡量，以确保两党政策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一道，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有序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提倡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民主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反对恐怖活动。共同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支持经济建设和代表民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郭泉：民主先声 287：请全体中国新民党党员为“走四方维权工作室”交纳特别党费

在《民主先声》247 里，我介绍了几个为广大苦难群众维权的年轻人，题目是《我们相信正义必胜：许向前先生与他的“走四方维权工作室”》。

许向前先生今年 28 岁，政法大学毕业。他立志为人民服务，从基层的民众维权做起。他的“走四方维权工作室”为苦难的维权民众代理案件。 考虑到弱势群体经济拮据，虽确有冤情需要诉讼，但他们不懂法律，被地方保

护势力欺蒙和威胁。许向前先生和“走四方维权工作室”决定，为弱势群体先行服务，而不是先行收费。在完成委托之事以后，委托人根据事先拟定的劳务费标准支付必要的劳务。

许向前先生与他的“走四方维权工作室”的宣言是：

一切受压迫的善良的人民，都应该觉醒，为自己的权利抗争。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正义公理何处在？法律维权“走四方”。

昨天（9 月 10 日），许向前先生发给我一封信，全文如下：

教授，现向您汇报一下“走四方维权工作室”今年来的工作情况。自今年年初成立以来，我们行走四方，为江、浙江地区各个地方的农民工处理过大大小小很多工伤与交通等民事索赔案件。我们还曾经在工地跟粗鲁的工地老板打起来。

可是我们除了他们负担我们的差旅费等必要费用外，一直还没有获得报酬。

老百姓很不容易，现在我们有好几个案件涉及诉讼要半年时间才能解决，老百姓的维权成本实在太高了，一个案子要真正解决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时间。而我们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后期的案子约定的收费也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因为要等案子结了，我们才能收费。这是我们的承诺。我们必须兑现这个承诺。

下面这个小女孩的案子，她叫谢海燕，特别可爱。发生事故时六岁还不到，但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右眼，但判了十几万却没拿到一分钱，我们免费为她打官司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款。一审胜诉了，可是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中院，这个月 23 号我们还要去泰州开庭。这个案子我们的差旅费都是自己掏的，因为小海燕的父母为了治疗她的眼睛（她的眼眶至今还是空的，但为了保住眼睛的形状，已经做了很多次手术了）已经花去了所有积蓄，家里面一贫如洗，负债累累。

还有一个案子当事人没有足够的钱做手术取出内固定，不能进行残疾评定，我们也给他垫了几千块钱。这个案子已经在进行残疾评定了。

郭教授，我们一直很矛盾，一方面我们的资金不足，工作室快办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看到这么多人的权益因为不懂法，或者身体残疾了根本没有能力与老板斗争维护权益。如果他们得不到维护，我们会很心痛。现在，我们在基本生活方面有了问题，现把我们的情况，向郭教授汇报：

我们的办公室很简陋，只有办公桌，到现在都还没有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当时凭着一腔热血，为着正义公理行走四方，为了替当事人省点钱我们宁愿顶着烈日走路去找工地老板。吃过很多苦但我们毫无怨言。因为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需要我们，我们能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维护权益感到很欣慰。

郭教授，因为您的文章我们出名了，而且每天都接受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咨询与求助。可是眼下却面临支撑不下去的窘况——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说实在话，我们都作好两手准备了，可能真的要找份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可是到时候真的要离开心爱的法律工作。忽然感觉很悲哀!!

我们希望帮助更多的人，而且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我们希望我们的维权团体能够发展到全国各地，可是现实却让我们望而却步……

如果能得到公益基金的援助，那我们的工作室就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一直想干的是事业，希望在法律维权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正如您说的我们都相信“正义必胜!”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我们“走四方维权工作室”的全体同仁集体创作了一首自励诗，发给您，请批评：

《正义之歌》

——“走四方维权工作室”自励诗

东奔西跑烦事多，劳心劳力脚泡磨；

正义公理何处在，法律维权走四方；

路见不平一声吼，大快人心尽开颜；

言传身教担道义，金刚妙手著文章；

为有雄心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颜；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以上是向您汇报我们走四方维权工作室的一些情况。

想了解更多您可看看　http://home.51.com/photo.php?user=overstar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祝福您全家！教授，保重！许向前，敬礼，2008 年 9 月 10 日

今天，9 月 11 日，我把许向前先生的这封信和《民主先声》247，提交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讨论，决议如下：

1、中国新民党高度赞扬并积极支持许向前先生及其“走四方维权工作室”；

2、中国新民党党员为“走四方维权工作室”交纳特别党费，金额不限，多少自愿。

3、许向前先生的银行卡号为：中信银行：6226 9021 0198 9962，户名许向前。

许向前先生手机：13961834545　QQ：345195535。

“走四方维权工作室”地址：江苏无锡新区梅村镇新华路，网址：www.overstar.51.com

4、中国新民党党员妥善保留存款凭条，未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省市党部凭此条确认您为 2008 年入党的中国新民党党员。

郭泉：民主先声 288：公然反对全民福利的中共犯罪集团应该被开除“球籍”

1956 年 8 月 30 日，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中共如果不能搞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就要被开除“球籍”。

毛泽东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现在不同了，“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今年是 2008 年，毛泽东先生当年的讲话已经过去了 52 年了，中共“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当然，如果只凭毛泽东先生的这句论断开除中国共产党的“球籍”也是武断的。

现在，我来提出两个开除中国共产党“球籍”的理由，请大家判断，这样的执政党，是否有资格执政？是否有资格保留“球籍”呢？

理由一、中共集团目前的腐败犯罪：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 2008 年第 7 号、第 8 号审计结果公告查实：

1、财政部预算编制不准财政结余 4 亿、32 个已完工基建项目总投资 10.69 亿元，结余资金未清理上缴。

2、国家税务总局超预算支出和无预算支出和挤占办案经费举办回顾活动，合计 1.7 亿。

3、最高人民检察院挪用财政专项经费资金 700 万元，用于离退休干部人员经费；挪用行政经费（其他业务费）36.1 万元用于所属单位北戴河培训中心的维修支出；挪用交通工具等消耗费专项资金 82.9 万元用于奖励费等；挪用财政专项资金 438.2 万元用于机关服务中心人员经费等。累计结余资金 3669.44 万元未及时清理。

4、国家发改委 购药专项资金八成长期闲置 ；资金结余 7670.48 万元未纳入预算，其中行政基本账户结余 3421.47 万元

5、广电总局年度结余 118769.10 万元，未纳入部门预算安排使用，多申报机动经费和项目支出预算 818 万元；未按项目进度申报项目预算，造成 1183.03 万元财政资金闲置；所属中央电视台未及时上缴财政非税收入 30 亿元。

6、国家水利部报销虚假发票套取现金 476 万、未将所属某单位资金 6.67 亿元纳入预算管理、所属单位违规购买购物卡 75 万元。

7、原交通部挪用 8400 万元“车购税”建办公楼，预算中未编报车购税征管机构经费预算 8.48 亿；新办公楼项目闲置预算资金 2.98 亿。

8、原环保总局在核与辐射安全技术审评项目中虚报冒领并拨付给自行批准设立的原环保总局辐射监测技术中心监测工作经费 300 万元。代编代报非预算单位项目预算 100 万元，挪用公用经费及项目经费 34.93 万元发放临时聘用人员工资。原环保总局机关服务中心 150 万元房租收入被转移至所属公司。

9、国家统计局挪用所属事业单位“事业运行”经费 1653.64 万元用于局本级基本支出。公务用车超编 52 辆尚未移交；

10、国家开发银行违规发放贷款问题金额 91.04 亿元，主要是违规将信贷资金投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国家限制发展产业及领域。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底，开行山西省分行与一家商业银行合作向某公司发放表外联合贷款 10 亿元，其中因开行审查不到位，有 1.1 亿元被挪用于向发生矿难而被有关主管部门勒令停产整顿的小煤矿的投资。

更多罪证参见《民主先声》283。

理由二、中共公然反对“全民福利”制度

社会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两个根本特征就是，在政治上民主，在经济上公平。

政治上民主就是“人民组党、多党竞选”，经济上公平就是“全民福利”，以上两点就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1949 年以来，中共长期实行了专制统治，人民有冤无处申，苦不堪言、天怒人怨。如今，中共又公然反对“全民福利”制度，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中共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社会保障的副部长胡晓义先生，近日在一次内部的座谈会上公然否认高福利制度，称中国将坚持“缴费型”的社会保险作为社保体系的核心制度，公然反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中共号称他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而根据原劳动保障部公布的《2007 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截至 2007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 2 亿人（20137 万人）。城镇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 77%，广大农村的养老保险基本还停留在“养儿防老”的远古时代。

相对于养老保险的制度缺失，医疗保险也显示了“报销比例太低”的劣势，中共搞的“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看病贵”的难题。

这算什么社会主义？

我们再看看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全民福利”政策的执行情况：

目前北欧国家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

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基本理论起源于《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提倡全民福利的原则即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一性原则。英国在战后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

当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时，北欧国家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和典范。

在西方国家福利制度中，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始终包含着两重涵义，彼此相辅相成：一是机会的平等，即制度的平等问题，二是国家保护人的转移支付，即再分配作用问题。前者强调“社会权利”，后者强调“削减贫困”。

显然，中共的社会福利政策（坚持“缴费型”的社会保险作为社保体系的核心制度，反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是公然反对“全民福利”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中共目前完全不是社会主义政党。那么是不是资本主义政党呢？我们对比一下中共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政策就知道，中共至少在福利政策上也根本比不上资本主义政党。

那么，中共到底是什么政党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共是怎么为自己利益集团里面的人谋福利的，就知道中共是个什么政党了。

中国新民党社会经济情报调查委员会获得的一份统计文件显示：2006 年一年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审核批复 84 个单位按房改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 2347 套，建筑面积约 15.49 万平方米；48 个单位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出售旧公有住房 2106 套，建筑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13 个单位出售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5133 套，建筑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

他们以办公用地或培训基地的名义获得土地，然后三分之一盖办公楼，三分之二自建经济适用房，再卖给大伙。相当一批有实力有关系的部委就是这样拿到土地的。

房改十年之后，当全国人民都在举家借钱购买住房的时候，部委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依然可以享受“准福利”分房

3 月的北京，春色暖人。如果走在北京西二环路积水潭桥旁欣赏春色就更让人赏心悦目，滨河从这里缓缓流过，滨河南边是北京重要交通枢纽积水潭地铁站、大型商场以及著名的新街口服装一条街，繁华满目；河的北岸则矗立着几栋整洁、朴素的灰色住宅楼。而走进这些楼构成的小区新海苑，小区里的安静、悠然马上把繁华和喧闹挡在了门外。一河之隔，两个世界。

这样位置优越而外观低调的小区在北京还有一些，比如在北京北二环的和平里中街，还没有更名的国家人事部旁，目前工地上就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着几栋 20 层左右的居民楼，楼房的名称是“和平里中街 3 号院”。

这样黄金地段的房子普通人有钱也买不到。它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专门为公务员统一修建的住房，并以相对低的价格卖给各部委的公务员（比如新海苑 2004 年的售价是每平方米 5000 多元，而当时周围楼盘市场价已经超过 7000 元每平方米）。类似这样的小区在北京还有若干，比如双井桥向西的广泉小区、宣武区广安门外的广源小区等等。

在中国停止福利分房十年后的今天，国家部委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他们依然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殊

的待遇，而不必和普通人共同承受房价暴涨的痛苦。

而他们却还说：中国将坚持“缴费型”的社会保险作为社保体系的核心制度，反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这样的执政党，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政党，只是社会蠹虫而已，哪里还有资格执政呢？哪里还有资格保留“球籍”呢？

郭泉：民主先声 289：中共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应该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最近，不断地有朋友给我电话或来信，询问中共是否在准备第三次思想解放。

我笑着说，恐怕又是共产党在忽悠人民而已。

2007 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要求立即终结独裁，还权于民，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不料，中共立即取消我的副教授津贴，吊销研究生导师资格。随后，中国民主同盟也立即开除我的盟籍，充分表现出中共走狗的邪恶本质。

于是，我对这些朋友说，如果中共恢复我的研究生导师资格，让我在大学课堂上继续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那才叫“第三次思想解放”呢。

这些朋友也笑着回答：是的，中共解放郭泉，才叫“第三次思想解放”。因为，解放郭泉，就意味着可以在大学、在社会谈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了，就可以讨论开放党禁和开放报禁了，就可以讨论“人民自由组党”和“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了。

下面，我来谈谈中共在 1976 年之后的两次“思想解放”：

一般认为“第一次思想解放”是 30 年前 12 月 18 号到 22 号举行的中共中央第 11 届 3 中全会，会上第三次复出中国政坛的邓小平作了主旨报告，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海内外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1978 年的 3 中全会是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 1992 年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1989 年之后，陈云、邓力群等人反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导致 89 动乱的发生，而新上任不久的江泽民采信了陈云、邓力群等人提出的“鸟笼经济”（新型“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开始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线相左。最后竟然闹到邓小平的思想在北京都没人听了。

于是，邓小平开始“南巡”，其中南巡讲话里的“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于”的观点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但是，最后让江泽民下决心抛弃陈云、邓力群的“鸟笼经济”的不是这个劳什子理论，而是邓小平的另外一句掷地有声、杀气腾腾的话，邓小平说：“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换脑筋。不换脑筋，就换人！”

进入 2008 年以后，面对席卷全国范围的各类自然灾害、面对风起云涌的“群体事件”、面对“十七大”之后民间越演越烈的民主呼声，中共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中共开始重提“思想解放”了。

当然，中共开始重提“思想解放”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如果中共是想“忽悠”人民，这我们就不答应了。

我注意到 2008 年中共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开始提出来的，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另一个是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先生。

根据我对中共的研究，可以判断这两位先生一定是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否则在省委书记的位置上，是断然不敢擅自说出什么“思想解放”的话的。同时考虑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的个性过于“沉稳”，所以完全有可能是总书记想用两位省委书记“放风”探路。

长沙晚报 9 月 1 号报导，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最近发表的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先后 90 次提到解放思想，并且把“解放思想”和“还权于民”联系了起来。

今年 55 岁的张春贤先生原来是中国交通部部长，2005 年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先生在讲话中，提出前两次解放思想运动可以归纳为“还利于民”，而这次则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考虑到张春贤先生过去的政治背景，“还权于民”的说法通过他在湖南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这一提法可能受到更高层的首肯。

很显然，张春贤先生归纳的前两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中共并没有“还利于民”，而是造就了大量的权贵资产者，造成了社会高度两极分化。

最近几年大规范的维权群体事件，充分表明了正是因为没有“还利于民”，人民才要求“还权于民”的。

苦难的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人民利益必须由“人民的政治权力”才能加以保护。人民没有“政治权力”，那么人民的利益，就随时被权贵者剥夺。

于是，苦难的维权人民开始组建要求“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体”的中国新民党，全力推进“还权于民”的民主政治运动。

但是，中共提出的“还权于民”，却根本不是“人民自由组党”、“多党竞选执政党”。

那么，中共提出的“还权于民”到底是什么权呢？

对此，我作了一些功课，现将作业汇报如下：

第一、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转向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三是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

但是，他所说的“制度创新”并不包括“人民自由组党”、“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政治制度改革。

第二、中共新华社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归纳了要归还给人民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让人民选任官员等等。另外，新华社的文章还提到了要还给人民生存权、弹劾权、申诉权、所有权、发展权等等。

但是，中共新华社也根本没有提到人民应该有“自由组党”、“竞选执政党”的权力。

于是，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还权于民”的“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中国新民党有重大区别。

中国共产党忽悠中国人民的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还权于民”），其实就是继续捍卫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而让公众在监督共产党政府行使权利方面多起点作用，也就是说，民众将会在公共领域和经济生活领域会多一点发言权，而在民主政治领域，却根本不得提“多党竞选”。

而中国新民党认为“还权于民”的“权”，应该是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90：中国新民党决议：谴责中共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渎职行为

2008 年 9 月 13 日，中国新民党召开中央党部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新民党公共健康委员会的食品安全专家提交的关于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报告，决议如下：

1、谴责中共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渎职行为；

2、发表致全国人民及海外同胞的中国新民党食品安全宣言；

《中国新民党食品安全宣言》全文如下：

食品安全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用安全的食品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根据 WHO 的解释“食品安全”是指：食品中不应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因素，从而导致消费者急性或慢性毒害、感染疾病 ，或产生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健康的隐患。

如何让食品里不含有这些有害物质，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分野是人之初的性善性恶问题。古代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于是强调百姓或执政者的良心发现；而西方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所以对那些“泯灭良心”的人，必须动用政府的强制手段。

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食品生产者的良心，另一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行业管制能力。

有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往往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而不能怪罪食品生产者，例如因农药、兽药的高残留，化肥、激素等的滥用，工业“三废”而导致的有害金属(砷、铅、镉)、有机磷农药、有机氯农药、食源性致病菌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件。

之所以说上述这些因素不能怪罪食品生产者，是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食品生产者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

但是，三鹿奶粉中被发现添加了“三聚氰胺”而导致数百名婴幼儿罹患肾结石等严重疾病，这显然是食品原料

提供者或食品生产者的良心泯灭。

对“泯灭良心”的食品原料提供者和食品生产者，只能动用来自政府的强制手段了。

那么中国是否没有监管的相关法律呢？

不！

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近20部法律和近40部相关行政法规，还有近150部规章。

中国政府中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部门有 10 个，例如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这些部门负责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

另外，中国食品相关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国家标准又分为食品卫生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对中国所有食品规定了相应的安全标准。

那么，中国政府有管理部门、有法可依、又有众多的安全标准，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恶报频传”呢？

中国新民党情报部门提供的2007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材料显示，胡锦涛先生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胡锦涛先生在学习总结的时候说：实施农业标准化，保障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实施农业标准化，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对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提高对实施农业标准化和保障食品安全重大意义的认识，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一年之后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让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不敢放心食用中国食品了。

因此，不能说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先生不重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只能承认这个独裁体制无法有效地实施监管职能了。

2007年，我国一家出口美国猫狗食物的公司在宠物食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轩然大波，其元凶就是三聚氰胺，中共食品安全监管本该在那次事件中接受教训，加强行业管制，但是中共没有。

2008年再次发生三聚氰胺中毒事件，这完全是中共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渎职行为造成的。

在食品制作需要检查蛋白质含量，但是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食品中氮原子含量越高，这蛋白质含量就越高。因此，三聚氰胺被“良心泯灭”的食品生产者派上大用场了。三聚氰胺含氮量很高，生产工艺简单、成本很低。经实验计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

所以“增加”产品的表观蛋白质含量是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原因，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等也成了掺假、造假者心存侥幸的辅助原因。

1994年《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表明：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但是，中国的食品生产者却在大规模地使用这一有毒化学品冒充食品。2007年，美国科学家在中国食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根本想不到是中国人有意添加进食品的，还以为是老鼠药污染造成的。当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都是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后来终于有知情的中国人忍不住，偷偷告诉美国人这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奥秘，才让高手云集的美国学术界恍然大悟。

虽然美国科学家搞清楚了中国人怎样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工作流程，但是至今美国科学家还是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能为了多挣钱而用三聚氰胺来残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呢？

一切善良的人，都不明白中国怎么变成了这样？其中有良心的问题，也有体制的问题。

美国的食品供应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主要在于它具备一个保护公众健康的联邦强制执法机构；一系列强有力的、灵活的、以科学为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个全面的、有效的机构协同监管体系；一整套先进的HACCP管理技术和在政府行政部门的主导下进行的缺陷食品召回制度。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最优秀的监督体系，即有反对党（在野党）存在的多党民主监督制度。

反对党存在和多党竞选的意义，就是代表民众对执政党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和攻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使得一切食品安全的监管权实际在人民手里。

而一党独裁的“本党监督”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无法监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根源于此。

在强大的民主监督体制下，美国有一个部门从来没有发生任何腐败犯罪案件，这个部门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这是一个被国际上公认为全球第一流的食物与药物监管机构，这个部门是负责美国国产和进口的食物、化妆品、药物、生物制剂、医疗器械以及放射性产品安全的科学监管专门机构。

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要向西方民主国家学习的管理技术很多。但是，中国最要向民主国家学习的是民主制度。

因为，只有民主制度，中国人民才能把一切监管权力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当“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时候，中国人民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吃自己心爱的食物。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91：民主政治与《推背图》：无王无帝乾坤定，天下一家世界同

今天（9 月 15 日），有个叫“云林”的朋友在 SKYPE 里问我，“您是个胆子很大的人，很让我佩服。您是怎么变得胆子这么大的？因为我的胆子就很小，向你讨教一下，你能说说吗?”

我问：“你怕什么？”

他说：“怕坐牢!”

我说：“我不怕坐牢，还不怕死。”

他说：“你说话怎么那么让人觉得不可信!”

我说：“你可以不信，但是我真的不怕死。”

他说：“为啥啊？你不喜欢活着吗?”

我说：“人都是要死的，所以要为死打算，而不是为生打算。”

他说：“不对吧？应该为生打算啊。”

我说：“不，随便你怎么为生打算，你都难免一死。”

他说：“我明白了，所以你不怕。那我以后多为死打算，就变得不那么懦弱了，你说是吧？”

他兴高采烈地下线了。我却接着这个话题想了很多。

88 年，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春游到泰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遇见一个算命先生。他很奇怪用六十首诗作签，一签一诗，无有上下之分。这非常奇特，而一般的先生都是用周易的六十四卦作签的，签分上下。

我问他，为什么不分上上、中上、中、中下和下下签。先生笑着说：“命无分上下，运乃己自作。”

于是，我抽了一签，是第四十七象“庚戌”签，上面写着“偃武修文，紫薇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

我问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他看了我好久，然后说：你未来是个很大很大的“书橱”。

旁边的同学笑着对我说：“哈，你这书呆子。”

先生很认真地把这个第四十七象“庚戌”签上面的文字“偃武修文，紫薇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抄给我，还附加了一首七言诗：“无王无帝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义言一出见英明”。

至今，我的同学聚会还有人说：“郭泉算的命真准，算命先生说他未来是书橱，这不，现在是博士、教授，真的是书橱呢。”

这个签后来我一直保留着，读书期间没事的时候拿出来读读。总觉的好象有一种力量在督促我好好学习。这样，

一直读完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家里的书越来越多。家里最抢眼的就是我的客厅里满墙的从地到天的书橱。果然，我是很大很大的“书橱”了。

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总理温家宝先生要求立即终结独裁，实现民主。之后，不断地有研究命理的朋友向我提到《推背图》，他们一直在研究中共的气数。其中一位江苏周易研究会的朋友有一次对我说：“郭教授，您搞的多党民主制，在《推背图》里有预见的。”

这让我很好奇，我忙问《推背图》里是怎么说的。

他说：“《推背图》里有一图，说未来有个时代‘无王无帝定乾坤’。这个时代就是没有独裁，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

他一读出这句诗，让我大吃一惊。我立即问，“这和书橱有什么关系？”

他笑着说：“这个图上就是画了一个书橱。书橱古代叫阁。不看的书要束之高阁，这个阁就是书橱的意思。民主时代竞选获胜之人要组阁，再下一次竞选获胜之人要重新组阁。所以《推背图》的这个图，是在预示民主到来的景象。”

这简直太有意思了。原来我20年前读大一的时候求的一个签，竟然“预示”了我一生的事业。

于是，我一回到家，就拿出20年前的那张签。到网络上一查，果然就是《推背图》的第四十七图。当我仔细研究了这个图里的七言诗之后，我感到惊讶无比。

“无王无帝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义言一出见英明”。这首诗是对谶语“偃武修文，紫薇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的颂诗。

“偃武修文”，停止武事，振兴文教之意也，语出《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紫薇星明”，是指最高执政官英明。天上恒星中的三垣，紫薇垣居中央，太微垣、天市垣陪设两旁。所以，古时候认为垣居中央的国家最高执政官就是“紫薇”。

“匹夫有责”，即国家大事每个人都有责任。 语出顾炎武（清）《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一言为君”， 由“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得知，言说“思无邪”方可为君。

再看颂诗：

“无王无帝定乾坤”：真正的民主政体就是反对独裁，实现人民自由组党，多党竞选、政党轮替，当然也就“无王无帝定乾坤”了。

“来自田间第一人”：此田间我理解有二，一是民间庶人，二是“广种福田”之人。《佛说诸德福田经》对“福田”的定义略分为五：“佛告天帝，众僧之中有五净德，名曰福田。供之得福，进可成佛。何谓为五，一者发心离俗。二者毁其形好。三者永割亲爱。四者委弃躯命。五者志求大乘。以此五德，名曰福田”。此第五德“志求大乘”，即普度众生，乃今日之“代民维权”也。

“好把旧书多读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阅读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著作。

“义言一出见英明”：“义”是立身处世的准则，是人际交往的原则，是治国理民的方针，小到搀扶老人孩子的一臂之力，大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尚贤、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都是义的范畴。只要符合天地之道、百姓之意的，都是义言。

读完以上两诗，再回到文章开头的关于生死的对话，就应该知道“如何有意义地死”才是人生的大事情。

贪生怕死的斗屑之人，怎么可能“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呢？怎么可能“义言一出见英明”呢？

《推背图》的最后两图很有意思，第五十九图“壬戌”，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象是在描绘“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时代的社会景象。

第五十九图是“壬戌”，谶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

读第六十图“癸亥”的时候突然感觉强烈的震撼。

长期以来，我认为，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在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里就说到这个理论。现在我又在《推背图》里找到了相关的表述，这让我激动不已。

第六十图“癸亥”，谶曰：“一阴一阳，无始无终；终者自终，始者自始。”

最后，我研究了一下我20年前求到的那个签的签名“庚戌”。

庚戌年，是农历中用干支纪年的方法所记录的一个年份，相对应的公历是 2030 年。

是年，我 62 岁。希望在这一年，我能看到一个伟大的民主中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92：未经中国人民允许，中共不得擅自动用“主权财富基金”（SWF）

2007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0 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正式在北京新保利大厦挂牌成立。

中投公司挂牌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到中投公司宣布了人事任命。

中投公司三名执行董事为楼继伟、高西庆和张弘力；五名非执行董事为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以及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胡晓炼；两名独立董事是原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现任发改委副主任的王春正。

中投公司党委成员共有六人，其中楼继伟任党委书记，高西庆和胡怀邦为副书记，张弘力、谢平和杨庆蔚任党委委员。

中投公司的七人管理委员会(又称“七人小组”)，由楼继伟、高西庆、张弘力、谢平、汪建熙、胡怀邦和杨庆蔚组成。

其中，楼继伟出任公司董事长，高西庆担任总经理，张弘力、杨庆蔚、谢平和汪建熙出任副总经理，胡怀邦任监事长。七人管理委员会将负责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以及日常经营管理。

中投公司注册资本金虽然为 2000 亿美元。目前，中投公司实际控制着中国的 1.2 万亿美圆的外汇储备，此外，中投公司还通过操纵银行的方式，间接控制着更多的外汇储备。

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先生与我有一面之缘。

高西庆先生 1953 年出生，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2 年，在美国加州律师事务所工作；1986 年至 1988 年，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1992 年至 1995 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1997 年至 1999 年，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1999 年至 2003 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2003 年至今，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2007 年 9 月起担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993 年，我在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做秘书的时候，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的高西庆先生到南京了解南京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的有关情况。

高西庆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无论我们摆出多么丰盛的筵席，高西庆先生总是快速地吃完饭，而且吃完立即退席，根本不管陪同的地方官员的尴尬。

我当时想，高西庆先生一是可能因为长期在美国工作，对国人拖沓的吃喝习俗极其反感，二是可能对奢华的筵席感到愤怒。

我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但是第一种情况我的朋友、同事们一直在不断地证实给我看。

对第二种情况，我想我和高西庆先生有同感。我一看到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就想到苦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惨状，于是就愤怒、就抑郁。

在我们做公务员的时候，当然不能愤怒，于是就只能抑郁。

]抑郁久了，就离开这个体系了。1999 年，我离开公务员体系，到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后，2001 年，留校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1994 年我从南京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入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工作，之后，再也没见过高西庆先生。

但是，就是这个连吃“地方政府”一顿饭都不忍心的人，却忍心在 2007 年到 2008 年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未经中国人民同意，而将中国人民万亿美圆的主权财富基金（SWF）投资海外，造成数千亿美圆的亏损。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随着一国宏观经济、贸易条件和财政状况的改善，以及政府长期预算规划与财政指出限制政策的实施，国家财政盈余与外汇储备不断积累。针对过多的财政盈余与外汇储备盈余，一些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投资机构来进行管理运

作，这类机构一般被称为“主权财富基金”（SWF）。

中国负责操作“主权财富基金”（SWF）的组织，就是高西庆先生出任总经理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

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一般多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盈余或财政盈余。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来源包括三类：外汇储备盈余、中国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债券、社保基金。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将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海外投资。投资目的是为中国人民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并把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那么，中共政府的投资公司是否有权未经人民同意而擅自动用属于中国人民的万亿美圆的主权财富基金去海外投资呢？

也就是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是否有权代表中国人民在海外进行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

我们来看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及其控制的银行到底做了什么？

截至目前，中投公司自己做的海外投资有三笔，其中两笔是参股金融机构，除了 50 亿美元参股摩根士丹利，还有 30 亿美元参股黑石。此外，中投公司还在香港H股市场以 1 亿美元购入中铁的股份。

中央汇金公司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从 2003 年至今，它先后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注资，加上 2005 年汇金及其子公司建银投资对部分问题券商的注资，注资金额接近 900 亿美元。这还不算对中国农业银行的 400 亿美元注资。如果将其计算在内，汇金公司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注资就达 1300 亿美元。

此外：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15 亿英镑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

中国铝业宣布买入力拓英国上市公司 12%的股份；

江西铜业公司与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收购加拿大北秘鲁铜业公司 100％股权；

中国移动收购巴基斯坦运营商；

华为联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贝恩收购美国公司 3Com；

中投公司拟 40 亿美元投资美国新基金。据日本《富士产经商报》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与美国私人股本集团 JC Flowers 正在就一笔交易进行谈判，由中国投资出资 40 亿美元，成立一家新的基金，用于投资财政状况不佳的美国金融机构。

以上只是我能够收集到的中投或和中投有关的投资资料，而大量的不为人知的投资资料，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在美国获得了两个资料，现在，在美国一个国家，中国就投资了至少 9000 亿美圆。

一个资料是，美财政部和美联储今年联合发布的“2007 年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高达 9220 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 1.197 万亿美元，而中国外汇储备的总额是 1.2 万亿。

另一个资料是，7 月 14 日美国报道称，中国是美国的“房地美”与“房利美”两大按揭公司债券外资机构最大债权人，持有房利美和房地美 3760 亿美元的债券。

而美国的“房地美”与“房利美”在次贷危机中，已经宣告濒临破产。也就是说，中国投资这两家房地产的 3760 亿美元已人间蒸发。

最后，我的问题来了。

请问中共，外汇储备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们凭什么这样胡乱投资，最后导致严重亏损？你们的投资行为经过人民同意了吗？

现在亏损几千亿美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是高西庆先生吗？是中投公司的七名高管吗？还是中国共产党？

附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管（七人小组成员）资料：

楼继伟，58 岁，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任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

高西庆，55 岁，中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和副主席。

张弘力，58 岁，中共财政部副部长，曾任财政部预算司司长。

谢平，53 岁，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金融稳定局局长等职。

汪建熙，57 岁，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副秘书长。

胡怀邦，53 岁，中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杨庆蔚，59 岁，中共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

郭泉：民主先声 293：今天国民经济又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9 月 16 日），上证指数狂跌至 1986.64。

一个炒股损失几十万的北京朋友沮丧地问我："教授，这叫不叫崩盘呀？这个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是不是昭示着国民经济的不好走势呀？文革期间没有这个表，文革结束后，中共说 10 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那么，现在是什么原因，使国民经济呈现出这样的走势呀？"

这个朋友在一个国家级报纸做编辑部主任，我一直是她的股指"预报员"，可惜她总是不相信我。

我在上半年就对她说根本不会有什么奥运行情，她不相信；奥运时我对她说，奥运后会跌到 2000 点，她又不相信；

好在她今天终于决定相信我的下一个预测了。今天我说："我原来预测上证股底是 1500 点的，现在三鹿奶粉毁灭性地打击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制造'食品的信心，所以我现在重新预测的新股底是 1200 点。"

随后不久，我就在一个 SKYPE 群里，看到她对别人说："教授说了，要跌到 1200 呢。"

我立即笑起来，其实，从中共现在的颓势看，即使有人预测新股底是 800 点，我都信。

其实，今天是有一个重大利好消息的。

这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是：央行决定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0.27 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从 2008 年 9 月 25 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1 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2 个百分点。

此货币政策的发布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出现由收紧到放松的拐点，对资本市场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但是出台了这样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中国股票都跌到了 2000 点以下，可见中国人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跌落到了什么一个程度了。

我的这位北京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中共说 10 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那么，现在是什么原因使国民经济呈现出这样的走势呀？"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的确可以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只是股票市场的问题，而是资源、环境、物价、经济道德和国际经济等众多因素共同形成的大崩溃。股票市场的崩盘只是这个大崩溃的一个表征而已。

我们先来看看 1976 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情况：

纵观文革期间（1966 年到 1976 年）的社会经济问题可以得出结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确实是不正常的。

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由重工业和能源工业拉动的，虽然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是一种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加上不切实际的目标，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从 1966 年和 1976 年的社会总产值来看，农业比重从 29.7%下降到 25.4%；工业比重从 53.1%上升到 58.1%，建筑业由 6.4%上升到 8%，运输业从 3.3%下降到 2.9%，商业从 7.5%下降到 5.6%。这里还要指出，建筑业的发展（包括水泥之类），主要是投入到重工业的基建投资，而民用投资持续下降。一五期间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之比为 67：33，而文革十年两者之比为 82.8：17.2，尤其集中反映在住宅等生活方面的大量欠帐。1976 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 1965 年的一半，亏损企业达到三分之一。

1966 到 1976 年的历年社会总产值数据显示：1967 年社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 9.9%，1968 年再降 4.7%，其后一段时期内，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但明显带有对之前大幅下降的补偿性质。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一贯的政治经济方针取向和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大小三线建设，内地投资猛增，重工业发展很快，1971 年增幅是 7%，但 1972 年的社会生产总值增幅又骤降到 2.9%，1974 年下降到 1.9%，到了 1975 年增幅又骤升到 11.5%，而 1976 年增幅又骤降到 1.4%，其中工业净产值下降 5.3%。由上可见，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一个大国的经济就像是坐上了失灵的升降机。

那么造成 1976 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以"斗私批修"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

"批修"是政治原因，即以"政治挂帅"为核心的"政治专制"运动。

“斗私”是经济原因，即以“一大二公”为核心的“经济公有”运动。

“一大二公”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说法。一大是指公社的规模大，二公是指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毛泽东对“公”的理解，“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并开始了 “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高度公有化”的经济运动。

那么，2008 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我看答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以“经政独裁”为中心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治独裁”是政治原因；“权贵资本”是经济原因。

1976 年和 2008 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政治原因完全一样，都是“政治独裁”，但是经济原因却正相反。

1976 年是脱离实际搞“一大二公”，2008 年是不顾人民的死活搞“私有化”。

权贵资本在中国产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将人民的财富想方设法“私有”到他们自己的怀抱里去。所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理论”，其实质是中共权贵富豪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但是这个再分配，是单方面的，是中共权贵资本家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早期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今天，上证指数狂跌至 1986.64，其实就是中共用股市崩盘的方式把金融危机的灾难锁定在了中国老百姓头上，同时，把暴利锁定在中共权贵富豪的身上。

郭泉：民主先声 294：为了民族的生存和未来，中共必须立即终结独裁体制、实现民主制度

2008 年 9 月 13 日，中国新民党发表致全国人民及海外同胞的中国新民党食品安全宣言，宣言的标题是《食品安全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宣言指出：

中共的独裁体制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监管职能。反对党存在和多党竞选的意义，就是代表民众对执政党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和攻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才能使得一切食品安全的监管权实际在人民手里。而一党独裁的“本党监督”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无法监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根源于此。

只有民主制度，中国人民才能把一切监管权力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时候，中国人民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吃自己心爱的食物。

今天（9 月 16 日），接到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通报称，国内检出三聚氰胺的婴儿幼儿奶粉达到 22 个厂家。他们是：

1、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2、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熊猫可宝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3、青岛圣元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圣元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4、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古城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5、江西光明英雄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英雄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6、宝鸡惠民乳品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惠民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7、内蒙古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蒙牛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8、中澳合资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生产的可淇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9、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雅士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0、湖南培益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南山倍益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1、黑龙江省麒麟乳业责任有限公司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12、山西雅士利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雅士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3、深圳金必氏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必氏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4、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公司生产的施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5、广州金鼎乳制品厂生产的金鼎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6、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伊利牌儿童配方乳粉
17、烟台澳美多营养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澳美多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8、青岛索康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爱可丁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19、西安市炎凉区百越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育宝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20、烟台蕾蕾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蕾蕾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21、上海宝安利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宝安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22、福鼎市陈冠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聪尔壮牌婴幼儿配方乳粉

看到以上企业名单，我对终结独裁实现民主，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强烈。因为，这不是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一个非改不可的体制问题。

以前，我们中有不少人对民主制度的要求是源自哲学思考和政治诉求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象今天这么团结。

今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开始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思考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和未来，必须终结独裁，实现民主了。

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国度，应当为自己感到羞愧。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并成为了这罪恶的历史见证人。在这个时代里，前所未有的无耻、贪婪、淫乱、背信、掠夺、背叛、荒诞……，都被表现的淋漓尽致，生动真实，不得不令人惊叹、哀怨、悲痛！

文化传统的割裂、道德精神的沦丧从未象今天这样彻底、决绝。无水不脏，无河不臭，掠夺资源式的发展，让子孙后代为今天的虚假繁荣埋单。喝的造假，吃的有毒，连还在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

中国有涉及食品安全的近 20 部法律和近 40 部相关行政法规，还有近 150 部规章；中国还有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 10 个部门（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中国还有关于食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但是，有管理部门、有法可依、又有众多的安全标准，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恶报频传”呢？

不是没有法律，不是没有监管部门，不是没有食品标准，究其根本，就是体制问题！

要想绕开政治体制改革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

中国之病，病入膏肓。

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就在一党独裁。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未来，中共必须立即终结独裁体制、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制度。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95:“国保”警察应该保卫国家人民，而不是保卫共产党

昨天（9 月 16 日），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的杨海东先生一早来南京看我，他想请我讨论他的一个经济案件。不料，他一到南师大就被两名“国保”警察绑架走了。

杨海东先生的案件在经济关系上很简单，但是由于涉及到中共腐败而变得十分复杂。

案情如下：2001 年杨海东、朱峥嵘两先生在滨海县投资五金装饰城。 2001 年 11 月 19 日，与县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县政府出让 34 亩土地给予投资建设。2002 年 8 月，杨海东、朱峥嵘在提前交清了土地出让金，办理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后开工建设。2003 年 4 月装饰城近万平方米工程已经封顶。这时，由于地皮急骤增值，某不法商人与滨海县委主要官员勾结，密谋叫滨海土地局以未缴清土地出让金为借口，野蛮收回土地及已建房屋。国土局将土地及房屋收回后，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以 1388 万元价格公开挂牌拍卖，实际分文不收就将土地和资产送给了该名不法商人。

杨海东、朱峥嵘两先生依法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却在 2003 年 6 月 6 日，被滨海县公安局非法抓捕。 一年以后，滨海县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杨海东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80 万元；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朱峥嵘有期徒刑 1 年，并以处罚金 10 万元。杨海东、朱峥嵘两先生不服上诉至盐城市中院。盐城市中院认定不构成犯罪，并责令放人。2004 年 8 月 14 日，杨海东、朱峥嵘两先生被释放。

获释后，杨海东、朱峥嵘两先生得知他们的装饰城已被不法商卖掉，并赚取了两千多万元的不法利益。杨海东十多次进京上访，引起中央领导过问。在这种情况下，滨海县政府作出两条处理意见：1、退还杨海东、朱峥嵘已缴的土地出让金 248 万元及其利息；2、由县国土局起诉不法商，追要资产的拍卖款 1388 万元。

但是，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目前此案件已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师大的刘旺洪和韦宝平两位老师参与会办此案。但是，省高院至今不进行实体审查。

此次杨海东先生来南京与我会见，就是想请我帮他分析案情、出谋划策，不料，却遭到“国保”警察绑架。

今天（9 月 17 日），原本约好和我上午 10 点见面的安徽省政协民主建国会（民建）的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信息，

说他昨天晚上被几个“国保”警察找谈话了。“国保”警察威胁他说：“郭泉是公安部内控人物，是危险人物”，并询问他为什么要约见我。“国保”警察在了解到我们见面只是学术会见之后，仍然强令这位民建的朋友取消和我的约见。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至少几十次了。电话里约好来见我的各地朋友，到南京后立即人间蒸发，数日后，我才得到消息，他们被拘留数日，或被强行遣返原籍。（参见《民主先声》164）

好，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保”警察了。

“国保”的全称是“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属公安局内设机构，负责掌握所辖地区的国内安全的敌情、社情、政情动态，研究制定对策；组织指导“隐蔽战线”工作，对重点部门，对象和重点部位开展安保。国内安全保卫大队主要职责是：搜集、掌握处理涉及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侦察、控制、防范、处置危害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组织、人员和活动；在民族、宗教等领域开展国内安全保卫工作，掌握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和重大事件的情况，及时报告、配合处置、防范和打击各种破坏活动；开展境外调研和秘密力量建设。负责对入境居留、旅行的外国人进行管理办理公民出国境的有关手续。

原来该部门还有“打击处理邪教组织，反动会道门组织违法犯罪”的职能，后该职能由“610 办公室”实施。目前，各地“610 办公室”都已经更名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党委领导下的反“邪教”机构。

“国保大队”（ 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在 1997 年前的名称叫“政保大队”（政治保卫大队）。政治保卫，其实就是“保卫共产党”。之所以改名，是因为 1997 年中国刑法进行了修改，把“反革命罪”修改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修改的目的，是中共为了对外宣传中国没有政治犯罪，只有刑事犯罪了。所以，“政保大队”也就相应改名为“国保大队”了。

但是，“政保大队”改名为“国保大队”，是不是就从保卫共产党，转变为保卫国家和人民了呢？我看，根本没有！

从这几年“国保大队”对我的非法讯问、非法跟踪、非法监视监听来看，“国保大队”唯一职能，从来就没有改变！那就是“保卫共产党”。

那么，“国保大队”到底应该保卫什么呢？是应该保卫国家，还是保卫共产党，做“党卫队”呢？

“国保大队”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而政府是人民的仆人，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养活的，所以，国保大队应该效忠人民，保卫国家、保卫人民。

那么，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呢？其实执政党是政府的组织者和人民意愿的执行者，当然更是人民的仆人（参见《民主先声》232）。

也就是说，“国保”警察是人民的仆人，而中共也是人民的仆人，这两个仆人都是为主人（中国人民）服务的。

但是，现在“国保”警察这个人民的仆人，不保卫主人（中国人民），却去保卫主人的另一个仆人，这不是主仆颠倒了吗？

07 年 11 月，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要求中共终结独裁实现民主，“国保”警察立即冲到我家抄家，并对我进行刑事传唤；

08 年 5 月，我因为上书谴责国家地震局在有足够地震前兆和预测的情况下欺瞒四川人民，而遭到“国保”警察的拘传，24 小时后“国保”警察将我送入狱中，关押十天；

这两天，我又公开发表了谴责中共在三鹿奶粉方面的监管渎职的两封公开信，不知道这次“国保”警察要把我投入大牢多少天呢。

“国保”警察如果拿出跟踪、监视我的一半精力来跟踪、监视三鹿奶粉的原奶来源和加工过程，我想就不会有数以万计的孩子遭遇肾结石和肾衰竭的危险。

“国保”警察应该保卫国家、保卫人民，而不是保卫共产党。中国人民，才是“国保”警察的真正的主人。

与主人为敌，做恶仆的帮凶，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昭，罪恶必罚！我们拭目以待！

郭泉：民主先声 296：中国新民党反对中共在食品方面对外国人实行“超国民待遇”

就在全国的“结石宝宝”快速上升到万名的时候，来自中共官方的两则新闻让人悲愤异常。

一是，9 月 16 日，国家质检总局通过央视（CCTV）新闻联播播出的关于奶粉质量检查结果的通报称：被查出有问题的广东雅士利奶粉出口到孟加拉、缅甸和也门的产品不含三聚氰胺；各厂家所有供应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粉未检出三聚氰胺。

二是，9 月 17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质检

总局局长李长江在会上通报了婴幼儿奶粉抽检等有关情况。李长江表示，“供应给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食品是完全安全的。我们对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所有食品的供应，包括奶制品的供应实行点对点的严格对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李长江还说：“对所有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奥运会举办之前的两个月，均派出驻厂检验人员，对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地监督。”

9 月 18 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召集本党法律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中共在食品方面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进行了谴责。

国民待遇是指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外国人与本国公民同等的待遇。即在同等条件下，外国人享有与本国人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依此原则，国家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应等同于本国人的待遇，另一方面，外国人不得要求任何高于本国人的待遇。所谓超国民待遇，也称优惠待遇，是国际投资法上的一个概念，即指一国对外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给予优于本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待遇。

当然，“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严格来说，并不是指“食品安全标准”。这里，本党为了说明问题借用了这两个贸易和法律术语。

所谓中共在食品方面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即中共对外国出口的食品或在本国给外国人食用的食品安全标准比中共提供给国人食用的食品安全标准要高。

例如，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坦言，中共“对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很显然，中共对供应中国人民的食品实行一般的管理办法。

另外，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还说：“对所有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奥运会举办之前的两个月，均派出驻厂检验人员，对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地监督。”

那么，中共对所有供应中国人民的食品，为什么不派出驻厂检验人员，对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地监督呢？

外国人的命是命，中国人的命不是命吗？

我们并不是要求中共提供给中国人民的食物要比提供给外国人的好，我们只要求在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国家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应等同于本国人的待遇”。

事实上，很多国家，例如日本，就是把最好的食物和其他所有的货物提供给本国国民，次一等的提供给欧美各国，最次等级的产品才送到中国，给中国人使用。

当然，对此我们也是反对的。不过，中国新民党认为本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本国人民提供最好的食物和服务。这是执政党和政府存在的根本意义。

但是，我们在中共政府身上，看不到这个“根本意义”。相反，我们在中共政府在奶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上，看到了中共与满清政府完全一样的嘴脸。

1901 年 2 月 14 日清廷颁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外）国之欢心” 。慈禧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还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清廷卖国求荣、丧权辱国之心昭然若揭。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之言“对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与清廷“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有异乎？有异乎？

相反，那些在百年前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洋人却一次次对中共政府说：“你们不能这样虐待你们的人民”。

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知识产权理事会的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说：“中国对本国国民的保护低于国际保护水平，这是不对的”。

中国代表反驳说：“只要我们对外国人的保护达到国际水平就行了，我们给予外国人的是超国民待遇，你们得领情，还得道谢呢”。

知识产权理事会代表说：“中国的这种保护也违反了国民待遇，因为国民待遇不仅适用于对外国国民的保护，而且还适用对本国国民的待遇，内外有别是违反国民待遇原则的。”

以上对话，说来真的让人感到无限的悲愤和无奈，我们中国人民的权益，竟然要外国人来帮我们维权了。而我们中国人因为针对有毒奶粉说几句都要被“国保”警察讯问。

今天（9 月 18 日）晚上，我的老朋友顾志坚先生对我说，“今天我和国保警察去约会了。”

我忙问怎么了？

他说：“昨天，我想到第二天是 918，我就在震惊世界的毒奶粉事件中思考到底什么叫国耻。中国早已独立，独

立的国土上，依旧有伤害。毒奶粉的出现，已经是故意毒害下一代幼小的中国未来接班人，于是，我就写了一些思考的文字，发到一些论坛上,不料今天一早，就接到江苏泰兴县国保副大队长的电话，叫我下午三点左右去公安局。具体事情到了以后再说。对于国保，我已经不陌生，因为此前我已经和他们有了两次约会。国保警察副大队长询问了我我最近有没有写关于毒奶粉的文章。我老实说写了。于是国保警察就说，现在国家形势一片大好，好得不能再好。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共产党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肯定会乱。我反驳说，没有反对党、没有监督，才是现在乱象的根源。于是，国保警察说，算了吧，你个人力量渺小，不足以改变社会。还不如好好关注自己的生活呢。最后，警察提醒我不要上了某些势力的当。"

顾志坚先生接着说："国保警察这次的态度很好。和他谈话，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还以为遇到了亲人和老乡。我想，这说明这个国保警察的人性的花朵还没有凋谢。可是，我更愿意相信时代变化才是激发人性片刻从良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的矛盾，中共最高层其实最清楚。而天天关注我们的国保警察，有那么多监视监听的特务手段，怎么可能听不见民众的呼声呢？"

顾志坚先生说的很好。

晚清李鸿章自嘲是糊大清这个破船的裱糊匠。既然是糊房子，肯定要细心，善于体味人心，稍微不注意，洪秀全似的人就会冒出来。据说李鸿章其实是竭力希望孙中山成为大清的顺臣的，而且还为此努力了许久。但是，大清朝的灭亡是不可挽回的。无论李鸿章释放多少人性之善意，也不能消灭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决心。

最近，有很多朋友，因为发表谴责中共有关当局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监管渎职的文章，而被"国保"警察讯问、传唤。

我想，这也好，让"国保"警察们看看我们的人对祖国是怎样的一片拳拳之心。让"国保"警察们看看我们的人和"国保"警察，谁才真正在保卫国家、保卫人民。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布什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字。

布什先生说："中国的变革终有一天会到来的。所有的人都会看到，那些勇于直言不讳的人士、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士，对中国的未来决不是一个威胁；正是这些人，将让中国成为 21 世纪的伟大强国。"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297：中国新民党绝不会是第二个中国共产党

最近，我在《民主先声》284 里，表述了中国新民党对毛泽东先生的历史评价问题。

中国新民党认为，毛泽东先生及其 49 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推翻独裁统治、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确起到关键的作用。

但是，中国新民党还认为，1949 年后，毛泽东先生错误地把"人民民主专政"理解成为了"共产党专政"。这就是导致 1949 年后的中国，人祸、党祸不断的根源所在。

中国新民党对毛泽东先生在 60 年代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表示支持。因为毛泽东当年所反对的权贵资本主义和独裁威权主义的"苗头"，已经变成了现实。毛泽东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正是现在我所反对的。

同时，中国新民党还指出，毛泽东先生走对了方向，却走错了路。因为，毛泽东先生没有用人民组党、多党竞选的方法来消灭独裁威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反，却用毛泽东先生的个人威权，取代了"走资派"的威权；用"共产党专政"取代了"人民民主专政"。

不料，《民主先声》284 发表后，立即有一些极端仇视毛泽东先生的朋友，说我们中国新民党也会步中国共产党的后尘搞独裁主义。

我想，这些朋友一定不知道中国新民党的基本理念是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另外，如果在《民主先声》284 里我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还没有表述清楚的话，我愿意在这篇文章里再次表述如下：

中国新民党反对阶级压迫，反对政治独裁，支持一切反对阶级压迫和政治独裁的阶级斗争。如果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人民必然会"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先生的"继续革命"理论在当前形势下，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完全适用和唯一的理论。

针对，一些朋友对中国新民党在未来价值取向上的担忧，我表示理解。毕竟，毛泽东先生的确在 1949 年之后进行了一党独裁。但是这些朋友以此就开始担心中国新民党也会在未来竞选上执政党后废除民主立法而搞一党专政，这就大可不必了。

我在《民主先声》51 中对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现摘抄几段，以解诸位“反毛”人士的担忧。

这些朋友的担心是必要的，翻开南美和非洲和东南亚（特别是缅甸）各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以民主宪法为伊始的新国家，堕落成为军事专制国家也是易如反掌的。

但是，这些倒行逆施与我是永远无关的。理由如下：

第一、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其实和 49 年前各民主党没有与共产党一起强行制定一部多党竞选的民主法律有关。当时的各民主党认为选举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于是就把立法的事情搁置下来了。等到 1957 年（西方民主国家 4 年为一任，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二任），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位领袖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再提出来“轮流坐庄”、“多党竞选”的时候，他们就被毛泽东打成了“右派”。

而我们，必须先选出议员、制定多党竞选的民主法律体系、召开议会。这样才有制约总统、弹劾总统的议会和法律基础。

这里引用美国总统华盛顿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民主制国家的认知：宪政治国天为公，分权制衡议会国，全民普选废任命，公民监政参议政。

第二、我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南美革命斗士切·格瓦纳、另一个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切·格瓦纳的牺牲精神，使我在争取民主的工作中有了无尽的精神动力。他有两句话我终身不忘，一是当他被捕时，面对枪口，他说：“我叫切·格瓦纳”。二是他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美国有一位华盛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第一任总统是幸运的。华盛顿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解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 年，华盛顿再度接受人民的召唤，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89 年 4 月，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当他担任美国总统八年后，发誓不再连任，坚决回到芒特弗农山庄，过平民生活，直到去世。

我想，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我就是切·格瓦纳，当我面对枪口的时候，我也要说：“我就是郭泉”。当我被反动派杀害之前，我也要说：“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我想，我在当选中国的民选总统之后，我也要做华盛顿。我的任期届满，我也要不再连任，回到我的徐州老家种田养猪，直到死亡。

第三、我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对政治“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从小“三不朽”的观念就牢记心中。我接受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要做一个流芳百世的人，这就必须“立言”、“立德”、“立功”。复辟专制是绝对没有好名声的。所以，我不会做毛泽东先生那样倒行逆施的事情。

郭泉：民主先声 298：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章程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章程

一 缘起、名称、基督徒与政治之关系

二 宗旨和目标

三 中国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

四 与各党之关系

五 与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之关系

六 党团注册、党员登记、党部设立和党主席选举

七 党的日常学习和活动

八 党费、党产和支出

九 与中国新民党、中国在野党联盟、基督教民主党国际之关系

一、缘起、名称、基督徒与政治之关系

2006 年 10 月，中国部分城市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在遭遇中共长期的非法打击下，开始秘密组建中国基督教民主党 China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CCDP)。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在关于“政教分离”的问题上普遍地存在两个错误的思维，一是认为“政教分离”就是教徒不能从政，二是认为“政教分离”就是教徒不可以组建政党。

政治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都无法回避政治。

基督徒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放弃对社会罪恶的批评、漠视百姓的疾苦，就是悖逆上帝的吩咐。

在今日中国教会中，错误的神学造成了众多“敬虔”的懦夫！他们自己不谈论政治的问题，也不让别的基督徒谈论。一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政治的无知，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怯懦。因为他们并不以圣经为标准来合理地看待政治问题；而是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是残酷的，基督的信息与政治无关。

他们人为地把自己关闭在“隔都”里，自诩属灵，却不晓得已经丧失了光亮和盐味，成为“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 5：13）的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发挥“光”与“盐”的作用，要积极地通过自身的好行为，改善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政治领域。

中国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人民反对专制独裁的政治，提倡并努力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二 宗旨和目标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暨“中国基督教民主主义（China Christian Democracy）的主要思想：

1、主张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

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

3、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

4、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5、对于改变（如社会的结构）抱持着开放态度，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

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

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

8、排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9、倡导各宗教教徒和睦相处，共同建设和享受地区、国家和世界。

10、强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同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源泉，并积极进行两种文化的同源性研究。

基督教民主主义在道德和文化议题以及其他公共伦理和传统思想的议题上，提倡尊重民族传统文化价值。

基督教民主主义在经济和财富议题上，主张以“强烈地社会良心”济救贫穷的福利国家 制度，是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将国家经济视为对国民的人道服务，我们认为照顾人民是国家的首要责任。

基督教民主主义在人权、个人进取和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的议题上，是自由主义。

所以，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观点，以传统文化道德和基督教教义作为其广泛的架构。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目标是，与中国各民主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

三、中国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

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

基督教思想里发展出的民主理念深深影响了世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

中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开端于中华民国时代。

国父孙文先生、国母宋庆龄女士都是基督徒；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和宋美龄女士也是基督徒；现任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中国国民党员马英九先生夫妇也是基督徒。

1925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可以说，中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就是从孙文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开始的。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圆融的典范。提倡圆融思想的中国人民理应让这两朵人类文明的奇葩同时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将继承中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的传统，沿着圆融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路数，在21世纪积极开展中国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

四 与中国各党之关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主张建立人民自由组党、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

在这一体制建立前，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愿意与一切积极推动结束专制政体以建立民主宪政政体的政党合作。在这一体制建立后，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愿意与一切依法注册登记并合法发展的政党保持正常关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与中国各党之关系为竞选关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认为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与其他各党的竞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将是中国人民。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坚决支持中国全境和境外（港澳台各政党、流亡海外的各民运党派和组织）的民主党反对“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主张，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都是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朋友。

一切反对民主，捍卫专制的政党，都是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敌人。

五 与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之关系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捍卫人民利益。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认为，一切出生在中国的人，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除非本人书面声明放弃中国国籍，均终生获得中国国籍。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反对目前政府认为只要加入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政策。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热爱一切学习、工作、生活在中国的反对专制、支持民主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一切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多党民主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都是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天然盟友。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希望中国各行业都有独立工会，并愿意为全国所有行业的独立工会的成立和运作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支持一切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海内外宗教组织自由在中国开展宗教活动。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支持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在中国进行各自宗教的信仰崇拜活动。谴责并以实际行动反对一切限制和镇压任何种类的宗教公开或家庭聚会的邪恶专制暴政。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谴责并反对专制暴政用其专制政党利益来任意界定“邪教”、并镇压宗教组织和信仰人士的反人类罪行。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认为未经民主制度下的司法检控和审判，任何宗教均不得被判定为“邪教”。

六 党团注册、党员登记、党部设立和党主席选举

由于目前中国法律并无政党注册法，所以，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无法进行政党注册。

为了汲取早些年要求申请登记注册的其他民主党先后遭遇残酷镇压的经验教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决定以中国开放报禁、解除党禁这一历史事件为分界线，实行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活动政策。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设立任何形式的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和县市党部。但在海外设立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各国）党部。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寻求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团注册工作。但在海外各国均应申请注册，以利于开展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海外工作。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员登记工作。但在海外进行严格的党员登记工作，包括党员申请、审查审批和宣誓入党工作。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党员必须是基督徒，包括受洗过的基督徒和没有受洗的基督徒。任何反对专制、支持民主的基督徒，皆可自行宣称为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目前在大陆的工作，就是用一切手段对民众宣传民主思想和基督教民主主义。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海外各党部的工作是带领海外党员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成立，宣传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寻求各民主国家民主政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积极配合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国内民主运动的最新形势。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将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后，依法进行党团注册、党员登记（接受申请、审查审批、宣誓入党）工作。党员登记的基层单位为各县市党部。登记工作全部完毕后，进行各级党主席竞选。

任何党员都必须首先归属县市党部。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任何党员皆可参选县市党部主席。

各县市党部进行民主选举产生的县市党部主席，参加省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各省党部主席参加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海外各国的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部也照此执行。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海外（各国）党部主席与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大陆各省党部主席的地位平等。

海外各党部主席必须回国参加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各县市党部主席、各省党部主席如被民主选举到上一级党部担任主席的，原党部重新进行新主席的民主选举工作。

中国解除党禁前，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由中国公民郭泉先生出任。

未来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部主席、省党部主席、县市党部主席或任何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如参加政务竞选，成功当选政府各级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为其个人、家属亲戚或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各党产部门谋取利益。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坚决反对执政党的一切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

七 党的日常学习和活动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虽皆为基督徒，但本党没有宗教偏见，是服务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党。

学习、实践和宣传民主思想是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最重要的工作。

所有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都要深刻认识到惟有民主才能拯救中国。而未来民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我们今日的努力宣传。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目前阶段的近期目标是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目前之主要工作是宣传。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学习宣传文件目前为：

1、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章程；

2、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工作指南暨基督徒维权手册（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编写、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审订）

3、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所有公开信和民主时评集《民主先声》

4、苏晓康先生等撰写的《河殇》解说词、远志明先生等执笔的《神州》解说词；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活动，目前在大陆的思路是“以维权促民主”、“以民生求民主”。切实作好每个维权个案，总结提高。在实际维权工作中，把民主思想灌溉到每个维权人员的心灵深处。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海外各国党部，目前的活动以联络各国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为主，广泛宣传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成立和政治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政治声援和财物支持。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国内外党员都要有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的精神。并肩作战，奋力工作，争取早日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八 党费、党产和支出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反对目前中国执政党使用人民纳税来供给党务开销的政策。

中国人民不仅要养活一个庞大的政府公务员的队伍，而且还被迫养活人数众多的中共党团委、伪“民主党”的专职党务人员。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制国家人民都无法接受的邪恶政策。

党政必须完全分开。

任何党（包括执政党）的党务活动都不可以使用人民纳税，而只能使用本党党员缴纳的党费、党产和合法的社会捐赠。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经费来源略分为三：

1、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缴纳的党费（因为各种原因经济拮据的党员免交）；

2、自愿以厂房、商场或其他经营形式缴纳党费而形成的党产收益；

3、一切不违背竞选法律的、合法的国内、国际社会捐赠。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的经费使用分为三个途径：

1、支付各党部办公经费（包括房租水电通讯、设备购买维修、宣传活动场地费等）和人员工资。

2、各级党部主席的竞选费用的公共部分，例如会议场地的租用、新闻发布会的费用。但参选人各自的竞选宣传费用自筹。

3、各级党部主席代表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参加的社会政府官员的竞选活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鉴于目前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不寻求党团注册和党员登记，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中国境内之党员不缴纳任何形式的党费。但中国基督教民主党（海外各国）党部在严格办理党员登记工作的同时，自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党费标准，但必须造册登记备查。

九 与中国新民党、中国在野党联盟、基督教民主党国际之关系

基督教民主党国际 Christian Democrat International（CDI）是各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联盟组织，该国际目前有成员党 52 个。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CCDP）志愿加入并积极与基督教民主党国际（CDI）取得联系。

2008 年 8 月 16 日，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加盟“中国在野党联盟”，与中国新民党、中国共产党（新党）共同成为“中国在野党联盟”的最早三党之一。

2008 年 8 月 27 日，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缔结两党政党同盟，誓言并肩作战、共赴国难。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与中国新民党共同奋斗、努力在中国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政治主张。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全权委托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出任本党代主席，并起草中国基督教民主党章程。本章程于 2008 年 9 月 20 日经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部审议通过。（全文完）

郭泉：民主先声 299：有这样的执政党，我们的人民怎么能不苦难？

三鹿毒奶事件爆发后，我的很多学生问我，怎么才能让这个国家没有“问题食品”。

我笑着说，我有个好办法，只要共产党执行，中国就一定不会有“问题食品”。我的办法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官员的日常饮食直接随机取自各地农贸市场。

同学们都说这个办法好。但是，也有一些学生问，“郭教授，难道您认为中共干部的每日饮食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吗？”

于是，我笑起来，说，当然不是，他们的每日饮食来自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及其下辖的三个公司：北京国佑特供产品有限公司、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国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然而，我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专门为中共干部甄选“安全食品”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

今天（9 月 22 日），中国新民党的情报部门提供了五份资料给我，这五份材料是：

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及其下辖公司介绍；

二、中央国家机关主要“国 A”特供食品介绍；

三、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介绍；

四、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五、中央国家机关特供食品网 http://www.aaa123.com.cn

现公布如下：

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及其下辖公司介绍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下辖三个公司。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兼任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这三个公司是：

1、北京国佑特供产品有限公司，企业经济性质：股份合作企业。经营模式：政府或其他机构。经营品牌：国A特供产品。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12号

2、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是中国领先的优质零污染食品——有机食品的供应商和有机食品配送服务提供商，具有极高的市场感召力和客户忠诚度。

自特供中心成立以来，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等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办局办别老干部们（其中，部级以上老干部2000多人，局级老干部6000多人，处级以上在京老干部共约130000人）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3、北京国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2008年4月成立。该公司承担着"国A"特供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考察、甄选工作。

二、中央国家机关主要"国A"特供食品介绍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国A"特供食品有十余种，例如：

特供有机大米：原产地：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稻米生产基地，出产的"越光"有机大米。

特供有机杏仁油：原产地：山西左权县太行山中段海拔1200米的生态自然地区，纯天然，无污染。

特供国A鲍参酒：原产地：山东省。

特供国A茅台酒：原产地：贵州茅台。

三、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介绍

2006年5月，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派出由多位专家组成的"国A"特供酒考察组，赴贵州茅台镇实地考察， 以茅台基酒为原料，调制出首款"中央国家机关特供茅台酒"。

2006年10月，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甄选山东科尔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品的"壳寡糖"系列保健食品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2007年4月至10月，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国A"特供产品考察组在公司副总经理杜毅带领下，先后几次赶赴东北三省，考察了30多家有机大米生产企业。经过对生产基地、稻种、空气、土质、灌溉水源、生产设备、物流系统的综合对比、论证，最终于2008年元月，选定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越光有机大米作为"国A"特供产品。越光有机大米为日本新潟县鱼沼地区越光米粳稻品种，目前选择中国丹东前阳鸭绿江口滨海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稻米生产基地，当地气候及自然环境均极有利于水稻种植生长，并采用多机轻碾加工工艺，加工出的大米晶莹透亮，光亮如玉。越光大米一年一收获，量少口碑好，无论香味、白度、光泽以及吃起来的甜度、弹性与粘度，堪称米中之最。

2007年4月，受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邀请，国佑世昌派员考察其最新科研产品—"鲍参酒"。考察组一行参观了中国海洋大学科研所，详细听取了专家对"鲍参酒"的讲解并参观了"鲍参酒"加工企业青岛海能海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次日，国佑世昌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青岛海能海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国A"特供产品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国A"特供体系更近丰富。

2007年9月"鲍参酒"被甄选为"国A"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2007年10月，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应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左权鸿鹏油脂有限公司邀请，赴山西左权考察有机杏仁油项目。一行人员首先听取了农业局对左权农业的整体介绍，随后参观了有机杏仁生产基地、有机杏仁油生产线，并详细了解了有机杏仁种植、采摘及杏仁油的生产加工过程。会后与左权鸿鹏油脂有限公司签订了杏仁油采购协议。有机杏仁油将进入 "国A"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体系。

2008年3月27日，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毅一行考察组，来到江苏省盐城市考察农业项目。市委书记赵鹏、副书记李驰、市委组织部部长章大李、副市长朱传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戴晓春、市经贸委副主任徐华明等市领导接待了考察组一行。28日，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农业局进行了农业项目合作洽谈会，杜总肯定了盐城农业取得的喜人成绩，并对特供产品采购要求及农业项目合作条件作了阐述。此次会谈双方就盐城多个优势农业项目进行了较为仔细的探讨,在多个层面上达成了共识。会谈后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盐城市农业局、盐城市委老干部局三方签订了《有机农业合作开发意向书》，这对双方在日后合作项目的开展做出了铺垫。

2008 年 4 月 18 日，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应邀赴承德鑫达食品有限公司考察。在鑫达公司相关人员陪同下，国佑万悦负责人实地考察了荞麦、莜麦生产基地并参观了产品陈列室、产品生产线 、物流仓库等，在有机杂粮深加工及市场销售等方面双方进行了探讨交流。最后，双方就有机杂粮产品合作一事达成了初步协议，并有望在六月份推出“国 A 特供”有机杂粮礼盒。

四、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祝咏兰主任
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2006 年 10 月）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年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代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出席本次会议。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 13 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 94 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基于对自身优势及对需求的客观判断，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率先投入到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中来，被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

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的进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进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

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我们甄选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

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用返朴归真这四个字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

大家都知道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这些成分残留在最终产品（各类蔬菜、肉类、奶制品）中，人食用了这些产品后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

我国绿色食品的 AA 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再说“营养性”。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一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我们将保健食品列为一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其要求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格外的慎重。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进、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进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 GPM 认证、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我们还要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进行大量调研，最后由我们的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甄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覆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定，历时半年，“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最终获选。

在此，我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对山东科尔公司表示由衷的祝贺。

五、中央国家机关特供食品网 http://www.aaa123.com.cn

我不知道看完这五份材料的人们会有什么想法，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是：有这样的执政党，我们的人民怎么能不苦难？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郭泉：民主先声 300：就中华民族的未来，与胡锦涛总书记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尊敬的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您好！我是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2007 年 11 月 14 日，我曾发表致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的一份公开信，题目是《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在那封信里，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从十八个角度与两位领袖探讨了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其中，第十八条的标题是《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今天（9 月 23 日），我得到一组数据，令我震惊。数据如下：

河北目前检出肾结石儿童占全部已检查的 3.6%，广东是 2.2%。而全国有 3 亿儿童，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我国将出现 500 至 1000 万肾结石儿童。有的小孩现在还没出现肾结石症状，但肾脏受损有镜下血尿的儿童数还没报上去。

我读到这组数据，不禁仰天长叹。

这是不是一场民族灾难？还有什么灾难能一次性伤害这么多儿童？

我们知道罹患肾结石和尿道结石的成人疼痛起来呼天喊地、满床打滚。而不会说话的孩子有苦说不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冤屈啊。真是人神共愤！

任何一场灾难都没有这个事件对我们民族的未来伤害大。这个事件里，突显出来的问题很多，有“眼前利益”问题，有“民心公心”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却是“制度问题”。

现在，我想就 2007 年上书给您的公开信里谈到的“眼前利益与民族未来”问题，再与您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在 2007 年公开信的第十八节中认为：

没有监督的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没有监督的权贵统治者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攫取暴利，而把人民抛在脑后。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所以，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时隔一年，我在 2007 年最担心的问题终于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民主制度。

下面，我想和胡锦涛先生谈谈“制度”问题。

1980 年 8 月 18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 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8 月 31 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早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我注意到，为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胡锦涛总书记主政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力倡导提高中共干部思想作风。

例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思想作风。

但是，我也更注意到，邓小平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无疑，小平先生是正确的。制度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

邓小平先生曾极其精辟地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然，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制度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这种根本性作用。例如，胡锦涛先生指出："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形成完善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十六大以来，中共先后制定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十几部规章和纲要，建立健全了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质询和罢免机制、诫勉谈话、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但是，腐败势头不减，人民不满情绪增强、群体事件年年递增。

这次的奶粉事件也是如此。

中国有涉及食品安全的近 20 部法律和近 40 部相关行政法规，还有近 150 部规章；中国还有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 10 个部门（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中国还有关于食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仍然"恶报频传"呢？

很显然，以上两个例子里的制订"制度"，并不是小平先生所说的"制度"问题。

那么，小平先生所说的"制度"到底是指什么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看小平先生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思考制度问题的，就会知道小平先生所说的"制度"到底是什么制度了。

第一，在对待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时，小平先生从制度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反思和批判"文革"错误，是我国实现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伟大转折的历史前提。"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如何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次发生？不少人多从个人作用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思考。而邓小平则侧重从制度这一更深的层次去看问题。他明确提出，对过去、特别是"文革"的反思与"清算"，"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第二，在理论思考（是什么）与实践考虑（怎么做）之间，邓小平总把实践考虑放在优先位置。邓小平将思考重心位移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他把实践的重心移到了"制度建设"之上。在他看来，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回答我们在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下、遵循什么样的规章制度、运用什么样的规则与机制，去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三，在分析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机制问题时，邓小平虽然重视人格化机制的作用，但他更看重制度的优先性。社会发展机制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类是人格化的机制，另一类是非人格化的机制。人格化机制的典型代表是"人治"，非人格化机制的典型代表是"法治"。

人格化机制与非人格化机制的区别，不在于重人与重制度的对立，也不是在人重要与制度重要之间做排他的选择；而是在于：社会发展的推动机制是什么？是人格化的意志、感情、个人魅力、高尚人格，还是尽可能排除这些私人情况的公共规章、普适规则、共同规范？

小平先生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四、在对制度优越性的评价方面，小平先生强调"人民幸福"才是评价制度的优劣唯一标准。邓小平先生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随便你说你的制度怎么优越，只要两极分化，你就是罪恶的制度。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小平先生所说的制度，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小平先生在有生之年，囿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而无法实现他的这一政治制度改革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反对贫富不公，反对两极分化，提倡全民福利、按劳分配。"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反对独断专行，反对个人权威，提倡民主监督、多党竞选。

2007 年，我的公开信所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

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最后，我承认胡锦涛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对此，我不持疑议。但是，在一党执政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中国新民党与贵党持不同政见。

我认为，中国人民能否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和人民是否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这是衡量中国是否有民主的唯一标准。

多党竞选，不只是谁执政"一届四年或两届八年"的位置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

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面完全一致，但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面，中国新民党坚持走人民组党、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缘，与贵党才俊在"民主社会主义"这方面进行对话。

另外，胡锦涛主席，我注意到中国现行法律里没有《政党注册法》。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所有的政党，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由人民自发组建的中国新民党，都未经注册。这是极不正常的。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依法注册，接受人民的选择，为人民服务。

请胡锦涛总书记衡量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贵党神圣的抉择。历史会对胡锦涛先生及贵党的抉择作出公允的评价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301：请中共南京"国保"警察善待高敬德先生

今天（9 月 24 日），高敬德先生来南京看我。下午 3 点半，我和他见面不到 5 分钟，南京"国保"警察就中断了我们的会见，带走了他。

高敬德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药品打假专业人士，被各大媒体誉为"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 2007 年 5 月 16 日 11:40 的央视《大家看法》曾对高敬德先生有过访谈。

我认识两位药品打假的专业人士，两位先生都姓高，一位是高纯先生，一位是高敬德先生。

高纯先生，我想大家都熟悉，他历时 12 年状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落马被判死刑，于 2007 年 7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高纯先生举报自己单位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罗永清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作假，从岳阳市、湖南省一路告到北京，在局长接待日见到了郑筱萸。

郑筱萸对高纯先生咆哮："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从 95 年开始举报的 11 年里，高纯先生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 100 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 42 件、电子邮件 400 多封、电报 2 封，电话打了 500 多次，去了 21 次。

高纯先生有句话，我想与全国一切热爱真理、热爱民主的朋友分享。

他说： "说真话真的很深刻吗？其实，说真话不需要学历知识经验。"

是的，高纯先生说的对，说真话不需要学历，但是需要勇气。

高敬德先生，今年 48 岁，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药界从事经销工作，2003 年初，受聘于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从事药品采购工作。高敬德先生有多年的脂肪肝病史，经同行介绍，服用由浙江金华泰来医药公司总代理的"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但是，高先生吃了半瓶药后，分别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凭着多年接触药品的经验，高先生意识到可能遭遇了假药。于是，他开始了他的药品打假生涯。

高敬德先生称他的药品打假工作为"一个人的战争"。

高敬德先生就像药品行业里的一只啄木鸟，见了假药就一定要将它"啄"出来。4 年来，高敬德先生转战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十个城市，成功举报 108 起假药制售。

高敬德先生至今仍是单身，不嗜烟酒，为人耿直。他为举报假药丢掉了工作。当我们为此感到愤慨的时候，高敬德倒是蛮乐观，他说："等我的老本全部用光了的时候，或假药彻底消失了，我也会找到工作的。好在我没有家

室，少了后顾之忧。”

当高敬德先生一次次发现假药向药监局举报，等不到药监局的驰援，却等来了假药销售者的一次次殴打之后，高敬德先生开始到法院起诉药监局对假药监管的“不作为”了。

高先生认为，中国的假药盛行，除了有假药生产单位和销售单位的违法犯罪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高先生是对的。成本只有 3 元的药，市面上可以卖到 300 元。药品的利润之大，足以让卖药的人付得起行贿的成本，而现行药品审批的权力之大，又难以让药监官员抵抗如此巨大的诱惑。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 FDA)所面对的不过是 200 多家企业，每年只审批几十种新药。而在中国负责注册审批的几个人要面对几千家制药企业的上千次诱惑，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不腐败才怪。

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都出在一个根子上，这个根子就是一党独裁，没有多党监督

一党独裁为其统治，也搞“监管”。例如，凡是问题丛生的地方，中共都认为是监管不力，于是在权力部门之上，设立一个监管部门，于是就有了银监、保监、证监、安监、药监、土(地)监(察)等等，这还不算审计、纪检、反贪部门。估计很快要有社保监、住房公积金监、医药费监等部门。

监来监去，“谁来监督监督者”就成了最终需要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监督者没有人监督，就像药监局一样，同样面临腐败的风险。

所以，只有多党竞选，才能监督执政党。

人民必须有权选择执政党，这个国家才是人民的。否则，就是“党国”，而不是人民共和国。

高敬德先生被南京“国保”警察带走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请南京“国保”警察善待高敬德先生。虐待这样的好人，是缺德的。

“国保”警察也是人，你们也要吃药。

我相信，居住在北京的中共“国保”总头目的药品是“特供”的，不会有假，但是，南京“国保”警察，你们的药你能保证不假吗？

善待高敬德先生，就是善待人民，因为高敬德先生在为人民打假药。

虐待高敬德先生，就是虐待人民。人民不答应！

现公布高敬德先生的手机，请大家表示声援和慰问，另外有律师朋友也请为高先生的打假事业提供法律援助。

高敬德先生的手机是：13913873054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302：国务院，你否认不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食品特供问题

今天（9 月 25 日），中国新闻网发表了国务院否认中央国家机关有食品特供的一则新闻，全文如下：

中新网 9 月 25 日电 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今天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时，就近日网上出现的所谓题为“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的贴文进行了说明。

这位负责人说，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所谓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没有举行过所谓的“授牌仪式”，也没有“祝咏兰”这个人，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

我想，这就是国务院对我 9 月 22 日指控中共有“特供食品”的回应。

我的指控和相关证据见《民主先声》299，我提供的五个证据如下：

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及其下辖公司介绍；
二、中央国家机关主要“国 A”特供食品介绍；
三、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介绍；
四、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五、中央国家机关特供食品网 http://www.aaa123.com.cn

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

我不否认国务院在很多问题上是有诚信的，但是，在“特供食品”问题上，国务院一定是不诚信的。

下面我再提供一些证据，再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对不诚实的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证据一：2006 年 12 月 4 日《大众日报》有关“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报道

2006 年 12 月 4 日《大众日报》报道： 由中国最权威医药学府——中国药科大学研制、山东科尔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品的两款专利保健食品“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科尔益康胶囊”日前被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特供指定专用。山东科尔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也因此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供应基地中唯一的保健食品特供企业。

证据二：2007 年 9 月 12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洪山）礼堂召开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武汉）新闻发布会

湖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网站“宏根·老人坊”记载：

2007 年 9 月 12 日，“生命要素壳寡糖与人体健康高端论坛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武汉）新闻发布会”在湖北省人民政府（洪山）礼堂隆重举行。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我国生物科学领域的诸多权威专家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主要有：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翟殿玉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老领导、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炎黄文化研究会养生保健委员会王峻峰会长，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副主任杜毅先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天然产物与糖生物工程 1805 组党组书记曲天明教授和专家委员会委员陈耀华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继珩教授，老人家领导人刘大一先生等 30 余位嘉宾和湖北电视台、《现代健康报》、《武汉晨报》等新闻单位，以及来自湖北各地的一千多名老年朋友参加了这次大会。

陈耀华教授做了《生命要素壳寡糖与人体健康》的报告。

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杜毅副主任介绍了“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特供之路”，并和老人家领导人刘大一签订“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权经营协议。见 http://www.53199.com/html/hbll/dfll/20080430094956682_3.html

证据三：2008 年 8 月 18 日，杜昱光教授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杜昱光教授是中国生物工程学糖生物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委员会甲壳素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天然产物与糖工程研究组（1805 组）负责人 。他说：

尊敬的赵明顺书记及在座的各位领导和专家、

尊敬的各位山东以及各地的老年朋友、科尔的全体员工：

你们好！很高兴参加这次盛会！同时也祝贺科尔公司的两款产品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的特供产品，这说明科尔公司产品的质量、功能达到了一定要求。（以下略）

证据四：2008 年 8 月 18 日，姚乾元教授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姚乾元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山东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他说：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好，今天我能参加这一盛会，感到非常荣幸，科尔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科尔益康胶囊和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双双被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选定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并授权使用“国 A 标志”，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以下略）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303：民以食为天，中国新民党以民为天

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的组织改良和道德的进步，都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乃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

古人管仲先生云：“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如天之天者，斯可以”。

“天”者，至高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是政治哲学精粹之所在。

为顺天应民，视民心为天意，中国新民党“以民为天”。中国新民党认为，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执政党对民食疏于督察，无异于陷民众于毒臼。

民食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孟子的“仁政”理想在于让人们吃饱穿暖，以尽“仰事俯畜”之责。儒者所梦想的“大同”社会的标志也不过是使普天下之人“皆有所养”。

中国人一直以“社稷”二字来代表国家，这二者当中的社字则为社神，而稷是粮食的一种。《白虎通·社稷》：“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由此可见，“食”在中国历史的绵延和更替中的重要和醒目了。

《诗经》中数百次提到了食物的类目，其中 44 种可确定为食物性植物（《圣经》只指出了 29 种）。

《论语》记载：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要出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治理政事的方法和秘诀。孔子说：“曰食，曰兵，民信之矣”。

《老子》第十二章也有记载：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

唐太宗在《务农篇》中说：“夫食为人大，农为政本”。籍此李世民在青史上得“千古明君”之誉。 唐太宗说：“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唐太宗一生“劝课农织，使人还其本。”

国父孙文，在其《上李鸿章书》中明确地提出 ：“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

毛泽东先生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目前，中国共产党在食品安全上的渎职行为，向国人和世人表明，中共既没有“法先王”，也没有“法今圣”。

商鞅虽有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但是在“民食”问题上一点也没含糊过，那就是“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

郭泉：民主先声 304：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胡佳或胡锦涛，谁更正确？

9 月 25 日，我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胡佳可能得奖的消息时说：“我们认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是授予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的人，那就应该授给正确的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在这一问题上能作出正确决定，不要做违背诺贝尔奖初衷、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听到刘建超先生的这番话，我不禁笑出声来。

关于胡佳（嘉）先生，我在《民主先声》里详细介绍了他的事迹（参见《民主先声》92），随后发表了中国新民党反对中共逮捕胡佳先生的决议（参见《民主先声》174）。

胡佳先生热爱和平、热爱世界人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是中国最著名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人士。他经常到爱滋病的重灾区河南上蔡县等地为病患提供帮助，例如送钱、送衣服、送玩具等，深受艾滋病人和爱滋孤儿的爱戴。

胡佳的爱心活动，使中共当局感觉“丢了脸”，中共当局生怕胡佳揭露出的爱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的情况，会破坏“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经常把胡佳抓起来，一关就是一个月。

中共警察们还时常殴打胡佳，享受拳头打在肉体上的快感。连胡佳的爱人金燕在医院生孩子，胡佳去送饮食，警察先生们都惟恐饭盒里送的是有关爱滋病患者的情报，在医院门口殴打可怜的胡佳先生。

2007 年 12 月 28 日，胡佳被中共北京“国保”警察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08 年 4 月 3 日，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胡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谁比胡佳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正确。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谁比刘建超先生说胡佳先生不正确更无耻。

刘建超先生您认为在中国，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正确呢？

刘建超先生，您和您的党推选了哪位更正确的人选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呢？

我不知道刘建超先生和刘建超先生的党，是否向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提名过谁，但是我想如果贵党如果有人选的话，那一定是贵党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的确，胡锦涛先生完全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这必须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胡锦涛先生开放党禁、报禁，在中国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

如果，胡锦涛先生不开放党禁、报禁，不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那么，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人胡佳先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另外，刘建超先生威胁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说：“不要做违背诺贝尔奖初衷、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今天，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对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先生女士们说：你们做的很好，评选胡佳先生才符合诺贝尔奖初衷。如果你们不评选胡佳先生，你们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如果刘建超先生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否被伤害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在中国开设投票站。选票上写两个名字，一个是胡佳，一个是胡锦涛。看看谁的得票高。

刘建超先生，您敢试试吗？中国共产党，你们敢试试吗？

郭泉：民主先声 305：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消灭敌人

今天（9 月 27 日），我在一个复转军人群里重温了一部我上小学时看过的电影《大浪淘沙》里的主题歌。这首

主题歌的歌名叫《工农兵联合起来》。

歌词全文如下：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我们勇敢，我们奋斗，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目前中国的革命情势，与电影《大浪淘沙》的大革命背景完全相似。

专制统治下，现在受苦的已经不是一个群体，而是涵盖工农兵学商在内的所有被压迫群体，所以，工农兵学商必须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消灭敌人。

重温了这首歌，我想起了另外一首人人皆知的歌，可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只知道这首歌的第一、第二和第六段。而这首歌的第三、第四、第五段歌词，与中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一致，但是却一直没人翻译演唱。

这首著名的歌就是《国际歌》。今天我认真读了《国际歌》的全文，特别研究了《国际歌》的第三、第四、第五段歌词。

这三段歌词大意是：别用和谐来忽悠人民，我们已经无法忍受，我们需要平等的法律！你们霸占了我们的矿山和铁路，你们手里的金币，必须全部退回！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我们必须讨回血债。如果你们决意与人民为敌，我们将奋勇杀敌！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歌》，以及为什么现在演唱的《国际歌》只有第一、第二和第六段。

1871 年 5 月 28 日，凡尔赛反动军队攻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最后一个堡垒——贝尔・拉雪兹神甫公墓，导致革命失败。

全城开始了大屠杀，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

面对着这一片白色恐怖，第二天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1816－1888），怀着满腔热血，奋笔疾书，写下了本曲那气壮山河的歌词。

这首诗歌原名为《国际工人联盟》。1888 年，在欧仁•鲍狄埃逝世后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尔・狄盖特以满腔的激情为这首歌谱写了曲子。从此，它便成了世界无产者最喜爱的歌，从法国越过千山万水，传遍全球。

1890 年出现了西班牙译文的《国际歌》，1899 年被译成了挪威文，1901 年出现了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国际歌》，1906 年正式传入了俄国，为了便于传唱，翻译这首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柯茨只选择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段。

1923 年瞿秋白将它从俄文翻译成了中文，因此我国所唱的《国际歌》也只有三段。

今天，我要把那丢失的三段补齐，恢复《国际歌》六段歌词的本来面目。全歌六段歌词如下：

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三

国家正在压迫人民，法律也只保护富人。

不能再让富人为所欲为，一切必须恢复平等！

我们已经无法忍受，需要平等的法律！

反对一切不平等法律，我们应有平等权利！

四

我们的矿井和铁路，已被独裁者霸占

他们手里的金币，必须全部退回！
他们高高在上，抢夺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我们必须讨回血债。

五

别对我们说什么和谐，那是你们的欺骗。
被蒙蔽的敌军将士们，放下你们的武器。
如果决意与人民为敌，我们将奋勇杀敌！
你们将被我们消灭，我们高唱凯旋之歌！

六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上文六段歌词的副歌都一样，如下：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以上《国际歌》全部六段歌词的第三、第四、第五段，我是根据英文意译的。
翻译好以后，又对乐谱唱了几遍，感觉可以对上，就匆匆发表了。以后大家在演唱的时候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商量改进。

郭泉：民主先声 306：人必须有所敬畏！“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如是说

《民主先声 271》介绍了 8 月 24 日 23 时 47 分清华大学的清华新闻网刊登了一则新闻，题目是《清华校长顾秉林：中国大学教育就是往脑子里灌屎》。

当时，我想，可能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情况如清华大学新闻中心所言，是骇客假托顾秉林先生发表批评中共教育制度；

另一种情况是清华校长顾秉林先生对学生确实说了这些肺腑之言，但是告戒学生不要发表，不料，某位耿直的清华学子整理好顾秉林先生的讲话后直接发到清华大学的清华新闻网上了。

无论是什么情况，我认为“顾秉林先生”的那篇文章符合中国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况。

无独有偶，9 月 26 日 23 时 09 分，另一篇署名北大校长许智宏，抨击中国教育制度的文章登上北大主页成为头条新闻。次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发表声明称，该校网站“遭到别有用心的恶意攻击和篡改”，“假造许智宏校长名义的错误文章，混淆视听，性质恶劣”，“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读完“北大校长许智宏”的《大学教育，反思还是腐烂？》之后，感慨万千。

这篇署名为“北大校长许智宏”的文章对 8 月“清华校长顾秉林”的文章进行了思考，随后，在对中国大学教育忧心如焚之余，发出了“救救孩子”、“救救国家”、“救救民族”的时代最强音。

尽管，两所大学的新闻中心都在文章发表的次日都发表了对假冒“校长”行为的谴责声明，但是，我却一直没有看到两位校长自己的声明。

从这两篇文章对国民教育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深邃洞察的思想来看，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和清华校长顾秉林先生，理应有此思维。

如此两篇文章果为两先生所为，则乃吾国万幸，百姓洪福。

如此两篇文章非为两先生所为，则此两篇文章的作者完全可以出任两校校长。

“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的文章里，最值得所有中国人思索的是“人必须有所敬畏”。他说：“人必须有所敬畏。不是指对权贵的敬畏，而是指对正义，对天理的敬畏。若失却了敬畏之心，人便会无法无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没错，这个“许智宏先生”说的没错。

从炎黄算起，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历史。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意思是：神的土地。

中国的国土也被称作“社稷”。社稷，即土谷之神。由于古时的君主为了祈求国事太平，平谷丰登，每年都要到郊外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社稷也就成了国家的象征，后来人们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社，古代指土地之神，按方位命名：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五种颜色的土覆于坛面，称五色土，实际象征国土。古代又把祭土地的地方、日子和礼都叫社。稷，指五谷之神中特指原隰之祗，即能生长五谷的土地神祇，这是农业之神。

一部《诗经》，呼喊昊天上帝之名达四百二十一次之多。

但是，如今，中国，这块称作神州的土地，离开神已经很久了。

没有对天地神灵的敬畏，离开了昊天上帝的恢宏大道，赤裸裸的投机功利主义开始不知不觉沁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

大哉！“许智宏先生”！ 大哉！“许智宏先生”！

现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的文章抄录如此，以飨大家：

《大学教育，反思还是腐烂？》

许智宏

上个月就听说了清华大学被黑客入侵的事情。震惊之余，思考了很久，我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实在是太需要一个局内的人来发出一些声音了。

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认为这本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先生的原意，只是后来迫于压力，才推托到黑客身上。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此事发生之后，我还没有机会与顾秉林先生交流，所以也不好随便猜测是怎么回事。如果这真的是顾校长的意思，那么我佩服他。同样身为大学校长，很惭愧，我是没有勇气说这些话的。关于高校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我与顾先生也曾多次在私下里讨论过。只是，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权限其实是很有限的，处处受人监督，处处受人牵制，要想搞一些大的动作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中提到，在二十世纪初至 40 年代，中国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而这种盛况自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衰落。这是事实。我们不仅要问，解放前出了这么多的大师级人物，为什么解放后反而寥寥无几？当然，这与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所谓乱世出英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往往会爆发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可是，这些客观条件就应该成为我们教育失败的借口吗？

无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大学校园已被侵蚀，风气与三、四十年代那种纯朴的校风早已无法相提并论。看看我们现在的校园吧：女同学以被人包养，作人情妇为荣；男同学以大学四年没有性经验为耻。学生会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整个一个社会阴暗面的缩影。至于上大学的目的，看看外面满大街的办证广告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生活，最后带着这些功利、浮躁的心态走向社会，国民的精神水平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小学教育有没有责任？有。整个社会有没有责任？也有。在这里，我暂且只讨论大学教育的问题。

再看文章最后写道，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对于改革，虽然不能成为执行者，至少我也来发表一下拙见吧。敝人以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便是要废除所有的政治类课程，至少要大幅度降低其比重。这些课程对于学生思想的禁锢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以国内的政治环境，废除这些课程，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也就不明说了。

第二，就是应该加强传统的道德文化教育，让学生重塑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在多少年前，就有先人说过，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是我们现在正好取反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祖先留给我们的傲骨与气节，都被我们无情地丢弃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功利价值。而相反，其中的一些垃圾，如官本位思想，通过科举（也可以理解为今天的高考）来求取功名利禄的思想，毒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至今还在发挥它的作用。可能有人会出来反驳：敬畏天地什么的，那不是迷信吗？对于此，我的观点是，人必须有所敬畏。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对权贵的敬畏，而是指对正义，对天理的敬畏。若失却了敬畏之心，人便会无法无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尤其在这个法律体系还不太完善的社会，更必须保持这种敬畏的心态。我相信，让学生们接受传统的文化道德教育，可以慢慢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

第三，就是要“清理门户”了，将一些以教授的名义，长期盘踞在大学校园里的无德无能之辈清理出去。我不能确定的说这些人到底在学校里占多大比例，但是我敢肯定在北大燕园内就有不少。看看现在的某些“老师”、“教授”，一点师道师德都没有，怎么为人师表？这些学术骗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尸位素餐，浪费财力、物力、教学资源，这些都是小事。让他们来教书育人，误人子弟，害了学生，那才是问题的严重之处。这个后果，是我们无力承担的。把这些败类赶出去，不仅可以节约教学成本，更重要的是为学生的利益着想。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是相当重要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被人诟病了这么多年，现在反思还为时未晚。若再这样闭目塞听，自我感觉良好的走下去，被耽误的将不仅仅是一代大学生，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307：美国国会应该否决救市，但中共政府必须救市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周一（29 日）以 228 票对 205 票否决了布什政府的 7 千亿美元拯救金融界、结束信贷危机的法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讨论的焦点是，这 7 千亿美元到底属于谁？这 7 千亿美元到底救了谁？

德州共和党议员约翰·库伯森(John Culberson)指出，这一方案将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美国人民的纳税不是用来救市的，而是用来维持国计民生的。金融寡头的经济困难，不能让全体美国人民来分担。

约翰·库伯森说：“这一方案相当于迫使我们在让我们的孩子破产还是让几个决策失误的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之间做选择。

133 名共和党议员（占共和党议员的三分之二）和 95 名民主党议员一致认为：纳税人不应为华尔街的错误买单。

对于华尔街的这次“金融海啸”， 美国布什政府认为“有可能动摇美国的国体”，于是推出 7 千亿美元拯救金融界、结束信贷危机的法案。

对于布什政府 7000 亿美元救市的“大手笔”，美国舆论则称这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学家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甚至开始讨论美利坚合众国(USA)是如何演变成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USSA, the United Socialist States of America)的。

前德意志银行高管罗杰·依伦伯格(Roger Ehrenberg)竟然用“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来评论美国政府对这次华尔街危机的反应。他说：“美国政府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历史性的反应将我们置于一个几代人也没法看清的一个位置。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正式地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

其实，美国舆论和这些西方经济学家彻底错了。因为布什政府 7000 亿美元救市的“大手笔”，根本不是保护美国普通人民的政策，而是保护美国金融寡头的经济政治。

“7000 亿美元救市”根本不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寡头政治条件下的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国会众议院却毅然与美国人民站在了一起，与美国人民一起反对金融寡头和政治寡头，共同捍卫了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受美国国会应该否决救市法案消息拖累，华尔街股市当日跌势加剧，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跌 777.68 点，跌幅近 7%。 按照下跌点数来算，可以说是史上最惨，2001 年 9.11 恐怖攻击事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曾下跌 684.81 点。

最近九天是中国股市的长假。长假之前，由于受美国布什政府提出“7 千亿美元拯救金融界、结束信贷危机的法案”的利好消息的影响，中国股票大涨 10%。

但是长假之后，受美国股市影响，中国股市势必狂跌。

那么中共政府是否需要救市呢？

十几年来，中共政府通过转让配股权，实物配股（不算分红），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早已十几倍几十倍地赚了大钱，现在再以高于原价几十倍的价格套现，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对中国人民的公开抢劫。

中国股市 20 万亿总市值的灰飞烟灭；老百姓 6 万多亿真金白银的惨重损失，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凭空蒸发。 这完全是中共政府的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政策所为。

所以，中共政府必须救市。

否则，亿万中国股民的财富将全部损失殆尽。
亿万中国股民不答应！
中国人民不答应！

郭泉：民主先声 308：温家宝总理，您为什么始终闭口不提多党竞选呢？

9 月 28 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星期天播出主持人扎卡利亚在其全球公共广场的节目里对温家宝先生的采访。

扎卡利亚首先出示了 1989 年 6 月 3 日晚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后来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探望绝食学生的照片。然后请温家宝谈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温家宝先生看着这张照片，沉默良久，紧闭嘴巴，皱着眉心，下巴不停微颤，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说："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我想，你的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发展民主。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被服务于人民。第二，改革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立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三，政府应受人民的监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听到温家宝先生对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方面的介绍，我只能说，如果不进行朝向"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政体改革，那么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在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

我想，扎卡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下一个问题就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个事实。

扎卡利亚又问:"您是否认为在 25 年内中国的选举将会出现竞争，由两个政党来竞逐，比如你现在总理的位置？"

温家宝先生说："我很难预测 25 年后会发生甚么事情。但我坚信，中国的民主将继续发展。20 至 30 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更加民主和更加公平。"

果然，温家宝总理闭口不提多党竞选。只说 20 至 30 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更加民主和更加公平。我想如果是让我提问的话，我一定会问："温家宝先生，您真的认为一党独裁下，中国社会会有民主和公平吗？"

果然，我在随后的温家宝总理的回答里看到了他的意思，他认为只要一党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那么独裁也是美丽的。他说："我想，世界上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重要的是实质。这就是说，不管民主的形式如何，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是最重要的。我理解，社会主义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应建立在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之上，否则将会一片混乱。"

其实温家宝总理并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提倡全民福利，在政治上提倡公民政治平等，人民有组党自由，并进行多党竞选。

目前中共的政治独裁，其实并不叫社会主义，因为各党在政治上并不平等。中共永远都是执政党，而其他各党永远都不能竞选执政党。

扎卡利亚问：你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资讯不开放的国家，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吗？

温家宝先生说："中国现在有超过两亿互联网用户。很多人认为中国网络是自由的，即使是西方人也这样认为。当然，为了安全，中国也和许多国家一样，对互联网进行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也是为国家的安全和大多数人的方便。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你可以找到很多批评政府的帖子，通过读那些帖子，我们可以找出存在问题，进一步改进工作。我不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看法。我经常浏览互联网，了解情况。我浏览过许多网站。"

说实话，我就不认为中国的网络是自由的。因为我的所有博客都被中共关闭。现在我的所有文章都由我的朋友帮我发表在海外的媒体。其中很多文章"出口转内销"到国内，也是经常被中共的网络警察删掉。好在顽强的中国人民和中共网络警察进行了"你删我发，你再删我再发"的针锋相对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得国内网络上时不时地会看到我的《民主先声》。

温总理说"我经常浏览互联网，了解情况。我浏览过许多网站。"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民主先声》和我给您的数封公开信，我想，您应该读读。

最后，扎卡利亚问："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人权观察家们，他们指过去几年，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下滑，他们一直希望，奥运会能带来一个开放的中国，但事实上，却出现了更多的镇压。你对此如何看待？"

温家宝先生说：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实际上已变得更加开放。任何人如果没有偏见，都会看到，而且也看到了这点。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有了更多的保障。中共政府重视和保护人权。我们也将这些写入了中国的宪法，也在切实地执行。我想，任何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是，确保其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每一项权利，包括生存权、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人权方面是无懈可击的。的确在某些地方和领域，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我们会继续努力，促进和改善我们的人权。

看到温家宝先生的这段话，我不禁笑起来。

奥运之前，国际金融时报（英国）的记者给我电话，请我在 7 月 24 日在南京等待接受采访。不料，我 7 月 22 日就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7 月 23 日又被告知“请不要接受采访”。7 月 24 日下午，我家楼下的中共警察比我家小区的狗都多。最后，国际金融时报的记者无功而返，怏怏不快地坐夜航飞机飞回北京。而我得知，中共政府应许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中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那么，中共政府一方面应许外国记者“两个任何”，另一方面又阻止我接受采访。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奥运之后是不是好了些呢？

奥运之后，跟踪我的中共“国保”特务有增无减。我的手机 24 小时被监听。连我去看望我母亲都被大队中共特务全程监视监听。

更有甚者，9 月 16 日，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的杨海东先生一早来南京看我，他想请我讨论他的一个经济案件。不料，他一到南师大就被两名“国保”警察绑架走了。（参见《民主先声》295）

9 月 24 日，中国著名的“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先生来南京看我。下午 3 点半，我和他见面不到 5 分钟，南京“国保”警察就中断了我们的会见，带走了他。（参见《民主先声》301）

杨海东先生和高敬德先生都被中共“国保”特务告知“郭泉是公安部内控的反动人士，迟早要被抓起来坐牢。”

而事实上，我只不过是在 2007 年 11 月给胡锦涛先生写了一封要求“终结独裁、实现多党选举”的公开信，以及接受人民的委托出任了中国新民党的代主席，还有 300 多篇提倡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先声》而已。

我所做的仅此而已。我违法了吗？我违了什么法呢？ 请明示，谢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309：中共必须在独裁和多党竞选之间给个说法，否则人民就给你个说法

今天（10 月 3 日），一名中共特务（QQ：155174495）冒充中国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来找我聊天。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郭教授，你觉得，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回答：是共产党独裁。

他又问：为什么独裁不好的呢？

他的这话一问，我就立即对他的中科院教授和研究员的身份表示了怀疑。其实，并不是我过于敏感，而是他的这个问题过于弱智。这与中科院的教授和研究员身份完全不相吻合。于是我详细询问他的情况。

不料他说：不方便告诉您。放心吧，我不是特务，只是和你辩论问题。

我回答： 独裁不好，这个命题不需要辩论。谢谢！再见！

我想，之所以今天这个中共特务来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我前日发表了《民主先声》308，题目是《温家宝总理，您为什么始终闭口不提多党竞选呢？》

估计这名中共特工是想数点独裁的“诸多好处”，来打消我全力推广“多党竞选”的念头。如果我不中断这个毫无意义的聊天的话，我想他一定会用温家宝的一句话来教训我，那就是“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如果我接着问，“那么这个中国国情是什么呢？”他一定会说：“中国人长期以来需要君主，所以还是共产党一党统治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

其实，关于中国国情和多党竞选的问题，中共在 60 多年前就说得很明白了。

1944 年 5 月 17 日的《新华日报》社论说：“他们说这一套（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

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我想以上的这段中共社论，温家宝总理，您应该读读，所有中共特务也都应该读读。因为，这段中共社论不只说明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还批驳了“中国国情只能搞独裁”的谬论。

好，下面我就来谈谈独裁到底为什么是邪恶的。其实，独裁为什么邪恶，中国人民都知道。我想，只有中共不知道。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弱智，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毕竟，他们的所有财富来自独裁。

所以，我以下要分析的独裁为什么邪恶的两个理由，不是给中国人民看的，而是给中共特务看的。

那么独裁到底有什么坏处呢？其实，中共在 60 多年前就说的很明白。

独裁的第一个坏处就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1946 年 3 月 30 日《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说：“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独裁的第二个坏处就是“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

1946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温家宝先生说：“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第二，改革法律制度，依法治国。第三，政府应受人民的监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

温家宝先生其实一直在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结束一党治国的问题。

1941 年 10 月 28 日《解放日报》说的明明白白：“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5 年 9 月 27 日《新华日报》社论又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1945 年 1 月 28 日的《新华日报》反对在民主问题上忽悠人民，社论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

温先生，您看看，您的共产党人先辈说的多好啊！可惜您没看！

郭泉：民主先声 310：经济与政治：与何清涟商榷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

今天（10 月 5 日），我读到何清涟女士的一篇文章《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

首先，她介绍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在海外的滥觞。她说：“‘中国制造’最近再次陷入信誉危机，这次的祸首是国内正在讨伐的三鹿毒奶粉及制奶行业。不幸的是，那几万名结石婴儿的痛苦却唤起了美、欧等国对‘中国制造’的不良回忆。目前，全球都加强检验来自中国的进口食品，已经有 30 多个国家纷纷采取禁止进口、召回和加强检疫等措施。”

其次，她认为真正的祸首并不是三鹿毒奶粉及制奶行业。

读到这里，我不禁点头称是。但是，随后看到她所寻找出的“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的时候，我不禁大跌眼镜。

何清涟女士认为，“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是中国政府那自欺欺人、完全流于形式的质量检测、以及厂商们那种丧失商业伦理、毫不顾及消费者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生产方式”。

随后，何清涟女士为中共政府出谋划策，请中共政府从三方面着手建立“中国制造”的信誉。

何清涟女士帮中共出的三个“金点子”是：

第一、要放弃中国食品安全的双重标准。包括两点：1、立刻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2、取消出口产品与国内消费品的双重标准。

第二，治乱邦用重典，将食品生产提升到有关“国家安全”的高度。

第三，撤销专事制造谎言的国家机器中宣部，将政府与厂商置于公共舆论的监督之下。

文章最后，何清涟女士对中共说：“如此，则多少可向本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展示痛改前非的诚意，食品安全引起的民怨可望平息，‘中国制造’的质量亦有望提高”。

读完何清涟女士的《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全文，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何清涟女士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她比我大 12 岁，是湖南邵阳市人，1956 年生。1983 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湖南财经学院任教，后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获硕士学位后，赴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法制报》工作，并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旅居海外。其代表作《现代化的陷阱》为人熟读。1999 年 6 月 14 日何清涟女士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1999 年 11 月 28 日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 25 位时代人物之一。

我 1993 年到 1996 年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的时候，教授们在课上经常谈论到何清涟女士。96 年到 99 年在南大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在宿舍里我也多次和其他博士讨论何清涟女士的文章。后读博士后，并担任副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我带领我的学生们也多次研读何清涟女士的文章。

我承认在何清涟女士的文章里，能看到很多真实的中国社会现实。但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其实分为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原始数据（事件）”，第二个部分是“原因分析”，第三个部分是“对策研究”。

而何清涟女士的文章作为“原始数据（事件）”来阅读是很不错的。在纯粹的经济事件问题上，何清涟女士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今天，何清涟女士在“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的找寻上，其“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都忽略了政治因素。对此，我很惊讶。

究其原因，我认为何清涟女士把这次“食品安全”问题，只当成了一个“经济事件”，而不知其实此事件早已不只是“经济事件”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其实，何清涟女士在只关注了这个“经济管理原因”之外，似乎对“缺乏多党监督”这样的政治原因置若罔闻。

2008 年 9 月 13 日，中国新民党发表致全国人民及海外同胞的中国新民党食品安全宣言，宣言的标题是《食品安全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参见《民主先声》290）

宣言指出：

中共的独裁体制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监管职能。反对党存在和多党竞选的意义，就是代表民众对执政党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和攻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才能使得一切食品安全的监管权实际在人民手里。而一党独裁的“本党监督”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无法监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根源于此。

只有民主制度，中国人民才能把一切监管权力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

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时候，中国人民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吃自己心爱的食物。
随后在《民主先声》294 里我认为，“为了民族的生存和未来，中共必须立即终结独裁体制、实现民主制度”。

因为中国不是没有法律，中国不是没有监管部门，中国不是没有食品标准，中国惟独缺乏的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制度。

一切要想绕开政治体制改革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中国之病，病入膏肓。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就在一党独裁。

以上文字，请有条件的朋友转给何清涟女士阅。

另附中国新民党人、时政评论家楚天先生的一篇长文，供何清涟女士和其他同志阅。

楚天：政治改革 势在必行

——从“瓮安民变”与“杨佳袭警事件”谈中共必须立即终结独裁统治

2008 年 6 月 28 日,贵州省瓮安县爆发了上万民众围攻该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特大民变事件。在事发过程中，愤怒的人群焚烧了上述机关的办公大楼，砸毁了大楼内的办公设置，并焚烧砸毁了该县公安局的 47 部公务车辆。事后确定事发原因，证实是由于该县一位名叫李树芬的女中学生突然死亡事件而引发的。

无独有偶，距此次事件发生仅隔三天，2008 年 7 月 1 日，一名男青年手持单刀冲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办公大楼，以势不可挡之势，从一层直杀到 21 层，杀死 6 名警察，另重创并杀伤四名警察及一名大楼保安，酿成了震动中外的惊天血案。从事后的媒体披露所知，这位来自北京的 28 岁青年名叫杨佳，大专文化程度；并获悉，其在作案过程中，几次碰到女性警察并未加以伤害。

这两起事件通过媒体的报导后，引发了海内外和中共高层的高度关注。

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今年中国诸多暴力性冲突的代表性事件而已，而就在这两个月内中国大陆发生的暴力事件还有很多，其发生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是以个人极端性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这样的案例和杨佳案很相似，例如今年 7 月 9 日发生的河北省广宗县公安局大楼被炸事件；7 月 2 日发生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办事处政府大楼被炸事件；发生在 7 月 21 日的昆明两起公汽爆炸事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个案，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第二类是以群体性事件为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如 7 月 17 日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圆洲镇发生的湖南籍民工焚烧警车并同警察对峙的突发性事件；7 月 11 日至 13 日，浙江省玉环县连续三天爆发上千外地民工围攻当地派出所的示威行为；7 月 19 日爆发的云南孟连胶农同警方的严重冲突事件，该事件最终是以警方开枪打死两名抗议农民而告结束的。

在今年近几个月发生的诸多群体性和个体性暴力事件的案例中，瓮安民变和杨佳袭警事件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反响尤为激烈！下面将这两起事件作为诸多事件的代表性案例来加以分析和说明，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那么这两起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呢？它对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不仅是非常有必要，同时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情。下面是事件发生后政府官方和民间舆论分别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

在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政府召开了关于该次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同以往的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定性很相似的是，这一次震动中央的民众抗暴示威活动、再一次被当地政府简单定性为具有黑社会势力在内操纵指挥的暴力行为。然而，就是这个政府定性的结果，在社会上并不能让人们信服。而在最能体现中国民意的互联网网络里面、却到处都是要求调查弄清李树芬真实死因的呼声。而杨佳事件也很相似，在该事件在媒体报导和披露之后，在互联网各大论坛网友评论的贴子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和同情杨佳的。

这种现象初看上去，确实感觉到不大正常，一个杀死杀伤那么多人的杀人犯，怎么不仅听不到批判的声音，反而在网上到处都是支持和同情的语言呢？与贵州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信息相互矛盾的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广源先生在总结瓮安事件时说了一点实话，他的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语，也许能给予我们某些启发和帮助。他说：“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而上海袭警案的杨佳，却在互联网上被广大的网友们称之为当代武松、杨少侠！并且还在网上看到了有人以史记的形式给他作的《游侠杨佳列传》。他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正义之举。与此同时，不仅在国内

有许多法律工作者要求做他的辩护律师，而且还有很多民众都希望政府能够面向社会公开审理此案。

自从这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之后，社会的舆论又一次把中共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两起事件的结局和审理结果!

由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制约,信息流通渠道的不畅,政府对一些敏感社会问题的严密封锁，加之中共政府在一些利益矛盾的处理过程中的表现极不如人意。而且还在许多涉及民众利益冲突的事件中，充当了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和帮凶的角色，在面对各种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时、在涉及到官商私利和民众根本利益面前，没有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承诺。相反的是，他们的行为完全倒向了官商私利的那一边，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公权力，随意的出动警力粗暴的对群众实行打压和拘捕。

因此导致国内民众跟政府形成激烈的对立情绪，致使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加之民间的舆论、各种相关信息通过网络为主要传播方式却流传着同政府说法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时，国内民众对政府所公布的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原因等内容普遍持怀疑态度。对于政府的事件处理方式和案件审理结果，国内民众更是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对于这一点，通过互联网上的舆论我们是不难看出来的。

李树芬和杨佳，一个是芳龄十几还未谙世事的青春少女；一个是才二十多岁正值报效国家的青年才俊！而现在呢？一个的生命却像风一样的已经逝去！她匆匆的走了，十几年的短暂年华、花一般的清纯少女！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不知她在泉下是否可知？正是她的死，在中国引发了新一轮强烈的民众抗暴行动、数万名瓮安愤怒的民众勇敢的走上街头向政府追寻事情真相。一个一审已被判定死刑，这位悲剧性英雄的生命已经快进入人生的倒计时了！更可悲的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却是由政府指定的。

并且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位名叫谢有明的上海律师却在杨佳案开审之前，当着媒体的面前大放厥词，事先就认定了他的当事人当判死刑。原本作为上海市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的他，按照相关国家法律规定，是不应介入本案的刑事侦察和调查取证工作的。因上海闸北区政府同该区公安局是上下级利害关系，而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被害人（单位）不应介入本案的刑事侦察和调查取证工作"。他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法律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而且他同时也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品格！

李树芬和杨佳，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在二十一世纪，在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等基本普世价值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旋律的今天，在我们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上的祖国和人民，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悲剧？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吗？而且有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像这样的悲剧性事件在当前之中国、正在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发展，也许明天的受害者就会是你、就会是我，就会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也正是基于此点，我们现在用理性的思维、从深层次来探析该案例的发生原因才显得尤为必要。

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中国现在每年发生的十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和为数多到难以统计清楚的个人极端事件的代表性案例而已！悲剧接连不断的发生昭示着其中必然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和教训！我们只有追本溯源，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悲剧一次次的重演。

从事情的起因来分析其根源，我们首先来回顾瓮安事件，我们知道该事件的起因是由女中学生李树芬的突然死亡引发的，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布会中关于李树芬死因的内容得不到人们的认可，老百姓普遍都持怀疑态度，从而最终引发群众走向街头。现将该厅新闻发言人王正兴在发布会上的原话援引如下，供大家参考：

2008 年 6 月 21 日 20 许，李树芬与女友王某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某及陈的朋友刘某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刘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李树芬。王某急忙打电话给陈某，并大声呼叫救人。陈立即返回河边，跳下河中帮忙施救，陈见刘已体力不支，便用力先将刘拉回岸上。王某、刘某随即报警，并打电话通知了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1989 年 12 月 9 日生，瓮安县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生)。

从上述该发言人公布的内容中，确实是很难让人置信，李树芬死亡的原因无非两种：一种他杀；另一种确属自杀溺水而亡。如果要证明其是自杀，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该发言人就没有提到，那就是李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哪个人会无缘无故的去自杀？不知道是公安部门没有查明她自杀的原因，还是他在发布会中忽视了，按道理来说这个原因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怎么会说漏掉呢？其二，李某怎么会突然只跟刘某谈到要自杀的事情，而对他的男朋友

为什么却没有说？他男朋友为什么会在事发时不在现场走开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在做不在场的证据，以避免让人猜测是情杀！其三，李跳水之时，刘某在事先得知李有轻生念头之后，竟还在做俯卧撑？这个说法也太荒唐了吧!

如果不能做出让人信服的自杀解释的话，那么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他杀为那么多人所认同也就并不奇怪了！作为省一级的公安机关，在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面前竟是如此的草率、如此的无知、如此的无能！这似乎与他们平时热衷于在群众面前摆威风、在政府利益官员和不法商人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下，打群众压群众的那股干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李树芬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但让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疑惑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公安机关。我们不会武断的说李一定是他杀，只有在掌握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才能作此等表述。但是作为一个办案机关，你们一定要拿出让群众信服的答案。按照你们公安机关鉴定的结果，就是自杀的，但是你们却没有办法让群众做到信服。这就说明了，你们以往的种种作为，让你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而且也证明了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尽到你们应尽的职责，由此也直接导致了震动中外的 6.28 事件的爆发。

我们再来分析杨佳袭警案,该案的事情经过是杨佳从北京到上海旅游期间，因为租了一辆自行车而被警方怀疑为偷车者。这本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虽然后来警方证实杨的车确实是租的。但是在警方审讯的过程中却对杨佳的生理和心理均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事后杨佳也确实一直在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最后在杨佳认为通过法律的途径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惨案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血案发生之后,素有中国舆论风向标之称的互联网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和支持杨佳的声音。而作为受害者的警察反而却没有得到主流舆论的应有同情！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这说明了在社会上的人们对于我们的人民警察平日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不满意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痛恨的。他们的这种不满的情绪通过这个特殊的事件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我们的人民警察们也应该反思了，为什么人民对你们这么的痛恨！很显然，在这次事件中，你们死去的那六名警察同行也是受害者，包括受伤的那五名同样也是的。但是为什么在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的时候，国人不仅没有给予你们警察应有的慰问、同情和支持呢？反而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杨佳的行为是在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他们直呼："杀得好"！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平时的工作作风是不是太横了，你们有没有把群众当人看，你们不把群众当人看，群众是更不会把你们当人看的！

并且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上爆出了关于杨佳杀人动机的信息，该信息后来也得到了上海市警方的间接认同。（因为上海市警方也承认在杨佳作案之前，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曾两次进京同杨佳协商补偿问题，后因金额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这也为以后悲剧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那么杨佳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目前已经没有人有机会直接从当事人杨佳及其母亲的口中找到答案了。（杨佳入狱不久，他母亲也神秘失踪了，她应该是除他儿子之外，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了解最清楚的一位）但是在互联网上却传出一位自称是杨佳朋友所发的贴子，他在贴子中一语道出了杨佳作案杀警的动机。（该贴简述了杨佳袭警前同警方引发冲突的事情经过，并且还说到杨佳的下体受到警察的伤害，经医院鉴定确定，杨佳因伤导致失去了生育能力。）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帖在网上传出之后，引发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大家一致呼吁政府能够公开审理此案，并且要求政府查明杨佳受伤导致不育的事情真相。

认真分析该案，我们就会发现，杨佳案同 2003 年在中国发生的另一起惨案（孙志刚案）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从两人的受教育背景来看，他们俩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懂法律的知识青年。从两人的个性来看，都很执着，太倔犟了！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懂法律、太执着才导致悲剧的发生。曾经有学者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把杨佳换成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不懂法律的普通农民工身上的话，很有可能事情的结局是另外的一种结果"。虽然我们国内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农民工朋友们遭遇到警察的各种侮辱行为，但是只要他们忍一忍，毕竟还不会酿成这么大的悲剧和血案啊！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悲剧！是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中共政府和中国司法界的耻辱！

2003 年孙志刚的死，同样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高度关注，并直接促使《外来人员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的废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它却是建立在无数人血的教训的基础上的。在当今中国，哪项不合理管理制度的退出和消灭不是建立在无数悲剧发生之后的，为什么我们社会上的每一点艰难的进步、或者说是每一项不合理制度的退出都是要建立在无数人鲜血和悲剧的基础上呢？不知道这次用杨佳和那六名被杀警察用生命作为代价的"杨佳袭警

事件”的发生会不会引起当政者的深思？我们在为他们的悲剧而深深挽惜的时候，同时也在热切期待着这一血的教训能够推动中国社会新一轮的进步！

我们不得不承认，被杀警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的悲剧是我们中国这个时代的悲剧，究其实质他们都是中国这种落后政治体制的受害者！可悲的是，我们的警察再一次成为了这个体制的殉葬品，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家人在此时此刻是多么的痛苦！我甚至都不忍心再继承写下去！他们和大多数警察同行们一样，其实也是无辜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能在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共独裁体制下混口饭吃，确实是干了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我相信，这决不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初衷和心愿！有句话说得很精辟：“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

李树芬和杨佳，无疑也是受害者，前者李树芬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她自己，并且由她的死引发了一轮民众抗暴的大行动，差点还酿成更大的血案！在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内，绝对不可能因为某个人的死亡而引发如此大的动荡。当然，她的死因只是导火索，导致民众走上街头的还有更多涉及到体制性弊端等因素在内的深层次原因。因为正是在这个落后的专制政体的保障下，带有官商勾结性质的贪腐行为更加的肆无忌惮，他们所做的不仅仅只是与民争利，而且还在大肆侵吞占有民众的私有财产，其危害现在已达到了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活不下去的地步了。

杨佳的悲剧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国现存体制下，通过体制内解决矛盾的途径早已被堵死。在这个时候，要么我们就彻底的放弃自己的权益，对社会恶的势力表示屈服。要么只有采用极端手段来寻求正义！但是这样做，代价往往是惨痛的。而我们的杨佳呢？这位在网络上被广大的网友称之为义士、大侠的热血青年，在认为通过法律途径确保不了正义和自己权益的时候，原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他,却选择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选择了用手中的钢刀来解决问题。他的行为和我国八佰多年前的水浒梁山英雄好汉们的理念又是何其相似啊！他们的这个共同的理念就是：“以暴制暴，除暴安良，杀尽天下不平方太平！”

杨佳的悲剧不仅仅是其本人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时代和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人们。从梁山英雄时代到现在,为什么中国社会经过了八佰多年，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拥有现代文明科技成果的今天，我们社会民众的生存状态竟还和八佰多年前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宋末小农经济社会如此的相似，甚至可能还不如！杨佳的悲剧不仅仅是其本人的，他只不过是当今中国生活在官僚资产阶级多层压榨体制下千千万万受害者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已！

杨佳不仅是专政体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追寻理想正义社会的殉道者！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认同他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类似杨佳悲剧的再次发生。但是这个社会的事实告诉了我们，像这样的事情却在不断的重演！当我们在追寻这到底是为什么的时候？美国开国先贤和《独立宣言》起草者、曾经从事过律师工作的美国第三位总统杰斐逊的一句名言告诉了我们的答案：“人民有对暴政说不的权利，人民有保留选择用暴力方式结束暴政的权利”。

改变政体，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走向繁荣、稳定、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的选择！细看今日之中国，为何会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乱象丛生这种局面的，其实质就是中共执政当局走的是一条与人民意愿相违背的、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精英路线”！这条路线的推行者们漠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诉求，及其贪婪无耻，对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诉求不是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加以打压，就是被这些掌握着媒体资源的所谓“改革精英们”作为“民粹主义”来大加批判！可是恬不知耻的他们是否知道、他们那条专门损人利己的所谓“精英路线”早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唾弃！

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权力操纵下的市场化，政治上继续保持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一党独裁统治。而经济上呢？他们利用这种得不到制约和监督的落后体制、打着各种所谓“改革”的旗号，大发其财，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致使国内民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非法的剥夺和侵犯！而在这种威权政治体制下，国内人权状况到底如何？那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不终结旧的体制，不建立民权政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社会，杨佳的悲剧还会在中国不断的重演！

我们在此呼吁国内的中左、中右乃至包括极左路线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能够早日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共同终结独裁统治！我们坚决反对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极右精英路线！我们同时也能理解国内新老左派的爱国爱民之情！作为今日之中国，你们还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们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信仰共产主义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利益！你们是属于那种真正有信仰的人！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最终放弃一党体制的旧思维，走代表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路线！

威权体制、一党独裁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国内的毛派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是想不通，那么还有一条非常公平

的道路，那就是中国新民党主席郭泉教授前不久提出来的："中国未来的政治模式应由人民来选择"。也就是说，中国今后走什么样的路，由人民来决定！国内各种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都要对我们的人民有信心，任何政治党派社团的理念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促使中国社会尽快转型。

今日之世界，民主政治早已形成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转向民主政体！

目前的中国，推行了三十年之久的经济改革路线走到了瓶颈状态，已是举步维艰、寸步难行了。一个不能保障公平与正义原则的改革路线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一个得不到人民拥护的政府又怎能使社会合谐安定呢？而又怎么才能够促使这个公平正义原则来得以实现呢？除了政治改革，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破解当前中国的种种乱局，就不可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郭泉：民主先声 311：读何清涟女士给我的回信有感

昨晚 23 点 25 分，我发表了《民主先声》310，题目是《经济与政治：与何清涟商榷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

今天（10 月 6 日）早上九点，就收到了何清涟女士的回信。我正在纳闷怎么何清涟女士也有熬夜的习惯时，突然想起，原来我在地球的这一边是独裁的黑夜，而何清涟女士在地球的那一边却是民主的白天。

何清涟女士来信中认为她给中共出的"三个金点子"其实并不只是经济策略，也是一种政治策略。

她说：第一个"点子"，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本身就是要求共产党高官放弃政治特权，与民众共一国风雨；要求统一国内国际食品标准，本身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中国人的生命与人权。第二个"点子"，要求将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实际上是讽刺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置民众生命与健康于不顾，一味去抓捕良心犯与政治犯的倒行逆施，告诉共产党现阶段民众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如何去构建这样的国家安全才是沧桑正道。第三个"点子"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台湾经验是开放舆论后，开放党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种政治团体的出现，多党政治随后形成。

下面，我来对何清涟女士的这三个"金点子"一一作出我的判断。

其实，我和何清涟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学者之前，都做过时间不短的国家工作人员。何清涟女士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法制报》工作过，而我在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过，我们对中共的恶行都非常熟悉。

何清涟女士的第一个"点子"是请中共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

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是不是知道，中共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个"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中共自己都不承认有，你叫他撤销什么呢？

何清涟女士的第二个"点子"是请中共将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

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是不是知道中共一直标榜自己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例如 2007 年 4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材料显示，胡锦涛先生高度重视食品安全。胡锦涛先生说：实施农业标准化，保障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实施农业标准化，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对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提高对实施农业标准化和保障食品安全重大意义的认识，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自己认为他们早已把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了，你还叫他提高什么呢？

何清涟女士的第三个"点子"是请中共撤销专事制造谎言的国家机器中宣部，将政府与厂商置于公共舆论的监督之下。并认为这第三个"点子"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台湾经验是开放舆论后，开放党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种政治团体的出现，多党政治随后形成。

我想何清涟女士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过，一定知道中共的宣传部是中共维持独裁统治的三个根本工具之一（还有两个是组织部和军委）。我的朋友北京大学的焦国标教授因为写了一篇《讨伐中宣部》的文章，立即被中共下岗，现流亡海外。另外，何清涟女士提到台湾经验，请问，中共哪位领导人能有蒋经国先生的胸襟呢？蒋经国先生有句话"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将千古流芳。中共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谁会千古流芳呢？当然他们也会千

古流传的，不过流传的绝对不会是芳名。

另外，何清涟女士对我把中国的所有社会症结都归结于中共独裁不以为然，并举了三个独裁（或称威权）事例来论证独裁并不一定导致“食品安全”。

她说，“将一切问题归结到专制独裁，前提似乎不错也很省事。但具体参详，万事有因有果，不是把一切都往专制独裁上扯都行得通。比如新加坡是威权国家，但从不生产伪劣产品，更没有让国民吃有毒食品。南韩民主化之前的朴正熙时代也未生产有毒食品给国民食用。毛泽东专制时代固然是短缺经济，但也从未如此规模化“生产”有毒食品。”

我想说的是，何清涟女士提到的新加坡、南韩威权时代和毛泽东专制时代，恰恰都是我的研究对象。

第一，新加坡并不是威权国家，而是一党独大的民主国家。新加坡的反对党有议席，可以否决各种法案。新加坡唯一和西方民主国家有区别的是，新加坡的反对党可以否决执政党的法案，却无法竞选执政党。那么，中国有可以否决中共法案的反对党吗？

第二、南韩民主化之前之后，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公民信仰。韩国人的两大宗教覆盖了全体国民，即基督教和佛教。韩国自古以来深受东亚佛教文化熏陶（我写过一本《韩国佛学圆融思想研究》），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在东亚诸国的传播和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基督教在韩国取得了巨大发展。尤其在近半个世纪，韩国基督教更是异常迅速，不仅教徒数量超过了韩国传统第一大宗教佛教，而且也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海外传教计划，其海外传教士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韩国赵镛基牧师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汝艾岛纯福音教会也是享誉世界的全球基督教第一大教会。

在韩国这样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即使是独裁统治，也不可能发生类似中国毒奶粉这样的“无良事件”。那么，中国呢？中共这样的无神论执政党，敬畏什么呢？一个无所敬畏的无神独裁党，怎么可以和韩国相提并论呢？

第三，毛泽东专制时代，虽然是独裁，但是在经济上却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什么叫计划经济呢，就是政府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对等数量的生产。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由国家编制生产计划，由国家组织生产。这样的统治，虽然是独裁、“机械”和“节用”的，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却绝对是无可挑剔的。

那么，当今的中国呢？政治上独裁，而经济上却放任到竟然随意发放食品企业“免检证书”。当代中国的独裁，在政治方面与毛泽东专制时代完全一样，但是在经济管理特别是产品质量方面，怎么能和毛时代相提并论呢？

尽管如此，何清涟女士还是承认“在中国现阶段，食品是生产厂商、农村专业养殖户、种植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原因很复杂，政府放弃监管责任只是原因之一。”

我与何清涟女士的分歧其实就在这一点，即中国食品安全的症结，中共的独裁统治是原因之一还是根本原因。何清涟女士持前一观点，而我持后一观点。

何清涟女士在给我的回信的最后说：“海内外众多民主力量在为争取民主竭尽绵薄，各人能力与关注重心不一样。大家如果能够在从事本身事业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作用，情况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我想，何清涟女士久居海外民主世界，可能不能理解我们身处独裁专制统治下，心如刀割、周身如焚的感受。

请何清涟女士有空回国看看中国人民的苦难吧，如果再能顺便到南京我的家中小聚那就再好不过了。

附件：何清涟：回答郭泉先生“与何清涟商榷‘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一文？

接到阿波罗网转来的郭泉先生的文章，先谢谢郭泉先生多年来对本人研究的关注。对他提出的问题简答如下：

第一，郭泉先生讽刺的“三个金点子”其实没有一个是纯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第一个“点子”，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本身就是要求共产党高官放弃政治特权，与民众共一国风雨；要求统一国内国际食品标准，本身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中国人的生命与人权。第二个“点子”，要求将食品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实际上是讽刺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置民众生命与健康于不顾，一味去抓捕良心犯与政治犯的倒行逆施，告诉共产党现阶段民众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如何去构建这样的国家安全才是沧桑正道。第三个“点子”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台湾经验是开放舆论后，开放党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种政治团体的出现，多党政治随后形成。

第二，我为《华夏电子报》及其它专栏写的文章，每篇只有 1,500 字的篇幅，只能就一事谈一事，不能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地漫天扯开，这是前提。读我的文章，最好有个连续性，这样才能对我的总体立场有个基本了解。如果郭泉先生读我最近写的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的文章，包括为 BBC 写的那篇在内，可能就不会得出他文中的结论。

第三，将一切问题归结到专制独裁，前提似乎不错也很省事。但具体参详，万事有因有果，不是把一切都往专

制独裁上扯都行得通。比如新加坡是威权国家，但从不生产伪劣产品，更没有让国民吃有毒食品。南韩民主化之前的朴正熙时代也未生产有毒食品给国民食用。毛泽东专制时代固然是短缺经济，但也从未如此规模化“生产”有毒食品。所以这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很难成立。在中国现阶段，食品是生产厂商、农村专业养殖户、种植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原因很复杂，政府放弃监管责任只是原因之一。否则，我就无需要前后写五篇文章谈这问题。（有兴趣者请上我的个人网站“清涟居”）

第四，在中国现阶段，如果要等到郭泉先生谈的“多党监督”出现之后才谈食品安全，中国人可能早已经再次沦为“东亚病夫”。目前要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尽可能地改善食品安全状况。我的文章就是为此写的。

我是学者，本人并不认为要将我所有的研究简化成“打倒共产党，结束独裁统治”这样的口号。如今的读者文化素质不低，他们并不只想听一两句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想知道更多。将一切结论政治化，并非与读者沟通的一种最佳方式。更何况，有些问题，并非共产党一倒台，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比如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共产党倒台了，也不意味着中国农民每人手里就有人送上一只饭碗，小农阶级就此消失，城市化就此成功。民主化最多只是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民众参与的前提条件。

海内外众多民主力量在为争取民主竭尽绵薄，各人能力与关注重心不一样。大家如果能够在从事本身事业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作用，情况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郭泉：民主先声 312：其实，我们大家的民主思想都差不多，区别的只是勇气而已

今天（10 月 6 日），几位国内的民主人士来和我聊天，他们说，有的时候真的感到勇气不够。

我说：“其实，在全民福利和多党竞选方面，我们的民主思想都差不多，区别的只是勇气而已”。

对此，他们不持异议。

和这几位民主人士分手的时候，我送给他们一句我最喜欢的文字，是圣雄甘地说的。

“每当我绝望时，我就想起，在历史的长河中，爱与真理总是会胜利，尽管有过暴君和杀戮者，有时他们似乎无比强大，但是最后，他们会失败。想一想，总是这样的。——甘地”

晚上，一位企业军转老干部在网络上和我联系，他说：“郭教授，你为企业军队转业干部呐喊，我们无比振奋。和你相比，我们为自己权力争取还不太理直气壮。接受了党的多年传统教育，当驯服工具当惯了。我当过 20 多年兵，做过 40 多年的党政干部。还是一个生活的可怜虫。被暴力一压，就缩头了。看到你，我实在感到羞愧。”

正好，我在和中国新民党人、山东的“自然之子”先生讨论一部南韩的影片《华丽的假期》。我们的讨论核心是韩国的勇气来源，以及如何表达这种民族勇气。

《华丽的假期》的背景设置很简单，即是以当年韩国的“光州起义”为背景。大韩民族的确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光州起义中平民百姓与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相抗争，他们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虽然最后在军政府的强力镇压下，光州起义最终失败，但是它也是一个导火索，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直接导致了韩国军政府的下台，为韩国的民主化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这是一部自始至终散发着亲情、爱情以及抗争和血泪的影片，它的受众完全超过了经历光州起义的韩国人，它所要传达的内涵是完全超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表达的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尤其对于我们同样历经坎坷的中国人，对这部影片可能更易产生共鸣，可惜国内有良知的电影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给国人献上此等发人深省感人至深的影片。

于是，我就把“自然之子”先生的一篇观后感修改一遍，发给了这位企业军转老干部，并请他转给全国所有的复员、转业军人阅读。

“自然之子”先生的观后感全文如下：

我下载了南韩的影片《华丽的假期》，看完了，泪流满面……

为什么会是这样？韩国人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种性格？坚强、意志坚定、被称作“太极虎”。看了这个影片，我知道了！

对政府的独裁行为，韩国人采取的是游行示威，采取一种强势的手段去迫使政府听命于人民。而当我们在 89 年，却是长跪在中南海，上万言书乞求政府开恩！这是多么截然不同的做法！我们五千年来渴求明君，祈求救世主施舍的意识是如此的深厚！那可是北大、清华中国的精英！他们的意识形态如此，何况小民！

而当南韩人民游行示威，独裁者去镇压时，韩国人对独裁者的军队选择了愤怒，选择了不屈服，他们夺取武器愤而保卫自己，公然和政府对抗！把政府军赶出了自己的城市！

他们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当政府要镇压时，我们怕了担当造反的罪名，选择了明哲保身，我们选择了屈服，选择了逃避，我们只想挣几个钱，好“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希望能享受，选择在纸醉金迷中度日，我们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我们相信权术和潜规则，不相信良知和善人，不相信有所谓精神追求和信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最后，政府调集更多的军队，把夺取武器的南韩人杀了，镇压了。但是，他们却并不是选择屈服和逃避，不是去承认“弱肉强食”而是去不断的抗争，他们组成了民间的抗议组织。每年那一天总会有人去抗议，去自焚……是的，他们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但是却唤醒了民众！

而我们，当 89 年的迫害如火如荼时，我们仅仅选择了和平请愿，却反而被冠以叛乱的恶名！而广大人民，宁愿相信政府的谎言，宁愿躲在自己的家里，只要不关自己的事，哪管别人洪水滔天！而我们从来就不敢正面去反抗政府，任由政府去残害我们，而不去吭一声，这就是我们所崇尚的美德！千年圣人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抱怨”，我们总是采取隐忍做“好人”的态度，其实大大纵容了恶！几千年来，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小人得逞，从来都是正不压邪！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我们总是追求超道德的理想境界，却总是对坏人一点办法没有。我们不能容忍稍有所谓邪念头的好人，我们却对流氓恶霸恭敬不已。鲁迅所说：想做奴才而不得，正是我们的国人。

南韩人经过 10 年的不屈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开始清算独裁。1990 年，韩国人民把全斗焕、卢泰愚送进了监狱，甚至判处了死刑！随后，把夺取武器与政府军对干的人都评价为英雄，评价为民主斗士！而不是反革命暴徒！也不是不道德的人！从此，韩国人真正实现了民主，真的站了起来，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家活的是何其尊严！

对我震惊最大的，是韩国人对政府的态度！

政府就是人民的服务机构，不是凌驾于人民的权势拥有者！你欺负人民，人民绝对要对你清算！这就是韩国人的逻辑！这就是韩国的民主！我们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开恩和怜悯，放我们小民一条生路。我们只求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韩国人公然和独裁政府作对，也公然自焚以示抗议，最后冠以英雄的美名流芳百世。

而我们呢？我们总是企图申辩：我们没有和政府对抗，我们不是反叛者！我们没有拿起武器，没有自焚，我们是好人！

我真的不知道对付坏人的办法是否是比他还要坏？对付暴力的办法是以暴制暴？我听了太多的道德教条，可是韩国人的例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太多的道德说教，只是实实在在的反抗。有时候，真得让人难以选择！

假设，让我在韩国的那种反抗的人流中，我会怎么做呢？是否有勇气去拿起武器对抗政府军呢？这样的事，换了中国人，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结果。现在的我，真心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文明，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这样希望。但是，只是期盼而已，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敢做，也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做什么……

当我和周围的人谈论这些，他们只是嗤嗤的笑，甚至露出鄙夷的目光：“幼稚”。

那么，什么才叫不幼稚呢？什么叫做聪明呢？也许就是不动声色，永远躲在暗处，不管别人死活，只要自己伺机行动捞取好处，而且满口场面话。这就是我们所崇尚的智慧吗？如果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我宁愿“幼稚”。

我记得郭泉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中共南师大党办主任（刘旺洪教授）对他说：“你太幼稚、你太幼稚”的时候，郭泉教授说：“如果反对中共的独裁，要求民主是一种幼稚，那我就要将幼稚进行到底！”我想，郭泉教授才是真正勇敢的中国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中国人。终结独裁，实现民主，应该是中国人的大智慧。

现在大家真正关心的就是能够挣多少钱。对人评价的标准，似乎也只剩下了这一项……当同学聚会，朋友见面，大都在谈各自的经济能力，甚至性能力，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

至于社会的丑恶，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只要我自己过得好就行。谁来统治都一样。这就是大部分人的想法。明年就是 89 事件 20 周年了，不知道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呢？

我想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明白是非。这一点也是统治者最怕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国人也才是这么的愚昧和无知。从毛泽东停止学校上课，大搞上山下乡进行愚民政策，到现在的邓小平理论教育和三个代表、先进性，以及以政治挂帅的教育体系，都是因为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设计的教育，而不是真正的为求知求实的教育。

所以，我们出不了诺贝尔奖，也没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更不会有很高深的社会学，我们都是所谓吃狼奶长大的。政府也知道重视教育的结果，只会使人更加聪明，知道什么是文明社会，什么是文明的统治，所以，中国的一切都

必须先被中共确认为不危害其统治，才可以进行。这就可想而知，为什么中国的教育经费如此低，而且教育水平如此低下了。

因为中共看到了，从五四运动到 64，以及韩国的运动，都是大学生冲在前面，都是大学生在牵头。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化了，不听话了，知道太多了，所以要严格控制教育。

韩国之所以如此，可能与他在建国时采取的是美国扶持下的民主政治有关。他们的人民可以容易得知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独裁，其宣传机器也不像中国控制得如此。所以人家可能更加开化一些。人民知道得更多一些。

真的感到很难过。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不自觉地，在随波逐流，也许有那么瓜熟蒂落的一天吧？就像我们的祖祖辈辈一样，每天在期盼着有道的明君，期盼着好日子的到来。

我不禁想到了归属感，所以我选择并加入了中国新民党这样一个要求终结独裁统治的政党。在新民党里，我们大家都能够赤诚相见，真诚面对。

郭泉：民主先声 313：从重阳登高北望与“阎崇年先生被扇”，谈民族气节问题

今天是重阳节，一早我就登上了南京紫金山顶北望。和我一起登山的一个学生问我：“郭教授，重阳节为什么要登高北望呢？为什么不是南或东或西呢？”

我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史称永嘉之乱或五胡乱华。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民族，其他还有丁零、乌桓、吐谷浑等等。

这些北方民族在中原大地上任意宰杀汉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 130 多年的外族统治。其中有多个政权是标准的“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建立的。

例如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羯族，白匈奴，鲜卑族三族煮食我汉族子女人数最多。

公元 304 年，段部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供随军奸淫、煮食。幽州刺史王浚不让他们带人走，他们不想放掉这些少女，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在易水中。

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 400 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掌，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中心。

为了缅怀中原大地的土地和死去的亲人，逃到南方的汉人从此登高北望。

下山后，回到家里，一开电脑就看到一个消息：

10 月 5 日，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先生（1934 年生）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华书店签名售书。13 点 30 分，阎崇年先生与读者交流。14 点 30 分左右，签名售书活动开始。轮到阎先生给一位青年男子签名时，被该年轻人当场扇了两个耳光。

当然，任何人反对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观点都是可以的，但是扇阎崇年先生的耳光至少不符合我们汉民族尊重老人的传统了。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该年轻人扇阎崇年先生的耳光，是由于认为阎崇年先生的言论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

那么，阎崇年先生说了些什么伤害汉民族感情的话呢？

现列举阎崇年先生近年来的一些言论，给大家分析判断：

阎崇年先生说：

1、满人入关后对汉人的“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2、清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3、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4、我刚录完的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谈到皇太极五次带兵杀入关内。其中有一次就掳掠“人牲 97 万头”，这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5、玄烨是刘彻和李世民加起来都没法比的，因为他面临的环境比两人更艰巨。并且，比起汉武帝，康熙更有

开拓之业，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比起唐太宗，康熙更有包容之心，让中国人普天同庆。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

6、为什么我们不为曾经给我们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清十二帝表示出最起码的感恩之心呢？人是需要感恩的，不然就泯灭了人性的底线。

我想，阎崇年先生的第一条观点就是错的。

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对亡国是不太在意的，因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是对“亡天下”那是必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我以上的思考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后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段文字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上对顾炎武的“亡国”和“亡天下”的理解诸说纷纭，莫一而衷。而我认为这个“天下”特指华夏风俗文化。亡国只是朝代更迭而已，而亡风俗文化却使一个民族万劫不复。

顾炎武《文集》四里的《与人书九》这样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据我考证，清军于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此后，汉人苦于明宦压榨久矣，只盼换王治理，故并无甚力抵抗。然而，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文书里公然写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中国自古有“衣冠古国”的美誉，蓄发、衣冠为中国文化的外在象征。“五胡乱华”时代，汉人大规模南渡撤退，史称“衣冠南渡”。所以，汉人发现清人不只是要换王而治，甚至还要换文化的时候，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开始全力抵抗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都与“剃发易服”有直接关系。当然，在强权下，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例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最后，王国维竟然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投湖殉清，为清朝尽节、殉节。

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极坏。

所以，阎崇年先生说满人入关后对汉人的“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我认为阎崇年先生的史学观是根本错误的。

其他各条我就不一一批判他了。

其实，类似阎崇年先生的教授学者不少。我再举几个例子：

嘉靖年间数十年，中国国内的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头目安徽歙县人士王直与日本倭寇联合组建了庞大的倭寇海盗战舰队伍，此时的倭寇头目为王直。

成祖三十四年，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馅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俞大猷、戚继先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数十万之众，抢劫财产难以

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1556年就任浙、直(徽州)总督的胡宗宪，以“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策略，派遣间谍，将藏身日本的王直诱捕回国，在杭州处决。三司集议（明代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系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时，对王直是这样评价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据《倭变事略》)

但是，王直却在日本被奉为“海神”，日本人每年在王直生日这天都祭奠这个“海神”。

2000年，日本人觉得在日本祭奠这个“海神”不过瘾了，于是就来到王直的中国老家安徽歙县楚雄乡柘林村违章搭建了“王直墓”和“芳名塔”。随后，日本福江市政府每年派人到中国土地上“参拜”倭寇首领王直。

数年来，我对日本人到中国土地上“参拜”王直的行为实在无法忍耐。在多方投诉中共各级政府无果的情况下，2005年1月31日晚我携带斧头和榔头，和浙江丽水学院的郚伟民老师，“夜袭”了这个倭寇首领的墓地，砸毁了“王直墓碑”和“芳名塔”。

由于这个墓是典型的“违章建筑”，所以我砸这个墓没有任何法律问题，但是，中共政府的警察特务们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详细情况参见新浪新闻：http://news.sina.com.cn/z/jpwzlb/index.shtml

不料，就在我砸了这个墓之后不久，两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为王直鸣冤了。一个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樊树志教授（1937生），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薛国中教授（1929年生）。

首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对我的砸墓感到十分愤慨。他说：“这件事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他说，王直是明代武装走私的海盗首领，不应该完全否定他。因为王直的贸易促进了当时日本的经济，所以日本人对他十分感激和崇敬。

樊树志教授还转引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的话说：“‘嘉靖大倭寇’时，应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于是，在樊树志教授眼里，王直成了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了。

随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薛国中教授竟然在2005年第6期的《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让我笑了几个月。薛国中教授这篇历史学论文的标题是《王直：新时代的骄子》。

说实在的，反对明嘉靖皇帝的“海禁”政策，没什么不对。但是反海禁，怎么能残害自己同胞？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可以置若罔闻吗？

我真的为这两位教授的学生担忧。他们不深入读史，而是听信这些教授的言论，那么是很容易接受这些“倭寇新论”的。

其实。最让我感到担忧的是，两个中国的历史学家，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怎么会站在一些日本人的立场，用日本人的眼光去研究历史呢？他们说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他们用日本人的眼光去研究中国历史，难道不是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吗？

另外，我再举两个教授，他们的历史观点也很另类，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徐晋如教授，另一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余桂圆教授。

北京大学的徐晋如教授说：“我认为岳飞、文天祥所参与的战争属于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因此不能再称之为民族英雄。另外，在我看来，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民族的英雄，而只是大宋天子忠实的臣子而已。他们是赵王爷的护卫。我们不可能把为土豪劣绅看家护院的乡勇称为英雄，难道像岳飞、文天祥这样的为赵王爷看家护院的‘敢斗士’就是我们应当顶礼膜拜的榜样？”

2002年，中国教育部定出新版《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余桂圆教授担任主编。余桂圆教授二话不说，把岳飞和文天祥从“民族英雄”榜里删去了。

余桂圆教授的理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并不称之

为民族英雄”。

我想请教徐晋如教授和余桂圆教授，岳飞抗的“金兵”和文天祥抗的“元兵”，在今天的确成了我们汉人的少数民族兄弟，但是，在宋朝，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外国敌人，怎么不是入侵者呢？

还有，很高兴你们也认为戚继光是民族英雄，但你们知道戚继光抗击倭寇的首领是谁吗？我告诉你们，就是王直。而你们现在又把王直当成是“明朝改革开放的急先锋”，那么戚继光不成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历史罪人了吗？

同样是教授，我不知道你们吃的米和我吃的米是不是一样的？

附：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有以上几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找到我。

他们说：“郭教授，我们认为你不民主！”

我笑着问：“怎么不民主了呢？”

他们说：“你有说岳飞是民族英雄的自由，我们也应该有说岳飞是汉奸的自由。这就是民主。”

我说：“历史不是可以被你们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民主，只有一个定义，那就是终结独裁，实现人民自由组党，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政治体制。”

郭泉：民主先声 314：中共政府不是弱智，就是悍然与人民为敌！

今天（10 月 8 日），我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8 年第 25 号》

这个联合公告，一上来就说：“三聚氰胺不是食品原料，也不是食品添加剂，禁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对在食品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我读到这里，真的要高呼万岁了。

不料，这个联合公告下面的话，就让我愤慨无比了。

联合公告说：

“为确保人体健康，确保乳与乳制品质量安全，特制定三聚氰胺在乳与乳制品中的临时管理限量值。 规定：

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1mg/kg，高于 1mg/kg 的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二、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2.5mg/kg，高于 2.5mg/kg 的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三、含乳 15%以上的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2.5mg/kg，高于 2.5mg/kg 的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根据这个联合公告，我可以得出结论：

一、只要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1mg/kg 就可以销售。

二、只要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2.5mg/kg 就可以销售。

三、只要含乳 15%以上的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2.5mg/kg 就可以销售。

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了。联合公告的前面说三聚氰胺不得添加到食品中，而后面却又规定了三聚氰胺在各种奶产品的限量值。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再读了一遍联合公告，才发现原来联合公告里还有一句话：“三聚氰胺作为化工原料可用于塑料、涂料、粘合剂、食品包装材料的生产。资料表明，三聚氰胺可从环境、食品包装等途径进入到食品中，其含量很低。”

也就是说，上述五个部，无法控制中国的环境和食品包装里的三聚氰胺，所以，对奶产品就只能规定了限量值。

我很奇怪，国务院为什么不通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化学工业部，和上述五部，颁布一个七部门的联合公告呢？

难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化学工业部对中国人的食品安全就不该负责吗？

果然，这个联合公告一出来，就遭到国人的唾骂。

国人普遍攻击中共政府：“为什么不严格控制中国环境和食品包装生产，而搞出了一个三聚氰胺的标准含量？”

于是，国家卫生部坐不住了，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先生在会上表示，三聚氰胺是不允许加在任何食品中的，所以不可能有标准。

但是，面对记者的追问，陈君石先生辩解说，发布乳制品及含乳食品中三聚氰胺限量值，我们是进行监督管理的一个临时管理限量值或者限量水平，是用于监督管理用的，不是一个标准。

陈君石先生的意思很明确，即，虽然三聚氰胺不得添加到食品中，但是只要不超过一定量，还是可以吃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共政府只控制食品中的三聚氰胺这个量，而不是消灭食品中的三聚氰胺这个物质。

于是，随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下面的一段留言：

请问，陈君石先生，虽然大便不得添加到食品中，但是只要不超过一定量，也是可以吃的。

如果陈君石先生气愤地质问："怎么能规定食品中的大便含量呢？"

陈君石先生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米饭中大便的限量值为 1mg/kg，大便高于 1mg/kg 的米饭，所有餐厅一律不得销售。大便含量低于这个标准的就可以销售。我们发布米饭中大便的限量值，是我们进行监督管理的一个临时管理限量值或者限量水平，是用于监督管理用的，不是一个标准。请大家放心进餐！"

郭泉：民主先声 315：英国人，你们没必要这样支持中共的三聚氰胺

2008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暨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下一轮增长浪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回答克劳斯·施瓦布的一个提问时这样回答：

"我在凤凰电视看到曼德尔森先生，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场，他喝了一杯中国的牛奶，以表示他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我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眼前，而是未来。中国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丝毫掩盖，我们坦诚面对，而且勇敢加以解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相信我们绝不会让在座的企业家失望，也不会让我们的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失望！谢谢。"（鼓掌）

原来，曼德尔森先生为了平息欧洲消费者对从中国进口的牛奶、奶粉等奶制品的担心，当着公众的面喝中国的牛奶。

曼德尔森先生喝中国奶的时候是欧盟贸易专员。喝完之后，就被英国首相任命为是英国的商务大臣。

请问，曼德尔森先生，中国奶真的比英国奶好吗？

好，我们来看看英国商务大臣曼德尔森先生喝过中国奶之后的身体情况。

英国《每日邮报》6 日报道，上任第一天的英国新任的商务大臣曼德尔森 6 日早晨肾痛不止，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曼德尔森肾部出现肾结石。

院方随后于当天晚些时候动手术摘除了曼德尔森肾内的一颗结石。

英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在过去的几天，曼德尔森都忍受着肾部疼痛。"但是，消息显示，曼德尔森先生以前并没有罹患过肾结石。

那么，曼德尔森先生的肾结石是否和他喝中国奶有关，只能说曼德尔森先生喝过中国奶，两者是否有关联，还有待医生对结石结构进一步化验。

曼德尔森先生，作为英国商务大臣，当众喝中国奶，无非是向英国人宣誓："我认为中国奶里没有三聚氰胺"。

但是，我告诉你，曼德尔森先生以及所有善良的英国人，中国奶确实里有三聚氰胺。

昨天（10 月 8 日），中国的五个国家部门刚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8 年第 25 号》

这个联合公告制定了三聚氰胺在中国奶与乳制品中的临时管理限量值。 规定：

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1mg/kg，高于 1mg/kg 的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二、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2.5mg/kg，高于 2.5mg/kg 的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三、含乳 15%以上的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 2.5mg/kg，高于 2.5mg/kg 的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根据这个联合公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一、只要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1mg/kg 就可以销售。

二、只要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2.5mg/kg 就可以销售。

三、只要含乳 15%以上的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2.5mg/kg 就可以销售。

所以，曼德尔森先生应该是喝下了三聚氰胺，才得了肾结石。当然，是否如此，我们要等英国医生出具的化验结果。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温家宝先生在回答克劳斯·施瓦布的提问时的回答。

第一、温家宝先生说：我在凤凰电视看到曼德尔森先生，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场，他喝了一杯中国的牛奶，以表示他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我心里非常感动。

我的评论是：是的，曼德尔森先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奶的信心，但是有信心不代表不得肾结石。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对你的感动，也不代表就能阻止你得肾结石。

我不知道，曼德尔森先生是否有长期喝中国奶的习惯，如果你有长期喝中国奶的习惯。那么我想，你的病因我已经找到了。如果曼德尔森先生只是喝这一次，那么，我想你赌输了。因为你赌你喝的中国奶里没有三聚氰胺，显然你输了，因为，根据上述中国文件，中国奶里都有三聚氰胺。所以，你得了肾结石就不奇怪了。

第二、温家宝先生说：曼德尔森先生喝中国奶是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眼前，而是未来。

我的评论是：是的，曼德尔森先生的确是希望这个事件之后中国奶里不再有三聚氰胺，但是曼德尔森先生错了，因为中国的文件显示，只要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不高于 2.5mg/kg 就可以销售。所以，无论眼前和未来，中国奶里都将有不高于 1mg/kg（婴幼儿配方乳粉）、2.5mg/kg（液态奶、奶粉）的三聚氰胺。

第三、温家宝先生说：中国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丝毫掩盖，我们坦诚面对，而且勇敢加以解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相信我们绝不会让在座的企业家失望，也不会让我们的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失望！谢谢。

我的评论是：真的没有丝毫掩盖吗？中国的消费者在 2007 年底和 2008 年春节前就不断地为孩子治疗肾结石，各地报纸都有相关报道，只不过慑于官府和恶商的压力，在报道的时候，才在标题上很不正常地写到“某奶粉”。中共政府真的不知道吗？难道等到新西兰总理向中共政府抗议，中共政府才行动起来，这就叫没有丝毫掩盖吗？

第四、关于温家宝先生说完这段后的（鼓掌）。

我的评论是，这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商贾，你们是不是见中共官员说话就鼓掌啊？中国有句俗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对美丽的话语不加实践考察就鼓掌的人，不是弱智就是中国独裁者的帮凶。

郭泉：民主先声 316：独裁的中共只会让中国农民的土地“流转”到中共权贵者手里

最近，除了“三聚氰胺”和“神七太空行走造假”之外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农民的土地流转”问题。

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情报分析来看，中共这次要出台的“农民的土地流转”政策表面上是让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权，获得宅基地及其房产的包括转让在内的全部产权，获得农用土地向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收益，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红利。但是，“流转权”其实质是为了“土地可配置到最能发挥其效率的经营者手中，可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获得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率”。

那么，谁才是“最能发挥其效率的经营者”？中国农民吗？

不，不是中国农民，而是中共权贵资本者。

我们先看看，在农民没有土地“流转权”的情况下，土地是怎么样流转到中共权贵资本者手里的。

我举三个例子：

一、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四川成都市政府不顾农民朋友的反对，以低价，强行拆迁太平村上千亩的土地，过程中多次使用暴力对付村民。村民不满，向多个部门反映，但都不获处理。部份村民一直拒绝迁走，留守村内看护土地，期间亦曾多次发生冲突。最后，成都当局终于在 2008 年 1 月 19 日如愿以偿。该市政府出动数百人员入村，强行拆卸掉了村民集体所有的厂房，近二百名村民到场阻止，期间引发冲突，两名 80 岁的老奶奶村民受伤进了医院而无人问津。

于是，伟大英勇的中共四川成都市政府顺利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大叙事”。当然，大队警察大打出手的镜头，我们在 CCTV 等“宏大叙事”思维下的新闻报道里是根本看不到的。我们在中共新闻专制下，可以看到的就是我的南师大同事们看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电视新闻上农民都说共产党好。”（以上参见《民主先声》110）

二、我的一个网友今天上半年给我信息说：“今年我回去上祖坟，发现大量土地荒芜，村里人都出来打工去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修了一条几乎没车走的外环线，侵占农民土地无数。每亩只给农民 1000 元就强买走了。一亩白菜也不止卖 1000 元，可是农民敢怒不敢言。”（参见《民主先声》188）

三、2008 年 3 月，被强征土地的福建晋江池店镇清濛村数以千计的、控告无门的农民历时多日徒步来到泉州

市政府门前，垒砌锅台，一边沿街煮粥、一边沿街乞讨，他们打出一道巨幅标语——“我们是失地的农民，请路过的行人行行好！”（参见《民主先声》165）

2007 年、2008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征地进行，新农村建设要征地、城市扩建要征地、基础设施建设要征地、招商引资也要征地，几乎是发展中的每一步都在打土地的主意，土地似乎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最近几年，中国发生了大量政府圈耕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的事件，失地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统计显示，截至 2007 年 10 月底，甘肃当年耕地减少了 6.7 万亩，其中建设用地占 34.89%。利用廉价的土地来“招商引资”，致使征用土地越来越多。农民的怨气也越来越大。

于是，中共权贵者为了“合法获得”农民的土地，就准备出台这个“农民的土地流转”政策。

国庆前夕，胡锦涛先生也前往 28 年前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他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我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所说的“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实行土地流转。其实，胡锦涛先生所说的这个“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在法律上被称为民事权利的“自愿原则”。

但是，在农民拥有的土地流转权之后，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如地方政府、乡镇干部等等，找几个中共警察或黑社会，对农民兄弟姐妹们稍微显露一下拳脚，我想，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就“自愿”了。

当然，这些可怜的中国农民是会得到一点可怜的“土地流转费”的。

怎么才能保证中共政府以及中共政府的利益圈内人士（中共权贵资产者）不利用中共警察或黑社会来迫使中国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给中共权贵者呢？

我想，只能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道路。

其实，农民以土地为“命根子”，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却缺乏明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法》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后来，人民公社把土地收归国有；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分田到户”合法化，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使用权。

那么“流转权”是什么权？有人很兴奋地以为是“土地私有权”。

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这些朋友，你们错了！“土地流转权”绝对不是什么“土地私有权”，而是中共权贵获得中国农民土地的一点“良心钱”。

其实说“良心钱”都是在抬举中共了。因为中共权贵在给了这个“土地流转费”之后，还要请农民签一份法律文书。这个法律文书和“土地流转费”，将使得中共权贵获得中国农民的土地成为“合法行为”。

这就是中共实行“土地流转”的真正目的！

我认为，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中共必须回到 60 年前，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例如，1947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归各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

1949 年 9 月 29 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

中国新民党的农村政策是：

1、“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2、“居者有其屋”：保护农民的私人房产权；

3、“均贫富”：全民福利制度（养老、医疗、教育保障等）；

4、“等贵贱”：人民组党自由，多党竞选执政；

5、“均田”：核定均等农民土地份额

6、“免粮”：免除农业税。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17：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宣言

经中国新民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两党负责人多次交流协商，并经两党中央委员会决议通过，中国新民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一致同意缔结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并发表联盟宣言。

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以结束专制，建立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国，实现人人平等和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社会制度为宗旨。

中国新民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都是倡导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都是来自于人民、接受人民选择的政党。

中国新民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理念就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正”。

主张政府必须负责解决教育、培训、医疗、运输、通信等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分配以“实现社会公正、增进社会福利”为先。

保障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和私有财产（包括土地）不受侵犯。

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的近期目标是引导中国人民维权抗暴，促使中共当局放弃独裁统治，开放党禁报禁。

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的远程目标是在开放党禁报禁后，赢得广大选民支持，并通过大选取得国家政权，从而实践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为中国最广大的民众谋取最大福祉。

为共同反对独裁，推进民主进程，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欢迎一切有志于在中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加盟。

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实行轮值主席制度。

加盟的各党主席轮值中国民主社会政党联盟主席。

轮值主席任期一年。

首轮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主席由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担任。

中国社会民主政党联盟

公元二00八年十月八 日

附：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民主先声》275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18：从胡迪（林年锦）先生的儿子被打，谈新民党人的牺牲精神

今天（10 月 11 日），胡迪（林年锦）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他在上小学的儿子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暴徒毒打了。胡迪（林年锦）先生的手机号码是：13672817560

胡迪（林年锦）先生是广东省新会的民主人士，一直致力于民主中国的建设。他是祭奠林昭运动的发起人。从 01 年至今每年组织网友去苏州灵岩山的林昭墓地祭奠。林昭女士因为说真话，而被共产党杀害。

由于多次组织祭奠林昭女士，胡迪（林年锦）先生一直被中共警察跟踪、盯梢。他因为中共警察的骚扰，而多次失业，现在家务农。

2008 年的 4 月 29 日（林昭女士遇难日），胡迪（林年锦）先生被中共警察拘禁在家，不得去苏州林昭墓祭奠。

今天，我想就胡迪（林年锦）的儿子被打一事，与中国新民党的同志们谈谈如何面对暴政，以及与即将从事中国民主事业的年轻朋友们谈谈从事民主事业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胡迪先生在年前，曾经向我表示，非常关注我的处境，我说，“我不在乎生死”。

他说：“万事小心，它们的兽性太重了”。我说：“这个当然。他们本就不是人！我不怕”

他说：“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别让它们找到下手的机会”。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说：“是的，人民对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诚信的基础。”（参见《民主先声》117）

他说的是实话，最近几年来，中共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几乎很少使用政治罪名，而较多地是找个其他的普通刑事犯罪的罪名收监。例如孙大午案用的是非法融资，南都案用的经济犯罪，陈光诚案用的是破坏财产和扰乱交通，郭飞雄案用的是非法出版，孑木案用的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等。

如果以上罪名也找不到，那就用其他手段，如用经济手段、诬陷生活问题、诬陷精神病等手段。

如果以上其他手段也用不上，中共警察就开始打你家人的主意了。

例如，在你孩子放学的路上殴打你的孩子、让你老婆单位开除你老婆、找黑社会骚扰你父母，等等。

离胡迪（林年锦）先生那次和我对话一年不到，这样的事情就降落到他的身上了。

下面，我给所有中国新民党同志和即将加入新民党的朋友提几点要求，作好以下牺牲准备的人，才能从事民主事业：

第一、请准备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丢掉你的饭碗；
第二、请准备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丢掉你的自由；
第三、请准备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丢掉你的生命；
第四、请准备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丢掉你孩子的生命；
第五、请准备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丢掉你配偶的生命；
第六、请准备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丢掉你父母的生命。

郭泉：民主先声 319：李连杰先生并不懂自己出演的《木乃伊 3 龙帝之墓》

最近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画皮》，一部是《木乃伊 3 龙帝之墓》。

其实，这篇《民主先声》还有一个副标题："从《画皮》、《木乃伊 3 龙帝之墓》谈中国人民的困窘和抗争"。

我先来谈谈陈嘉上先生导演的《画皮》。故事梗概如下：

秦汉年间，都尉王生（陈坤）率王家军在西域与沙匪激战中救回一绝色女子，并带回江都王府。不想此女乃"九霄美狐"小唯（周迅）披人皮所变。其皮必须用人心养护，故小唯的隐形助手一只沙漠蜥蜴修成的妖小易（戚玉武），每隔几天便杀人取心供奉小唯，以表对小唯的爱意，江都城因此陷入一片恐怖中。小唯因王家军首领王生勇猛英俊对其萌生爱意，并不停用妖术诱惑王生，想取代王生妻子佩蓉（赵薇）的地位。佩蓉发现小唯爱恋自己的丈夫，并觉察到她不是常人，于是暗中求助武功高强的流浪侠客庞勇（甄子丹）和冰清玉洁的降魔者夏冰（孙俪）救助王生。

这部电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苦恼的诠释。中国人苦恼在于一种困窘，即，生活手段与生活目标的背离，同时，想摆脱身处苦恼世界而不得。

例如，蜥蜴修成的妖精小易爱上了"九霄美狐"妖精小唯，不料小唯却爱上了人类王生。小易明知道小唯使用美貌人皮来诱惑王生，但小易对小唯的爱，又驱使小易不断地杀人取心来维持小唯的人皮的美貌如初。小唯越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导致王生越爱小唯。小易爱小唯的手段与其目的正好相反。果然，小唯一边吃着小易给她找到的人心，一边骂小易"你这个吃苍蝇的家伙！"

这是巨大的困窘。这一困窘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天天都遭遇。我们本以为我们养活的中共政府可以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服务，不料，中共政府吃着我们的人心，却骂我们："你们这群该吃三聚氰氨的家伙！"

中国人民就是如此，越以为自己的生活手段在朝向生活目标，却不料生活手段在干着与自己的生活目标完全相违背的工作。这一生活手段，也叫"劳动异化"。就是说，它创造了自己的苦难，却给了自己的敌人以幸福。

我们再看《画皮》里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困窘。

都尉王生在西域与沙匪激战中救回了小唯。小唯因王生勇猛英俊对其萌生爱意，并不停用妖术诱惑王生，想取代王生妻子佩蓉（赵薇）的地位。王生虽然夜夜梦着小唯，却囿于佩蓉与其为结发夫妻，而不愿意越雷池半步。

当佩蓉要为王生作主纳妾，王生却当着佩蓉和小唯的面一边流泪，一边说决不会纳小唯为妾。此时已经埋下了"并非不爱，而是已有老婆"的伏笔。果然，最后，王生将佩蓉亲手杀死后，却对小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爱你，可是我已先有了佩蓉。"

王生一生都没有突破窘境，这不是他的能力问题，而是他根本没有生出突破的心来。

全局唯一突破窘境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妖：小唯。小唯无论是作为一只扁嘴扁鼻的小胖白狐，还是作为"小三"，都是彻底的大赢家。最后，小唯丢掉了人皮，重新回到原形。但是，小唯至少在王生的心里落下了根，从此，我想王生再也活不好了。

果然，王生最后看到庞勇再次离开佩蓉去流浪，脱口而出："我也想走"。 庞勇拍了拍王生的脸，笑了笑，我仿佛听到了庞勇心里在说："傻孩子，你有资格流浪吗？"

事实上，我也经常对很多人说，你们这个也不敢丢那个也不愿意放弃，你们有资格搞民主吗?

从当代爱情生活上来看，小唯这个小三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在精神层面，小唯是完全成功的，至少在她爱的男人心里，小唯狠狠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以上谈的是中国人的困窘。

在这部《画皮》里，我们看不到任何突破和成功的希望，只能希望“妖怪的良心发现”。事实上，如果不是“小唯的良心发现”， 王生、佩蓉、庞勇、夏冰的任何作为都是毫无效果的。

但是，我们在《木乃伊 3 龙帝之墓》里却看到了中国人对这种困窘的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故事梗概如下：

龙帝“秋王”（ 李连杰）战胜了所有敌人，成为皇帝，便妄图长生不老，于是他请大将军郭明去到远方请女术士紫媛（杨紫琼）寻找灵药。当紫媛为他找回秘方，祈求“秋王”成全她与大将军郭明的爱情时，不料暴君“秋王”说“你也是我的”，同时将大将军郭明五马分尸。

紫媛为了报仇就下了诅咒，将“秋王”及其万名精兵变成了兵马俑，永远地埋藏在了陵墓当中。

进入 20 世纪，“秋王”的崇拜者杨将军（黄秋生）和女副官（孟广美）在几个外国人的帮助下复活了“秋王”及其万名精兵。

于是，千年前的紫媛携她和郭明所生之女“林”（梁洛施）来到了 20 世纪，唤醒了被“秋王”及其军队残酷杀害的郭明和无数人民的冤魂。

激战过后，郭明和无数人民的冤魂终于打败了“秋王”的大军。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想到了很多。想到最多的就是这部电影的现实性。我认为，这部电影其实完全是在述说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困境，并为当代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抗争的道路。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呢？首先，这个“秋王”应该就是“秦始皇”。 20 世纪这个暴君在几个外国人的帮助下，被一群穷兵黩武的军人复活了。

于是我想到了 20 世纪复活的“秦始皇”（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 1958 年 5 月 8 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电影里，“秋王”是杨将军（黄秋生）和女副官（孟广美）在几个外国人的帮助下复活的。而 20 世纪，中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复活了中国的暴君独裁，最终在 1949 年，让毛泽东成为了“马克思加秦始皇”。

20 世纪的“秦始皇“（毛泽东）的复活与电影里“秋王”的复活完全一样。

如何消灭复活的“秦始皇”呢？《木乃伊 3 龙帝之墓》没有象《画皮》那样等待“妖精”的“良心发现”，而是唤醒无数被暴君虐杀的人民的冤魂揭竿而起，奋勇杀敌，最后大获全胜。

那么，当代的中国人民该如何将复活的“秦始皇”送回陵墓呢？

我想，那就是唤醒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被中共压抑的革命斗争精神。

其实，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反对暴政的革命传统，只是被独裁压制久了，被自我遗忘了。

我想，唤醒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这就是我的历史使命了！

《木乃伊 3 龙帝之墓》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它不仅创造了全球票房的很多纪录，最主要的是，它鼓舞着中国人民向暴君暴政抗争的斗志。

但是，这一切只有身受独裁之害的中国人民才能深切地认识到，外国人却未必能很好地理解这部电影。

例如：

《芝加哥太阳时报》：为什么我喜欢这部充满乏味愚蠢乐趣的影片呢？因为它极为荒谬可笑而且还以此为豪。

《滚石》：要怎么点评这部《木乃伊》新片呢？糟糕得吓人。

《泰晤士报》：电影聒噪和夸张，说旨在为观众提供不经意的乐趣实在是一个不得力的借口。

美联社：好莱坞可能会从《木乃伊》系列中学到一个教训：任其被埋葬会更好。

最让我感到气愤和不能理解的是，这部伟大作品的主演李连杰先生 8 月 28 日在上海接受新浪“娱记”采访时，竟然说：《木乃伊 3 龙帝之墓》“这都是创作出来的世界，跟历史、真实完全没关系。这部电影全球的观众应该都不会当它是很认真的东西，就是喝杯汽水吃着爆米花开开心心看个故事就完了。”

我想，李连杰先生以后在回答类似重大问题的时候，应该先向我之类的文艺学教授咨询一下，或者，你参考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罗伯·科恩先生的一句话，或许对您的思考有好处。

罗伯·科恩先生说：“该片 90%讲述历史，10%才是娱乐”。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郭泉：民主先声 320：请“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委派特使来宁与我会晤

我注意到马英九先生 10 月 7 日前后，接受《世界》月刊、墨西哥《太阳报》以及日本媒体访问时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当然是独立之主权国”，中国大陆亦为我“中华民国”领土，而因“宪法”如此规定，台湾无法承认“中华民国”领土上还有另一个“国家”存在。大陆和台湾，只能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不知道马英九先生说这样的话，是否真的认为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如果马英九先生真的认为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有对大陆有关事务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履行国家职责的决心，我想，我现在就给马英九先生一个任务，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处理呢？

中国新民党历史委员会长期调查 1949 年前中华民国退役军人在 1949 年后的生活状况。目前，1949 年前的中华民国退役军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健在的也都在 90 岁上下。

本党调查之 1949 年前中华民国退役军人，特指在 1949 年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大陆前，从中华民国政府领取退役金的复转军人。

1949 年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撤离大陆后，所有在 1949 年前退役的中华民国军人的退役金就无人过问了。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没有为这些在 1949 年前退役的中华民国军人支付过任何退役金。

现举一例说明情况，请马英九先生阅处：

经查：

中华民国退役军官陈正（现用名陈德树）先生，1911 年生于南京。

1933 年，陈正先生在南京双龙街地区任防护民团团长，百姓至今口碑极好。

1935 年，陈正先生在广州从军，后在江苏无锡军校当军事教官。

1937 年 11 月，陈正先生在江苏宝山与日军作战。后转战于粤北、江西、湖南全境。以上情况参见：武冈市档案馆 2 号、合宗 4 号，1941 年目录、39 卷，2、50、51 页、《官佐通信录》

陈正先生 1941 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学校、湖南武冈第二分校、军官训练组、第 11 期、第二总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党证》编号（军名）字第 00387 号。

1941 年后陈正先生随抗日名将薛岳将军（后在台湾任国防部长）参加“长沙会战”。 任湖南长沙抗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中将司令部、军务处二科上尉科员。

1946 年 2 月，陈正先生在南京金陵师管区，南京团管区退役。转为在编预备役，同年 4 月，接《国府令》：“调往北方战场，抵抗林彪所率共军南下。”陈正先生不愿打内战，觉得兄弟残杀、于心不忍，而以家属牵累，婉言推诿，退避硝烟。

1946 年 5 月，陈正先生退役，开始领取退役金。在南京郊外购得四亩地，进行农业生产。

1949 年 10 月至今，陈正先生没有领取到中华民国的任何退役金。

1950 年 10 月 21 日，接《刘少奇主席令》：“民国军政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交待历史，交出枪支弹药。”陈正从命、向南京人民政府交出战袍，战靴，勃莱宁手枪，中正佩刀，军官证，党员证，退役证，遂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安置在南京郊区种菜务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无退役金可领。

2002 年 12 月 19 日，已经是 91 岁的陈正先生家贫如洗，度日如年，遂提笔给台湾民国政府写信：

“台湾民国政府：我仍健在，极度贫困，望国民党党部、中华民国政府查清底档，将 56 年的退役薪金汇来，以济我风烛残年，无米之炊。

老臣：步兵上尉陈正敬上。

2002 年 12 月 19 日”

2005 年 3 月 27 日，陈正先生在南京中山陵等待国民党总裁连战先生到来，打算将前述《致台湾民国政府》信件，亲手交给连战先生。岂料陈正此举，被中共南京特务发现，并将陈正先生全家在中山陵拘禁直至连战先生离开南京。

目前，本党对中华民国退役军人的调查已近尾声。中华民国退役军人自 1949 年后就再无半厘退役金可领，苦难度日近六十年，只在 2000 年以后，才陆续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每月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的低保金。

再如黄埔军校 11 期学生程云先生（89 岁），1937 年 12 月 12 日首都保卫战参战将士，民国政府荐任官少校科

员，蒋经国保安团连长。1949 年后被中共收监劳改，1960 年至今在乡下务农，2005 年后每月以“老农民”的身份从当地乡政府领取 50 元的低保金。

马英九先生，陈正先生在今年正月初五度过了九十八岁生日，他原本想在“双十节”再次给您写信，不料，却在“双十节”前夕与世长辞。

马英九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国父的《黄埔校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我想，马英九先生，如果你还把大陆当成中华民国的话，请您立即补发 1949 年前退役军人从 1949 年至今（或至去世之日）的退役金。

如马英九先生果真认为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有对大陆有关事务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履行国家职责的决心，请派特使来南京与我会晤。更多调查统计资料，将在中国国民党特使来宁后共同甄别、移交。

中国新民党将协助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全地进行本案调查和人员统计工作。

附件： 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室的回函

敬啟者：總統電子郵件信箱已經收到您的來信。

總統非常重視民眾的意見，對於每一封信所提供的寶貴建言，都會作為施政方向的重要指引；來信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也會盡全力協助，轉請主管單位處理。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竭誠歡迎您隨時不吝賜教。（您也可以依照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及本件編號 234488 查詢來信處理情形）。祝福您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總統辦公室 敬上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21：从胡锦涛和马英九对我的态度，看中共的匪帮性质

因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日前提出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亦为我‘中华民国’领土”的讲话精神，前天（10 月 15 日凌晨 1 点 30 分），我发表了一份“请求马英九先生高度关注并及时处理 1949 年前退役并滞留大陆的中华民国将士和其他公务人员的退役、退休金的公开信”。（参见《民主先声》320）

公开信发表后，立即有网友将我的这份公开信发到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的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这位网友给我发来了“总统办公室”的回函。回函全文如下：

敬啟者：

總統電子郵件信箱已經收到您的來信。

總統非常重視民眾的意見，對於每一封信所提供的寶貴建言，都會作為施政方向的重要指引；來信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也會盡全力協助，轉請主管單位處理。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竭誠歡迎您隨時不吝賜教。（您也可以依照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及本件編號 234488 查詢來信處理情形）。祝福您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總統辦公室 敬上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oopmail/mailform/thank.php4?_num=234488）

虽然，我很清楚，这个回函是一种“程序函”，只表示“總統辦公室”收到而已，但是，由于这份“程序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编号（234488），而使得“程序函”带有了“实体函”的性质。至少，我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根据这个编号了解到我的公开信的处理情况了。

这个编号很了不起。

马英九先生给我这个编号其实就在昭告天下，这个事情必须公开处理，而处理结果也必须是公开的。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与马英九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从 2007 年 11 月 4 日以后，也先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邦国先生写过十四份内容不一的公开信。其中主要内容是与中国共产党探讨“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为中国各方面人民群众维权的申诉材料等等。

不料，我不仅没有收到任何带有编号的“回函”，相反，却遭遇胡锦涛先生派出的中共警察特务的多次抄家和迫害。

先是中共统战部让中国民主同盟开除我；中共南师大党委决定不许我再在课堂上讲课，调离教学岗位下放文学院资料室；取消我研究生导师资格，将我的研究生安排给其他教授；取消我的教授津贴，只保留基本工资。

然后，中共派出警察和特务对我家进行了 5 次抄家，先后抄走我五台电脑、所有的银行卡、我的书籍、书信等大量文件资料，并刑事传唤、刑事拘留我十余次，中共南师大党委找我谈话就更不计其数了。

（以上物品，胡锦涛先生至今一样也没有归还我）

我想，如果我是台湾人，向马英九先生写一些探讨关于“什么叫三民主义”，“什么叫三民主义民主”，以及为台湾各方面人民群众维权的申诉材料的公开信，马英九先生是断然不敢派出中华民国警察作出如此天理难容的犯罪行径的。

我想，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吧。

尽管胡锦涛先生派出的中共警察和特务在我身上做了无数的天理难容的犯罪行径，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让我屈服。

于是中共警察特务又想到了别的办法。他们先是对我帮助的维权群体说我有生活作风问题。例如，今年 5 月，中共警察特务对江苏泰州的一位著名的军转维权人士说：“你们军转干部要离郭泉远点，他是个危险人物，他至少有 6 个女人，是个坏人。”

不料，军转干部说：“郭教授是否有女人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因为这和他为我们军转干部维权没关系。想要我们离开郭教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解决我们军转干部的问题。如果你们不解决，我们不会拒绝郭教授帮助我们呼吁的好意。”（参见《民主先声》145）

胡锦涛先生派出的中共警察特务见这招不灵，于是就动员我母亲劝说我放弃民主思想。不料我妈说：“虽然胡锦涛先生是我的泰州高中校友，但是如果郭泉违法，我支持胡锦涛先生逮捕他，要关要杀，一切按法律办。如果不违法，儿大不由娘。不过如果中国走多党竞选道路，我儿投新民党的票，老娘投共产党的票。”

胡锦涛先生派出的中共警察特务见这招又不灵，就到南师大调查我是否有经济犯罪问题，调查的结果竟然是南师大至少还欠我几十万元没有兑现给我。而我的态度是，南师大想给我就给，不给我就算。让中共南师大欠我的，那才叫感觉爽！

胡锦涛先生派出的中共警察特务见这招还是不灵，就调查我是否有生活作风问题，调查的结果是我和“可爱的小撒旦”很亲切。（关于我和“可爱的小撒旦”的关系，请参见《民主先声》231、246、256、266）

今天（10 月 16 日）上午 9 时半，南师大监察处的邱处长、秘书李春艳、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潘大春找我聊天，谈了很多事情，其中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们问：“郭老师，有人举报说你和‘可爱的小撒旦’等人关系暧昧”。

我回答：

第一、我和谁关系好，这是我的私事，和你们没关系；

第二、你们想和我谈政治、谈法律，我愿意奉陪，如果和我谈我的女同志，那你们就无权过问了。

第三、任何事情都无法使我放弃推进民主进程的信念。

第四、如果我和谁关系好违法，请走司法途径。

于是，南师大监察处的邱处长问，你不为你的孩子、妻子、父母担忧吗？

我真的不认为他是在威胁我，但是我还是警告他说：

“我不在乎我的家人被共产党杀！杀了我全家，我也要反对共产党独裁！”

最有趣的是，在结束谈话我离开监察处后，南师大监察处的邱处长等人，竟然到我妻子单位找到我妻子说：“有人举报郭泉在外面有女人，你知道吗？”

我妻子回答的很干脆：“知道，是警察干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

郭泉：民主先声 322：中国人民必须抛弃幻想，准备战斗

昨天（10 月 17 日）我发表了《民主先声》231，题目是《从胡锦涛和马英九对我的态度，看中共的匪帮性质》。其中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比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在接受、处理人民来信方面的迥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是拒绝并迫害，后者是接纳且感谢。

第二、我介绍了我在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上书之后，遭遇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残酷的法西斯主义迫害。

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支持。

一位叫“返本归真”的朋友对我说：“感谢网络时代，感谢有人马上把郭教授的这篇文章迅速转给了马英九先生，并且可以等待结果的公开。希望台湾方面能高调作出反应！——这才是政治智慧。因为如果台湾方面能高调作出反应的话，会让更多的大陆民众去重新认识了解这段历史，真正去了解国共历史，国共内战，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高唱抗日战歌背地阻挠抗日、卖国的？让被共产党的奴化洗脑教育的国人重新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分辨忠奸善恶！让大陆民众觉醒启发民智。台湾和大陆民运内外呼应，互相配合，则台湾国民政府的声誉民心彰显，中国新民党也得到极大的宣传和更加扩大了影响力，则蒋公余生念念不忘的复兴中华希望即在当代，大陆国民的民主制度的到来即在眼前！”

另有多位朋友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官民已经严重脱离，中国人民已经完全达到了“有冤无处伸”的悲惨境地了。

例如，网友“沙比懦夫斯基”说：“不要说中央领导的信箱，就是多数市长的信箱都是形同虚设。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敢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前几天，有位朋友找我，要我帮忙在网上向上面反映一个部门清正廉洁的事迹，我认为这很好，就答应了，结果下来的几天，硬是没有找到能反映的渠道。可一下子找到了市长信箱，兴奋地发过去，随后一查，根本没有我发表帖子的记录。”

网友“水深火热”抱怨说：“我想给共产党、给政府提点意见，不料政府的电子意见箱说共产党、政府这两个词是敏感词。我怎么发都发不上去，最后我把共产党改成公缠裆，把政府改成真腐，发是发上去了，可是第二天，中共国保特务敲开了我家大门，说我恶毒攻击共产党是公缠裆，说我恶毒攻击政府是真腐。我要晕倒了，这是什么世道？”

网友“长征”说：“如今已没有几个人相信了共产党了。如果共产党真有通畅的民情民意渠道并愿意切实解决人民的苦难，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集体上访呢? ”

我对以上朋友的观点完全赞同，共产党的确已经沦落为一个反人民的政党了，他们腐败、独裁，还不准人民表达对腐败、独裁的愤怒之情，中国任何一个封建专制朝代都没有现在这么邪恶和腐朽过。

我于是把我们新民党的调查人员收集到的一些“黑监狱”的情况发给这些网友。他们看傻了足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愤怒地对我说：“我们一直只以为政府的信箱没用、上访没用，却没想到原来上访竟然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事情呀。”

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份有关中共河南省警察特务在北京设立的一个黑监狱的情况。

所谓“黑监狱”，就是中共各省特务为了遣返本省进京访民而在北京设立的中共临时监狱。

中共河南省警察特务在北京设立的一个黑监狱的地址在北京市虎坊路青年宾馆后院（第 62 中学附近）。

中共特务在北京街头、天安门广场、中南海等地发现访民后，立即交由各省特务遣返。在遣返之前，临时非法关押在各省的“黑监狱”里。“黑监狱”的狱卒，都是各省的黑社会成员。

10 月 14 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博士应一个访民的呼救，到这个“黑监狱”探访时被“黑监狱”的狱卒殴打。“黑监狱”的狱卒一边殴打许志永先生一边骂：“我们是政府行为，我们怕什么？有本事你打 110？你现在就打？”“你再来多管闲事，我就开车撞死你。”

好在许志永博士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许志永博士自 2003 年以来一直在为弱势群体呐喊、呼号，经常被中共各地警察、特务以及他们雇佣的黑社会殴打，已是家常便饭了。

看完以上调查报告后，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样的党已经完全与人民为敌了。那么，人民的上访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是的，中国人民必须抛弃幻想，准备战斗”。

于是，一个网友发来了一份重要的革命形势情报。情报如下：

“昨晚一个送煤气的年轻人居然跟我谈起了政治！一开始我表示对煤气的高价格不满，这时他接过话发表了一堆不满！这个送煤气的小伙子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政制非常不满，痛斥其独裁给民生造成的残酷弊端。他说，一个社会怎么能什么都是你一个党说了算呢？就说煤气的价格吧，你一家说了算，国外的价格石油天然气的价格都大跌了，但是国内就只见升不见跌！很多行业都是这样让共产党的企业垄断了，都是一党说了算！没法活了！希望中国马上发生革命，他妈的把这个独裁的社会打得稀巴烂！”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23：温家宝先生，您免除外国 247 亿美元得到中国人民同意了吗？

今天（10 月 18 日）我读到一份文件，是温家宝先生 9 月 25 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所作的主旨发言。

温家宝先生首先承认中国目前有 1500 万贫困人口。

我们知道，根据《千年宣言》，每日收入低于 1 美元的人员，属于贫困人员。

其实中国的贫困程度远比温家宝先生了解的情况严重。

但是，在中国有超过 1500 万以上的中国人民每日收入低于 1 美元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却宣布：

“中国将免除最不发达国家 2008 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给予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95%的产品零关税待遇。”

那么，温家宝先生的金口一开，到底中国人民丢掉了多少美元呢？

根据中国新民党金融和银行学委员会的调查资料，温家宝先生的这一金口，使得中国人民丢掉了 247 亿美元。

247 亿美元还只是温家宝先生开的第五金口。温家宝先生 9 月 25 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一共开了六个金口，列举如下：

一、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援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数量翻一番，增至 30 个；对外派遣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数量也翻一番，增加 1000 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3000 人次的来华农业培训。

二、中国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 3000 万美元设立信托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和活动。

三、向粮食紧缺的国家增加出口和援助。

四、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新增 10000 个来华留学奖学金名额，同时专门为非洲国家培训 1500 名校长和教师；为对非洲国家援建的 30 所医院配备适当数量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同时为有关受援国培训医生、护士和管理人员 1000 名。

五、中国将免除最不发达国家 2008 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给予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95%的产品零关税待遇。

六、在未来五年内，为发展中国家援建 100 个小水电、太阳能、沼气等小型清洁能源项目。

根据中国新民党金融和银行学委员会分析和评估，为了完成全部温家宝先生的六个金口，中国人民将丢掉大约 500 亿美元。

请问，温家宝先生，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 2008 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 247 亿美元无息贷款和其他合计达到 500 亿美元的援助项目，经过每日收入低于 1 美元的 1500 万以上的中国人民的同意了吗？

温家宝先生，您开的这六大金口，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或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同意了吗？

另据中国新民党金融和银行学委员会的情报，中国政府 2000 年免除了 31 个非洲国家部分到期债务共 109 亿元人民币。

情报还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对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 33 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国将免除其截至 2005 年底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受援国政府和人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请问，温家宝先生、魏建国先生，你们这样金口一开，大笔一挥，到底得到了谁的授权？是中国人民吗？还是你们独断专行？

你们让外国人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你们看到中国1500万贫困人员的苦难生活了吗？



见、摸得着”的好处啊！但是，你们却丢下了中国的1500

年2月14日清廷颁谕）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有异乎？有异乎？

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收

郭泉：民主先声324：“郭教授，请告诉孩子们，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不共戴天！”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共虽然划定了抗议专区，但是，事实上，中共是让外国人申请抗议的。中国人的所有抗议申请都不被批准，随后，申请人立即被刑事传唤、刑事拘留或逮捕。

中国人在中共划定的抗议专区的唯一成功的抗议是一对没有申请的父子。

京奥期间，北京的一位姓海的父亲带着他只有6岁的儿子成功地冲破了戒备网，在抗议区之一的日坛公园进行了一次短促和小型的抗议。

6岁的孩子高举着的牌子上用英文和中文写着：“山东惠民县政府非法卖了我奶奶家的房子，抢走了钱！”（Shandong Huimin county government illegally sold my grandmother’house and took away the money!）(见照片)。

今天（10月20日）一早，一位我曾经服务过的“断友”（被中共一次性买断工年龄的职工）带着他的7岁的女儿来南京看我。女孩子叫“小芬”。

我请他们父女到南师大附近的一个早餐店吃早餐。这2年里，这家人到北京上访路过南京，都来看我。一共是三次，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来的。而这次只有父女两人，我很奇怪地问，“孩子妈呢？”

他哽咽地说，“我们夫妻都被买断，今年上半年家里的房子又被强拆，补偿款根本不合理。我妻子多次去政府说理，最后一次在回来的路上车祸死了。”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的袖子上有一朵小白花。他接着说：“郭教授，我这次来是想把孩子带来给你看看，然后把她送到一个农村亲戚家。下个月我要到北京去，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就要在北京学杨佳，带上汽油和刀，杀不到敌人就自焚。这是农村亲戚家的地址和电话，请郭教授在我死后，多关心一下小芬。”

我正想开口，他立即打断了我。

他说：“郭教授，你不要劝我。我和杨佳一样，有选择生的自由，也有选择死的自由；有忍气吞声的自由，也有以暴制暴的自由。我只希望在我死后，郭教授一定要告诉小芬，她爸爸妈妈的死，都是共产党害的，要她长大为父母报仇，消灭共产党。郭教授，请告诉孩子们，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不共戴天！”

他把小芬的外套脱掉，这时，我注意到小芬的T恤前胸写着：“政府是大灰狼”；后背写着：“中共是大坏蛋”。

我不知道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看到这个7岁的小女孩身上的字会有什么感想？

但是我知道，如果一个执政党让这个国家的孩子都仇恨到这个程度，我想这个执政党是没有未来的。

我还知道类似这个7岁小女孩和上述6岁的小男孩的中国儿童岂止百万千万！

我对小芬爸爸说：“你安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如果你牺牲，我会安排新民党的女同志将小芬接到家中抚养的。”

将他们父女送上火车，目送着火车远去。我想，中国会有千千万个杨佳要向中共讨个说法的。我想，中国还会有千千万个小芬在心里牢记“政府是大灰狼”、“中共是大坏蛋”的。

这些孩子长大，一定会报杀父之仇的！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所谓的“经租房社会主义改造”中，非法抢夺了他们的爷爷奶奶的私房？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 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将他们的爷爷奶奶打成“右派”，迫害致死致残？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让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饭吃最后饿死 4000 万人？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用各种政治罪名任意迫害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中，用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手段，非法剥夺他们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的工作权利？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所谓的“城建规划”中，用各种强盗手段，非法拆除了爸爸妈妈、叔叔伯伯的住房？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在所谓的“打击邪教”运动中，残酷迫害有宗教信仰的善良的中国公民？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是谁让你们，是谁让我们，是谁让我们所有的人不得自由，饱受独裁之苦？
是中国共产党。

最后，我们还要告诉所有的孩子，

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的一切仇恨都是独裁造成。让独裁者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我们在这个消灭独裁的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中国。全中国苦难的孩子们，联合起来！

郭泉：民主先声 325：“1291 次列车绑死中国人”与“2220 次列车为日本人停车”之比较

在 9 月 24 日开出的广州至遵义 1291 次列车上，疑患狂躁症的贵州人士曹大和先生因为在火车上乱喊乱叫，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布捆住了手脚。曹大和先生在挣扎了整个晚上之后，于次日 9 点多的时候死去。

经查，根据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当出现下列情况的应该临时停车：

一：前方出现意外例如交通事故，大雪等；

二：由于其他快车不正点而让路；

三：由于旅客意外需要临时停车救助；

四：调整运行时间；

因此，1291 次列车长针对疑患狂躁症的曹大和先生，应该选择第三款“由于旅客意外需要临时停车救助”，与其前方最近的车站联系以落实相应的急救医院及急救人员安排，甚至必要时临时停车，送最近的医院。

但是，1291 次列车长却选择了用胶布捆住了曹大和先生的手脚，致其挣扎了整个晚上之后，于次日 9 点多的时候死去。

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很愤怒，因为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 1291 次列车宁愿绑死乘客也不愿意停车。绑死乘客，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为此，我长嘘短叹了好一阵子。

今天（10 月 23 日），我又看到一个消息，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曹大和先生被绑死，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如果曹先生是日本人，那就一定会临时停车，由警车直送医院的。

可惜，曹先生是中国人，所以，他只配被中国列车的列车长和列车员绑死在中国列车上。

今天看的消息如下：

新华网 10 月 23 日报道，8 月 22 日齐齐哈尔驶往大连方向的 2220 次列车上有个日本老太太抱怨道：“我和杉本洋江要乘坐今天 9 时飞往日本大阪的航班，列车晚点这么多，我们可怎么办呢？”

2220 次列车长立即用手机联系到了大连周水子机场值班负责人，机场负责人答复，如果 8 时 10 分旅客能赶到机场，可以保障日本旅客顺利登上飞机。列车长一算时间，如果旅客在大连火车站下车，再赶往机场的话，时间就来不及了。

于是，列车长马上向沈阳铁路局客运调度联系，请示能否在离机场最近的周水子车站临时停一分钟，用汽车送旅客去机场，沈阳铁路局批准临时停车，让日本旅客下车。

8 月 22 日 7 时 44 分，2220 次列车在大连周水子站停车，7 名日本旅客顺利登上飞往日本大阪的航班。

这几个日本人返回日本后，杉本洋江代表其余外籍旅客用汉语写来感谢信。

杉本洋江在信中说：“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列车在周水子车站临时为我们停车一分钟(本不应停)安排我们提前下车，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在中国铁路史上闻所未闻。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列车长为了万无一失，还专为我们联系了警车护送到机场。这也是铁路的又一创举。”

我读完日本人的这封感谢信，再想想 1291 次列车宁愿绑死中国人也不停车送医院，我真的觉得日本人有足够的理由蔑视中国。

首先，这 7 个日本人因为火车晚点而赶不上飞机，根本不属于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临时停车”第三款规定的“由于旅客意外需要临时停车救助”的情形。

其次，如果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抱怨到：“我和娃他爷要乘坐今天 9 时飞往日本大阪的航班，列车晚点这么多，我们可怎么办呢？” 2220 次列车长是不是会在离机场最近的周水子车站临时停一分钟，用汽车将“中国老太太和老大爷” 送去机场呢？

我想，所有中国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最后，我感到奇怪的是，2220 次列车是沈阳铁路局的列车，是沈阳人的列车。而我恰好也认识一个沈阳人，他叫马臣，他就很有骨气。我以沈阳朋友马臣先生的事迹来结束我的这篇《民主先声》，希望能给 2220 次列车长和其他沈阳人、其他中国人一点启迪：

1988 年 3 月末，日本右翼分子屡屡枪击我驻日使领馆，并狂妄叫嚣要再来一次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被《参考消息》报道给国内。

见报的当天，沈阳市的一个二十五岁的年青人名叫马臣，他当即买了两把长刀，单枪匹马去给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的日本领事下了一封战书。马臣先生要日本领事代表日本、代表日本政府、代表日本人来与其决斗，以了断日本国内正在发生的右翼分子枪击我驻日使领馆事件，并指出，这是唯一可以了断的办法。他说：“我们每人一把刀，

真的是优秀的，就接受我的决斗挑战

客。并且，你们以后再也别吹嘘什么

等来了大量中共特务把马臣先生抓走

场危险的决命游戏。而且，那个日本

等，大批中共特务就包围我们的家，

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子。

dui6390@sina.com

郭泉：民主先声 326：中国新民党声援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的“罢教”运动

10 月 17 日，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开始“罢教”。罢教初由永川乡镇中学开始，星湖中学和星湖小学等 4 所学校所有教师到教室但都不开口说话。10 月 20 日，罢教运动规模扩大。永川的第 1、3、4、5、6、7、8、12 中学，北山中学、中山中学、双石镇中、双石小学、奥妮小学等 79 所学校的 2000 多名教师参加罢教。

以上学校的 2 万多名学生积极支持教师的“罢教”运动。

师生们表示，此次罢教运动將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中共屈服为止。

中国新民党教育委员会调查显示：

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和有关文件，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是，在中国，教师的收入待遇不足公务员的 1/3。

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参加工作 8 年的中小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 800 多元，加学校津贴也就是 1000 元，而同时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的月收入达到每月 2800 元以上。

经中国新民党教育委员会提请中央党部讨论，决议如下：

第一、中国新民党声援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的“罢教”运动；

第二、中国新民党四川省党部、重庆市党部派员协助。

第三、公布中国新民党教育委员会提交的四川重庆人民教师的“罢教”运动资料。

公布四川重庆人民教师的“罢教”运动材料如下：

一、永川人民教师罢教运动倡议书

永川全体教师同仁们：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老师，我们同站在神圣的三尺讲台上，不断的进行着知识与文化，人性与人格的接力传递。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无数仁人志士的背后几乎都有我们的影子，家家户户的香火神龛之上也曾为我们留了位置。

可是今天，各位同仁们，你们过得幸福吗，你们的心情愉快吗，你们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你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满足吗。试想，如果没有“外援”的话，可能多数同仁都在为自己的千余元甚至几百元的工资能否用到下个月而发愁。如果仅凭这点微薄工资来养家糊口的话，毋庸置疑，全家成员都是“常瘦”之人。

再看看我们的周围吧，清洁工、小商贩、个体户以及那些口口声声称自己为人民公仆的人……无人不在我们面前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对于老师的工资额，他们的反应是惊讶、叹息、漠然、鄙夷……想当年寒窗十数载，虽不能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倒也算是学有小成，方有资格在这个被称为学校的庭院中传递人性与人格。但左右一望，没想到我们竟是如此的廉价与卑微。难怪有人说“我女儿一定不能嫁给老师”云云。

真是可悲可叹：悲教师家贫徒四壁，叹人间何时重斯文。圣人曰：“君子谋道不谋食”难道真的是要我们作一匹既不吃草又能永远奔跑的神马吗？那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公仆的人，当他们拿着丰厚的俸禄，心安理得地占有和享受着国家公共资源的时候，他们或许早已淡忘了是谁教自己念“人之初”的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只能靠自己。同仁们，行动起来吧！我们不能再作温顺的羔羊，必要的时候，也应该作一头威猛的下山虎。

为了知识的尊严，为了文化的地位，为了人性与人格的传承，也为了我们不再卑微，我们不能再沉默。

爆发吧！像火山一样喷发吧！用炽烈的红光驱赶天空的阴霾，为我们迎来同样炽烈的朝阳！

期望来日的永川，能还给老师公平的世界！

永川人民教师 2008 年 10 月 15 日

二、永川人民教师罢教运动口诀

并非愿停课，实乃不得已。此举为何来？只缘工资低。一月五六百，十月九不齐！弹铗恨无肉，出门破车骑。

天寒肘出襟，有病向天泣。贫也无所妨，奈何城乡异？　百行教师贱，五莲冤最奇！手仗一支笔，擎天立三尺。

披肝呕心血，栽培桃与李。夜归星作灯，早起惭晨鸡。酬劳难相抵，寥寥钞票稀。大官俨然者，谁只一个妻？

苦哉众教师，一年难添衣。愁眉脸菜色，苦音绕教室！　任劳又任怨，徒劳你我他。民以食为天，停课齐投笔。

自不为奴隶，谁复轻教师？成败在此举，全区须努力！官者敢压迫，天公当不依！试看补天手，停课展雄姿

郭泉：民主先声 327：“打警察真的很过瘾！”

今天（10 月 24 日）一早，我的一位在江苏省宿迁市当中学教师的学生给我电话，激动地是说：“教授，你知道我们宿迁人民奋起反击中共警察的事情了吗？”

这位学生以前是南师大的成教学生，我做过她两年的班主任。我说，最近一直在忙四川重庆永川等地中小学教师的罢教运动，还不知道宿迁发生了事情。

她说：“一百多个中共警察畜生打宿豫中学的几个学生家长，围观的群众看不下去，就奋勇上前，几千个群众把警察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警察逃跑了，群众把很多警车都掀翻了。”

我忙问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家住天一苑，就在宿豫中学附近，看的清清楚楚。情况是这样的，10 月 12 日，宿迁市宿豫中学一名初二的男生上吊自杀了，男生留有遗书，大意是：在学校老师经常打骂他，让他无法承受，家人又逼他上学，结果他只能选择死亡。10 月 20 日上午家长带着孩子的尸体去学校讨说法，如果不给说话，就不火化尸体。学校不理家长，还不让家长进入学校找校长。中午的时候，无奈的家长在学校大门口挂上了一块大白布，上书“还我孩子”四个大字。围观群众达到好几千人。

下午 1 点钟左右，学校门口突然来了近 20 辆警车，100 多名警察，声势浩大。警察身上的编号全都撕了下来。下午 2 点半左右，大约有五六十个头戴盔甲、手拿警棍的中共警察畜生开始强行抢夺孩子尸体，孩子的亲人跟警察打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亲属被打倒在地。

孩子的父亲最先被警察打昏，孩子的爷爷 70 多岁，死死抱着孩子尸体不放，但是就连这位老人也不能幸免，也被警察打倒在地。后来孩子的姐姐也被警察打倒在地。

这时，孩子的其他亲属纷纷跪在了地上，向围观的群众磕头求助。

此时围观的群众都在大声的叫骂“打倒共产党！”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被这群中共畜生的暴行激怒的。

随后，上万名群众冲开警戒线向学校冲了过去。群众将警察围起来打成一团。数十个群众打一个警察。畜生们狼狈不堪、落荒而逃。群众把畜生打跑以后，又把剩下的警车都掀翻了。

最后，我的这位女学生兴奋地说：“打警察真的很过瘾！可惜当时我在家楼上带孩子出不了门，否则我也要下去扇警察几个耳光呢！”

郭泉：民主先声 328：秦刚先生，请先搞清楚中共和胡嘉到底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再发言

今天（10 月 24 日）我读到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 23 日就欧洲议会授予胡嘉（胡佳）先生“萨哈罗夫奖”答记者问的一段文字。

有记者问：10 月 23 日，欧洲议会宣布授予胡嘉（胡佳）先生“萨哈罗夫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回答：胡嘉系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徒刑的犯罪分子。欧洲议会某些人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授予其“萨哈罗夫奖”，完全是颠倒是非，充分暴露了他们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政治图谋。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们的行径绝不能改变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也蒙蔽不了欧洲各国人民。

看完，我不禁笑起来，我想：

第一、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的发言只能代表中共外交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为我和中国新民党的千万党员们就很支持胡嘉（胡佳）先生获得“萨哈罗夫奖”。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胡嘉（胡佳）先生获得“萨哈罗夫奖”一定能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当然中共对此是很不开心，而且是愤怒异常的。

第二、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请先搞清楚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中共和胡嘉（胡佳）先生到底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以后再发言。

那么什么才叫国家政权呢？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国家政权。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权是由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与共产党无关。所以，一说到“颠覆国家政权罪”，往往有人马上认为反对共产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完全不正确的。

其实根据中国《刑法》反对中共并不构成任何罪名。宪法虽然规定了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颠覆

国家政权罪”只是指反对后两项，即指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也就是说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本没有关系。

那么什么才叫人民民主专政呢？很显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那么什么才叫社会主义制度呢？很显然，人民共同致富，全民福利的社会制度才叫社会主义制度。

胡嘉（胡佳）先生从来都没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也从来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他最多和我一样，是在反对一党专制、反对阶级压迫、提倡全民福利而已，这恰恰是在要求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行为，立即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支持。而那些提倡和捍卫一党专制、经济垄断的集权统治者才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附件：萨哈罗夫奖介绍

萨哈罗夫奖由欧洲议会设立于 1988 年，颁发给对维护人权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这个奖项是以 1975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原苏联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的，奖金额为 5 万欧元。

历届获奖人（组织）名单：

1988 年：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和安纳托利•马青柯（乌克兰，追封）

1989 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

1990 年：昂山素姬（缅甸）

1991 年：亚当•德马希（南斯拉夫）

1992 年：五月广场的母亲（阿根廷）

1993 年：《解放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4 年：塔思利玛•娜丝琳（孟加拉）

1995 年：莉拉•萨娜（土耳其）

1996 年：魏京生（中国）

1997 年：萨莉玛•葛沙莉（阿尔及利亚）

1998 年：易卜拉欣•鲁戈瓦（南斯拉夫科索沃）

1999 年：沙纳纳•古斯芒（东帝汶）

2000 年： ¡Basta Ya（西班牙）

2001 年：努利特•皮勒德-卡沙威（以色列）、艾萨特•加沙维（巴勒斯坦）和唐•萨卡利亚斯•康文和（安哥拉）

2002 年：奥斯瓦多•巴亚（古巴）

2003 年：联合国

2004 年：白俄罗斯记者协会（白俄罗斯）

2005 年：白衣天使（古巴）、无国界记者和荷瓦•易卜拉欣（尼日利亚）

2006 年：亚历山大•米林科尔维奇（白俄罗斯）

2007 年：萨利赫•默罕默德•奥斯曼（苏丹）

2008 年：胡佳（中国）

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介绍：

萨哈罗夫 1921 年出生于莫斯科，1938 年，萨哈罗夫入读莫斯科大学，1947 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哈罗夫开始对宇宙射线的研究。1948 年，他参与了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苏联原子弹计划。萨哈罗夫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联在 1953 年 8 月 12 日对研制的第一种核聚变装置进行了测试。同年，萨哈罗夫得到了科学博士学位，被选为苏联科学学会的会员。随后萨哈罗夫继续留在萨罗夫主导研发苏联首枚百万吨级氢弹，并在 1955 年进行了测试。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曾引爆的核武器——沙皇炸弹也是基于萨哈罗夫的设计制造的。

从 1950 年代后期起，萨哈罗夫开始关注他工作所牵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在 1960 年代开始活跃于政坛，反对核武器扩散。他亦推动各国停止在地面进行核试验，也参与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 1963 年的签署。

1967 年当反弹道导弹成为美苏关系的重要议题时，萨哈罗夫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折点，1967 年 7 月 21 日萨哈罗夫在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他认为苏联应该接受美国的建议，双方共同放弃对反弹道导弹的研发，否则针对这项新技术的军备竞赛将增加核战的可能性。他也请求领导人批准他在苏联一份报章上发表文章，解释反弹道导

弹的危险性。当局没有理会这封信，并禁止他在苏联出版书籍展开对这个议题的讨论。

1968 年 5 月，萨哈罗夫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反弹道导弹是核战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篇文章作为地下出版物被传播并在苏联境外出版后，萨哈罗夫被禁止参与与军事有关的研究。之后他返回列别杰夫物理学院修读普通理论物理学。

在 1970 年代，他与瓦列里·查里兹和安德烈·特韦尔多赫列博夫共同创立莫斯科人权委员会，并因而面对当局更大的压力。

1973 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翌年他获得了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

1975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被苏联禁止离境领奖，他的妻子叶连娜在颁奖典礼上代他宣读演讲辞。

1988 年，萨哈罗夫获得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颁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奖。之后，萨哈罗夫协助了苏联最早的一批独立政治组织的成立，并成为苏联反对势力中主要一员。

1989 年 3 月，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

1989 年 12 月 14 日，萨哈罗夫死于心脏病发，终年 68 岁。他的遗体埋葬在莫斯科沃斯特里亚科夫斯科耶公墓。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被称作苏联的“氢弹之父”。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主席在发奖仪式上对萨哈罗夫作了如下评价：“安德烈 • 萨哈罗夫对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卓有成效的方式，为实施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各项价值观念而进行了斗争。他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29：韩国光州事件与中国六四事件之比较

由于我在《民主先声》312《其实我们大家的民主思想都差不多，区别的只是勇气而已》这篇文章里提到反映韩国光州事件的电影《华丽的假期》，于是很多朋友都请我介绍一下韩国的光州事件。

其实，我对韩国的了解并不多，我只学过一学期的韩国语，而且我对韩国的研究只限于韩国新罗时代的佛教（曾经写过《韩国（新罗）佛学圆融思想研究》一书）。但是，我有很多韩国朋友，他们在韩国各大学从事多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为此，我请教了很多韩国朋友，今天（10 月 26 日），我终于完成了这一激动人心又痛苦不堪的工作了。

在介绍韩国光州事件之前，我先提供韩国历届总统的资料，这对理解韩国光州事件非常有用。

韩国历届总统介绍：

李承晚 1948-1960（1-3 届) 、尹普善 1960-1962（4 届)

朴正熙 1963-1979（5-9 届) 、崔圭夏 1979-1980（10 届)

全斗焕 1980-1988（11-12 届) 、卢泰愚 1988-1993（13 届)

金泳三 1993-1998（14 届) 、金大中 1998-200（15 届)

卢武铉 2003-2008（16 届)、李明博 2008～（17 届）

然后，我要再介绍一下全斗焕。他是韩国光州事件的罪魁祸首。

全斗焕（1931 年 1 月 18 日生），韩国的军事独裁者，第 11、12 任总统。毕业韩国国陆军士官学校，和卢泰愚是同学。1961 年军事政变时，积极支持朴正熙少将。 朴正熙认识他的功绩，把他升格为最高会议议长秘书官。后来，以猛虎师团长的身份参越南战争。归国后，历任为特战司令官和保安司令官。

1979 年 10 月 26 日。韩国中央情报局首长金载圭暗杀了朴正熙。总理崔圭夏任代总统。

1979 年 12 月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打倒郑升和参谋总长，把军部实权拿握起来。1980 年崔圭夏总统在全斗焕的压力下下台，8 月 27 日， 全斗焕成为韩国总统。曾武力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并把异议人士金大中、金泳三等拘捕入狱，并驱逐出境。

1988 年在民间多次压力下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之后让其得力助手卢泰愚将军出选总统。

卢泰愚总统任期届满后，金泳三当选为新一任韩国总统。金泳三他立即彻查由全斗焕时间开始的官商勾结活动。

1995 年 11 月 16 日，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相继因筹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逮捕。

1996 年 8 月 26 日，首尔地方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判处全斗焕死刑，后来改判终身监禁。1997 年 12 月得到后任总统金大中特赦，并于 1998 年初获释。

下面，我来对韩国的光州事件作一个全面的介绍：

韩国“光州事件”又称为“5.18 民主运动”。

1979 年 10 月 26 日，韩国朴正熙总统被部下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身亡，由崔圭夏任代总统。朴正熙所颁布的一系列紧急措施令相继被解除，政治矛盾有所缓解。韩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但好景不长，实权还是掌握在军人手中。11 月 24 日 140 名民运人士因要求民主而被逮捕及拷问。

1979 年 12 月 12 日，当时的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以刺杀朴正熙“有牵连”为由，将陆军参谋长、军事管制司令官郑升和等 40 余名高级军官逮捕，夺取了韩国的统治权力，任命其妻子的弟弟出任戒严司令官。

不久，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

1980 年 4 月 14 日爆发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

1980 年 5 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宣布在汉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但民众示威浪潮随之更形扩大，并要求撤销戒严令和全斗焕下台。

5 月 15 日，约 10 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

1980 年 5 月 16 日光州也有 3 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

5 月 17 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校园，封闭了国会和所有政党，禁止一切“室内外的集会、游行”和政治活动。禁止批评国家元首，并下令逮捕了反对派领袖金大中。

金大中的被捕激起了民愤。在金大中的家乡光州市，爆发了自四月人民起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

1980 年 5 月 18 日凌晨，全斗焕调数万戒严军分 6 路包围了韩国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市，甚至动用飞机空运军队。当日上午 10 点，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与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几十名群众死亡、逮捕多人。激动的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聚集于全罗南道道厅（省政府）前广场，拉开了“光州 5.18 抗争”序幕。一句“到道厅去”成了当年最激荡光州市民的口号。学生与市民以道厅为中心，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18 日晚，光州三万名学生高举火把游行。

5 月 19 日 军队封锁光州并向人群开火，并脱去学生衣服、将学生倒吊等等。目睹暴行的中学生、市民也开始加入示威行列。不论小孩、孕妇、老人，都被军人屠杀。

5 月 20 日晚，20 万人在道厅示威。市民组织 200 多辆出租车、公交车突破封锁线到道厅助威。21 日凌晨戒严军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 54 人死亡。30 万市民来到道厅、广场参加抗争。

一个青年站在戒严军的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军队射杀了这位青年。愤怒的市民立即成立“民众抗争本部”。

20 万人民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夺取了武器库，赶走了官员，打退了驻军，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

5 月 22 日金大中被控以煽动罪，遭起诉；万名军人包围光州。在光州，“市民收拾对策委员会”成立，与政府当局谈判：让死难者家属认领抗争者尸体、戒严军释放被捕的民众并撤出道厅及市中心，市民军交出武器。组织救援、发动募捐、提供后勤保障。为抗争人士提供食物及日常补给。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受伤者，连娼妓都为伤者献血。

5 月 23 日 15 万名市民召开大会，商讨日后的策略。

5 月 24 日 10 万名市民在雨中召开第二次大会。

5 月 25 日 5 万名市民召开第三次大会。很多人捐钱、捐血。“光州民主民众抗争领导部”组成，决心与军政府对抗到最后一刻。

5 月 26 日坦克进城，市民躺在路上阻挡坦克，可是坦克照样压过他们入城。

抗争队决定疏散其它人，只让“抗争领导部”的人留下。在 200 多名留下来的人中，有 10 多名女孩子及 60 多名高中学生，因为亲友被杀害而坚决留下。

全斗焕叫嚷“杀死 70%光州市民也可以”，5 月 27 日清晨出动 7 万兵力、150 多辆坦克和装甲车、100 多门大口径炮、大型直升飞机，出动导弹部队。“讨伐军”试用战史上罕见的毒气弹镇压群众，在拥有 80 万居民的光州市，

屠杀 5000 多人，打伤 1.4 万多人。

5 月 28 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运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后迫于国际压力，1981 年 2 月金大中被宣布免除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韩国教会在“5.18”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5 月 18 日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光州基督教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等教会医院组织了对受伤者最及时的救助。

戒严军切断光州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体不仅不客观报道事件的进展，还歪曲事实。市民纵火焚烧几家电台和报社，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揭露戒严军的暴行。整个抗争期间，天主教会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光州事件”被

木。1980 年～1986 年，每年都有大约

”正名迎来了曙光。这时，反对党的

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

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

到来。

，而后者是学生运动。所以，任何学

《民主先声》129、227）。

的民主体制。

郭泉：民主先声 330：四川、重庆等地中小学教师“罢教” 运动如火如荼

9 月以来，四川重庆各地中小学教师为“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开展了大规模的“罢教”运动。

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对此次“罢教” 运动决议如下：（参见《民主先声》326）

第一、中国新民党声援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的“罢教”运动；

第二、中国新民党四川省党部、重庆市党部派员协助。

第三、公布中国新民党教育委员会提交的四川重庆人民教师的“罢教”运动资料。

截止今天（10 月 27 日），四川重庆各地已有 8 个区县爆发了教师“罢教”运动。

各县区“罢教”运动的开始时间和地名清单如下：

9 月 23 日开始，四川省郫县教师大规模罢教；

10 月 6 日开始，四川省邛崃市教师大规模罢教；

10 月 8 日开始，重庆市铜梁县部分教师罢教

10 月 9 日开始，四川省资中县教师大规模罢教；

10 月 13 日开始，四川省华蓥市教师大规模罢教；

10 月 17 日开始，重庆市永川区教师部分教师罢教；20 日，重庆市永川区全体教师罢教；（参见《民主先声》326）

10 月 22 日开始，重庆市长寿区教师大规模罢教；

10 月 23 日开始，重庆市綦江县教师大规模罢教。

以上罢教运动，除四川省郫县教师罢教成功外，其余各地的罢教运动仍在继续。

注：四川省郫县县长和财政局长在郫筒镇中学亲自宣布，给全县教师每人补 9600 元。原津贴照发，每月净增 1200 元。从 2008 年 3 月份开始补发。从此，郫县教师年津补贴费实现了和公务员（28000 元/年）同样的标准。

下面介绍重庆市綦江县教师的罢教运动：

从 10 月 23 日早上八时到现在，重庆市綦江县十几所中小学近千名教师集体罢教，抗议教师工资待遇极低，

贫富悬殊过大，无法生存。

重庆市綦江县政府不但不执行《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中的教师待遇不低于或略高于公务员的法律规定。而且重庆市綦江县政府又欺上瞒下，虚报教师工资数据，还多次欺骗教师，在新闻媒体和网络上造谣，多次欺骗教师要涨工资，但实际上却根本不见行动！

重庆市綦江县政府还出台其他事业单位人员也将参照公务员待遇执行的政策，唯独只字不提教师！

重庆市綦江县中小学数万名学生坚决支持教师的罢教运动，学生们自发地打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横幅在各校内游行。（见照片）

学生们对教师罢教运动的支持，感动了广大罢教老师。

相关法律：

1、《义务教育法》中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2、《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

3、《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指出："《教师法》第二十五条所称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指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构成的口径统计的平均工资额。各地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当地教师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幅度及保障措施，并予以落实。" （1995 年 10 月 6 日下发）

4、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所以，公务员增加的津贴补贴应包括在工资总额之内。

另据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情报：

四川省旺苍县中小学教师的罢教运动即将启动，情况如下：

2008 年 9 月份，四川省旺苍县公务员（包括参公单位的在职、退休人员）发了所谓的地方津贴，标准为科员 15000/年，副科 16500/年，正科 18750/年。

可是旺苍县全县的在职、退休教师一分钱都没有。

附件：致綦江县全体教师的一封公开信

綦江全体教师同仁们：

大家好！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老师，我们同站在神圣的三尺讲台上，不断的进行着知识与文化，人性与人格的接力传递。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无数仁人志士的背后几乎都有我们的影子，家家户户的香火神龛之上也曾为我们留了位置。

可是今天，现实对我们而言是严厉无情的！养家糊口、房贷按揭……无一不是一座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你我的肩上，多数同仁都还在为自己的千余元甚至几百元的工资能否用到下个月而发愁。

而《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但一直以来，我们教师的总体收入严重低于公务员总体收入。特别是去年公务员实行所谓"阳光工资"，即绩效工资后，綦江县公务员绩效工资达到了年均 18000 元，而教师仅在年终发放了一次性补贴 3600 元。我们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加扩大，同级别公务员工资收入甚至达到了教师的三倍。

可笑！可叹！堂堂法律竟如一纸空文！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政府相关部门有关人员也通过非官方渠道提出过即将兑现教师绩效工资。但是公务员的绩效工资已经发放近两年了，我们教师的绩效工资还没有一点眉目，目前为止，也没有官方的承诺。作为教师，我们也理解政府的困难，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公务员绩效工资的发放就没有这诸多的困难？我们也相信政府有诚意解决我们应得的报酬，但我们不知道这一天究竟还有多久？

真是可悲可叹：悲教师家贫徒四壁，叹人间何时重斯文。圣人曰："君子谋道不谋食"难道真的是要我们作一匹既不吃草又能永远奔跑的神马吗？那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公仆的人，当他们拿着丰厚的俸禄，心安理得地占有和

享受着国家公共资源的时候，他们或许早已淡忘了是谁教自己念“人之初”的了。

郫县教师罢教终于成功！他们罢教是因为教师津补贴 14000 元仅为公务员津补贴 28000 元的 1/2。綦江的同仁们，我们 3600 元仅相当于綦江县公务员的 18000 元的 1/5 而已。

公理何在？公平何在？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只能靠自己。同仁们，行动起来吧！我们不能再作温顺的羔羊，必要的时候，也应该作一头威猛的下山虎。

为了谁？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人格尊严，为了我们不再卑微，我们不能再沉默。

爆发吧！像火山一样喷发吧！请用炽烈的红光驱赶天空的阴霾，为我们迎来同样炽烈的朝阳！

期望来日的綦江，能还给老师公平的世界！

经全体教师商议，决定于 2008 年 10 月 23 日早上起开始罢教,要求全面、尽快落实教师待遇！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1：拯救中国社会良心的有效途径，一是宗教，二是民主制度

昨天（10 月 26 日），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在南京太阳宫洪泽湖厅聚会。

我们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94 级硕士研究生。96 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到南大哲学系读博士。99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入南师大读文学博士后，2001 年留校担任副教授至今。

昨天，我们还请到了来南京大学出席南大社会学系 20 年系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副研究员。

这次同学聚会简直就成了一次小型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学问题研讨会。

除我之外，出席的朋友还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宛丽 副研究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吴作富 博士、讲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肖萍 博士、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 花菊香 博士、副教授、

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公共管理系 高红 博士、副教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傅晴女士 硕士

平安保险公司（南京） 贾钰女士 硕士

华夏银行（南京）副行长 樊立群先生 硕士

另有五位同学缺席：

上海社会科学院 苏萍 博士、副研究员

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陈如 博士、副研究员

南京市建邺区区长办公室主任 刘晶磊 硕士

江苏省宿迁市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 周长东 硕士

深圳大学法学院 吴崇华 硕士、讲师

席间，自然从食品安全（三聚氰胺等）这一典型社会学问题，聊到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学建设和社会工作问题。

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需要一场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在这一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社会学者应该走在最前沿，因为，我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最有发言权。

我们都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于一种中国社会上下普遍存在的社会良心缺失。

因此，如何修复中国人缺失的良心，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良心严重缺失，源自两个因素，一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的缺失，二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缺失。

而宗教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缺失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第一，由于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党，于是，共产党在中国大搞无神论教育，结果，在中国，宗教几乎成为“迷信”的代名词。只要中共对某宗教一不如意，立即就“打击邪教”，而忘掉了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

根本人权。

没有了宗教意识，人就没有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于是，人们认为只要不为人知，不留犯罪痕迹，就安然无恙了。

缺失宗教意识，其实就是丢弃了一种很伟大的内在监督。这个监督与其说是来自于上帝的，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一种思考，那是我们本能的对社会、对他人的恻隐之心。

第二，由于共产党是独裁的党，于是，一切名义上的监督，诸如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团监督、政党监督在涉及中共的根本利益的时候都变得毫无作用。结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要搞定中共领导，一切都安然无恙了。

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团监督、政党监督中的核心监督机制是政党监督。

而政党监督，只有在可以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如果搞“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模式，将使得所有的“民主党”变成中共的“花瓶”和“尿壶”。这在中国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缺失民主意识，其实就是丢弃了一种很强大的外在监督。任何一个党，如果没有在野党对执政地位的竞争，无论这个党多么伟大、光荣、正确，都将变成无恶不作的魔鬼。

因此，拯救中国社会良心的有效途径，一是重建中国人心中的宗教世界，切实捍卫“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必须尽快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

昨晚让我很开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副研究员对我们说，社会学所的原所长陆学艺研究员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加大社会学投入并对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研究进行高度关注。张宛丽副研究员说，陆学艺研究员的上书已经得到胡锦涛主席的批复，并在落实中。

我对张宛丽副研究员说：“中国不是没有好的社会学者，而是没有好的体制。希望在座的所有社会学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都能在改革的前沿做大量的具体工作。”

张宛丽副研究员说：“是的，我们有幸生在一个色彩斑斓、千姿百态、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我们将比前人看到更多的变化，但是，我们也承受着前人所没有的委屈、痛苦和挣扎。”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1：拯救中国社会良心的有效途径，一是宗教，二是民主制度

昨天（10 月 26 日），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在南京太阳宫洪泽湖厅聚会。

我们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94 级硕士研究生。96 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到南大哲学系读博士。99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入南师大读文学博士后，2001 年留校担任副教授至今。

昨天，我们还请到了来南京大学出席南大社会学系 20 年系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副研究员。

这次同学聚会简直就成了一次小型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学问题研讨会。

除我之外，出席的朋友还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宛丽 副研究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吴作富 博士、讲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肖萍 博士、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 花菊香 博士、副教授、

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公共管理系 高红 博士、副教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傅晴女士 硕士

平安保险公司（南京） 贾钰女士 硕士

华夏银行（南京）副行长 樊立群先生 硕士

另有五位同学缺席：

上海社会科学院 苏萍 博士、副研究员

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陈如 博士、副研究员

南京市建邺区区长办公室主任 刘晶磊 硕士

江苏省宿迁市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 周长东 硕士

深圳大学法学院 吴崇华 硕士、讲师

席间，自然从食品安全（三聚氰胺等）这一典型社会学问题，聊到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学建设和社会工作问

题。

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需要一场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在这一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社会学者应该走在最前沿，因为，我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最有发言权。

我们都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于一种中国社会上下普遍存在的社会良心缺失。

因此，如何修复中国人缺失的良心，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良心严重缺失，源自两个因素，一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的缺失，二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缺失。

而宗教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缺失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第一，由于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党，于是，共产党在中国大搞无神论教育，结果，在中国，宗教几乎成为“迷信”的代名词。只要中共对某宗教一不如意，立即就“打击邪教”，而忘掉了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人权。

没有了宗教意识，人就没有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于是，人们认为只要不为人知，不留犯罪痕迹，就安然无恙了。

缺失宗教意识，其实就是丢弃了一种很伟大的内在监督。这个监督与其说是来自于上帝的，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一种思考，那是我们本能的对社会、对他人的恻隐之心。

第二，由于共产党是独裁的党，于是，一切名义上的监督，诸如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团监督、政党监督在涉及中共的根本利益的时候都变得毫无作用。结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要搞定中共领导，一切都安然无恙了。

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团监督、政党监督中的核心监督机制是政党监督。

而政党监督，只有在可以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如果搞“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模式，将使得所有的“民主党”变成中共的“花瓶”和“尿壶”。这在中国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缺失民主意识，其实就是丢弃了一种很强大的外在监督。任何一个党，如果没有在野党对执政地位的竞争，无论这个党多么伟大、光荣、正确，都将变成无恶不作的魔鬼。

因此，拯救中国社会良心的有效途径，一是重建中国人心中的宗教世界，切实捍卫“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必须尽快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

昨晚让我很开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副研究员对我们说，社会学所的原所长陆学艺研究员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加大社会学投入并对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研究进行高度关注。张宛丽副研究员说，陆学艺研究员的上书已经得到胡锦涛主席的批复，并在落实中。

我对张宛丽副研究员说：“中国不是没有好的社会学者，而是没有好的体制。希望在座的所有社会学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都能在改革的前沿做大量的具体工作。”

张宛丽副研究员说：“是的，我们有幸生在一个色彩斑斓、千姿百态、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我们将比前人看到更多的变化，但是，我们也承受着前人所没有的委屈、痛苦和挣扎。”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2：从中华民国总统府“照壁”的非法拆除，论独裁的中共必须倒掉

今天（10 月 30 日），我在南京的门户网（西祠胡同 http://www.xici.net）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小朋友在一个广场上玩，远处是中华民国总统府。

看到中华民国总统府，不禁让我神伤万分。我立即写下：

“小朋友活动的这个位置是中华民国总统府门前。这里以前有个水池和一个壁。古代，这样的门前水池叫‘照’。水池和壁，统称‘照壁’。古人认为，好的宅地风水是‘前有照，后有靠’（就是房子的前有水池、水塘，后有靠山，才是好风水。）后来，南京政府决意拆掉这个‘照壁’，要搞街头广场。当年，我组织过多次抗议活动，因为‘照壁’属于总统府民国建筑群的一部分，是受《国家文物法》的保护的。但是，最后，这个建筑还是在一个夜晚被南京政府偷偷拆了！　哎！现在小朋友看到的此总统府，非彼总统府也！”

不料，我把以上文字提交的时候，却显示“你发表的文章里有敏感字，需要管理员审核”。

呜呼，这样的文字在中共统治时期的中国都算敏感字，中共还有什么资格说“中国网络是自由的”？

温家宝先生 9 月 28 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扎卡利亚采访时说：

“中国网络是自由的。当然，为了安全，中国也和许多国家一样，对互联网进行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也是为国

家的安全和大多数人的方便。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你可以找到很多批评政府的帖子，通过读那些帖子，我们可以找出存在问题，进一步改进工作。我不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看法”。（参见《民主先声》308）

请问温家宝先生，我上述的文字被限制，难道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大多数人的方便”？

连我这样的文字都需要被审查，请问，您真的可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找到很多批评政府的帖子”吗？
连我这样的文字都需要被审查，请问，您真的可以“通过读那些帖子，找出存在问题，进一步改进工作”吗？

连我这样的文字都需要被审查，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您的制度和您的政府害怕批评的意见或看法。

最近，台海关系互动加深。

下面我来谈谈中华民国总统府的“照壁”是怎样被非法拆除的。

在谈这个问题先，容我先介绍一下中华民国总统府的“照壁”的由来和地位。

中华民国总统府位于南京长江路 292 号。耸立在“总统府”前的大照壁，原址是太平天国皇天门（凤门）。天京沦陷后，同治十一年（1871 年）重建两江总督府大门时，将大照壁作为大门的附属建筑。1929 年国民政府建总统府西式大门，改建了照壁，将其加高加宽，上建有巴洛克柱头纹饰。

大照壁总长 61.07 米，最高处达 11.28 米。照壁作为古建筑的一个形式，与“总统府”大门形成一个整体。

中华民国总统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门前大照壁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府的一部分，也应该同样受到重点保护。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1996 年(82)号文明文规定：它的保护范围南至照壁以南 10 米以内，其他三面以现存大院围墙为界。也就是说整座照壁在保护范围以内，不容许擅自拆除。

但是，2001 年 5 月 30 日，南京政府为了兴建大行宫广场和长江路拓宽工程，竟然开着大铲车撞向大照壁东侧。

奋勇的南京人民当即冲上前去保护“大照壁”。南京市民和外地游人数百人纷纷指责强拆施工人员。市民们一边站成人墙保护“大照壁”，一边打电话谴责有关部门。

最后，中国近代史博物馆项目办负责人赶到现场，制止了南京政府的强拆行为，但“大照壁”已被强拆掉约五分之一。

随后，南京人民通过网络抗议、街头抗议方式进行多渠道抗议，迫使南京政府于 2001 年 6 月 12 日决定不再拆移“大照壁”，部分被拆的照壁恢复原貌。

但是，2002 年 9 月 3 日，南京政府出尔反尔，称“出于保护历史遗迹和保证交通安全，屹立了近百年的南京总统府门前的大照壁于今晨零时 30 分拆除。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将在原址按原样重建。”

至今，被非法强拆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照壁”也没有重建。南京人民再一次被伤害了！

我想，如果我们的中国是个法制的中国，那么，中华民国总统府“照壁”也就不会被南京政府偷偷摸摸地拆掉了，因为有《国家文物保护法》。

我想，如果我们的中国是个民主的中国，那么，中华民国总统府“照壁”也就不会被南京政府偷偷摸摸地拆掉了，因为有在野党指责执政党违法行政。

为了类似中华民国总统府“照壁”这样的更多民国建筑不被非法拆除，我想，中国必须尽快建成为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3：从黄静案，再谈中共已经完全沦为资本家的帮凶和走狗

2007 年 11 月 14 日，我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里的第十五节里，说到：“2007 年 10 月 3 日，湖南江永国有有色矿的工人因不满矿长每年从股份制企业公款中私吞 260 万人民币而罢工，当日，8 名罢工工人被捕。10 月 10 日，吉林长春市 100 多名出租车司机到政府请愿，反对把个体司机纳入私人公司统一管理，以免额外缴纳大笔管理费。多人被捕。10 月 14 日，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外资电子器材公司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员工因长期接触有害物质，有数百人的健康受影响，还有人因此患癌症死亡。员工要求厂方补偿医药费被拒绝后，全厂近 2000 员工集体

罢工，并发起示威活动，多人被捕。

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会罢工的。更何况人民反对的还是做了坏事的资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资本家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制止呢？“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底是要帮工人呢，还是要帮资本家呢？”（参见《民主先声》72）

今天（10 月 31 日），我又读到一个案件，再次让我意识到中共已经完全沦为资本家的帮凶和走狗了。

这个案件是，2008 年 10 月 26 日黄静小姐决定起诉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案。案情如下：2006 年 2 月 9 日，当时还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三学生的黄静小姐花 2 万元在华硕代理商北京新人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 V6800V 笔记本电脑。

黄静小姐买回电脑的当天下午，该电脑便在运行时出现了蓝屏死机，及强行关机后再不能开机的情况。随后，几经修理，该电脑仍存在问题。最后一次修理时，华硕工程师告诉黄静，“由于等待时间过长，免费将 2.0GHz 的 CPU 升级到 2.13GHz”。

此后，黄静发现“新”电脑问题更大，开机不到一小时，机身的温度就把写字台的木头表层烫坏了。黄静通过软件检测发现，该电脑内安装的 CPU 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样品处理器，即测试版 CPU。经证实，这种 CPU 性能稳定性差，是英特尔公司明令禁止在市场销售的。

随后，黄静带着疑问来到了华硕北京产品服务中心询问。华硕的电脑维修工程师承认该 CPU 由华硕公司更换，并且可以得到华硕公司保修。

2006 年 2 月 15 日，黄静找到了华硕电脑中国业务事业群总经理许佑嘉，就工程样品 CPU 一事进行了谈判。黄静要求华硕赔偿，并提出按照华硕年营业额 0.05%进行惩罚性赔偿，数额为 500 万美元，黄静小姐希望获得这笔赔偿之后成立反欺诈基金会。

2006 年 3 月 1 日，在多次协商未果后，黄静向华硕公司宣布终止和解谈判，并准备提起诉讼。

不料，华硕公司却去海淀区公安机关报案称遭黄静小姐敲诈勒索。3 月 7 日上午，当黄静小姐再次来到华硕公司时，海淀警方出现，将黄静小姐抓捕。

随后，黄静小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送往海淀看守所羁押。

2006 年 4 月 14 日，黄静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黄静小姐在看守所度过了 10 个月后，迫于各方面压力，2006 年 12 月 26 日，检察院向黄静发出取保候审通知。黄静重见天日。

2007 年 11 月 9 日，检察院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不起诉决定书中写道：检察院认为海淀公安分局认定的黄静的犯罪(敲诈勒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决定对黄静不起诉。

2008 年 6 月 5 日，黄静的代理律师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内容为：“申请人没有犯罪事实而被错误逮捕羁押，从 2006 年 3 月 7 日至 2006 年 12 月 26 日已经被羁押 295 天，被申请人理应支付申请人赔偿金人民币 46855.62 元(295 天×158.8326 元/天)。”

2008 年 6 月 16 日，海淀检察院发给黄静《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通知书中写道，黄静采用向媒体曝光的方法，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 CPU 的事件公之于众，并与华硕公司谈判索取赔偿。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占行为，而是维权行为，不是敲诈勒索犯罪。目前，检察院正在核定具体的国家赔偿金额。

2008 年 10 月 26 日，黄静决定起诉华硕公司对华硕提出名誉侵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诬告陷害三项诉讼。

这个案件本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案件，是一起因为商品质量而引起的维权案件。

第一、消费者对出售伪劣商品的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赔偿要求，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即使认为赔偿要求不合理，也只能走民事诉讼程序。而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却诬陷黄静小姐敲诈勒索。

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眼里有“顾客”吗？

第二、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对黄静小姐的“敲诈勒索”的指控不加分析，就动用刑事拘留手段，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眼里有“群众”吗？

第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的报批材料后，又不加分析研究，就“批准逮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眼里有“人民”吗？

我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里的第十五节的最后说到：“现在，有很多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员’，

自认为几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罢工’得了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他们把持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帮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相反却与资本家穿一条裤子，或自己就充当资本家欺压人民，骂群众，压群众，而且人民想选择执政党他们也不让选，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愤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参见《民主先声》

以得出结论，中共已经彻底沦为了资本家的帮凶和走狗。

郭泉：民主先生 334：猥亵还是强奸（未遂）？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的犯罪定性

10 月 28 日晚 8 时许，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1950 年生，山东烟台人）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吃饭，席间欲去洗手间。遂向路过身边的一位 11 岁的女童询问男厕所怎么走。11 岁女童热情带路，不料，在男厕所门外，林嘉祥掐住女童的脖子，将其拖向男厕所。女童虽喉咙被掐不得喊叫，但女童奋力抗暴，最后挣脱魔爪哭奔逃走。

女童父母抓获林嘉祥后，林嘉祥叫嚣："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林嘉祥还咆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0 月 31 日下午 5 时 10 分，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瞿久刚和深圳海事局副局长王建华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王建华表示从网络获知事件后，深感震惊，并对林嘉详酒后的不当言行深表歉意，他表示，公安机关正在做进一步调查，相信在调查后会有合乎事实的结论。

王建华说，媒体和网络对事件的关注，将促进我们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管理，这个事件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

瞿久刚代表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宣布了 3 个决定：第一，由交通运输部成立调查组赴深调查；第二，在调查期间，停止林嘉祥的工作；第三，根据调查结果将进行严肃处理。

林嘉祥事件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本案件一开始只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新闻在深圳电视台播出。播出时，连记者都不知道案犯的姓名和身份。但是，新闻播出后，广大正义的网友立即通过视频搜索，立即找出了案犯的姓名和身份，即：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这次网络搜索，充分说明了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二、深圳海事局副局长王建华称此事件为"林嘉详酒后的不当言行"是完全错误的。

《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所以，醉酒不是犯罪的借口。

那么，林嘉详的行为，是"酒后的不当言行"还是"犯罪行为"呢？

本人认为，林嘉详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第三、本案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

目前面市的所有的新闻都称此事件为"林嘉祥猥亵女童"事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本人认为，本案案犯林嘉祥所犯之罪应为"强奸幼女（未遂）罪"。

我们先看看刑法是如何规定猥亵罪的：

猥亵，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实施的淫秽行为。对未成熟少年的性骚扰，即使在对象不明了意图和没有违抗乃至顺从的情况下，也可视为猥亵。严重的猥亵行为构成猥亵罪。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从重处罚。"

那么什么叫强奸（未遂）罪呢？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刑法》第二十三条第 1 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根据这一规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所呈现的犯罪停止形态。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所以，本人认为，本案案犯林嘉祥意图用掐脖子的方式将女童强行拖入男厕所实施奸淫，但被女童挣脱，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刑法》第二十三条第 1 款之规定，应定性为强奸幼女（未遂）罪。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5：感谢"天安门母亲运动"为我邮来香港市民亲手编织的围巾

今天（11 月 3 日）我接到了 10 月 22 日香港铜锣湾坚拿道西 15 号永德大厦阁楼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给我邮来的两条红白相间的手工线织围巾。围巾编号：343、346。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还随件发来一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

我们是一群追求公义、民主、自由的团体及个人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目的是为声援国内"六四"死难者家属通过法律途径向当局追讨公义。

自 2006 年，天安门母亲运动（www.tmc-hk..org）发起为期三年的"玫瑰呼唤"，争取天安门母亲和"六四"死难者家属能自由悼念自己的孩子和亲人。

去年初，我们发起"爱心围巾送暖行动"，呼吁全港市民亲手编织围巾送赠天安门母亲，透过手中"一针一线"，表达对她们的祝福和关注。

过去一年，包括团体、地区组织、教会、学校及数以百计的热心市民，加入"爱心围巾送暖"行列，表达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人道关怀。

围巾的主调为红色和白色，与天安门母亲运动中红白"64 玫瑰"互相呼应：

白色代表纯洁，即每一颗纯洁的心灵；

红色代表热血，即"六四"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为国抛头颅、洒热血。

迄今，我们已收集逾千条围巾，总长度逾一公里，成绩令人鼓舞，这反映了香港市民对天安门母亲的关怀和支持。

知悉阁下 / 阁下的家人曾参与八九民运或致力争取中国民主、人权，特送上围巾表示敬意及支持，希望您们能感受香港市民的关怀和祝福。

天安门母亲运动
contact@tmc-hk.org
2008 年 10 月

刚刚，又收到中国民主党美西党部主席郑存柱先生发给我的"六四 20 周年纪念主题曲——《一起去》"，现也发表于此。

请国内国外的民主朋友们，将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事迹和以下这首歌曲《一起去》广为传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5rYsTjmzK0

"六四 20 周年纪念主题曲——《一起去》"

注：歌曲《一起去》为了六四 20 周年而制作。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首歌，祈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了解 20 年前的那场革命和牺牲。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6：中国新民党支持重庆主城区出租汽车司机"113"总罢工

11 月 3 日早晨 6 时，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全城总罢工开始。所有出租车全部停泊在公司里、马路边或小区内。

重庆市共有 16000 辆出租车，其中主城区出租车近 9000 辆。11 月 3 日全天，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主城区未见一辆行驶的出租车。

中国新民党交通委员会和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重庆党部当日上午 10 时，向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发出了"重庆出租车司机'113'总罢工的调查报告"。

经查，出租车罢工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黑车多：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

二是罚款多：平均每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要接到 10 张罚款单。

三是运价低：起步价才 5 元。10 年前的起步价是 5 元 10 年后的起步价还是 5 元。重庆的交通拥堵情况严重，现在重庆每个区都在修路，到处都堵。堵时间长了一天都干不到成本钱。

四是收费高：承包一辆车，5 年的承包费用高达 30 万元。另外每个月还要交管理费 2000 元左右，最多交规费 4000 元

五是加气难：重庆市出租车的动力能源是天然气，但天然气供应紧张。

当日上午 11 时，中国新民党交通委员会就重庆出租车“113”总罢工事件提请中央党部讨论，决议如下：

第一、重庆出租车“113”总罢工运动是工人阶级维护劳动权利的正义斗争，中国新民党声援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运动；

第二、中国新民党四川党部和重庆党部派员调查、协助；

第三、重庆市政府必须尽快清除运管行业腐败官员，打击黑车；

第四、取消出租车皮包公司（重庆的运输公司、出租车公司多数为皮包公司，即自己没有车，公司的车都是个人买得，然后挂在出租公司名下。出租车名义上归公司所有，但出租车每月缴纳挂靠费。但这个挂靠费多到让出租车几乎无利润）；

第五、退还驾驶员的押金；

第六、适当提高出租车起步价；

第七、增加出租车加油、加气站点；

第八、限制私车购买。重庆号称“桥都”，街道窄，路复杂，城市汽车饱和量不得突破。

第九、提高驾驶员福利，三险一金要代缴。

第十、重庆出租车“113”总罢工事件是工人阶级自发的劳资纠纷，而非由黑恶势力“领导”。中共的专政工具（警察、军队等）不得残害工人阶级。

郭泉：民主先声 337：中共和我们，到底谁才是精神病？

今天（11 月 3 日），我的老朋友宋翔峰先生发给我一个短信。宋翔峰先生是中国幸福社会党临时党主席，他的短信全文如下：

今天中午，中共国安逼迫我去作精神病鉴定。看来他们是想将我定性为精神病患者，然后再对我加以迫害了。

我是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民主的人，希望中共能够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将政治权力和平移交给全中国人民。可中共对我们的和平诉求却视之如敌，欲杀之而后快！

湖北荆州　宋翔峰　2008 年 11 月 3 日

今天我想来和大家谈几个问题，都是关于精神病的。

首先，中共的独裁者认为我们所有搞民主的人都有精神病。他们认为我们“不正常”，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些明知道枪炮在中共手里，却仍然要求“终结独裁专制、实现多党竞选”的人“很傻很幼稚”，于是，中共的独裁分子及其走狗特务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认为我们民主人士有“精神病”。当然，我们被中共特务称为“政治精神病人”。

例如，在过去的 20 年中，在中国精神病院中有超过 3 千例“政治精神病人”。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被系统化地送进精神病院，是中共特务的例行工作之一。

国际人权组织曾经有一个长达 298 页的报告，虽然这 20 年被世人公认是中国的改革时期，但是，以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院依然是一种对中国人民常用的思想钳制手段。

中国的官方精神病医师将属于特定范畴的异议人士判定为“危险型精神失常”，这些人被送进特殊的治疗中心，接受长期治疗。

被确定为“政治精神病人”的民主人士，在精神病院时刻遭到虐待，使用的手段包括电击生殖器和随时的拳脚棍棒的殴打。

所有共党独裁国家，都有大量的“政治精神病人”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前苏联、朝鲜都曾经关押过成百上千的“政治精神病人”，但是，他们都比不上中共在这方面工作的细致和残酷。

不过，就在中共认为我们这些搞民主的人是“精神病”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些搞民主的人，也认为所有搞独裁的人都是精神病。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 21 世纪还渴望并乐此不疲地搞独裁的人，如果不是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他是什么病呢？

下面，我们来谈谈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吧。

2004 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先生在北京表示，目前中国各类精神病的患病率已达千分之十三点四七，共有精神病患者 1600 万人。 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约 780 多万人。

精神障碍所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已超过心脑血管、糖尿病及恶性肿瘤等疾患。

而全中国只有各种精神病防治、康复及收容机构 575 个，床位 11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约有 7.7 万，专科医生 1.3 万。

另外，中国目前精神病患者以每年 38%的速度在增长。2004 年我国公布的精神病患者人数为 1600 万人，以后的四年里，中国一直不敢再公布人数。有数据显示，近四年来，社会矛盾激化，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已经超过 3000 万。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得精神病？

人类得精神病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生理疾病原因，如遗传、脑外伤和脑部细菌感染等；二是社会原因，即人类情感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如爱情和官司等。

由于第一个原因属于生理疾病，这并不是我们民主人士关注的重点，我们就留给医生去做了。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社会原因，即人类情感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社会原因里的人类情感问题，也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因为，爱情的美丽和痛苦都在于“爱的对象”的唯一性。当一个人确定并“非他不嫁”或“非她不娶”了一个“爱的对象”后，如果这个“爱的对象”失落，那么这个人得精神病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由于爱情这个特性的普世性，所以，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因为爱情的失落而得精神病的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她）不想突破这个唯一性。如果他（她）换一个人做“爱的对象”，那么，他（她）也就不可能得精神病了。

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精神病的根本原因也是如此。如果，人们虽然受到某一种来自特定社会制度的迫害，但是可以找到投诉的渠道并通过这个渠道加以纠正或复仇的话，那么，受到迫害的人们是不会得精神病的。

但是如果人们受到某一种来自特定社会制度的迫害，但是却走遍中国也找不到投诉的渠道，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受迫害，而加害者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十分幸福美满，我想，所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都会得精神病的。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这就是中国每分钟就会产生两名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根本原因。

附件一：中国幸福社会党公告

本党奉行党是全体中国幸福社会党党员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党，在内部组织结构上是强调内部组织高度民主性的党。任何加入本党的人均享有绝对的党内领导者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个人意见表达权，个人正当人格体现权和受尊重权，党组活动自由参与权，自由退党和退党后重新申请入党权。党内允许任何党员保留个人不同政治观点，党的主要政策都由所有党员自由讨论后，以最终多数通过为原则。

鉴于当今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国家急需民主体制的建立以满足全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幸福生活日益渴望的需求因素，本党需志同道合者和社会明义人士的加入。以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并在国家实现民主多党制之后能够行使下列之作用：

一、 在政府过渡期间保证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全有保障。

二、 与国内其它政党在尽量短的时期内共同完成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民意竞选工作和民主政府的建立。

三、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辅助完成新国家的法制建设。

四、 对于在中共时期犯有严重贪污、腐败、渎职的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给予全面严厉打击，还民以公道。并建立新的廉政机制和监督机制，调整政府机构体系，以使得政府能够持继性地成为清廉、高效、受雇于和服务于民众的政府。

五、 对于在中共时期对人民、对社会犯下严重罪行的犯罪份子给予彻底地法律惩处，还民以正义。并革新国家法律法规，以确保社会的安全，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有保障。

六、 对于在中共时期优秀的、正直的、对人民未犯有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给予保护，使其免受政治性迫害。

七、 整顿国家经济，建设公平、健康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平衡社会经济利益分配，构建国家良性经济循环链。

八、 全面实施本党思想理念和方针政策。

希望认同本党思想的广大同胞勇敢的加入本党，不要害怕。在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本党所有行为会保持在一种理性状态。

本党的行为是有战略性的，希望大家理解本党苦心，不要以观望、自保、一再容忍的心态面对现实社会。要相信自已，相信自已的力量，只有大家勇于加入本党，形成巨大的团体力量，本党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国家，改变大家的生活。

凡年满 18 周岁，并认同本党思想，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均可加入本党。

附件二：中国幸福社会党临时党主席：宋翔峰先生 手机：13627166780 QQ：535767450 skype：jz36915816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8：从美国人恶搞奥巴马，看美国人眼里的中国

今天（11 月 4 日）一早，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就给我发来了一封题为“奥巴马退出总统竞选的声明”的信件。

这让我大吃一惊！

奥巴马 1961 年生于美国夏威夷，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白人。他先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96 年首次当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2004 年当选国会参议员，成为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五位、本届国会中惟一一位黑人参议员。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若是奥巴马入主白宫，将是数百年来对抗种族主义的一场胜利，在过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明天，美国就要正式选举总统投票了，但是，今天我却看到了“奥巴马退出总统竞选的声明”，这实在让我匪夷所思。因为，如果奥巴马退出总统竞选，那么美国的下一届总统事实上就已经有了结果了，不需要再忙活了。

不料，当我看到这份“奥巴马退出总统竞选的声明”的副标题的时候，我笑开了花，副标题是这样的：“请美国为我祝福，因为我要去竞选中国深圳海事局长”。

于是，我知道了，这是美国人在恶搞奥巴马，但是，读完全文，我又知道了，与其说是美国人在恶搞奥巴马，不如说是美国人在奚落和揭露中共的独裁罪恶。

现在把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发表如下，请大家在笑读之后，思考中国、思考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中国必须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否则，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下文中的中国。

全文如下：奥巴马退出总统竞选的声明

尊敬的美利坚选举委员会、迪恩主席（民主党）、麦肯恩参议员、参众两院议员们、亲爱的米歇尔、全美公民们：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现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决定退出这场选举。

公民们，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你们真切的希望我能带领你们，带领美国走出现在的布什低谷，希望我为你们带来更加自由和富裕的美国。请你们相信直到现在这一刻，你们的愿望仍然是我的信念，从未动摇。

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将离开这场选举，你们可以骂我是逃兵、懦夫。是的，你们可以——但是要在我讲完之后。

我知道，只要我稍微坚持一下，我可以轻松当选为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物。

可我还是选择放弃，公民们！

我们国家民主价值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自由，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们选择我而不是麦肯恩是因为我更加优秀，对吗？

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比总统更加吸引我的职位，这个职位的魅力之大，足以使我有勇气承担失去总统职位的代价。

这个职位就是我决定要应聘的中国深圳市的海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和纪检书记的宝座！！

安静！请安静，女士们！我理解你们的震惊，可是听我说。

你们都知道，严格意义上，我是肯尼亚人，感谢上帝没让我生活在非洲。我的祖辈和父辈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为了什么？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为了自由！

为了可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

为了可以选择信仰上帝的自由！

为了免于匮乏不再忍饥挨饿的自由！

为了避免恐惧的自由！

自由是我们每个美国人崇尚的最核心的价值，ME TOO!

所以，我不能容许我的任何自由遭到践踏，可我发现我已经承受了很多的不自由，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发现一旦我顺利进入白宫（这几乎是肯定的），我会被剥夺更多的自由。你们知道吗？我的父辈从非洲看到的自由的美利坚

如同天堂一般美丽，因为她是自由的，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从肯尼亚飘洋过海。
而现在，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天堂，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迷人的国度。所以我和米歇尔毅然决定再一次飘洋过海，正如这个国家的谚语所说：良禽择木而栖。我再次提醒，我来自非洲。与已经去世的小肯尼迪参议员不同，我没有显赫的家世，这意味着我很在乎免于匮乏的自由。我承认我现在的确衣食无忧，可绝不是富裕。

作为参议员的薪水收入一直是几乎我所有的收入来源，你们都知道参议员的年薪仅仅是不超过二十万美元，事实上，在二零零四年之前，我和米歇尔全部收入都没有超过三十万美元。零六年好一些，超过一百万，可那是因为我出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书。我只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所以我不可能永远发这种意外的横财。

对，女士，你说的没错，如果我住进白宫，收入的确会提高。可是，布什总统的年薪也不过是 40 万美元。的确，这在美国算是中等收入，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谁会拒绝金钱和财富呢？知道吗？在那个我即将踏上的美丽国度——中国，好多和我同等地位，甚至更多地位与我远不能比的官员的收入是我远不能比的！

例如，中国延吉市市长车钟日先生的非工资收入即可达两千万之巨、中国的最高法院副院长的非工资收入竟然搞到了几个亿。他们的孩子在美国的消费连我都感到瞠目结舌。而中国人民的月平均工资只有 2 千元不到。

当然，中国的官员从来都不会上中国年薪收入排行榜，因为，这一切都不为人知。我之所以能知道，是因为这些官员得罪了更高层的官员。如果上下沆瀣一气，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非工资收入能达到多少。据中国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国有银行的支行行长上榜收入即可达 40 亿。

先生们！女士们！每次参议院组织到中国公务游我都不愿参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国度的东方美食，而是我不愿在该国同僚面前寒酸到汗颜！

哦，布隆伯格先生也在座，您知道吗？中国的类似纽约级的城市市长的非工资收入有三亿人民币，而这位先生不用选举就可以安居市长高位（含副职）达十数年之久。请问布隆伯格先生，您觉得天天坐地铁上班有意思吗？您还不想和我一起跳槽到中国去吗？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反正我知道，比尔・克林顿先生就很想。

当然，作为潜在的规则，我不想对我热爱的中国同僚的收入状况做更多的评论，毕竟我也要成为他们中幸福的一员了。

说起比尔・克林顿先生，我们都知道关于他的一点传闻，诸如琼斯、莱文斯基、实习生，椭圆办公室、雪茄……因为斯塔尔的关系，这些本来愉悦的回忆都让他的总统生涯变得令人难堪。这也是比尔・克林顿先生决定和我一起到中国谋职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国还有另一种独具特色的迷人的自由。以那位三亿市长为例，这位先生还曾自由的拥有十一位实习生，当然他也不需要寒酸到在办公室实习，因为有一座龙柏行宫。当然他与邻省的一位厅级同僚相比就差的太远，这位先生自己记录的实习生就有 140 人——比尔・克林顿先生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哭了！同样为人民服务，做官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上帝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自由啊！与这种幸福相比，不要说我只是候选总统，就是现任总统又怎样？

还记得去年的龙卷风吗？那场飓风不只是卷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家园，也卷给布什总统劈天盖地的臭骂，只是因为他反应迟钝了些——其实我们理解他的智商的。如果是在那个美丽的国度，我们假设铁路撞死了几百个人，那边的部长不仅不会被撤职，甚至道歉都不用。当然，只需要搞定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就可以了。

这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发挥到极致的自由，官员们无需害怕，别说人身伤害，就连声音伤害都听不到。因为中国的官员拥有控制新闻舆论的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官员们除了和我们普通民众拥有同等的言论自由外，还拥有另外的一种伟大的自由：免于唾骂的自由。

不要说报纸电台，哪怕是网络都会自动的删除掉一切让你不舒服的字眼，一片宁静一片河蟹。

反观我们，从州长到州议员，国会议员，各部长，有谁没有被骂过白痴的请举手？

哦，布什总统举手了，抱歉，你已经被骂傻了，不算数。

哦，上帝，感谢您给了我们人类一个美好的国家——中国，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不，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需要上帝了！

我不再需要信仰上帝，因为中国的人民币，中国的实习生，中国的河蟹（中国人发明的伟大的词语，意思是“和谐”），就是我的上帝！

我即将出任的职位将非常令人羡慕，至少可以象我的前任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先生那样掐住 11 岁美妙女童的脖子，将其拖向男厕所。

当然，如果我不小心被女童挣脱，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如果有人不要钱，要问我是谁，那么我就告诉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请问，美利坚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先生女士们、迪恩主席、麦肯恩参议员、参众两院议员们、亲爱的米歇尔、全美公民们，这么英雄的话语，美国总统敢讲吗？

你们谁敢对美国人民说？谁敢？请站出来！

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人敢对美国人民说这句话而被免于处罚的话，我就不跳槽到中国，而坚定地和美国人民在一起，为美国人民服务，做美国人民的总统了！

没人敢了吧！那好，我要离开美国，去中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权力去了。请不要挽留我，请给我跳槽的自由，谢谢大家！最后，如果明天的美国报纸想发表我的"退出总统竞选的声明"，请别忘了加上一个副标题："请美国为我祝福，因为我要去竞选中国深圳海事局长"

永远爱你们的巴里·奥巴马

备注：本文发表后，网友亮剑(728440745) 发来读后感，他说：

"你们算个屁！"林书记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几千年的一个不变的现实：在当权者眼里，人民永远算个屁。

曾几何时，中国的老百姓在遇到冤屈的时候一直在希望着一个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为自己做主。人民从来不希望自己能够做主，人民把自己的利益的维护寄托在某个所谓清官的身上。在这样的一种心态的作用下，类似林书记的当权者，身居高位，掌握着亿万小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眼里的老百姓不就是个屁吗？

在民主的制度下，布什打死也说不出"美国的选民是个屁吗？"

奥巴马脑子发热也说不出"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啊"。

民主制度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当权者能够当权的决定权在民众，所有想竞选官职的人都会把选民（普通民众）当成上帝，他们不敢得罪民众，竭力去讨好民众。

没有民主，人民永远算个屁！以前是，今后还是！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39：美国人的选票和中国人的屁

明天（11 月 5 日），美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投票了。

每四年的这个时候，我眼巴巴地守着电视或电脑，看着美国人民拿着自己的选票到各地的投票站投票选择自己喜欢的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我心里的滋味真不好受。

最后，看到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总是一边流泪水，一边咽口水。

流眼泪是因为，这么好的制度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咽口水也是因为这么好的制度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2007 年 11 月 14 日，我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里说到："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当时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后在发表这封公开信后被开除）以及其他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参见《民主先声》72）

这封公开信的第二节标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这节里，我说：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就象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产生出一个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党。民主有一支看得见的手，一支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选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

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

这封公开信的第三节标题是“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这节里，我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而事实上，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这封公开信的第四节标题是“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这节里，我说：“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专制国家不允许政党竞争执政党地位。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党都可以竞选执政党，只要他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封公开信的第五节标题是“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这节里，我说：“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想大家读到我的这封公开信的第五节，一定想到了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所说的几句话了吧。

林嘉祥在掐住 11 岁女童的脖子，将其拖向男厕所，被女童挣脱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当林嘉祥遭到孩子父母的斥问的时候，林嘉祥更是语出惊人，他咆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你们算个屁！”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共执政 60 年来的一个大实话：在独裁的中共眼里，中国人民什么也不算，中国人民算个屁。中国人民把一切财产都交给中国共产党“共产”之后，还应该把自己的女儿也老老实实地交给中共“干”。这样或许能得到中共的一些好处。例如林嘉祥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如果中国人民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中共“干”，那么中共就会说：“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为什么中国人民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就是因为中国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没有可以选择执政党的选票。

曾几何时，中国的老百姓在遇到冤屈的时候一直在希望着一个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为自己做主。中国人民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欺骗认为“明主”比民主好。

不，如果中国人民继续持有这个思想，而不希望自己能够选择执政党，类似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这样的中共独裁者，身居高位，掌握着亿万小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眼里的老百姓不就是个屁吗？

我们在电视里，在网络上，看到美国总统侯选人的竞选演说，布什敢说“美国的选民是个屁吗？”

奥巴马敢说“你们这些美国选民算个屁啊”？

但是，中共的官员就敢！

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告诉大家，这就是因为中国人民手里没有选择执政党的选票！

民主制度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各政党竞选执政党，其实，这个竞选过程就是各政党竞相取悦于民的一个承诺过程。人民评判各政党的承诺及其兑现的可能性，最后用手里的选票选择出一个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来做公仆。

所有想竞选官职的人都会把选民（普通民众）当成上帝，他们不敢得罪民众，并竭力去讨好民众。

只有当手里有了可以选择执政党的选票以后，中国人民在执政党眼里才不是屁！

郭泉：民主先声 340 祝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大纪元 11 月 6 日讯】今天，11 月 5 日，我看了一上午的美国总统大选直播节目，感觉我比美国人还要激动。最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先生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美国总统，这让我和我身边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多党竞选”这一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的伟大和光荣。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大选中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从而当选为美国第 44 任、第 56 届总统。他的当选使民主党人夺回了已失去 8 年之久的总统宝座。根据投票结果，奥巴马赢得 324 张选举人票，远远超过当选总统所需要的 270 张票。

在今天的投票中，奥巴马赢得了宾西法尼亚、俄亥俄、纽约、佛罗里达、威斯康辛和密执根等重要关键州。麦凯恩夺得肯塔基、阿肯色、阿拉巴马州和德克萨斯州。

今天美国各地千百万美国人到美国各地的投票站投票。在美国各地的投票站开门时，选民排起了长队，选择一位新总统。

现年 47 岁的奥巴马在竞选中，主张将资本利得和股利税由 15％调高至 20％，年收入超过 25 万美元的家庭，以及年收入超过 20 万美元的个人，应提高课税；向石油和天然气业者课征暴利税；劳工阶级和年收入低于 75,000 美元者应减税。拯救房市方面，奥巴马主张成立 100 亿美元基金，协助缴不出房贷而房屋可能被查封的民众；要求接受政府纾困的金融机构，让房屋遭法拍但已尽力偿债的屋主，有 90 天的宽限期。就业方面，奥巴马主张在 2011 年前最低时薪提高至 9.5 美元，并将随通膨而变动；企业每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即可享有 3,000 美元免税两年；失业保险金暂停课税；鼓励筹组工会。

奥巴马获得大选胜利，并不只是百年来美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胜利，而更主要的是对美国人民的承诺获得了美国人民的选票。现在，奥巴马赢得了大选，以后的四年，就是奥巴马向美国人民兑现他的承诺的时候了。如果，下面的四年，奥巴马没有兑现他在竞选的时候的承诺，那么四年后，他就必须从白宫里搬出来，并受到美国人民的唾骂。这就是伟大的民主制度！

这个伟大的民主制度，不应只由美国人民、台湾人民和其他民主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享受，14 亿中国人民也理应享受到这一人类共有的宝贵政治财富。

我不知道深居在中南海长达六十年之久的中共官员看到这个现场直播会作何想法，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中国人都很渴望在中国也可以进行多党竞选。

中国新民党认为民主就是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长期以来，中国新民党一直致力于告诉人民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民主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民主就是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

现在，中国新民党敢于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政党竞选中国总统，那么，中国共产党敢与中国新民党和其他政党竞选中国总统吗？(http://www.dajiyuan.com)

郭泉：民主先声 341：中国新民党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

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上过中国共产党两次大当。这两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大当，最后迫使中国国民党被驱逐出大陆。

今天下午（11 月 6 日）4 点半到 5 点半，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进行赴台最重要的行程之一，即与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会面。目前，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已经敲定，时间是今天下午 4 点半到 5 点半，预计进行一个小时的对谈，地点在台北宾馆。

有足够多的情报显示，中国国民党将第三次上中国共产党的当。而这个第三次当的结果就是，中国国民党将被驱逐出台湾岛。

下面，中国新民党公布，中国国民党前两次所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当的资料，当然，中国共产党称其为“两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欺骗中国国民党是 1924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 1922 年 6 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中共在文件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由是可知，中共认为联合中国国民党其实是发动共产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的运用。

1922 年 8 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一思路来自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他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经验"，马林还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挖心"阴谋，而非合作。

1924 年中国国民党上当。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欺骗中国国民党获得成功。

其实，孙中山先生对此也是有所警觉的。他明确规定：所有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国国民党的本党主义和纪律"。

但是，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次置若罔闻。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目标。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

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一场"挖心战术"而已。

1927 年国民党为纯洁队伍，实行"整理党务"案，将中国国民党里的中共党员清理出去。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欺骗中国国民党是 1937 年至 1945 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 8 月 1 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动。

后中共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失败，逃至陕北 30 万红军仅存 2 万不足之时，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此，中国国民党很清醒地认为是中共之目的根本不是抗日，而是为了不被剿灭，然后在伺机颠覆中华民国。于是，中国国民党断然拒绝，并派张学良部挺进西北，剿灭中共残部。

于是中共一边屡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事变，企图乱中求存。

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把中共的残余部队收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所以，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那么，中共在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后，做了什么呢？我给中国国民党几个中共的资料看看：

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

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59 年 7 月 31 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 182 页）

1959 年 8 月 17 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 260 页）

写到此，我想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要说的是，中国新民党有责任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因为，前两次当，你们已经被赶到了台湾；这第三次当，我想你们一定会被赶下大海！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42:1945 年毛泽东的答记者问

成文日期：2008-11-07 16:18:30 更新日期：2008-11-07 16:18:30 点击:3438

原题目：中国共产党在背离人民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今天（11 月 7 日）早上，我在整理中共 1945 年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我找到了一份 1945 年 9 月 27 日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这张报纸里有一篇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的书面问答稿。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请毛泽东书面答复的问题有十二个，其中，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这篇文章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共要么在 1945 年忽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要么中共在 1945 年后背离了中共自己承诺要走的道路。

审查现在中共正在走的道路，我们会发现，无论中共当时是忽悠人民还是初衷良好，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共在背离人民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下面我将中共在 1945 年 9 月 27 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思考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已经反思中共对人民的欺骗和反动。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中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答复。问题与答复如下：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止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你们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 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 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各剩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 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 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政党拥有军队么？

答：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 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

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 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我想，读完这篇文章的朋友，都会掩卷长叹或掩卷长笑的！

目前的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了一党独裁，反对多党竞选；在经济上实行了权贵资本家垄断，造成两级分化；在民族地区反对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造成民族矛盾；在军队问题上，推行"党指挥枪"，反对军队国家化。

中国共产党在背离人民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这也很好，中共在这条不归路走的越远，离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爆发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原题目：郭泉：民主先声 342：中国共产党在背离人民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郭泉：民主先声 343："你们共产党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今天（11 月 7 日）上午，被各大媒体誉为"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的药品打假专业人士高敬德先生在南京和我见面。他提交了一些证据和资料，请我妥善保存。

高敬德先生曾在 9 月 24 日下午 3 点半来南京看望我，被南京"国保"警察当场中断了我们的会见，并带走了他，几小时后才"释放"。（参见《民主先声》301）

昨天（6 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高敬德先生打假药的长篇报道，今天（11 月 7 日）新华社的《现代快报》也发表了一篇关于高敬德先生打假药的长篇报道。

但是，今天，高敬德先生来见我是为了向我反映一个情况。

2008 年 9 月 11 日，高敬德先生以"咳嗽待查" （暗访）的名义住进了南京大学医院。住院的当天下午就发现一位老太太开的"洛赛克"是假药。同时医院也发现了高先生的住院目的是打假药。

就在高敬德先生通过病房医生开"洛赛克"的时候，院方来人告诉高敬德先生医院没有这个药，要高敬德先生回病房。14 号，高敬德先生吃完饭回来，医院把铁门关上，不让高敬德先生进。医院办公室主任对高敬德先生说："快点走，不然打断你的腿。"随后，一个保安朝高敬德先生撞过来，说你没长眼睛啊，然后朝高敬德先生鼻子挥上一拳，按倒在地抢了高敬德先生的手机和 1200 元现金。随后包括医院的 5 个保安都上来打高先生，当时在场的 110 民警先是无动于衷，后故意避开。

高先生被打晕，清醒后发现身体半边不能动，周围的群众纷纷指责警察袖手旁观。最后警察只得打了 120 喊救护车。高先生被送到了鼓楼医院，但因南大医院与鼓楼医院串通，高先生在鼓楼医院无人理睬。19 日，高先生去了玄武医院，CT 影像显示鼻部骨折，额头有积液，之后又检出小便有红血球，肾损伤。后，高先生入住脑科医院，经磁共振检出：外伤性脑梗死，脑挫裂伤。

但没几天脑科医院对高先生说派出所来人说公安厅发了通告，说高先生以打假药为名招摇撞骗，要立即驱逐高先生出院。此时，中国青年报记者蒋昕捷正在采访高先生。脑科医院保卫处长把这个通告出示给蒋昕捷记者和高先生。后，江苏省公安厅否认曾发过这个通告。

（高敬德先生的手机号：13913873054；蒋昕捷记者的手机号：13581901035）

现高先生要求警察立案侦察殴打高先生并抢钱物的犯罪行为，并要求上级部门追究派出所领导、警察张牧、余兵两人的不作为责任。

但是，江苏省公安厅至今不予立案，也没人给高先生一个说法。

相反，高先生却得到了药监局的一个说法，药监局的官员对高先生说："只要你不再在南京打假，我们愿意每月给你几百元生活费。"

听到高先生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不禁笑起来。

高先生说，警察对他讲："不要把中国假药泛滥的情况告诉外国记者，否则就定你个里通外国罪"。

我笑的直不起腰来。我说，所有外国记者采访高先生都是我安排的，警察和特务要是不开心，那就来抓我好了。

再说，中国的刑法里根本就没有“里通外国罪”，没想到中国的警察特务竟然法盲到如此田地。另外，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刚刚签署了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有关规定，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外国记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事情采访任何一个中国人”，看来中国警察特务认为中国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算个屁啊！”

高先生还说，警察对他说；“不要和郭泉接触，他是个危险人物。他搞维权搞民主没有好下场，你看，我们已经让他不能上课了。他现在连清洁工都不如。”高先生对警察说：“上不上课这不能影响郭泉教授什么。郭教授是什么人，我们比你们清楚！”

我又开心地笑起来。这些警察和特务真的弱智到家了，你们想一想，我现在的“课堂”和我以前做教授的时候的课堂哪个大呢？你们再想一想，做“民主先生”和大学教授，我会选择什么呢？

别说警察特务不让我上课，就是现在立即把我从南京师范大学开除，我也毫不在乎；

别说把我从南京师范大学开除，就是把我投入监狱，我也毫不在乎；

别说把我投入监狱，就是把我害死，我也毫不在乎；

别说把我害死，就是把我全家害死，我也毫不在乎。

我活着，带领一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与独裁专制斗争，我死了，也会带领一切被共产党害死的中国人的冤魂与独裁者斗争。

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掐住 11 岁女童的脖子拖向男厕所，被女童父母抓获后，林嘉祥叫嚣：“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中国人民对林嘉祥的回答是：“你们林嘉祥们算个屁呀！敢跟人民斗，看人民怎么收拾你们！”

而我要说的是：“你们共产党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备注：

10 月 28 日晚 8 时许，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1950 年生，山东烟台人）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吃饭，席间欲去洗手间。遂向路过身边的一位 11 岁的女童询问男厕所怎么走。11 岁女童热情带路，不料，在男厕所门外，林嘉祥掐住女童的脖子，将其拖向男厕所。女童虽喉咙被掐不得喊叫，但女童奋力抗暴，最后挣脱魔爪哭奔逃走。

女童父母抓获林嘉祥后，林嘉祥叫嚣：“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林嘉祥还咆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44：“第 537 号国务院令”颁布，东京新闻小坂井先生“以身试法”成功

2008 年 10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签发第 537 号国务院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已经 2008 年 10 月 17 日国务院第 31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0 月 17 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的核心精神是：

只要不违法，并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就任何话题采访任何人。 当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举行中外记者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做出说明并回答记者提问。

根据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刘建超强调：

第一、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

方外事部门申请等。
第二、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在中国，不会有人因为正常发表言论而受到干涉和干预。
第三、中国不要指望国外媒体只报道中国好的、进步的和发展的一面，也要承受国外媒体报道一些中国不愿意被报道的问题。
第四、中国不会干预一个中国公民接受国外记者采访的决定过程，不管他是商人，学者，专家，还是政府官员，是否接受国外记者采访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决定。
虽然，在第 537 号国务院令颁布前，国外媒体对我的电话采访和网络采访从来没有断过，但是，中国政府对国外媒体来南京和我见面采访却是高度警惕并竭力阻止的。 例如 2008 年 1 月 4 日，日本的三大新闻社之一的“东京新闻•中日新闻”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来南京采访我。虽然他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拦，但是十多名中国警察在周围监视。采访还没结束，我就被特务带到学校保卫处。中共南师大党办主任刘旺洪对我说，学校有规定，学校里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我说：第一、我知道有这个学校规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否合法？ 第二、我谈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也不代表南师大。我谈的所有话语都和南师大无关。和南师大有关的话题，我想境外媒体也不会找我了解。第三、我的观点我选择告诉什么媒体，这完全是我的自由。如果您说我违反了南师大的规定，那好，您就开除我吧。
中共南师大党办主任刘旺洪楞了一会儿，喃喃地说：“适当的时候，会开除你的。”
离开保卫处，我立即给小坂井先生电话询问他是否安全。他说：一切安全，没有警察骚扰。于是，我笑起来。原来，中国警察只敢骚扰中国人，不敢骚扰日本人。
那天我回到家写了一篇《民主先声》，题目是《民主先声 96：中国必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必须包括采访的自由和被采访的自由》，可供大家参考。 再举一个例子：7 月中旬，国际金融时报（英国）的记者给我电话，请我在 7 月 24 日在南京等待接受采访。不料，我 7 月 22 日就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7 月 23 日又被告知“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7 月 24 日下午，我家楼下的中共警察比我家小区的狗都多。最后，国际金融时报的记者无功而返，怏怏不快地坐夜航飞机飞回北京。而我得知，中共政府承诺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只要不违反法律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中国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中共政府一方面承诺外国记者“两个任何”，另一方面又阻止我接受采访。（参见《民主先声》252、308）
昨天（11 月 7 日）下午三时，“东京新闻•中日新闻”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再次来南京采访我。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颁布后第一位国外记者来南京“以身试法”。
我们在南京的上海路的长春藤（茶）咖啡馆喝茶。南京的上海路长春藤（茶）咖啡馆是我的民主茶馆。我在这家茶馆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也在这里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维权和民运领袖。上海路上的长春藤（茶）咖啡馆有两个分店，分别在上海路的 87 号和 100 号，是街对面。我以前经常在下午 4 点去喝茶或咖啡。别人经常说“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而我却是“我不在 87 号就在 100 号”。不过现在事情多了，就无法定时去喝茶和咖啡了。
小坂井先生是吸烟的，桌上放着日本七星。我立即拿出我最喜欢的中国烟“大丰收”。我说，到中国来见我，应该抽中国烟。
小坂井先生并没有实际的采访提纲，他显然只是来“以身试法”的。

他凝视了我好一会儿，说：“看来，您过得不错！您胖了！”
我笑着说，“是啊，中共在前进，虽然他们不是自愿的！”
小坂井先生说：“那么，中共对您和您的党完全不问了吗？”
我拿过他放在的桌上的笔，作了一个持刀状。说：“不，他们一直手握尖刀，等待命令刺杀我们，但是，下命令的人现在要比持刀的人沉着和智慧得多！”
小坂井先生说；“噢，我明白了。另外，东京大学一名副教授想做您和中国新民党的专题研究，您同意吗？
我说：“当然同意。美国南卡一所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已经开始做有关中国新民党的传播策略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了，他已经得到了他的导师的肯定和支持。”
说实在的，我很清楚日本人在想什么。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在礼仪上输给别人。奥巴马这次决意竞选美国总统，日本的一个发音类似“奥巴马”的小镇从开始到最后都欣喜若狂，仿佛奥巴马是从这个日本小镇“北漂”美国的居民。在奥巴马当选之后，这个小镇的镇长又立即发出邀请，请奥巴马有空来小镇坐坐。但是，韩国这次就很“抓瞎”，直到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韩国才发现整个韩国在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与奥巴马有过任何接触。
我想，对我和中国新民党，日本人的想法也是如此！
送走小坂井先生之后，我想，中共已经在开始做开放“报禁”的事情了，只不过现在开的是“外报禁”。 “外报禁”一开，“内报禁”也就不远了。关于内外两种“报禁”，请参见《民主先声》262。“内报禁”一开，开放“党禁”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在南京的上海路长春藤（茶）咖啡馆请所有采访过我的海外记者喝茶，他们是：美国之音VOA记者黎堡先生、美国纽约的New Republic周刊记者Mara（汉名：马语琴）；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严修先生、何平先生、张敏女士、丁小女士；伦敦BBC记者傅东飞先生；英国第一 24 小时新闻频道天空新闻的亚洲制片总监Eve Johnson女士（汉名韩莺）、驻亚洲记者Peter Sharp先生（汉名夏锐）和摄影师Andy Portch先生（汉名安都）；英国《金融时报》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法国《巴黎人日报》记者Emilie Torgemen（汉名：陶莉莉）；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的支局长渡边昭和先生；“东京新闻•中日新闻”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每日新闻社（日本）上海支局记者大谷麻由美女士；韩国KBS记者金大宏先生；新唐人电视台記者林慧心女士、李馨女士、熊斌女士、秦越女士；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方亮先生、天慧女士；大记元记者辛菲女士；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宪宏先生；等等，以及很多我不知姓名的海外媒体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另外，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女士经常在网上和我聊天，我欠她一瓶酒，我想，“第 537 号国务院令”颁布后，她可以到南京让我完成这个心愿了。
南京的哪家酒吧好些呢？
恩，这我要先调查一下。或许，就在路边，坐下来，点一盘金陵盐水鸭，再要一碟南京老卤干，两瓶“二锅头”，两包“大丰收”，这都是我喜欢的，然后，谈天说地，真得很爽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民主先声 345：台湾人民和台湾的民主政党应高度警惕中国国民党复辟独裁

成文日期：2008-12-13 22:01:26　　更新日期：2008-12-13 22:01:26　点击:2637

11 月 6 日，我发表了题为《中国新民党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的文章。文章在列举了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上过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当之后，指出"这两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大当，最后迫使中国国民党被驱逐出大陆"。

文章的最后，我说，"中国新民党有责任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因为，前两次当，你们已经被赶到了台湾；这第三次当，我想你们一定会被赶下大海！"（参见《民主先声》341）

《民主先声》341 发表后，得到了很多海内外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却是更多台湾朋友并没有我这样的担忧，他们担忧的是中国国民党会和中国共产党联手，把台湾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赶下大海。

例如，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警察为了不让大陆官员陈云林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感到不舒服，就驱逐了所有持中华民国国旗抗议的台湾人，警察甚至还撕拦抗议者手里的中华民国国旗。

于是，台湾的李文芳女士给我信函说："郭泉先生好！國民黨這回不會被趕下海，他們也要做可以濫殺人民、權利無限的惡黨！"

最近，有个事情让我很警惕。

日前，一个自称是"泛蓝联盟"的人咄咄逼人的对我说："你赞同三民主义吗？"

我说："是的，民族、民权、民生，我赞同。"

他又问："你赞同三民主义统治中国吗？"

我说："我研究过三民主义，我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所以，我也赞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再问："那你赞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训政吗？"

这就开始让我高度警惕了。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

北 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一党独裁）。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 1945 年战争结束。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回向"训政"。后内战爆发。49 年，中国国民党败往台湾。 继续执行了数十年"训政"后，在台湾人民的不断抗争下，中国国民党 1990 年 5 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多党竞选）。

但是，这位自称"泛蓝联盟"的人却希望中国国民党继续在大陆"训政"（一党独裁），而"泛蓝联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亲国民党的组织，所以，这个人对我发出的"信号"是很值得警惕的。

台湾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民主宪政"得来不易，台湾人民和台湾的民主政党理应高度警惕中国国民党的复辟独裁。

为了让台湾人民、台湾的民主政党以及中国国民党内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派人士，更准确地认清中共的独裁本质，我推荐一篇宋美龄女士在 1982 年 8 月 17 日致中共廖承志的公开信给大家看。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 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 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 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 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 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 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 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 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 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 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 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 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 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朒（注"朒"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 1966 年开始，到 1976 年 10 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 2000 万人，波及遭殃者至 6 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 727000 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 34000 人被害致死。

《北 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 12000 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 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 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 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 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 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 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 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 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 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 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甡甡（注“甡甡”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 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鳌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 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 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顺祝安谧 民国 71 年 8 月 17 日 宋美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46 网易、腾讯，你们就继续做共产党的帮凶吧

昨天（11 月 10 日），我的老朋友中国民主党美西党部主席郑存柱先生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份国内著名网站"网易"的网络屏蔽的敏感词文件。这份文件挂在网易的体育栏目里面，文件的名字叫"badwords.txt"，翻译成汉语就是"坏词"。那么，这些被"网易"认为是坏词需要被审核屏蔽的敏感词有哪些呢？
郑存柱先生介绍说，"网易"的敏感词共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是共产党的政治术语和现任、历任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怕网友谩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党和国家领导人"， "网易"认为是无论是赞扬还是攻击这些人的，都需要被审核。
这些词是：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习近平、李克强、贾庆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无一漏网；江绵恒、温云松、胡海清等太子党也榜上有名；宋祖英因为国母的绯闻而名列其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被禁止；已经召开的 17 大和没有召开的 18 大也是敏感词。
第二类是和法轮功相关的人物、术语、机构，像李洪志、九评、610 办公室、大纪元等。
第三类是六四。像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柴玲、吾尔开希、64 运动、89 民运，包括汉字大写数字"陆肆"、"捌玖"，还有"十九年前"（估计明年要改成"二十年前"）、"广场上的热血"、"天安门母亲运动"、"平反六四"等等相关的词语。
第四类是民运、维权类的人物和词语。2007 年 10 月以后，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终结独裁，实现民主的"汪兆均"、"郭泉"、"郑存柱"以及"上访"、"维权"、"蚁力神"等词。
第五类：民族宗教类："门徒会"、"回教"、"回汉纠纷"、"西藏独立"、"狮子旗"、"穆斯林"、"大昭寺"等等。
第六类是真正的"坏词"，像"我操"、"操你妈"、"fuck"等等。
其实，类似这样的"badwords"（ 敏感词），除了"网易"外，国内所有网络公司的即时聊天工具和网络论坛都有。
例如，腾讯 QQ 个人聊天窗口把"中共独裁"、"大纪元"等词汇屏蔽。只要是文章中带有这些词的，全部文章都发不出去。腾讯 QQ 空间屏蔽了"民主"、"专制"、"镇压"、"政府"等词汇，甚至连"物价"这个词也不能幸免。

至今，腾讯 QQ 还关闭着我的 QQ 空间，大概快一年了，具体情况请大家参见《民主先声 140：马化腾先生，请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网易的总裁是丁磊先生，腾讯 QQ 的总裁是马化腾先生。马化腾先生曾经自豪地说："在网上我才会获得完全的兴奋。"那么，我要说的是，马先生，你兴奋地挣到钱之后，怎么不让我们兴奋地争取民主了呢？
后来，马化腾先生在网络上认识了网易的丁磊先生，约了出来喝酒。马化腾先生回忆到："当年一起喝啤酒的时候，我们只是打工仔而已，都还不知道未来。"那么，请问，你们现在知道中国未来会是继续一党专制，还是实现多党民主呢？当年你们不知道象你们这样的打工仔也会成为总裁，那么，现在你们怎么能知道中国的未来不是多党竞选的民主国家呢？
马化腾先生自己也说："网易的丁磊后来的成功为我带来了启发，只要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是的，我们新民党人现在做的事情，也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今天（11 月 7 日），汪兆钧、郑存柱和我本人郭泉三人决定在美国正式起诉网易公司。在美国的民事案件中，这样的行为属于"defamation"，是侵权的一种。因为网易公司在美国上市，并且在美国设立相关的机构，而这种网络侵权行为所发生的损害是全世界性的。因此，美国地区法院具有诉讼管辖权。为此，郑存柱先生已经找到了人权律师，并起草了诉状。同时，也分别和网易公司在中国和美国的机构进行了联系。
网易公司在这个文件曝光之后，很快清空了这个文件的内容。但是这个文件的网页截图和 google 的快照截图都已经被保存作为证据，另外有上百名网友愿意提出书面证词。
在收到起诉通知之后，网易公司很快回信，承认了他们的错误，并进行了道歉，同时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给予正式的答复。
众所周知，中国的网络公司都对网民的言论进行设限，但是像网易这样公开把这个文件放在官方网站上面还是第一次。这也证实了中国进行网络言论封锁得到了这些网络公司的积极配合。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把私人姓名和一些污秽词语放在一起，是一种侮辱人格的侵权行为。
但是，我们三人联名起诉网易公司，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通过法律诉讼让人们关注中国的网络言论封锁，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基本人权，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希望网易和腾讯等国内网络公司，尽快开放网络禁锢，释放一切屏蔽词。
中共独裁统治的日子不长了，如果你们网易、腾讯等国内公司再不思悔改的话，我想，最终你们难逃"从犯"的下场。
网易、腾讯，你们就继续做共产党的帮凶吧！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民主先声 347：感谢中共警察特务让我远离了南京"剧毒地带"——仙林大学城

成文日期：2008-12-13 22:02:46 更新日期：2008-12-13 22:02:46 点击:2823
中石化下属单位南京金陵石化年产 60 万吨 PX 项目于 2005 年动工兴建，2007 年下半年建成投入试运行，项目总投资 28 亿元人民币，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PX 六十万吨和 OX（邻二甲苯）二十万吨。南 京 px 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 20 公里的栖霞山附近（南京炼油厂的厂区），距离长江的南京市保护水源不到 1 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饮 水就发生重大问题。离此装置不到 1 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游玩的著名景点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 3 公里，大学城里有 10 所全国 重点大学。居住学生、教师和教师家属接近 20 万人。炼油厂的生活区里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 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 2 公里左右。
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 px 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装置一运行，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一旦发生事故将直接危及附近数十万居民和南京城内的数百万居民的生命安全，并对长江下游数十座县市造成严重污染。
2007 年 8 月开始，我和南京的徐雪峰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南京市民抵制南京 px 项目，我们在南京的门户网站（"西祠胡同"）上开辟了专门的抵制南京 px 项目的讨论版，并利用组建抵制南京 px 项目 QQ 群的方式，向广大南京市民介绍南京 px 项目对南京人民的危害。结果我在 9 月被中共南京警察特务找"谈话"，他们一方面承诺"保证有毒化学物质不会泄露"，一方面关闭了我在"西祠胡同"上所有的关于南京 PX 的讨论文章，并封掉了我在"西祠胡同"上的 ID（注册网名）和我的所有关于抵制南京 px 项目的 QQ 群。
2007 年 11 月，我把南京 PX 项目写进了我的关于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公开信，于 11 月 14 日发给了全国人民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 大委员长吴邦国。呼吁人民高度关注专制统治者的这种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本民族未来的犯罪行为。号召中国人民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 惕，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有效地抗议活动。参见《民主先声》72。
我的这封公开信的第十八节，也就是最后一节的标题是《十八、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最 后，我说："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群居住地以外 100 公里以外），

但是权贵者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 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我得到消息说，中共中央最高层批示，为"维稳"，南京 PX 项目"缓建"。
PX 全称"对二甲苯" （para-xyl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为无色透明液体，有刺鼻气味。国际有关化学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人类居住地 100 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巨大危险性，而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南 京大厂地区的扬子巴斯夫化学公司周围数公里都能看到烟囱里飘散的白烟，闻到含苯的化学品的刺鼻味道。PX 是对人体危害最严重的有机化工原料，最初级的原料 是石油。国内市场对 PX 有巨大的需求，百份八九十用来生产聚酯原料，做成涤纶产品，供应给纺织企业。整条产业链大致如下（PX 处于中间位置）：石油→石脑 油→对二甲苯（PX）→对苯二甲酸（PTA）＋乙二醇（EG）→聚酯切片（PET）→"涤纶长丝（PFY）"或"涤纶短纤（PSF）" 在 PX 生产过程中，要用到高毒、高致癌、且会造成"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苯和甲苯（中毒者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虽然两者都是在封闭的反应塔中循环使用，但中 国人民所担心的爆炸和泄漏事故并非没有"万一"发生的可能。且不说 2005 年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留意一下相关新闻就会发现，化工厂起 火爆炸、化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泄漏并造成恶性污染的事件正日益增多。
生活在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民。
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专制集团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如此众多的有毒的化学工业。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地区（南京、厦门、海南等）竞相上马了 PX 项目。没有民主监督的专制集权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只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中国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
而专制集权集团却无须担心中国人民投中国政府的反对票，因为中国人民手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
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就是专制集权者"钦定"了一些拥护专制集权的所谓的"选民"欺骗中国人民的把戏而已。中国的专制集权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2007 年 12 月，我因为发表这封公开信被中共警察伙同中共南师大党委"决定"不得在课堂上上课，取消教授津贴，保留基本工资。这样，我就告别了南京的"剧毒地带"——仙林大学城里的学生朋友们了。最近，又得到消息，被"缓建"的南京 px 项目将于近日正式运行生产。
我想，我该感谢中共警察特务让我远离了南京"剧毒地带"——仙林大学城。我再也不会闻到刺鼻的有毒气体了。但是，我今天（11 月 12 日）到收到了我的学生沈杏培的"红鸡蛋"，让我又揪心起来。
我 2001 年"博士后"结束留校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同时还兼任研究生班主任，直到 2004 年我出任文学院院长助理、成教办主任，才卸去研究生班主任一职务。
2004 年，学生沈杏培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研究生辅导员一职，同时学院决定不再设研究生班主任职位，于是沈杏培应该算是我的继任。
沈杏培一直在仙林工作，结婚生子。他性格沉稳，可以说在底下的若干年内应该都工作、生活在仙林地区。
沈杏培给我的"红鸡蛋"是用一个美丽的红布包包装的，扎口的地方是一个可爱的米老鼠。红布包包里有两颗巧克力和两个红鸡蛋。
红布包包上贴了一个菱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他们全家三口人的名字："沈杏培、姜瑜、沈心悦"，三个人的名字下面是一行字："我们有宝宝啦！"
看到这个可爱的红布包包和这张温馨的小卡片，再想到他们生活在南京 PX 项目的浓烟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手机：13151423196 Skype：gwnguoquan

郑存柱：民主先声 348：大智大勇的郭泉先生
【大纪元 11 月 17 日讯】今天，我刚刚开车从洛杉矶到达旧金山的办公室，在网上遇到几位国内的网友，正在谈论一些热门话题，突然看到郭泉先生发来了短信： 郭被抓。
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便问他被抓了怎么还能发短信？是不是警察在门外？他却突然掉线了。我觉得事态突然，马上把以下的消息通过网络发送出去，请求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证实：
"郭泉好像刚刚被抓了，你们打电话联系问问，刚才在网上，突然收到郭泉先生的短信： "郭被抓"。然后郭泉就掉线了。请国内的朋友马上打电话证实这个消息。
以下是我刚才和郭泉的聊天记录:
[23:21:48] 郭泉 says: 郭被抓
[23:22:20] 郑存柱：地方选举是政改的突破口 says: 自己被抓？？？
[23:22:26] 郑存柱：地方选举是政改的突破口 says: 怎么发信息？

[23:22:35] 郑存柱：地方选举是政改的突破口 says: 警察在门外吗？
[23:23:01] 郑存柱：地方选举是政改的突破口 says: ？？？？
[23:23:09] 郑存柱：地方选举是政改的突破口 says: 快说!!!
郭泉一直没有答覆，并很快吊线。
我马上打他的手机，一直没有人接听。
请国内朋友联系看看，证实这个消息。
中国新民党 代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郭泉的校内网：http://xiaonei.com/gwnguoquan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 122 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收
郭泉的妻子李晶的电话：13813908784"
结果很快就出来的。郭泉先生确实被抓捕。
一个小时内，更加详细的消息陆续发送过来。大纪元记者在和我通了电话 5 分钟就发布了最详细的新闻：
(大纪元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星期四（11 月 13 日）早上，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被南京警察抓走，警察并从他家里抄走其个人资料。当地公安给其家属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走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郭泉的妻子李晶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今天早上八点多钟，他送小孩出门的时候，就被人带走了，还出示了一个文件给他妈妈，说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被带走的情况我不清楚。我一早出门的时候就被公安拦了下来，先把我带到鼓楼区派出所，问了我一些话，又把我带回家，来了 20 多公安把他的东西搜走。"
警方对郭泉的妻子说:"这次'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可能要判刑。"李晶一直追问警方带走郭泉原因是什么，"公安说他们对案情不清楚，具体要什么公检法来判，他们只是执行任务，具体的他们也不知道。"
据郭泉的朋友郑存柱发来的信息内容是:"刚刚在网上，突然看到郭泉留下一句话：郭被抓，我还以为在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警察在门外，但是他却突然掉线了。我马上给他打手机，却无人接听。我立即通知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证实，有多人和他妻子联系上，证实郭泉刚刚被抓捕。"
郭泉被抓，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和他的多次交谈中，我也知道他早就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记得不久前，我在和他交谈的时候，就对他说:"我觉得你在不断挑战共产党的底线。"他哈哈大笑，认为我看穿了他的心思。是的，从去年他发表公开信开始，他的"民主先声"就像一发发炮弹一样，不断地发射出去，向着专制制度开火；然后他又宣布成立"中国新民党"；在几次的拘留都安然无恙地放出来以后，他又联系在海外的政党组织结成反对党联盟；一个月之前，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准备出版《新民报》，开始向"报禁"发动进攻了。我还以玩笑的方式劝他慎重考虑:"你搞新民党，虚虚实实，共产党拿你没有办法。别人还说是因为你的妈妈是胡锦涛同学，所以不抓你。如果你真的出报纸，别说你妈妈是胡锦涛同学，就算你爷爷是邓小平的同学都保不住你，他们一定要抓你的。"他就说，抓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要看看共产党在什么时候抓我，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哪里是雷区，哪里是安全的。我就算是在扫雷吧，让后来的人可以走地更安全，走地更远些。
我很是感动，便对他说，如果哪天你是因为和我联系而被抓捕，你判刑了，我也回去和你一起做牢。
可惜的是，在网络上却有不少人对他冷嘲热讽，不但不理解他的行为，反而有人还说他是民主的"芙蓉姐姐"。我就替他辩护说，他的"芙蓉姐姐"式的做法是大智大勇的。一方面是竭力在虚化而保护自己，一方面也不断突破共产党的警戒线，向政治改革的禁区挺进。如果连"组党"都因为他这样的方式而成为了人民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人人都可以宣布成立一个政党，并自任主席，以政党的名义来发表文章，批评、监督执政党，那么中国就会从冷战思维中走出来，人们的言论空间就会变得更加宽敞了。
当然，郭泉先生也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人物。他对坐牢也看得很开：那是共产党在给他机会制造一个英雄。有人说，郭泉这样坐牢不值得，现在大家会关注他，过几年大家就会把他忘了。但是郭泉却很想得开：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面，需要不断有英雄出现。如果因为有更多的新人勇敢地站出来，从容地走进共产党的专制的牢房，那么他愿意被人默默遗忘。
但是，我想对郭泉说:"不，我们不会遗忘!"
是的，我们不但不能遗忘，甚至不能让郭泉先生坚持写作的"民主先声"因为他的被捕而终止。于是，在得知郭泉先生因为"颠覆政府"而被捕的消息之后 2 小时内，我就早早完成最新一期的"民主先声"，以此来回答专制的政党：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必忘!
2008 年 11 月 13 日 凌晨 2：30 于旧金山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先生的战友
中国民主党美西委员会联系人：郑存柱

电话：626-227-4575
email: minzhu98@yahoo.com(http://www.dajiyuan.com)

郭泉：349 郭泉上诉状全文 2009-10-26 08:53:03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郭泉、男 、1968 年 5 月 8 日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文化 、 原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住南京市鼓楼区金信花园 1 幢 2 号 1001 室 。

上诉人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宿中刑二初字第 0002 号刑事判决，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提起上诉，希望贵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上诉的事实和理由：

一、审判决书根本没有法律分析，只有事实和结论，没有论证，是一篇蹩脚的政治判决书。

该判决书所查明的全部事实是："被告人（上诉人）于 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 11 月间，撰写并通过互联网多次传播《民主先声》系列文章，诋毁我们现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扬言要终结全部现存的独裁专制制度；在互联网公开发布《中国新民党党章（暨施政纲领）》、《中国新民党（CNDP）党建党务大纲》，非法组建"中国新民党"并自任所谓代主席，积极发展了刘成功，牟昊、杨士振等新民党成员，提出孔强、王喜强等人担任山东、浙江等地党部负责人，号召新民党党员交特别党费资助走四方维权工作室；通过互联网策划了七日在家革命，民主革命蓝色运动等活动，要求全体国民在家，不与专制者合作，不为专制者服务，备齐七天之饮食，静候民主中国来临，妄图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借助部分群体维权之名策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该判决书中本院认为是："被告人上诉人通过互联网非法组建中国新民党，并通过互联网发表大量反动文章，发展党员，策划七日在家革命，民主革命蓝色运动等活动，组织、策划实施颠覆我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经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依法应予严惩。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行驶该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被告人上诉人的利用非法组建中国新民党，发表文章，招募党员，策划七日在家革命等方式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危害了国家安全，其行为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

以上是一审判决书所有认定事实和结论，上诉人全文照抄，是为了暴露此判决之漏洞百出，没有分析论证，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混为一体，将党和国混为一谈，将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将人民主权偷换作中共主权，且使用非法律、文革用词"反动"文章，暴露其以意识形态定罪的实质。判决书完全没有逻辑推理，没有法律分析，断章取义，故意不提新民党的宗旨即多党竞争，并故意回避上诉人、辩护人一审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完全违背了法律文书应有的要素，类似一篇蹩脚的政治判决书。二审依法应予改判，以体现人民法官的基本素质。

二、上诉人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垄断执政，提倡多党竞选，组建新民党，符合现行宪法，更不是刑法 105 条的惩罚对象，一审判决逻辑将执政党和人民主权混为一谈，本身颠覆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权结构。

通观一审判决的逻辑，无非是认为，上诉人组建一个提倡多党竞选的政党是一种颠覆现行政权、试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上诉人认为，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在法理上是荒唐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正如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和辩护人问公诉人的话，在我国，如何才能合法组党？公诉人无言以对，一审判决书也故意回避这个问题。

1，　一审判决认为，组党和中共共产党竞争即系颠覆国家政权。上诉人认为这直接违反我国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一审判决书本身颠覆了我国政权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宪法。宪法规定了政权的组织形式，宪法还规定了政权中执政官员的产生方式，就是通过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层级的执政官员。（参见宪法第三章）。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机关的执政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宪法没有规定某个政党一定就必须是执政党、或是永久的执政党。一审判决认为，反对这个执政党垄断政权，就是颠覆现政权，这种推理是错误的。显然，这个推理存在一个错误前提，就是曲解认为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永久执政党]，[且不得与之竞争]。我们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既违背常识，也曲解了宪法。不但我国宪法主文没有这样的规定，就连宪法序言也没有这样的描述。

（1），宪法主文没有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任何内容。而序言仅仅是宣言性的，不具有法律的形式、效力。

宪法序言中在第十自然段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文字的前提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在政协会议中，提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并发展。应该说，宪法序言是描述性的、宣言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序言中涉及到大量的描述性表述，如中国的历史，地理，革命历史，这些都是对事实的描述，是不符合法律形式的。

从常识而言，法律需要明确的规则，违反法律需要有一定的后果，如果违反法律没有一定的惩罚后果的，严格意义上，这个不是法律，而是指导性历史知识。其次，法律应当是一条确定性规则，民众可以依照这个规则进行理解，并参照执行。现行宪法序言中的描述性、宣言性内容很多，基本上都不符合法律的形式。例如，宪法序言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如果说，这是中国法律，那么恐怕会颠覆人们对法律形式的认知。任何说中国历史不悠久的人难道都违宪了？建国 60 周年庆是否就是违反宪法了。违反了这个宪法有什么后果？宪法序言说，在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假如有历史学家认为："毛泽东的并不是领袖，中国共产党是集体领导"，这是否就违反宪法了，如何处罚？这种将宪法序言作为法律对待的理解，其后果是极其荒唐的。充其量，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一种学术探讨，或是错误的学术理论？而绝对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因为，我国没有一部法律是用来实施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内容。而对于宪法主文中的很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来予以实施。或者说，全部法律最终的上位法，都来自宪法，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下位法是宪法序言的法律。因此，从常识看，宪法序言不具备法律的基本形式，也就不存在法律效力，只是宣言性、描述性。因此，也只能是指导性的。人民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主流的观点，但是，却无法认定这是法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宪法序言（有的国家没有序言），也不认为序言是有制约力的。
（2），宪法正文规定的内容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永久的执政党"。
宪法关于国家政权机关等主文的规定非常明确清楚，完全符合法律的形式，如，全国人大的职权、国务院的职权，国家主席的职权。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全国人大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宪法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是人民是一切权力的起源。就是说政府的统治是基于人民的同意，人民设立了政府，而不是政府给与权利予人民。人民是通过选举的形式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的。而一些专制国家是通过暴力来建立其国家政权，如军事政变后建立的政权。既然人民可以选举产生宪法、法律规定的官员，这就说明，掌握政权的选举官员（各级政府首脑，国家主席，人大主任等）的任免权归人民；选举官员当选后才有任免其职权范围内官员的权力。因此，从宪法主文的逻辑推理下去，人民可以选择任何执政党，宪法主文没有也不可能规定，中国人民只能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任何政党，只要人民愿意，都可以通过选举方式成为执政党。事实上，即使宪法序言，也只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长期存在并发展，这当然也直接否定了任何政党永久执政的理论。
事实上，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永久的执政党。如胡锦涛主席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句话对宪法主文、对世界潮流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是打下来的，其合法性来自武力占领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期间，违背中国人民意志，通过武力建立的伪满政权、汪伪政权也合法了。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其基本形式就是通过人民制定的宪法建立政权，政权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胡锦涛主席多次讲话提到要尊重我国宪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应当在宪法范围内执政，就符合这个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力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民心向背基础上，因此，武力胜利后，人民即制定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并按照宪法成立了政府。现政权的合法性当然来自人民同意，而不是武力胜利。因此，人民才是主权者，人民是按照宪法治理国家。如果新民党力图推翻人民主权，才会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一审判决将人民主权替换为政党主权，是很荒谬的，也是颠覆性的。
即使退一步讲，宪法主文规定的原则和宪法序言的描述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从法律解释的原则看，主文的效力明显是高于序言的。这可以从我国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得出结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接下来是第一章总纲。显然，文中说的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等是指宪法主文，而宪法序言中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内容。这表明序言本身也认为其不是法律。
2，既然宪法否定了"一党垄断执政"的合法性，上诉人提倡多党竞选并组建新民党就是符合宪法规定的。符合宪法规定的，必然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
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规定了选举制度，也规定了选举方式，以差额选举为常规，以等额选举为例外。这实际上是民主制度在选举中的体现，因为人民有权选择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有权选择官员。如尊敬的顾肃教授所提出的"只有有竞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这也是一个常识。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是基于一个普遍常识，市场垄断会导致侵害消费者利益，高价，滥用市场权力。这些弊病，在政治垄断情况下一样会发生。如何消除垄断，就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黄炎培的答案：[只有民主]。人民可以通过民主方式，民主就是有竞争的政党市场，打破垄断，把不反映人民利益、意志的执政党选下去，把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党选上来。这就是我们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既然，需要政党之间竞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从我们宪法的顺序看，公民权利章节先于国家政权机关，从修宪资料看，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基于公民授权，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政权。公民保留结社权，通过结社权组建政党，参与民主选举，通过选举方式成为执政党，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可以说是公民自己保留的权利。公民既拥有选举方式更换政党的权力，也保留了自己组建政党参与竞选的权利。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假设公民没有这个权利，即使有选举权，也没有真正的民主。譬如，假如晚清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公民有选举权，但是只能选举满族皇室指定的候选人作为执政者，难道可以说这是民主，这是人民主权吗？显然不是。
从我国法律对宪法规定结社权的事实状况看，我国的法律规定了社团条例，但是，社团条例上并没有包括政党。从

我国目前存在的 9 个政党都没有登记或者补登记的事实看，社团条例规定的社团不包括政党。因此，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组建政党，也没有规定组建政党的法律程序。法非禁止即允许，对于公民来说就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公诉人，一审判决都无法回答，"在我国，如何才能合法组党？"的真正原因。退一步讲，即使社团条例中规定的社团包括政党，违反这个社团条例的后果最多是取缔此社团，对非法组建人进行行政处罚。而不是刑法的处罚对象。

3，执政党不是国家政权，只是通过其当选官员一定期限内掌握了国家政权。

上诉人的所有观点，都是在提倡多党竞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一审判决混淆了一个逻辑，将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等同起来。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颠覆国家政权等同起来，无疑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在目前的现实执政方式下容易犯，但是在宪法范畴下，是容易厘清的。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等规定了政权中关键官员产生方式，这些官员是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事实上，现代政治已经完全离不开政党政治。公民通过行使结社权，组建政党，团结起来，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公开其主张，进行竞争，从而赢得人民的选票，在议会中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些政党一旦选举获胜，成为执政党或者联合执政党，就可以获得一部分宪法、法律规定职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位。宪法、法律又规定了主席可以根据人大决定任免总理等内阁成员，也规定了某些职位可以任免一些官员，这些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称之为选举官员。另外政权机关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事务官员，按照公务员法，他们不会被随便解职的，只有犯有错误的情况下才能解职。因此，执政党的更换只会影响选举官员及他们直接有权提名、任免的官员。而不会直接影响事务性官员，事务性官员原则上是中立的。这种划分在宪法架构下是有意义的。因为，国家政权机器的运作离不开事务性官员，如果把选举官员比做汽车驾驶员的话，事务官员就是汽车的各个零件，无论往哪里开，都离不开汽车零件。选举官员负责重大决策，事务官员一般负责执行。这样，在执政党更换后，才不会增加改朝换代的成本，毕竟，这些成本都是人民--纳税人支付的。

上诉人主张的就是选举官员之间的竞争，不涉及到国家政权机关本身，而只是反对国家政权机关的临时掌控者变为永久掌控者，一审判决显然没有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别，一审判决这种主张是违背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本身就颠覆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将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谎而变为政党主权，就颠覆了宪法原则，对此二审法院应当予以严肃地纠正。

4，刑法 105 条第一款惩罚对象是试图用武力推翻人民对政权的掌控，推翻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上诉人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该条第一款规定。

这一点，上诉人的律师在其辩护词中已经阐述清楚。上诉人需要重申，上诉人的新民党既拥护人民主权原则，又主张全民福利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符合刑法 105 条第一款所惩罚的对象的。鉴于刑法 104 条已经规定了武装叛乱罪，因此，刑法 105 条第一款就是多余的，罪名本身应予废止。

三 ，上诉人批评执政党独裁不是犯罪，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反动文章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定罪的表露。

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上诉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就是上诉人的民主先声 347 篇。这些文字无非是针砭时弊，批评执政者。如果这种文字都能被认定为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历史教科书中对历代文字狱的批评将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审判决否定了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给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第四十一条对政府的批评监督权。

1，行使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权是有边界的，但其边界是指煽动暴力引发即刻的骚乱，或用武力叛乱。对于批评性的，诉诸于和平方式变革的，是完全受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保护的，与国家安全无关。

正如一审判决书提到，个人行使自由权利是有边界的。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问题是这个边界在哪里？虽然这个边界有点模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非暴力煽动的言论，提倡和平理性方式实现变革，肯定不会接近这个言论自由的边界的。一审判决所谓上诉人组建政党，发表文章，招募党员，策划七日在家革命，危害了国家安全。上诉人认为，一个执政党受到批评和竞争，与国家安全是没有关系的。

言论自由的边界只有，当当事人的言论涉及到暴力煽动，或者直接提倡暴力，针对特定的法律保护对象时，才会涉及到触犯了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显然，上诉人的一贯立场是清楚的，是和平方式的，主张多党竞选方式改变现共产党垄断政权的模式。至于一审判决断章取义，截取几句上诉人预计，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可能会出现的人民起义，作为上诉人有暴力煽动的依据，显然是对上诉人言论的曲解。上诉人撰写是文章，无论是党章，党建党务大纲，还是绝大多数文章，都非常明确提倡和平，竞选，明确反对暴力，反对组建军队，甚至，反对任何形式的上街游行。因此，才会提倡七日革命。这种和暴力煽动背道而驰的言论，是完全应当受宪法保护的。再多说一句，即使有人的文章，提及暴力革命，只要不是会引发即刻暴力骚乱，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保护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理论，但是，在 100 多年前的英国都没有受到迫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 100 多年之后显然也不应定罪。上诉人组建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竞争，最多只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国家安全没有逻辑关系，一审判决将党国混为一谈，毫无逻辑。

2 ，批评执政党垄断政权中的选举官员职位，并与之竞争不等于推翻现政权，更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如上文中区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样，党不等于国家，党不等于政权。执政党和政权的关系只是选举官

员掌控国家政权机关的决策权而已。正因为如此，上诉人所批评的正是执政党执政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执政党，恐怕就不会引发上诉人的批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执政党都会受到民众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批评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时，也是不遗余力，其言辞之激烈，恐怕不亚于上诉人，（见一审辩护人提供的证据《历史的先声》），当时的国民政府依据彼时的新闻法，给与了一定的宽容，（尽管，国民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也有局限），当时的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并没有因此受追诉。上诉人认为，历史不应该轮回，至少应当有进步。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对政府的监督权，并由此制定了国家赔偿法，我们应当切实保护这种宪法性权利，从而在实践中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事实上，从世界上看，对民众批评政府言论的宽容程度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足够民主的试金石。正如一个人面对待批评的态度一样，可以看出其涵养，素质，自信心。一听到批评就暴跳如雷，只能说明此人没有自信，西施那会在乎别人批评其貌不美，姚明那会在乎别人批评其身不高。即使，别人的批评正好触到痛处，有古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听得进批评言论从而改进，才是一个正直君子该做的事情。为人如此，为政更应如此。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推广孔子学院，孔子二千年前就说，"丘幸也，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第七）。有人提意见是一件幸事，为何非但不感谢而反而加之以刑？

上诉人系革命烈士之后，曾供职政府机关、法院，后来成为学者，对现实有一定的了解、研究。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才会冒一般人不愿冒的风险，对执政党说出一些批评和建议的话。也同时尝试行使一般人不愿意尝试的宪法规定的结社权，组建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有足够的自信，相信人民的选择，而不能以执政工具打击上诉人。《后汉书》说，国君不可仇匹夫，仇之则一国皆惧。即使到了现代，执政党也应当知道，执政者不可以仇民权，仇之则一国皆惧。二审法官作为法律人，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及法律精神出发，应当能够得出，上诉人的行为，与国家安全无关，更不在刑罚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范畴内。上诉人希望，二审法官能本着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公正执行法律。

四，一审审判程序上存在极大的违法，二审应当宣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

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连行政机关都不得干涉，政党显然也不得干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任何人不得干扰法院司法。最高法院的领导人多次提出，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因此，对于上诉人批评执政党的行为，对于上诉人组建新民党（对于新民党是否有组织性的观点，以一审上诉人的辩护人观点为准）试图和中国共产党竞争的行为，法院应当保持中立。而一审法院显然没有做到司法中立。

1，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秘密审判。

根据我国宪法第 125 条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任何第一审案件均应当公开审判，但是，一审法院有组织地将旁听者，将旁听证只发给宿迁市政府机关的官员，组织这些人大、公安局的官员将旁听席坐满，并对外不公开发放旁听证的做法，上诉人的辩护人的助理等向法院申领旁听，被一审法院拒绝。实际上，一审法院搞的是变相秘密审判。违反了刑诉法的明文规定，剥夺了上诉人享有的公开审判权利。公开审判本身就是昭示天下，让百姓民众来判断这个审判程序是否公正，实体是否正义，同时也起到教育百姓的作用。一审法院的秘密审判行为，只能让上诉人认为，法院害怕公开，因为，上诉人的行为本来就是无罪的。

2，一审审判时，剥夺了上诉人的质证权利，并有他人操控庭审审判的嫌疑。

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多次提出要查看笔录，证据，然，法院多次拒绝。一审公诉人出示证据的方式也不公平，公诉人以快速念读页码、并摘录部分宣读的方式，违反了刑诉法出示证据的方式，上诉人及上诉人的辩护人根本无法核对相关笔录，因为，公诉人使用的页码和上诉人律师使用的页码是不一样的。对于上诉人辩护人提出的多次质疑，一审法官仅仅回应了一小部分。

同时，上诉人注意到，一审合议庭在审判中，频频阅读前面电脑显示屏，每当遇到重大争议时，审判长就会多次注意显示屏，待看完显示屏后，才得出结论，鉴于本案有闭路电视直播庭审，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有人可能在操控庭审。上诉人认为，这种审判，违背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

3，一审法院允许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是违法《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

法律规定的检方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建议延期、补充侦查，应当指开庭结束之前，一审法院在 2009 年 8 月 7 日开庭已经结束，并宣布本案待审委会讨论决定后再择日宣判，因此，检方无权建议延期、补充侦查。

我国刑诉法第 165 条条文如下：第一百六十五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三）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对上述条文中的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特解释法律如下：

第一百五十七条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因此，我们只需要解释在"庭审过程中"是否应当包括开庭结束后。庭审过程中的范围是指宣布开庭到宣布休庭，还是从刑事案件进入法院到法院宣判之前。如果法律解释应该是

前者，本案中，人民检察院已经无权退回补充侦查，一审法院同意补充侦查在程序上是违法的。
根据文义解释，条文上下文理解，最高法院其他司法解释的"庭审过程中"的用词，以及刑诉法之平等原则，上诉人得出的结论是，"庭审过程中"的合法解释，应当是法院开庭审理结束之前。(详见，一审辩护人给一审法院的书面异议)。
因此，一审审判中，允许检方退回补充侦查是违法的。鉴于我国对这种程序违法的纠错程序不明确，建议二审法院本着公正原则，撤销一审判决，直接宣判上诉人无罪。
五，一审判决没收书写工具电脑是荒唐可笑的，恰恰证明了文字狱的存在。

一审判决的主文第二项是没收上诉人的电脑，表明上诉人真的就是以文字获罪的最清晰的证据。如果上诉人不是用电脑写文章，一审判决是否要没收上诉人的钢笔？从来没有一个法治国家会在判决书中会没收一个学者的钢笔，说这是作案工具，岂不是正好证明这个国家会以文字入狱。电脑键盘，无非是书写工具的延伸而已。这种判决，岂不是自曝其丑？
尊敬的二审法官：
宪法、法律毕竟是纸面的，其实施依赖法官根据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按照内心确证，来进行审判。法官对法律的公正理解，独立司法才是公民权利得到法律保障的前提。尽管上诉人也明知现实可能存在多少不正常的影响，上诉人之所以上诉，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对法律人人性、勇气的期待，毕竟，社会在进步，总归有一天，总归有一案，法官会对那种非法干扰因素说，"不"！哪怕这个"不"，不是发生在上诉人的案件中，上诉人也期望这一天的到来。上诉人这个案件，给这个迟早会来的"不"，多一次机会！多一点激励！多一点道德反省力量！本案不管结局如何，上诉人当然知道，历史会站在谁一边！
谢谢！